

美國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从殖民地時期
到劳联的成立

方 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美國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从殖民地时期到劳联的成立

方 納 著

黃雨石、王仲英、黃寧而
沈國芬、陳大春、黃巨興 合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6年·北京

俄譯本序言

英勇的蘇聯軍隊粉碎了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這就根本改變了現代的國際形勢。

世界已經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反動的美國資產階級領導了帝國主義和反民主的陣營，但所有民主和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則團結在以蘇聯為首的民主陣營里面。這一切就特別有力地說明，必須加強我們對國際反動勢力的堡壘——美帝國主義——所進行的思想鬥爭。

大家知道，“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目的是鞏固帝國主義勢力，準備新戰爭，反對社會主義與民主，支持一切地方反動的、反民主的和親法西斯的政權和運動。”（日丹諾夫語）

現在國際反動勢力的重心和準備新帝國主義大戰的主要策源地就是美國。美國反動的資產階級公開極力想實現它的世界霸權。列寧曾經寫道：“威爾遜的理想化的民主共和國，事實上原是最瘋狂的帝國主義和對弱小民族實行最無恥的壓迫與摧殘的形式。”*

美國資產階級老早就就是人所共知的自由與進步的死敵。不管美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如何頌揚“美國生活方式”，不管他們把“美國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六九頁。

自由”、“美國主義”、美國資本主義“不可限量的繁榮可能性”形容得怎樣天花亂墜，——這一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帝國主義反動勢力辯護人的無恥謊言。

全世界都知道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帝國主義的美國——富豪們的美國，它是奴役和壓迫各國人民的策源地；一個是勞動者——在帝國主義桎梏下備受折磨的工人與農民——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美國在資本家的御用走卒——反動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論家——的著作中曾受到多次的描述。卷帙如山的著作描寫了資產階級的美國，這些著作廣泛地敘述了各主要資產階級政黨的表面活動、總統們的傳記，以及屠殺印第安人和侵入墨西哥及美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統帥們的“豐功偉績”。在美國的全部資產階級史學中卻沒有主要的東西，即沒有人民群眾本身的歷史、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

斯大林同志說：“……社會發展史……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即身為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群眾的歷史。”*

美國的工人群眾和美國的勞動農民，在他們本國的官方歷史中是沒有地位的。他們很少被談到、被寫到，而且，資產階級思想家們筆下所寫的盡是對勞動人民真正歷史的捏造，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捏造。

論述美國工業發展問題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如科普蘭特、巴特杰爾德爾、卡羅林納·魏爾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作了虛偽的描寫：似乎在勞動與資本之間會有協調的關係，他們並企圖證明美國

*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九頁。

資本主義發展的“例外性”。他們尤其是企圖證明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英國不同：英國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人民群眾破產和貧困的道路，而美國資本主義還在其發展的初期即已保證了人民群眾的順利發展和繁榮。

像坎門司—威士康辛（坎門司、波爾曼、萊斯科希爾等等）這樣一個歷史學派，雖然搜集了大量關於美國工人運動的事實材料，可是卻把工人運動的歷史歸結為職工聯合會的歷史，即歸結為美國勞聯的歷史，歸結為個別的、彼此不相聯系的無產階級群眾發動事件。至於比方說黑人的爭取自由的鬥爭（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貫串在美國全部歷史中），則官方的資產階級歷史著作對這個問題就加以輕蔑的沉默而閉口不談了。

美國歷史的真正研究首先是從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的。他們提供了了解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美國社會發展中那些最重要問題的關鍵，揭示了美國階級鬥爭的特征，暴露了作為進步與民主的最危險敵人的美國資產階級的殘暴面目。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列寧和斯大林認為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堡壘，他們把美國資產階級叫做培植黑暗勢力和憎恨人類的情感的溫床，認為美國資產階級是妄圖向後扭轉社會發展方向和永久保持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的主要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生和戰友弗·阿·左爾格、約·衛登麥爾、赫·施留特爾、艾杜阿爾德及愛琳娜·艾威林以及威·李卜克內西等人曾經用了許多時間去研究美國的階級鬥爭史。他們花費了許多精力以便在反復研究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以後，能夠弄清美國社會的真正歷史。他們根據大量的事實材料，指明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日益增長，以及無產階級絕對的和

相對的貧困化，並指出美國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

可惜的是弗·阿·左爾格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在十九世紀中葉和末葉的許多著作，特別是二十世紀初期的許多著作，大部分都沒有譯成俄文*。例外的只有左爾格的一些論文曾譯成俄文單行本，即“美國工人運動史”（一九〇七年聖彼得堡版）一書。左爾格的這些論文在恩格斯生前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理論機關報“新時代”上發表過。

後來，德·列昂曾對美國工人運動史作了相當多的研究。然而他的作品，正像威·李卜克內西的作品一樣，缺點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徹底。因此，決不能把這些作品看作是美國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鬥爭中標準的思想武器。

改良主義者（岡伯斯、希爾奎特、奧尼爾、米特傑爾等等）所寫的關於工人運動史的著作，是從反革命的立場，從工人貴族的立場來描寫美國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的，他們的著作是必須列入資產階級著作一類的。

在着手解決美國社會發展問題時，首先必須遵循斯大林同志下述的指示：不要忘記“美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這些基本特征是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所固有的”，而同時，又不要誇大“美國資本主義的特點”**。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揭露了美國資產階級史

* 這裡指的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期約·衛登麥爾在“革命”、“改革”等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和弗·阿·左爾格在“新時代”上所發表的文章；艾杜阿爾德和愛琳娜·艾威林的著作，如“美國工人階級運動”（一八八七年倫敦版）、“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八八七年倫敦版）、“社會民主工黨……宗派”等等；赫·施留特爾的著作：“德國工人運動在美國的興起”（一九〇七年斯圖加特版）、“國際在美國”（一九一八年芝加哥版）；和威·李卜克內西所著的“新世界一瞥”（一八八七年斯圖加特版）等等。

** 斯大林：“論美國共產黨中的右派分子”，一九三〇年莫斯科俄文版，第四頁。

学中所存在的錯誤观点，因为美國資產階級史学把美國的社会發展描寫成某种不同于欧洲資本主义的东西，描寫成文明世界史上的不同尋常的現象，它似乎是不受馬克思列寧主义科学所發現的歷史發展的一定規律的限制的。

事实上美國正如其他資本主义國家一样，是經過了同样的資本主义發展各个階段的，而美國也具有資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特征：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經濟危机、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的加深、劳动農民的破產、經常大量的失業現象等等。

得到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洛夫斯頓分子及右翼社会党人附和的关于美國社会發展的“例外性”的資產階級理論，从而也就完全被推翻了。美國的歷史每日都帶來了愈來愈多的新証据，証明这种認為美國發展的“例外性”的理論是毫無根据的，而这种理論的有毒矛头过去和現在都是針對着工人运动及其他任何進步运动的。

但这并不是說，馬克思主义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美國資本主义的特点，低估了美國工人运动的發展特点，和低估了資產階級的思想体系在工人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原因等等。美國資本主义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中，联邦政府落入美國南部奴隸主之手，而長时期內，美國資本主义，按照列寧的說法，不但能够“深入”，并且能够“廣泛”地發展起來，因为中西和远西的土地已經被垦殖了。这种与欧洲資本主义國家不同之处，在过去，就使得美國國內形成这样一种状态，正如列寧所指出，在这种状态下，“矛盾的尖銳化和对小生產的排挤並沒有消除，而是轉向更廣闊的場所。資本主义的火焰燃燒得似乎‘慢了下來’，但这是作为为它

准备了新的、大量的、更加易燃的物質的代价的”*。

一部分工人之前往西部地區，使得美國工人運動帶有不穩定的特征：已經出現的各種工人組織之所以瓦解，不僅是由于遭到資產階級的打擊，還因為那些不甘心受資產階級的剝削的工人想成為小經營主和種植園主，而“自由”土地的存在在長時期內便促成了這一點。當然，必須知道，這些土地，對工人說來，並不是如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描寫的那樣可以自由地獲得的。資產階級的政權機關，擁有奴隸的種植園主、土地投機者和工廠主都要求獲得這些“自由”的土地。因此，向西部“自由”土地的殖民就經常伴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結果就變成了聯邦政府對自行移居該地者所施行的討伐，其殘酷程度不下於對該地區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摧殘。工人們即使在遷居到新土地以後，也往往變成了大土地所有者的雇農。因此，他們還是沒有解決他們面前的任務：擺脫資本主義雇傭奴隸的地位。美國工人與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乃是爭取農業中資本主義的革命發展道路的鬥爭。

美國南部奴隸制度的存在也在美國工人運動上烙上了巨大的痕迹。北部工人的處境由于廉價奴隸勞動的存在而複雜化了，這種廉價的奴隸勞動是他們所競爭不過的。此外，一部分美國工人當中對黑人的種族偏見也是美國工人運動發展中的嚴重障礙。這些情況，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強調指出的，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範圍內，都妨礙了工人對資產階級進行徹底的鬥爭。上述的美國工人階級中間的種族偏見，直到現在仍然是美國工人運動發展中的嚴重障礙。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七六頁。

最后，在几十年中間，美國工人与外籍工人之間的矛盾尖銳化起來了。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美國勞聯、產聯中的工会官僚及所謂社会党中的改良主义者們則过去和現在都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挑撥这一矛盾。

尽管存在着削弱美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許多离心傾向，但工人运动中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翼却还是日趋成長和巩固起來了。

目前美國有三千五百多万工人，而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團結在各种职工会之內，如果考慮到这一事实，則美國工人階級在爭取進一步進步和民主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决不会过高估計的。然而，現階段的美國工人运动却面臨着巨大的危險。美國的反动势力正使用很大的力量，效法希特勒及其整个匪帮在法西斯統治德國时期所使用的手段，以便使工人的組織法西斯化，并以資產階級沙文主义來毒害他們。產聯和勞聯的右翼領袖們正与英國工会改良主义領袖們一起拚命想分裂世界工会联合会，这就是賣身投靠資本家的这些領袖們公开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一个最鮮明的例証。

美國勞聯、產聯、鐵路兄弟工会及其他工人組織中的上層分子之日益法西斯化，美國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压迫的加强，以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工人隊伍中灌輸法西斯思想体系——这一切都明顯地証明，美國的金融寡头現在正企圖麻痹日益成長的工人运动，并以狂暴的沙文主义毒素來毒害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群众。美國的反动罪惡势力正在把美國及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僕从國家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們在工人和劳动農民中間傳播荒誕無稽的关于美國的世界霸权的“思想”，并效法希特勒匪徒，宣傳和培植最卑鄙的憎恨人类的观点。

美國反动势力的卑鄙而自私的政策，不但引起了世界進步人士的正当憤慨，而且在美國國內也激起了正当憤慨。一九四八年的總統競选运动就可以說是無数例子中的一个，当时，在二十世紀里第一次在选举中出現了反对各主要資產階級政党的第三党，这是一个進步和民主的政党，它有自己独立的口号和要求，这些口号和要求是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挑撥者和反对設在華尔街摩天大樓中的美國“無形”政府的。

在美國，在加强民主与進步力量的障地方面所獲得的一定進展不能不影响到像歷史科学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的領域。在美國，正如在其他資本主义國家一样，出現了一些進步的歷史学家，他們不僅十分注意于研究人民群眾（首先是無產階級）的战斗傳統，而且竭力使这些光荣的战斗革命傳統成为反对日益抬头的反动势力的强有力的武器。像諾曼·魏尔、斯·耶恩、菲·方納等都發表了研究的作品，这些研究作品不但搜集了大量值得注意的事实材料，而且表現出超出一般資產階級观念範圍以外的观点，这些作品的作者們公开同情劳动人民群眾（首先是同情無產階級）过去和現在所進行的反对資產階級的斗争。同时，如果說在諾·魏尔及斯·耶恩的作品中这点表現得不够明顯的話，那末，在方納的作品中对資本主义制度的譴責就說得很尖銳而且很有道理了。方納的一部已譯成俄文的作品——“美國工人运动史”，闡述了到一八八一年为止，即到美國劳工联盟成立时为止的事件，这部作品是美國現代歷史著作中的一个不平凡的現象。

这部著作的主要优点——即使得這本書引起苏联讀者很大兴趣的那些东西——是在于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力求詳尽而科学地叙述美國的工人运动。方納的这部著作是一部進步的作品，

其中每一章都是用來揭露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的；他把無產階級群眾本身的積極性作為自己研究的中心，並以極大的同情來描述無產階級先進代表人物的活動，揭穿了工人階級虛偽朋友的假面具，並對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給以尖銳的批評。同時，作者還尖銳地批評了從華爾街的企業主起到白宮的代表們止的美國整個剝削體系。

作者在本書的序言中談到其主要的研究對象（工人）之時，公正地寫道：“關於這些男女英雄的生平，在我們所見到的留傳下來的歷史中從來也沒有提到過，而現在這一部書正是要對這些人的歷史作一個詳細的介紹。”（見本書第二一頁）

而且這並不是一句空洞的諾言。作者從工人階級在國內的最初發動開始，詳細闡述了工人階級的這種或那種發動產生的原因，指出了它的不成熟性、軟弱性和錯誤，但同時也堅決地強調指出，甚至美國資產階級所誇耀的那些殘缺不全的美國“自由”，也都是人民群眾在美國歷史的轉變時期用強力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過來的。因此，這部書中有关工人在爭取本國獨立、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些材料是很有價值的。該書的這幾節是根據一些沒有公布過的材料寫成的。

方納與那些抹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用與意義的美國工人運動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以及他們在改良主義者營壘中的走狗們的一般作風相反，他一再強調指出科學共產主義奠基者這些解決十九世紀後半期工人運動根本問題的最高權威者所起的作用，並詳細地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有關美國工人運動問題的最重要的言論。

本書作者提供了大量關於第一批無產階級組織——工會聯合

會、各州的工人黨——產生的材料，並說明了資產階級政客們分化工人組織的方法和手段。方納所搜集的關於美國的女工運動，關於工人在競選運動中所獲得的初次的勝利，關於先進無產者為創辦工人刊物而作的鬥爭的材料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儘管本書作者所描寫的十九世紀上半期美國工人運動的許多成就是帶有地方性質，但絕不能不同意他的這種看法，即認為美國工人當時已經提供了許多證據，證明他們對資產階級懷有不可調和的仇恨，並向其他國家的工人提供了如何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爭取自己切身需要的鬥爭榜樣。

本書中論述美國經濟危機時期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各章也是同樣值得注意的。作者在這裡（見本書第一〇五至一〇六頁）尖銳地批評了資產階級辯護人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危機的原因所作的歪曲解釋，並把工人階級先進代表人物（如衛登麥爾等人）的觀點與這些解釋作對比。有關美國內戰的各章（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揭露了南部奴隸主及其北部和歐洲〔英國〕同盟者的政策），以及敘述第一國際在美國的作用和意義的各章，都寫得很鋒利和富有內容。在這裡，方納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國內戰時期所採取的方針，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要求林肯按革命方式來進行反對叛亂者的戰爭。

在閱讀方納這部著作時，很自然地就會得出一個主要的結論，即“自由的”、“民主的”美國對工人和全體勞動者說來，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種苦役。作者描寫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不斷增長（見本書第四一三、六五二、六八二頁），並得出了必須按社會主義原則來改造美國社會的結論（第二九四頁及其他各頁）。作者強調指出了俄國對美國的和平政策以及俄國想鞏固兩國人民

之間的友誼和相互尊重的願望(見本書第四七四頁)。這樣的一個重要事實,也應該認為是方納這部著作的一個優點。

可是,方納這部著作除了具有這一切優點外,也還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其中最一般的、成為全書特征的缺點是對於出現在工人運動舞台上的個別政治活動家都不加批判地給以評價。例如,作者武斷地聲稱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有名的“左”派派別活動分子威里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見第四七〇頁)。作者認為,赫爾曼·克利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國的政敵)似乎有一個時期曾領導過美國的工人運動,大家知道,這是與事實不符的。作者給予法朗士·賴特和斯基德默以過高的評價,他試圖肯定這兩個人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是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却忘記了當時在美國,無產階級作為現代涵義的階級還沒有出現,忘記了賴特和斯基德默乃是前無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的觀點在許多方面是和自稱是全體勞動人民代表的巴貝夫的觀點相近的。本書作者沒有着重指出,賴特和斯基德默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也還不可能意識到工人階級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特殊的革命使命,而只是把工人階級看作是最受壓迫和最受苦的群眾而已。

方納有時把美國的一些進步總統杰斐遜、杰克遜、凡·布倫和林肯等加以理想化,而忘記了他們是屬於剝削階級(奴隸主和資產階級)的,並幾乎把他們描寫成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代表者(見本書第一四七、二二五、二二六、二五三、五〇〇、五〇一、五〇二頁)。

應當記住,杰斐遜和杰克遜都是奴隸主,而且是參加了種植園主的政黨的。美國的某些總統,也包括林肯在內,從贏得工人及勞動農民的同情的策略考慮出發,常常邀買人心地以保護勞動人民以反對上升的資產階級的姿態出現。方納企圖把這點說成是對勞

動人民的真正保護，然而他所引用的事實是遠不能令人信服的。

雖然方納正確地描寫了美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特征，但他並沒有着重指出，烏托邦主義者並不認為工人階級是能夠用革命方法來改造資產階級社會的偉大的革命的力量。有關烏托邦主義者的一章的嚴重缺點也就在於，方納在敘述完關於他們的活動問題之後，並沒有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歐洲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由於在後來的敘述中，作者不僅屢次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權威言論，而且在其著作中還時常強調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國際政治和社會發展的一切根本問題上所採取的戰略和策略的英明和正確，因而就更加有必要指出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了。

但是，方納在強調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運動中所採取的政策正確性時，說得不够徹底（在這裡也表現出方納的不徹底性）。方納在描寫美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破滅時，認為空想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僅是由於它力圖主張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合作，而且首先是由於空想社會主義遠遠够不上是一種科學。方納就在這裡結束了。這樣，作者就迴避了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動的問題；他並沒有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的思想，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越過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而不願意在美國人民中間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的界限。

但是，本書的優點就在於他與坎門司—威士康辛歷史學派（坎門司、波爾曼、勃蘭迪斯等等）不同，也不同于摩·希爾奎特、奧尼爾和其他的改良主義者，他在全書中，不但沒有提出和強調關於美國在發展上不同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美國發展“例外性”的

有害的資產階級理論，反而公開強調指出，在美國，正如在歐洲一樣，同樣存在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同樣存在着為工人階級所不能忍受的狀況，這種狀況過去和現在一直在推動美國工人去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本書作者在全書中，在談到美國的“自由”時，並不是經常着重指出這是一種極有限的資產階級“自由”，它實際上是資本家的“自由”，這種“自由”是用來掩蓋最露骨的反動勢力並包含有法西斯主義的成分。但本書作者卻提供了自本國成立一百多年以來的最大量的和具有豐富內容的材料，這些材料表明，工人和農民對這資產階級的“自由”抱有極大的不滿情緒。方納舉出了很多證明富豪們完全統治着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精神生活的例子，並引用了美國先進人士所發表的反對剝削者的憤怒的演說。因此，本書所引証的許多事實使我們很感興趣，因為在這些事實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工人們曾如何不得不在街頭舉行自己的集會，因為工人們所使用的一切場所都被政權機關和警察所封閉了；我們還可以知道，為獨立而鬥爭的老戰士如何被長期地關在監獄里，以及早在十九世紀，工人組織就已受到如何無情的、空前殘酷的摧殘和迫害，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則被當作野獸一般地加以消滅。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了解到，北部的資產階級如何侮辱“被解放了的”黑人，而替黑人制訂了“黑人法典”，可以了解到美國所有的反動勢力如何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運動，他們在工人運動的道路上建立起“不可攻破的”堡壘，這些堡壘便是法庭迫害，露骨的反動法律，用軍隊來鎮壓無產階級的發動等等。

作者以憤怒的心情令人信服地在書中描述了這一切；作者以最雄辯的方式指出，資本主義的美國，對於工人和全體勞動人民來說，乃是真正的地獄。

至于方納這部書中所沒有闡述的個別關鍵問題，有兩個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應該提出來談一下。

第一，本書作者在書中並沒有說明美國的資本主義大工業是怎樣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問題上，他並沒有超出他所批判的工人運動中的坎門司—威士康辛實用主義歷史學派的觀念之外。他沒有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即說明導致美國資本主義大工業建立的那一條道路的特征何在。

大家知道，這個問題只有斯大林同志當時曾經研究過。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五年時說過，歷史表明，強大的剝削者工業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有三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侵占和掠奪殖民地的道路。英國特別具有這種特征。第二條道路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進行軍事破壞和索取賠款的道路。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期間及戰後的德國即具有這條道路的特征。第三條道路就是奴役性的租讓和奴役性的借款的道路。在革命前的俄國，就是通過這條道路來建立起大工業的。斯大林同志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這些道路中沒有一條是以純粹的方式出現的。“其實，在各個國家的歷史上，這幾條道路往往交叉着和互相補充着，而提供了交織的樣本。例如，美國的發展史就是幾條道路這樣交織的一個例子。這種情況是由于各種不同的發展道路，雖然它們相互間有所差別，但是有某些使它們自己之間很接近、使它們得以交織起來的共同特征：其一，它們都導致形成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其二，它們都是以某種方法獲得的外來‘補充資本’的流入為前提的，外來‘補充資本’的流入乃是形成這種國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九八頁（譯文見斯大林：“問題與答復”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四頁）。

在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侵占和掠奪殖民地的事實——兼併了得克薩斯；占奪了墨西哥幾乎一半的領土；剝奪了印第安部落的土地所有權，對印第安人進行了真正的戰爭；有過對戰敗者索取賠款的事實——使南部破產和從南部榨取資財和設備；也曾有過奴役性貸款的事實——美國從歐洲銀行家那里得到巨額的款項來建設大工業。早在內戰之前，美國政府和個別州就欠了歐洲國家兩億美元的借款，單單是借款的利息，美國每年便要向羅特喜爾德與歐洲其他銀行家付出多達一千二百萬美元。*

第二，本書作者既沒有提出也沒有解決關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根本轉變問題。不錯，方納在敘述了一八七七年的美國鐵路工人大罷工以後，曾簡略地指出美國資產階級從這個使它不安的時期的革命事件中為自己得出了哪些結論，但他並沒有全面地提出這個問題。

巴黎公社和七十年代的美國工人運動確實使得美國的資產階級胆戰心驚。它瘋狂地着手擴充和增強全國的武裝力量，在中央和地方培植各級的官僚。這樣，在美國內戰以後，在建立“使一切服從自己和駕乎一切之上的官僚軍事機關”**的道路上就跨了第二大步。

美國資產階級在整個帝國主義時代中，一直在改進和鞏固它的官僚軍事機關，這個官僚軍事機關將其全部力量用來鎮壓國內的勞動人民和解決基本的侵略任務——保證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在美國反動勢力實施這些貪得無厭、仇視人類的罪惡計劃的道路上，兀立着偉大的蘇聯、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全世界的進步民

* 波加爾特：“美國經濟史”，第二〇四頁。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頁。

主运动。

方納所著“美國工人运动史”一書，概括了美國工人階級过去的斗争經驗，它鮮明生动和令人信服地叙述了美國人民群众过去在反对反动势力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的無窮精力。因此本書強調指出了民主和進步力量是不可战胜和不可摧毀的，从而就有助于民主和進步力量的隊伍在現代复雜的环境下的巩固和团结。苏联的讀者怀着非常滿意的心情讀完美國工人运动史学家的这部著作，因为在这部書中洋溢着剧烈斗争的精神，而这种斗争过去和現在一直是在美國內部，在反动势力和進步势力之間，在兩個美國——華尔街的美國和進步与民主的美國——之間進行着的。

阿·波列塔叶夫

(陈致中譯)

原 序

在二十世紀以前，對於我國勞工運動的歷史還從沒有人作過認真的研究。一八八六年，原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任教，後來在威士康辛大學任教的里查·伊力教授出版了他的“美國的勞工運動”一書，但他自己說他還只接觸到這個問題的皮毛。他在該書的序言里寫道：“我這本書只能算作一個粗略的綱要，我相信不久以後，一定會有一本真正配稱為新大陸勞工史的著作接着出現的。”一年後，內戰以後的一位卓越的工會運動領袖喬治·愛德文·麥克尼爾所編“今日之主要問題——勞工運動”一書問世了。該書內容包括從殖民時期到一八八六年間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和對美國某些工會的歷史情況的評論。麥克尼爾寫道，“我們這裡獻給讀者的這部歷史，只不過是將我們所能從各種勞工組織的記錄，各種報章雜文，以及我國各處很多思想家的經歷中搜集到的材料編排在一起而已。”

但除了麥克尼爾在他這本有價值的著作中所發表的材料外，從種種勞工組織的記錄、各種報章雜文中，是還可以找出更多的東西的。自然首先必須完成這個搜集材料的艱巨工作。伊力教授自己在這方面是做得很有成績的；他在二十年的時間內，完成了極大一份勞工文獻的搜集工作。這些材料最後都送到芝加哥約翰·克萊拉圖書館去了。但關於搜集勞工史料的最有價值的工作，還是

威士康辛大学教授約翰·坎門司同他的兩位合作者約翰·安德魯博士及海侖·薩姆納博士所進行的。在“美國工業材料研究局”（總局設在麥迪生）的主持之下，這些學者們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開始了對全國各個圖書館、書店、歷史學社及各地私人收藏的全面調查，發掘出了很多使我們對美國勞工組織的發展有進一步認識的雜文和報紙上的材料。這次調查的結果，找到了很大一部分從來沒有人知道的勞工史料，而這些史料大部分都存在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里。一九一〇年，這次搜集所得到的材料大約有十分之一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這一部十大卷的巨著中發表了；從此研究勞工問題的人便有了極其豐富的一份關於一八二〇到一八八〇年間勞工運動的原始材料。

此外就在这个时候，在坎門司教授的領導之下，他的幾個學生（大衛·塞波斯、愛德華·米脫門、亨利·霍格蘭、塞里格·波爾曼）和海侖·薩姆納及約翰·安德魯一起已經開始了編寫第一本真正詳細的美國勞工運動史的准备工作。一九一八年約翰·坎門司及其副手所編“美國勞工史”的頭兩卷出版了；這兩卷所包括的時期是從殖民地時期初期到一八九六年。唐·賴斯柯義爾和伊利莎白·布蘭底斯合編的第三卷及塞里格·波爾曼和菲利浦·泰弗特合編的第四卷則先後在一九三五年中出版了；这里面便包括了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勞工運動的歷史。

坎門司及其副手所編的這一部著作，特別是作為在處女地上破土的前幾卷，所包括的材料是那樣的全面，以至於在其後很多年中，一切關於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書籍都顯得不過是依據這部詳盡的“美國勞工史”所編寫的一種提綱而已。但很明顯，對於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第一，自從

“美國勞工史”的前几卷印行以后，一份重要的有关美國勞工运动史的文献已經出現了；这里面有些是工会运动者所寫下的雜記，大部分却是各專科學校和大学中所存、未經發表的論文和專論。这些專論里的材料使得我們对于某一特別时期和特別地区勞工运动的發展有了一种新的認識，因而也使我們有必要重新估价过去那些有关这一問題的作品所做的結論。同时更重要的是大家已經慢慢認識到，約翰·坎門司及其副手的那部著作，虽然包括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却有其相当明顯的缺陷。近來勞工运动的發展則使得这些缺陷更加顯著了。

“美國勞工史”中的每一章都充滿了坎門司—威士康辛学派实用主义的勞工运动理論。这个学派認為所謂勞工运动只是如何組織工会并如何使它們的策略適應“环境”的一种实验过程。他們經常着重地討論美國环境的特殊性（如沒有封建約束，土地的自由使用，階級流动性很大，民主政治团体很多等等）；他們認為，这种特殊环境，使得美國工人不可能有什么階級意識。因此，在坎門司—威士康辛学派看來，虽然階級意識是欧洲勞工运动的組織基礎，而在美國勞工运动中其組織基礎則应是“職業意識”。根据这个学派的說法，在美國一切能够存在的勞工組織都是曾經認識到这个基本差別，并使自己的組織環繞着某种特殊的工人職業的。其他那些宣傳勞工利益一致及共同行动諸原則的組織，那些号召工業工会里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團結一致，号召外來的和土著的美國人，黑人和白人，女人和男人團結一致，并敢于提出超出要求增加工資和爭取職業保障这种限度以外的問題的组织，是同整个美國勞工所唯一能接受的那种“意識”相違背的，因此必然归于失敗。同时，据坎門司—威士康辛学派說，勞工歷史已經証明，美國勞工

組織應該採取的唯一聰明的政策是無黨派的政策。過去勞工階級為進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所作的努力，在坎門司—威士康辛學派看來，結果是都失敗了，并常常是嚴重地削弱了工會組織。對於這個學派來說，塞米爾·岡伯斯所領導的美國勞工聯盟乃是美國勞工運動所應採取的正確政策的最高表現，因而那部龐大的“美國勞工史”，事實上也就變成了岡伯斯主義——行業工會主義，工會組織脫離政治，勞資利益一致等理論的辯護書。

其實，就在這樣一種美國勞工史理論形成的過程中，現實生活本身已經指出了勞資雙方在他們的基本關係上利害的衝突，已經開始證明坎門司—威士康辛學派這一套理論的荒誕。最近的事件更徹底地推翻了這種對於美國勞工運動歷史的分析。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形成，通過產業工會主義而形成的大規模生產工業中的勞工組織，通過最近的種種鬥爭建立起來的黑色工人同白色工人間的堅固的團結，自一九三五年以來，工會運動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巨大影響，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中所發生的影響等等，不但指出了坎門司—威士康辛學派在勞工運動為要取得勝利究應採取何種政策的問題上是如何錯誤，并且也指明了只有把這個學派所頌揚的那些政策完全拋棄掉，美國廣大勞動群眾的組織工作才有完成的可能。

約翰·坎門司及其副手的這部著作，作為一本美國勞工史來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缺點，就是它沒有從勞工運動的更廣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來研究勞工問題。最近的各种研究，已着重地說明了勞工運動對於美國民主運動成長的貢獻，說明我們對於美國邊區在建立我們的民主制度上所起作用的認識有改變和加深的必要，并且肯定地說明了我們對於歷史上很多有決定性的鬥爭應

該从階級斗爭的角度而不是从区域之間的斗爭的角度去進行研究。

現在這部著作正要根據各種手稿、報紙、短文以及現存的研究美國歷史、經濟及其他有關問題的專論材料，从上述新的角度來討論美國勞工運動的歷史。它將从勞工運動的最初發展根源直到一八八一年美國勞工聯盟成立的整段歷史時期中來追溯勞工運動的發展過程。而現在正在準備中的下一卷則將繼續寫到最近時期的勞工歷史*。

這部歷史花費了很大的篇幅討論工會組織的發展，但它決不僅僅是一部研究美國工會運動的歷史。對於工人階級在我國整個歷史上各種突出的民主斗爭和社會斗爭中所起的作用，曾經是，將來也還是要予以特別重視的。同樣，在這整個歷史時期里，工人階級，雖然一方面集中力量在進行為了滿足各個時期的當前要求的斗爭，而另一方面更是一直在尋找一個對於貧窮和社會安全諸問題的更基本的解決辦法。他們中間很多人一直是在追隨着那些在言論中或者在自己作品中表示必須廢除工資制度並要以一個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來代替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人們。

工人階級中曾經出現了很多偉大的英雄人物，男的女的，他們對於我國的民主政治曾有过很大的貢獻。可是關於這些男女英雄的生平，在我們所見到的留傳下來的歷史中從來也沒有提到過，而現在這一部書正是要對這些人的歷史作一個詳細的介紹。

作者在整理該書材料過程中對於各方面所給予的幫助表示無限感激。很多的圖書館和歷史學社讓我能够利用他們所收藏的各

* 第二卷已出版，从美國勞聯的建立敘述到美國帝國主義的出現，正在翻譯中。

種手稿、報紙、雜文及一些發表過和沒有發表過的專論材料。我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向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國會圖書館，美國古物研究社，紐約歷史學會，芝加哥約翰·克萊拉圖書館，美國哲學學會，費列得爾菲亞圖書館公司，及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布法羅、底特律各公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致謝；向威士康辛、哈佛、南加利福尼亞、紐約、杜蘭、北卡羅來納、芝加哥、叙拉古斯、羅徹斯特、布法羅、西瑞澤符、耶魯、普麟斯吞、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及哥倫比亞各專科、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人員致謝。同時我還要感謝弗羅任斯·桑恩，他允許我利用了“塞米爾·岡伯斯書信集”，感謝密西根大學圖書館管理拉巴第藏書的亞格尼士·英格里斯，他不嫌麻煩地替我在這一部分收藏里找了很多的材料。

我更感激紐約大學英文系的威廉·俄爾遜，他曾極認真地通讀過本書的手稿，並提出了很多極有價值的修改意見。西德尼·杰克遜博士，克萊爾·格林博士，蘭地先生，索菲亞·特萬及伊莉莎白·羅森夫人都曾通讀過本書手稿。他們極善意的批評，給了我很多的幫助。皇后學院的亨利·大衛博士讀過一部分清樣，並提了很多使我很感激的建議。

當然，本書可能發生的一切錯誤及本書所談到的一切意見則只能由作者本人來負完全責任。

菲利浦·方納

目次

俄譯本序言

原序

第一章 美洲勞工的起源.....29

歐洲的勞工情況(30) 移居到美洲(34)

第二章 殖民地時期美洲的勞工情況.....38

奴隸與合同雇工(38) 工資收入者的產生(42) 勞工情
況與勞工組織(46) 為民主政治而鬥爭(51)

第三章 勞工運動與美國大革命.....58

大革命時代背景(58) 自由之子(61) 政治行動(65)
走向獨立的道路(70) 獨立戰爭(74) 勝利(79)

第四章 美國工業的發展(一七八三年至一八八〇年).....83

工業發展中的各種障礙(83) 交通運輸業在工業發展中
的作用(88) 工廠制度的興起(91) 內戰前夕工業的擴
張(93) 內戰期間的工業發展(98) 內戰後的工業擴張
情況(100) 向壟斷發展的趨勢(102) 危機及勞工的回
答(105)

第五章 早期的工會組織..... 109

美國大革命後的勞工情況(109) 商業資本家的登場
(113) 臨時性的勞工會社(114) 最早的工會組織(117)
工會策略及其實際活動情況(119) 勞工與法院(127)

第六章 劳工与杰斐遜时代的民主·····	134
杰斐遜民主主义的根源(134) 各种民主共和主义会社 (139) 联邦党人的反攻(142) 杰斐遜路綫的胜利(145) 劳工与(一八〇七年的)封港令(148) 劳工与一八一二 年的战争(150) 民主制度的擴張(155)	
第七章 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三七年的工会运动和 劳工斗争·····	157
劳工的情况(157) 工人的觉醒(163) 城市总工会(179) 全國性的劳工組織(182) 十小时工作日(185) 劳工运 动与社会一般反应(189)	
第八章 早期的工人政党·····	193
政治上的觉醒(194) 劳工綱領(195) 費列得尔菲亞 (201) 紐約(205) 新英格蘭(220) 衰落和消滅(221) 成就(222)	
第九章 劳工与杰克遜时代的民主·····	225
劳工对杰克遜的評价(225) 銀行斗争(226) 紐約工人 的作用(234) 火柴民主党人的兴起(239) 火柴民主党 运动的擴張(248) 火柴民主党人的成就(253)	
第十章 空想社会主义(烏托邦)时期·····	260
工会运动的衰落(260) 机器的廣泛使用(262) 烏托邦 主义者的信条(264) 欧文主义(268) 傅利叶主义(270) 生產合作社(277) 消費合作社(281) 土地改革(284) 空想社会主义改革者和工会主义(291)	
第十一章 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的十小时 工作制运动·····	286
工会运动的复兴(297) 工厂工人和劳工运动(298) 十	

小时工作制的理論基礎(308) 新英格蘭工人協會(312)
 爭取十小時工作制的罷工運動(320) 十小時工作制的
 法令(323) 新英格蘭勞工運動的低落(326) 賓夕法尼
 亞勞工運動的高潮(327) 五十年代期間的活動情況
 (329) 新澤西的政治行動(333) 十小時工作制運動的
 成就(335)

第十二章 工會組織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

勞工鬥爭..... 337

勞工情況(337) 地方工會(339) 新移民入境的勞工
 (345) 英國的影響(348) 德籍美國勞工運動(350) 全
 國勞工組織(359) 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363) 工會運
 動的復活(367) 新英格蘭制鞋工人的罷工運動(368)
 勞工和政治(375)

第十三章 南北戰爭以前美國南部的勞工運動..... 379

奴隸的生活狀況(380) 反抗鬥爭(383) 白色工人與奴
 隸制度(392) 奴隸制度的兩難境地(402)

第十四章 北部勞工與奴隸制度..... 405

歧途徘徊(407) 勞工和奴隸取消主義者(411) 工資奴
 隸制和私產奴隸制(413) 奴隸制度擴張時的壓力(420)
 奴隸主的政綱(425) 共和黨的出現(429) 一八五六年的
 選舉運動(434) 向共和黨內的保守主義作鬥爭(438)
 林肯和勞工(441) 一八六〇年的大選(444)

第十五章 勞工與內戰..... 451

勞工與聯邦分裂危機(452) 武裝起來!(464) 為什麼
 而戰?(470) 英國工人和美國內戰(473) 黑色工人的
 貢獻(480)

第十六章	勞工與銅頭蛇·····	485
	勞工和征兵問題(485) 銅頭蛇的宣傳(490) 戰時的社會經濟狀況(491) 戰時的罷工運動(494) 銅頭蛇運動的失敗(497) 勞工轉向林肯(500) 勞工報紙所起的作用(503) 民主共和工人協會(505) 最後的勝利(507)	
第十七章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六年的勞工運動·····	509
	工會復興的原因(510) 女工(513) 日益壯大的工會組織(518) 鑄鐵工人(521) 勞工出版物(525) 老板們的反攻(530) 勞工嚴整自己的隊伍(534) 政治行動(537) 對全國性勞工組織的嚮望(540) 向八小時工作日前進(545)	
第十八章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勞工運動·····	555
	全國勞工會的成立(555) 第一屆代表會(557) 加強全國勞工會(563) 八小時工作日(565) 女工和女權(572)	
第十九章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勞工運動(續前)·····	581
	勞工與國家建設(581) 黑色工人的組織情況(590) 一八六九年的黑人勞工代表大會(599) 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601)	
第二十章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勞工運動(續完)·····	608
	國際勞工大團結(608) 第一國際在美洲(613) 合作社運動(618) 金融改革(623) 政治行動(627) 全國勞工會的衰落(636)	
第二十一章	勞工協會的誕生·····	640
	勞工協會的各種儀節(641) 尤利亞·斯蒂芬斯的作用	

(642) 劳工协会最初的組織形式(646)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八年的長期 不景气現象.....	648
工会會員人数的驟減(648) 百折不撓的工会运动(650)	
不景气时期的生活情况(652) 失業示威运动(657) 拉 薩尔主义者与馬克思主义者(661) 社会主义运动內部 的团結(664)	
第二十三章 对抗嚴重的不景气現象.....	669
紡織業的罢工运动(669) 一八七五年的長期罢工(671)	
莫利馬乖雅(678) 一八七七年的大罢工(683)	
第二十四章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八年的独立 政治行动.....	698
綠背紙幣运动的兴起(698) 劳工政党与綠背紙幣运动 (703) 全國綠背一劳工党(708) 对中國劳工的排斥 (716) 政治騙子在加利福尼亚一时的气燄(718) 社会 主义运动(723)	
第二十五章 近代劳工运动的开端(一八七八年至 一八八一年)	729
工会运动的复兴(729) 國際劳工会(734) 劳工协会 (739)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新工会主义”(751) 雪茄 制造工人(754) 有組織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759)	
引文註.....	769
本書人物介紹.....	861

第一章

美洲劳工的起源

关于殖民时期的美洲，船長約翰·史密斯曾有一次寫道：“如果不付出劳力作为代价，从那里是什么东西也不能得到的。”^①他說這話乃是用以告誡那时把美洲看成为一种巨大財富的無尽源泉的英國的商業資本家的。他們很快就看出船長史密斯的話是對的——在弗吉尼亞、麻薩諸塞及宾夕法尼亞各州并没有什么像馬可波罗所拜訪过的神話似的可以任意擄掠的城市。新大陸所有的任何財富，除了付出艰巨的劳力以从事开礦，开伐森林，种植、收割庄稼，建筑房屋、道路、桥梁等工作以外，是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取得的。一六一六——一六一七年冬天，弗吉尼亞公司在招攬投資的公报中說，只要我們能有“更多的人手”來開發新大陸的資源，美洲一定可以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利潤^②。

但是人手从哪里來呢？在美洲的确有很多印第安人可以抓來当奴隸買賣。不幸的是，这些印第安人却一心只想逃回自己的部落，从那里邀集更多的伙伴跑回來，以割取他們从前的主人的头顱，作为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就因为这样，新阿姆斯特丹的政府只得命令所有的老板們付工資給印第安工人。政府向老板們說，“为了及时地、尽可能地防止一切的不幸”，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因为那些印第安人正威脅着“要采取一种無礼的手段以取得他們应得的報酬”。要想奴役印第安人的种种企圖，結果是都失敗了^③。

老板們于是不停地向歐洲各殖民公司要求勞工人手，他們並且特別仔細地指明，他們所需要的，不是那些“寧可餓死也不願動手勞動的”風雅高潔之士^④，而是一些能夠開發並支持一個永久性的能夠生產利潤的殖民區的普通男女。殖民區財政當局曾經發動過一次很大的宣傳運動，以吸引歐洲的貧民移民到美洲來。同時發出各種的小冊子和傳單告訴工人們說，在美洲他們將可以得到“三倍於他們在英格蘭或威爾斯所能得到的工資”，並且說貧窮的女工可以在這裡找到有錢的丈夫。他們派出很多人走遍了一切貧困地區，過分地誇大新大陸美妙的前途。一六三〇年弗吉尼亞公司甚至發行了一種印着這些字句的硬幣：

在英格蘭勞力充溢土地少，

在弗吉尼亞土地無主勞力缺^⑤。

懷疑的人收到很多最初移居到美洲的人們的來信——大多數是偽造的——勸他們的親戚朋友趕快收拾行裝來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一個通訊員寫道，“一個工人一星期只要工作四天或五天，他就可以生活得很美滿”。美洲是“一片富饒的土地，真正富饒的土地”^⑥。

歐洲的勞工情況

一片富饒的土地！英格蘭何嘗不是如此，不過與窮人無關而已。在英格蘭封建主義正快要壽終正寢。雖然有時候它還在發出一陣一陣的掙扎，但它已經是相當徹底地被資本主義經濟所代替了。這一種新的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帶來某些重要的進步的改革，同時也增加了人們的苦難。比方說，毛織工業的迅速發展，使得原來用以種植莊稼的土地逐漸都改作養羊用了。大片的

土地被圈成了牧場，為要讓地方給羊群住，佃農被趕了出來，少數幾個牧羊人占據了很多農業勞動者的地位。既無土地又無工作的貧苦人民的數目迅速地增加着，他們困難的處境，由於從前那些還能給窮人們一些救濟的宗教機關的解体，變得更加嚴重了。

新大陸黃金白銀流入歐洲的結果，使得一般物價增高了四倍之多。但是，據估計，一六〇〇年工人工資收入的實際購買力和前一個世紀相比只有其四分之一了^⑦。

工資率可以說是一直沒有任何變動的，同時根據一五六三年所施行的“雇傭法”，任何人如果拿到超過法定數目的工資，則將被判處二十一天徒刑，而付給超額工資的人也將受十天徒刑的處分。根據同一法令，治安事務官有權根據不同的時間和物價，改變原定的工資。但這些事務官本身常常就是雇用工人的老板，所以他們總是把工資定在最低的水平上，而讓教區救濟去維持那些工人不致於全部餓死。可是教區救濟是極有限的，很多工人仍不免凍餓而死^⑧。

一六一八年的時候，雖然維持一個家庭最低的生活，每年至少約為二十鎊十一先令，但工人的工資收入極少有達到八鎊八先令九便士的。一六二三年尉爾特郡的毛織工人訴苦說，他們“以自己勞苦的工作所得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因為布商們一方面可以任意地拚命加重我們的工作，一方面更可以隨意減低工資……。”大約七年以後，東部各郡的紡織工人曾經反抗說，他們的工資已經降到如此之低，使他們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床鋪、機輪和工作工具來換取麵包”^⑨。

如果還居留英格蘭，這些英國工人是想不出多少辦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他們不能辭去一個工作再去找一個收入較高的

職業，因為根據英國“主僕法令”，任何一個工人任意離開自己的工作就要被處以三個月徒刑。他將被拖到治安事務官面前去聽審，而這治安事務官常常就是他自己的老板，老板是不會容許他提出任何證據為自己辯護的。不僅如此，除了徒刑以外，這個工人還必須因為他的曠工付給老板一定數量的罰金。有時候一個工人可以為了這樣的一件違反法令的事情接連被處以幾次徒刑^⑩。

因此，很多英國工人雖然名義上是自由的，實際上是過着奴隸的生活。其中蘇格蘭礦工尤其如此。一六〇六年，蘇格蘭有一條法律竟規定，逃亡的煤礦工人應以盜賊論罪。任何人藏匿或雇用他，並在得到通知後二十四小時內拒絕交出者，將科以一百鎊的罰金。根據同一法令，礦廠老板有全權“逮捕所有的流浪人和身體強壯的乞丐”，並根據老板自定的條件強迫他們在礦坑里工作^⑪。

為了自衛，工人們常常力求組織勞工協會，在很多情況下並確實舉行了罷工。但是每當這種時候，政府方面會馬上行動起來保護老板們的利益。早在一三四九年，倫敦就有一群麵包房的雇工，被控告為“彼此陰謀籌劃，聲言若工資數額不提高兩倍或三倍，他們將拒絕繼續為雇主工作”。一三六〇年，國會宣布一切泥瓦工和木工的聯盟和協會為非法，並宣稱，任何一個“泥瓦工或木工，不管他現在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他的雇主有權強迫他作任何他份內應作的工作”。到一五四八年，國會更宣稱，任何結成團體，並聲明非在“一定的工資數目”和“一定的工作時間”的條件下，決不參加工作的工人必須予以處分：

“初犯罰金十鎊……或二十天徒刑，在徒刑期間（他）只能吃麵包和喝白水；第二次犯罰金二十鎊……或予以示眾處分，第三次犯罰金三十鎊……或割去一耳示眾，並將終身被視為

無行的人。”^⑫

後來，這種嚴厲的懲罰雖然多少減輕了一些，但是直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英國的法律，對於工人企圖改進自己地位的活動，是決不與以任何贊助的。安諾德·羅杰士教授在全面地研究了六個世紀以來英國的勞工情況後，曾結論說，從一五六三到一八二四年一個巨大的“由英國法律所制定，而由與此利益相關的各方面所執行的”陰謀被有計劃地組織起來，以“欺騙英國工人，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剝奪掉他們的一切希望，讓他們永遠生活在無法自救的貧困中”^⑬。

英國的統治階級，儘管能夠阻止工人進行組織，却不能制止他們舉行抗議的遊行示威。在十六世紀的英格蘭，失業工人的暴動活動是如此的頻繁，以致威尼斯的大使在給他家人的信里說：“沒有人肯定地知道這種騷亂的情況什麼時候才會結束，但肯定的，事情決不能就這樣長此下去。”很多有錢的英國人都同他一樣的怀着恐懼心理，他們希望，依靠殖民地“替‘祖國’把那些騷擾的邪惡分子清洗出去”^⑭。

歐洲其他部分的統治階級也同樣的日益感覺不安，因此他們很歡迎能有人被派來盡量鼓吹大西洋彼岸的那片金銀遍地的世界。愛爾蘭的農人和工人是特別容易接受這種宣傳的，因為英國的法律對於愛爾蘭運到英格蘭的布匹、牲畜規定了很高的入口稅，

* 早在一七七六年，亞丹·斯密在評論這個陰謀時曾說，無論什麼時候政府企圖“調解工人和老板的糾紛的時候，法律顧問永遠是老板方面的人”。亞丹·斯密接着說，“我們的國會沒有一條法令反對聯合起來以減低工資，但反對聯合起來要求增加工資的法令可真不少。”（見“國富論”，一八四五年倫敦版，第二七頁。）

完全剝奪了蘇格蘭及愛爾蘭人民的自治權，並且強迫他們向那些他們並不從屬的國教教堂付什一稅。德國的農人和工人也同樣急切地接受了威廉·彭恩所散發的一些小冊子，他是在一六七七年去萊茵區招收到美國去的移民的。只要讀一讀當時的記載，就知道德國的農民和工人是如何遭受着無人性的地主和王室的殘酷剝削的，只要知道在“三十年戰爭”及以後的戰禍中有多少無辜的人民被屠殺的情況，我們會馬上了解到那時為什麼有許多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彭恩的勸告。

總之，歐洲的貧民所以跑到美洲來，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本鄉的飢餓、貧困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壓迫。有一個蘇格蘭人約翰·麥克比斯，他是一個農人兼鞋匠，他是五個孩子的父親，這裡關於他的一段故事很可以讓我們了解歐洲人移居出境的真實原因。麥克比斯在船上對接見他的的一個官員說：

“〔他〕離開家鄉，是因為地里的莊稼沒有收成，牛群死亡了，租稅加高了，而麵包却一向都是很貴的；在家庭他找不到職業來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從他的和他妻子的在美洲的朋友們那裡得到的消息，更鼓勵他決定移居，他們向他保證說，到了美洲他的妻子同孩子們都可以過着很舒服的生活，因為那裡勞動力的價格是非常高的。”^⑮

移居到美洲

但是逃出歐洲的苦難境地，是並不像宣傳家們所描畫的那麼簡單的。從英格蘭到美洲的船費是六鎊到十鎊，這對於工人說來是一個極龐大的數目。湯姆斯·杰斐遜曾有一次說過，“最初移居到這裡來的我們的祖先，是工人而不是律師。”^⑯

為要來美洲，很多勞動者不得不接受充當數年“合同雇工”的條件。他們同歐洲的商人或商船船主簽訂合同，保證在兩年到七年的期限之內“擔任雇主要他們擔任的任何工作”以償付路費。這些典身自救的人中，有些可以不在歐洲簽訂什麼契約或合同，但必需答應在到達美洲后的一定時間內自己設法償還一切費用。他們大多數都相信美洲的種植園主和商人一定會極願意替他們墊付那筆費用的，那末他們很快就能以自己的工資收入來還掉這筆債，他們就可以完全自由了。但他們大多數馬上就發現自己的希望被“殘酷地破滅了”，而自己已“陷在一個繁瑣、勞苦而無利可圖的職業的千苦萬難中。”^{①7}

那些移民還常常被迫同意活着的人要負責償還那些在中途死去的人的路費。那一趟旅程是那樣的可怕，每次都會有很多人死去。哥特里叶·米脫伯格根據自己的經驗寫道，“船上的情況真是悲慘極了，惡臭、煤烟、恐怖、嘔吐，再加上由於陳腐的、苦咸的食物和魚肉以及骯髒的飲水所引起的暈眩、發燒、痢疾、頭疼、中暑、便秘、火瘡、壞血病、癰疽、口瘡……，使得很多人都悲慘地死去。”另外還有一個幸而未死的人告訴我們說：“為免于餓死，我們只得吃老鼠度命。我們付八便士到兩先令的價錢買一只老鼠，化四便士買一瓶水。”^{①8}

一七六七年六月，“南卡羅來納報”的編輯曾呼喚查里士頓的居民救濟剛剛到達的三百個愛爾蘭“合同雇工”。他自己曾經拜訪過他們的住處，發現每一間屋子里“住着約四十到六十人，其中很多已經是奄奄一息，有些已經神智不清，幼小的孩子們一絲不挂的躺着，他們的父母在幾個星期以前已經死去了”^{①9}。

在紐約、費列得爾菲亞、波士頓和查里士頓都有販運他們的商

船老板或商人，他們在殖民地的報紙上登載廣告，為他們的人肉商品招攬雇主。有一個最典型的廣告是這樣說的，“現停新碼頭的‘白雪亨利’號，有好的愛爾蘭黃油及馬鈴薯出賣，並有不同期限的合同雇工，敬請選購；船長司徒。”

另有一個很典型的廣告是：“費列得爾菲亞城愛德華·賀恩新由倫敦運到……大批年輕力壯的男雇工，其中有紡織工、細木工、鞋匠、鐵匠、磚瓦匠、蜜工、鋸木工、成衣匠、女胸衣縫紉工、屠宰工、桌椅匠以及他種行業工人，廉價出售，現款購貨，或以麥子、面包、面粉交換均可。”^{②①}

這些在拍賣場出賣的工人並不全都是自願來到美洲的。他們中有些人是因為某些輕微的過失而被判決到殖民地服勞役的。另有一些，特別是孩子們，則是被那些一般稱為“人賊”、“人騙子”、“人拐子”的人們從倫敦、布里斯它爾及利物浦等地拐騙來的。後來是黑人愈來愈多了，他們從非洲被捉來，用鐵鏈拴著手臂、足踝或脖子一對一對地連在一起，塞擠在船上牢房似的小艙房里，經過很長一段恐怖的旅程，一船一船的運到美洲來出賣。

移居到殖民地美洲來的人，可以說一半是“合同雇工”。截至一七七〇年進入美洲的人口數目已達到二十五萬人，其中十萬以上都是被拐騙來的，或者是被判勞役處分的犯人。在那個時候，每年運到南卡羅來納一地的黑奴，總在三千人到四千人左右，所以那時美洲的黑奴已有將近五十萬人，差不多等於全殖民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②②}。

因此那時殖民地人口的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祖先在英格蘭或者在歐洲大陸上的時候，都曾經是技術工人、短工、小商販和農人。到美洲以後，雖然他們大多數並沒有如

那些信口开河的宣傳家們所鼓吹的，找到什么“快乐的生活环境”，沒有得到什么高额的“工作报酬”，但要在这个大陸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和一个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却正是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孙。

第二章

殖民地时期美洲的劳工情况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中，自由工人，在数量上是極少的，在整个美洲劳工群众中也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大革命时期，無論在宾夕法尼亞，在馬里蘭，在弗吉尼亞差不多每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是或者曾經是合同雇工，而在三百万殖民地人口中，差不多每六个人里面有一个黑奴。北部有將近四万黑人。在至少有五个南部的殖民区里面，黑色人口的数目是等于或多于白色人口的。

奴隸与合同雇工

在南部的烟草、谷物及靛青种植区（棉花及糖料作物是在差不多半世紀以后才占据重要地位的），奴隸制在相当早的时期便已經代替了合同雇工制。因为种植園主們發現，買一个奴隸——一个終身为自己服役的工人，而且他的子孙都將变成自己的私產——比雇用一个在合同期滿后便將离去的雇工，是一种獲利更大的投資。此外，在空闲时，老板还可以把自己的奴隸出租給別人使用。同时維持一个奴隸的生活所需的費用比維持一个雇工要少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使得南方的种植園主和北方的商人更認為奴隸制真是最理想的劳工制度了。

但奴隸制也不是一下子就在殖民地美洲發展起來的。最初來到美洲的黑人也都是合同雇工，合同期滿后，他們也可以完全自

由。到了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奴隸制才真正开始。自一六六四年至一六八二年間，很多殖民区的奴隸法令硬把黑人雇工划定为奴隸了*。黑人的孩子更由法律明文規定成为其母親的主人的私產。奴隸不得集会，不得占有或携帶槍枝，非有書面許可証不得擅自离开主人的農場，并不得在法院对白人案件作証。如有黑人毆打白人，不論誰是誰非，該黑人必須受四十下鞭笞的处分；但若奴隸主殺害奴隸，則并非犯罪行为，因为据假定，“除非为了自衛”^①，沒有一个主人会殺害自己的奴隸的。一六五六年，馬里蘭有一奴隸主用熔化的鉛汁潑燙一个奴隸致死，而奴隸主却被法院判为無罪釋放，理由是該奴隸已是“無法救葯”；一七三五年，紐約城約翰·曾特鞭打一个奴隸致死的时候，驗尸的陪審官的最后結論是：該奴隸的死亡，乃是“上帝对他的懲罰”^②。

成千成万为逃避本國的貧困和迫害而跑到美洲來的合同雇工，在这里遇到的常常是“比他們……从前所遭受到的更为可怕的苦难”^③。他們的命运并不比黑奴好多少；实际上，有人相信还要更坏些。因为一个老板有时倒觉得有必要照顧自己的奴隸，因为奴隸是自己永远占有的財產，而他知道合同雇工在几年之后就会要离开他的。因此，如果一个合同雇工在离职的时候，由于劳苦的工作或殘酷的刑罰已經变成了殘廢，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是的，法律有时也規定“任何人如果把自己的男雇工或女雇工的眼睛打瞎了，牙齒打掉了，或者把他們打殘廢了，或者嚴重地損害了他們的外貌，他就必須允許他們自由离职”。这种安慰也真是

* 但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蘭，因为那时的法律把黑人一方面作为財產，一方面也作为人看待，他們是有双重地位的。（見罗潤佐·格利恩：“一六二〇——一七七六年殖民地时期新英格蘭的黑人”，一九四三年紐約版，第一六七頁。）

太冷酷了；但雇工們也知道，如果他們一定要興訟，在老板們掌握中的法院里，他們要是不能提出充分的證據，那是只會自找處罰的。例如在紐約，任何雇工如果不能對自己的訴訟提出有力的證據，就要“為每一次這種不適當的控訴而被處以替老板無償服役六個月”④。

學徒們——實際上也就是在一定年限內受着奴隸待遇的兒童和青年們——同合同雇工一樣，也有說不盡的苦難。雖然說起來他們是在學一行手藝，但根據法院紀錄所載他們在法庭上經常提出的控訴來看，簡直可以說絕大多數的老板是什麼也不願讓學徒學到的，此外還要毒打他們，“毫無理由的，極殘酷而凶暴地打他們”，給他們吃的是“極少量的粗麵包”，而且通常是剝奪掉他們“一切生活上的一般的必需品和便利的”⑤。

殖民地時期美洲的那些失掉自由的工人經常“在比當年埃及奴隸的更沉重的鎖鏈下”呻吟着。一個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曾說，合同雇工完全同黑奴一樣“既得不到日常應有的糧食，更沒有稱體的衣服，儘管事實上（富人們）所享受的種種生活上的舒適，大都是他們不倦地勞苦工作的結果”⑥。他們中很多人經常要想逃脫他們的雇主是完全無足怪的。儘管種植園主和商人用盡一切努力使他們彼此孤立，白人雇工和黑奴仍常常由於身受共同壓迫而集結逃走以尋找共同的自由。“賓夕法尼亞日報”于一七四七年九月十日曾登載一廣告說：“茲有白人黑人各一由其主人處潛逃失蹤，據猜測很有可能為結伴同逃。”該報同年十月八日另有一廣告是：“居恩·貝納德有女黑奴一名，昨偕一白人雇工安·溫賴特逃逸失蹤。”

逃跑被捉回的雇工則要遭到殘酷的鞭打，有時還要被烙上“逃”字烙印；此外他們常常還要被迫替老板服額外勞役——這種

劳役竟有一次达两年之久的。马里兰的议会在一六四一年甚至通过这样一项法令，规定凡从雇主处“企图逃出本州”的雇工可判处死刑^⑦。

但严酷的刑罚仍不能阻止雇工逃跑事件的发生。法院的记录告诉我们很多像关于麻萨诸塞州雇工伊萨克·罗宾逊一类的事，罗宾逊“由于屡次逃跑并常劝诱其他人逃跑”曾遭受过几十次的鞭刑，又法朗西士·贝兹也因为屡戒不改地“劝诱一起工作的雇工们”逃跑而受到极严厉的惩罚^⑧。

有时，这些失去自由的工人不采取逃跑办法，而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暴动。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奴隶们的密谋被发现的有四十多起。其中有很多都是黑奴和白人合同雇工在一起共同计划的。一七三〇年在查里士顿所策划的一次秘密活动，其规模之大使得当时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不是主宰一切的上天保佑，让我们及时地发现了他们的阴谋，那我们现在恐怕已经全躺在血泊中了。”九年以后，在查里士顿附近的司东农场，有二百多个奴隶起来暴动。在他们被逮捕和遭到屠杀以前，他们已经把房子和庄稼全给烧掉，杀死了好几个奴隶主，其中只有一个一向对奴隶较好的没有被杀害^⑨。

-
- 罗宾逊可以说是最早的美国劳工组织者之一。其中另一位是马里兰的一个黑奴山姆，他因为“几次企图在本殖民区鼓动黑人暴动”，在一六八八年被法院判罪。（见“威廉马利学院史学季刊”，一九〇二年一月出版，第十卷，第一七七页。）

不仅是失掉自由的雇工组织起来集体逃亡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是常常发生的事，我们现在还可以读到很多关于那些失掉自由的工人如何为抗议自己所处的境遇而起来举行罢工的纪录。（见里查·摩利斯：“早期美国的政府与劳工问题”，一九四六年纽约版，第一六七——一七四页。）

奴隸暴動的事也并不全只發生在南部。一七一二年，在紐約市市區就曾有二三十個持着武器的奴隸暴動反抗“他們的主人所加于他們的殘酷的待遇……”。暴動雖被鎮壓下去了，但一七三四年三月十八日的紐約公報上，却有一個通訊員警告奴隸主們說，“要不是幸賴皇帝陛下的警衛團的威力，現在我們這個城市很可能已經變成一片瓦礫場，大多數的居民已都死于非命了。”

因逃跑被捉回而受到的嚴厲鞭打，和因為參加了奴隸暴動而受到的野蠻的刑罰一比較起來，那簡直就不算什麼了。一七〇八年，在長島牙買加地方，有一個女奴隸因為參加了一次暴動的計劃工作，便被捆綁在一堆木柴上活活地燒死了。當火焰一点一点地吞食着她的身軀的時候，竟有人拿着一個盛滿了水的壺送到她的嘴邊又立即拿開去，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重復着，“作為對其他人的威嚇”。關於一七一二年在紐約暴動中被捕而處以死刑的二十一個奴隸，州長亨特爾寫道：“有的是燒死的，有的是絞死的，有一個用刑輪分尸，另一個則是用鐵鏈活活地懸在市中心示眾，這就好讓大家看一看那些所能想出的最足為戒的刑罰。”^⑩

但殘暴仍不能滅除奴隸暴動的威脅，於是有些地方只得開始讓步了，給奴隸們一些較好的食物和衣服，對奴隸的一般待遇也較前略好些。在蓄奴沒有什麼利潤的北部，對黑奴的恐怖也愈來愈大，於是竟有人主張用自由勞工去代替奴隸。

工資收入者的產生

在海口邊的市鎮和城市，自由的勞工階級開始出現了。在波士頓、費列得爾菲亞及紐約，人們的經濟生活曾有很長一個時期是和航運業連結在一起的。最初，是英國同荷蘭的船隻經營着殖

民地美洲的大部分商業，但不久殖民地的人也开始要建造自己的船只了。因此也就產生了对于木工、鉄匠、細木工、造船工、油灰匠、制繩工、制帆工，以及他种技術工人和劳动者的需要。早在一六八五年，威廉·彭恩即曾指出說，在費列得尔菲亞，“住着各种行業的極有用的技術工人，如木工、細木工、磚瓦匠、泥瓦匠、鉛匠、鉄匠、玻璃工、成衣工、鞋匠、屠宰工人、面包工人、釀酒工人、手套工人、制革工人、皮毛工人、制輪工人、制磨石工、造船工、木船工、制繩工、制帆工人、滑車制造工、旋工等等”。兩年之后，有一个法國人來到波士頓，他也發現“这里是什么行業的工人都有的，而特別多的是造船的木工”^①。

随着商業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制造奢侈品的技術工人——如銀匠、金匠、鐘表匠及珠宝匠等也出現了。一七二〇年时，紐約已經有十三个銀匠，四个鐘表匠，兩個金匠及一个珠宝匠。

最初，只有很少的技術工人和机械工人是工資收入者。他們住在大城市里，在自己家里制造貨品，他們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店鋪，由自己的妻子兒女們在那里照顧賣貨。另一种技術工人則是一些流动性質的工人，泥水匠、木匠、鞋匠，或者制蠟燭的工人，他們隨身帶着工具到農場上去臨時住下來，由農人們給他們原料，讓他們制造。他們所得的報酬有时是現款，有时則是谷米或麥子。殖民区里很多鉄鋪、木工作坊、布鋪和鞋子的制做工作，全是由这些四处流动的工人們担任的*。

-
- 但經過很多年，这种流动工人承攬工作的机会都是相当有限的，因为那时農村中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是一个工厂的縮影。每一个農人同时又是为自己工作的木匠、鉄匠、鞋匠，以至于几十种手藝合在一起的一个工人。直到一七六七年，紐約州長穆尔还曾在一次報告中說，殖民地的大多数農家，都只是

後來，人口日益繁殖，這些四处流動的技術工人大都定居下來；他們一般的都是在某些小村子里，租賃或者蓋造一點房屋作為自己的家，就在這裡利用一間房開起一個小店鋪來。附近的農民去鎮上出賣自己的農產品的時候，他們就會化錢買一些他自己難于做出來的東西。

後來，商品的需要量愈來愈增加，那些開店鋪的技術工人發現單靠自己一個人的勞動已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于是他就會化上十鎊二十鎊（約五十至一百美元）去買一個合同雇工，一般還是有技術的工人；對這個雇工，他只要供給他吃住和偶而給他一兩套衣服，就可以替自己工作七年之久。一七〇九年四月、六月、七月三個月中來到費列得爾菲亞的一千八百三十八個合同雇工中，有五十六個面包工人，八十七個泥水匠，一百二十四個木工，六十八個鞋匠，九十九個成衣匠，二十九個屠宰工人，四十五個面粉工人，十四個皮革工人，七個襪子織補工人，六個理髮匠，四個鎖匠，九十五個織布工人，八十二個桶匠，十三個馬具匠，二個玻璃工人，三個帽工，八個石灰窑工，二個雕刻工人，三個磚瓦匠，二個銀匠，四十八個鐵匠，三個設計工人，及六個旋工^⑫。

在殖民地各店鋪中，黑奴也常被按月或按年雇作技術工人使用。但對於自由工人的需要却愈來愈增加了。因為，儘管在整年有工作可做的種植場或農場上，合同雇工和奴隸是極受歡迎的廉價勞動力，但在工作有季節性的店鋪或工廠中，使用自由工人就會合算得多。雇工或奴隸在淡季時老板也得給他穿的、吃的和住的

“為他們自己家里人穿用而紡織布匹，完全沒有意思要把布匹拿到市場去出賣……每一個家庭都是兒女成群，那些孩子只要剛一能紡紗或梳毛，就要被派工作了。”（見奧卡拉幹編“紐約州殖民地時期史料”，一八五六年阿爾巴尼版，第七卷，第八八八頁。）

地方,但对于自由工人,到那时则只要通知他走路就完了。同时,合同雇工或奴隶有时还会逃跑,这对老板来说就是损失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投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亦曾说道:“在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列得尔菲亚……自由工人的劳力,总起来计算,是要比奴隶的劳力更为廉价。”^⑬

一七一五年间,殖民地报纸已登载有征聘大批各种行业自由工人的广告,从钟表匠到皮毛匠均在内。一七七〇年在纽约成立的职业介绍局曾通知作坊老板们说,“如欲聘用技术工人,可向北教堂附近,门前有三狮为记的柯特尔斯先生处接洽,该处有职工介绍所,愿为一切前来登记之技术工人介绍职业。”^⑭从此,一个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阶级在殖民地美洲出现了,接着由于合同雇工制度的消灭及更多外来自由工人的入境,这个阶级的人数更不断增加。有技术的工人一般称之为师傅、技术工人、手艺人、工匠或技士;没有技术的工人则被称为普通劳动者,挖掘工或小工。

殖民地工业,已有相当发展因而需要雇用大批工人,主要有造船业、酿酒业、面粉业、水桶或大木桶制造业、皮革业、马具制造和铁器制造业数种。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区,每一个工作炉灶,除几个砍柴的、碾煤的、推车的或别种普通工人外,总要雇用八、九个技术工人。在波士顿、纽约、费列得尔菲亚、纽波特及查里士顿等地,毫无疑问,造船业乃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业。一七二〇年,波士顿已有十四个造船厂,每年可产船约二百艘;一七一二年的纽波特也已有船厂十余所,而一七一八年的费列得尔菲亚至少也已有船厂十所。这些厂便使极大数量的、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都有了工作的机会。例如说,在一七一三年,据估计仅在波士顿和萨勒姆两地的港口,便已有水手三千五百人。大革命的前夕,木材厂和铁

工厂均已雇用有大量的工人，同时在紐約、波士頓及費列得尔菲亞等地的大商店中也有很多的紡織工人、制鞋工人和木器工人等被雇用⁽¹⁵⁾。

但是，真正屬於殖民地人口所有的商店或作坊中所雇用的工人是極少的，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國政府曾予以限制。在一七五〇年，这一类作坊，一般是包括一个老板兼雇主的手工業主，兩三个雇工和几个学徒。手工業主仍同他所雇用的工人在一起并肩工作。他出資本和原料并經手出賣生產的成品。

劳工情况与劳工組織

要分析殖民地时期美洲劳工情况，我們必須經常記住美洲劳动力極端缺乏的事实，这种情况乃“保證每一个工人都能达到，比一个同样职业的人在英國或大陸上所能得到的較高一些的生活水平”。据一位研究过这一問題的人估計，“殖民地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資，比同时期的英國工人要高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一百”⁽¹⁶⁾。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中，大量的技術工人不断地从欧洲被运到美洲來，殖民地的工業家，为要招致他們，也不惜自願提出一些極其引人的条件。

关于殖民地时期美洲各种行業的工資情况的調查，現在能找到的材料是非常不全面的，因此也不能作出任何概括一般情况的結論來。但有一些統計数字，不妨在这里提一提。一六三〇年，麻薩諸塞州的木工工資，大約是管飯兩角三分一天，不管飯三角三分一天；普通工人的工資，除伙食外，有低到七分錢一天的，而磚瓦匠和泥水匠的工資，在一六七二年間，則是除管飯外一天兩角二分。到一七七〇年，一个木工一天可以賺到五角錢，屠宰工三角，鞋匠

七角，普通工人則是兩角一分。一般的工資大約为一星期兩元左右。無疑的，有些工人還能靠附帶种一点地來補助自己的收入^⑰。

然而，殖民地美洲工資收入者的生活是并不怎么好的。每到失業时，殖民地工人常常無法使他們的孩子免于飢餓，使自己免却牢獄之灾。一七三七年，紐約州副州長曾說，殖民地的很多工人“已由于找不到職業而陷于貧困中”。殖民地时期的新澤西州，在一七六五年的时候，失業工人是那樣的，州議院竟不得不撥款二百鎊買糧食去救濟那些最貧苦的家庭^⑱。

物價的高漲和貨幣的貶值常使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資減低了。但物價下落时，工人們也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因为很多的殖民区法院会要命令他們“同意根据商品價格的下落減低工資”。而在物價上漲时，法院則有其最高工資率的規定，任何工人要求或接受超过那个标准的工資时，則將被科以極重的罰金*。新英格蘭法院紀錄中有一条說：“威廉·狄克西因接受每日三先令的工資罰金三先令；詹姆斯·史密斯因領取超額工資罰金兩先令，約翰·司东及日諾·西布雷各以同样理由罰金三先令。”^⑲ 这种行动，雇主們竟說是“为了挽救美國工人，免其自取毀滅”，是完全必要的。一七六九年有一个美洲的老板更說：“毫無疑問，高額工資更容易使劳动人口陷于悲慘的境地；因为他們只会將自己的暇时和金錢用來敗坏自己的道德和損害自己的健康。”^⑳

-
- * 殖民地时期大多数控制工資額的法令，虽然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和难于使工人安于原職而均告失敗，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希望施行这种法律的要求却是始終沒有停止过的。几乎凡有这种法令存在的地方，受到迫害的便全是工人而不是老板。

制造商們為要壓低工資，往往盡量雇用黑奴。南部的白色工人沒有辦法可以制止這種行動，乃開始大批向北部各殖民地移居。可是到了北部，他們却遇到了同樣的競爭情況。一七〇七年，費列得爾菲亞的自由技術工人即曾抗議“由於大批黑人短工的存在……使得他們很難找到職業並且工資也因而被壓低了”^②。三十年後，紐約的自由工人更抗議“蓄養奴隸以便買賣的惡毒現象”，這種現象迫使很多自由工人向其他殖民地流徙^③。

另外一種參加競爭的人，是那些半工半農的勞動者，他們到冬天時便跑到城市里來找工作，到了春耕要開始時又回到農場上去。一七五七年，紐約有一個技術工人寫道：“一個農人應該永遠守着自己本分的職業，除了製造或修理農地上需用的犁耙或其他工具外，他就不應該跑到鐵匠業、泥瓦匠業、木器業、制桶業或任何手藝行業中來搗亂。”^④

這時，工人們還沒有了解，對於這種因資本主義日益發展而產生的問題，只能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那就是通過工會的力量去限制工作時間並為合理的工資制度和較好的工作條件進行堅決的鬥爭。在早期美洲，階級間的分界綫還是很模糊的。作坊老板還仍然坐在工作凳上工作，他並且還常常和他的工人們合作，對那些違反一般通行制度的大商人們進行鬥爭。此外，技術工人可能自己開作坊變成老板，無技術的工人可能遷移到別的地方去或者變成農人。

雖然如此，在殖民地時期的美洲，勞工組織仍然成立起來了*。一七四一年，波士頓油灰工人即曾發布過一個聯合聲明，說

* 在殖民地時期的美洲，少數的行會組織早已出現了，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七二四年成立的“費列得爾菲亞木工同業會”。雖然這些殖民地的行會組織，極力

明今后他们决不再接受代替现金和货物的商号流通票作为对他们工作的报酬，这种办法已使得“他们自己和家人陷于极度的贫困中”。他们又接着说，从今以后，“除了法定的通用支付凭单”外他们决不接受“任何别的东西以代替他们的工资”^{②4}。“这是一个光辉的、值得推崇的范例”，一七四一年二月十二日的“波士顿每周通讯”曾对此事评论说，“不久以后一定会有无数的技术工人和劳动者起来响应的。”

刊登在一七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周报”上的一节广告，说明那时很多女傭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也已经组织起来：

“我们是本城的一群妇女，被困难的日子所迫必须出外找工作，但我们感到有必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的条件，我们想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要求，太太们的丈夫决不能打我们，他们身体太强，也许会把我们脆弱的妇女打坏。如有太太们要雇傭人，或替她们的丈夫雇，我们随时可以来。”

在大革命之前，和后来的工会组织最相近的一种组织，是在很少几个大城市里成立起来的，老板、雇工和学徒均可参加的各种福利社。这种福利社的宗旨一般是“帮助那些由于发生了意外事件需要接济的会员、或该会员遗下的寡妻及幼小的孩儿”。它们也办理疾病救济，设有赤贫会员的救济基金，有时还贷款给会员，并置备“保险箱以便利会员储蓄”。它们一般并不处理工资、工时或工作条件等问题。但一七六七年纽约房屋油漆工人的福利会却向市议会提出要求，请其制止油漆铺老板们从附近殖民区招雇工人，而且

想按照欧洲的行会的办法，调节各本行内的工作，决定工资数额、工作时间及工作条件，检查工人们的工作技术及其所使用的原料质量，但大都没有什么成绩。殖民地时期美洲的工人过于分散，因此行会组织也很难调节或监督他们的工作。在一般的情况下，行会中的成员全都是自己开店的手工业老板们。

只給他們少量的報酬借以壓低紐約市的一般工資標準。在福利會成立以前，官方對這一類的要求一般是置之不理的。但市議會收到這一份請願書時却馬上委派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並命令該委員會將調查情況“立即回報”²⁵。

在殖民地時期，也曾有過很少幾次的罷工運動*。一六八四年，紐約市政府雇用的車運工人，拒絕搬運市區垃圾，要求增加每車垃圾的搬運費。這些罷工工人“因不服從指揮，拒絕執行自己應盡的職責”被“停工或解雇”了。一個星期以後，這些被解雇的車運工人又自動請求回原職工作。結果他們只得接受命令，承認以後遵守某些“既定的法令和規章”，並且每人付出罰金六先令。大約又過了一個世紀以後，一七七〇年，紐約的制桶工人決定“拒絕以低於既定的價格出賣木桶”。但這些工人卻受到法院的審判，並在圖謀限制本市商業發展的罪名下，被迫“向教堂或其他宗教機關”付款五十先令作為罰金。還有那些公家雇用的工人也全被解雇了²⁶。

-
- 但這些罷工並不真正是工人反對廠主的罷工，而不過是作坊老板們因為限制物價問題聯合起來對於當地政府的抗議。約翰·坎門司及其副手曾說，一七八六年費列得爾非亞印刷工人的罷工才是美洲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工人罷工運動。（見“美國勞工史”，一九一八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二五頁。）里查·摩里斯却認為，一七六八年的紐約可能已有過一次成衣工人的罷工運動。（見一九三七年三月號“政治科學季刊”第五二卷，第七七頁所載“罪惡的陰謀與早期紐約的勞工結社”一文。）在一七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有二十個成衣店雇工曾公開宣稱，他們決定只在“願意出三先令六便士一天的工價”并“管飯”的店家工作。（見一七六八年四月七日“紐約新聞”。）

一七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查里士頓日報”上有一篇非常有趣的報道說，一群掃煙囪的黑人工人“竟敢如此驕橫，彼此聯合起來要求增加正常的工價，並且說在他們的非法的要求得到滿足以前，他們將堅決拒絕工作”。

在几年以前，当有权势的造船商人于一七五八年联合起来减低造船木工、有技术的海员以及普通工人的工资的时候，我们知道，同是这个市政府，却是仁慈得多的。又过了六年以后，一个包括全殖民区雇主的联合会在纽约市成立了。在该会中全体会员通过：任何新来申请工作的工人如果不能拿出“他在本殖民地原工作处的老板或女主人的推荐信”，则“决不予以雇用”^{②7}。而这些雇主却并没有受到科以罚金的处分，也没有因为联合进行密谋而遭到任何迫害。

一七四六年，塞凡那城一群木工举行罢工。马上殖民地的各托辣斯机构便引用国会的法令来对他们进行镇压了。一七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作关于他们的行动的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

“顷见由塞凡那数木工签字之通告一种，张贴本市各处；借此以联络全体木工，决计不在低于该通告所提出之工资数额条件下进行工作。

“因此命令

“将名为……国会法令一份检送州长及其助理，并附指令一份嘱其通知与该法令有关人员，立即将该法令付诸实施。”^{②8}

为民主政治而斗争

十七世纪时，在美洲有些殖民区里，除开奴隶和合同雇工外，普通人民是都有选举权的。但后来，财产限制的条例施行了，因此在几百年的时间中，穷人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了。一七五〇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必须有五十镑“法定钱币”的财产或五十亩土地才能有选举权。这样一来，农村人口有选举权的仅有百分之八，而

在費列得尔菲亞城中則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有選舉權。在新澤西州，選舉權只限于至少有一百畝土地的所有者，在南卡羅來納也限于占有“一個已能生息的墾殖區”或一百畝尚未開發的土地的人。麻薩諸塞州一位律師，約西亞·昆西曾在談到南卡羅來納的眾議院時說道：“不錯，他們有一個眾議院；但他們到底代表誰呢？代表勞動者嗎，機匠嗎，技術工人嗎，佃農嗎，農人嗎，或者自耕農嗎？不，那些代表如果不完全是，也可以說差不多都是富有的大種植園主。”^{②9}

廣大群眾中的憤恨情緒越來越增加，他們被剝奪了選舉權，被迫向他們完全不相信的國教教堂付稅，他們被擁有大量財產的投機商和地主們完全奪去了購買土地的機會，負債了，他們被關進監牢，他們被迫要穿着區別于上等階級的服裝，并被視為好像是天生永遠要生活在貧賤和愚昧中的一群，難道他們是為了這些東西跑到美洲來的嗎？他們并不怕公開表示自己心中的憤怒。常常到了大選的時候，群眾便開始各處活動，小店鋪的老板，技術工人和普通的勞動者們，手拿着棍棒和石頭，擁到選舉會場去要求選票。除了這種示威行動外，他們還用詩歌或散文來表示他們的抗議，例如：

歡樂的日子來臨了；看哪！
到處是大人先生們的車馬聲喧！
那些拿自己的血汗養活着他們的窮人，
他們是連看都不屑看一眼的^{③0}！

在麻薩諸塞州發生的兩件事，說明了人民大眾在統治階級的面前是不會如它所希望的那樣俯首貼耳的。一六六七年，有一個造船木工愛麥紐爾·當寧在厄塞克司郡被捕了，理由是什麼呢？他

“一再講說有高度叛乱性和危害性的言詞，冒犯王朝及國王陛下查理第二的天威”，例如他常說，“他从沒有覺得他（英王）和一般平民有什么兩样”一类的話^⑪。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是，麻薩諸塞州州長約瑟夫·达德利在一七〇五年一个冬天在波士頓一条路上碰到几个車夫。他神气活現地命令他們站到路边讓他的車子过去。但那些車夫拒絕了，他們中間有一个人并告訴州長大人說：“我是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你站在一边給我讓开路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⑫ 这群車夫當場被逮捕，但不久就釋放了，而这件事在一切貴族社会中却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他們一致悲嘆說，下層階級簡直是要造反了。但这种叫喊，較之后來，当这些下層階級真正起來反抗，要徹底推翻那种由“几个、極少数的几个富有的家族組成的橫暴的統治”时，那些貴族們所發出的狂吠，那真是要温和得多了。

一六四六年*，弗吉尼亞發生了那薩尼尔·培肯所領導的、反对農業貴族的暴动。这次暴动發生的原因，据英王所派遣的調查大員的报告，是“有一部分卑賤的人民不安于其所处的貧困与苦痛的境地，这种情况乃使得他們極易被引上邪惡的道路”。当时更有人把培肯的軍隊描寫为“一群最下賤的暴徒，这一群人过去的情况，早已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了”。他因为听到他們說“要把人类的財產拿來大家均分”，真是嚇坏了。

培肯忽然因發高热死去了，但这次暴动，在被州長貝尔克列用血腥的手段鎮压下去以前，确已替美洲人民爭得不少的民主权利。旧州議院規定剝奪無財產的自由人民的选举权的法令被廢除了。

* 据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中为一六七六年。——譯者

每一个教区中有產权的人和一般自由平民都同样得到选举教堂中教区代表的权利。

不幸所有这些民主改革，在那次暴动被压服以后不久，又完全归于消滅，可是人們对它們的怀念則是永远存在的。“革命的火炬手”的称号，培肯是真可以当之無愧的，好几代以后，任何一个人民大众的領袖都还被称为“培肯主义者”^{③③}。

雅可·賴斯勒便是許多培肯主义者中間的一个，他在一六八九年領導紐約市的人民，对紐約的商業貴族進行反抗，結果他們占領了炮台，推翻了当地的政府。組成賴斯勒党的大多数的人是被州長白罗蒙称之为“人类的渣滓，成衣匠及其他不良分子”的城市技工和劳动者。在这个运动失敗以前，人民爭取到几項很重要的民主权利。一个安全委员会由人民自己选举出來，沒有財產的自由人完全都得到了选举权，并由全体选民选出了殖民地政府的代表^{③④}。

賴斯勒建立起來的政权，結果虽然是被推翻了，但在这反叛运动進行的过程中，民主制度却得到了相当的發展。因为这种緣故，大革命的前夕，紐約市的选举法一直比其他任何殖民区都要开明得多。紐約市全体白人居民中大約有百分之十都有选举权。此外，虽然政权是始終掌握在商人、皇家官吏、律师和地主們手里，工人們也总还有机会進行各种政治运动的。

一七三四年市參議會选举运动一开始，这种机会正來到了，那时，代表着州長柯斯比和商人的宫廷党，为要控制市政府政权，决定要重选市參議会的委員及市議會議員。嚴整自己隊伍來和他們抗衡的乃是为工人群众所拥护并为約翰·彼得·曾格爾的“紐約新聞”所支持的人民党。在这次运动当中，人民党曾散發傳單鼓动

全体紐約工人“不要选举任何皇家官吏或任何机会主义者；不要选举对于本市的真正利益毫不关心，而只重视个人荣誉的那一班野心家。也不要选举任何依赖上述这些人生存的狗腿子”。在傳單中該党并提醒所有的选民說，“一个正直的窮人是比一个有錢的混蛋要好得多的。”在运动將近結束的时候，工人們聚集在选举会场，高声唱着：

國家的权利我們必須保衛，

这是每一个勇敢正直的人的責任，

只要我們正当地使用了我們的选举权，那就完了，

下一次选举仍不能沒有我們^⑤！

这一次选举的結果，人民党是完全勝利了。普通工人約翰·弗瑞德，磚瓦工約翰斯·貝格尔，印刷工人威廉·魯蒙，面包工人亨利·波加特及一些別的技术工人都当选了市議会的委員，因此，在一七三五年間，市議會是完全在人民党的控制中的。州長柯斯比向倫敦的商务大臣悲訴說，“本市人口已經完全走入歧途”，另有一个保守分子則說，这个城市現在是“完全落在那絕大多數出身于最下層階級的平民一派的掌握中了”^⑥。

为人民的勝利所激怒，州長柯斯比采取行动來对付約翰·彼得·曾格尔了。好些歌曲和民謠以及好几期的“紐約新聞”都被州議會和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曾格尔本人也以散發叛乱性的毀謗言論而被捕。費列得尔菲亞一位八十八歲高齡的、望重資深的老律師安德魯·漢密尔頓，自願不取任何報酬起來替他辯護。安德魯·漢密尔頓強調出版自由的原則說：“現在擺在法院前面的這個問題……不是一件微末的或只关系着某些人个人利益的事，更不是一个只牽涉到一个可憐的印刷商，或者甚至紐約城一个城市的

問題……它乃是有關於整個自由的基本原則的；我完全相信，你們今天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義的舉動，不僅將使你們得到本市全體同胞的愛戴和尊敬；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反對奴隸生活的人都將會為你們祝福，對你們表示敬重的……。”³⁷

結果曾格爾被宣判無罪，這是美洲第一個爭得出版自由的先例。

後來，紐約的保守派又重新掌握了市政權，但那些被紐約人民掀起的政治狂潮一度嚇破了膽的殖民美洲的富人和“出身高貴”的人們，始終也沒有能夠完全恢復過來。一七四〇年，麻薩諸塞州貴族與人民之間的鬥爭開始了，他們因此更加恐怖起來。他們感到可怕的是工人和農民已聯合起來，向那些可惡已極的，把殖民地的白銀運到歐洲，並拒絕接收以紙幣償付債款的債權人開始進攻了。商業貴族被他們鄙棄地稱為“貪得無厭的、無人性的高利貸者”，他們完全依靠壓榨貧苦的人民“以積累巨大的財產”。深受壓迫的農民和城市工人一致要求成立一個自己發行紙幣的“土地銀行”。

波士頓的商業貴族們已完全明白現在“整個的鬥爭基本上只是一個此後究竟是由誰來控制全殖民地社會生活的問題——由普通人民還是由有錢的紳士？”自然，他們是極力反對開辦土地銀行的提議的，後來當殖民地議院表示同意這一提案時，他們乃轉向英王及英國國會求救。英國政府乃終於解散了土地銀行³⁸。

因此，在任何一个殖民地中，普通人民是沒有辦法限制上層階級的權利的。每一次企圖恢復下層階級的民主權利或爭取它種權利的運動都為敵人所打敗，敵人常常能夠得到英王及英國國會及時的援助。但是，大地主、自由職業和商業貴族們的勝利只是暫時的。經過各種鬥爭，城市工人、技工及鄉間農民已結成了一個有重

大意义的联盟。不久，在美國大革命时期中，这个联盟就要得到充分的利用了，那时，他們將要把对内争取更大自由的斗争和对外争取独立的运动联合起来，从奋斗中使得一个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在美洲建立起来。

第三章

劳工运动与美國大革命

在美國大革命时期中，工人們已經联合起來，作为一个階級來反对英國的对美政策，并推進他們自己在美洲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

美國大革命乃是兩個同时進行着的偉大运动达到最高發展的表现：一是使美洲殖民地脫离英國暴戾的帝國統治的运动；另一运动則是要对美洲的政治、經濟及社会制度進行民主的改革。由于全体工人、大部分農民和一部分農業及商業貴族团结起來以击败共同的敌人，大革命終于勝利了。

大革命的时代背景

敌人所持的經濟武器即是英帝國的商务政策，根据这个政策，美國殖民地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替英國的制造業者、商人和地主們增加財富。殖民地人口所生產的商品是只能运送到英國去的，至少也要先送到英國然后才可以轉运到不屬於英國的海口去。進口的貨物也只能是在英國生產的或至少是先經過英國然后再运到殖民地來的商品。这一殖民区的羊毛、棉紗或毛織品不能輸到那一殖民区“或任何別的地方去”，帽子及鋼鉄生產品也是不能出口的。殖民区的人民不能自己兴办切鋼或軋鋼厂，不能修建鑄鉄厂或熔鉄爐。一七六三年以后，一切殖民地人口不得在阿巴拉契亞山脉

以西地区居住。一七六四年的“貨幣法令”更剝夺了他們使用法定紙幣和建立殖民地鑄幣厂及土地銀行的权利^①。

自然，殖民地人民常常能够利用非法的生產和走私的办法去打破种种这一类的限制。但一七六三年以后，由于英國商人的叫苦，法令的强制执行和檢查更为加緊，情形便越來越困难了。一七六五年，波士頓曾有人悲痛地說：“殖民地的任何人那怕他只是生產了一顆鈕扣，一片馬蹄鉄或一枚平头釘，也决不能不引起英國某些滿身煤烟的鋼鉄老板或神气活現的鈕扣商人們狂喊大叫地說，他老爺的威嚴遭到美國共和党流氓們無比的損伤和侮辱了，他受到他們的欺騙和搶夺了。”^②

美洲的一切階級——除英王的家臣外——無不遭受到这一切限制的折磨。一七六三年的公告* 粉碎了南部農場主想要以投机方式到西部地区去大撈一把的好夢；同时也打破了渴求土地的農民及城市商人們向边陲地区流徙避難的希望。加之于殖民地商業的种种限制，損害了商人的利益，降低了農產品的价格，特别是減低了海員和造船厂工人的工資，因而造成了大量失業的結果。工人們，因为这一切限制阻塞了他們变成独立生產者的道路，感到驚惶不安。紙幣的被禁用，加重了欠債人的負擔并嚴重地妨礙了商人們自己之間的交易。总之一句話，“聚在韋斯敏斯特**的一小撮英國資本家是比几百万美國人的需要更重大得多的”^③。

危害美洲經濟自由的各种限制既然如此之多，而它們竟仍沒有能够使一切殖民地人口联合起來，反抗英國的殖民政策，是因为

* 即上文禁止殖民地人口向阿巴拉契亞山脉以西地区移民的命令。該命令为英王乔治三世于一七六三年十月七日發出。——譯者

** 英國倫敦國會所在地，此处即指英國國會。——譯者

这些限制只在不同的时候損害着不同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在一七六三年以后施行的其他一些暴戾的政策却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一七六五年，規定美洲境內任何一紙有法律效用的文契，任何新聞紙或商务报刊都必須付稅的“印花稅法案”，一七七四年授权东印度公司使其壟斷全部茶叶貿易的“茶叶法案”，以及因为將英國茶叶傾倒入海，作为懲罰而進行封閉波士頓港口的各种法令——这一切措施才使得殖民地的各个階級和各个階層在無比的憤怒中联合起來進行反抗了。很多在美洲的人民現在已認識到如果英國國會可以在这里征印花稅，它將來也可以在这里征人头稅、土地稅、以及如一七六五年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上所說的“日光稅、空气使用稅、以至埋葬死人的坟地稅”的^④。

殖民地人民用請願、示威游行及不進口協議等办法对英國政府的各种高压政策進行斗争。“只有付稅义务沒有政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暴君政治”，“天賦人权”以及“自由人权、自由財產权”等都是他們進行斗争时的民主口号。

同英帝國的种种爭端，漸漸使人民大众头腦中充滿了爭取自由的情緒，他們一方面要脫离殖民地貴族的各种压迫，一方面要脫离英國的統治。一句話，美洲必須擺脫一切“外來的或本洲的寡头政治制度”^⑤。

但在殖民地統治階級中很多人看來，美洲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所講的那些“平等原則”和“民主思想”，是比英國的暴政所加于美洲的什么“印花稅法案”或“茶叶法案”更为可怕得多了。因此，在独立战争爆發前，在美洲殖民地与英帝國对立起來的整整二十年的時間中，他們总是在想尽方法使得美洲人民的斗争不致于危害到他們自己的利益。但在一切保守的办法不能再起作用的时候，

他們便起來制止人民的运动了。州長摩利斯为維護殖民地的貴族政治曾寫道：

“無知的民众已經开始思想，开始算計了……我現在已經看到，恐怖而战慄地看到，如果我們同英國的爭端再繼續下去，我們就將要在一群暴徒的統治下去討生活了。因此，为了一切人的利益，我們必須尽力想法与我們的父母國重归和好。”^③

自由之子

到了一七六五年的后半年，反抗大不列顛这一斗争的指揮工作才不完全是掌握在那些一直控制着殖民地美洲政治生活的、保守的商人和种植園主的手里了。大城市中的技術工人和一切劳动者已經成立了自己的战斗組織，这种組織清除了那些首鼠兩端的保守分子，帶动了那些步伐迟緩的穩健分子，并从無数方面推進了美國革命，直到在一次革命战争中把英帝國在美洲的統治徹底推翻。他們有时候自称为取締派；在宾夕法尼亞，却被称为联合派，而在康涅狄克州又有人称他們为“因結党人”。但大家通常叫他們“自由之子”^{*}。

这些革命团体中的主要成員是手工業主、技工、短工劳动者、大木工、木器工人、印刷工人、造船工人、鐵匠、鞋釘工人、制

-
- 有时某些特殊行業的工人通过自己單独的組織去進行活动，但这些組織却仍同“自由之子”發生联系。如紐約市的海員則大半是通过他們自己的組織“海神之子”進行各种革命活动的。（見紐約歷史学会一七七三年十二月二日公报，該报曾載有海員湯姆·波林“致敬愛的同餐諸君”的一封信，他呼吁“海神之子”們起來制止英國茶叶在紐約進口，不然，这一件事將“最后消滅我們的一切自由权利的”。）

繩工人、海員、泥水匠、以及別的一些城市里的下層階級中的成分，他們的名字是很少在任何歷史書籍中被提到過的^⑦。來自商界和自由職業界的一些人則在“自由之子”的組織中擔任了領導的職務。麻薩諸塞州的塞米爾·亞當姆斯和南卡羅來納的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紐約州的約翰·蘭木及羅得島的斯蒂芬·霍布金斯都是當時極出色的領導人物。同時勞工階級是同那些擔任領導職務的律師，種植園主或商人們經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進行工作的。如皮革工人耶賓萊澤·梅金塔西及一個主要由技工和一般工人組成的俱樂部“北極會”的領導人保羅·瑞弗爾便經常在波士頓同塞米爾·亞當姆斯商談各種問題，技工威廉·約翰遜則同查里士頓的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經常一起合作。

在他們的領導下，“自由之子”們舉行了反抗英帝國高壓政策的示威運動，爭取到廢除了印花稅法案，實行了不進口協議，並抵制了英國茶葉的進口。他們強迫那些被派賣印花的官員們自行辭職，並威脅一些別的人逃出市區；他們威逼那些不遵守不進口協議的商人當眾道歉；他們對那些一意孤行而危害革命利益的人予以塗油黏毛的處罰^⑧。

在自由的敵人的口中，“自由之子”則永遠被稱為“暴民”，“蘇格蘭、愛爾蘭及外國浪人們組成的烏合之眾”，“罪犯們的子孫”，“製造分裂變亂的一群下流的搗蛋分子”^⑨。但在塞米爾·亞當姆斯看來，他們和他們的同盟軍農民階級* 乃是“每一個人類社會的力量

* 在有些殖民區里，在“自由之子”的旗幟下組織起來的技工、機匠及普通勞動者們曾企圖和偏僻區域農民中的急進分子結成聯盟。例如波士頓的“自由男兒”就曾和全區的農村急進分子取得聯系，因而保證在很多市鎮和村庄里通過了反印花稅法案的決議。但在紐約，雖然農民是極願與工人合作的，那里

的泉源”，同时，正是依靠着这“被称为工匠和農夫的兩種可尊敬的人群”他才能够实际推行了不進口运动。塞米尔·亞当姆斯曾說，“最后來挽救我們这个國家的命运的”，毫無疑問，乃是城市劳工和鄉村農民的“坚强的愛國主义精神”。另一个革命領導人約瑟夫·華倫博士，当他在一七七四年六月提到关于执行不進口協議的問題时，也对工人的愛國主义精神表示了同样的信任，他寫道：“我怕紐約方面是不会以很热烈的心腸來帮助我們的，但是要完全抛弃我們，他們也許又会觉得那未免太可耻了；至少，如果紐約的商人們打算要把我們出賣掉，紐約的工人却一定会起來破坏那筆交易的。”^⑩

在英王党人敌視的目光下，“自由之子”，手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抱定寧肯“浴血苦斗”也不願再忍受暴君統治的决心，排成战斗的行列浩浩蕩蕩地向各公共會議場行進，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自由之樹的徽章。在小旅館和酒店中，他們定期举行每周一次的学习会，在那里有人給不識字的同志們大声宣讀最近的報紙和一些小册子或傳單^⑪。到了举行歌唱的節日，他們便高声唱着革命的歌曲，警告那些贵族們，他們是敢于从本國以及英國的暴政下爭取自由的。其中有一曲歌是：

起來吧，自由的兒女們，
讓千万顆心緊緊地團結在一起，
我們的口号是：“我們敢于自由地活着”，
为了这个我們什么都不畏懼！

的“自由之子”却没有作任何的努力去与他們結成統一戰綫。關於該問題的分析，可參看欧文·馬克：“一七一——一七七五年殖民地时期紐約的農村矛盾”，一九四〇年紐約版，第一三五、一三八、一四八及一五二頁。

壓迫的鎖鏈必須被粉碎，
過了今天，良機一去不復回；
讓我們用行動來証實我們的口號，
從今天把奴隸制徹底摧毀^⑫！

有時，婦女們也參加了這個大合唱，因為“自由之子”已經在美洲找到了第一個作為自己幫手的婦女組織——“自由女兒”。這些婦女拒絕以茶作飲料，更因為她們也都起來抵制英國貨物，使得不進口協議收到良好效果。她們在“寧穿本地布制衣，莫把自由拋棄”的口號下，推廣土產布料的銷路。有一次在“自由女兒”的集會上，忽然來了一個男人，他竟對革命大加詆毀，婦女群眾馬上就把他捉住，脫光了他的上身，但因一時找不到黑油和鷄毛，她們便在他身上塗滿了糖蜜，黏滿了鮮花上的花鬚^⑬。

有人指責“自由女兒”的行為是違反上帝意志的，因為上帝規定女人只應該永遠坐在家裡。但“自由之子”卻是極歡迎她們的幫助的。他們高興地喊着：“有這麼多的婦女站在我們身邊，我們就可以使每一個英王黨人在我們面前抖成一團。”^⑭

印花稅法案取消後，“自由之子”仍繼續進行它的組織工作。紐約市的“自由之子”並曾派遣代表到其他地方去幫助那里的同志組織分會。然後把所有這些組織聯合起來便成立了“自由之子”聯合會。此外在波士頓及查里士頓也在進行着同樣的活動^⑮。

這些先進組織的成立，不僅第一次實現了美洲各殖民地間有效的聯盟，並幫助推進了整個工人階級的團結。一七六八年，英國軍隊在波士頓駐扎的時候，政府當局發出命令要工人們去替他們修建兵營。雖然由於不進口協議的執行，很多木工和泥瓦工失業了，他們卻仍拒絕參加這個修建工作。額外賞金和高額工資也

絲毫不能动摇他們的决心。他們是如此的“頑強”以致戒基將軍只得派人到紐約去另找工匠。但就在这时候，保罗·瑞弗尔也被派單騎兼程向紐約進發了，他要到那里去尋求紐約“自由之子”会中的木工和泥瓦工的支援。在听完保罗·瑞弗尔的报告之后，那里的工人立刻作出决定永不为“本國的敌人”工作^⑯。

爱尔兰的都柏林城接着也成立了“自由之子”的組織。他們在精神上及經濟上都曾給美洲人民以多方面的支持，他們为“全世界自由之子”干杯、祝福，他們并召集了很多爱尔兰的自由主义者和急進分子前來参加華盛頓的軍隊作战。甚至一部分英格蘭的工人也激励美國的自由兒郎們說：“只要你們坚持下去，你們就一定能够保障你們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保障了英格蘭人民的自由。”^⑰

“自由之子”对于这种國際間的关怀是極表欢迎的。后来，倫敦的“憲政会”匯款來餽贈在康科德戰爭中陣亡的將士們的子女及家屬，这件事也更進一步加强了他們的决心。英國的紡織工人、海員、成衣工人及礦工們更鼓勵“自由之子”坚决進行不進口協議运动，并且說，即使英國工人会因为失掉了美國市場而失業，而处于“飢餓状态”中，也决不要因此中止。是以戒基將軍在其一七六八年的一个报告中說：“在倫敦和都柏林兩地所發生的叛乱和暴动事件的消息……傳到美洲那些党徒們的耳朵里后，他們都認為这是極有利于他們的独立陰謀的。”^⑱

政治行动

这一切國內和國際間的友善关系在后来对于美洲的工人是有極大的帮助的。同样对他們有很大帮助的是大革命时期他們在各

種政治活動中所獲得的經驗。由于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對於殖民地政府是完全沒有控制力量的。但到了英國王朝所派遣的合法政府開始垮台而超法律的委員會與議會控制的時期開始時，工人們却要叫那些保守分子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力量了。費列得爾菲亞一個技工于一七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賓州日報”上所寫的話可以說正反映了那時全國各地的他的工人弟兄們的情緒。他寫道：

“從來，無論參議員、政府委員或稅務官等等的選舉，都是由一班居于領導地位的人提出人選，決定候選人名單，而工人們要想插在里面說一聲贊成或者不贊成都是不許可的。這種情況我們已經忍耐很久了，但那些大人先生們却一向認為理所當然地說，那些工匠們（雖然他們在數量上是最大的一群人，特別是在本國）有什麼權利要來過問這一切；那也就是說，事實上，他們是完全沒有替自己說話為自己思想的權利的。是什麼理由使得我們不能具有別人一樣的選舉權和被選權呢？……我想，選舉出一兩個人來讓他們去代表在全人口中占極大數目的工人群眾，是絕對必要的。”

一七七三年，當紐約保守的商人們組織五十一委員會企圖以之控制革命的潮流時，技術工人立即單獨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技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委員都是“自由之子”的老輩，因此，他們也就要盡他們作為父輩的責任，盡全力進行推翻國內外“老牌敵人”的鬥爭。他們舉行會議募款“救濟波士頓的窮苦人民”，因為波士頓海港已被英國封鎖了；他們嚴格執行不進口協議；組織通訊聯絡委員會；鼓動木工及泥瓦工拒絕參加修建波士頓峽口工事的工作，並強迫商人們拒絕利用他們的船隻去裝運英國的軍隊和給養。他們重新提出“自由之子”曾為之進行過鬥爭的問題：“給過去

一直被擯弃在选举之外的一切階級以同等的权利”，并改变口选的办法为票选^{①9}。

勝利終于得到了。选举的限制改变为只要有正式住所一項，因此大部分工人都有了选举权。“技工委员会”所提出的召开美洲大陸會議的要求，最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同意。但保守派却还企图要控制一切，他們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是提出大陸會議的代表必須完全由五十一人委员会中选出的建議。技工們的回答是很簡單的，他們提出了他們自己的全部候选人名單。最后，由商界和技工兩方面各派代表來進行商談，才算得到了協議。为使彼此能够團結起來，当商人們同意在一个更廣大的百人委员会中，与工人進行联合的时候，技工委员会也同意撤回自己的候选人名單。

这种向联合的道路推進的活动，在别的殖民地也同样在進行着。查里士頓的技術工人对于原來由商人們發动的不進口協議的条款極为不滿，因为那个協議忽略了某些工人們所最不能容忍的問題。比如說，他們的要求是要禁止任何拿來作为技術工人出租的奴隸進口的。在原來的協議拟定了四天以后，技工們在自由之樹下开会了，他們对原協議提出了兩条修正，一是規定不許有任何奴隸進入本殖民地，另一条則是不从流动商人手中購買任何由英國运來的商品。查里士頓的商人却又修改了技工們的提議，要想展延禁止奴隸買賣的时间。对这一点技工們完全拒絕接受，他們同小种植園主联合起來对商人施以压力。这些种植園主乃命令他們的經理人不要从那些拒絕接受技工修正案的商人們那里買任何貨物，也不賣任何东西給他們。結果，商人們請求召开一个技工、种植園主和商人三方面有同等代表权的联合委员会來重新起草不進口協議。这样，一个包括十三个商人、十三个种植園主及十三个

技術工人的聯合委員會終於成立了，並以此為基礎聯合實施了一個共同的不進口協議^{20*}。

在這個時期，查里士頓的技工們已選出了自己的議會代表。一七六八年十月一日“波士頓新聞”刊載了一條寄自查里士頓的新聞：“本市技工領袖多人曾在制繩廠附近田野中之樹蔭下集會，聞將選出六位先生代表本市居民以參加即將開幕的州議會。”當波士頓的技工們一讀到這條消息時，他們就馬上把自己的隊伍開進了本市的會議廳，也不管它什麼法律上規定的對他們的選舉權的限制，他們整個兒把政府的政權接收過來了。一七七〇年有一個貴族寫道，“波士頓的商人們，在他們的市會議上已經完全沒有決定任何問題的权利了，市會議現在已是完全操縱在一群屬於人民中最下層的暴徒的手中。”美洲關稅委員會更補充說，“在那些會議上，是人類社會中最下層的工匠，以最大的自由在討論着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²¹

一七七〇年以後，其他城市和市鎮上的技術工人們都起來遵循着查里士頓技工們所走過的道路前進。一七七二年費列得爾菲亞的愛國會成立了，該會宗旨是保障“屬於我們及我們後代的正當權利和特權，使其無論在這裡或在大西洋的彼岸，都不能受到任何的侵犯或破壞”²²。兩年以後，該會更名為費列得爾菲亞技工協會，同時和偏僻地區的農人們聯合起來。

一七七六年，一個超法律的州會議在賓夕法尼亞召開了“其明

* 一七七〇年，紐約一技工寫道：“真是沒有什麼事能比這個更荒唐更豈有此理的了，我們的商界大老板們竟喊叫着說，關於英國商品入口的問題，技工們是沒有權利表示任何意見的。”（見一七七〇年五月十日後，由布魯塔斯簽名的一份公報，稿存紐約公共圖書館珍本室。）

确的目标为成立一个……完全由人民授权的新政府”。本殖民区的一切居民，凡年滿二十一歲，在其所在城或郡負擔賦稅，居住已達一年以上時間，并願宣誓支持革命事業者，均有权选举制憲代表會議的代表。从这个工人和農民都有充分代表性的會議中，終于產生了当时最民主的憲法。这个憲法保證了人民的言論和信仰自由，增強了偏僻地区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并允許一切担負賦稅的居民均有权参加选举，参加政府中的各項工作。反动分子称这个文件为“一群愚昧不堪的人的暴民政治綱領”，費列得尔菲亞的詹姆斯·艾倫先生更哭喪着臉說：“整个的权利是都操縱在联合派手里了……。”^{②③}

每一殖民区的保守派都悲痛地感到，革命运动把“水底深处的沉渣全翻攪到最高的水面上來了”^{②④}。乔治亞的州長更滿眼含着泪說，在塞凡那，“教区委员会的委員完全是一班最下層階級的人民，主要是些木匠、鞋匠、鉄匠們……”^{②⑤}一个反动的宾夕法尼亞人約瑟夫·盖罗維更以下面的一联詩句來表示他的憤怒：

晚上躺下时还是泥水匠或木工，
早上一起身却成了來喀古士和梭倫*^{②⑥}。

人民群众是以極嚴肅的态度來对待这一些攻击的。南卡罗來納州查里士頓城的一个牧师，因为他狂妄地說，“工匠和那一班鄉下佬根本沒有权利談論政治，更不能过問英王陛下及众議院的議員們決定作或可能要作的任何決定”，乃被主教会予以开除教籍处分。罗得島紐波特的“水星报”于一七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曾站在人民的立場公开說，“这一切說明……工匠和鄉下佬用人們所用的

* 來喀古士为紀元前七世紀的斯巴达立法家，梭倫为紀元前七世紀古雅典的立法家。——譯者

含侮辱性的称号乃是英王、参、众兩院議員及教士們的真正的主人的主人……”

走向独立的道路

保守派的主意是想依靠國會中緩和派的力量，阻止美洲人民的斗争，使它不要变成流血惨剧，但工人们却完全不这样想，他们知道，英國的統治階級已經下决心要維持他們在美洲的統治，即使有必要——如國會中一个議員曾威脅着說的——“放火燒毀他們的森林”，也是在所不惜的⁽²⁷⁾。为了革命的事業，工人中已有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一七七〇年三月二日就有五个人在波士頓曠場上被英國軍隊槍斃了。在这次波士頓慘案中被害者的姓名是：一个从奴隸制下逃出來的黑人海員克瑞斯巴斯·阿塔克司，制繩工人塞米尔·格瑞，青年海員詹姆斯·克尔德維尔，技工帕吹克·卡耳和木器工学徒山姆·馬費瑞克。最后五个人同埋在一个墳墓里*。

在这次慘案發生后，技工們堅強地武裝起來准备对付一切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們組織地方自衛隊，收集大量的槍械和軍火，并在“自由之子”的集会上進行作战的訓練。在英軍駐扎最多的地方波士頓，技工們組織了一个極其复雜細密的偵察網以“窺察英軍的动态并收集关于英王党活动的各种情报”。

不久，他們得到了戒基將軍打算要把朴次茅斯所存軍火运走的消息，保罗·瑞弗尔，作为偵察委員會的委員之一，馬上騎着馬

* 英國兵士常以低微工資担任部分時間的工作，因而引起波士頓工人对英軍的反抗心理，是此次波士頓慘案所以發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見里查·摩利斯：“早期美國政府与劳工問題”，第一九〇——一九一頁。）

徹夜奔馳將这个消息通知了朴次茅斯的“自由兒郎”們。結果他們是在鄰近市鎮和村庄里的技工和農人的幫助之下，在英國人還沒有到達以前便已把全部的軍火搬走了。又過了一些時間，這位波士頓的技工又一次騎上快馬了，這一次乃是在通知塞米爾·亞當姆斯和約翰·韓苛克，戒基將軍打算要逮捕他們，所以他要設法把他們送到較安全的地方去。最後，偵察委員更搜集到了一個極端重要的情報。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的夜晚，偵察人員發現有八百個紅外衣*全副戰鬥武裝，離開了自己的營房，向波士頓北郊距城十八英里的康科德進發，他們的目的是要到那里去搶劫愛國主義分子的軍火庫。基督教教堂的燈塔立刻閃爍着向鄉區發出信號，保羅·瑞弗爾便束裝上馬開始了他的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奔馳。英軍在走近勒克星敦的時候，便遭遇到當地義勇隊的狙擊，一到康科德，在“自由之子”所領導下的自衛隊更與他們正式交戰了。最後英軍撤退了，但留下了將近三百名死、傷和被俘的兵士，而美洲人則只損失了約九十名。

五天後一個星期日，波士頓的一個技工以色列·畢瑟爾，騎着他疲憊的戰馬來到紐約城，在這裡散播關於康科德及勒克星敦的各種消息。於是紐約市的小商人、技術工人和普通勞動者馬上打破了本市的軍火庫，搬走了所有的軍器並將大約六百枝步槍立刻分發給大家。這樣武裝起來以後，“自由兒郎”們很快成立了一個自願兵團，並掌握了本市的政權。他們接收了當地的海關和一切公立倉庫，卸下了兩船預備送交波士頓英軍的物資。幾個星期以後，“自由之子”領導下的民兵和預備坐船到波士頓的一部分英軍發生了

* 英國軍隊的俗稱。——譯者

冲突，結果他們劝說一部分兵士逃散了，其余的都被留下。

“响徹全球的炮声”在其他殖民地也產生了同样的效果。在乔治亞州的塞凡那，“自由之子”打破了那里的火藥庫，拿到了六百磅火藥，此外从一只停泊在港口的英國船上也搶到很多槍枝和一些火藥，于是他們开始組織了一个团的軍力。會員耶宾勒澤尔·麥克卡西被捕入獄了，“自由兒郎”們馬上打破監獄把他放出來，并排成战斗的行列在街头示威。在費列得尔菲亞的技術工人和开明的商人成立了一个“軍事联盟”。在新澤西的紐亞克，“自由之子”举行了一次會議，在会上一致決議他們“將在这个空前的危机中，毫不猶豫地付出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以支持爭取“美洲自由的事業”^⑳。

革命和战争已經擺在全体人民的面前了。但在几乎一年的時間內，它所采取的形式还只是武裝要求糾正过去的一切錯誤措施。工人們完全明白他們必須从战斗中去取得自由，但保守派却还在相信有和解的可能。因为保守派在美洲大陸會議中仍居于主導地位，他們压低了要求脫离英國統治的呼声，反向英王保證說，美洲人根本沒有“意思要独立”。工人們則托付他們的州議會和大陸會議中的代表要他們進行爭取独立的斗争；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更在南卡罗來納的州議会上發表談話說，当他在会上提出要求，希望本議會公开宣称，它不但要为自由努力，而且还要为美洲的独立而努力的时候，他是代表着查里士頓全体工人的意志的^㉑。当加德斯登被工人选为代表参加大陸會議以后，一七七六年二月十日他在会上高声誦讀了一本小册子“常識”中的一段話，这本小册子乃是一个曾做过鞋匠、胸衣制造工、做过職員、并在布厂里做过工的工人所寫的：“爭辯討論的时期已經过去。武力，这最后的手段，

必須用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湯姆·潘恩更以生動的辭句和無可反駁的雄辯證明了：殖民地人口決不可能一方面忠心于喬治三世而同時又能獲得自己的自由。他更代表着全體人民的希望說，獨立的結果，將是一個民主形式的政府的出現，將是把美洲變成一個“全人类的收容所”，一個“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避難處”。“我們的前面有無窮的希望和無盡的鼓舞，要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建立起來一種最高貴最純潔的政治制度。而我們相信我們是完全有力量來重新改造這個世界的”^⑩。

但也有很多人是不願把這個世界重新改造的。“我們不要獨立。我們不要什麼革命”，北卡羅來納參加美洲大陸會議的商人代表約瑟夫·休士就曾這樣喊叫着說，獨立將產生一個“共和制的暴政——一切可能存在的暴政中最壞最邪惡的一種政體”^⑪。

一七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紐約的技工委員會要求紐約代表投票贊成獨立。但保守派占統治地位的州議院不但拒絕向出席大陸會議的代表們傳達這種要求，更於六月十一日通知那些代表說，他們根本沒有代表本州說話的權利。可是在這個時候，弗吉尼亞的里查·亨利·李已經在會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議案：“這些聯合起來的殖民地，現在已經是、也應該是自由和獨立的州郡”。馬上，大會委派了起草“獨立宣言”的委員會，在磚瓦匠格瑞福的家里，湯姆斯·杰斐遜草擬了這偉大的革命文獻。

“獨立宣言”的消息一傳出來，工人們真是歡喜若狂。但在某些殖民地里，也只有工人們在那里感到高興。愛德華·麥克格芮茅曾寫道：“在南卡羅來納，只有一派人是全心全意忠於這個事業的，那就是克利斯多佛·加德斯登所領導的，全由普通人民組成的老自由之樹黨……。”^⑫

很顯然，如果技工們和一般勞動者不會遭受到種種阻撓，與英國的分裂是一定會更早實現的。但在一七七〇年以後，富有的種植園主、律師和商人卻完全掌握了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並逐漸把技工們安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了。這種事情的發生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個主要依靠農業的國家里，技工、機匠和一般勞動者在數量上比農民要少得多，在影響上也遠不及商人和種植園主。在革命運動的最初階段，城市的下層階級所以能夠發揮極大的作用，是因為在城市中，較之道路崎嶇、交通困難的鄉村，組織工作要容易進行得多。但在革命鬥爭的其他各個時期中，技工和一般工人們雖然能夠對於那些保守分子起一種推動的作用，但他們始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在一定的時間內來領導整個的革命運動。

然而，無論如何，今天的工人階級的革命祖先們已經得到的成就是不容輕視的。他們曾作為“運動的矛頭，使美洲殖民地脫離了英國的統治，並在美洲建立了更廣泛的民主政治”，他們組成了“當時偉大的示威運動中的廣大群眾以及這些運動的核心組織；此外，更是完全依靠着他們的力量，請願書的輾轉傳遞簽名，傳單的散發，和英國軍隊進行的武裝鬥爭以及將英國茶葉傾倒入海等等工作，才有了實現的可能”^③。要是沒有他們，大革命一定會歸於流產。

獨立戰爭

他們的革命熱情更在獨立戰爭取得勝利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上尉裴多克領導的波士頓炮兵連是完全由技術工人組成的，很多美洲軍隊中的軍官就是從這個單位中產生出來的。賓夕法尼亞第十一團的兩個連中有五十七個士兵會把自己的職業登記

下來，其中只有七个人是神話和詩篇中的“开上战場的農民”，其余則完全是各行業的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此外还有很多人，他們的工作都是極关緊要，对于革命的勝利也都有其極重要的貢獻的。他們供給了革命所需的劳动力——他們是喂養牲畜的牧人，是鐵匠，是槍炮匠以及其他數十種不同行業的技術工人。他們，正如有一個命令會說，“在情况需要的时候，要充當進攻或防守的士兵，同时还要充當技術工人”^③。

很多合同雇工也参加了革命軍，他們的老板們可以从政府得到一部分錢以补偿合同未滿的一段時間的工作。宾夕法尼亞州蘭加斯德郡参加軍隊的合同雇工是如此之多，以致一七八一年本郡的財務当局拒絕再向老板們付款，“因为這項經費所需比全郡的稅收數目都更大了”^④。後來，由大陸會議通過了一條法案，凡參軍的合同雇工均應立即無條件恢復自由人身份。

自由的和奴隸身份的黑色工人在革命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一般沒有得到適當的重視。在戰爭爆發以前，因為不允許他們參加反對大不列顛的熱潮，很多奴隸都跑到英國方面去，英國人答應他們在服滿兵役後可以恢復自由。為制止這種情況，很多州政府当局才向奴隸們提出，凡參加獨立軍作戰的都可以獲得自由。一七七八年到一七七九年間羅得島給華盛頓送去了一團黑人兵士。從麻薩諸塞的七十二個市鎮，從賓夕法尼亞，都有不少黑人參加在混合營里作戰。有一個英國的雇傭軍官曾在日記中寫道，在美洲軍隊中“從來沒有見到過任何一個團，里面沒有大批的黑人，那些黑人有些是極能干、極強壯和極勇敢的傢伙”^⑤。黑人兵士薩勒姆·普爾，曾由十四個軍官署名專案向麻薩諸塞州州議院呈述他的功績，他們說他在邦刻山一次戰役中“表現自己完全像一個經驗豐富的

軍官，同時又是一個英勇善戰的兵士”。他們接着說，“在這個黑人身上，看到他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兵士”。麻薩諸塞州對於一個假扮男裝在獨立軍麻州第四團中充當了十七個月兵士的黑人婦女德波娜·茄勒特也表示了極高的崇敬。她得到由本州發給的三十四英鎊的獎金以表揚她的“女英雄主義的卓越事績”⁸⁷。

美國的革命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是一枝忍受着飢餓、寒冷和各種挫折但仍然堅持着向勝利前進的軍隊。華盛頓對於在鐵爐谷時襤褸不堪的獨立軍的動人的描述，充分地表露出我們的革命祖先真是一種特殊材料做成的：

“士兵們沒有足夠遮體的衣服，睡眠時沒有軍氈，走路時沒有鞋襪，從他們兩腳上流下的血跡可看出他們行進的方面，糧食是經常沒有，但他們仍然在冰天雪地中前進着。聖誕節到了，他們在離敵人一天的行程的地方駐扎下來，那里，在他們自己動手修建以前，是沒有半間房屋或一個茅棚可以蔽體的，但他們毫無怨言地忍受着這一切，這種堅韌和服從的表現，在我看來，在整個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⁸⁸

華盛頓的軍隊在鐵爐谷所遭遇到的這種困苦並不完全是由英國的封鎖造成的。名譽上負擔軍隊給養的商人及製造商們的“貪婪和對金錢的無饜的飢渴”倒是造成這一切的最大原因。華盛頓寫道，“投機商人、各式各樣的罪惡的守財奴和股票商們”，才真正是“扼殺我們的事業的凶手”⁸⁹。這些發戰爭財的魔鬼，安穩地坐在自己的家里，化錢雇幾個人上前綫去替他打仗，當技工們、農人們和上層階級中的愛國分子都為自己的國家貢獻出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的時候，他們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通過同政府簽訂購貨合同，通過貨幣上的投機和土地的買賣積累無盡的財富。

在后方，对于“扼殺我們事業的凶手”的憤怒情緒是同样日益增長的。物价上漲了百分之三百。約翰·亞当姆斯的妻子阿比盖尔·亞当姆斯于一七七七年四月寫道，現在到处“可以听到反对商人、反对壟断者等的呼声，据說他們已經制造出一个影响到很多人的大灾荒”^⑩。人民群眾要求各州和各个市鎮的政府当局控制物价，并实行定量分配的办法，这个要求首先在康涅狄克州得到实现。一七七六年該州州政府通过一个法案規定了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一定的工資标准，該法案的序文并对那些壟断商人們予以嚴酷的斥責^⑪。馬上，紐約、新澤西、宾夕法尼亞及新英格蘭的各州都先后通过了規定工資、限制物价的法令并对于商品分配進行管制。

如果沒有强制执行的机构，僅靠法令來控制物价是决不可能的。老板們很容易在工資标准方面遵守法律規定，而在物价方面完全置法令于不顧。工人們看到自己完全成了“一种無饜的財富欲”下的牺牲品，真是憤怒已極。一七七九年一月費列得尔菲亞的海員为要增加工資举行罢工了。但結果竟遭到軍隊的鎮压，而罢工工人也被关進了監牢。不滿情緒越來越增長，有些工人更完全气馁了。他們感到他們所流的血“只不过是為了讓一种寡头政治的統治去代替另一种寡头政治的統治，而兩者在压迫人民和只顧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是毫無二致的”^⑫。但这种情緒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下層各階級決定用它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方法來执行控制物价的法令了。在麻薩諸塞州的柏味力，女工們打進了商人們的倉庫，強迫他們按照法定的价格出賣他們的商品。

在这个問題上，費列得尔菲亞城所采取的办法乃是最有效的办法。宾夕法尼亞州在一七七八年十月就通过了一个限制物价的法令，但到一七七九年夏天这个法令仍然沒有能够执行。那年夏

天，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一個法令執行委員會產生了，大會對這個委員會所給的原則性的指示是“武器是拿在我們手裏的，我們也知道如何去使用這些武器，在這個法令沒有貫徹執行以前，我們決不放下它們”。於是這個委員會公布了一個新的物價表，並警告商人們說，任何人如果敢於違反這個物價表上的規定，決將予以嚴厲的懲罰。這樣一驚之下，壟斷商人們才只得規規矩矩地服從，物價也因此下落了。當湯姆·潘恩和檢查委員會找到羅伯特·摩利斯的家里，沒收了他的一船面粉的時候，這位富豪的費列得爾菲亞商人和金融家却埋怨說，“不容許一個人照他自己的意思，根據他本人認為合適的條件去處理屬於他自己所有的財產，那實在是完全違背自由原則的”^④。

英國人以及為他們服務的美洲的英王黨叛徒們極力希望把人民大眾的憤恨情緒轉向革命運動。他們向工人們說，只要他們一拋棄革命事業，他們馬上“就會得到永恆的榮譽和立刻兌現的報酬，以代替他們現在所面臨的茫茫的前途和無窮的困苦”。但只有極少數的工人因此投降了。同時，由海員、鐘表匠、成衣匠和鞋匠所組成的巴爾的摩獨立黨俱樂部在這一問題上所採取的行動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了。一七七七年他們命令一個屬於英王黨的印刷商人威廉·郭大德，“於午前離開本市並於三天之內離開本州”，否則他即將是“無數群眾的憤怒下的犧牲品”^④。

英軍司令克林頓聽說賓夕法尼亞第十一團因為“幾乎有十二個月沒有見到一元紙幣的兵餉”，馬上要嘩變了，於是他一方面派人傳去一些極富於誘惑性的消息，一方面並派遣了幾個代表去和他們進行談判。但這些代表可真是時運不佳。他們中有幾個竟被士兵們捉住給絞死了。為要給那些懷疑賓夕法尼亞工人對革命的

忠誠的人們一个教訓，他們的尸体被懸挂在野風中达五天之久^④。

勝 利

一七八一年康瓦里斯的投降*及緊接着成立的“和平协定”并没有給美洲的劳工階級帶來安乐的歲月。但美國大革命确是本國人民大众在走向自由的長途上大踏步前進的开始。需要从斗争中去爭取的东西是还很多的。廢除奴隸制度的工作虽然已經开始，但这个制度現在还依然存在。麻薩諸塞州于一七八〇年取消奴隸制，同年，宾夕法尼亞也通过了一个逐步解放奴隸的法案。罗得島更提出了一个需要再來一次革命才能实现的原則：

“既然美洲的居民一般都正从事于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而人身自由更应当視為最重要的一項，每一个自己急切希望享受自由生活的人，是應該極願意讓別的人也都能够得到人身自由的……。”^⑤

大革命有效地摧毀了合同雇工制。以千計的合同雇工因为参加軍隊得到了自由，新的合同雇工的入口已几乎完全停止。一七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紐約市民举行的群众会一致要求取消“过去在專橫的英國政府的統治下，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在本州一直進行着的買賣白色人口的活动”，因为这种買賣是和“本國人民在欢欣鼓舞中建立起來的自由理想”完全違背的^⑥。

大革命开放了原由一七六三年公告划在居住范围外的大片的土地。虽然首先得到利益的仍是一些投机商人；彭恩氏、斐尔費克

* 查理·康瓦里斯(Cornwallis)侯爵为英國政治家和軍事將領，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他在弗吉尼亞州的約克鎮向美洲軍投降。——譯者

斯氏、格阮菲尔氏等家族及其他英王党人的大批地產全部都落入極少數的几个壟斷商人的手里了，但边境上各区域人口的大量增加也說明一般人民还是得到了一些利益的。

各州的憲法可以說是把革命的勝利果实紀錄下來了。虽然大多数的憲法仍然是維護富人們的利益，但保障民主進步确已在一切憲法中成为基本法則。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原則差不多在所有各州憲法的民权条例一篇中都明文規定下來。有好些州，取消了國教教堂，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口选的方式被禁止了；長子繼承和限嗣繼承等使大量土地永远为少数家庭占有的封建制度取消了。最后，人民选举代表参加特別的制憲會議并批准憲法草案的权利，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得到承認。

大革命把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从英國商务政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發展了美洲商業，使本國工業有了發展的可能。这些情况轉過來更產生了新的美國勞工运动，这一运动在其此后的斗争中則將实现那些为美洲的自由而牺牲的机匠、技術工人和一般劳动者們所留下的未完的願望。

在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美洲的勞工階級更獲得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通过“自由之子”的組織，它認識到集体行动和集体斗争的重要价值。通过通訊連絡委員會的活动，它認識到同其他城市和其他國土的工人必須保持密切联系的重大意义。由于参加了市會議、州議會以至大陸會議的工作，它了解到应如何为了全体人民共同的目标去和自己的同盟者進行合作。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國勞工运动思想意識的形成，大革命也起了極重大的作用。下面一段話是很有代表意义的。这是一八三六年六月費列得尔菲亞制鞋工雇工协会对于鞋厂老板們的一个回答，那些老板曾警告雇工們

說，他們將再不雇用任何曾參加了任何工人組織的鞋匠了：

“我們說我們願意參加什么样的一个組織，這是我們的權利，這是我們的祖先——那些在一七七六年為保衛平等權利和平等待遇，榮譽地用自己的鮮血澆遍了這片土地的辛苦勤勞的老工人們遺留給我們的權利，因此我們，他們的後代子孫，是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干涉的享受這種以我們祖先的血換來的這份遺產的。”^{④⑧}

多少世代以後，人們對於七月四日的紀念是同一八八六年以後紀念“五一”一樣熱烈的。這一天的整個活動是遊行、宴會、開慶祝會和表演各種表現工人階級要求的戲目。一個在工廠工作的工人曾於一八四四年七月四日為福爾河的紀念會作了一支歌：

我們又一次歡迎你的來臨，

你——曾給我們帶來獨立的日子！

那曾經烘暖了我們祖先的自由火焰，

今天還熊熊地燃燒在他們的子孫的心間。

歌唱吧！讓寧靜的碧天發出回響！

自由的朋友們已集會在此間，

對敵人的打擊是要沉重的，

我們要叫自由的敵人戰抖，乞憐。

今天，讓我們在彼此的面前宣誓，

我們要為勞動的人民戰鬥到底，

在這個戰鬥中我們不要用刀槍劍戟，

我們的武器是真理^{④⑨}。

偉大的革命口號——生活、自由以及對幸福的追求——組成了勞工階級所提出的提高工資、縮短工時和改善工作條件等要求的具體內容。他們的革命祖先們所付出的犧牲則更激動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的工人們，使他們要求更多的分得一份由他們的勞力所產生出來的財富。

第四章

美國工業的發展

(一七八三年至一八八〇年)

美洲勞工運動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也更不是什麼從歐洲輸入進來的東西，雖然移民到美洲來的一些對工會運動有經驗的人也會加速了它的發展。美洲勞工運動乃是在美洲工業發展下的社會經濟力量的產物。它是美洲土生的東西，是本國工業發展後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工業發展中的各種障礙

獨立戰爭敲碎了英國商務制度強加在美洲商業和工業上的鐐銬。但政治上的獨立也並不能立刻就帶來經濟上的穩定。緊跟着大革命之後，由於英、法、西班牙等國多方限制飄搖着美國旗幟的商船——比如說，獲利最大的西印度群島的貿易，美國船是完全無分的——美國商業的發展遭受到嚴重的阻撓。另一方面，在革命戰爭時期出現的、前途遠大的工業也因為歐洲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傾銷受到了急劇的打擊^①。在聯邦組織法的條文下，沒有真正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只使得整個的情況更形惡化。各州之間的商業戰爭不停地在進行着；有些州對歐洲商品開放了自由港口，還有些州竟對別州商人運來的商品課以重稅，否則就不許在本州銷售。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繼續很久。到了一八〇〇年美國商業不但恢复了它过去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而且是迅速地向前發展着了。当英法兩國在欧洲進行战争的时候，美國商人拿过来了相当大一部分運輸業方面的交易。此外，因为欧洲方面食粮的歉收，造成了大量需要美洲粮食的情况。有紀錄的美國对外貿易輸出額，一七九五年时为十五万七千噸到一八〇七年則增至一百万噸以上。

但工業發展的速度就要慢得多了。一七八七年通过的新憲法虽然消除了美國各州之間商务交往上的各种阻碍，但也并不能在一天之內就在美洲創造出一种全新的經濟生活來。在一八〇〇年，美洲人絕大多数仍是分散的農民。運輸和交通上的便利是那样有限，巨大的工業品市場还几乎不可能存在。絕大地區的農村人口是自給自足的。据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一七九一年的估計，在很多地區，“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的居民們所用的布料全是自己紡織的”。

还有些别的困难情形也阻撓了美國工業的發展。資本家們对于製造業投資不感兴趣。那时商業巨頭如薩勒姆的耶里愛斯·海士克特·德比和費列得爾菲亞的斯蒂芬·基納德正从对外的商業上撈取巨大的財富。一八〇五年左右，運輸業的利潤已達每年五千万到七千万美元之多。很多工業企業的徹底失敗，更使得大多数商人認為多余的資金只应在不動產上去投資。新興的工業家羅伯特·李，他在給一八一〇年八月十四日的紐亞克“自由前哨”的一封信中，即曾對“製造業方面資金的缺乏，或者是很少人願意把資金运用到其他可能帶來更大利潤的、或對於資本所有人更方便更省力的方面去”的情況深感不滿。

另外一種障礙便是因為有人相信工業的發展將在人民中產生邪惡放蕩的惡習和道德上的墮落，因而出現了一種反對發展工業的傾向^②。無疑的，很多人是受了一七八二年出版的“弗吉尼亞拾零”的影響，在那本書里湯姆斯·杰斐遜曾說，他希望美洲將永遠不會看到自己的人民整天坐在工作間里，他並且說，如果“我們的工廠永遠是設在歐洲，在那里進行一般用品的制造”，那對我國說來真是再好沒有的事了。後來，杰斐遜在這個問題上是已經改變了他的看法的，很多杰斐遜主義者也都成了發展工業的熱烈擁護者。一七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杰斐遜派的報紙哥倫比亞“前哨”，即曾呼喚讀者們停止購買英國制造的工業品，要他們開始“買美國貨”。該報接着說，如果能夠這樣，儘管有“歐洲國家加在美國工業上的種種壓制”，美國工業是仍然能夠存在並且大加發展的。另一種杰斐遜報紙，費列得爾菲亞的“曙光”，亦要求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以幫助美國工業的發展。該報于一八〇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提出疑問說，“為什麼自由共和國的制造業者不能和暴君統治下的臣民一樣從政府得到同樣的保護？”

但很多美國人仍同意工業應該停留在歐洲，認為大城市是“破壞人的道德、健康和自由的瘟疫”。從曼徹斯特、伯明翰、里子和英國其他工業城市傳來的大量失業，童工、女工的可怕的遭遇以及工人階級所處的慘痛的生活情況等消息，更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但慢慢地情況改變了。歐洲方面對糧食的需要增加了改善運輸條件的要求。為滿足這種要求，設關卡的道路和運河馬上開始修建起來。交通條件改善的結果，農村里的商人可以從東部購買商品來賣給農人，農民們因為麥子和玉米價格的增高，已可以有力

量購買比自己家做的更好的布料和鞋襪了。

移民的增加和人口的繁殖也使得工業品市場更加擴大。交通的發達更給這種市場準備了條件。最初，是英國的製造業者全部收羅了這個日益擴大的市場上的利益。但封港運動、各種停止與國外交往的法案以及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終於制止了充斥美國市場的外貨的流入。

封港禁運的結果使美國製造商人暫時掌握了國內市場。船運業的衰落使一些資本家不得不把資金轉向別的方面去投資，工業也因此吸收了相當大一部分資金。最後，直到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發生後，很多美國人才相信，本國工業的發展是達到國家獨立所必不可缺少的東西。一八一六年時杰斐遜說，“現在，我們必須把工業生產者放在和農業生產者同等的地位。”“我們是不是要完全聽從外國人的意志去決定我們要不要享受一切生活上的舒適呢？……經驗告訴我，在目前製造業對於維持我們的美好生活和維持我們的獨立同樣是完全必須的。”^③

愛國主義和發展工業變成了同一個概念。自然，製造業者是更願意強調這種論點的。一八〇八年在費列得爾菲亞一次宴會上，康涅狄克州的一個工業家，大衛·漢姆弗瑞上校曾請大家為“我國所需要的最好的戰爭形式——以梳棉機和紡織機為炮、以梭子和滑車為槍的戰爭”干杯^④。

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六年的十年中，棉織和毛織廠、面粉廠、鐵工廠、鞋廠、地氈廠、棉花打包廠、印花布廠、陶器廠、玻璃廠、肥皂廠、封臘廠、造紙廠等都先後建立起來。僅在普羅維頓斯一個區域，從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一五年間，紡織廠數目從四十個增加到一百六十九個，紗錠數目則由兩萬增加到十三萬五千。從本世紀

初到一八一〇年，棉織工業中的紗錠數已增加了約三十倍，而在其後的五年中則又增加了差不多六倍多，全數達到約五十萬的驚人數目。投資紡織工業的資金總值，據估計在一八一五年已達到約五千萬美元。

可是，僅僅數年之後，這些工廠是大部分都不存在了。在同英國的和約一簽訂之後，歐洲的商品便像洪水一樣湧進美國來。那時的英國商人完全有意要用犧牲成本在美國銷售商品的辦法摧毀美國的工業。一八一六年，亨利·布魯安先生在英國國會會議上說，“為要用供過於求的辦法，把美國正在成長中的工業，這種被戰爭所迫違反自然規律產生出來的工業，乘其尚在襁褓時期活活捏死，我們在最初的幾批出口生意上賠點本是完全合算的。”^⑤

英國製造業者掌握着很多有利的條件，使他們能夠實現他們的這種政策。英國貨比美國自己生產的東西價錢來得便宜而且質量也好些。此外，賒購英國貨的付款期限可以比賒購美國的要定得長些，因為美國的製造業者本錢少。

一八一三年僅為一千三百萬美元的入口總額，到一八一六年已增加到一億四千七百萬美元，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〇年間每一個美國居民所消耗的進口貨的價值平均為十三元五角，而在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四年則僅為每人二元五角。這種情況的結果是很多新興的美國工業完全被消滅了。一八一五年，在羅得島開工的工廠有將近一百五十家；一年之後，除了很老的斯萊特一廠以外，其餘的是全部倒閉了。一八一九年，嚴重的經濟恐慌來臨的時候，美國大多數的工廠完全“倒閉，老板們宣告破產，工廠的一切設備均以極大的犧牲賣掉”。一八二〇年，亨利·克雷曾報告美國國會說，沿着公路兩旁現在還可以看到很多過去曾一度興隆的工廠的陰

影，“它們的老板們因外國競爭的強大壓力已不能使它們再活動起來了”^⑥。

但是，儘管有這種殘酷的鬥爭和經濟不景氣的惡劣情況，美國工業却終於又一次向前發展起來。老的工廠復活了，新的、完全近代裝備的工廠開始誕生了。

只要南部奴隸主政權還能一天控制着全國的政權，它總是要想尽方法阻止一切能夠使美國工業家擊敗“外國競爭的強大壓力”的關稅政策和其他必要政策的實施，以求在工業發展的道路上安放下有力的障礙。但現在市場的擴張是如此的迅速，以致僅靠國外的生產已不能滿足市場上極大的需要了。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〇年間，美國人口幾乎增加了一倍。從全國各地都傳來需要大量商品的呼聲——紡織廠、鞋廠、金屬器具製造廠、鐵工廠、酒廠以及皮革廠的生產品都包括在內。

一八四四年恩格斯說道，“美國以其無盡的資源，無法估量的煤鐵礦藏，無比豐富的水力，特別是更加上精力充沛、工作積極的全國人民……已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創造了自己的工業，這種工業已使美國在較粗的棉織品方面可以同英國競爭，使她能夠把英國勢力完全排出北美和南美的市場了，並使她能夠在中國市場上和英國抗衡。”^⑦

交通運輸業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

又一次，交通運輸業替國內市場的擴張準備了條件。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在美國的河道同海運綫上經常有几百艘汽船在行駛着。無數的關卡道、河流、湖泊和運河，幾乎把內陸的每一部分都同海岸邊的大城市連接起來。一八二五年，伊利運河的修建完

工了。它把工業品輸送到阿巴拉契亞以西各地去，又把那里的糧食運送到東部來。它使得運輸費用減低了百分之八十五之多。而更重要的是從它開始了一個迅速發展交通運輸業的新紀元；那時交通運輸業發展之快，據一八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布法羅共和黨人”報的描寫是“即使極留心的人也無法確切知道已經完成的或打算要修的鐵路和運河到底有多少”。

但這些修建計劃，有很多完全是一種投機性質的東西，因而始終也沒有能夠實現。一八三七年的大恐慌——這個恐慌一部分實由於過度發展運河和鐵路的修建以及在這方面進行無理的投機所造成——却使得很多別的計劃也因此沒有能夠完成。儘管如此，直到一八五〇年運河運輸還是極發達的。運河把匹茲堡的煤和鐵運到費列得爾菲亞，從西部把麥子和玉米運到紐約城，並從新英格蘭把工業品輸送到俄亥俄及西部各地去。

鐵路綫終於慢慢代替了運河，因為它更快更省錢。此外，鐵路綫的運輸是整年不停的，而水道則一年中總有四個多月要結冰的。

一八三二年開始修建紐約中部的鐵道，到一八五〇年時已從原來僅只從阿爾巴尼通斯刻涅克塔狄十七哩長的一段路，發展成為從紐約直達布法羅的一條極長的鐵路綫。在四十年代期間，美國新鋪設的鐵軌共六千哩，但大部分都在東部。五十年代，共鋪軌二萬一千哩，則大部分在西部。在五十年代初期，俄亥俄、印第安納及伊利諾各州共有鐵道僅九一三哩。但到一八六〇年，在全國三〇，七九三哩的鐵道總數中，上述各州共有鐵路已占了八千哩。

在這十年中，僅在南部新建的鐵道是七，五六二哩。在一八五〇年，田納西州原來是半哩路的鐵道都沒有的。十年後，該州有鐵

道共一，一九七哩。

五十年代中鐵路綫的發展，使整個西部地区和工業化的东部極便利地連結起來。同时，这个極重要地区的人口也因此能够急剧地日益增加。一八四〇年，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密西根及威士康辛州共有人口数为二百九十万——而一大半在俄亥俄州。一八六〇年，伊利諾州一州的人口为一，七一二，〇〇〇人；印第安納为一，三五〇，〇〇〇人；密西根为七四九，〇〇〇人；威士康辛为七七六，〇〇〇人。而俄亥俄州这时的人口則已达二，三三九，〇〇〇人。

交通運輸業是一种極关重要的工業，它同鉄、鋼和煤一起組成美國工業發展的整個基礎。一八一二年，从費列得尔菲亞到匹茲堡坐馬車需时六天。一八三四年，走运河的水道也需要三天又十九小时。但到一八五四年有了火車以后則只需要十五小时就够了。

技術方面的改進对于美國工業的發展也有極大的作用。菲直和福尔吞的汽船、惠特勒的軋棉机和机器零件掉換办法，都是恩格斯所称的美國“精力充沛、工作積極的全國人民”的智慧的產物。此外更还有無數的發明堆滿了華盛頓的專利局。自一七九〇年至一八一〇年間，平均每年發出的專利証为七七件；一八三〇年增至五四四件；一八五〇年增至九九三件，而至一八六〇年竟达到四，七七八件之多。在这些年中，美國每年發出的專利証差不多都超过了英法兩國所共發的數目。一八四一年，一个英國人在英國國会上公开宣称說，“据我所了解，一切真正的發明，那就是說，真正用一种完全新的机器，或在一种完全新的方式下，進行一种生產过程的一些新的原理，主要地、或者說大部分是从外國來的，特别是从美

國來的。”^⑧。

工厂制度的兴起

在美洲，工厂制度最先是在紡織工業中开始發展起來的。英國曾經尽一切可能用禁止輸出紡織机及紡織机的設計或模型，禁止紡織工人出境等办法，企圖來制止这种發展。但無論什么办法也不能阻止美國人自己進行制作紡織机的實驗。在罗得島，教友派教徒富商，威廉·阿尔密及摩西·伯朗即曾試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來建立紡織工業。

一七八八年*，一个英國机工塞米尔·斯萊特，來到美國。听到伯朗要想建立工厂的消息，他自己提出來願为伯朗担任一个紡紗厂的經理职务^⑨。伯朗馬上就同意了，并拿出了所需的資金。斯萊特憑自己的記憶制出了阿克來式紡紗机的圖样，并把圖样送交坡塔刻特城一位铁匠，大衛·威尔金生，这位铁匠在一七九〇年完成了美國第一部試用成功的阿克來式的紡織机。一年以后，几部靠水力發动、由孩子們管理的机器便已开始生產質量很好的棉紗了^⑩。

随着斯萊特的坡塔刻特紗厂的开办，美國的工厂制度也开始了。但这个厂实际上还不能算是一个已經成形的工厂。在这里只有把生棉变成棉紗的过程是用机器；織布的工作仍是分由当地農村里的農民担任的。

一八一五年美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工厂出現了。五年以前，法蘭西斯·罗厄尔即曾到英國去專門研究組織棉織厂的各种問題。

* 此处原文作一七九八年，据俄譯本改。——譯者

一八一二年帶着滿腦子的新觀念回到美洲來，他終於找到一群新英格蘭的商人，勸他們把自己的財產投資到他的工廠里去。這些資本家於是開辦了“波士頓製造業公司”並在麻薩諸塞州篤爾坦地方建立了一個棉織廠。在這個廠里才第一次做到讓棉織品的全部紡織過程在一個地方一次完成。第一匹布出廠是在一八一六年二月二日。從此紡織業的大量生產開始了^①。

不久以後，類似的機構在麻薩諸塞、新罕布什爾及緬因各州的各地建立起來了。羅凌士、羅厄爾、多維爾、曼徹斯特、何略克及契科皮諸城市都變成了工業中心；但占有和控制着這些工業的則全是波士頓的一些大族——羅厄爾氏、阿波特氏、耶波頓氏及羅凌士氏各家。這些資本家是不到廠的老板，他們根本很少上那些工廠所在的市鎮中去，在那裡只有無數的工人生活在疾病和骯髒不堪的環境中^②。

在毛織工業方面工廠制度的出現是比較晚得多的。遲至一八三〇年，專供自用的家庭生產和以分包零工為基礎的家庭工業社的生產仍然超過工廠的生產量。甚至到一八六〇年，費列得爾菲亞的毛織品的生產仍大部分是依靠手機的紡織工人，他們自己有織機和工具，由商人資本家們供給材料。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間，新英格蘭才有毛織工廠出現。到一八六〇年，該地區共有毛織廠一千七百所，紡錠總數為六十四萬，織機共一萬六千座，每年產量總值約為九千萬元，雇用工人數目達六萬人以上。鞋靴工業進入工廠生產的階段也是很慢的。一八四〇年以前，鞋靴制作工作一般由兩類工人在擔任着，一種是在商業資本家所有的工作間中集中工作叫做廠內工，一種則是在自己家裡工作的，叫做廠外工。廠外工中間有很多是女工，他

們由商人供給皮子、沿條兒和絲綫，只擔任綑鞋的工作。沿條兒也多是由在家工作的婦女們做，計件付工資。直到一八四〇年麥凱縫紉機被採用以前，使用機器的事几乎是沒有的，雖然專業分工的情況早已存在了。到一八五五年，切皮機、裝底機、磨革機以及染外底和鞋跟的機器等都已開始使用。這些機器也大都是用蒸汽或水力發動的，雖然制鞋工業真正充分使用動力的事是內戰期間才開始的。

制鞋業方面工廠制度的建立大約是在一八五五年左右，那時，專業化、分工、廣泛使用機器和大量生產等情況都已出現了。一八六〇年的調查已清楚地說明這一工業正在一天天向工廠制度的方向發展，制作廠是幾層樓的龐大建築，每一層專供某一特殊生產過程之用，蒸汽機和其他各種節省勞力的機器也都已採用了。

同時根據這個調查，我們更知道制鞋工業所雇用的工人人數占那時全部製造業工人總數的十二分之一以上。一八六〇年，美國共有制鞋工廠一二，四八七所，雇用工人總數為一二三，〇二九人，所產鞋靴的總值為九一，八九一，四九〇元^⑬。

內戰前夕工業的擴張

在內戰開始的時候，鋼鐵生產業几乎還不能說是一種已經成形的工業。那時，這種生產差不多完全是建立在一種封建制度的基礎上的。某些富人在新澤西或賓夕法尼亞占有大片的礦區，他們便雇用一批工人到他們的礦坑或工廠里去工作，這些工人連生命都是完全在老板們的掌握之中。那里的一切房屋、商店、教堂、學校等都完全屬於那些鋼鐵巨頭所有，工資則是以商品抵付，工人們是經常向礦廠或工廠的大老板們負債的。

到三十年代期間，鋼鐵工業才完全轉移到各種公司組織的掌握中。那時，美國的鋼鐵生產量已是僅次于英國的，雖然這一“僅次”是次得很多的。美國生鐵生產量一八一〇年為五五，〇〇〇噸，一八三〇年為一八〇，〇〇〇噸，一八六〇年為九八八，〇〇〇噸。

作為一個重要的鋼鐵生產的中心來說，匹茲堡的鋼鐵業是發展得很慢的。到一八二六年的時候，整個這一區域才只有七個軋鐵廠，所消耗的礦砂不過六千噸。一八五〇年，有廠十四所，消耗礦砂五五，〇〇〇噸。一八五七年，增加到二十一廠，消耗礦砂數為一三二，六〇〇噸。在內戰以前，這裡的鐵工業主要倒是為了農業上，而不是為了工業上的需要。在那還是以農業為主的時期，熟鐵的製造商人專門供給“棒鐵給農村的鐵器工人，以打鐵為職業的或只供自己需要的鐵匠們，讓他們去重新打煉以滿足農人、車工或廠房老板們的需要”。到了工業時期，這個時期是從一八五九年開始的，對鐵的需要“愈來愈大的則是那些從事生產鐵器用品、生產工業或商業上用的機器等的製造工業了”^⑭。

隨着美國工業的發展，采煤業也升高到極重要的地位。在一八二五年以前，我國煤的開采量是極其微小的——一八二〇年的全國開采總量還不到五萬噸。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大多數的礦藏那時還沒有方法挖掘，也因為那時我們的經濟生活對於煤還沒有什麼很大的需要。蒸汽機是很少的，大多數的機器都是靠水力發動。家庭用的柴火是木柴，熔鐵也是用木炭。早期的鐵道上用的大多數是燒木柴的火車頭，俄亥俄大河上的汽船直到五十年代初期還依然是使用木柴的。

情況很快就改變了。由於運河的修建，使煤有了出路。煤的

市場也不再只限于本地区了，虽然直到四十年代第一条铁道伸入煤礦区來以前，运输问题是沒有得到真正解决的。

三十年代期間，家用燃料方面，煤已經开始代替了木柴。一八三九年，鼓風爐設備的采用，更使得無烟煤能够在煉鉄爐中使用了。由于鉄器生產的增加，由于熔鉄爐、軋鉄厂以及鋼鉄工厂等數目的增加，煤的生產量也飛速地上升。到一八六〇年，其总產量已为一四,三三四,〇〇〇噸，其中有八,五〇〇,〇〇〇噸为無烟煤。

这种煤產量的增加肯定地指出，美國的經濟是正迅速地由農業經濟改变为工業經濟了。此外，公司組織的兴起也說明了同样的情况。虽然在內战以前，独資經營或数人合股經營还是最突出的現象，公司制度在紡織、煉鉄和煤礦工業諸方面，已經在迅速地向前發展着了。在铁道建設方面，除了公司經營，便沒有別种形式存在。建設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鐵路所費約为一千五百萬元；紐約中部铁道所費为三千萬元，伊利綫則約为二千五百萬元。即使說这些巨大的数目中有好大一部分都讓那些富有的承攬人飽了私囊，但在美國是沒有任何一个个人或几个人合股能够拿出足够修建这些鉄路的錢來的。

工業家对美國的經濟生活及政治生活發生影响的情况甚至是在內战以前便开始了的。比方說，在一八五〇年間，波士頓的被稱為“波士頓幫”的十五家大戶，共控制了全國紡織業紡錠數的百分之二十，控制了麻薩諸塞州全部鉄路綫的百分之三十及全部保險業資金的百分之三十九，并控制了波士頓地区銀行資金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大戶——罗凌士、罗厄尔氏、耶波頓氏、卡波特氏、德怀特氏、耶利阿特氏、林曼氏、西尔氏、杰克孙氏——控制了整個的麻

州，控制着該州的報紙、教堂、學校、工廠、議院——一句話，整個麻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

商業控制美國政治的事也並不是到內戰時期才開始。走向壟斷的趨向同樣是很早的。匹茲堡“每晨郵報”在一八四九年即曾發表言論指出這種趨向說：“擁有巨大財產的壟斷商們無時不在想擠垮一切小規模的工商業，把它們完全清除掉，以便他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願望來規定商品價格。”^⑮

在某些工業部門，一八五〇年時的工廠數目比一八四〇年的確少多了，一八六〇年則比一八五〇年更少。例如僅就棉織業方面說，其工廠數一八四〇年為一，二四〇，至一八五〇年則減至一，〇九四，到一八六〇年則更減為一，〇九一了。但就在這几十年中，資本的投資總額却反增加了一倍，原料的使用量增加了三倍，雇用工人的數目增加了將近百分之七十。毛織工業方面發展的情形也完全一樣，工廠數目從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減少了百分之十，而生產的總值卻增加了。

那時，雖然托辣斯制度還並不普遍，但在某些工業部門中，消滅小型企業建立大規模企業的趨向已是很顯著的了。

美國是正處在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過程中，儘管由於南部奴隸主政權控制了全國的政治生活，因而限制了這種轉變的發展速度，但是它也並不能完全制止其發展。自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我國工業生產的總值從四八三，二七八，〇〇〇元增加到一，八八五，八六一，〇〇〇元，差不多是增加了四倍。每年生產價值在五百元及五百元以上的工廠的工人人數，一八四〇年為七九一，〇〇〇人，到一八六〇年則增至一，三一—，〇〇〇人。一八六〇年進行生產的棉織業的紡錠數在五，二三五，〇〇〇以上，而

在一八四〇年則僅為二,二八四,六三一,也几乎是多了一倍。在一八六〇年中,一千九百多个毛織廠的生產總值為六八,八六五,〇〇〇元,而一八四〇年僅為二〇,六九六,九九九元。在同一時期內,絲織工業的生產總值從原來几乎等于零的數目增加到六,五〇〇,〇〇〇元。自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火爐生產總值從約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約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工具和農業機器生產從約一〇,五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家具和室內裝飾品,由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增至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車輛則由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到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自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美國人口從原來不滿一千万的數目增加到三千一百万,几乎是每十年中便較前增加了三分之一。由于工商業的發展,城市大大兴盛起來。城市人口的百分數一八二〇年為四·九,一八四〇年為八·五,一八六〇年則已為一六·一。在一七九〇年時,超過八千居民的城市只有六個;但到一八六〇年則共有一四一個之多。在一八一〇年,超過十萬人口的城市是一個都沒有的;但到一八六〇年,有八個城市——紐約、費列得爾菲亞、巴爾的摩、波士頓、新奧爾良、辛辛那提、聖路易和芝加哥都已超過這個數目。紐約市人口在一七九〇年為四九,四〇〇,一八六〇年則已增至一,一七四,七〇〇。在同一年中,費列得爾菲亞的人口總數為五六五,五二〇;芝加哥為一〇九,二六〇;巴爾的摩為二一二,〇〇〇;新奧爾良為一六八,一七〇。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反映了美國工業的發展。下面所列一八六〇年工業調查的統計數字,更可使我們了解這種人口迅速增加的基礎:

地 区	工業機構數	資本總額	工人平均數	全年生產總值
新英格蘭	20,671所	257,477,783元	331,836人	468,599,287元
中部各州	53,387所	435,061,964元	546,243人	802,338,392元
西部各州	36,785所	194,212,543元	293,903人	384,606,580元
南部各州	20,631所	95,975,185元	110,721人	155,531,281元
太平洋各州	8,777所	23,380,334元	50,204人	71,229,989元
自治州	282所	3,747,906元	2,333人	3,556,197元
合 計	140,533所	1,009,855,715元	1,311,246人	1,885,861,676元

一八五八年時，馬克思曾正確地預言說，“一旦那必然發生的向工廠制度轉化的情況在（美國）開始時，隨着來的集中經營的趨勢，同歐洲，甚至同英國比起來，都將會顯得是以非凡的速度在前進着的。”一八六〇年美國工業在全世界居第四位。一八九四年即占全世界第一位，生產着全世界工業產品总量的三分之一。在該年度中，美國生產總值為九，四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聯合王國為四，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德國為三，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法國為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奧國為一，五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全部歐洲也僅為一七，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元^⑩。

內戰期間的工業發展

工業的急劇發展是從內戰時期才開始的。戰爭中及戰後不久的那些年頭使得美國的經濟生活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間，美國工業機構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八，生產品總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工廠工人的數目也從一，三一—，〇〇〇增加到二，〇五四，〇〇〇。

戰爭本身刺激了工業的發展，加速了大規模生產企業的建立，

并推动了铁道及电讯交通綫的修建。战争更使得農業机器、罐頭食品和現成的衣服及鞋靴等的生產事業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收割机的采用带来了農業方面的改革,谷物因此有了大量生產的可能,國家的边疆也因此更向西部推進。到战争結束时,工厂制度硬拉住了很多的美國工人,他們想要跳出工資制度,使自己变成一个小生產者的希望眼看着是都落空了。甚至很多小城市里的手藝人也愈來愈感到自己是完全無法同工業城市里的机械化的工厂競爭的,工厂里出來的廉价的貨物通过鐵路綫已运銷到了全國各地。

在战争期間,作坊的轉变为机械化工厂是以驚人的速度在進行着的,政府發出新机器專利証的数目,竟从一八六一年的三,三四〇件驟增至一八六五年的六,二二〇件,这正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轉变的情况。現在如果我們再看一看某些特殊行業中的各种改革,那就更明白了。在木船制造業方面,鑿榫机、刨床及挖花机都已經开始被采用。在雪茄制造業方面,手压机和模型的使用也已开始。其他的發明有刨木模型的机器、打扫街道的机器及做桶箍和桶板的机器等。到战争結束的时候,在鞋靴業、五金業、雪茄業、印刷業、紡織業以及很多其他工業中,大量的机器生產已占据了顯著的地位⁽¹⁷⁾。早在一八六四年,有一个在麻薩諸塞州林城的工人曾在內战时期著名的劳工報紙“芬区尔工会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当时林城的制鞋工業的革命性变革的情况:

“一般地說,現在还只有很少人意識到在制鞋工業中,特別是在林城的制鞋工業中,所進行着的这种寧靜的但一直是穩步前進着的变革……。在那时(一八六一年四月),特別是在过去的一兩年中,制鞋工業在采用新机器方面所表現的急速的進步,完全是前人所意想不到的。現在我們几乎可以說,

手工業已成了少數的例外，而機器生產乃變成普遍的情況了。小本的鞋鋪和鞋作坊正迅速地一個接着一個消滅了，不久，人們就會完全忘記了它們，使用着代替人力操作的蒸汽機、到處充滿着軋軋機輪聲的龐大的工廠，正迅速地興起來代替了它們的位置，這古老的為人重視的制皮鞋業工人的中心城市的一切將因此徹底改觀了。”

到了這個時期，有技術的熟練工人發現自己幾乎完全沒有什麼較之“生手”優越的地方了。一個大規模的制鞋廠的工頭曾說，他可以“隨便在街頭雇來一個毫無技術的工人，在兩天的時間內就可教會他某些部門的工作，而工作的成績可以和受過多年訓練的老鞋工完全一樣好”。在制桶工業中，因為有了機器做的桶板，制桶這一項手藝中最重要技術失去了作用，所剩下的只是比較簡單的“裝排”的工作，這是任何一個工人學習幾天就會做的。同樣，在雪茄製造業中，因有了定型的卷煙機，廠主可以雇用女孩們，給她們幾天的訓練，就可以讓她們擔任過去由熟練工匠擔任的工作。因此就產生了一種所謂“部分熟練”工人——一些受過短期訓練的男孩和女孩，而他們的工資則只有過去那些熟練工人們所得的一半。在戰爭時期，他們成群地走進了那些過去認為專屬於技術工人的各個領域中去^⑬。

內戰後的工業擴張情況

內戰結束，奴隸主政權被完全打垮以後，資本主義乃以“一往直前的步調”向前發展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大量的公共土地一旦轉移到那些以鐵道及采礦等方式進行剝削的、以投機為目的的的公司手中”，就必然會“產生一種最卑鄙下流的金融寡頭集

团”，这个集团將急切地把他們的資本向一切有暴利可圖的地方去投資。整個工業中的固定資本在一八四九年為五三三，二四五，三三一，元，而在一八七九年則增加到二，七九〇，二七二，六〇六，元，而生產品的總值（現在的生產完全是為了已有保障的國內市場了）則由一八五九年的一，八八五，八六一，六七六，元增至一八七九年的五，三六九，五七九，一七一，元。

內戰後二〇年中的經濟發展可以在下面工業生產的統計數字中反映出來。僅只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間采礦業中的投資就增加了二〇倍以上，而其生產總值則增加了九千萬至二億五千萬元之多。一八六〇年煤礦開采總數為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在一八八四年則達到將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自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二年間，柏塞麥鋼塊的生產從一九一，九三三噸驟增至一，六九六，四五〇噸。一八六五年中，麻薩諸塞州生產靴鞋七一八，六六〇箱，二十年後則每年生產量為二，六三三，〇七五箱。一八六〇年，在使用中的鐵道為三〇，六二六哩；而在一八八四年則為一二五，七三九哩。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間鐵路綫增加了將近百分之八十，並且在其後的十年中也還按照這種比例在增加着。

根據一九〇〇年美國國家統計，製造業的資產總額在一八六〇年時估計為一，八八五，八六二，〇〇〇元，而在一八七〇年則達三，三八五，八六〇，〇〇〇元，及至一八八〇年則更增加至五，三六九，五七九，〇〇〇元，几乎是增加了四倍。而在同一時期內，投入工業中的資本則從一，〇〇九，八五六，〇〇〇元增至二，七九〇，二七四，〇〇〇元，其全部被僱用工人的總數則從一，三一一，〇〇〇人增至二，七三三，〇〇〇人。

向壟斷發展的趨勢

隨着高度機械化的工業體系的出現，更大規模集中經營的趨勢產生了。這種趨勢的發端應該說是較早的，但到了戰爭時期則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着了。自然只有大的工業家才能有足夠的資金大量採用機器，擴張他們的工廠，因而也就能夠爭奪到有厚利可圖的政府的定貨合同。結果是誰都可以料想到的：很多小本經營的企業，或者倒閉了，或者被一些大的企業整個接收過去。

在一八六五年的時候，大部分的工商業還都是小規模經營的，但沒有幾年以後，幾個小規模的、原來彼此競爭着的公司合併到一起的情形已經開始了。通過吸收和擠垮小本競爭者的辦法，資本額達到幾千萬元以上的、巨大的獨占公司出現了。

每一種工業都是受到這種集中化趨勢的影響的，但最顯著的則是電報業、鐵路業、食鹽業與胡椒業以及石油工業。原來掌握在許多彼此競爭的小規模公司手中的電報業很快便完全歸於“西聯”和“美洲”這兩個主要的電報公司的控制中了。甚至這兩個大公司實際上也只是一個，同樣的一群資本家“在這不同的兩個公司中所占有的股權之大已使它們實質上成為二而一了”。一八六四年，要想和它們競爭的一群資本家成立了美國電報公司，但是兩年以後，這個擁有六百萬元資金的新公司仍被西聯公司吞併掉了，西聯公司這時已有了四千萬元資金和七萬哩長的電報綫路。

到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起初只有一條自費列得爾菲亞至薩斯克罕那河很短一段路綫的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這時已吞併了原來分屬二百五十個公司的鐵路綫一百三十八條，而到一八七一年，則在該公司控制下的鐵道達三千哩以上，年入超過四千萬元。由

于在戰爭期間，得到了匹茲堡、威因堡及芝加哥等地鐵路綫的所有權，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完成了第一條從密西根湖直通大西洋海岸的鐵路干綫。其他鐵道事業大規模歸并的活動也因戰爭而在加速進行着。伊利公司接收了幾條較小的鐵路綫。芝加哥和西北鐵路公司歸并了弗吉尼亞州半島區的路綫，波士頓到紐約州的奧格登堡的路綫以及自伊利諾州之昆西通俄亥俄州之托利多的鐵路綫四條。

以運煤為主的鐵路公司早看到了自己如果控制一些煤區時所能得到的利益，于是就趕快設法取得土地所有權了。勒定鐵路公司在一八七一年時已占有土地約七萬畝，該公司在送給股東們的年報中更矜誇着說：“這一行動的結果將替本公司獲得永遠附屬於本公司的大片的煤田，這些煤田將保證在幾百年的時間中供給本鐵路綫可能運出的煤量的全部。”勒定鐵路公司控制下的作為副業的煤礦工業共占斯庫基爾郡全部煤礦業的百分之七五^⑩。

總之，走入戰爭時還是一個只有小規模企業的國家，走出戰爭的時候，則已是一個工廠制度占統治地位，集中經營的趨勢正瘋狂突進的國家了。自然，真正達到全國範圍的大托辣斯是八十年代以後才出現的，但內戰確曾加速了形成這種機構的傾向。在戰爭期中，最早一次的煤油公司的合併已經完成了，洛克斐勒王國也已漸次形成。是以早在一八六六年，“商業與金融日報”即曾說：

“目前資金集中傾向較之過去已愈益顯著。小規模公司日益無法同各大富戶競爭而只能任其逐次吞沒。是以目前我們各大商業城市中擁資十萬之人數已遠超過五年前號稱資金五萬元者。毫無疑問，此處所謂的十萬資本者其中多有虛構情形。但由於資金大量集中致使各金融集團權利日益增長一

事已引起金融市場各觀察家的極大注意。此一情況乃屬本時代特征之一，其于我國工商業未來發展或將予以重大影響。”^{②①}

這種情況對於整個美國社會，包括政治、教育、出版和宗教各个方面也都曾“予以重大影響”的。因為事實上這裡所講述的工業擴張和財富日益集中的歷史實在也就是這種或那種方式的道德衰頹的歷史。為要从政府得到免費土地，得到貸款和補助金，借以搶奪國家最豐富的資源，各個鐵路公司竟不惜採用一切可能的卑鄙的手段。自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間，聯合太平洋公司給國會議員及州議員行賄的款子共五十萬元，而中太平洋公司在一八七五年到一八八五年間每年付出行賄的款項更達五十萬元之多。國會議員霍爾在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綫落成時曾說：

“當這世界上最偉大的、貫串整個大陸、連接懷抱我國國土的兩大海洋的鐵路綫全部完成的時候，我看到我們全國歡欣鼓舞的心情忽然變成了悲痛和羞辱的情緒，因為根據國會三個委員會意見完全一致的報告，這個偉大工程的每一個過程都是在一連串卑鄙無恥的活動中進行的。”^{②②}

三個委員會之一的波蘭委員會，該委員會是曾經負責調查了抵押投資所的違法案件的，一八七三年在其報告中稱：

“我國現正迅速地變成一個充滿了極端龐大的公司組織的國家，這些公司掌握和控制着巨大的財富，因而也就掌握着極大的影響和權力。誰都知道，這種影響在很多州議會中常常是居于控制一切的地位的，因此實際上它也就是那些州的統治勢力。在幾年之中，國會在某種程度上也已經屈服在這種影響之下了。”^{②③}

危机及劳工的回答

但是美國的經濟生活并不是一往直前地發展着的。每隔几年的時間，工業就会一度陷入停頓狀態；大批的商店和工厂倒閉了，工人被解雇了，較小的生意被較大的一个一个地吞并掉。一八一九年、一八三七年、一八五四年、一八五七年、一八六〇年及一八七三年均是經濟危机非常嚴重的时期。在这些时期中，苦难淹遍了整个的國土。

每当危机來到的时候，人們总要奇怪到底为什么工業会突然一蹶不振呢。而每次上層階級的代言人所給的回答都永远只有一个——生產过剩。現存的工厂太多了，运河太多了，鐵路、銀行都太多了。布織得太多，粮食生產得太多，鞋制造得太多——一切都太多了，多到不能再產生任何利潤的地步了。因此工業停頓了，工人失業了。

沒有一個人提到生產這些商品的人們所賺的錢是簡直不能買到什麼自己所生產的東西的。沒有一個人提到新英格蘭棉花紡織工厂几十年來，每年都獲得等于投資百分之一〇的利潤，塞米爾·斯萊特在四十年的時間中積累了數達七十萬元的財富，波士頓幫在同樣的時間內獲利數百萬元，而紡織工人却永遠在饑餓綫上掙扎。沒有一個人提到在五十年代期間，一切鐵工厂的紅利達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一百之多，而鐵工厂的工人則几乎是生活在封建时期奴隸生活狀況中。沒有一個人提到承攬修建鐵路的商人們、鋼鐵生產商人們、木材大王和煤油巨頭們，由于搶奪和獨占了本國最富有的資源——那些屬於人民的資源——已積累了無法計算的財富。這一切是沒有一個當權的人曾經提到過的，除了一位

早年的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約瑟夫·衛登麥爾，他在一八五三年的夏天曾經說道：“產生那些工商業發展的障礙的——這些障礙恰好在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是以一種革命的形態動搖了我們整個的社會結構——不是別的，而只是兩件東西（生產力和市場）不平衡的結果。因為，市場消耗力的增加，不能和工業生產力的增加保持同樣的進度。”在一八七三年開始延至一八七九年才結束的不景氣時期的那些慘痛歲月中，有一個工人曾經寫道：

“這個國家曾經有了多大的改變呀！看一看我們千萬里的鐵路，我們無數的機房和工廠，我們的礦場和熔鐵爐，我們這無數的財富啊！這一切都是這一國家的勞工階級創造出來的。可是勞工階級有什麼東西可以表示出，他們對於自己所生產出來的這些好東西也享受了一份呢？什麼都沒有，他們沒有鐵路，沒有工廠，也沒有熔鐵爐或礦山。資本家們以狡猾的手段奪去了一切。”^②

一百年來美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史，主要的即是有關勞工階級的歷史。如果沒有勞工階級，這裡所講的工業發展是完全沒有可能的。關於這一點，伊利諾州礦工工會中一位會員講得最明白了，他在內戰時期寫道：

“如果沒有勞工，那裡會有我們現在所有的這一切發明？如果沒有勞工，又那裡會有我們現有的這些礦山中的財富？沒有勞工，我們就不可能有在過去七八十年中不停發展着的對蒸汽動力的使用，因為沒有勞工，這個偉大的發明就根本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誰能說瓦特是一個資本家。我相信歷史一定會證明他是一個工人的。如果沒有勞工，那裡會有我們的鐵路和汽船？沒有勞工，我們的運河不可能修建——我們

的河流也不过只能是大大小小的魚池；而我們的丰富的礦藏則將永远深深地埋藏在大地的心腹中。要是我們都是資本家，黃金从哪里來？又哪里会有現在就在我們富庶繁榮的伊利諾州出產的这無数万噸的礦砂、鉛、銅以及和它們有同等重要性質的無数万噸的煤塊兒？……”^{②4}

在这位礦工會員寫这段話的时候，林肯正担任美國的總統。林肯也許从沒有讀到过这一段話，但如果他讀到時，在基本觀點方面，他一定会表示完全同意的。因為他自己曾說：

“我們從來沒有，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任何一件良好的東西而不需要首先付出一定數量的勞力作為代價的。既然一切好東西大都是由勞力產生出來的，那麼，無可爭辯的，所有這一切東西就必然應該屬於那些用自己的勞動力生產它們的人們所有。可是，實際的情形却不是這樣，自人類世界存在以來，永遠是一部分人在勞動着，而另外一部分不勞動的人却享受着最大部分的勞動果實。這是錯誤的，這種情形決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保證每一個勞動者能夠得到他用自己的勞力所生產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的生產果實，乃是每一個賢明政府的最重要的努力目標。”^{②5}

內戰期間卓越的勞工領袖威廉·夕威斯曾說道，“勞工乃是整個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基礎。”他更說，它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然而資產階級却侵占了勞工階級所創造出來的絕大部分的財富。最後他提出疑問道，“如果一切財富都掌握在極少數幾個人的手中，都只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存在，而廣大的群眾，‘各生產階級’却日益陷入貧困的境地，那試問一切鐵路網、運河、礦山資源、工廠、巨大的城市、公共建築以至內政改革”等等對於人類還能有

什么意义？^{②⑥}

劳工完全知道，富庶的美洲是可以讓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享受幸福生活的經濟基礎的。但是要想享受到这种幸福生活，他們就必須團結起來从資產階級手中夺取更大一部分的國民收入。在工会和各种政治組織的領導下，美國工人階級通过自己的斗争已經爭取到較高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較好的生活条件，完成了多种的民主改革并把自己提高到同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更为相称些的社会地位上去。

第五章

早期的工会組織

处于每况愈下的环境和过着僅得不死的生活，美國工人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仍在原处工作，老板願意給他多少工資或什么样的工作条件，他也都認了；第二条路是离开原來的工作，到別的地方去尋找較好的生活；第三則是同他的伙伴們联合起來，強迫老板們答应他們的要求，求得生活上的改善。因此有些工人是在自己的原工作处忍耐下去了，他們忍受着剝削，他們沒有發动任何斗争以求改变自己的境遇。另一些人也确想逃避目前的处境，向別的区域移居，或者跑到边陲地区去作一个独立的農民，或者变成一个独立生產者。但無論如何，甚至在联邦宪法通过以前，大部分的美國工人已在各工会組織中和自己的弟兄們团结起來了，他們在一起共同爭取生活条件的改善。

美國大革命后的劳工情况

独立战争后貿易和商業的迅速擴張也沒有給美國劳工階級帶來任何的幸福。在早期的那些工厂里，工人們从早到晚的工作着，而工資真是微薄得可憐。幼小的兒童成了紡織厂里主要的劳动力。塞米尔·斯萊特工厂第一批雇用的九个管机器的工人是七个男孩和兩個女孩，而他們全都还未滿十二歲。在一八二〇年間，工厂工人半数为“九歲到十歲的幼小”男女兒童，他們以每周三角三

分到六角七分的工資，每日工作達十二小時到十三小時之久^①。一八二〇年五月四日，“羅得島製造業者和農民紀實報”上，曾登載過這樣一條極有代表性的廣告：“徵求——養有五個至八個能在棉花紡織廠工作的孩子的家庭一個。”新英格蘭政治家約西亞·昆西一八〇一年在波塔刻特參觀一個紡織廠的時候，該廠的老板極自豪地給他介紹那廠里現有的巨大數目的童工。他說，看哪！這些孩子們，現在不但不會再出去惡作劇，不會再去在無謂的嬉游中把時間全浪費掉，相反的，他們現在是一方面完成着上帝的使命，一方面在經濟上幫助着自己的家庭。但昆西却並沒有被他這種為童工制度辯護的美妙辭令所感動，他說：

“但以問題的另一面為出發點的理論是比這一套言詞更為動人的，它使得我們不得不為這些幼弱的兒童感到悲痛——他們在飛輪和齒盤的空隙中，在密不通風的屋子裡，整日不停地忙碌着，而在他們這種年歲，自然却要求他們生活在空氣中，曠地裡，無拘無束地嬉游。現在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臉上，你只能看到一副呆滯慘沮的神情。”^②

其他很多紡織廠的工人大都是近處農家的女兒。她們居住在擁擠不堪的、通風設備極壞的公共寄宿舍中，工作時間是非常的長，從清早五點到夜晚七點，而工資卻是非常的微薄，平均每星期僅兩元到三元左右^③。

在那種與工廠制度完全無關的機構中工作着的熟練工人，也並不比她們生活得好些。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紐約市的一個木工、一個泥瓦匠或一個鐵匠每天只能賺到四先令。無技術的、挖土的、運磚的工人，則一天只能掙到兩個先令。儘管如此，紐約的一個保守分子約翰·杰還在抗議說，“技術工人和一般勞動者的

工資……真是高得荒唐了”。一七九一年一月十三日“紐約每日廣告人報”上的一篇報告很可以告訴我們到底荒唐到了什麼程度，該報告說，“現本市有極大數目的小商販、車運工人、散工以及很多其他的勞動者都已陷入極端的貧困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七九七年紐約有六百個技術工人要求官方救濟，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燃料和糧食”以維持他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們哀痛地說，自從大革命以後，物價已上漲了百分之五十，但工資却一直絲毫未改^①。九年以後，一個熟練的鞋工抗議說，“我每天從清早五點鐘開始工作，直做到深夜十二點或一點，但我每周的收入僅只有八塊五毛錢”^②。

下表將說明美國工会組織開始成立後的數年中，工資與生活費用的關係：設一九〇〇年為一〇〇。

年 度	名義工資	生活費用	實際工資
1791年	23	42	55
1792年	25	46	54
1793年	27	49	55
1794年	29	53	55
1795年	33	61	54
1796年	33	65	51
1797年	31	60	52
1798年	33	60	55
1799年	29	57	51

本表所列材料來源：基爾金·庫辛斯基：“一七八九年以來美國勞工狀況簡史”，一九四三年倫敦版，第二〇——二一頁；同時參看漢遜所寫“美國批發價格”一文，載“美國統計學社叢刊”，第十四卷，第八〇四頁及一七八五年九月七日“紐約每日廣告人報”。

就是這麼一點工資也不是按期如數付給的，工人們拿到的一般都是只限於在老板開的商店、或者在他所控制下的商店中使用

的購物証。這些商店對他們索取高價，因而又從他們微薄的收入中再挖去一大部分。從下面一段報告中，我們約可看出美國工人在这方面所遭受到的苦難的情況，這報告是革命后才來到美國的一個英國人寫的：

“所有同我會談過的工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抱怨地講訴他們領取工資時的痛苦經驗，他們勞苦所得大都是只能在某些商店購買日用必需品和衣物的購物証；在這種情形下，商店老板向他們勒索的無理的價格，據他們估計，至少每周要使他們遭到七角五分錢的損失”^⑥。

以二角五分或五角錢作為一天的用度，一個工人能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呢？最近所作的對一七八九年紐約情形的研究告訴我們：“最簡單的飲食和衣服、簡陋不堪的茅棚是他所能維持的最高的生活。一七九五年的時候，住在救濟院里的每人每天的生活也至少需要一角錢，而在救濟院里，食糧、衣服及燃料等自然都是整批地買，同時也不要付房租的。但是，在同年中，亦如在一七八九年一樣，一個普通工人，如果托天之福有一位太太和一個孩子，那他要維持三個人的生活則每人每日平均的費用較之住在貧民收容所的人都還要更少了。”^⑦

工作時間是從太陽出山到太陽入土。如在夏季那就等於是一天十四小時到十六小時的工作，中間只有兩小時或一小時的吃飯時間；冬天則是九小時到十二小時的工作，吃飯時間則更只有一小時或半小時了。因為工資總是按日計算，不管工作時間的長短，於是老板們全設法把工作放在暮春、夏季和初秋的時候去做，這樣他們就可以付出同樣的工資而得到更長的工作時間。

商業資本家的登場

还不止此。美國經濟生活的巨大的改變越來越使得熟練工人的技術失去了重要性。開作坊的老板現在決不只是給本地的幾個主雇定制貨品了。他現在雇用的工人和學徒也決不是一個兩個了。他現在是在給南部、西部的各個市場製造商品，同時隨着市場需要的增大，他愈來愈大地擴大他的廠房，雇用更多的工人。

競爭更是愈來愈激烈了。無數的交通道和運河使得各地的製造商都可以在同一個市場上彼此競爭，而為了要在競爭中得到勝利，他們的辦法是減低工資，增加工時。

這種傾向，在商業資本家登場以後，變得更加嚴重了。對於比較遙遠的市場，製造商們所感到的最大困難之一是嚴重地缺乏信用貸款和金融上的便利。因為要想買鞋靴和其他工業品的農人是沒有多少現款的，而小製造商和當地的零售商們都沒有力量可以把貨品賒售出去。這樣一來，海邊各城市中的進口商人卻有了大好的機會了，他們不但有極大數量的資金，在海外他們還可以借到大批債款。小規模的製造商們會想盡一切方法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來挽救這個局面，他們甚至組織了以貸款給社員為主要業務之一的聯合公司。但這種組織終不過是不起作用的一個空架子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商業資本家乃應運而生了。他並不需要知道如何進行商品的製造。他也根本不需要自己開店、開廠或雇用什麼工人。他只要買一些材料，找一個製造商人替他將材料製成成品，然後找到市場去賣就得了。他有自己的資金或者借來的大批

債款。但不管是哪一種情形，他都可以把貨品以相當長的期限賒售出去。

在商業資本家的勢力日益擴大的時候，自己開店鋪的作坊老板乃慢慢變成了等於是承攬定貨的包工。他所賺到的利潤只是他從商業資本家那里拿到的工價總數和他付給雇工的工資總數之間的差額。為要增高這種利潤，他於是把他所雇用的工人分為若干組，以專業化和分工的辦法來增加工作速率，讓有技術的和無技術的工人配合工作，用等於成年男工四分之一的工資去雇用女工、童工以代替男工，以及用各種方法強制工人付出最大努力。偶有幾個雇主願意按一般工資率付發女工和童工的工資，但他們却受到商業資本家的威嚇，被迫妥協。減低工資、增加在血汗橫流的工作間中的工作時間以求無限量地提高利潤，變成了雇主和資本家們的共同口號③。

這種情況的發展嚴重地影響了雇工與雇主間的關係。但這並不是說美國工會運動之所以出現只可以完全從市場的發展和商業資本家的興起這方面去解釋。工會組織之所以成立起來是因為工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工資維持，因為經驗告訴他們如果單靠個人的力量，他們絕對沒有辦法可以維持或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商業資本家的出場不過是加速了它的發展而已，這種發展，當工資收入者這個階級已在美國出現，是不能避免的。

臨時性的勞工會社

為了使“獨立宣言”有其具體意義，緊跟着大革命的勝利，美國工人開始第一次建立他們的工會組織了。但這時組織這些工會的只是有技術的熟練工人，無技術的工廠工人是不在內的。很顯然，

工厂里的工人是完全有理由对現狀不滿的。可是因为一方面，他們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兒童，我們总很难希望兒童們起來組織工会，另一方面，其余的工人又大都是年青的妇女，而她們除了組織工会从斗争中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办法外，还可以另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当情况实在坏得不能忍受时，就离开工厂回到自己的農庄上去。有技術的工人却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他們中很少人能有一点田地或者一点菜園可以拿來補助一下他們不足的工資收入。如果不組織起來，他們就只好永远“陷入極端的貧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大革命之前以及緊接着大革命后的一段時間里，工人和雇主們曾經在很多問題上進行合作，他們甚至还“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兄，使其在疾病或意外事件發生时能够得到必要的帮助的崇高目的，并为了救济死去的弟兄所遺下的孤兒寡婦”而共同建立了各种福利互助会社^⑨。但就在这些年头中，工人們已經对工資的微薄和工作条件的恶劣感到不滿，憤恨的情緒已經漸漸在他們心中產生。早在一七七三年，馬里蘭一个牧师約納桑·波其尔即已看到“雇主和雇工……任何一方面也都再沒有半点热爱或真誠的感情以維持彼此共同的生活了；劳动階級，不但不認為有錢的人是他們的保护者、扶养者和恩人，現在却把有錢人看成一堆他們可以任意侵犯的、長得过于肥大的怪物”^⑩。总而言之，在商業資本家出現以前，工人和雇主間的合作已經慢慢在解体。但他的出現加强了对工人階級的剝削，故更加速了这种解体的过程。

雇工与雇主間的关系發生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破裂，即是雇工們脱离了老板与工人共屬的互助組織而建立起自己的福利会社的时候。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雇工們——如印刷工、木工、制

鞋工、制帽工、成衣匠、磚瓦匠等——組織自己的互助會社的事已非常普遍。但僅有這些互助會社還是不夠的。勞工大眾已經開始認識到，制止老板把自己拋入貧困中是和在苦難中彼此互相幫助完全同樣重要的。在這種認識開始發展的時候，工會必然地出現了。

在第一個長期性的工會組織成立以前，有技術的工人也曾組織過臨時性的會社，借以使彼此團結起來以求得生活條件的改善。一七七八年，紐約的印刷業雇工即曾聯合在一起共同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他們送了一封信給各廠老板，通知他們說，“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既然如此狂漲，要我們仍在原工資的條件下繼續工作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們要求在我們現在所得微末不堪的收入外，再給我們每人每周增加三塊錢的工資。”^⑩同時，他們宣告，如果這個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決計不繼續工作下去。最後，在資方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後，這些印刷工人卻認為他們的組織已沒有理由繼續存在下去，因而把它解散了。

美國第一個真正的罷工運動發生于一七八六年，就是美國第一個永久性的工會組織成立前的第六年。決心要爭取到一元一天的工價，費列得爾菲亞的印刷工人舉行了一次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在這個決議中他們宣稱從今以後他們“決不在低於每周六元工資的條件下進入本市或本郡任何印刷廠工作”。在決議的結論中，他們並且說，“為了拒絕在低於每周六元的工資條件下接受工作而遭到失業的弟兄，我們必須予以支持。”當老板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時，印刷工人便舉行罷工了，或者照當時流行的說法，展開了一個“出廠運動”，然後勝利地達到了他們的目的^⑪。

更多的出廠運動緊跟着發生了。一七九一年，費列得爾菲亞

房屋建造木工举行了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罢工；一七九五年，巴尔的摩的成衣工人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罢工，同年，紐約的木工和泥瓦工也罢工要求每日增加兩先令的工資。老板們是如此地驚恐以致一七九五年三月三十日竟有人在“紐約每日廣告人报”上發出警告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市公民仍一味沉默容忍，其結果，不僅是要刺激他种依靠劳动过活的人起來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非常可能是鼓励那些現在罢工的工人，每当他們感到人們最需要他們工作的时候，便來重复一次这种要求增加工資的活动……。”

所有这些罢工活动都是在一些臨時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这种組織总是随着每次斗争的結束而結束。但經驗却很快讓工人們明白，在老板們要想减低工資的这种永久性的压力下，臨時組織是不能保證他們能經常維持一定的工資标准的。因此，他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有定期集会的、有应付緊急事件的財務機構的、并能在進行斗争前制訂一定斗争計劃的經常性的組織。

最早的工会組織

随着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开始，各个城市里的熟練工人也开始把原來的互助会社改变为工会，这种工会組織一方面要領導工人進行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时的斗争，一方面仍办理會員們的疾病救济事宜。老板們力圖阻止这种向工会主义發展的趋势。在他們的影响下，有些州議院并通过了禁止工人們利用福利会社的組織以規定工資标准的法令。作为对这种法令的回答，一群一群的工人如費列得尔菲亞的印刷工人等就立刻解散了他們原來的互助性的会社而把它們重建为各种工会組織^⑬。紐約市制鞋雇工工

會一八〇五年所通過的會章的緒言對於這種工會的宗旨是講得很明白的：

“我們，紐約市的制鞋工人，因深感有維護自己正當權利之必需，並為防止僱主老板們利用各種陰謀詭計將工資減至我們認為不足以酬報我們的勞動的程度，一致同意以下列各條款作為本會會章。”^⑭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紐約的制鞋工人已肯定地說明，勞工階級必須要團結在一種穩定的、經常的組織中以準備隨時對付老板們的任何要想減低工資的企圖。同時這一段話也說明了早在一八〇五年，美國的勞工階級即已決心要保持自己的決定權去決定什麼樣的報酬才是對他們勞動的“適當的酬報”。

美國第一個保持工人之間長期團結的工人組織，是由費列得爾菲亞的制鞋工人在經過多次失敗之後，於一七九二年建立起來的。一七九四年，費列得爾菲亞制鞋業雇工聯合會成立了，這個工會到一八〇六年以前還一直存在。一七九九年，該會進行了第一次由經常性的工會組織所領導的罷工運動。這次反對減低工資的罷工運動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是它引起了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同情罷工：馬靴工人為了幫助制鞋工人實現他們的要求也舉行罷工了。該會並拿錢給一個會員讓他經常在鞋鋪老板的廠房附近巡哨。這個罷工堅持了約十周之久，但結果是失敗了。可是，無論如何在這個制鞋工人會存在的十二個年頭中，卻進行過很多次要求提高工資的勝利的鬥爭。

在費列得爾菲亞的制鞋工人把自己組織起來了幾個月之後，巴爾的摩的成衣業雇工和紐約的印刷工人也先後成立了他們的工會組織。一七九四年組織起來的紐約印刷業工人會繼續存在了十

余年之久。紐約的另一个工会，箱櫃桌椅制作業雇工工会于一七九六年成立，并一直繼續活动到一八三七年。紐約造船業雇工工会于一八〇三年成立，紐約市房屋修建木工会則成立于一八〇六年。同年，紐約的成衣工人也組織了他們的工会。根据当时报纸上的通告，上述最后的三个組織，直到一八一九年还在進行活动。一八〇五年成立的紐約制鞋業雇工工会在其后四十年中都一直非常活躍^{⑮*}。

早期的一些工会組織却很少能够維持这样久的時間。一次罢工的失敗常常就是宣告一个工会的結束。而有时候一次勝利的罢工也会使一个工会解体，因为那时會員們認為它的任务已經完成了。只有印刷工人和制鞋工人曾有足够的力量和正确的認識使得他們的工会組織能够在全國各地長期地存在下去。制鞋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經常性的工会組織到一八一〇年的时候已遍及費列得尔菲亞、紐約、巴尔的摩、匹茲堡、波士頓、華盛頓及新奥尔良各地^⑯。

工会策略及其实际活动情况

由于早期美國各工会存在的時間都極短，它們大多数也都沒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的紀錄或議事錄，現在要想很正确地知道这些組織的真实面貌及其如何進行活动的情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幸而印刷工人和制鞋工人工会的很多紀錄都保存下來了，这

- 城市中某些行業的工会組織常常会将原組織解散，另换一个新的名称再繼續活动。紐約印刷工人会即曾於一七九九年改組为富隴克林会而繼續存在至一八〇四年。另一个或者說第二个紐約印刷工人会是一八〇九年成立的，其存在期約到一八一八年，同时根据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紐約“平民日报”提到該会的一則消息，說明該会可能直到一八四五年都还存在。

使我們到底還有可能來研究一下早期美國工會的活動情形。

一般的情況是，一個工人如果要想參加工會做會員，他必須要宣誓遵守工會所作關於工資標準的規定，對本會的一切會議情形嚴守秘密，並“在幫助任何其他的人以前”盡先幫助同會的會員找工作。他要繳付約四角或五角錢的入會費，經常的會費每月約在六分錢到一角錢左右。他要按期出席每月的例會。但因為工人們常常要從這城跑到那城去找工作，通常可以容許一個會員缺席三個月。回來時只要他能證明他確是出外去了，那他只需“補繳一個月的會費仍可被認為是合法會員”¹⁷。

一切會員在會場上都必須態度文雅，嚴守秩序。任何一個會員如果在主席喊“安靜”的時候還不保持安靜的話，便要受罰金，數目約六分錢左右。會員大會無故缺席的也將受到罰金處分，第一次缺席罰金一角至一角二分，第二次二角至二角五分，第三次則罰金五角。關於缺席問題，紐約制鞋工人會的會章上說道：“出席會議並與本會職員合作推進本會福利事業是每一個會員的職責。在執行這一職責時，他們應該想到他們正是在謀取自己個人的福利。”¹⁸

任何會員如果經過偵訊發現犯有以下過失，便將被開除會籍：“常常醉酒”，“有重大的不道德行為”，“開會時在會所里辱罵同會弟兄”，以及“常常疏忽自己的工作”以致影響家人生活并使老板遭受金錢上的損失。紐約印刷工人會曾經開除過一個會員，他的過失是“把一本二十四開書的印紙折錯了半面，而他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老板，後來他更連自己用的印紙的折疊號碼都沒有留下就離開本城到別的地方去了”。這件事被認為是“重大的損害紐約印刷業工人會名譽并侮辱自己的會員身分的一種行為”。各工會組

織均以“所有最好的工人”都是自己的會員而感到驕傲^⑩。

早期的美國工会都是地方性的行業工会，因为主要也只是处理本地本行業中的各种問題。它們同別一城市的工会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联系，即同本地其他行業的工会也不發生任何关系。从本質上講，它們是只限于在本地区某一特殊工業部門中活动的一些小团体。各个工会中的會員也就只限于某一行業或某一种技術範圍中的工人。在那时，任何一种商品的生產过程中都還沒有什么分工的情形。制鞋工人工会里的大部分會員都是那种自始至終經一人的手做完一双鞋的工人。印刷業工会的工人也都是不僅管刻字和排版，連印刷都要管的。有技術的工資收入者經常都是在很狹小的工作間里工作，他們同其他行業的工人根本也沒有接触的机会。因此很自然，这些工人也只会想到組織这种嚴格地局限于某一行業的工会了。

最初工会會員們的主要斗争是为了保持他們的技術的尊嚴，抗議老板們雇用“初学的工人、逃跑來的学徒和半調子的熟練工人”以及任何無技術的工人，这些人，大家認為是“只要給錢就干的”^⑪。但就在那时候，技術工人們也始終是打着敗仗的。老板們，在商業資本家的鼓动之下，仍开始尽量雇用学徒，其工資則比一般熟練工人要低得多。劳动分工渐渐开始在手工業的各行業中發展起來。熟練工人被迫要教会学徒們某一特殊过程的工作，使这些“生手”慢慢掌握这一方面的專門技術。沒有多久，熟練工人和学徒的工資就完全变成一样了。因为老板們感兴趣的是数量和价格，質量他們是不十分重視的，而很多短期訓練出來的專業化的工人却能生產得更快，更省成本。

熟練工人开始猛烈地向这种新的傾向作斗争。他們中很多人

并不責怪老板，却把責任推在學徒們的身上。後來通過自己所得到的經驗教訓，這些熟練工人才慢慢認識到，只有把學徒們也組織到工會里來，大家在一起規定需要技術的工作和不需技術的工作的工資數額，他們才有可能維持他們的工資標準。制鞋業熟練工人早在一八〇五年便已明白了這個道理，因此他們在自己的會章上規定學徒也可以入會。

經驗更教給他們另一個道理，那就是任何一個勞工工會如果允許僱主老板也參加作會員，那它就不可能發生作用。至于老板為什麼會變成了工會會員，這是由下面兩種因素產生的結果。第一，工人們認為既然老板自己也是在工場工作的，他也就是生產階級中的一分子，同那些百事不做、專靠剝削人為生的資產階級、銀行家、“以及那些現在過着或打算將來還永遠過着不從事任何有用勞動的生活的人”是不同的^②。第二，在有些行業中“階級轉換”的事是常有的。在印刷業中，如果一個工人變成了老板，他只要按照工會標準支付他所僱用工人的工資，那他仍可以是工會中的會員。但在靴鞋製造業中，因為階級轉換的情形非常少，所以也就沒有老板可作會員的規定了。這同時也是制鞋工人工會為什麼鬥爭性較強的原因之一。

紐約印刷業工人會是最先認識到不應當容許老板作會員的工會組織之一。一八〇九年該會曾經贊成過一個聲稱“僱主和僱工之間是有某些共同利益”的決議。八年之後，該會卻發現有一個僱主會員竟同別的僱主老板們勾結起來進行企圖摧毀該工會的工作。該會乃立即將他開除會籍，並修改會章以排除一切僱主，因為：

“經驗告訴我們，人的一切活動幾乎完全是為他自己的利

益所支配的，同时，一个会社团体，如果它的會員受着兩種相反方向的动力的影响，代表着几种不同的利益，那它是不可能得到適當的調和，因而也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的。本会为印刷業雇工的工会組織，既然雇工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是不相同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彼此对抗的，我們認為如果讓他們對我們的一切計劃有發言权或有任何影响，那是完全錯誤的。”^②

这种重視經驗教訓的精神，我們可以拿來作为一个指針去進一步了解早期各美國工会的情况。劳工階級不断地从經驗中學習，經驗也告訴他們，应如何加緊他們的努力，他們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应如何改進斗争中的策略，他們才能够从老板的手里夺取到这些条件。

最初，工会的策略是相当簡單的。全体的會員在一起开一个会，制訂下來一种工資标准，大家保證，任何一个老板如果不肯照他們規定的标准付給工資，就誰也不許到他那里去工作。到一八〇二年，有些工会选举出一个委員會來，由这个委員會把決定好的工資表送給各厂老板。对于接受这个工資表并願按表付給工資的老板們，工会常常要通过一項特別決議向他們致敬，拒絕这个工資表的就馬上会遭到工人的罢工并看到自己的厂房为巡邏委員會的糾察所監視。罢工工人有罢工津貼；到一八一〇年的时候，制鞋和印刷業工会都按期付津貼給那些“因为拒絕在少于規定的工价下工作而遭到失業的弟兄”^③。

勞資協議是工会策略的進一步發展。早在一七九九年費列得尔菲亞的制鞋工人便同他們的雇主們商訂过一种勞資協議。十年以后，紐約印刷業工人會派遣一个三人委員會去同代表本行業

中全部雇主的委員會進行協商，目的要規定一種全城一律的工資標準。在幾次會議之後，終於訂立了一個雙方同意的工資表。還在一八一五年的時候，紐約印刷工人即曾力圖統一東部各城市的工資標準以制止老板們把工作送到其他城市去作。這些印刷工人結果是勝利了^{②4}。

有些工會派定一個巡邏委員會以監視老板們執行協議。後來因為發現指派一人給他薪水讓他專門去做這件事更為妥善，于是就產生了所謂“巡行代表”。但在大多數罷工運動中，一般還是利用不另外給薪水的委員會的。

工人們很早便得到的另外一個教訓是，他們必須要實行關門制度*。老板們，以低於規定的工資，雇用一些非會員工人以此破壞協議的事是常常發生的。在這種情形下，不到一個月，工會會員工人的工資就會降低到和新來工人的工資一樣的水平。因此，任何一個工會，如果它的會員必須要在同一個廠里和一群無組織的工人去競爭，那它是完全不能發揮什麼力量的，因為工會的一切影響及其一切活動所爭取到的任何利益，無組織的工人全可以坐享，但一到罷工發生的時候，他們則又同老板合作來反對工會。一八〇九年，紐約印刷業工人會對於這個問題即曾簡明扼要地說：“我們認為這是本市每一個印刷工人的職責同時也是為了每一個印刷工人的利益，他們都應該到這裡來和所有同行的弟兄們團結起來，以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标，這個目标的實現是對全體有利的。”^{②5}

關門制度必須依靠嚴格的紀律才能實現。紐約制鞋雇工會是懂得這一點的，它在一八〇五年即將實行關門制度列為會章的一

* 關門制度在一七九四年即已開始，那時費列得爾非亞的制鞋工人即已強迫老板只能雇用工會會員。

部分：“本会一切會員不得在雇用有任何不屬於本会的制鞋工人或学徒的老板处工作，除非該被雇工人願立即前來参加本会。”

任何會員如和一个或几个沒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在一条凳子上工作”，而又沒有在最近的一次会上向工会主席报告，他就必須繳付一塊錢的罰金。如再一次違反这个規章，他便將受到开除处分²⁶。

其他的制鞋工会也都有类似的条款——虽不一定都寫成明文——而且也大都能够嚴格地执行。在費列得尔菲亞的一次訴訟案中，曾有一个工人作証說：“如果我不加入工会，在我工作的長凳上就沒有人肯坐下來工作，也沒有人願意和我在一起吃飯或和我在一間屋子里住宿，不，他們根本不要和我在同一个老板手下工作。”²⁷

“流动執照”是使关門制度得到實現的又一办法。这种办法在印刷工人中实行得非常有效。華盛頓有一个工人曾請求他原屬的工会准其恢复会籍說：“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極想到紐約去，可是如果我不能帶着这边会里的証明，在那边我就不能找到工作，自然罗，要拿到这个証明必須要請会方允許我恢复我的会籍，現在我以無比的崇敬和热忱請求他們答应我。”²⁸

工人們对于工賊是永远怀着極大的憤恨的。一八〇〇年为爭取提高工資而罢工的一些紐約海員工人，因有工賊上船工作，乃在無比的憤怒之下，“击着鼓，吹着号，高举着旗帜”开向船塢同那里那些保护“野耗子”的打手們進行了一次血战。一八〇六年，費列得尔菲亞曾有一个制鞋工人以蔑視法庭的罪名受到五塊錢罰金的处分，因为他在一个关于劳工的訴訟案審判的过程中竟站起來大声喊道，“一个工賊就是一个蝨子窠”²⁹。

在罷工時期做工賊是工會會員可能犯的一切過失中最大的過犯，其結果是立即开除工會。紐約印刷業工人會不僅要开除任何一個敢于去遞補一個“因為維護本會的規章、拒絕在少于規定的工資標準下工作而被老板解雇的”工人所留下的工作位置的會員，同時并規定要將這個被开除會籍的會員的姓名通報美國全國各地的各個印刷業工人會^②。在各城市地方工會尚沒有組織上聯系的時期，這種交換“工賊名單”的行動確實是表明全國勞工大團結即將出現的征象之一*。

一八一〇年，因為費列得爾菲亞的印刷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老板們于是到紐約去登廣告另外招收工人，并提出給他們兩倍于一般價格的工資。可是當費列得爾菲亞的工會組織和紐約方面的弟兄們一連絡，他們馬上決定支持他們“費列得爾菲亞印刷工人弟兄們的提高工資的要求”，并堅決地說，“……我們彼此宣誓，我們決不去占據任何費列得爾菲亞的弟兄們在日前情況下空

- 在這個時期，至少曾作過一次希望達到這種大團結的努力。早在一七九六年，為爭取提高工資，并為打破老板們“不雇用任何以工會會員身分出現，只雇用以個人身分出現的熟練家具工人”的決定而舉行罷工的“費列得爾菲亞家具工人聯合會”，曾向“他們的全國工人同胞們”發出通告，促請各個工會到一起來開會“商討一種進行團結的計劃，以維持彼此的存在”。通告中有一節向大家呼喚說，“我們希望，我們懇請本市以至全國的各個不同部門的工會立即團結起來，以打敗已經和可能來到的對於我們各個工會的攻擊……。我們感到我們有必要向你們大聲疾呼，要求彼此互通聲息和互相幫助，因為我們已經明白地看出，各個會社聯合起來進行鬥爭是比一個工會單獨的努力更能夠長期保證各個會社的生存的。不要再遲疑了，弟兄們，請你們立刻宣布你們隨時準備同其他一切弟兄們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中合作互助，我們的事業乃是關係着美國全體勞動人民——這整個社會中最有用的一群人——的自由權利問題的。”（見一七九五年六月十六日及一七九六年二月十八日“鄧萊普與克萊普爾美國廣告人報”及一七九六年四月七日費列得爾菲亞“曙光”報。）

出來的位置。”^{③①}*

这距离第一个工会組織在美洲出現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但很多工会已經开始采取了以下的各种政策，如集体交涉，提出最低工資要求，爭取实现“关门制度”，交換工賊名單，筹备罢工基金，爭取技術工人与非技術工人間的团结，建立“流动执照”制度，以及建立同行業中各个地方工会間的联合互助等等。

由于这些政策的結果，工人階級得到了很多經濟方面的重大勝利。麻薩諸塞州的木工工資从一七九一年的每日七角四分錢增到一八二〇年的一元一角三分；印刷工人工資則由一八〇〇年的每日一元一角五分增至一八二〇年的一元三角四分^{③②}。关于其他行業的統計材料現在虽然还未找到，但似乎沒有理由怀疑，这些行業也会通过工会的活动爭取到工資的大大提高。

劳工与法院

而且，这些勝利乃是在法院殘酷的反對下獲得的，法院可以允

- 当皮革業老板們，为要打败一八〇三年皮革工人的罢工运动，登廣告招收新工人，并保証說只要他們“向費列得尔非亞市区或本郡各地的皮革店老板申請工作，他們就一定可以得到永久的職業和优厚的待遇”的时候，費列得尔非亞制革工人雇工协会在報紙上刊登了这样一条通告：

“通告

“全國各地的制革工人們！

“你們的費列得尔非亞的弟兄們在这里向你們宣告，他們为要求增加工資已全体協議举行罢工——既然他們提出的并不是高于紐約方面規定價格的額外要求，他們相信他們同行中的其他弟兄們决不会接受老板們的廣告的引誘到本市來参加工作的；特別在这个时候，皮革老板們是已經下定决心要想减低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通行的工資标准的。”（見一八〇三年十一月九日費列得尔非亞“曙光”，）

許各雇主聯合起來強迫壓低工資、交換黑名單，但一切工人的聯合活動，它却都判為圖謀不軌的行為*。勞工領袖斯蒂芬·辛柏遜在一八三一年出版的“工人手冊”中寫道：

“如果技工們為爭取增加工資進行聯合，法律就會認為他們是破壞社會安寧的不軌分子而予以制裁，監牢也將會像對待匪徒似的向他們打開了大門。但是，資本家們却可以聯合起來剝奪勞動者的勞力所得，使他過着一塊干面包皮、一瓢白水的[●]生活，而法律却認為這是極其正大極其光榮的行為。現在的政權正是如此地顛倒是非、混亂自然規律的。”^③

雖然在美國並沒有頒布過像十八世紀英國所定的那種禁止工人進行聯合的法律，但在對美國的工人組織加以圖謀不軌的罪名時，則所遵循的仍然是英國司法所定下的先例。這種罪名的成立完全是以英國的不成文法——即由法院從法官所處理過的一切個人訴訟案件中發展出來的一套關於各種犯罪行為的原則和規定——中的圖謀不軌條例為依據的，根據這個條例，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在一起密謀以損害第三者，或損害公共的利益，就可以以圖謀不軌的罪行論罪，並予以法律處分。簡單一句話，就是工人們決不可以聯合起來去爭取靠個人力量無法爭取到的利益。例如，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在費列得爾菲亞的一次關於制鞋工人的案

* 早在第一個工會出現以前，老板們就可以說是已經聯合起來了，不過現在他們是更加强了他們的活動，以抗拒勞工的要求，並“把它們（一切工會組織）徹底根除”。有時候老板們之所以肯接受工會的條件，目的只在於爭取時間招收反罷工分子以待將工會會員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參看前引坎門司等編“美國勞工史”第一卷，第一三二——一三四頁；斯蒂文斯：“紐約印刷業工會史”第六號，紐約一九一三年版，第一三四頁，及一八〇四年八月一日費列得爾菲亞“曙光”報。）

件中，起訴人竟声称，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極合法地提出要求說，他要得到什么样的工資待遇，但如果有兩個人或更多的人同时都要求一个同样的数目，那他們就是破坏法律的罪犯……。”^④

这个条例对于工会运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工人提高自己生活的唯一道路是依靠集体交涉，廣大的工人群众中的每个人是沒有同資方進行交涉的力量的*。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件件詳述在早期法院中所發生的，这种名义上是由國家提起公訴，而实际上是由雇主們所鼓动并由他們出錢進行的各种反劳工的活动。但通过对一个案件的分析，也可讓大家了解到所有那些类似的案件中的基本問題所在。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費列得尔菲亞有八个制鞋工人遭到一个龐大的陪審委員团的控告，罪名是進行“共同联合，密謀增加工資”。这个案件在当时曾成为全國人所重視的一个問題，因为它确是代表着联邦党人和杰斐遜的民主共和党人之間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因为联邦党人那时控制着整个司法机构，而民主共和党人則力爭英國的不成文法應該已經被大革命从美國的土地上全部清洗干净。雇主老板們的辯护师是杰瑞·英節索尔，他是一个著名的保皇党人的兒子，热心的联邦主义者，并且是英國不成文法的坚决拥护者。鞋工的辯护师是一位杰斐遜派的領袖人物，凱撒·罗德里，不久就做了杰斐遜屬下的檢察長，他是英國不成文法的坚决的敌

-
- * 一九三七年美國最高法院審判長查理·伊文斯·休茲在審判全國劳工关系局与瓊斯劳林公司糾紛一案时，曾代表多數人的意見說：“很久以前，我們就提出了應該容許劳工組織存在的理由；我們說，他們所以要組織起來完全是为情勢所迫；并且，一个單个兒的被僱用的工人是完全沒有力量去同僱用他的老板進行交涉的；……只有依靠工会，一切劳动者才能够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去和老板們談問題。”

人，他認為這種法律是英國在美國的暴政的殘余^⑤。

在審判進行以前，工人們發出通告，呼喚全國人民參加他們的鬥爭，以制止這種勢將危害美國一切進步運動的事例的開端。通告由制鞋工人會的主席詹姆斯·蓋根和秘書喬治·克依默爾簽字，發表于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杰斐遜派報紙“曙光”上，該通告說：

“如果為調整勞動力的價格而進行聯合竟會成為一種罪行，被列為與陰謀破壞民族的自由同罪，那賓夕法尼亞的前途實在未免太可悲了……。”

該通告在結論中說：

“我們這裡所說的這一切，將使全國同胞了解我們的一切作為，並且要告訴大家，如果為了遵循我國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我們只能聽從那些老板們任意施舍一點僅夠維持我們不致餓死的工資——如果，只因我們想爭取到一種公平合理的待遇以維持我們的家庭，我們就要被從自己的住房中拖入監牢，如果，只因為我們主張自己要有取舍我們認為適當的償付我們勞力的報酬的權利，我們將得到像對付重罪犯和殺人犯一樣的待遇，那不管用什麼樣的借口來進行這一切，所謂的自由只能是紙上空文。”

審判是在市法院中進行的，陪審官包括兩個旅館老板、一個商人、三個雜貨店老板、一個煙草商、一個鐘表工人，及一個成衣店老板。原告方面的第一個見証人是一個直認不諱的工賊和勞工中的奸細，名叫約布·哈立遜。另一個是安東尼·班勒特，他出庭作証說工會會員們曾威脅着要殺害他。問他怎麼知道要是他不加入工會就會被人殺害，他回答說：“他們曾威脅着要殺我的。不是當着

我的面那样說，但据我了解是那樣的。他們用土豆砸破了我的窗子。他們还罵过我。”

起訴人方面的主要論点是，如果不把工会徹底消滅，工業將永遠在費列得尔菲亞絕跡。英節索尔問道，試問一个由高尙的公民們所組成的陪審团，能够容許这些“由到你們國家時間还很短的一群人組成的”劳工組織和这些不肯“服从本國的法律”而想要“根据他們自己的幻想和意圖來改变的工会組織”再繼續存在下去嗎？

凱撒·罗德里的辯护主要是以对于英國不成文法的义正辞嚴的攻击为基礎。他強調說，美國的工業老板們是一直还拿着英國一三四九年通过的一条法律——“劳动者法令”在作他們的护身符，那条法律曾强迫所有在大瘟疫后幸得不死的工人依照國家根据老板們的利益所規定的工資价格替老板們工作。罗德里問道，美國人民在一个長期的艰苦的战争中牺牲、奋斗，难道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嗎？对于那种所謂工会將要强迫工商業离开費列得尔菲亞的控訴，他只認為可鄙。这种控辞不僅是虛假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决不可能的。

罗德里坚决地說，“劳动人民，是完全有資格拿到足够的工資使他們能够过着舒適的生活的”。此外，制鞋工人会“在建立自己的組織的問題上，是同一切为推進商業、農業、藝術或为其他任何目的而組織的协会有完全同等的权利的”。

他接着說，起訴人方面要大家發揮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喊，只是要拿它作一件外衣去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案件中会遭到危害的不是什么公共的福利而只是工厂老板們的私人利益。“当你們看到大老板們排成了这样一支驚人的隊伍來出席这次審判了，本城最卓越的辯护律师也都被請來出庭了；而且，当你們看到他們

的雇客中並沒有半個人來參加這個訴訟時，那就真需要非凡的辯才才能使你們相信他們進行這一訴訟的動機是本着什麼純粹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最後，羅德里以要求伸張正義的熱烈的呼聲結束他的談話：

“如果你們希望在我們的政治和法律中發揚一種不平等的精神，如果你們認為我國的勞動者和所有的技術工人都已經享受着過分的自由了……這種假定、這種看法就將使你們宣判被告方面是有罪的。如果，相反的，你們對於我國政府既定的各種賢明的維護自由的原則感覺滿意，……如果你們感到在我國這種保證每一個公民都有同等權利、反對階級歧視的憲法下過生活是一種值得珍惜的幸福——那我就只能希望你們予以無罪的宣判。”^{②6}

陪審官的組合成分早已對這個案件作好結論。被告的工人們被判以“聯合要求增加工資罪”的罪名，每人罰金八元。

這個決定隨即變成了以後判案的先例。一八〇九年，紐約的成衣工人也以圖謀不軌的罪名罰金一元並償付全部訴訟費用。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巴爾的摩及匹茲堡的制鞋工人也被判為有罪並被科以罰金。在一八〇六年及一八一五年間，有紀錄可查的六件控告鞋工有圖謀不軌罪行的案件中，有四件的判決是不利於工人的。罰金數目不大固然可以說是美國民心的一種證明，但這種決定仍然說明老板們和法院的目的是要把工會運動在美國人民的生活中徹底消滅。一八一五年審判匹茲堡制鞋工人時的紀錄官曾寫道：“陪審官的判決對於全部製造業的利益是有極大的重要性的，因為這種判決將徹底消滅那些對於我國西部資本家們的興隆的企業是如此不利的各種會社組織。”^{②7}

在一定时期內，老板和法院在阻止工会主义發展方面是勝利了。一八〇六年，当費列得尔菲亞制鞋工人的組織被法院宣告为非法时，他們只好轉而組織了一个生產者合作社。但任何法院的決定和老板們的努力是都不能制止美國劳工运动的發展的。費列得尔菲亞印刷業工人会給紐約的罢工弟兄們的一封信典型地說明了工人們前進的必要和前進的決心：“在你們的光榮的斗爭中坚持下去吧！記着：沒有一个偉大的斗爭能不經過危險和艰苦而取得勝利的。”^③

第六章

劳工与杰斐遜时代的民主

“你从不知道恐懼或政治压迫，
你忠实的独立党员和愉快的劳动者，
来吧！团结起你们的力量、整肅你们的队伍，
为了那昔日的正义要求，团结、战斗、一心一德。”^①

这是一七八五年流行的一支工人的歌曲，这里所说的昔日的正义要求，是指革命战争时期美国人民从战斗中所争取的对自由的要求。现在却又需要一个新的战斗来保存这种自由了。这个新的斗争即是争取杰斐遜的民主主义。

杰斐遜民主主义的根源

杰斐遜民主主义的直接根源的探求要引我们回溯到革命军人从战场上回到家鄉的时期去，那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看到自己的財產抵押掉了，家里人負債累累，而他們的政府則是完全掌握在富有的商人和地主豪紳們的手中。这些人利用在土地、士兵証券、財政支付証以及独立紙幣各方面的投机，積累了巨大的財富。人民大众，正如他們在战争中争取勝利一样，现在，在政治上組織起來要争取和平中的勝利了。各州都展开了政治斗争以求減輕战后加在自耕農、技術工人和一般劳动者身上的負擔。可是在大多數的斗争中，工人階級的力量始終受到限制，因为选举权一般都是

为有財產权的人所專有。

宾夕法尼亞是选举权不受財產限制的極少几个州里面的一个。在紐約州，占有价值二十鎊的財產或租用房地產其生息价值估計每年在四十先令以上者始能有权选举州議院的議員^②。占有財產的工人是很少的，但也頗有一些工人租來的住房每年生息可估价达四十先令。一年一年地过去，有选举权的技術工人和劳动者也愈來愈多。

有些工人开始想到要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了。一七八四年十月九日，費列得尔菲亞有一个技術工人曾鼓动全体工人弟兄要在下一次选举中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选人，他說：

“一切人类的苦难都是从自由人不能表达和实现他們自己的願望这一事实產生的。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答复，为什么自由的人民在这方面，即在他們的政治的以及宗教的信仰方面，不应当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有相等的独立人格。”^③

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但在第二年春天紐約市州議院选举时，那里的技術工人們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單。这一运动是在技工們要想組織技術工人会的企圖遭到失敗后开始的。阿尔倫·布尔領头反对这个議案，他的理由是，这將給工人“太大的政治影响”。結果，这一議案在議院通过后却被修正委員會否決了。

在这个运动失敗后，技工們决心要做到讓州議院中有他們自己的真正的代表。一七八五年四月十四日，有一个技術工人在“紐約小邮包”上發表談話道，“咬文嚼字的律師、富有的商人、神气十足的大地主都有人……在那里替他們照顧他們的利益”。那么，他問道，为什么“高尚的技工和車运工人們”，不應該有他們本階級的代表以便实现他們的要求？他接着又說：“大戶和有錢有勢的人們

永远在那里聚成一团，这是为什么？为要欺侮、蹂躪那些弱者、窮人和無助的人嗎？……难道除了商人和律師之外，就再沒有一個人值得我們信賴嗎？”当年在自由的子孙的旗帜之下結隊游行的記憶猶新，技術工人會終於在革命後的美國第一次提出了技術工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除開一個外，全部名單上的人都當選了，他們中間有兩名是工人——一個鞋匠和一個鐵匠。其餘的都是“對勞工事業抱友好態度”的人④。

到了一七九〇年，同樣的一種由於全國政府完全被一班富人所控制的這種情況所激起的憤怒情緒，使得全國各地的技術工人和一般的勞動者都起來組織了他們自己的政治性的會社。

要在這裡詳細地說明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期間，美國政府如何被商業和金融巨頭們所篡奪以及美國工人階級又如何反對這種篡奪，顯然是不可能的。這裡只想略舉幾件事情以見杰斐遜民主主義時期美國勞工階級各種政治活動之一斑。

完全不同於很多的自耕農反對通過新憲法（害怕在“大人物的傲慢—富人的暴政—以及收稅官、徵稅員的無人性的擄掠下”將永遠不得安寧），技術工人和一般勞動者却是追隨着杰斐遜的領導一致擁護新憲法的。他們完全和老板們一樣急切地希望得到全國經濟的穩定並制止英國貨物在美國市場的傾銷，因為目前的情況已引起了相當嚴重的失業問題。他們相信，有一個“人權條例”會幫助制止反對新憲法的人們所預料的某些惡劣現象。早在一七八八年，波士頓的技術工人，在保羅·瑞弗爾和班哲民·羅素的領導下，即曾全體投票贊成新憲法，他們並作出一項決議，表示熱切地希望麻薩諸塞州能夠立即予以通過。在紐約和費列得爾菲亞，技術工人和普通勞動者也為了新憲法的實現積極努力着⑤。費列得爾

菲亞有一个技術工人，当他听到一个新宪法的反对者抗議說不願讓人拿新宪法“硬向我們喉嚨里塞”的时候，回答說：

“如果这位F先生除了借錢買來的或賒來的东西以外，就沒有任何食物可以向他自己的喉嚨里塞，像过去三个月來的情況一样，而他知道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缺乏一个良好的联邦政府，因而產生了商業上的蕭条的結果，那他也就决不会需要化費上三四个月的时间去考慮新宪法了。”⑥

急切地希望建立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技術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同社会中其他的人們联合起來，合力推动杰斐逊所提出的通过“人权条例”的要求。那最初的十条修正案所以能够終于包括到宪法中去，完全是这种（群众）压力的結果。关于这一点，正如一位大学里的同学所說，“它們从人民中來，因而也就是直接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的”⑦。

但是，僅在条文上規定下來，保證全体人民都有宗教、出版、言論、集会及請願自由等还是不够的。“人权条例”能不能有实际意义，会不会变成一紙空文，那是完全要看普通人民的力量。 “紐亞克日报”关于这个問題講得很对，它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十九日寫道：“只有工人和農民或者貧窮階級（按照一般人对他們的称謂），才会感到必須要支持美洲的自由。”

因而自由是又一次在危險中了。当杰斐逊从法國公舉回來的时候，他驚异地看到在宪法通过后仍然是富有的商人和投机家們統治着整个的國家。漢密尔頓和联邦党人已露骨地表示了他們要把共和國变成一个專制王國的决心。联邦党人痛恨民主政治，他們称它为“不能再坏的政体”。約翰·杰在他的一句話里更總結了他們全体的意見，他說，“誰占有这个國家的財富誰就應該統治这

個國家”。普通人民是完全無知的，決不可以讓他們有政治上的特權。技術工人和普通勞動者只應該安分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凳上，小農民則只應該呆在犁頭的旁邊。國家大事是只能由“富人和出身高貴的人們”去管的^②。

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有力的幫助下，“富人和出身高貴的人們”真是從此一个个青云直上了。僅只漢密爾頓的基金政策一項便給聯邦黨的商人和銀行家們开辟了無盡的財源，他們從農民和工人的手里以一分錢去把價值一元的兵士證券和他種債票買來，却由政府完全照票面額的數目付給他們現款。而這些農民和工人還被迫要繳付高額的捐稅使國家財政收入足以維持這個計劃的實施。最後，詹姆斯·麥迪孫講話了，他說，“目前這項工作中最可恥的事，是那些當初推行這套玩藝兒最積極的一些州議會的議員們現在是公開地在那里搶奪着分贓了。”^③

當人民大眾正開始看到他們從戰鬥中爭取到的前途已經陷入危境中的時候，重大事變的消息從法國傳來了。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得到美國啓示進行的，而現在它却要从新燃起美國的革命火焰了。這個消息是使得聯邦黨人極不開心的，但美國人民却因此而歡欣鼓舞。一七九四年，紐約的技術工人們堅決地表示：“要讓這在美洲燃燒起來并照亮了法國的自由的火焰燒遍整個的世界，將一切專制王權化為烏有。”^④

但要把“一切暴虐的統治者，一切擄掠者和公債資金投機商”徹底剷除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聯邦黨人是一個強大的敵人，他們有嚴密的組織，有堅強的決心。他們有極充裕的現款供他們進行賄賂，使他們能夠操縱一切，進行各種腐化的活動。而人民大眾却是極端分散的，他們要想集體會商一個問題，採取集體行動都非

常困难。他們沒有錢，沒有什麼報紙去和联邦党人的出版物對抗，更沒有教士們替他們講話。雖然如此，在城市和大市鎮中却住着無數的机工、技術工人和普通勞動者。這些人過去曾參加自由的子孫的活動，現在也還正在組織各種福利會和工會，他們是知道應該怎樣去進行組織工作的。一七九二年，這些勞工運動中的老將和富于鬥爭性的農民，為要保存革命果實，已堅強地站起來了。

各種民主共和主義會社

這些新的組織一般都被稱為民主會或共和社。它們最上層的領導人往往是小康的知識分子，但會員成分則主要是城市工人和自耕農。根據尤金·林克最近的研究，費列得爾菲亞民主會中可以查明出身的二〇六個會員，里面有一〇三個是技術工人，查里士頓共和社里的一七七個查明職業的會員中，則有三四人屬於工人階級⁽¹⁾。

從這些民主會社里，常常傳出要和法國人民團結起來的呼聲。有一個會社在其“致美國人民書”中講道：

“難道我們這首先燃起自由火焰的美國人民，現在却要袖手旁觀眼望着那正在法國的土地上燃燒着的熊熊烈焰熄滅下去嗎？難道大家還沒有看清，只要專制暴君一天存在，我們也就一定會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要遭受到暴君的統治嗎？如果所有的殘暴的統治者可以聯合起來反對自由的人民，所有的自由人民卻不應該團結起來反抗那些殘暴的統治者嗎？毫無疑問，我們必須以共存亡的精神同法國人民團結起來。”⁽²⁾

民主會社的每一個集會都不外是用來進行講演、座談、討論問題，以及制訂并通過各種決議、各種致全國人民的宣言和致總統、

國會及州議院的抗議書。它們經常起來反對國會和州議院所舉行的秘密會議。它們要求所有的議員、行政官和法官們不要再使用那些除了律師和古典學者外沒有人能懂的、“意義隱晦的、在文字上繞圈子的、古老的官樣文章”和一切“陳腐的辭句”。人民大眾有權利要求明白了解一切問題，任何“專制者”編造得不管多么精妙的理論也不能使他們貼耳听命的。

革命後實現普及教育終於能變成全國人民的要求，各民主會社領導人湯姆斯·杰斐遜所提出的一些進步的教育理論終於能見諸實施等，都完全應該歸功于這些民主會社。正如費列得爾菲亞民主會所說，“基于正當原則的公立學校的建立將確保我國家的永恆獨立和共和政體的永遠存在”。通過各種通訊委員會的活動，民主會社使得普及教育變成了全國性的問題。儘管在那個時候，由國家支付經費的學校還並沒有創辦起來，但我們這種公立學校的制度的建立乃是這些會社所作努力的直接結果，而在這些會社中，美國工人是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的。至少有十個學院和研究院是由這些人民團體中的會員們舉辦或在他們的幫助下辦起來的¹³。

同時，教育也並不是完全限制在學校中的。各種出版物就經常是散播某些知識或阻止某些知識傳播的極其重要的力量。因為“美國報紙的絕大部分似乎是完全不留餘隙地掌握在反民主派的人們手中”，民主會社乃極端感到需要有自己的出版物。威廉·曼寧曾說過，一個窮苦的、未受教育的農民，“一個勞動者要想從五光十色的一大堆矛盾中找出他所需要的知識，那真是比從草里尋針還要難得多”¹⁴。曼寧于一七九七年發表了他的“自由的鎖鑰”，在這裡他建議組織一個一切靠勞力為生的美國人均可參加的“勞動會社”。他提出的關於該會的組織原則，便是在差不多一個世紀

后，由于劳工协会的組成而变得非常著名的那些原則。曼寧曾說，“既然劳工是全人类都賴以为生的一切財富的唯一生產者，这种職業就应当是一种光荣的職業，从事劳动的人也就應該得到大家的尊敬。”他所提議的这个組織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要使劳工階級自己“有一个月刊〔和一份〕周报”^⑮。

虽然，这些民主会社努力的結果並沒有办起來一份劳工的周报，但它們却在一切有关人民福利的問題上，打入了美國已有的各种出版物。紐約民主会化錢讓“紐約新聞”于一七九四年四月二十日附發了一份增刊，在那里詳細地介紹了維尔蒙州契吞頓的民主联合会的各重要原則及其組織形式。其他会社也都尽可能的把它們的決議、通電、愛國性的演說及會議錄等在報紙上公布。它們印發了很多小冊子，其中有湯姆·潘恩所寫的“人權”，在这本小冊子中作者極強調地說：“現行的法律中有好些是專為調節和限制工人的工資而設的。制訂法律的人們對於自己所有的房屋田庄是完全容許有自由討价还价的，但为什么他們却不容許工人們有完全同等的自由去爭論劳动力的价格呢？劳动力是工人們所有的全部財產。为什么他們所享有的如此少的一点財產、如此小的一点自由都要受到侵害？”^⑯

他在这里着重地提出对工会主义的辯护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期間所組織的一些技術工人雇工协会都是經常和民主共和会社密切合作，并在一起進行工作的。兩方面的會員和領導人也都常常混在一起。有好多次当“七月四日”这个節日來臨的時候，各地木工、印刷工、鞋工、制桶工和家具工等的会社組織都正式地和当地的共和社联合在一起舉行慶祝，他們共同为七月四日这个節日干杯，“希望它永远鼓舞着一切被压迫的人起來維

护自己的权利”^{①7}。

联邦党人的反攻

联邦党人以一种苦心制造的紅色恐怖來对抗各民主会社以及很多杰斐遜路綫的报纸。联邦党人大声疾呼着說，这些会社，乃是“該万死的法國急進民主派”所組織的，所謂“巴伐利亞改良派”这个龐大的、秘密的、專門从事破坏的國際組織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从巴黎拿津貼的。耶魯学院的院長提摩賽·德怀特更提出警告說，如果人民的运动得到了勝利，那时將再沒有什么对于上帝的神聖的崇拜，人們能看到的只有“民主急進派的群魔乱舞”，他們的聖詩將是“馬賽進行曲”，“聖經”將被他們“全部拋入营火堆中去”，而美國人的妻子和女兒則將变成“法定娼妓制度下的牺牲品，將被人正大光明地予以侮辱，無所忌憚地予以蹂躪，而她們則將完全被拋出純潔和道德的圈子，为人神所共弃”^{①8}。

一七九七年，有一个杰斐遜派的人曾寫道：“任何一种企圖恢复人类自由或阻止專制政权發展的努力，現在是一律被称之为民主急進主义了。”^{①9}

紅色恐怖也許可以推迟但是并不能阻止自由运动的前進的。到一七九五年，虽然各民主会社已开始解散，它們的工作却仍在市鎮會議和聖塔馬尼大廳* 的集会中繼續進行着。那些人民会社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湯姆斯·杰斐遜領導下的民主共和党的組織即是在它們的帮助下才終于形成了的。

虽然共和党里面包括有很多制造工業者、商人和自由職業者，

* 聖塔馬尼大廳在紐約市区中。一七八九年組織的聖塔馬尼民主派即系因以該大廳为根据地而得名。——譯者

其主要成分仍为农民、机工、技术工人和各业零工*。他们中间最积极的是海员工人，因为这些人曾深受英国政府之害，英国政府经常监禁美国海员、抢夺美国船只。这些海员工人毫不隐讳地表示对一切反民主分子的反抗。在致汉密尔顿报纸的专栏作家、人民运动的死敌威廉·魏罗克斯的一封信中，“一海员”写道，“如果你的名字再继续在报纸上那些又脏又臭的一套鬼话下面出现，我要叫你马上无疾身亡”^②。

发现他们那些谎言并不能吓退人民大众的时候，联邦党人转而采用暴力和恐怖统治的办法了，他们强使国会通过外侨法案、叛乱法案及归化法案。在过去这同样的一班人会欢迎过欧洲工人来到美洲的，因为那时商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极需得到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汉密尔顿曾经颂扬那些移居到美洲来的工人们说，“他们脱离欧洲，一方面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帮助发展了美国工业并增加了美国的财富。”^③但现在当这些移居到美洲来的人们不但帮助发展了他们新入籍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增加了她的财富，而且是极喜爱这个新的国家，因而要求得到较多的工资，享受到民主权利的时候，联邦党人却想尽方法要把他们驱逐出境或者制造种种困难，使他们无法得到公民资格。

规定五年到十九年居住期满始能入籍的归化法案是特别用来对付爱尔兰工人的，他们在一七九八年的“爱尔兰叛乱”失败后会大批的来到美国。这些工人在各工会中、在圣塔马尼民主会社中以及在民主党中都非常积极。这些爱尔兰人，根据一位联邦党人的看法，乃是“与地狱为邻的世界中最为上帝所痛恶的一群民主党

* 在波士顿和纽约也有很多工人曾经拥护联邦党，原因是该党曾提出实行保护关税制的要求。

人”，他并且極力主張，他們从哪里來還應把他們送回到哪里去。哈利遜·格雷·奧提斯在寫給他妻子的信中說，“如果不采取有效辦法對於這種任意容許野蠻的愛爾蘭人和他種野蠻人獲得選舉權的情況立加制止，那不久自由和財產權等都將完全歸于消滅。”⁽²⁾

另外一個用來徹底制止任何人對聯邦黨人提出批評的辦法是外僑法案，這個法案授權給總統，使他可以隨意將任何他認為可能危害“美國的和平和安全”的外僑驅逐出境。在國會中領導反對外僑法案鬥爭的愛德華·李文斯頓曾說，這種對付外僑的辦法是很快就可能用之于美國公民的身上的。結果則正是如此。聯邦黨人更用強大的壓力使國會通過了叛亂法案。該法案則規定如有任何人“寫作、印行、談論或發表……任何虛假的、誹謗性的、惡意的文章或著作用以反對美國政府，反對美國國會的參院或眾院，或反對美國總統，意在……使他們……遭人唾棄或喪失威望者”，得受兩千元以下罰金及兩年以下徒刑的處分。

麻薩諸塞州有一個流動謀生的技術工人，大衛·伯朗，被聯邦黨人誣稱為“叛亂的流浪使者”，竟被判以十八個月徒刑和四百元罰金的處分。他的罪行是在麻薩諸塞州的德漢木地方豎立了一根自由柱，在柱上貼了如下的一份傳單：

“在這里我們看到，在五百萬的人口中，只有一千人享受着公共財富的全部利益而所有其他的人却是完全無份的。一點不錯，我們的政治是以最大的速度在向貴族與平民的社會制度前進着了——那就是只有極少數幾個人應該占有整個的國家而其他的人則全是他們的佃戶和房客。一個社會中的勞動人民與那些因魔鬼附體而想出種種辦法以圖消滅勞動人民的、不勞而獲的流氓們之間，是（經常）在進行着各種實際鬥爭

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政府，在人民完全对它失去信任的时候，还能够长期支持下去的，因为人民才是真正的政府。”^②

恐怖、監牢和罰金都沒有能够阻止杰斐遜于一八〇〇年当选为美國的第三任总统。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一切在外侨法案和叛乱法案的名义下提出的迫害人民的訴訟及其判決完全無效。

杰斐遜路綫的勝利

虽然有很多工人不能参加投票，但在杰斐遜竞选总统的运动中，他們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紐約，大家当还记得，有很多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是有权参加州議院議員的选举的。一七九六年，漢密尔顿甚至說，州議員的选举在紐約市已成为“富人与貧民之間的斗争問題”^③。因为紐約的州議院將选出它的总统选举人，因此如果在紐約市的选举中，共和党能够得到勝利，那就將保証杰斐遜在这里得到十二張选票*。这个勝利却是完全要依靠机匠、技术工人、小职员、雇工及普通劳动者的投票情况的。为要爭取勝利，联邦党人曾試圖采用强硬的手段來对待在他們控制下的工人，他們告訴那些工人說，他們現在是在杰斐遜和自己現有的職業兩

* 杰斐遜于一八〇〇年三月四日致詹姆斯·麥迪孙的信中說，“在紐約，一切要看紐約市的选举是否能得到勝利”。接着他并指出这里的选举对全國选举运动的重大意义說，“……如果紐約市的选举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單得到拥护，那結果就一定是一定是共和党的勝利；但如果在紐約市选举中联邦党人所提名名單占上风，其結果則極可能是联邦党人得到勝利，因为在那种情形下，必須有澤西和宾夕法尼亞兩州都支持共和党才可以压倒紐約，而那是完全沒有把握的事。”（見保罗·福尔德編“湯姆斯·杰斐遜文集”，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九年紐約版，第七卷，第四三三——四三四頁。）

者中間進行選舉”。一八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紐約每日廣告人報”更企圖恫嚇商人和工人們說：

“商人們，你們的船隻將永被封鎖在海港里慢慢地霉爛掉，因為它們賴以為保護力量的海軍將被杰斐遜全部消滅。車運工人們，你們可以把你們的車子都燒掉了吧，因為商人們將永不能再有什麼工作需要雇用你們了。碼頭邊鐵錘的叮當，繁忙的工廠中傳來的機聲隆隆，這些美妙的音樂將從此再也聽不到了。供奉上帝的至尊無上的神廟將被橫加褻瀆，那里，如在法國一樣將變成由下流的婊子們所裝扮成的‘理智女神’的罪惡的狂歡場。”

最后，并在結論中說：

“行動起來吧，你們所有對於政府的穩定——財產的安全——宗教的保存和法律的尊嚴表示關懷的人們……。”

富有的商人、銀行家和律師們確曾行動起來了，但所有的技術工人和一般勞動者也同樣行動起來。依靠着他們，杰斐遜終於能在這個城市得到勝利。

聯邦黨人們所斷言的一切可怕的結果一件也沒有成為事實。在杰斐遜執政期間，通過取消選舉權問題上的財產限制，民主制度已漸在很多州建立起來。在邊疆地區新設立的各州中，全民選舉

- 有一個印刷業雇工曾在這樣一段辛酸的談話中總結了紐約雇主老板們的全部行為：“讓你們雇用的工人全都是最忠心最徹底的聯邦黨分子吧……如果他們中間有任何人敢對於自由和平等一類的原則表示半點好感，那你們就要立即將他們開除掉；又如果你們那個區域的行政官是一個極好的聯邦黨人，那你們在支付工資給他們的時候也就完全用不着一定要很精確地照他們應得的數付給他們。”（見一八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共和黨人瞭望台”所載署名“一個排字弟兄”一文。）

几乎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一八〇四年，馬里蘭的人民修改了他們的州憲法，所有無財產的人也都取得了選舉權。數年以後，南卡羅來納州的選舉法亦已規定一切成年的白色男性公民均有選舉權。

工會主義者所進行的重要戰鬥之一亦即是杰斐遜及其領導下的全党所進行的反對在美洲使用英國不成文法的鬥爭。杰斐遜派的人們說，不成文法乃是一套“由法官們所頒布的并不寫成明文的法律……那也就是說，一種完全以法官們的一時心情，或其頑固的成見，或其一時熱情為最後依據的法律”^②。一八〇五年費列得爾菲亞制鞋工人遭到控訴并被判為有罪的事則更加速了不成文法的共和主義化的過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華特·奈耳斯教授曾寫道：“在內戰前很長的年代中，杰斐遜主義的力量是極為雄厚的。否則的話，那一定還會有更多的（圖謀不軌）案件發生。當英王黨人用盡壓力偶而在某一個案件中獲得勝利時，那個勝利也是受到相當限制的。”^③

一八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杰斐遜第二次當選三個星期以後，“紐約晚郵報”號召全國舉行一個悲悼日，以懷念當年技術工人、普通勞動者及一般平民从不干預政治的太平盛世。“目前的真實情況是，民主主義和杰斐遜主義的統治已遍及全國，一切有才能、有見識和有財產的人們是除了靜坐在家中一任狂浪汹涌外完全無能為力了”。聯邦黨人們却也並沒有肯靜坐在家中，相反的，他們集中力量向各州政府及法院里面鑽去，他們認為，在那里他們可以找到一個掩護，以躲避“急進民主派的瘋狂的浪潮”。在某些州里，他們為要騙得選票，乃改稱自己為聯邦共和黨人。漢密爾頓甚至主張要建立一個基督徒憲政會，并在一切“急進民主黨人”控制下的城市中設立分會。他并提議要特別向“技術工人中的各

个階級”發出通告，号召他們前來參加該會會員^②。

這些還不是聯邦黨人用來阻撓民主運動的主要方法。早在一八〇三年他們即曾籌劃一個陰謀，希望用一次武裝政變來推翻杰斐遜。另外一個規模更大的陰謀則是企圖要使新英格蘭各州脫離美國聯邦而重新與英國結合。英國駐美國大使安東尼·麥瑞并通知他的政府說：“自然，當時機成熟時，他們是極希望能夠得到大英帝國的支持和援助的。”^③

反杰斐遜派的人們所要依靠的同盟者還不僅是英國。阿爾倫·布尔就曾希望從西班牙得到幫助。當聯邦黨人企圖使新英格蘭和聯邦的其他部分脫離時，阿爾倫·布尔則正從事於企圖使西部各州和東部各州分裂的活動。

勞工與（一八〇七年的）封港令

英國的援助不久就來到了。一八〇七年英國宣布了她的樞密院單行法令^{*}，禁止新大陸與歐洲大陸通商，如欲有任何通商行為則必須得到英國的許可。英國的船長繼續扣留美國船隻并強征美國海員。那時拿破侖也正下令禁止美國與大英群島之間的通商活動并掠奪美國船隻，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的政策乃恰與拿破侖的“柏林與米蘭令”吻合。一八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杰斐遜總統給了他們一個回答，那就是：下令封港，禁止任何船隻出入美國海口，直至各挑戰國改變它們的政策為止。英國的樞密院單行法令得到聯邦黨人的熱烈支持。英國駐美大使福斯特即曾出席過一次聯邦黨人的會議。他曾寫道：“所有的建議，總成一句話，是我們

* 即僅諮詢樞密院，不經國會同意即頒布施行的法令。——譯者

不應該收回我們的樞密院單行法令或对它加以任何修改……一句話，他們似乎完全相信英國是可以有办法讓美國同她建立任何一種她認為最合適的关系的。”^⑳

這些賣國陰謀的成敗是主要決定于全體人民的反應的。馬上，聯邦黨人對於因封港而引起的困難感到不安了，他們抹煞杰斐遜的政策正刺激着美國工業發展這一事實，片面地誇大經濟上的損失。有些聯邦黨人則希望封港令將使所有失業的工人起來反對杰斐遜。在聯邦黨人控制下的報紙上總常有一些文章專門發揮“街頭已長滿了野草，碼頭邊的船隻都已開始在腐爛”的論調。一八〇八年七月十二日，“紐約商務廣告人報”更發表社論說，“國家繁榮的標志，那一度使人聽來心曠神怡的，勤勞工人們的歡噪聲現在是再也聽不見了，代替它的是窮人們的呻吟，是勞動者的報怨和悲慘的乞丐們向人乞討的叫喊。”一向以荼毒工人著稱的查里士頓聯邦黨的工廠老板們現在也會看到“靠自己的血汗維持着生命的工人們現在感到自己本來已極微末的收入，由於這個倒霉政策的實施，越來越減少了”^㉑。

雖然很多海邊城市的确遭遇到了相當大的苦難，但這些“淒慘”的故事是欺騙不了工人的。他們有他們的另一種見解：“波士頓的親英集團鼓動外國人來摧殘我們的商業，逮捕我們的海員，因此政府才不得不採取封港辦法以制止這種橫暴行為的長期繼續下去。如果農人的收穫減少了，這個集團必須負責。如果在我們的海港地區的城市中有破產的事件發生了，這個集團也必須負責。必須對農人、商販、海員、商人們的遭遇以及他們目前所遭到的困苦負完全責任的不是什麼別的，就是那個陳腐霉爛的英王黨。”^㉒

失業工人並沒有咒罵杰斐遜，更沒有投票選舉聯邦黨人。一

一八〇八年一月八日，“紐約每日廣告人報”上曾出現了一個通告，召集一切失業的海員來開一個群眾會議以便向市政府要求職業。但在該會以及以後各次會議所發出的通報中並沒有任何斥責杰斐遜的言論。幾天以後，失業的技術工人和造船木工們也在一起開了一個會要求市政府予以幫助。不久，興辦公營工廠的政策實施了，“一切因封港而失業的工人”均可到那里工作^②。

聯邦黨人所設工廠里的工人，凡公開表示擁護杰斐遜政策的，都被老板開除，同時，他們更拿失業來威脅其他的工人，要他們在請願書上簽名抗議封港命令。到威脅無效的時候，他們就自己動手假造請願書。這樣的請願書曾有一份送達麻薩諸塞州州議院，在上面簽名的一共有——〇個水手。州議院子是很熱心地委派了一個委員會要去和那些簽名的人面談。其中有六個人最後总算給找到了。但他們却只能證明有一個過去從來沒有見到過的人曾在海邊一帶來往，他攔住過路的水手們要他們在一張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③。

一八〇八年紐約市選舉運動中的中心問題即是封港問題。聯邦黨所提出的候選人白倫特·加丁勒是一個公開反對封港政策的人，而共和黨所提國會議員孟福爾德乃是曾經投票贊成封港而現在仍是擁護封港政策的。結果孟福爾德在絕大多數選民的擁護下當選了^④。

勞工與一八一二年的戰爭

一八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寫道，“聯邦黨的諸領導人物曾毫不猶豫地告訴我說，雖然在辯論時他們將決不表示任何意見，但在投票時他們一定要贊成和英國開戰；他們並且

說，除了战争，他們看不出有任何別的办法可以結束現在的种种限制令及各种禁止入口的法令；战争將把現在的政权推翻，那他們就可以自由地实行他們的主張，同大英帝國建立永久的和平。”³³

当战争快要爆發的时候，联邦党人投票反对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一开始，他們更加强了他們的破坏活动。新英格蘭屬于联邦党的各州長拒絕全國政府所提出的組織民兵的要求。联邦党派的商人和銀行家則拒絕貸款給國家。联邦党派的工商業者更大規模地和敌人做生意。其規模之大竟使英國人承認如果沒有从美國來的大量的給养，他們在加拿大的軍隊就会發生粮荒了。最近發表的英國政府旧档案中的文件更說明联邦党人还派遣过一个代表去拜見駐加拿大的英國司令約翰·謝尔布魯克爵士，求他对于新英格蘭脫离美國联邦的活动予以軍事上的援助。該代表曾說，“这一步驟將使現在的美國政府完全陷于癱瘓状态，并徹底摧毀那万惡的民主政治。”

約翰爵士在其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致巴色斯特伯爵的信中說：

“今有不敢不据实直陈者，乃現各該州中民主党势力甚强大一事。設新英格蘭脫离联邦之謀有所举动，其全國政府勢將極力支援該党以反抗联邦党此举。是故在事端既开之后，情有不得已之时，英帝國是否能予联邦党以軍事援助俾使所志得伸，实联邦党人所不勝迫切待命者也。”³⁴

战争來臨以后，勞工大众立刻热烈地响应了麥迪孙總統組織志願軍的号召。在諾福克、紐約市、費列得尔菲亞、紐亞克及查里士頓等处，都是工人們首先报名入伍。紐約印刷業工人会号召全体會員起來为保衛祖國而战，該会并筹划了一部分特別基金以作

为补助入伍會員們的家屬之用。查里士頓的技術工人們組織了一個戰鬥連，他們并宣誓要使自己在勇敢方面無愧于他們的革命祖先²⁷。一八一四年的夏天，在联邦党人正陰謀策划欲使美國在戰爭中失敗的時候，紐約市的工人和其他市民們則正積極修建工事，以便在即將來到的攻击下保衛該城。一八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向紐約市民發出的一个号召曾登載在“紐約北美報”上：“从睡夢中驚醒起來吧！讓每一個市民立刻站起來走向前綫，准备为紐約城的保衛工作流尽他最后的一滴血。現在已不是講理論的時候了！我們必須行動起來，奮不顧身地行動起來——否則，我們一切全完了。”

几天之內，二万五千个市民已經武裝起來，并开始進行訓練，以便保衛紐約市。紐約制造公司和飛鷹制造公司的工人更集体参加了志願軍，他們在工作空隙中進行軍事訓練；此外，他們还利用工作時間制造武器和彈葯。紐約印刷業工人會的書記大衛·瑞因斯更組織了一個完全由参加工会的印刷工人組成的連隊²⁸。其他的市民則参加了建筑布魯克林城格林堡防禦工事的工作。木工雇工協會的五百个會員工人参加义务劳动达兩星期之久。皮革業、鉛管業及家具、桌椅業工人會的會員們同商販、店員、婦女及城市的公務人員們完全在一起并肩地挖着战壕。八月十七日，更有从新澤西州的帕特遜來此的几百个會員工人幫助進行挖掘工作。此

-
- 一八一四年九月，費列得尔菲亞印刷業工人會決議每一個會員必須捐出一天的勞力參加“現在为保衛費城而進行的工事建筑工作”。后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四日，該會更通告一項議案，決定撥款救济“由于本人為國家服役而离开了家鄉，因而需要救济的會員們的家屬……”。（見乔治·特萊西：“印刷業工会史”，印第安納波利斯一九一三年版，第四四頁。）

外参加工作的还有约一百五十名黑人^③。

当时极流行的战歌之一，“爱国的坑道工”，即是在人民大众保卫纽约市这一伟大行动的感召下写作出来的：

为要在敌人的炮下
保卫我们的权利，
看哪！爱国的坑道工
工作在布鲁克林高地；
不分人种，不分地位，
不分职业或年纪，
他们，热烈地工作着
一起又一起。

这里是泥水匠在建造
光荣底自由神坛；
那里是油漆工人在勾画
不朽的历史；
铁匠在这里找到最熾的烈火，
賣酒人在这里尝到最烈的酒漿，
印刷工人也分享着这个榮譽的，
他们把这一切印成历史的篇章。

学生走出了自己的学校，
追随着他们的爱国的老师，
農人們拿起了挖地的铁鍬，
帶領他們的是教区的傳教士，

泥土在他們的手臂下翻飛，
他們是酒匠、屠工和烤面包的同志，
這裡揮着汗的是一位外科醫生，
那裡喘息着的是殯葬技師。

鉛管匠、翻砂工和旋工，
鐵皮匠、理髮師和染匠，
清道夫、小職員、小商販，
雕刻師、珠寶匠和布商，
宰夫、呢絨商和演員，
鞋匠、帽匠、成衣匠，
磅員、度量員、檢查員，
還有海員和木匠。

(合唱)

鐵鍬、鐵鏟與鷹嘴鋤，
手車、平鋤與撬石器，
最好打消你侵略的念頭吧，
美洲人民是有種的！^{④①}

英國人在這神聖的保衛工作前面畏縮了，他們放棄了攻奪紐約城的計劃。

黑色美國人親身參加了一八一二年戰爭的，還不僅限於那參加紐約市保衛工作的一百五十人。伊利湖一戰，培理率領下的艦隊中，有十分之一的水手是黑人^{④②}。同時，還有一個黑人連在安德魯·杰克遜的指揮下參加過新奧爾良戰役。年老的喜可理曾對他們表示非常的欽佩，他說，他們的英勇是“超出”他最高的希望

的^{④2}。

民主制度的擴張

在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勝利已保證了美國的獨立后，杰斐遜派的人們开始又一次進行發展民主制度的斗争了。一八一七年，康涅狄克州的共和党人和聖公会联合，建立了一个美國宗教自由与政治改革党，以宣揚宗教自由，要求制訂新憲法以及推行各种政治改革，特别是以實現一切男子均有选举权的选举法为其宗旨。很快，該党在一次选举运动中得到了勝利。一八一八年六月“尼罗河实錄”报曾以極度欢乐的心情宣布这一次的勝利：“自由來到了！一切負担國家賦稅并为國家服兵役的人均有选举权的法令，今已在康涅狄克州州議院中勝利地通过了！”可是保守派的“康涅狄克州潮流报”却感到無限的悲哀。該报于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日新憲法通过后喊叫着說，“毀滅性的一紙証券已經簽字了、蓋印了、并且發出去了”。“成千成万的人盲目的任人帶領着完成了一件使自己陷于滅亡，使自己的子孙和后代从此將永無翻身之日的工作”。

数年后，紐約及麻薩諸塞州首先步康涅狄克的后塵，取消了选举中的一切財產限制。其他各州很快也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一切保守分子都对于杰斐遜路綫的最后勝利感到無限悲痛。有錢的有財產的人們將落“在那些为找每天的工作而挤塞在街头的人們的手中和权力下了”^{④3}。一八二一年十一月，著名的联邦党人彼得·杰注意到“好像要求实现普选制度的空气瀰漫了整个美洲”的事实。最后，他說，“既然無財產的人在数量上远超过有財產的人，其結果，我恐怕是不堪設想的。”^{④4}

湯姆斯·杰斐遜却对其結果很抱乐观。一八一六年他寫道，“我不是那些害怕人民的人，我們賴以支持永久的独立的正是他們，而不是什么富人。”⁴⁵

第七章

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三七年的 工会运动和劳工斗争

一八一九年到一八二二年的經濟恐慌甚至將那些在各种罢工运动和被誣告为有謀叛罪行后尚能坚持下來的工会組織也破坏無余了。失業变成了普遍現象；費列得尔菲亞及紐約市差不多有兩万工人沒有工作^①。一个在一八二〇年到达紐約的印刷工人曾寫道：“当我和我的家人來到这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有兩塊錢。整整八天我們只能吃面包黄油飲凉水过日子，沒有茶，沒有糖，也沒有肉。那些日子真是艰难極了。”^②

劳工的情况

政府官員沒有作任何努力去解除失業者的痛苦。在遙远的路易斯安那州，倒有一位杰斐遜派的民主党人爱德華·李文斯頓曾向州議會提出了一个关于办理公共救济的方案。他說：“一个政治会对它所有成員的人身、名譽和財產都完全有予以保护的責任；同时，它也有責任給那些自己無法維持生活的人以必需的生活上的帮助。”他坚持說，失業現象是那种使得市場商品过剩的不正常的工業發展的結果，而那些生產利潤的工人却“因此陷于飢餓状态或淪为公共慈善事業的救济对象”。因此，社会中其他的人及雇主們“如果偶尔不得不救济一下这些不幸的、作为創造社会的工具

的人們，是不应当抱怨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永遠不應當忘記：“對於社會成員生命的保存是首先的事，財產只能是次要的東西。我們能不能設想在任何一個公正的合同中規定說：為了使一方可以不折不扣地享受他們共有的全部的財產，他方應當凍餓而死？”^③但這些觀念對於路易斯安那州州議會來說，是未免太前進了。

富有的費列得爾菲亞商人馬太·卡瑞，在他的一本流布很廣的名為“對所有依靠雙手勞動謀生的人們的品格、行為、處境和前途問題……告全國富人書（第一篇）”的小冊子中，列舉了當時在上層階級中流行的關於窮人問題的全部“錯誤論點”：

“一、凡有能力工作並願意工作的人，不論男子、婦女或年齡較大的孩童，是都可以找到職業的。

二、窮人只要肯勤勞，能算計，知道節儉，就可以永遠過着舒適的生活，無需再依靠慈善團體的救濟——同時，根據以上兩點更可以推斷出：

三、他們的痛苦與窮困即非全部是也主要是由於他們自己懶惰、放蕩和奢侈的結果。

四、因此，為救濟貧民而抽的捐稅以及辦理慈善事業的個人或團體所給予他們的幫助都是有害的，因為他們這樣做是增強窮人們的依賴性，因而更助長了他們的懶惰和浪費的習慣，其結果則是更造成了或至少是增添了他們本意想去解救的貧困和痛苦。”

但是，工人階級的苦難和上層階級的冷漠無情卻已造成了一種如約翰·昆西·亞當姆斯所說的“普遍懷着不滿情緒的群眾”^④。這種不滿情緒，由於每隔數年對這個國家就再來一次工業的不景氣，因而人民就要再忍受一次痛苦的事實而更為加深。失

業在一八二九年又一次成为普遍的現象。“紐約商务廣告人报”的編者在那年一月寫道：“如果說过去的許多年也有苦难的話，現在的灾难無疑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深重了。”据“紐約时报”一个記者的报道：“数以千計的、过去从未要求过救济的各工業部門的技工現在也淪落到只得忍受屈辱乞求救济的境地，他們剛毅的兩頰上流着眼泪，自認实在無能賺得衣食以供养自己的家庭。”可是繁荣时期重新出現的时候，工人却仍得不到什么好处。一个当代的人曾說：一般的工人都是生活在“飢餓的邊緣，他們即使能幸而不夭亡的話，也無法为自己積蓄下养老的費用了；他們变成了依靠慈善机关救济的流浪者；最后是由教区化点錢把他們埋葬掉了事”^⑤。

一八二九年的不景气現象已过去了好几年之后，一八三三年八月曾有一篇極动人的通告，即“曼那永克工人告全國人民書”，对当时許多工人所处的情况描寫如下：

“我們的老板們强迫我們在目前这个季節里从早上五点钟起一直劳动到太陽落山，共十四小时半，除去半小时用早飯和一小时用午飯的时间之外，足足有十三小时要在一个对健康有害的厂房中辛苦工作；在那兒，縱然在我們感到悶热得透不过气來的时候，我們也永远呼吸不到一絲清涼的微風；在那兒，除了透过窗戶以外，我們永远見不到太陽；我們經常在呼吸着那充滿了灰塵和棉絮的空气，毀損着我們的健康、胃口和精力。

我們时常感到衰弱得簡直無力工作，因为被迫在又長又酷热的夏日还得在厂房里的不潔和腐敗的空气中从事極度緊張的劳动，晚上又只有很少的休息，完全不足以恢复那已經耗

尽了的体力，早上我們回到工厂來工作的时候，还是和下工离开厂时一样的疲乏；可是，我們还得要工作，虽然我們的身體一天天被磨損，一天天衰弱下去；不然，我們的家庭馬上就要挨餓，因為我們的工資是維持我們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够的。我們沒有能力儲蓄下一塊錢來以各有病或有其他困难之用，因為我們目前的生活需要，已耗尽了我們全部菲薄的收入；如果我們要是在牀上病倒几天，我們就真是陷入最深的苦难中了，結果便是全部破產、貧窮和依靠救济过活。

比起大多数别的工人來，我們的開銷恐怕是更大，因為需要全家每一个能工作的人（除了一个小姑娘照管家和預备飯以外）的收入來購買絕對必需品，結果，女人們沒有功夫給她自己和孩子們做衣服，自然，每一样用品都不得不到店鋪去買。”^⑩

至于不熟練工人的境况，那就更悲慘了。在拿破侖战争結束、谷价下跌之后，很多沒有專門技術的爱尔兰農民來到了美國。由于他們的財產为英國地主所剝奪，他們之中有好几千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而那些幸而找到職業的也只有五角錢到八角七分錢一天的工資，在运河和关卡道上那种非人所能忍受的环境下工作着。馬太·卡瑞曾对当时不熟練工人的情况評述如下：

“以千計的劳动人民，經常經過几百哩道路跋涉到运河上去找一个每天六角二分、七角五分或八角七分錢工資的工作，每周他們要化費一塊半到兩塊錢維持自己的伙食，依靠他們供養的家庭是被遺留在老远的地方了。他們时常要在那种極有損于他們健康的沼澤地帶工作，这种損伤往往是一生都永远無法恢復的。最后，他們帶着已經毀損了的身體和以極大

辛劳赚得的极少一点钱，回到自己穷困不堪的家里去，从比病倒在床上，再想去工作也不能了。每年都有成百的人就这样死去，其中很多人留下了人口众多的完全无法自给的家庭。可是，尽管他们的命运是如此的悲惨，他们留下的位置很快就又有很多人补充上去，死神的威胁他们也是顾不得的。”^⑦

一八二九年，由费列得尔菲亚素有声望的九十位妇女和一百三十八位男人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向陆军部呈递了一份请愿书，对于做军用襯衫的家庭妇女工作者所得过低的报酬表示抗议。他们说，现在的情况是，一个熟练的女裁缝从早到晚工作，一天最多也只能得到五角钱。况且，他们时常还无工可做。但陆军部的答复是，他们对于此事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密切地联系着整个制造业的利益以及费列得尔菲亚城中对于这类劳动的通行价格问题的”^⑧。

对于这类劳动的通行价格在其他城市中也是完全一样的。在纽约，妇女们做马裤，四分钱一条，棉布襯衣，五分钱一件。纽约有一个医师曾说：“即使整日不歇辛劳地工作，她们一天也最多能做三条马裤或一件襯衣。”伊力牧师在一八二九年时更说道，肯塔基、弗吉尼亚或田纳西的一个奴隶也能比纽约女工实际上获得“丰裕得多的报酬”。马太·卡瑞也认为，棉织厂里的工人工资还没有达到奴隶的水平，而“其中有很多工人倒是很快地在向着这个水平下降”。因为在这里，印刷工人、染坊工人和紡纱工人，在夏季从太阳出山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鐘，一星期也只能得到两块五角到两块八角钱。女工工资平均每周只有两块两角五分；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则只有五角钱^⑨。

工厂工人时常被迫要在厂里附設的商店里去購買东西，而这商店里的貨物的价格永远是高得荒唐的。事实上，工人们拿到的工資时常就完全是用公司購物券。結果，这些工人只能过着極端貧苦的生活。著名的十九世紀美國勞工統計学家卡罗尔·賴特曾經肯定地說：“很少工人能够保持不負債的情况，每逢結賬总是对工人们不利的。”^⑩到了失業的时候，他們得不到任何救济，却被命令回到他們原來的村子里或小鎮上去^⑪。

在窩尔坦、罗厄尔、罗凌士、多維尔和契科皮等地，女工們是住在由厂方租給她們的寄宿舍里。她們的生活永远受着嚴密的管制。寄宿舍的女舍監受命向厂方报告任何一个深夜不归的、不去教堂做礼拜的、或者在一起聚着發牢騷的女工們的名字。这些人会立刻被工厂解雇。

在厂房里，公司方面一样完全控制着她們的一切行动。大多数紡織工厂都有一条規章，那就是要女工們簽字保證，願意完全接受“公司方面为最合適的”工資而工作，并且“及时繳納公司方面所課的罰金”。而極小一点犯規章的事就馬上会受到罰金处分。有一条規則更直率地規定說：“召集工人上工的鐘每次先急敲五分鐘，然后緩敲五分鐘；在敲最后一响时，厂門即將关闭，任何人如欲請求重开，必須繳款一角二分半。”帕特遜城的工厂工人不断地訴苦說，雇主們“都完全采取一致行动，如果我們晚上班五分鐘，他們就要在我們一天的劳动所得中扣去四分之一”^⑫。據說由于这种罰金制度的結果，在帕特遜城的街頭，人們經常“看到小孩子們，有些年紀还非常幼小，在冬季嚴寒的清晨，手里拿着干面包片在風雪中奔跑，他們害怕，如果晚到几分鐘，就会惹怒了他們的老板，因而被解雇。”^⑬

女工們甚至被迫簽訂了在后來大家都称之为“黃狗合同”的契約，那上面訂明：“我們更同意不参加任何妨碍工作、或有損于公司任何一部門利益的团体；如果我們参加了，我們同意公司有权沒收当时我們应得的全部工資。”因为工資往往是一年發兩次，這項規定当然有相当大的作用*。此外，工厂老板們还建立了一种極狠毒的黑名單制度，任何一个女工，如果不能拿到她从前的雇主所發給的“正式离职証明”，便不可能在任何別家公司里找到工作。这种“正式离职証明”是只有那些工作已滿一年并未犯过“不服从”过失的人才拿得到的①。

以上这些就是在一八一九年經濟恐慌之后的几年中美國工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就是使得工会运动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期間再一次兴起的原因。更多的美國工人已經开始懂得：如果不团结起來，則他們的工資只能永远被压得很低，工作時間永远是从“日出到日落”，而生活的艰难只能永远繼續下去。如果团结起來，工人們就可以獲得比較合理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和較好的工作条件。

工人的覺醒

早在一八二三年，工人覺醒的迹象就已顯示出來。一八二三

-
- 在一些資金比較充足的工厂里，工資是按月支付，可是在多數工厂里，工資却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發一次。更有甚者是工資很少以現款支付；工人們經常只能領到一种只能在工厂附設商店購買物品的代用券。單身的工人，被迫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因此从他們的工資中还得扣除房租和伙食費，这样一來，能供他們自己化的也就所剩無几了。（見康斯坦司·格林：“一八六一年以前的輕工業及精密器械制造业之开始”，載哈洛德·威廉遜：“美國經濟的成長”，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二四三頁。）

年三月，一群新奧爾良的印刷工人在技工大廳開會，鑒於“同行兄弟們因不能從他們的老板那里按期領到工資而陷于困難的境地”，當即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⑤。不久，紐約、費列得爾菲亞、巴爾的摩、查里士頓、維爾民敦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各業工人也都組織起來，提出了他們關於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時的要求，以罷工作為威脅，強迫廠方答應他們的條件。

這些新的工會還保留着很多早期勞工組織的特點，但它們也有一些新的發展。早期的勞工團體稱自己為某某社或某某協會，但在紐約慶祝伊利運河開航的時候，却已有一個紡織工人工會來參加這次慶祝了。同年，紐約的女縫紉工組織起來並為提高工資而舉行罷工，這乃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全體女工”罷工。

木工、泥瓦工、石工、制帽工人、裁縫工人、裝配工人、碼頭工人、家具工人、制鞋工人和其他工人都各自建立了相當穩定的工會組織，並且領導了多次為提高工資而舉行的勝利的罷工運動。一八二七年費列得爾菲亞城各業工會組織了技工工會聯合會，這便是美國第一個全市性的工會聯合組織；這種組織已經認識到一切工人，不論屬於那一種行業，都面臨着一種共同的問題，必須大家作為一個階級聯合起來，同心協力才能得到解決。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八二〇年前民主會社及民主共和黨里的政治活動確實已經是美國工人運動的開始，可是從我們今天對美國工人運動的了解來看，我們也可以拿一八二七年費列得爾菲亞技工工會聯合會成立的時間作為美國工人運動的起點的。

費城技工工會聯合會是從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中產生的，這種運動在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五年的十年間正像野火一般在工人羣眾中開展着。至於這個運動本身，是在第一個永久性的工會

組織成立以前就已开始了的，因为早在一七九一年，費城的木工就已曾为爭取十小时工作日和額外工作時間的加班費而举行过罢工。我們不知道那次罢工的结果究竟如何，但我們确切知道它是美國工人在爭取縮短工时的斗争方面所走的第一步。

一八二五年，波士頓的木工們所举行的一連串爭取縮短工时的罢工运动中的第一次罢工开始了。这次罢工结果是失败了，但由于其敌对方面力量的性質很特殊，我們頗值得对这次斗争作一个分析。在这次罢工中，工人們第一次看到老板們和商業資本家們勾結在一起，集合一切力量，組織了一个巨大的反攻來对付工人們的任何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進行的运动，并利用各种虛伪無耻的道德理論來証明剝削的合理。他們告訴木工們說，十小时工作制对于工人本身是很不利的；因为它会“對我們的学徒們發生不良的影响，引誘他們逐漸去掉勤勞和愛惜時間的習慣，而这种習慣正是我們(老板們)急于要他們養成的”，同时它还会“使雇工們自己遭受到很多不良后果的誘惑并使他們養成浪費習慣”。老板們和資本家們說，工会組織不是美國应有的玩意兒。它是外國人从歐洲帶來的，那些外國人滿心怀着“一种不滿現狀因而亟思反抗的情緒，而这种情緒對於我們本國的技工來說，至今还是陌生的”。这些工人团体，如果讓其滋長下去，將會不利于社会中的各个階級，因為它們得使工商業發生一种人为的非自然的变化，并可能“使得工商業的各个部門都变成为独占企業”^{①6}。

这些话便是新英格蘭的几个为首的壟断資本家所說的——他們是那样全面地控制着建築業，他們可以威脅着要停止全季的建築工程，也决不会答应木工們每天工作十小时的要求的。

一八二七年春天，費列得尔菲亞的工人受到了一本未署名的

致該城技工及一般工人的小冊子的極大鼓舞。这本小冊子号召工人以斗争精神去求得“足够的知識”，以使普选制所包含的不可估量的福澤能变成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它并且特別推荐了一些办法，如办自由的劳工報紙、圖書館、閱覽室以及工人座談会等。最后，它在結論中說，但为要使工人能真正享受到这一切，那就必需在全市建立十小时工作日制度^⑰。这本小冊子出來后所產生的結果之一便是技工圖書館公司的成立，就在那年这个公司在費城出版了一种叫“技工自由报”的周刊，这是美國工人的第一种報紙。該报各期現在都还能找到。它的另一个結果是它鼓舞了木工們为爭取十小时工作日而举行了罢工。

費列得尔菲亞的木工們說：“他們相信所有的人都有他們的創造者所賦与的正当的权利，在較充分的时间中培养自己的智力和增進自己的学識。”費城其他行業的工人也把这次罢工看成是他們自己的运动一样，他們說，“千千万万的后代”将会从这里獲得好处的^⑱。这次罢工結果失敗，但它使工人們明白了只有所有的工人一致行动才能在反抗老板們的斗争中獲得勝利。因之，在一八二七年秋天，十五个工会团体在一起組織了技工工会联合会。根据該会会章的序言所說，它的宗旨是阻止“那些由于輕視人类劳动的真实价值而必然產生的陷入于悽慘境地的禍害；并把技工和从事生產的各階級提高到真正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他們的实际技能和創造性、他們对國家民族的無限功用和他們日益增長的智慧現在所迫切要求的。”

这篇序言确实是一篇不平凡的文件，它具有驚人的現代气味。

* 会章序言中“平等”誤作“不平等”，本書作者引用时注明系原文如此，今据本
書俄譯本改。——譯者

它肯定地宣称，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利于老板们自己，因老板们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应该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因为——序言说——高额工资能使一般购买力增长并引起普遍繁荣，而相反的，低微的工资则将引起普遍的商业上的停滞和衰退*；

“如果人民群众靠他们的劳动所得全可以使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充分享受到生活上一切舒适和便利的话，则商品的消费量，尤其是房屋、家具和衣服等，即将比目前增加至少一倍，那老板们所唯一依靠以维持其目前状况或积累更多财富的市场需求量当然也会以相等的比例增长……。因此——举例说——如果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在他自己和他家庭中每个人的头上戴上一顶帽，或预备下大量的质料最好的帽子的话，那真正得到实利的便是制帽商；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需要量——这种需要量是完全决定于大众的购买力的——是制帽商们所以能支付租金、维持他的全家过着舒适生活的唯一依靠……。”

从另一方面看来，如果工人的收入很低微，则“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便会因人民迫于无力购买而必然中止；其结果必定是商业

-
- 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的劳工文献都极强调这一主题。在威廉·高其所著的一本流传得很广的小书中，这一主题更得到精辟的发挥；那本小书“美国纸币和银行简史”（一八三三年费列得尔非亚版，第二七一—二八页）中说：“如果我们不是从全体人民现有的购买力，而是从他们的真正需要来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种有用的行业或职业中是都不会有过剩的人手的。举例说吧，受过正当训练的医师的数目对于我们人口总数来说决不会是已经太多了。但是，一方面有不少医生没有工作可做，而另一方面许多人由于付不起诊疗费而永远为病魔所苦。现在当绝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衣服和所用的家具都只能力求简朴的时候，我们就决不能说我们现在已有的制鞋工人、裁缝或家具工人都太多了。”高其是费城的一个进步的编辑，很积极于工人运动，并可能为技工工会联合会会章序言的起草人之一。

的蕭條，而虧本和破產的現象便必然到處發生”^①。

一直堅持到一八三一年的費城技工工會聯合會，一直把它大部分的力量都用於進行政治行動。它對於那日益高漲的勞工運動所做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它建立了一個把各業工人都團結在一起的一種榜樣。隨着這個趨勢前進的下一步的發展就是一八三一年新英格蘭農民、技工及其他工人聯合會的成立。

和費城技工工會聯合會一樣，新英格蘭農民、技工及其他工人聯合會也是爭取縮短工時鬥爭中的產物。雖然在那時紐約已經實行了十小時工作制，而且在費城這個制度也在某種程度上建立起來，但新英格蘭的工人仍然是從日出到日落地工作着。一八二七年，波士頓的木工和泥瓦工在爭取縮短工時的運動中獲得了勝利，而這運動却更繼續下去，向北面擴展到新罕布什爾州，向南面擴展至康涅狄克州。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波士頓實錄”曾報道說：“新英格蘭各地區都舉行了集會並通過了決議，以每日十小時工作，為今後所謂一天工作的具體數量。”在羅得島的普羅維頓斯，由於這一個集會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呼喚大家發起一個運動以團結“土地耕耘者、技工以及各業勞動者來推翻那些懶惰的、貪婪的貴族們的壓迫”的號召。

一八三二年二月，新英格蘭聯合會在波士頓召開第一次大會來制定會章。其條文之一規定：除了實際自耕農以外，所有會員都必須保證每日只工作十小時而不容許有任何工資上的折扣。由於這個條款簡直不可能實施，該會聚集了一筆鬥爭資金以救濟任何一個為遵守條款而遭到失業的會員。但是，這筆鬥爭資金，和資本家們用來破壞波士頓造船木工們為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罷工運動的為數兩萬元的款項比較起來，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看到這種

直接由工会活动去争取缩短工时的企图受到阻碍后，新英格蘭联合会便轉而采取政治行动。警戒委员会在各州組織起來，搜集各种有关劳工情况的材料，并向各州議院呈遞請願書，要求它們“根据联合会所决定的标准”來調整“工作時間”。开过四次大会之后，新英格蘭联合会把它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來進行政治活动。它对于美國工人运动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它第一次企图把所有的工人群众——工厂工人、一般劳工及熟練技工——都包罗在一个單一的組織里。这个联合会的創建人們相信，真正的工会組織就应当“包括每一个依靠他自己一天的劳动为生的全部人民，不論他是最高級的藝術家或最低級的劳工”。这些人——如在罗得島發行的一种劳工周报“新英格蘭技工”的編輯查理·道格拉斯博士、該报的“巡行代理人”塞斯·路得，以及工会領袖約翰·埃尔得萊琪和小塞米尔·惠脫康姆——都对于全体工人的團結有高度的信心；当他們強調說“新英格蘭一个市和每一个郡的工人都有組織起來”的必要时，他們指的是各种行業的工人^②。

联合会的領袖們曾希望大量吸收工厂工人，因为这些工人，就他們目前的斗争性看，似乎是頗有向工会組織方向發展的可能的。一八二八年，当新澤西州帕特遜城的厂主們想要把午餐時間从中午十二点改到下午一点的时候，工人們，其中多数是兒童，举行了美國第一次有紀錄的工厂工人罢工。一个观察家曾說：“对于这次罢工，兒童們是不大贊成的，因为他們怕如果他們表示了同意，他們馬上便会根本什么东西都沒得吃了。”^③ 國民兵被調出來鎮压这次工人的“騷动”。不久在同一年中，新罕布什尔州多維尔城有四百名紡織女工举行了罢工，当她們在城中游行的时候，她們高声問道：多維尔的女工們有誰能“忍受得了那种令人駭异的奴隸的遭

遇”？^②

新英格蘭聯合會成立后不久便指派專人向工廠女工們講解工會運動的理論。但他們想把婦女們組織起來的努力并未成功。雖然該會要想把工人吸入到工廠組織中來的工作完全失敗了，它却讓一般人都注意到了工廠中那種地獄似的情況，同時它更發動了一個要把工人們放在國家法律的監督和保護之下的運動，該會并公開對那種強迫小孩子們在工廠工作、使他們“毫無時間得到體力上的休息及智力上的增進”的現象嚴加攻擊^③。

聯合會對於工人運動的最重要貢獻之一便是它出版了該會領導人之一塞斯·路得所作的一篇對工人的談話。路得可以說是第一次勞工運動中的湯姆·潘恩，他的“對新英格蘭工人的致辭”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期間變成了一種廣泛流傳的讀物。這篇談話一方面號召大家採取行動，一方面又對那種可以說對“獨立宣言”是一個莫大諷刺的新英格蘭工廠的情況作了一種極透澈的分析。路得寫作這種充滿了感情的分析性的文章的目的，是為要使大革命時期的種種理想能夠復活起來。

他首先講述了大革命戰爭時期那些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所經歷的痛苦和困難。當我們在書本上看到“那些愛國主義者的無盡的熱忱和不倦的努力時，我們感到我們有責任敲起警鐘，讓大家注意到，現在我們的權利不僅是遭受到危害，而其中有某些權利已經被強大的無人性的獨占資本的魔掌從我們手里搶奪去了”。他說，那些壟斷資本家們，現在是正在勸說美國人民學習英國的光輝榜樣。他明白地指出在那種君主政治光輝的外殼下，英國是有半數的人口在飢餓綫上掙扎的。童工的悲慘遭遇，工人們的天亡、愚昧，各種邪惡現象的存在與普遍骯髒的環境——難道這就是工廠主們所

希望搬到華盛頓、瑞微耳和華倫的土地上來的東西嗎？

“一群正在盡他們的一切可能以求降低我們人民的工資，派遣無數代理人到歐洲去招致外國人來到這里使他們在低于美國公民所要求的工資標準下來工作，來支持美國的工業和美國的制度的人們，現在却是整日在喧嚷着愛國主義。”在描寫了“被稱之為棉花紡織廠的新英格蘭監牢”中的情況後，路得說：“我們不相信在群山東邊的那個地區有任何一個人會因被允許進棉花紡織廠工作而感謝過上帝。”

結束這種類型的“美國制度”而以另一種“教育與知識普遍傳播，每個人都能獲得對生活和自由的享受”的美國制度來代替前者的時機已經來到了。工人們只有在共同努力和全體組織起來的情況下才能使這個新的制度得到實現。經常維持着一定的組織“以保護他們自己的高貴的尊軀使其免于危險”的那些擁有大量財產的人們，對於窮人們尋求正義的努力却發出了瘋狂的喊叫，稱他們的活動為“最可怕的陰謀組合”。然而這種濫調是從前早已有人使用過了的。“‘獨立宣言’就是這樣一種組合的產物，它在當時的賣國賊和英王黨人的眼里，其可痛恨的程度，是現在那些貪婪的壟斷資本家及鈔票貴族們眼中的工人之間的結合完全一樣的。”

路得的談話結尾說：

“全市的同胞們……農民們、技工和一般勞工們，我們對於這些災難已經忍受得太久了；所有的政黨都欺騙了我們；我們必須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業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驚醒起來吧。我們的事業是維護真理的事業——是合乎正義和人性的事業。它必須得到勝利。讓我們下定決心，決不再受那些人的欺騙了，那些人他們自己不生產任何東西却享受著一切，

他們侮辱地稱呼我們——農民、技工和一般勞動者——為下等人，却耀武揚威地要求我們尊敬他們，因為他們是上等人——而‘獨立宣言’却明明肯定說：‘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²⁴

路得的這篇談話很快地印行了三版，當時並有人計劃專為歐洲的工人們印行一種特別的版本。從緬因州到費列得爾菲亞，工人們都為他的恢復革命時期各種理想的號召所激動。當工人們聽到他的聲音的時候，正是他們在直線上升的生活費用下呻吟喘息的時候。物價指數從一八三三年的九〇·一上升到一八三六年的一一五·七。然而熟練技工每周所得平均工資僅為四元到五元，棉織廠的工人則每周為二元一角九分至二元五角三分，在家中工作的女縫紉工則每周為一元至一元二角五分，麻薩諸塞州有數千婦女在家中做繡鞋工作，每天所得竟低至二角五分。不僅如此，大多數工人的工資還都是以州銀行所發行的鈔票支付的，這種鈔票在購買商品或繳納租金時每元實值只等於五角錢²⁵。

路得的小冊子加強了美國工人要團結起來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決心——這種決心更由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歐洲革命火焰的燃燒而爆發。特別是一八三〇年的法國革命使得他們開始相信工人是“他們自己的自由的主人，只要他們盡力去爭取，並彼此進行合作，他們便一定能得到自由的”²⁶。一封紐約技工和一般工人們給巴黎工人的信曾宣稱：“工人伙伴們！我們以無限感激的心情感謝你們。感謝你們的不僅是我們，而是一切勤勞的階級——各個國家的人民。你們在保衛自己的權利時，同時也是在保衛我們的權利。”²⁷

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勞工運動的浪潮在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七

年之間高漲起來。在這段時期中，工人的組織以該世紀內絕無僅有的速度在發展着。工會會員數目從二六,二五〇人上升到三十萬人。在紐約城便有一一,五〇〇名工人加入了組織；這數目几達該城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在紐約、費列得爾菲亞和巴爾的摩，已經有一五〇個以上的工會組織成立了。同時，工人運動已經不再只限于大西洋沿岸各地。在布法羅、聖路易、匹茲堡、克里夫蘭、辛辛那提、路易斯維，以及一些從早期的邊緣地帶發展出來的各地區^{②8}，工人們都在組織工會了。

一些從來不曾有過組織的工資收入者，包括泥瓦工、雪茄烟工人、女縫紉工、手織機織布工人及女帽工人，現在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工會并开始進行罷工活動。從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七年的四年間，在全國範圍內，共發生過一百六十八次罷工事件。其中，有一百

-
- 早期工人運動對於國際的自由鬥爭表示關懷的例子是費列得爾菲亞印刷業工人會於一八二七年捐款九十元幫助希臘人民的獨立戰爭。（見喬治·特萊西：“印刷業工會史”，第五五頁。）

一八三四年九月十三日，紐約的“全國總工會”一報刊登了法國南特城的工人致英格蘭總工會的一封信，建議“聯合各國的工人們”。這個工人的報紙對此建議表示慶賀。它宣稱：“這是世界上所曾發生過的運動中的最重要的一個運動。從這個運動出發，我們將在很多一向彼此懷着敵意的國家之間建立起團結及和睦的關係來。維護勞工利益是所有的工人都抱着同一個意見的問題……我們可以預料，文明世界中每一地區的工人階級將在一種牢不可破的基礎上團結在一起的日子已不會很遠了。”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國際勞工團結的最實際的例子也許要算一八三二年紐約印刷業工人會所採取的一次行動了，該會曾派遣了一個代表去訪問英國的印刷業雇工工會，并警告那里的會員們叫他們不要相信英國報紙上所登的宣稱在紐約城“千百個印刷工人都能找到高額工資的職業”的廣告。這個代表告訴英國的那些工會運動者說，他們在這裡所要的印刷工人是要拿去作破壞罷工的工具用的。（見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波士頓郵報”。）

零三次是为了提高工資，二十六次是为了十小时工作制，四次为了爭取建立关门制度。建築業的工会——木工、砌磚工、石工、泥瓦工和油漆工——罢工共三十四次；制鞋工人或皮革工人罢工二十四次，其余的罢工則分別由縫紉工人、制帽工人、面包点心工人、水手、制繩工人、印刷工人、石器工人、政府兵工厂里的技工、制革工人、玻璃裝配工人、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及其他工人等所举行^⑳。

妇女們也“卷入到爭取自由的狂焰中去”。麻薩諸塞州林城的女綉鞋工人，在她們組織自己的工会时說：“同男子們一样，妇女也有某些决不容被人剝夺的权利，其中之一便是随时有可以平靜地集会在一起商討有关公共利益諸問題的权利。”另外一群女工則說：“除了本城技工們最近勝利地采用的办法以外，我們想不出还能有任何別的办法使我們獲得解救。”^㉑ 新英格蘭、紐約、費列得尔菲亞和巴尔的摩的女成衣匠、女縫紉工、女雨傘縫紉工、女裝訂工、女綉鞋工和女皮革工都联合起來保衛自己以使不受到“由于減低了工資和原就不足的工資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灾害”。

工厂里的女工也在前進着了。真正說起來，工厂女工乃是那时期最勇敢的战士中的一群，因为她們不但必須和她們的雇主們進行斗争，同时还要和当时反对妇女参預公共活动的極強烈的偏見進行斗争。有一个作家陈述說：

“美國‘年青的妇女們’在初期的运动中，为了推進黨工策略，竟能公开反抗公共輿論，这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那时候許多人都認為年青的妇女們决不应当抛头露面跑到大街上去游行。然而，她們不顧一切責难，也不管社会習俗是否許可，为了保衛她們所要求的标准，她們仍然决定要这样做了。”^㉒

当工厂主們在一八三四年減低工人工資时，新罕布什尔州多維尔城的女工們首先公开反抗社会習俗，發动了一次有七百人参加的游行，她們把隊伍开到法院附近，在那兒，这些“自由人的女兒們”起草了一个声明，宣称：“尽管所謂‘工厂奴隸’这一类稱謂是随意地加在我們的头上，我們自己是永远不会真把自己看成奴隸因而無耻地搖尾乞憐地在那自以为使人耀眼的財富和神气活現的傲慢前面屈服的。”罢工結果是失敗了，但女工們拒絕再上工厂，而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她們募集了一些錢給那些住家离工厂远的同伴們做盤纏，又給“反对在我們的工厂里建立奴隸制度”的編輯們送了一份呼吁書，要求他們劝告別的女工們不要上多維尔來做工^②。

当一八三四年初，麻薩諸塞州罗厄尔城的工資被減低了百分之十五的时候，女工們曾举行了几次抗議性的集会。几天之后，这个运动的領導人被解雇了。当她离开工厂的时候，她却揮动着她的帽子对那些在窗口注視着她的人們發出信号。她們立即罢工了，集合在她的周圍，一个八百人的隊伍在城中开始游行了。在听取她們的領導人之一所作“狂热的、瑪丽·華尔斯顿克萊夫特式的关于妇女权利及有錢的貴族階級的橫蛮行为的講演”之后，她們決定“將不惜以生命作代价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在她們罢工的第二天，这些罢工的工人們發表了一篇題为“團結就是力量”的宣言：

“我們这里發出的這張傳單，希望得到一切承受了我們祖先的爱国精神的人們的支持，我們的祖先寧可忍受窮困也不願被奴役，并且为了他們子孙后代的独立，不惜舍弃一切使生命有保存价值的美好的事物以至他們的生命本身。”

有一千二百多名女工响应了这个运动，参加訂立了“除非我們

的工資能恢復原來的標準，我們決不回廠工作”的誓約。她們更彼此宣誓：“除非僱主們要我們全部回去，任何個人決不單獨去上工。”^{③③}

這次罷工仍遭到失敗。許多羅厄爾的女工回到自己的農庄上去，但那些留在工廠里的工人却並沒有因為失敗而從此氣餒。當工廠主們在一八三六年把工資再度減少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的時候，一千五百名羅厄爾女工再一次舉行了罷工。她們在罷工示威遊行時唱道：

啊！多麼不幸啊！像我這樣一個漂亮的姑娘，
竟會被送到工廠中任其憔悴地死去？
啊！我不能做奴隸；
我決不願做奴隸，
因為我是這樣地熱愛自由，
奴隸生活不是我所能忍受的^{③④}。

這一次，女工們成立了一個擁有二千五百名會員的工廠女工協會。她們在她們的議決中通知工廠老板們說，除非經過她們會里的負責人，她們任何個人將不會和老板有任何接觸。她們是“自由人的女兒們”，不能允許暴虐的工廠老板們完全控制她們的生活。她們宣稱“一如我們的祖先不惜浴血苦鬥以抗拒英國統治者無饜貪婪一樣，我們，作為他們的女兒，永遠也不會套上那給我們預備下的鎖鏈”。她們寧肯死在救濟院里，也不願“對那企圖加在我們身上的殘暴的壓迫讓步”。罷工堅持了一個多月之久。由於她們被攆出寄宿舍，同時又沒有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女工們被飢寒所迫，終於只得屈服^{③⑤}。

其他地區的工廠女工也“起來追隨着她們羅厄爾的漂亮的姊

妹們”行动起来。当阿姆斯特伯利的女工們被命令以同样的工资却要看管兩架織布机的时候，她們停止了工作，一起到浸礼会教堂里开会，她們选举了理事并通过了一项決議，大家保証在这种高速度化的措施取消以前，任何人都决不回厂工作，否則自願“罰金五元”。据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波士頓每晚实錄报”报道：“資方代理人看見她們已决心要坚持下去，只得寫了一个書面通知，告訴她們可以回去工作。”这次罢工是勝利了。

这些斗争虽然很勇猛，但因为沒有穩固的工会組織，都沒有能够繼續坚持下去。虽然雇主們并不十分害怕这些活动，他們实在想不出多少对付的办法來。罢工的領導人被加以“叛乱”罪名而解雇，厂主并把他們的名字送到其他的厂主們那里去以使他们不能在别处找到工作。

有一些工人也对于妇女走到工業圈子里來以后她們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抱着敌視的态度，理由是男工的工资因有了女工而降低了。但很多工人却贊同塞斯·路得在其談話中所指出的：“毫無疑問，除非讓所有的妇女們都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就不可能希望达到任何一个我們所想达到的目的。”^{③⑥}因此，当一八三四年林城的女綢鞋工工会为爭取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的时候，她們便獲得了男制鞋工人工会的支持，該会替女工們募集了一批罢工資金；同时，更重要的，他們并决定將不为任何拒絕滿足女工要求的“制鞋工厂的老板們工作”。他們甚至吁請林城及其附近市鎮中的公民們拒絕購買那些工厂里的商品^{③⑦}。

費列得尔菲亞的雪茄烟制造工人雇工会对于本行業的女工成立工会組織一事極表欢迎，他們在一八三五年決議說：“雪茄烟制造業中的女工从过去一直到現在所得的这种低額工资是远低于她

們付出的勞動力所應得的報酬的，因此決議，勸告她們和我們團結在一起共同舉行罷工，使互相幫助維護彼此的權利以成為雙方共同的利益。”^⑧

一八三六年，費列得爾菲亞城的男制鞋工人工會和女編鞋工人工會——雖然兩者在組織上并非聯合在一起的——同時舉行了罷工。男工們宣稱：“雖然他們（老板們）可能忘記他們還有母親這回事，但我們已決定把她們放在我們的保護之下，和她們共榮辱同甘苦。”他們并宣稱，即使他們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如果女工們不能獲得勝利，他們仍將拒絕工作^⑨。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期間，工廠工人和熟練技工也常常採取合作行動。最好的例子便是一八三五年夏季帕特遜城的大罷工事件。七月三日，帕特遜城紡織工廠的童工們為要求實行將工作時間減短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工作十一小時、星期六工作九小時的決定而罷工。另外一些使他們罷工的原因是：他們反對以商店購物券支付工資的制度，反對惡毒的罰金制度和過期不發工資的現象。到月底的時候，罷工童工們的父母和監護人組織了一個“帕特遜工人階級保護會”。他們向鄰近城市的工人呼喚，請他們予以支援。

紐亞克的工人立即起來響應了，他們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征集基金，并另外派遣了一個委員會，到帕特遜來調查情況。調查人員報告說，帕特遜城工廠的情況“雖然存在於現代這個時期，却完全是屬於中世紀黑暗時期的東西，最適合於它生存的土壤應該是沙皇陛下和俄國的貴族老爺們所在的地方，但不幸它現在存在的地方却是這‘自由人民的土地和勇敢人民的家園’，這個自豪地號稱為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避難所的土地上”。紐亞克的技工們鼓勵罷

工工人坚持下去，直到胜利为止，并答应继续给予他们以经济上的支援。同样地，纽约的工人也给这些罢工工人以金钱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

帕特逊的工人在这些鼓励和帮助下，坚持下去一直到老板们不得不同意减少工作时间——每天减少一小时半到两小时。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定为六十九小时，前五天每日十二小时，星期六则为九小时^⑩。

这种工人阶级间的互相关怀很快就发展为劳工阶级在组织上的团结。因此，虽然技工工会联合会的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它的精神却仍在继续前进中。

城市总工会

在一八三三年五月中旬前后，纽约的木工雇工们为要求将工资从每日一元三角七分增加为一元五角而举行了罢工。在两个星期内，便有好些其他行业的工会通过了表示同情的决议，并且筹集了一千二百元的款项来支援他们。有了这些帮助，木工们坚持罢工达一个月之久。结果，他们争取到从三月到十一月每日工作十小时、工资为一元五角，其余时间每天则工作九小时、工资为一元三角七分。在这种通过工会的团结因而能获得胜利的鼓舞下，印刷工人们便号召技工雇工和各业工匠们来一起组织一个总工会。在一八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纽约总工会便成立了^⑪。

其他三个城市，巴尔的摩、费列得尔菲亚和华盛顿，也于一八三三年分别成立包括多数行业的工会联合会。第二年，波士顿成立了一个中央劳工协会；一八三五年和一八三六年两年中，在阿尔巴尼、特洛依、斯刻涅克塔狄、匹兹堡、辛辛那提、路易斯维、新布倫

威克和紐亞克等地區也成立了八種工聯組織；因此，到一八三六年年底，美國至少已經有了十三個全市性的工會聯合會組織。在那時很少國家能像美國那樣有那麼多的工會環繞着一個核心組織成立起來。

這種組織一旦形成，它們就迅速地發展起來。費列得爾菲亞工會聯合會* 在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剛成立的時候只包含三個會社和不足四百名的會員；但到一八三六年四月的時候，它就共有五十個會員會社，總的會員人數達一萬名。在這些會員中包括普通工人、工廠工人和熟練技工。

這個工會曾宣稱：

“為了本會本身的利益，本會對於所有的人，都同樣表示歡迎。不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只要他是一個工人，只要他贊成從有錢的資本家的奴役下解放出一切勞動人民，我們便歡迎他加入我們的隊伍。我們對於入會會員並沒有任何出身或門第的限制，更不需要任何表記或證明。”^{④②}

為了提高工人們的一般福利，聯合會曾從事很多種的活動。聯合會的巡行代理人四出幫助各地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成立隸屬於本聯合會的地方工會。費列得爾菲亞聯合會的組織者在一次對全市工人發出的通告中，曾稱工會聯合會為“每一個技工都有機會學習到如何來保衛和守護自己權利的一個學校”^{④③}。

有一些聯合會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報紙；另外一些則竭力支援那些在當時對工人採取友好態度的報紙。當它的會員工會在舉行罷工的時候，這些工會聯合會便以抵制廠主的商品，或直接予以

* 費列得爾菲亞似乎曾有过兩個工會聯合會的組織，一個是工廠工人們在一八三三年八月組成的，另一個則是一八三三年十一月由熟練雇工們組織的。

經濟援助的办法來支援它們，有时候兩種办法同时采用。一八三三年，巴尔的摩的联合会曾以抵制商品办法，对付过那些拒絕支付較高工資的帽厂老板們。該会宣称說：这些老板們，現在所表現的正是和当年那种“產生著名的印花稅法案和茶叶法案”一样的無饜的利慾和貪婪^④。一个城市的联合会时常还帮助別的城市的人。紐亞克的工会联合会曾支援过一八三五年費列得尔菲亞手織机織布工人所举行的罢工。

紐約总工会有很嚴密的組織。它有它自己的机关刊物——“团结”，这是一种为了回答反动派的攻击而举办的日报，反动派攻击說：工会所主張的是采取“叛乱和暴动的行动”，“工会的領導人是外國人”，并且“滿足自身的升官發財的願望是一切工会領袖們的目的——無所事事与悠閑自在是他們整个生活的特点”^⑤。总工会同时設立了一个罢工基金委员会，以后在經濟上支援會員工会并作發起抵制运动之用；每当罢工时期，它便和全國各地的工会联合会取得联系，以防止其他地区工人來到这里接替罢工工人的工作。由于这些活动的結果，紐約的工人獲得了多次的勝利。紐約成衣工人工会，因为得到了市总工会的經濟上的支援，一八三三年十月他們在爭取增加工資的运动中獲得了很大的勝利^⑥。兩年以后，紐約雇主們所組織的一个委员会以無限的驚异宣告說：

“不同行業的工会已經联合起來組成了所謂的工会联合会，只要有任何一个行業的工会为爭取提高工資而罢工的时候，其他各个行業的工会便起來給以支援。在过去的一兩年中，印刷工人、木工、制帽工人、成衣工人、以及我們相信还有一些別的行业的人，都曾在‘罢工’运动中得到了勝利。”^⑦在十多个城市中已組織了劳工运动的核心組織，这一事实說

明美國勞工運動從此有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這些聯合性質的工會成立以前，任何行業的工人舉行罷工，他們只能依靠其他的工會偶而通過一項決議給他們一些經濟上與道義上的援助。但現在任何一群工人如舉行一次得到聯合會認可的罷工，他們肯定可以獲得一定的支援和經濟上的幫助。

全國性的勞工組織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初期雖然區域性的工會聯合會仍舊是工人團結的主要媒介，但那時已有人開始了建立全國性組織的努力。由於運河和鐵路綫的發達而產生的較好的交通運輸條件，使得老板們更容易通過互傳黑名單以及從別的工業區域運來工賊的辦法以攻擊地方性的工會組織。因此很多工人都認為，既然僱主們不得不和其他城市的工廠老板們競爭，而那里的工人可能都只拿很低的工資，一天却要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時，所以要想讓僱主們答應給他們較高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相信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將“使全國各地的工資能夠尽可能保持在同樣的水平上，並可以保證那種為達到我們的目的和維護正義所必需的各地工人迅速採取一致的行動。”^{④8}

於是，在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三六年之間有五個行業——皮革工人、印刷工人、梳機工人、木工和手織機織布工人——都建立了全國性的組織。其他的行業也還有作過同樣的努力的，但結果都失敗了。其中有一次值得提一下的，就是一八三六年十二月費列得爾菲亞的紡花與紡毛工人協會曾對“美國全國工廠工人”發出了一個號召，希望大家團結在一起，組織一個全國性的工會^{④9}。

三十年代所組織的全國性工人組織並沒有能夠堅持很久。在

那时发动这个运动还为时过早，因为虽然市场是不断在扩大，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市场。在全国性的市场出现以前，全国性的劳工组织是不可能真正得到稳定的，因为工会运动不可能超越国家经济发展的限度以外去发展。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联盟——全国总工会——的遭遇便是一个例子。全国总工会是在一八三四年三月开始组织的，那时由纽约总工会发出通知，邀请全国各地的劳工核心组织，请它们派代表来出席在纽约城举行的一个全国代表大会。

迟至八月，波士顿、布鲁克林、坡啓普息、纽亚克、费列得尔菲亚和纽约的代表们都聚集在纽约市政厅举行会议，因而成立了全国总工会。按照召集开会的通知上说，他们所以召集这个会是因为“那种在最初促使我们把各个行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成各种会社的情势——即我们所处的无力的状况——同样地促使我们在下一步必须把各种行业的会社组织成工会联合会，而这一步骤必须在美国全国境内得到实现。到了那时，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就会得到全国所有其他工人的支持，而全国工人聚集在一起的财富和力量就将足够抵抗任何最凶猛的敌人”⁵⁰。

这个希望却永远没有能够实现，因为那时那个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从中产阶级的改良派中间来的，他们的一切救世良方是把最后的目标来代替当前的需要，以致于完全和现实脱节。自然，正如大会代表所已经认识到的，到底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来说，总是一件极新鲜极重要的事。费列得尔菲亚的代表团在它的报告中说：“撇开这些对于各种策略的建议和讨论，也许有人会问，‘大会到底做了点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回答：‘大会成立了团结全国劳工的总工会。’难道天下还有那么不聪

明的人，竟要追問團結有什麼用嗎？”^⑤

從此美國工人第一次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發言機構，在全國總工會存在的三年中，它在各種問題上為工人說話，例如工資與工時問題、幣制改革問題、國民教育問題*、工廠法規問題、勞役犯人問題以及自由土地問題等。該會說，僱主們如果贊同十小時工作制，他們是並不會吃虧的。“在體力勞動方面素有經驗的技工和其他的工人都完全知道：極端有害於工人健康的連續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的強烈的體力勞動，對於僱主來說也是並沒有什麼特別好處的；就是說，總起來講，每天工作十小時的工人所做的工作實在比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工人所做的差不多。”^⑥ 該會並指派了一個委員會去專門收集當時流行的各種不同工作時間所產生實際效果的材料，以作為要求立法機關規定十小時為法定工作日的根據。並另設了一個委員會去着手擬訂第一個關於女工工會的策略。該委員會最後發出一個通告，号召男工們接受女工參加他們的工會或讓

- 一八三五年，全國總工會敦促所屬各單位在各城、各鎮和各村“為了技工和工人的方便和利益”，發動建立圖書館的運動。這就是在美國最早要求建立公共圖書館的呼聲之一。

同時，工人們還不能滿足於只是發動創辦公共圖書館的運動，在有些城市里，工人們自己通常是在鄰近的工會組織的主持下——建立了圖書館和閱覽室。在費列得爾非亞，一個加強工人階級教育的會社在一八三五年建立起來，其目的“不但要使工人們對一般的問題都能夠有一些正確的了解，並且要使這個供給人類生存源泉的階級知道他們的苦難是從那裏來的，應如何去解除它”。在紐約州羅徹斯特城，當地的工會組織于一八三六年成立了一個工人文化協會。宣傳這個協會成立的通告中說：“我們大家都知道，勞工階級多少年來都習慣於向有學問的人們求教，希望從他們那里得到如何治理國事或如何處理人事的各種必需的知識，但是，並不需要很敏銳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出來，任何的統治者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見一八三六年一月三十日及四月十六日“全國總工會報”。）

她們組織單獨的工会“使兩方互相輔助”，这样，“当困难發生的时候，她們就可以遵守共同的規章而便于得到他們的支援”。这一通告同时对上層中產階級的妇女予以無情的攻击，因为这些妇女对于“她們自己受压迫的同胞姊妹”^④的福利远不如对于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这件事來得关心。

十小时工作日

在一八三五年的大会上，全國总工会曾提議：当雇主們联合起來抗拒工人的要求的时候，各市的总工会应当号召一个全市总罢工。但这个計劃，却始終只限于紙上談兵。可是，就在那一年，費列得尔菲亞却經歷了美國第一次全市性的总罢工。

这次罢工是由曾經在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三二年兩度为爭取十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的波士頓木工們所推动的。這兩次罢工都失敗了，因为面对着雇主們的联合势力，又因为工会中有很多小雇主抑制住工人的斗争性，工人的隊伍竟被分散了力量。受到这次教訓以后，木工、泥瓦工和石工們在他們一八三五年举行的爭取十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中，乃夺回了掌握在小雇主們手里的罢工領導权，而选举了塞斯·路得以及另外兩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作为領袖。他們立即印發通告，說明他們的要求，并呼呀各方面的援助，同时还派遣了一个巡行委員會去訪問別的城市。但尽管已經运用了这些新的策略，尽管已經得到了其他城市的很多工人的援助，木工会的主席曾寫道，他們仍不得不“承認我們是失敗了，我們的最醉心的希望和我們最热切的要求完全沒有能够得到實現”^⑤。

廣义的說，这次罢工是並沒有失敗的，因为那使得波士頓最后終於實現了十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实是由这次罢工开始的。它的充

滿勇氣和愛國精神的罷工通告更鼓舞了美國全國的工人，這通告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在這種迫使工人們耗盡全部體力和智力的骯髒的、殘忍的、不合理的和暴虐的制度下，我們已經被折磨得太久了。我們有權利和責任要求保持我們的美國公民和社會成員的身分，這就不允許我們花費十小時以上的時間作為我們一天的工作。”^⑤

凡是這份波士頓通告傳誦之處，那里便掀起了為爭取十小時工作制而舉行的罷工*。最後，它更幫助發動了偉大的費列得爾菲亞總罷工；這次總罷工是以斯庫基爾河煤船碼頭上的愛爾蘭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和實行十小時工作制的罷工開始的。這些工人的戰鬥性是如此強烈，竟沒有任何工賊敢於來接替他們的位置。“以一個手執利劍的人為領隊，三百名工人沿着運河游行示威，對於任何敢於在那正等候在河邊的七十五艘船上卸下或轉運一塊煤的

-
- 費城木工工人會的主席威廉·湯姆生告訴塞斯·路得說：“木工們認為波士頓通告打碎了他們身上的鐵錐，解開了他們身上的鎖鏈，並且把他們從迫使他們過度勞動的殘酷的桎梏下解救出來了。”通告中有一句特別引起了各地工人的熱烈響應的話是：“我們以我們祖先洒在獨立革命戰爭戰場上的血為名，要求我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應有的權利；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敢於公然地反抗我們這種正義的要求的。”（見塞斯·路得“在慶祝美國獨立六十周年時對布魯克林城技工和一般工人的演說”，一八三六年布魯克林版，第一八一—二〇頁。稿存費城圖書館公司。）

各地的工人對於波士頓工人在舉行爭取十小時工作制的罷工時所說的這句話是都表示贊成的：“在這種舊的制度下面，我們是沒有時間在智力上提高的——而這正是大老板們的政策——他們竭力用讓人民永遠忙於工作的辦法來使人民永遠停頓在愚昧無知的狀態中。”（見一八三五年四月十七日“波士頓郵報”。）

人，威脅着不惜和他們以性命相搏。”⁶⁶ 波士頓通告在总罢工开始号召时就由費列得尔菲亞总工会重印并分發到工会的各个集会中去。在这一通告的鼓舞下，行动起来の呼声响遍了全城：

罢工吧，直到最后一个武装的敌人躺下，

罢工吧，为了你們的神壇和你們的家；

为了你們祖先的草色尚青的墓地，

为了上帝更为了你們的祖國罢工吧⁶⁷。

每天都有新的工人組織参加运煤工人的罢工运动，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实现。房屋油漆工人举行了會議，他們嚴厉地指責“現行的这种劳工制度，認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違反正义的——它破坏了人們的社会幸福并侮辱了自由人的称号”⁶⁸。

沒有多久，所有的工会都行动起来。制革工人、印刷工人、木工、磚瓦工、泥水匠、市府雇用人員、搬运工、运煤工、油漆工、面包工人和綢緞呢絨店的店員們，吹着号击着鼓四出游行示威，他們高举着各色的旗帜，上面寫着“从六点到六点，十小时工作，兩小时吃飯”。一个名叫約翰·費拉的費城工会运动的領導人說，当我們進軍到“各公立工厂的时候，那兒的工人們馬上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工作停止了，一切交易全陷于停頓，襯衫袖口卷着，工作裙仍圍在身上，工作的工具依然拿在手中，这一切代表着那一天的整个情况”⁶⁹。

六月六日，在州議会的庭院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在这里，工人、律師、医生和一些商人也都來表示意見，認為工人們十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是正当的要求。这个會議一致通过了几条決議，以对于一个已經同意了十小时工作制的企業老板表示贊揚；它以全力支持工人們所提出的增加工資的要求；它提出了增加女

工工資的要求并鼓勵運煤工人繼續罷工。此外，該會更號召所有的公民起來抵制任何一個強迫工人工作十小時以上的煤商。在休會之前，它發表了一個極動人的聲明說：“本會議確信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骨幹和中堅；而且……我們的光榮與自由的制度的穩固和永存是完全有賴於他們的健康、美德和幸福的。”^⑩ 在這個全體市民的聯合戰綫之前，老板們只得屈服了。約翰·費拉曾寫道：“這些吸盡人民膏脂的貴族們……完全嚇呆了；在極端恐怖的情緒中，他們以為最後審判的日子已經來到了……。”^⑪

當費列得爾菲亞市政府聞知公立工廠的雇用人員也都參加了這個總罷工的時候，它在匆忙中立刻召集一個會，在經過一番討論之後馬上發出通告說：“凡本市行政機關所屬各企業所雇用之工人，其工作時間夏季一律為‘六時至六時’，其中以一小時為早餐時間，一小時為午餐時間。”在費列得爾菲亞附近薩得克鎮的地方政府也跟着作了同樣的決定，它不但決定把工作時間減少到十小時，並將每日工資增加了一角二分半。六月二十二日，運煤工人開始罷工還不到三個星期的時候，總罷工勝利地結束。十小時工作制和適當調整計件工資的原則已為全市所採用^⑫。

工人在費列得爾菲亞獲得勝利的消息對於各地保守分子們來說自然是一個噩耗，根據“紐約商務日報”的說法，這是一種表示“一片烏煙瘴氣”的消息。一八三五年六月八日該報作了一個預言，它預言得很對，它說：“如果這樣來對待罷工的話，那將來罷工的事是會永遠沒有個完的。”

這個新聞由工人的報紙傳到了新澤西州、紐約州、康涅狄克州、麻薩諸塞州、馬里蘭州甚至到南卡羅來納州的各個城市里去，到處都引起巨大的熱烈的反應。罷工的浪潮沖遍了全國，其中大

多数的罢工获得了胜利。到一八三五年年底的时候，除开波士顿外，熟练技工的标准工作日一律都是十个小时了*。

一般说来，由于工会活动的结果，大多数熟练工人的工作时间已减少到十小时，因此，多数其他工人的工作时间也有下降的倾向。

同样的，许多行业里的工资数目也反映了三十年代期间工会活动的情况。麻萨诸塞州木工每天的工资从一八二一年的一元零七分增加到一八三〇年的一元四角；油漆工的工资从一元一角五分增加到一元三角二分，机械安装工的工资从一元一角三分增加到一元三角九分，金属工人的工资从一元二角三分增加到一元五角四分，玻璃工人的工资从一元一角三分增加到一元六角二分，印刷工人的工资从一元二角五分增加到一元三角八分，棉织厂工人的工资从四角四分增加到九角，毛织厂工人的工资从一元一角二分增加到一元二角，一般工人的工资则从八角增加到八角七分④。

劳工运动与社会一般反应

劳工运动所以能获得这些胜利是和它们能够博得公众的支持

- 虽然下面这张从“第十次普查”里引用的统计数字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工厂工作时间的完整印象，但它多少能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年度	报告中 工厂总 数	8—11 小时		11—13 小时		13—14 小时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1830	37	18	48.7	14	37.8	5	13.5
1835	48	24	50.0	18	37.5	6	12.5

(见“第十次普查”，第二十卷，第二八页。)

有極大關係的。在三十年代期間所舉行的罷工中，沒有例外地，每次都由工會採取適當的辦法把他們的問題提到社會各界的人士的面前。罷工工人和社會公眾建立關係的第一步就是在報紙上發表各種“啓事”如：

“致各界人士書”

“新澤西州奧倫治城的制鞋業雇工們，為實現他們認為完全公平合理的增加工資的要求舉行罷工了；為防止一切可能發生的、對於他們目前為要求增加工資所做的努力的無根據的報道或誤解起見，他們在這裡把真實的具體情況陳述于賢明的社會各界人士之前……。

“雇主老板們對於他們所雇用的工人一般都毫無同情心一事是完全肯定的，他們只有一個感覺，那就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因此老板與工人是完全不相同的。我們下面要講的，也許有些人會感到奇怪，但這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就是說：在我們這個素來以開明的制度、公正的法律和平等的人民著稱的國家里，却公然有一群人，不顧國家的制度要在這裡建立一種完全不適合於自由美國的气氛，而只能適合於歐洲那種罪惡繁殖地的貴族統治。”

另外一則典型的“啓事”是紐亞克制革工人們發出的，這個“啓事”說：“他們雙手的勞動和腦中的智慧便是他們的全部財產，因此他們認為他們完全有權利對自己的東西規定一個公平合理的价格，而不能讓那些壓榨他們的人任意給价。”紐約的制鞋雇工們曾提出問題說：“在我們對自己僅有的可以出賣的商品——我們的勞動力——都沒有控制權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說得上自由呢？”紐約的鋼琴製造工人和風琴製造工人在他們的啓事中也提到了這

一点，啓事中說：“既然劳动力是雇工們在市場唯一可以出賣的商品，他們便有权利來对它規定价格，誰不願意享受这个权利誰便是奴隸，我們奉劝他們和他們的主子們注意看看那些要求廢除奴隸制的运动。”^②

雇主們通常也發表他們自己的“啓事”作为回答。他們一般的論点是現在的工資是已經够多了，此外，他們說，他們很願意和任何个别工人來研究一下他个人的痛苦，但是他們拒絕被工人們強制着坐下來和那些受了“工会主义的道德上的癰疽”的感染的煽动分子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他們要求公众決定，是不是應該允許一群“从國外來的懶惰的游手好閑的搗乱分子”用破坏存在于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友善关系的办法，“威脅着要破坏我們的工業社会的前途”。有时工人們給他們回答說：“如果老板們認為他們所給的工資已經足够維持一个人的生活了，那我們倒想請他們自己來做工人，他們自己來看看他們这套論調到底有無根据。”有时工人們則向老板們提出要求，要他們把他們的賬簿提交一个公正的委員會，讓它去研究一下到底工資是不是太低。当林城女綳鞋工人們讀到一条登在報紙上公然攻击她們的工会是“有害于本城的繁荣”的“啓事”的时候，她們回答說：“我們只能說，对于本市人群的福利我們是完全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視的；但我們認為所謂本市人群的福利应当是表現于勤勉和劳动的階級的普遍繁荣和幸福，而不是表現于少数几个人的無比富貴。”^③

另有一群工人声称：“我們驕傲地說我們是已受到了工会主义各种学說的感染，并希望这个病的征象永远在我們身上保存下去”，因为，他們說，只有通过集体的行动，他們才能够“得到自然之神曾作为他們的权利賦給他們，而貪婪的魔鬼却要从他們手中夺

去的——舒服的生活”^⑥。

這就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間美國工人階級的基本精神。工人們決定要爭取到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所應享受的權利，他們因而組織工會，組織各市的工會核心組織和全國勞工聯盟，並且在很多次為爭取較高工資和較短工時的英勇的罷工運動中獲得了勝利。

第八章

早期的工人政党

“窮人是沒有法律的；法律是有錢的人制訂的，自然也只是為有錢的人服務的。”這一段話是一八二九年第拉瓦州新卡瑟郡工人聯合會所發宣言中的一部分，但它卻表達了絕大多數美國工人的共同感覺^①。

自從有些州開始允許沒有財產權的人享有選舉權以來，又是好幾年過去了。但是對於大多數的工人來說，所謂的公民權利，仍然只不過是極少的而且是空頭的諾言而已。在各個地區，工人的子女都因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永遠停止在愚昧狀態中。各個地區的工人們自己更時常因為欠下了為數極少的一點債務而被關進監牢，他們被迫自己負擔一切費用在國民兵中服兵役，同時他們要繳納極重的稅款，而很多富豪的擁有巨大財產的人們倒可以免除賦稅負擔。在大多數地區，政治黨派拿什麼樣一個名目加在自己頭上都完全沒有關係，因為一切擔任政府職務的候選人橫豎“完全是由被稱為富人或假定為富有的階級中選出來的”。

僅靠工會組織是不能改變這個情況的。只要工人們仍繼續投票選舉那些承受了腐舊的聯邦黨的政治哲學和策略，並仍然忽視人民大眾的福利的候選人，則這種情況即將永遠繼續下去，而美國大革命時的各種理想也就永無實現的可能了。然而這些政府官吏的確是由工人們投票選舉出來的。如果人民大眾仍然讓有錢的人

來完全控制他們的政府的話，那這種選舉權能有什麼價值呢？早于一八二七年，在費列得爾菲亞技工和一般工人中間流傳的一本小冊子即曾指出，勞工大眾竟是完全縱容某些和他們的利益“有矛盾的”個別分子在利用神聖的普選制來破壞他們的“繁榮和幸福”^②。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三日紐約的“工人擁護者”也發表了一個同樣的談話：

“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全國的貴族都已經互相勾結着來對付你們嗎？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分明是為了那些依靠剝削你們的勞動為生的人的利益才在想盡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的利潤嗎？為什麼你們要把這些人送進議院里去并讓他們幾乎占據所有的職位？……難道你們想着他們會為了你們的利益制訂不利于他們自己的法律嗎？那你們未免對於人性太無所知了。覺醒起來吧！”

政治上的覺醒

這種覺醒是從費列得爾菲亞開始的，在那里美國第一個工人的政黨于一八二八年夏成立了。這個運動向西發展到了匹茲堡、蘭卡斯特、卡萊爾、哈里斯堡、辛辛那提以及一些別的屬於賓夕法尼亞州和俄亥俄州的城市。向南發展到第拉瓦州，在那里工人們于一八三〇年選舉了維爾民敦自治鎮十八個官員中的十三個；向北則發展到紐約市、紐亞克、特令敦、阿爾巴尼、布法羅、叙拉古斯、特洛依、猶提咯、波士頓、普羅維頓斯、緬因州的波特蘭、和弗蒙特州的柏林敦等地。總起來說，在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四年間，獨立的工人政黨已經在六十一座城鎮里組織起來了，而在那些沒有組織這種政黨的城市中，在這個運動刺激下，很多技工俱樂部成立起

來，它們提出必須使立法制度符合工資收入者的利益的主張。

隨着工人政黨的興起，各種勞工報紙也開辦起來。在一八二七至一八三二年間，在各城各鎮出版的工人周刊約有五十種之多*。

勞工綱領

所有這些報紙並不都是工人政黨的機關報，但是它們全都極力宣傳各種“工人方案”以推進同一個運動。這些被各地保守派稱之為“工匠主義”的方案，便是那些新興政黨的要求。大多數的政黨所共有的一項要求是建立一種不論窮人或富人的孩子都有受教育機會的普及教育制度。這也並不是一個新的要求。早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期間，各民主會社的技工和工人們便已提出了實行普及教育的要求。在那時以後所發生的各種情況更使得工人相信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愚昧中一天天長大起來；據估計，在一八三四年間美國不識字的兒童為數達一百

-
- 一八二七年費列得爾非亞印行的“機工雇工擁護者”，是美國第一份工人報紙，但不到一年便停刊了。第二年便另有兩種周刊在費列得爾非亞辦起來，一是“技工自由先驅”，一是“技工自由報”，後者是由技工圖書館公司辦的。在此後數年中，在其他城市和其他各州，出現了很多種別的報紙，如：阿拉巴馬州德斯加盧薩的“時代精神”；維爾民敦的“第拉瓦自由報”；印第安納州查爾斯城的“農工擁護者”；新奧爾良的“自由主義者”；緬因州加德納爾的“新英格蘭農工”；波士頓的“工人擁護者”；新澤西州紐亞克的“鄉村時報及農工擁護者”；紐約州猶提喀的“技工報”；紐約州阿爾巴尼的“工人擁護者”；紐約州華盛頓郡散的希爾的“獨立政治評論”；紐約州布法羅的“工人公報”；紐約州羅徹斯特的“時代精神”；南卡羅來納州查里士頓的“南方自由報”；俄亥俄州波斯台其郡拉溫那的“工人團結”；以及一些紐約市的報紙，其中最出色的幾種是“工人擁護者”、“每日前哨”、“自由談話報”和“人報”。

二十五萬。為窮孩子們所設立的少數學校則完全帶着施舍的氣味，所以很少孩子進這種學校。工人們要求給他們的孩子以受教育的机会，並不是要依靠“別人的恩賜或施舍”，而是認為這是他們的“權利與義務”。他們深信，他們的孩子如果不能受到教育便永遠不能在美國社會中居于真正適當地位；同時對於這些孩子也將正如對於所有的窮人一樣，所謂“機會之邦”將永遠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③。

有些工人說：教育是“把我們從愚昧和貧困狀態中拯救出來所必需的，同時，也就是使得我們能夠脫離罪惡、悲慘和苦痛的境地所必要的東西，這種境地乃完全是由於那些奸滑譎詐的人們所設下的欺騙人民的陰謀詭計所造成的”。紐亞克的工人則認為“只有教育，只有靠教育的普及才能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支柱以支持那在獨占的金融寡頭的重壓下岌岌欲墜的民主制度”。費列得爾菲亞的工人宣稱，只有在全國每一個孩子都能獲得免費教育的時候，工人們才能夠“從外敵侵犯與內部破壞的危機中”永保共和國的安

全。

儘管他們是如此恐懼外敵的侵略，強迫國民兵役制卻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工人的憤恨，工人政黨更力求取消這種制度。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一切公民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去受檢閱和訓練，通常每年三次。如果不去報到則每年罰洋十二元，到期不付罰金便要受到徒刑處分。這種辦法對於有錢的人，是沒有什麼妨害的，他們盡可以按期繳納罰金以免除兵役，但是對於付不起罰金的或丟不開工作的工人們來說，這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他們隨時準備應征保衛自己的國家，但他們認為這種“既花錢又無用的操練和檢閱的規定”^④沒有什麼價值。

另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取消因負債而判徒刑的法令。据估計，一八二九年中，美國人民因債繫獄的在七万五千人以上，而其中半数以上的人所欠債款为数不足二十元。單單紐約市一地，便差不多有一千人由于欠別人五塊錢或甚至不到五塊錢的債而关進了監牢，在麻薩諸塞州的康科德，有一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兵威廉·克特，因为欠債十二元而被捕入獄。因此毫不奇怪，工人、農民和小商人們都联合起來一致攻击这种“和我們共和國制度的精神不調和的”“罪惡的封建暴政的余毒”^⑤。

由于沒有一种技工可以扣押債務人財產以抵債的法律，因而“每年我們人民中的最有用最勤勞的各階級中被掠奪去的款項不下三十万元至四十万元”。当一个老板破產的时候，工人們应得的工資常常是一个錢都拿不到，有时工資是一月一付或甚至半年一付，因此有些雇主們發現：为要侵吞那些应付未付的工資，宣告破產倒是一件对自己很有利的事。虽然在过去三十年中有不少請願書送到議院，但完全沒有發生效果，最后工人們決定要利用他們的权力來爭得这条必要的法律了^⑥。

組織工人政党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为了反对那些得到政府特許的独占公司。很多大賺其錢的公司組織完全是由州議院所發給的特許專利執照一个一个建立起來的。資本較小同时又沒有政治权势的人就很难得到这种特許執照。因此，很多商業上的帶冒險性質的事業便完全由少数几个資本家所独占，他們因此可以索取極高的价格。宾夕法尼亞州罗克斯特格罗芙的工人們明文規定下來要“反对一切特許的独占企業，因為他們已清楚地感覺到了这种企業对于各劳动階級所產生的影响……”。如果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競爭，那一切商業上的競爭都是值得讚許的，因为这样它对于

社會中大多數的人民都可能是有利的。但這種被特許的獨占企業，則只是使少數人發財而不利于人民大眾并使他們陷于苦難中的一種機構。這種獨占機構常常可以硬叫很多勤勞的人失業或強迫減低他們的工資”^⑦。

工人們認為，一切壟斷企業中最壞的一種就是壟斷性的銀行業。工人們擔心壟斷的銀行業的權力和影響會一天天增長直到它要控制整個美國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掌握着無限量資金的這些銀行家們組織成了一個人數極少而力量極其強大的集團。不久以後就將沒有任何敵對的力量能夠擊敗他們了，因此，在他們還沒有能夠完全鞏固、沒有“完全建立起那最後將動搖我們各種自由權利的基礎并使我們的後代永被奴役的寡頭政治的統治”^⑧之前，大家就必須行動起來了。

銀行限制商業競爭，并常常阻止新的人進入商業圈子的事實也是使它遭到反對的原因。由于貿易擴張的結果，商務上的債款時常不能按期收回，于是銀行貸款便在商業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商人們因而逐漸完全依賴于貸款機構。自然，那些身兼銀行董事的富有的商業資本家們很容易就能得到貸款，而小商人或那些想開始經營工商業的有技術的工人們就難得到了。因此，在工人們看來，銀行似乎只是用來阻止競爭、減少就業人數和抬高物價的一個龐大的壟斷性的陰謀組織中的一部分。

除了這種對金融壟斷家的一般恐懼之外，工人們對於銀行還另有一些仇恨。在那個時候，工資通常是以銀行鈔票支付，而這些鈔票的價值却是要隨着原發行銀行實際資產的伸縮而漲落的。因此，老板們拿銀行的鈔票時必須有一定的折扣，而工人們拿到這種鈔票時，却被迫完全照票面價值計算。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購買

力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在变动中。紐約市的老板們每到星期六早上便到華尔街去以打折扣的价格購進一批足够發放一次工資的鈔票來的事是極普遍的現象。一八二九年，費列得尔菲亞的工人和一些別的人“为反对在本國再有任何新的銀行因得特許成立起來”，在一起举行的一个會議曾宣称：“當我們的食桌上只有很少食物，我們的家屬吃不飽穿不暖的時候，它們——銀行却使得一些人能够依靠在商業上的賭博而过着極奢侈的生活。”

全國各地的工人都要求廢止銀行鈔票，并以硬幣支付工資。許多工人政党也要求馬上撤銷已發出的銀行業特許執照。另一些工人政党則要求通过一些法令來限制这些金融機構的权力。更有少数的工人政党甚至要求政府接收銀行事業經營貨幣的發行，这样來建立一个穩定的貨幣制度，一方面借以防止通貨膨脹同时防止銀行独占資本家們完全掌握政治生活的控制权^⑨。

工人們最激烈反对的現象之一是罪犯劳动力同他們的競爭。任何承包工作的人能够以極低的工資雇用罪犯：成衣工一角五分錢一天，箍桶工人一角五分到二角一天，制鞋工人二角五分一天，織布工一角錢一天。一群石工說：“在这种競爭的情況下，很多工人馬上便会失業，或者被迫接受低額工資，除非他們能够另有別的方法維持生活，否則便將陷入貧困和悲慘的境地。”^⑩

不平等的捐稅是使工人們極為不滿的另一種現象。劳工政党希望以一种“对一切人都平等都無所偏护的所得稅或財產稅”來代替人头稅或对生活必需品的課稅。另一方面，他們主張各种債券和抵押契約都应課稅，并且廢除教会財產免稅的制度，因为它不僅和壟斷資本的特許執照一樣代表着一種特權，同时还代表着一種含有危險性的“教会与政权的特殊关系”^⑪。这一点竟引起了很多

人的攻击，說工人政党反对上帝反对宗教，但工人們却立刻回答說，对于个人宗教信仰的問題他們沒有任何意見，至于說到教会應該和國家政权分开的主張，他們只是接受了湯姆斯·杰斐遜的看法而已。

很多工人政党要求在政府机关中建立更廣泛的民主。他們要求取消对于担任政府职务者的財產限制，并斥責那种通过政党秘密会提候选人的制度，認為这只是借以使少数几个政党領袖完全控制政府各項职务人选的办法。同时，他們反对間接选举，因为“在选举人和候选人之間不应当再有居間的人存在，一切重要的官員都应由人民直接选出”。对于委派官員的办法他們也是反对的，因为“关心本人的利益是人的天性——而律师与投机商人的利益和真正創造國家与独立的農民及工人的利益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所能希望到的只会是金融機構和富人們的利益得到照顧，而我們的法律將成为难以理解的东西，劳动人民的利益將完全被忽視”^⑫。

因此，工人們提出一切重要官員都必須由选举產生。同时，至少曾有过一个劳工政党，第拉瓦州新卡瑟的劳动人民协会，則是提出过更進一步的要求的。它于一八三一年要求給妇女以参政权。該会宣称：

“我們認為，在这个思想發展最为先進的地方，还要想坚持过去所假定的一些理由以剝夺妇女在选举会上的投票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社会中这一个实在很重要的部分占我們全人口的足足二分之一。有什么理由她們應該被剝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呢？难道有人会認為她們如果参預政事就会危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嗎？”^⑬

工人們對於他們自己所屬的這個階級的經濟地位是極為關心的。雖然在那時大多數工人還沒有準備進行一次徹底的社会改革，但由於貧富日益懸殊的對比使得很多工人都懷着同斯蒂芬·辛柏遜在其“工人手冊”中所表現的同樣的情緒：“我們的目標是……粉碎目前這種財富分配的根本原則——工人必須在一個更為公平的比例下和資方分享一切利潤。資本家是少數而勞工却是多數——只要勞工團結起來，他們就可以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中，獲得他們所希望得到的一切。”^⑭

總之，工人們決心要通過經濟和社会的改革以實現“獨立宣言”所提出的各種原則。有一個勞工政党說：“我們現在所嚮往的目標是完全籠罩在愛國主義的光輝中的——它將是完成獨立革命的光榮事業的最後一步。”這個運動，“如果杰斐遜還活着的話，也會完全接受并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運動的。”因為他一定會首先承認“工人的事業就是整個國家的事業”^⑮。

約翰·格林里夫·惠梯爾的看法也完全相同。早於一八二九年他即曾說道：“勤勞的技工群應該列為她（共和政體的美國）的最堅定的支柱之一，並且，不會要很久，他們就將被安放在社会結構中他們應當占據的地位的……。這一群人——國家的‘骨幹和中堅’正在發揮他們巨大的力量，這種進步的力量是沒有任何人能予以阻擋的。”^⑯

費列得爾菲亞

第一個工人政党首先在費列得爾菲亞成立起來，這是完全自然的，因為美國歷史上最早上的一些罷工便是在這個城市舉行的。同時也就是在這裡，第一種勞工報紙首先印行，第一個全市性的

勞工核心組織首先建立。这个勞工核心組織，技工工会联合会首先發動費列得尔菲亞的工人，使他們組織起來進行独立的政治行动。

一八二八年五月所举行的一次會議上，在該会通过立法機構在本城建立十小时工作制的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如何解救工人階級痛苦的問題，已被大家热烈地討論着。联合会并決議号召它的各會員組織在即將來臨的市議會与州議会的选举中爭取提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候选人。联合会的主要會員会如制鞋工人会、制帽工人会和木工工会都完全拥护这个号召，木工們一致決議說：“……我們对于技工工会联合会正計劃要實現的各种方案表示無上的滿意和贊同，并將尽我們所有的力量來實現这些方案。”^①

行动立即开始了，联合会通过了一項条例，規定秋季选举时的提名办法，并在費列得尔菲亞召开了四次會議，所有的人“不論他屬於何党派何地区”，都被邀請來參加會議。同时該会宣告說：“費列得尔菲亞全市与全郡的技工和工人們，已決心把有关他們这个階級利益的一切問題，完全放在他們自己的直接的掌握中……。”^②

从联合会所召开的各区域會議中產生了各区的代表会，以便提出担任本市及本州政府职务候选人。但主要是由于財產限制的存在，就是說担任政府的任何职务都必需要一定数量的財產，虽然代表們大多数是工人，而“工人的候选人名單”中却沒有提出一个工資收入者來。不过，那些被提名的人都保證支持工人运动的各種原則，并保證“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与权利”。这里所提出的候选人最后再由工人們提名列入了杰克遜的和联邦党人的候选人名單中去。

全郡提名代表会所建立的警戒委員會是支持“工人提出的候

选人名單”的最主要的力量。

选举的結果說明，如果工人要想使他們所提的候选人獲得勝利，他們必須要有更健全的組織。因此，經常性的政治会在城区及其近郊成立起來，它們一方面在选举时帮助進行政府官員的选举事宜，一方面帮助“在工人中普遍傳播关于宪法、立法和政治方面的知識”^{①9}。同时，費城工人共和主义政治协会于一八二九年三月的成立，也正好可以滿足对于这种較大的組織形式的需要。該会立即开始为了一八二九年秋季的选举進行对工人的組織工作。对于候选人提名的事完全交給城和郡各提名代表会去办理。各区域會議則只以民主的方式选出代表去参加市和郡的提名會議。

他方面要想破坏这些集会所作的努力都失敗了，当地的民主党用戴紅帽子的办法來制造內部摩擦借以分裂联合会的企圖便是一个例子。为了避免被旧政党操縱一切，并接受很多区域集会所提出的不要和联邦党人或民主党人混合在一起的警告，联合会的提名代表会在其他政党开会之前便选定了自己的候选人。就在这种情形下，在工人所提的担任市政府官員职务的候选人中，仍有九名同时得到联邦党人的支持，三名得到民主党人的支持，工人所提的州議会的众議員和參議員的候选人中也有三名和联邦党人所提相同。

虽然有种种經濟上报复的威脅（那时还没有不記名投票的办法），工人们仍能提出足够的候选人以保有决定性的力量。在五十四名工人所提的候选人中——他們都同时得到联邦党人或民主党人的支持的——有二〇人当选了。“技工自由报”在迎接这次勝利时，并不是以任何党派的立場來看这个問題的。它說：“决定性的

力量終於歸于工人的掌握中了，這是完全正當的，這種力量在將來則將被用以謀取全體人民的福利。”^⑳

這個運動並不從此滿足既得的成就。費列得爾菲亞市郊薩得克地方的聯合會向所有的會員和該會的支持者發出一份通告，敦促他們“為下一次選舉作好準備工作”。從一八二九年冬季到一八三〇年春季，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一直繼續在進行着。一八三〇年的全市大會中的代表是從十五個區域選舉出來的。在這個時候，政治性的聯合會已經在蘭加斯特、匹茲堡、卡來爾和派克鎮諸地建立起來。派克鎮聯合會在其所發出的一個宣言中說：“為了守護我們的權利和更有效地抵禦任何對社會勞動人民的利益侵害起見，我們——一切居住在克利爾費爾德郡派克鎮的農民、技工和一般工人們——格蘭扁山區勞動人協會在這裡向大家宣告我們自己的組織的成立。”^㉑

在一八三〇年的選舉運動中，關於政府官員候選人的入選問題曾被廣泛地討論着：在提名時僅只選舉工人呢，還是工人運動的“可靠的朋友”也同樣可以被提出？從各區域會社和郡提名代表會的決議來看，似乎大多數人是贊同只提工人的。他們也只希望得到那些“從事於生產事業的”人們的支持。阿利根尼郡聯合會更表示說，他們相信：“不管有些人看起來是多麼愛國，但很明顯，沒有一個人能夠全面地了解我們的利益，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時時警惕地來保衛我們的利益；因為當他們在推進公共福利的時候，最有效地保衛的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㉒。

在一八三〇年的選舉中，工人的運動曾遭受到一個由各報社發動的組織得很嚴密的進攻。“反宗教”、“不敬神明”和“土地均分主義”等等罪名不斷地被用來詆毀工人運動，“工匠主義”更成了

一切攻击中的主要論調。女权运动的勇敢的先驅法朗士·賴特，因她曾主張廢除奴隸制，主張政治与宗教分离，主張消滅教育中牧师势力的影响，則被認為是工人运动的思想意識的創始人。工人們回答說，他們对土地均分主义者無任何情感，他們和賴特女士也沒有任何关系，并声明說：“那些不論是把土地均分主义或宗教上的問題提到我們的政治行动綱領中來的人，全都是我們正义事業的死敌。”^②但这种謠言攻势仍有其相当效果的。民主党人在市和郡的选举中都獲得了勝利。虽然如此，联合会所提名單上的候选人仍獲得約有一千选票；同时，在費列得尔菲亞市郊的北里伯蒂斯，工人候选人有八名当选了政府委員。

費列得尔菲亞工人政党在一八三〇年以后的情况几句话就可以交代完了。一八三一年，市和郡的提名代表会都举行了，并且提出了一份候选人名單，但这个运动却已經成了强弩之末。一八三一年的选举中他們所提的候选人完全落选，这是联合会所参加的最后一次的选举了。沒有把各个分散的政治性的联合会組織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全國性的政党，乃是这个运动終于夭折的重大原因。

紐 約

在費列得尔菲亞的工人正为了独立的政治行动進行組織工作的时候，同样的运动也在紐約發展着。或先或后与这第二个美國工人政党有关系的、劳工界和知識界中的杰出人物，計有法朗士·賴特；著名的英國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兒子罗伯特·台尔·欧文；“工人拥护者”和“人报”的編輯，后来成为土地改革运动的領袖，乔治·亨利·伊文斯；木工工会的主席伊比尼塞·福

特；桌椅工人和鍍金工人工會的主席約翰·康默福特；鎖鑰雇工工會的領袖李維·史萊姆；以及自學成名的急進派的机工湯姆斯·斯基德默，他在工作之余曾寫了一本書，題為“人的財產權：作為使本代成年人財產權平等並使其后代于成年時有平等財產承受權的建議”。

紐約工人黨是從防止延長工作日的運動中產生的。在一八二九年的時候，紐約市是十小時工作制得到社會認可的唯一城市。但是僱主們却正在企圖恢復十一小時工作的制度。因此工會運動的領導人物在一八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開了一個會議，商討反擊僱主們進攻的最好的對策。幾天以後，他們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有五千多名工人參加了。他們決議不為任何老板做更多於那“公平而合理的十小時一天”的工作。任何工人如違反這項誓約，他的名字將被刊登在報紙上作為勞工的敵人看待。並為準備一次可能發生的罷工運動，大會募集了一百元的基金。一個由五十人組成的委員會被推選出來以籌劃保持十小時工作制的策略。工人們的警覺性和堅固的團結很快便迫使僱主們放棄了他們要想延長工作時間的計謀^②。

在勝利獲得之後，五十人委員會並沒有解散。它仍定期舉行會議，同時當秋季選舉快要來臨的時候召開了一次工人群眾大會，討論工人在這個選舉運動中可能起的作用。五十人委員會并向大會提出一個報告，建議提出工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以保證工人們最迫切的苦難能夠獲得解救。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第二個美國工人政黨於是誕生了。

這個新政黨的正式名稱是“紐約工人黨”。五十人委員會所提名的州眾院議員候選人名單中包括兩個木工、兩個機器工人、一個

油漆工人、一个翻砂工人、一个箍桶工人和一个医生。对于州参院議員的候选人，这个新政党則和克雷、亞当姆斯及反塔馬尼集团諸方面联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候选人^⑤。

到这时为止，在五十人委员会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湯姆斯·斯基德默，該委员会在各次群众集会上提出的議案中的絕大多数都是由他草拟的。建議組織一个工人政党，并強調指出，即使工人所提候选人完全当选也不能解决工人階級的問題的議案就是他所提出的。只有对現存的財產关系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斯基德默建議每一个年滿二十一歲的青年和每一个未婚的女子都应無偿地得到一六〇畝土地，同时只要他們繼續耕种，他們就将永远占有这块土地。但出賣或出租土地的权利則应永远廢除。法律不能容許任何人占有多于一六〇畝面積的土地，因为沒有一个以他个人的劳动力能利用更多的土地的。斯基德默并未建議將东部大地主的土地立即沒收归公，他只主張通过一条法律，讓它在原土地所有主死后收回其超出一六〇畝以外的土地所有权。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在一代以后把不平均的現象完全消除。

自工人候选人名單提出后，法朗士·賴特和罗伯特·台尔·欧文都加入了工人的运动。他們兩人在紐約市民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拥护他們的群众。經過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在該城組織了一个自由主义运动。通过他們的周报“自由訊問报”和他們所作公开的演講，他們广泛地宣傳他們的主張，那就是只有采取科学的和理智的态度來对待一切問題并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当前的問題才能得到解决。欧文和賴特女士兩人都特別向工人們呼吁，希望从他們得到支持，因为他們相信只有工人階級有足够的力量和組織性

以實現他們的理論。在一篇題為“致青年技工們”的文告中，法朗士·賴特宣稱：

“因此，如果說我無時不在演說，而特別是無時不在向勤勞的工人階級演說，這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工人群眾組織了社會各種各樣人群中唯一數量極大的一個階級；第二，他們的利益在目前已是最接近於全人類所共趨的遠大的利益，因此，他們也就是最傾向於完成大規模的改革和全人類的團結的。”^②

儘管社會對於婦女參加公共活動存在着極大的偏見，賴特女士的演講仍是頗受到工人們的歡迎的。工人們所懷抱的各種願望，如進行免費教育，提高工資，減少工時，以及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正當地位等等，都在她的演說中得到明確的發揮。此外，完全不像許多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害怕階級鬥爭，賴特女士却看到工人們正逐漸發展其階級意識，而她是歡迎這種發展的。她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自由訊問報”上寫道：

“目前的鬥爭所不同於人類一直在進行着的其他鬥爭的，是目前這個鬥爭很明顯是一個公開的世所共認的階級鬥爭，而這個戰鬥也是無處不存在的……；現在，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千百萬被壓迫的人民都一致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壓迫的鬥爭；現在，全世界一切一向被人作牛馬騎坐的人民正極力掙扎要掀掉那些‘穿着馬靴裝着靴刺的’騎在他們背上的傢伙，那些傢伙們的那種可以任意使人民飢餓勞瘁而死的合法權利將從此永不存在了*；這是勞動起來反抗懶惰，辛勤起來反抗金

• 在這裡賴特女士是引伸了湯姆斯·杰斐遜在其逝世前數日，一八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所寫的最後一封信中的極著名的一段話：“……科學光輝的普遍

錢；正義起來反抗法律和特權的鬥爭。這個鬥爭在今天才真不能說是來得太早了。一方面是壓迫、暴戾，另一方面是無盡的苦難和折磨，這一切已够使我們要責問千百萬的人民大眾為什麼竟會甘心如此地含垢忍辱，如此寬宏大量；我們那里還能說他們太急切于要求改變目前苦難的現狀，甚至太急切于要求報復了呢？”

歐文和賴特女士向新成立的工人政党欢呼。像斯基德默一樣，他們相信，一切改革與他們所認為最重大的改革，即與建立人民教育制度一問題比較起來，都只是“部分的無實際作用的，暫時的或微末的”。他們認為，一旦工人在政府中有了一定的力量，這個重大的改革就可以實現了。因此，他們經常和工人運動緊密地合作，他們自己的組織——“保護工業及發展國民教育協會”——也極力支持工人所提候選人名單^②。

工人候選人名單提出時，離選舉日只有一個星期了。此外更有一個困難就是基金缺乏，所存款項僅只七十五元。但儘管如此，當選舉運動迫近的時候，大家都明白看出工人政党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力量，各種報紙都因此陷于歇斯底里狀態中。它們懸求一切選舉人來共同擊敗那“妄稱為‘工人候選人名單’的‘叛亂的候選人名單’……那公開地、抱定決心反對一切銀行、反對社會秩序、反對財產權的候選人的名單。”^③這些報紙說，這個新的政党是那個發瘋的無神論的女人方尼·賴特一手搞出來的。下面所錄一八二九年

照耀已經使得每一雙眼睛都看到了一個明顯清晰的真理，就是說，人民大眾並不是生來的時候背上就帶着一套馬鞍，更沒有什麼少數幾個得天獨厚的人，生來就穿着馬靴裝着靴刺可以合法地在人民大眾的背上騎坐的。”（菲利浦·方納編“湯姆斯·杰斐遜的重要著作”，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八〇七頁。）

十月三十一日“商务廣告人報”的社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社会所鄙弃为天地所不容，以偷窃和褻瀆神明为衣食之源的一群反神道的不可救藥的鼓动家，正竭力企圖引誘本城許多青壯年男子追隨他們……去擾亂社会目前的安寧；引導他們身負着該隱*的烙印走進監獄；引導他們从事于乱倫搶劫和謀殺的活動；引導他們像一群被窮追的兇殘野獸走向死亡；最后則讓他們到上帝的面前去听受審判，这个上帝虽然在他們進行他們的愚蠢的可憐亦复可笑的投机活动时被他們百般辱罵，而在他們悲慘的心深处，他們是仍然相信他的存在的。从任何一部分來說，这都是一幅極為逼真的关于新政党中有某些領袖人物的寫照，这个新政党从本社会的污穢堆中生長出來，它是比埃及泰丰怪神更为兇暴殘忍的。”

为了反击这类語無倫次的謔語，“工人拥护者”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創刊了。它的編輯与印行者都是由乔治·亨利·伊文斯担任，他是罗伯特·台尔·欧文的一个合作者。伊文斯在十四歲时从英國來到美國，曾在紐約州伊大卡城做印刷工的学徒。从前他曾做过“自由訊問報”的印刷工人。有一个时期，“工人拥护者”和“自由訊問報”是都由同一家報館印行的。

这份在美國居于領導地位的劳工報紙以“平等教育；平等权利”的口号为其最突出的标志。它在第一篇社論里宣称：“工人階級已經占領了自己的陣地，在那压迫他們的勢力全部消滅以前，他們是决不会放弃斗争的。”

“工人拥护者”的影响并不僅限于紐約城中，因为在阿尔巴尼、

* 該隱 (Cain) 是亞當及夏娃之長子，曾殺害其弟亞伯，詳見“聖經”創世紀第四章，因常用以喻同类相殘殺者。——譯者

布法罗、叙纳古斯、新港、新伦敦、哈特福特、麻萨诸塞州的斯柏令费尔德，以及新罕布什尔州诸地都有该报订户*。这个重要的报纸继续存在到一八三六年，那时，由于它的编者健康情况已不能支持，乃停刊了一个时期。一八四四年当伊文斯又积极从事于工人运动的时候，该报始又复刊。

虽然这个战斗的时间很短，虽然缺乏资金以及遭受到各种报纸的完全无一定原则的攻击，工人党仍然获得了一次永铭人心的胜利。他们所提出的州众院议员候选人中，除了那个医生外，都在七万选民中获得六千张以上的选票。得票最多的是木工工会主席伊比尼塞·福特。福特当选入州议会众院，成为自技工所提候选人于一七八五年获得一次胜利后的第一位参加纽约州众院的劳工代表。而且，州参议院中的获票最多的候选人也公开承认他要感谢工人党所给他的帮助²⁹。

“工人拥护者”是有充分的理由表示庆幸的。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该报曾说：“这次选举结果，超出我们最乐观的估计，竟如此有利于我们的事业……有利于人民的事业，这是完全超过我们的估计的……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所获得的成就是比我们所能合理地希望的更多的。如果工人候选人名单更早一个星期提出来的话，那它无疑的一定会获得完全胜利。”

保守派的报纸却并无此种快慰的感觉。伊比尼塞·福特，一个普通木匠竟当选了议员，他们认为这是纽约城的耻辱。这件事将使商人和各企业的投资者吓得跑出我国的商业圈子，因为在这里

* 该报发行总额并无纪录，可能每期总共也不过几百份。但我们不要忘了，那时国内发行数目最大的“纽约快讯”在一八三三年也不过自称四千五百份，至于其他报纸，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的都很少。

一切銀行都將被那从英格蘭和愛爾蘭來的一些喪心病狂的煽動家所領導的暴亂的工人全部予以破壞了，在這樣一個城市里，有什麼樣的商人能感到安全呢？“商務報”更預測說，更壞的事還在後面哩。它並且說，當普選制被採用的時候，這個極重大的錯誤便已鑄成。因為，“把投票箱向每一個只要是活着的人開放，便等于是把權力置于那些既無財產又無才能、同時在其他任何場合都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人們的手中”^⑩。

勝利的獲得還不僅限于紐約市一地。紐約州北部的薩利納，在一八三〇年的春季選舉中，農工黨所提的全部候選人都當選了。在特洛依和阿尔巴尼，除了一個選區之外，農民們和工人們在所有的選區都獲得了勝利*。這些勝利“使得紐約州的貴族們感到無比的恐懼和沮喪”^⑪。

然而，在工人運動內部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湯姆斯·斯基德默分裂了黨組織，他和他的信徒另行組織了一個黨派，稱之為貧民黨。從表面上看，引起這一次分裂的，似乎只是一個很小的問題。自選舉運動結束後，關於黨的經常機構的組織形式問題，曾被大家討論了很久。五十人委員會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會上委員會把由斯基德默起草的一份計劃提出來，主要是仍要保持過去一切依靠全體群眾大會的辦法。喬治·伊文斯反對這種完全空泛的組織形式，並另外

* 阿尔巴尼農工黨的黨徽是一個持着一把鐵錘的手臂交在一架犁上面，代表“一種持着鐵錘與鐮刀的美國先驅者”。（見一九三九年芝加哥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中杰瑞米亞·英節索爾：“紐約市勞工與杰克遜民主”，第六九頁。）金氏郡農民、技工和一般工人會的標記則為一把鐵錘和一捆麥子。（見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擁護者”。）

提出建議說，黨的基礎應該像在費列得爾菲亞一樣建立在各區域會或各地的會社團體上，這樣工人們才能够有一定的地方進行經常的活動。斯基德默对这个分区組織的計劃嚴加攻击，他的論据是組織形式容易使敌人獲得对党的控制。

結果，斯基德默失敗了，大会通过了分区進行組織的計劃。工人們所以贊成这个計劃，不僅是由于他們認為它的确是比較好的办法，而更是由于他們已看到斯基德默的兴趣实在在于实现他的平分財產的農地平均主义，而并無意于实现工人們的急迫要求如教育問題、技工財產留置权法令，以及廢止因負債而判徒刑的法令等問題的。他們担心在斯基德默所建議的那种完全松懈組織形式下，他更容易把他自己的一套綱領滲混到党所發布的一切宣言或文告里去，而一直到那时为止，斯基德默确实是在那么做的。在那时以前，工人們都正全神貫注于保持十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或他們的政治运动，因此他們竟还没有十分注意到在他們的決議中已同时提出了要在目前这一代中实行平均分配一切財產的要求。現在，他們是正在考慮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組織了，大多数會員都不願意接受斯基德默的綱領作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当斯基德默在十二月举行的大会上站起來說話的时候，群众都喊叫着說，“別再來什么土地平分主义了”^②。

斯基德默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的敌人也承認他是一个“工人階級利益真正的热誠拥护者和他所崇敬的人类自由的坚强不屈的信徒”^③。在斯基德默所計劃实现的社会秩序中，对于一切宗教上、人种或性別上的歧視，他都認為是非法的。因此，他可以說是最早期的絕對平等主义——包括对妇女及黑人亦当一視同仁的普选制度——的拥护者之一。然而他的純教条的处理工人階級問題

的办法使他自己完全陷于孤立。他不了解工人們所以拥护新的政党是因为他們亟須解决当前的需要，而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他非但没有把这些迫切的要求和他的企圖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綱領結合起來，却反而大声疾呼地說，普及教育、廢除因負債而判徒刑的法令等等改革是很少或完全没有意义的。更嚴重的，是他竟拒絕再和反对他的綱領的运动發生任何关系。他坚持說，他的新党是本城唯一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党，并且在他的“权利平等之友”一报上，他对工人党發出了一連串的刻毒的攻击。

紐約出版的一种劳工报纸“每日前哨”，曾經分析斯基德默的新任务說：“不論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正是尽他一切可能在分化我們的党……。如果他已被貴族階級的政党所收買，并接受他們的津貼明目張胆地在只有內部分裂可以帶來我們的失敗的情況下在我們中間制造分裂的話，他現在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有效地执行他們的吩咐了。”^{②4}

斯基德默的脫党行为并没有嚴重地削弱工人党。只有很少的工人追随着他去了。党按照分区的計劃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并且选出了一个包括七十人的总执行委员会。这七十個委員里面，有五个是雜貨商；兩個成衣商；教員、油商、農民和經紀人各一；其余委員便全是工人了，而其中主要的是熟練技工如木工、家具工、泥瓦工、鉄工、印刷工、成衣工、車运工人和桌椅工人。虽然这个委员会并未包含不熟練工人或工厂工人，“工人拥护者”却声称“整个委员会里面只有一个委員不是工人”^{②5}。这个例外便是那个經紀人。在这里我們很明顯地看出，工人的界限是相当廣泛的。伊文斯自己曾給“工人”下了一个定义說：“凡从事一定有益人群之職業并賴以为生計之体力或腦力劳动者皆为工人。”因此，他更接着說，工人

运动“在其一切政治活动中就不能与那些只从事于某种对人类生活必需、生活上之舒適或便利毫無补益的職業的人共同行动，也不能和那些从不依靠一定的有益人群的職業为生計的人共同行动”^{⑤6}。

尽管这个运动也包括了一些小雇主和小店鋪的老板，各工人政党所用的名称已是把一般的人民大众和大雇主們加以区分了。大雇主們也觉察到这一点的，新英格蘭一著名的工厂老板哀莫斯·罗凌士曾对“工人党”这个名称提出反对，就是一个例子，他說：“我們实际上都是工人；建立一个名为‘工人党’的这种意圖对全人民是一个侮辱，因为它表示說在我們中間有很大数目的人不是工人。”^{⑤7}

虽然党被分裂了，工人們仍以高度的自信心准备着一八三〇年秋季的选举运动。“每日前哨”曾提出了一个警告。它說：“如果有人問我們：‘人民的候选人名單在下次选举中是否能獲得勝利？’我們就應該反問說：‘我們有多少把握能避免我們自己內部的分裂？’”^{⑤8}这个警告的提出是正当的，因为在第一次分裂發生了不过几个星期后，工人党又一次被分化了。这个新的爭端是由罗伯特·台尔·欧文和法朗士·賴特所提出的关于教育問題的綱領所引起的。

欧文和賴特女士認為，經濟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而一种全民的共和的教育制度才是最根本的問題，这种教育“以國家的榮譽、幸福、高尚的品德和國运的复兴为目的，全体出資全体免費，受國家的監护，用國家的經費”。他們認為这样一种制度便將產生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到了那时，技工財產留置权法令、限制銀行权力的法令、以及要求廢除因負債而判徒刑的法令等都完全不需要了^{⑤9}。

他們這個教育計劃中最顯著的特点是那個國家監護制度。根據這個制度，所有的孩子在極小的時候就得離開自己的父母到國立的學校里去，食宿也都在學校里，直到他們成年時為止。他們要穿同樣的衣服，受同樣的訓練，並且學習同樣的功課。那里沒有宗教方面的教育；全部課程都是學習以感官經驗為基礎的各種知識。孩子們的父母可以去看望他們的子女，但不允許干涉或妨礙他們的教育^⑩。

歐文和賴特女士深信，在作父母的沒有能力供他們的子女以適當的衣服和飲食的情況下，公立的走讀學校對於工人的子女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那麼，他們爭辯着說，為什麼我們要去支持那種希望建立只能反映現社會中一切不合理現象的公立走讀學校的要求呢？在一般的學校制度下，孩子們仍然是受着父母們影響的，他們會把自己的各種偏見和宗教上的迷信灌輸到孩子們的頭腦中去。在那種情形下，如何能希望有一種創造人類平等、結束階級分化和開創新社會秩序的教育出現呢？最後還有一點就是一般學校的教員永不會把全部真理教導給孩子們。法朗士·賴特說：“他們決不敢講述任何可能危及他們的聲名，因而也就會危及他們的飯碗的道理。他們所要尋找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合人口味的東西。”她接着說，所謂合人口味，主要是合於那些有錢的人、政客們和牧師們的口味^⑪。

歐文和賴特女士關於一般學校制度所講的一切，有很多地方，工人們都很同意的。有些人甚至對這種國家監護制度表示擁護。如油漆工人工會和很多印刷工人都決心要支持他們的這種計劃。

但是大多數工人反對這種使他們的家人分散並使他們的子女脫離宗教影響的辦法。自然，保守派的報紙更大大地利用了這一

点來指責工人党，說它要破坏那作为社会基礎的家庭制度。國家監護制的拥护者当然不接受这种罪名，他們坚持說：“讓孩子們脱离父母的管教并不是我們的願望。”但他們这种否認并没有發生多大的力量^{④2}。

尽管如此，國家監護制这一計劃本身的优点或缺点仍不是引起党内分裂的直接原因。这个爭論竟被一群一般称为“庫克—古揚派”的政客們抓在手里了，这群政客是因为看到了党一八二九年的勝利才加入到党里來的。力圖全部控制或分裂工人党，他們抓住國家監護制这一問題，对这一制度嚴加駁斥，說它是一种“假托的企圖以反神道的理論來蒙騙工人階級的陰謀”，并号召工人們起來“从一群丧心病狂的外國人所提出的惡毒的毀滅性的制度中去救护你們國家的各种制度”^{④3}。

欧文一派坚持國家監護制計劃已变成了“我党偉大計劃”之一的說法，更給了那些人以可乘之机。欧文說：“我們决定要与这个偉大的方案共存亡。”^{④4}当欧文批評和反对農業改革者說“改革永远也不应当走在人民思想的面前”的时候，在斯基德默身上曾表現过的那种教条主义的看問題的方法，現在又在欧文身上顯露出來了。

党内嚴重的分裂运动开始了；拥护國家監護制和反國家監護制的人分成了兩個派別在各个区分別举行會議。这一派的委員被那一派从区域委員會中驅逐出去，形成了兩個总执行委員會，一个是“反对土地均分主义和國家監護制的总执行委員會”，另一个則是欧文派。

廣大的工人群众尽一切可能以圖挽救这个分裂的局面；他們知道如果大家不能團結起來進行共同的运动，在即將來到的选举

中他們是不能得到勝利的。有一個工人曾寫道：

“我擔心，如果我黨真正的友人不站出來表現他們對共同事業的忠誠，塔馬尼派和英王派將一定會打敗我們的。當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已擺在面前的時候，難道本城的工人還要繼續把他們的精力浪費在內部的爭執和深夜的吵鬧上去嗎？一個有力而狡滑的敵人是站在我們面前的，我們不團結起來去抵抗攻擊，却要把我們自己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集團嗎？上帝都不允許的。讓我們立刻結束這一切吧。兩方面是都有過錯的，讓我們趕快丟開這種無謂的爭執，把我們的全部力量集中到我們偉大的政治目標上去吧。”^{④5}

從各個區域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來看，這個呼聲實在反映了廣大黨員群眾的意見。他們的決議號召那各自稱為工人黨執行委員會的兩方面都立刻解散現在的委員會以便在全城重新進行一次選舉。這些決議懇切地說，只有在派別爭鬧結束的時候，工人黨才有可能“為窮人和他們的子女爭得他們的權利”^{④6}。

但這些呼聲完全被忽視了。兩方面都完全沉浸在如何使用策略來獲得對工人運動的控制權的活動中，它們無暇去聽取下層群眾的意見，工人們所擔心的最壞的情況很快就要發生了。

美國第一個全州性的工人代表大會是紐約州于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薩利納召開的。在這次大會還沒有正式進行會議之前，便碰上了在紐約城工人運動中正發展着的這種分裂現象。代表分成了兩個集團——一個代表歐文派，另一個代表庫克—古揚派——都以代表工人黨的名義要求在會上占一席次的權利。歐文派的代表團中有一個代表曾建議展開一個全面的討論以解決兩派的爭端；但結果這件事却被交給一個三人委員會去處理，而這三個

委員却都是庫克—古揚派那一邊的。完全可以料想得到，委員會的報告是完全偏護反國家監護制的代表集團的。歐文派的代表立刻退出了會議，大會乃完全落在庫克集團的掌握中。

代表大會提出依拉塔斯·羅特將軍和那桑尼爾·畢區爾將軍分別為州長和副州長的候選人；他們兩人都是屬於塔馬尼派的。根據“工人擁護者”的意見，兩個都是“極堅定的黨人……都是從來也不會表示過擁護我們任何重要方案的人，……更不要說保證推行那些方案了”。它用簡單的幾個字來總結這次大會說：“工人被出賣了。”^{④7}

這次大會一閉幕，歐文派馬上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並決議全部否決薩林納大會的一切決定。九月十四日，他們舉行了另一次群眾會議，提出制革商伊塞基爾·威廉斯和商人伊薩克·史密斯分別為州長及副州長候選人，這兩個人是大家公認的工人的朋友。

在一八三〇年的選舉運動中同時出現了三種不同的工人候選人名單，一由歐文派提出，包括全城和全州各职位的候選人，同時還對他黨所提某些國會議員候選人表示贊同。一由庫克—古揚集團提出，也包括全城和全州各职位候選人，其中只缺正副州長的候選人，那是因為原被提名人拒絕接受所提职位。同時，很自然的，這個集團對於州長方面的职位，便決定支持那些與亨利·克雷派友善的候選人。克雷派因而也就支持庫克—古揚派的候選人名單，自己沒有另提了。第三個工人候選人名單則是代表斯基德默或者說農業改革派的。它自稱代表最初五十人委員會領導下的工人黨，也提出了地方和州的各职位的候選人^{④8}。

離開選舉日還有一個星期的時候，“工人擁護者”預言說，在一

八二九年投新政黨票的工人的極大多數，由於憎厭派系的鬥爭，都將會轉向塔馬尼大廳的。塔馬尼派結果在市一級的選舉獲得完全的大勝利，在州參院中占得了大部分的席次，並取得州長的職位。三個工人候選人名單則一共只得到二，一八〇票。塔馬尼派所獲得的票數大致等於工人候選人名單所失去的選票。塔馬尼派公開宣稱：“在紐約，土地均分主義的論調現在是已經死去了，消滅了，被埋葬了，它已被運回它的發源地英格蘭去了。”⁽⁴⁹⁾

一八三〇年的一次選舉運動等於是演奏了紐約工人黨的輓歌。三個各自分立的集團仍繼續在活動。各派舉行它自己的會議，通過它自己的決議。但是工人們却各自走他們自己的路，回到一些舊政黨中去了。

一八三一年秋季，斯基德默集團無形消滅了，而庫克—古揚派則和克雷派或國家共和黨合併。歐文集團則極力支持一種一方面包括有塔馬尼派一方面又有反塔馬尼派的候選人名單，因為那些人曾經表示過贊同“工人方案”的。一年之後，歐文集團乃與塔馬尼派合併了。

新英格蘭

跟隨費列得爾菲亞和紐約之後，新英格蘭在政治行動方面也採取了一些很重要的步驟。雖然新英格蘭農民、技工及其他工人聯合會本身並不直接從事政治活動，它卻鼓勵它的各城市的會員團體提出它們自己的獨立的候選人名單。在一八三三年的麻薩諸塞州選舉中，政治上從屬於聯合會的麻州工人黨所提候選人共獲得了三，四五九張選票，並取得了十個鎮的控制權。大多數的選票是從農業地區來的，從波士頓得到的只有五一九票。在那十個鎮

里面，有六个是在麻州的西部。总之，其主要的力量是农民，而以一些城市木工、泥瓦工及一些造船业中的油灰工为辅助。在选举运动中，工厂大都不能产生什么力量，因为那里大多数的工人是妇女和孩子⁵⁰。

衰落和消滅

我們歷史中这些早期的工人政党所以会终于衰落和消滅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說是美國資本主义社会發展的情况所造成的。在工人政党的主要成員，即熟練雇工，还有可能自己開設店鋪因而自己也就变成老板的情况下，工人政党是不能得到穩定的。那时，大多数的工厂工人，都是妇女和兒童，他們在运动中还不能起什么作用，而許多普通工人則还没有得到已算归化的公民权。同时階級流动性仍然太大，使得永久性的工人階級政党仍很难存在。毫無疑問，各方面对于早期工人政党所加的种种激烈的指責，也使得那些政党在选民中逐渐处于孤立地位。对于这些無理性的攻击当时也都曾給予适当的回答的。有一种对工人运动抱友善态度的报纸曾說：“進行工人运动的人們被人称为激進分子、破坏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咒罵的名称，其目的不过是要尽可能地引起大家对他們和他們的一切活动抱鄙弃的态度。他們的处境是和一七九八年时的共和党完全相同的，那时当权的貴族們对于共和党也同样不惜加以各种誣蔑的称呼，如民主急進分子和搗乱分子等等”⁵¹。这种明确的敌对立場，的确也能鼓起很多工人的勇气來。可是，無疑問，各种激烈的指責仍使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些拥护者。工会和工人政党之間的联系不够，使得兩方面都減弱了力量。当时大家認為僅是政治行动就能解决工人的一切問題。工

人運動所發出的文告或任何文件中從沒有一句話提到過建立工會的必要性；也沒有任何工人政黨對於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或工會里的一些其他問題表示過很大的興趣。喬治·亨利·伊文斯根本不是一個工會會員，而羅伯特·台爾·歐文和法朗士·賴特則對於工會運動是毫無興趣的。

各個工會的共同弱點是對會員缺乏較嚴格的控制。會員應繳納會費或應履行其他義務等都被認為不是十分必須的；只要他們堅持总的原則就夠了*。這種情況便限制了建立堅強的黨組織的可能，並在遭到失敗時加速了黨的解体。

黨外政客所經心培植的黨內紛爭也是幫助削弱早期工人政黨的力量之一，而那些政客們未能得到勝利的地方，又會有一批空想社會主義者出來拿他們的包治世界一切疑難雜症的萬應良方來代替當前迫切需要的各種改革。最後，那些已建立起來的工人政黨完全斷絕了各種勞工團體的支持，自己去搞它們的某種“工人方案”去了，到了一八三二年開始的銀行鬥爭時期，工人們乃又在安得魯·杰克遜領導下的政黨中團結起來。

成 就

早期工人政黨雖然存在的時間很短並有很多缺點，但這些並不能完全掩沒它們的很多偉大的成就。雖然那時工人階級在數量上還不大，還不能使自己在國家的各級議會中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但這些政黨卻使大家明白地看出，美國勞工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在美國生活中出現了。這些政黨的存在更表示了工人們已

* 費城工人共和主義協會會章中第三條規定：“每月會費為五分錢，繳納與否聽會員自便。”（見一八三〇年四月三日“技工自由報”。）

逐漸認識到他們自己是一個單獨的階級，這個階級的利益和資本家們的利益是不同的。它們存在時間的短促，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表明早期的工人階級的运动已經失敗了，表明工人的獨立政治行動是決無勝利可能的。誠然，那時的各种工人政党是都消滅了，但在它們消滅之前，它們對推進美國的民主政治运动已作了重大的貢獻。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個勞工政党建立了約一年半的時間之後，“工人擁護者”曾驕傲地寫道：“很多工人們所要求的改革現在已都被公認為正當的、合理的了，甚至某些過去一直支持當权政党的報紙，現在也在對這些要求表示擁護。”這裡，“工人擁護者”正總結了一度興起的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成就。這些組織在美國的民主進步方面已進行了先驅者的活動。

誠然，所有的改革，都是在那些工人政党消失之後才真正實現的，但完全是由於它們的存在才造成一個运动，迫使那些旧政党不得不把人民的要求放到它們自己的綱領里去。因負債而判徒刑的法令的廢止，技工財產留置权法令的實施，以及強制國民兵役制的取消等，都主要應歸功於工資收入者的努力^②。同樣，在推動實行較公平的稅則运动以及採用較民主的方式來推選各公務職位候選人方面，工人們也有很大的功績。我國那種不再帶着施舍氣味的公立學校制度的終於建立，也主要是由於工人的要求所促成的。實現以政府稅收來維持學校經費這一运动的“強大推動力”，乃是“從一個覺醒了的、堅強的、以選票為武器的工資收入階級的堅決要求中產生的”^③。賓夕法尼亞州一八三四年開始實行的公立學校制度便是一個例子。

在上述這些成就之外，還必須加上工人运动在安得魯·杰克

遜的領導下，對於爭取經濟和政治民主的全國性的鬥爭中所作的貢獻。

第九章

劳工与杰克遜时代的民主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工人政党的活动歷史，虽然所涉及的都是地方性的問題，但它实际上是杰克遜时期民主斗争中的第一个階段。这些政党將產生一种推动力量使得杰克遜时期民主运动在其第二个階段或全國斗争的階段中能够順利地進行。

劳工对杰克遜的評價

虽然早期的工人政党在安得魯·杰克遜时期便出現了，但它們从來沒有想到希望从杰克遜那里得到什么思想上的領導，同时也不相信杰克遜的第一次执政有什么特別的重大意义。許多由工人政党提出來的要求，例如反对采用政党秘密会的办法進行选举等，都是由“老胡桃兒”^{*}首先提出的。他在一八二八年当选的时候，大多数的工人也曾表示慶幸，認為这是他們自己的勝利，但他第一次执政时的表現还没有使得工人們相信他正是走着杰斐遜所走过的道路。工人們对于他的誠实的共和主义精神，他的反对联邦政府津貼私人股票公司的主張，以及他的每一任总统都应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建議等表示讚揚。但工人們却也批評他与塔馬尼派

* 当时極为流行的安得魯·杰克遜的綽号。胡桃木是一种堅韌的木材，人們以此喻其性格。——譯者

的關係，批評他的軍國主義的觀點，他的任意撤換反對派职位的狹隘的黨派性，並批評他對於印第安人的權利與正當要求的輕視態度①。

一切政治與經濟鬥爭中，工人們始終只是依靠杰斐遜，而不是杰克遜，給他們一些啓示。他們認為自己是“徹頭徹尾的杰斐遜派”並因而感到驕傲，同時在他們所通過的一切議案或文告中都明顯地表現着“杰斐遜精神”。當他們想到那即將來臨的一八三二年的大選時，他們說：“事實上，我們希望再有一個杰斐遜。”直到一八三〇年夏天，許多城中的工人還肯定地說，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全國性的政治領袖够格讓我們考慮他擔任下一屆的總統，因此他們要保留他們的意見。紐約的工人說，他們認為不論杰克遜或亨利·克雷，都沒有資格獲得工人的選票，因為他們兩人都從沒有“對工人所主張的改革方案表示過任何特別的關切或興趣”②。有些工人建議說，工人應該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因此一個召開美國全國工人代表大會的運動開始發動起來。那時，擁護肯塔基州的里查·約翰遜上校的聲浪頗高，因為他曾反對因負債而判以徒刑的法令，曾主張國民教育制度，並曾在國會中極力反對星期日停止郵運的決議。紐約釘書工人雇工協會特別出來支持約翰遜，稱他為“宗教自由的不屈不撓的堅強擁護者”。“工人擁護者”也在社論中寫道：“他正是我們所要的擔任總統职位的人，我們在這裡向所有的工人弟兄們推薦他作為這個職務的最適宜的候選人。”③

銀行鬥爭

然而到了一八三二年七月十日以後，美國的工人却一致認定了一個人，希望這個人做他們的總統——那就是“老胡桃兒”，因為

杰克逊在那一天否决了重新授给合众国银行以特权的议案。否决该议案的报告说道：

“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有钱和有势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强使政府的一切法案服从于他们自私的目的。在充分享受上天所赐的福泽和从优越的工业、经济活动及人类智慧所产生的一切果实方面，每一个人是都同样有权利要求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如果法律在这些天赋的和正当的利益之外还要加上一一种人为的区分，……使得富人更富，有权势的人更为得势，则那些既无时间又无金钱来使自己获得同样利益的人、社会地位低微的农民、技工和一般工人们，是完全有权利对于他们的政府的这种不公正的态度表示抗议的。”④

这便是在一八二八年总统选举运动中曾经领导过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使他们彼此联合*的安得鲁·杰克逊所说的话。这个报告所提出的一套理论完全能得到工人们的拥护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工人们在他们自己为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所举行的集会中，早已明确地提出了很多类似的原则。不过，杰克逊的议论乃正好触动了三十年代工人阶级思想中的主要关键：权利平等的哲学，亦即詹姆斯侯爵在其所著杰克逊传中所正确地着重谈到的，一种“谋取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的社会哲学”⑤。正如“纽约晚邮报”的进步编辑威廉·莱杰特极透彻地发挥过的，这种理论——这种在工人阶级中一般被称为“平等权利的圣论”的理论——要求“把富人的财

* 有一位曾研究过一八二八年选举运动的人指出：“东部的工人和西部的农民在一八二八年选举杰克逊为总统的运动中已联合起来。”（见赫尔曼·海尔登林：“一八二〇至一八二八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亲杰克逊情绪”，一九二六年“宾州历史和传记杂志”，第五十卷，第二三七页。）

產和窮人的勞動力放在同樣的地位上看待”，反對政府的那種“使窮人負擔極重而富人得到豁免的”稅收政策，並抗議那種授與專賣公司以各種特權從而加強壟斷資本的力量的措施——因為這種力量乃是富人用來損害窮人的^⑥。傑克遜在他的報告中說，根據權利平等原則，政府的正當功能“應該限制於平等地保護全體人民，應該像上天降雨露一樣，使上等人或下等人，富人或窮人完全一樣的盡沾恩澤……”。

要否決重新給銀行以特許權的法案，傑克遜正等於是向“壟斷資本之王”發出進攻。完全是這樣的，因此反動的銀行行長尼古拉·畢多爾乃認為傑克遜的文告是“無政府主義的宣言”。但是那被畢多爾稱之為“一批暴亂分子”的普通人民卻把這篇文告看成為希望的燈塔和行動的號召。在他們看來，銀行就是經濟剝削和反動政治的象徵。在政府授予的特許專利權之下，銀行很快就變成為一切壟斷企業中最大的一種壟斷機構，並已經威脅着要使自己的權力超於政府之上。許多工人和農民擔心美國的民主政治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將受到極大的危害，因為這種制度使得“那么多的權力集中於極少數幾個不對選民負責的人的手中”，而這些人卻利用它的資金——實際上是人民的錢，因為這個機構等於是政府的金庫——來腐化立法的官員，賄賂各個報社。工人和農民們都還完全記得杰斐遜在一八〇三年所說的話，他曾肯定地說，合眾國銀行這種機構乃是“一切反對我們憲法的原則和形式的敵對勢力中的一個最大的死敵”^⑦。實際發生的情況已讓工人們知道，雖然聯邦主義的軀殼已經死去了，但它的精神卻仍活在那些銀行家的身上；他們完全和聯邦黨人一樣地鄙視民主政治和人民的福利。正如在銀行爭論時期，紐約數千工人在一起舉行的一个群眾集會所稱：

“我們并不需要更多的証据來使我們相信这种銀行是完全服务于豪門和完全不合理的，只要看一看这样一个極簡單的事实就完全够了：得到銀行利益的人永远是那些反对我們的利益，力圖剝夺(我們的)选举权，反对上一次战争（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并反对几乎所有我們的州或全國政府所已采用的民主措施的人。”^⑧

早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十五日“工人拥护者”即已号召各劳工报刊起來反对重新授予合众國銀行以特权的决定。它說：“我們希望并完全相信一切拥护工人事業的報紙一定会立刻坚强地团結起一切力量，來反抗这个压迫人民的壟断企業的。”大多数成立不久的工人報紙馬上响应了这个号召，因此当杰克逊的否决案提交國會时，工人們就能够立刻起來給他以支持。在大选期間，工人們都团結在他的周圍，那时的关键問題，工人們認為是“究竟是由銀行还是由人民來統治这个國家”^⑨。他們的支持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杰克逊这一否决案的提出已引起了民主党內部的分裂；很多保守的民主党人已去和过去的联邦党人在一起另行組織了自由党，这个党和銀行派所提的总統候选人是亨利·克雷。

工人們一再受到不得投票选举杰克逊的警告。新英格蘭的一个工厂老板告訴他的工人說：“如果你們选举杰克逊將軍，那你們的大街將从此变成長滿野草的荒地，工厂將变成猫头鷹的樂園，所有的公路上都將滿布狐狸的巢穴。”^⑩但人民的回答是，以比一八二八年时更多的票数选举了杰克逊。

而畢多尔是不甘心向民主原則的勝利屈服的。維護銀行利益的報紙“波士頓快報”提出疑問說：“如果在选举时那些不会寫一个字又完全不識字的人完全除外，还有人会怀疑安得魯·杰克逊是

決不可能當選的嗎？那使得整個局勢有利于杰克遜的，完全是一群愚昧透頂毫無知識的人。”^⑪ 選舉結束後不久，畢多爾便開始籌謀要讓國會通過一個新的授銀行以特權的法案。反正他手中有足夠的錢去收買足夠擊敗另一次否決的同意票。

為了對付這種威脅，杰克遜決定把政府的存款從銀行提出來。他的命令規定說，一切政府資金再不准存進銀行，至于已存入款提取辦法仍按政府事務的正常程序辦理，那也就是說這筆資金在兩年之內還不能全部提清。紐約一次工人群眾大會宣稱，總統“完全應該而且已經得到我們所有的人一致的讚揚和我們的最大的感謝”^⑫。

在新英格蘭農民、技工及其他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代表們也發言贊成杰克遜所採取的措施。新英格蘭的工人運動領袖塞米爾·艾倫說：

“總統在關於合眾國銀行問題上所採取的措施，進一步鼓舞了我對於實行經濟改革的希望……。在今天哪一個政府敢於公然站起來和財富集團的勢力對抗呢？不論一個國家的政府採取什麼樣一種形式，財富集團乃是現代國家的真正的王朝。如果總統的巨大影響、政治上的大無畏的精神及個人的堅定意志能夠從它的魔掌中救出我們的政府和國家，他就將同時是恢復人民自由的巨人。”^⑬

畢多爾對於杰克遜這一行動的反應，更證明了銀行實在是美國的民主政治的一種威脅。正如聯邦黨人企圖將封港令後的困難情況歸罪于杰斐遜，以引起工人們對他的反對一樣，畢多爾現在要製造一個財政上的危機以使全國人民反對杰克遜。畢多爾降低貼現率，收回各州銀行的欠款，提高匯兌率并用其他各種金融上的奸

計來恐嚇美國人民以求得到他的特許權。畢多尔一方面因为忍受不了白宮里那个“憤怒的蠢才”而公开地悲伤得涕泪交流，一方面却又在寫信給波士頓銀行的負責人說：“除了尽量暴露困难的情况外，沒有任何別的方法能產生效果的……。采取沉着的步驟予以堅決的抵制，結果一定会……使銀行重新獲得特許權。”^⑭

畢多尔所期望的“困难情况”不久便來到了。破產的巨浪冲遍了費列得尔菲亞、紐約和華盛頓諸城市。到一八三四年五月前后，公司商号一家随着一家倒閉，这时全國金融上的灾难便已到了極尖銳的階段。只有很少的工商業者正确地指出了这次灾难發生的原因，他們同意“銀行人雜誌”所說，“这一切完全是由畢多尔先生的無原則的行動所造成的”^⑮。可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数人却都贊同新英格蘭一个工厂老板塞米尔·斯萊特的看法，認為危机之產生乃是“政府中少数几个自以为是的人对于那个應該得到尊敬的機構——合众國銀行——采取敌对立場的結果”^⑯。他們召开群众集会以抗議政府从銀行提出存款的決定，并派遣代表团到華盛頓去要求停止各种反銀行的政策。他們尽他們的一切可能以使工人反对杰克遜。最初他們則依靠哀叫和謾罵的办法。“由于無工可做，我們的技工成百地被解雇了；我們的街頭則充滿了向社会求乞的窮人，他們只要每天能掙得一点微末的收入，也都願意工作的。”此外就是，这一切之所以發生完全是由于那个“老迈不堪、昏愾糊塗，而又有着放縱的、無法控制的情欲时需滿足的安得魯·杰克遜采取了一种最違反憲法的、暴虐的行動”^⑰。

在無可如何中，許多拥护銀行派的老板們更采用了在經濟上施行恐嚇的办法，狂減工資甚至开除那些拒絕在要求總統結束反銀行政策的請願書上簽字的工人。“紐約快訊”——一家从銀行借

到五二,九七五元貸款的報紙——公開地誇耀說,它已經將那些不同意杰克遜對目前的困難情況負責的印刷工人完全開除了*。該報宣稱:

“我們希望大家完全明白,當我們被迫必須從我們的機構中裁去一些人員的時候,被裁滅的永遠是那些在有關國家大計的重大問題上和我們意見不相同的人。如果痛苦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在尽可能的範圍內,讓那些堅持那種製造這個情況的政策的人們去忍受吧;同時我們希望一般的雇主們都來采行這個原則。”^⑮

擁護銀行派的老板們的這些行動只使得工人們更加堅強起來**,由於他們的這些行動,工人們越加確信畢多爾所掌握着的權力對於整個國家是一個威脅。紐約工人所舉行的一次群眾集會宣告說:“在這種明顯地趨向於使得大多數的人民依靠着少數幾個大老板過生活的銀行制度下,再加上老板們一律採用‘紐約快訊’所提出的原則,幾年之後,在這個現在自誇為共和政體的國度里……還會有什麼自由可言嗎?”^⑯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的工會運動在反銀行的戰鬥中,擔任了最重要的角色。在工會運動最強的的地方紐約市里,各種勞工組織都團結了它們的全體會員以支持杰克遜總統。制鞋工人、印刷

*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六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有一則通告報道說,紐亞克馬鞍與鞍具製造公司早已開始這樣做了,有少數幾個工人“由於在上次競選運動中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擁護杰克遜的各項政策)被公司立即解雇了”。

** 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擁護杰克遜的工人群眾大會提出疑問道:“當我們還記得大革命時期的英雄人物們在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之前所忍受的各種痛苦的時候,我們難道要因為現在這一點暫時的困苦情況就屈服了嗎?這種念頭是不應該有的!”(見一八三四年四月四日“人報”。)

工人、石工、家具工人、室内装饰工人和一些其他行业的工会组织，都召开了特别会议，坚决表示了他们对杰克逊的支持，表示反对银行及一切垄断企业。此外，他们更公开斥责那些因工人拒绝在攻击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名而开除工人的老板。在费列得尔菲亚，所有的工会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步骤来支持杰克逊。该城的制帽工人会向总统呈献一顶毛皮帽子以表示他们对他的钦佩。他们已受到老板们的严重迫害，但是，他们在呈献礼物时宣称说，“忠于一七七六年的那些原则”，他们决意继续斗争，直到两个“银行妖魔”被消灭时为止^②。

在反银行的斗争中占极重要地位的报纸是那由乔治·亨利·伊文斯编辑的一种廉价的工人周刊“人报”。“人报”称杰克逊为“祖国的救星，维护政治上的正义与平等权利的不朽的战士”。该报给毕多尔取了一个外号叫做“专制君主尼古拉一世”，并斥责他是正利用“皇后陛下”——银行——作为工具，企图在美国人民中实现专制君王的统治。一期接着一期，“人报”坚决说银行派乃是英国政体的崇拜者，他们正热望在美国仿制一个世袭的君主制，一个世袭的反动的上议院，一个在严格的财产限制的基礎上选举出来的下议院，一种政治与教会相勾结的制度，一个界限分明的阶级社会，一种专为有钱人的孩子而设的教育制度，以及一种对报纸课以重税使得只有富人才能看报的新闻制度^③。

当国会所派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发现该银行的许多股东原来都是英国的贵族的时候，“人报”便公开把他们的名字发表出来。总计有价值九百万元以上的银行股票为外国人所有，而这还只限于那些用自己的名字出面的，至于那实际上属于外国的亲王和公爵而以他们的美國代理人的名字出面的还未计算在内。“人报”问道，

“难道这样一种事实还不足以使美國人民驚恐嗎？一个居于共和國心臟地区并在全國各地都設有分行的銀行；掌握着兩万万元的資金；拥有巨量的不动產；控制着十·万·名·債·务·人；收買我們的各种報紙，進入我國政治領域來進行活動；并企圖由它來決定我國的總統和副總統的人选；而这个銀行的如此巨大的一部分却是屬於歐洲的貴族的。”^②

“人報”虽然攻击英國貴族階級并以銀行如此地受着外國控制而斥責銀行，但它还是像整个工人运动一样，并不是抱着狹隘的民族主义。它登載了一切在英國或其他國家中發生的、有利于工人階級的各种运动的詳細情况。英國的大憲章运动，法國和德國的工会活动情形，歐洲的爭取縮短工时的运动，以及俄國、丹麥、奧地利及巴西諸國貧民的痛苦遭遇等，“人報”都極力詳为报道。它并在社論中指出，美國的工人斗争与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人斗争是完全不能分割的。为了使这个論点發生更大的力量，“人報”刊登了英國工会运动者寄來的一封討論美國銀行斗争問題的信：

“英格蘭的進步党派正以热切期待的心情盼望着杰克遜的勝利；千万顆心都同时在預祝他的成功。我們把你們國家所發生的这一事件看成为是关連着歐洲的命运的。英國的可詛咒的銀行是否能被消滅，也有賴于你們这个斗争的勝利。”^③

紐約工人的作用

工会組織和勞工報紙在反銀行斗争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組織力量在政治上支持杰克遜。自由党曾力圖爭取劳动人民，因为它知道如果它能够地方和國会的选举中獲得勝利，它便能迫使杰

克遜放棄其反銀行的斗争。在民主党的分裂情况最为严重的纽约城，自由党人相信他们一定能获得胜利。一八三四年二月八日，自由党召集纽约工人在市政廳公園开会以抗議提取銀行存款的決定。和他們合作，一起來組織这个大会的人中間，有过去分裂工人党的庫克—古揚派的几个領導人。

工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但他们却不是來对杰克逊表示反对，而是來对他表示拥护的。他们不同意由那些發起人主持大会，而另外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主席团人員。然后他們進行會議，通过了一連串的決議以对一切反銀行的策略表示贊成。当原來的那些發起人企圖重新取得对大会的控制权的时候，工人們便把講壇給拆毀了。他們扛着一塊一塊的破木片到街头去游行，高呼着：“杰克逊万岁！”^{②④}

在这次事件之后，工人开始在民主党內更加緊活动起來。工会的領袖們一方面到各区域委员会去担任工作，一方面在塔馬尼大廳的集会上發表演說。在一八三四年市長选举运动中，这是紐約市第一次由人民來选举市長的运动，工会运动者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罗凌士，和他競爭的是拥护銀行派的自由党候选人維尔潑蘭克。工人們說，总统已經尽了他的責任。“你願意自己承認或讓你的孩子們認為你無出息嗎？如果你回答不，那你就應該投票拥护罗凌士、杰克逊和憲法。”^{②⑤}

这次选举是有全國性的意义的。自由党人的勝利会嚴重地不利于总统。杰克逊自己却有高度的信心。他告訴一位極感憂慮的政党領袖說：“你知道，我從來不会感到絕望。我信賴人民。”^{②⑥} 他的信賴是沒有落空的。紐約的工人堅強地站起來了。工人們向投票处行進時唱道：

技工、車運工人和一般勞工們
大家必須堅決地團結緊，
讓那些有錢的貴族在這次
選舉中，瞧瞧咱們的雄勁……。
起來吧，美國人，讓我們合力把
狂妄的銀行集團的巢穴踏平，
除了那哈特福特的聯邦黨人
再沒有誰反對窮人和杰克遜^②。

羅凌士獲得了勝利。一八三四年四月十二日，“工人擁護者”以“銀行吃敗仗了！”的大字標題宣告這個“輝煌勝利”的消息。

雖然紐約的工人曾幫助選出了一個塔馬尼派的候選人，但他們並沒有繼續不加批判地支持塔馬尼派。他們知道塔馬尼派中有很多領袖人物所以反對合眾國銀行只是因為它是州銀行的死敵，而在州銀行中他們是占有大量的股票的，因此他們不過是希望由州銀行來控制全國的經濟與政治生活。但對於擁護硬幣政策並反對任何銀行控制國家貨幣的工人來說，國家銀行和州銀行僅只有名稱上的區別而已。實在說，工人們擔心州銀行所引起的投機狂熱，將會使他們對於要求減少紙幣流通量並整頓國家經濟使其有利於工人階級而不利於投機商人和金融巨頭的整個運動完全遭到失敗。如果取得對於合眾國銀行的勝利的結果，只是由地方性的銀行壟斷家來代替它的位置，那這種勝利將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為了對抗民主黨內保守派的影響，工人們在一八三四年五月另行組織了民主工人委員會。在該會中最为活躍的有一些是過去工人黨中的領袖，如喬治·亨利·伊文斯、伊比尼瑟·福特、李

維·史萊姆、約翰·康默羅特、小亞歷山大·明、小罗伯特·湯生德和伊力·穆尔等人。

塔馬尼派的首腦人物对于这个新的委员会抱着敌视的态度，并指责它阴谋分裂民主党。该委员会回答说，它唯一要做的事是推选出一些真正反对特权阶级的人来在州政权和国家政权中担任职务。它同时警告塔馬尼派说，任何一个不肯明白表示反对一切垄断企业、反对授给公司以专利权的特许证的候选人，要想竞选这些职位，都将不可能得到它的支持²⁸。

因为需要得到选票，塔馬尼派被迫接受了这些条件。它同意委员会的要求，让所有参加一八三四年秋季竞选运动的民主党候选人均反对银行及其他垄断企业，赞成禁止继续发行小额票面的银行钞票，并采取坚定的立场来反对一切企图恢复债务徒刑的运动。塔馬尼派同时提出了几个工人作为州议会議員的候选人，而纽约总工会主席伊力·穆尔则被提名为民主党的国会議員候选人。

所有提在候选人名單上的工人都当选了，伊力·穆尔成为在国会中第一个代表有組織的工人的議員。他的首次演说是反击南卡罗來納州代表華迪·湯普遜，湯普遜以飢餓的失業群众將举行暴动的話來恐嚇北部的商人，說他們將“用無法無天的暴动或以同样可怕的，即通过投票箱的办法來進行搶奪”。穆尔回答说，在整个历史中，贵族和專制暴君們無时不在利用將“土地平分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和無政府主义者”等称号加在人民头上的办法以替他們掠夺和压迫人民的行为找借口。他更說，历史已經証明，真正危害社会安定的东西以及造成一个國家的衰微与瓦解的基本原因永远是集中財富和政权于一手的那一小撮貴族集团。他說，“先生，

歷史將證明我的話是完全正確的，那就是不論在什麼時代或在任何國家中，貴族集團是永遠不變地無窮盡地在掠奪人民，犧牲人民的利益，並在和自由、美德與人道作戰”。他接着說，平等權利的擁護者們，却正在保衛國家的最高利益，他們贊成一個“建立在人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在財產的基礎上的、建立在平等權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特權的基礎上的政府。這些人的利益和幸福與合眾國的保存及政府的穩定與完整是完全不可分的”。各勞動階級沒有任何意思要否定他們自己或任何一個別人以勤勞和節儉來積累財產的權利。他們所反對的只是把特權授給少數的幾個人，使他們能夠取得對財產與資本的獨占。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人民或人民團體損害他人財產的例子，我們同時就可以找到五千個少數特權階級以其無人性的貪婪掠奪人民財產的例子。先生，資本無理地掠奪勞動的利益，是比勞動不合法地奪取資本的行為更危險得多的。”

穆爾接着提出對於工會運動的辯護；他說，工人組織乃是“為了在任何時候當資本家們企圖發揮其不合法或不正當的力量時以便與他們對抗的一種機構”。它的目的只是為了自衛與自存，它們更不可能是什麼陰謀組織，因此，它們是合法的。

“反抗匪盜和殺人犯，不論天理國法都認為是完全合理的，那怕反抗者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為了反抗瘋狂的利欲和暴政的侵害，它們就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衛士，因此，享受着獨占特權的朋友們當然會害怕它們的力量與影響。工人的團結不僅僅是為了防禦任何敵對的結合體的一個盾甲，它同時也是一種進攻的武器，這種武器一定將被有效地用來擊敗那腐化與專制的貴族集團的一切高壓政策。”^②

穆尔的演说被费列得尔菲亚的“全国劳工”印出来散发到全国各地去。有些城市中的工人们更举行宴会来向伊力·穆尔致敬，并决议在各个地区中重新加紧他们的政治活动，以使国会与州议会中能够很快有更多的工人代表*。

火柴民主党人的兴起

这时在纽约，州银行派的民主党人与反垄断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分裂情况也正迅速地发展着。在工人们看来，州银行的加速度的发展只不过是“许多单位组成的一种专横不法的银行团来代替一个银行大王”而已。州银行所发行的通货膨胀的结果，急剧地减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决心要整个结束这种银行制度，要“把这种被称之为银行家的，永不从事生产的常备军全部解散”的工人人数是不少的⁽⁹⁾。塔马尼派所以遭到分裂的另一个因素是该组织领导方面的极度专制的作风。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主张人民更广泛地参加提名与选举运动的工人，已成为不能忍受的了。

于是，一八三五年的夏天，他们秘密地在塔马尼派内部成立了权利平等民主派，以图恢复民主党“原有的纯洁性”。这一派在同

-
- 虽然穆尔由于这篇演说极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但由于他在关于囚犯劳工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他仍从劳工运动方面受到尖锐的批评。他曾被派去参加一个委员会，对于这个严重地威胁着工人生活标准的情况进行调查，但他却在一份实际上赞成囚犯劳工的报告上签了名。工人们斥责他这个行动为“一种公然无耻的变节”；一八三五年三月五日，民主工人委员会更在正式的决议中说：“伊力·穆尔在那个报告上的签名，使我们相信他实际上是沒有足够的政治上的忠实或者是沒有足够的道德上的勇气来为那些伟大的原则进行斗争的，虽然他今天在政治上的地位完全是由于他表示承认这些原则而来的。”（见一八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纽约晚邮报”；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二日、七日、十一日、十四日及二十日“人报”。）

年秋季便开始公开出來活动，它并得到“紐約晚邮报”的威廉·莱杰特的支持^①。一八三五年秋季，塔馬尼派更提出了同情銀行派的候选人，民主党乃因此分裂了。这些候选人中間包括了曾經違背自己在选举前所作的保證，在議會中投票贊成頒發銀行特許証的查理·亨利·霍尔，而工人階級所提候选人竟被从候选人名單中剔除了。虽然在塔馬尼大廳所举行的最后通过候选人的群众集会往往只是一个形式，权利平等派却仍决心要在这里否决掉所有拥护銀行派的候选人。他們曾为將在十月二十九日举行的批准候选人的大会進行了組織工作。大会开始时，某銀行總經理提出一个頗有地位的銀行董事來担任大会主席；但工人們拒絕同意他的提名，并把主席的席位从銀行董事那里拿过来讓一位工会領袖坐上了。

塔馬尼派的支持者由于自己只占少数因而遭到失敗，乃立即退出了会场。他們企圖以关掉煤气灯的办法來阻止會議的進行，但是工人們却拿出火柴來点亮了几枝蠟燭繼續开会，提出了一批反对壟断資本的候选人。由于这个大会采用了这种照明的办法，自由党和塔馬尼派的報紙乃給这里所產生的这个候选人名單以火柴民主党候选人名單的称号。工人們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号，并認為它正是人民反对壟断資本的象征而感到無限驕傲。

选举結果，因为有三千五百張以上的选票为火柴民主党的候选人所得，大大減少了塔馬尼派的票数，塔馬尼派因而也只能以略勝的多數击败了自由党人。一八三六年春季塔馬尼派的控制权則因为火柴民主党人分去选票而完全被阻撓了。在討論这次选举結果的时候，权利平等派工人的一次全体會議決議說：

“虽然对于在壟断資本压迫下的人民來說，不論是銀行派

的自由党人或銀行派的民主党人当权，結果都完全是一样的，但我們却为塔馬尼派的失敗感到慶幸，因为它的失敗將可能逐漸瓦解那种現存于政府官員与民主党內的貴族集团之間的罪惡的結合。”^②

局势的推演越來越使得独立的政治行动成为迫切的需要，但在好几个月的時間中，那些反对壟断資本的人却力圖“重新占有塔馬尼大廳”，而不去進行一个新的政党的組織工作。不久，那个由于工人階級的支持才獲得其职位的罗凌士市長居然在一次碼頭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派出國民兵來了。緊接在这个不幸事件之后，更出現了那在全部美國工人歷史中最令人驚奇駭异的一次法庭判決案。虽然老板們一方面依靠工賊、黑名單、閉厂、地方警察与州里的國民兵來与工会作战，但他們的主要的依賴仍然是司法官。就因为这样，工人被控为圖謀不軌而受到審判的有一八二一年及一八二九年賓夕法尼亞州的制鞋工人，和一八三五年紐約的制鞋工人；一八二四年布法罗的成衣工人、一八二七年費列得尔菲亞的成衣工人和一八三六年紐約的成衣工人；一八二三年紐約的制帽工人；一八二九年費列得尔菲亞的紡紗工人；以及一八三四年康涅狄克州的毛毯工人。

一八二七年費列得尔菲亞的二十四位英勇的成衣雇工受到審判的事是有很大的重要性的，因为这次案件的判決只是強調他們的陰謀活动“有害商業”的一面，而不是強調所謂犯罪行为的一面。此后对于工人案件的判決書更越來越多地表現着这个特点。例如，在一八三五年对日内瓦鞋工的審判中，为工会运动提出辯护的主要論点是：如果沒有工会，工人便处于完全無力的地位。“你們現在是禁止这些人進行那唯一能使他們有力量去抵抗貪婪所加在他

們身上的壓迫的團結活動。……你們更不允許他們有方法有機會去了解他們作為一個公民所應該執行的一切權利和義務。”^{②③}

但陪審官對於這些却是無動于衷的。在听完申辯後二十分鐘之內，他們仍提出了“有罪”的宣判。當工人向紐約州最高法院上訴時，該法院仍舊支持原來的判決。宣讀判決書的首席法官薩偉奇認為有組織的工人迫使工資提得太高，使得老板們沒有辦法再繼續參加競爭了。就這樣，破壞皮靴與皮鞋製造業的皮鞋工人便犯了“一種破壞法令的罪，因為這種行為是有害於貿易與商業的”^{②④}。

一八三六年，紐約成衣雇工協會有二十五名會員因被控告為“陰謀危害商業、進行騷擾、暴動及侵犯人權的活動”受到審判。結果他們也是被判為有罪，并被課以總數達一千一百五十元的罰金。該會的主席，亨利·福克納被罰一百五十元，其餘的人則被罰五十元或一百元不等。當被告方面的人繳納罰金的時候，法庭上當時有一位工人立刻走出來將他自己的工資捐出以抵付罰款。後來，其他城市的工會也都捐款來幫助這些成衣工人。

審判官愛德華茲在對這些工人作判決的時候宣判說，對於“本國貿易的控制權……現在是正迅速地由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轉移到一些私人所組織的社團中去了”。他更接着說：

“在這個幸福的法治與自由的土地上，上升的道路對所有的人都是暢通的……。每一個美國人都知道——或者應該知道——除了法律之外，他便沒有任何更好的朋友，他也更不需要任何人為的結合來保衛他自己。這種結合組織是從外國來的東西，並且我現在不得不相信主要支持這些組織的都是——外國人。”^{②⑤}

審判官愛德華茲的宣判和這種談話遭到暴風雨般的抗議。為了回答他的這種攻擊，“紐約晚郵報”提出證明說，被告的會員中有十一人是土著美國公民，另外九人之中，也有五人是歸化了的公民。“不論怎樣，即使工會里有很多會員是從外地來的我們的工人弟兄，我們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為絕大多數土著美國人所支持和擁護的。”晚郵報估計紐約工人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加入了工會組織的，並以此駁斥那種“組織工會的只是少數幾個外國人或全是一些外國人”的無理的攻擊³⁶。費列得爾菲亞的“全國勞工”更提出了一個極全面的回答，它說：“工會究竟是在哪一個國家或由哪一些人開始組織起來的這個問題，是完全不關緊要的，我們只要知道它是由於各種壓迫逼迫產生出來的東西就已經夠了。”³⁷

全美洲進步的地方都已起來對於這種把工會說成是陰謀組織，以及說工人進行組織以求得到足夠維持生活的工資乃是有害於貿易與商業的理論痛加駁斥。“紐約晚郵報”的編者同時是第一流的美國詩人的威廉·卡侖·伯利揚特寫道：“如果說這不能算奴隸制，那我們是已經忘記了奴隸制的定義了。既然可以剝奪自由人為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進行聯合的權利，你也就同樣可以把他們變成某一個主子的私產或者把他們看成土地的附屬品。”³⁸英勇的自由詩人約翰·格林里夫·惠梯爾則提出了更為有力的反駁，他說：

“那麼，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在這片權利平等的土地上，一個工人不可以和他的另一千個工人伙伴在一起決定工資的數額，如果這樣，他們就一定要在我們的法庭上被控告為刑事罪犯。商人們可以共同規定他們的貨物的價格；律師們共同決定他們所需要的手續費；醫生們共同決定他們的診斷

費；製造業商人也可以共同規定應給他們的职工的工資，而只有工人却不可以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訂出他們的勞動力和技術的價格。如果這便是法律，這種法律是不公平的，是暴虐的，是罪惡的。它就不應該被留下來沾污一個共和國的法律典籍……。整個那一套理論完全是從歐洲的封建貴族制度中抄襲來的。如果讓它像現在在紐約一樣，在各地普遍實行，那我們的自由與幸福的工人們的遭遇將不會比匈牙利的礦工或波蘭的農奴的境況好多少。”^{③⑨}

這次裁判激怒了全國的工人；在兩個星期內便有四家勞工報紙創辦起來以和這個判決作戰^{④⑩}，各方面的建議書如雪片一樣送到紐約總工會的機關報“團結”報社來，提議舉行一次全州工人代表大會以選出一個保證撤除薩偉奇和愛德華茲職務的議會。“團結”不但贊同這些建議，並提議：“和兩個政黨都斷絕關係，自己單獨提出一份真正是工人的候選人名單。”^{④⑪}

不署名的畫着棺材圖案的傳單在全城中到處出現，號召本市人民在審判官愛德華茲宣判的時候舉行群眾性的示威。傳單中有一段是：

“富人对窮人的進攻！”

貴族集團的走狗，審判官愛德華茲對人民、對技工和一般工人發動進攻了！你們的自由已經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你們的祖先從鬥爭中得來的榮譽現在已經被從你們的手中搶奪去了！北部的自由人現在已經和南部的奴隸居于完全相同的地位；他們除了勞動之外再沒有任何別的权利，而那些無所事事的二流子們却用你們的鮮血一個個喂養得腸肥腦滿！你們的

二十个兄弟伙伴因为敢于反抗抑低他们工资的决定而宣判为罪犯了！審判官爱德華茲指使着一个美国的陪审团，该团的人员更同意了他的指使，已经建立了一种工人无权调整劳动力的价格，或者只有富人才有权决定穷人的需要的第一个判例。为了满足贵族们的残无人性的欲望，这些自由人将于一八三六年六月六日，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听受对他们的判决了！”^⑫

在这种画着棺材图案的傳單的号召下，宣判的那一天大批的群众聚集在市政廳公園，但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便又散去了。可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則有兩万七千多人在該公園举行了一次巨大的群众集会。“团结”报称它为“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工人集会”^⑬。这个集会通过了一个战斗綱領，并斥責那个判决为一种“由贵族们协商提出意在完全剥夺工人的自由的陰謀，而这种自由乃是他们的革命祖先作为一个神聖的遺產留傳給他們的”，这些法院与贵族们是正在力圖把工人变成为“僅僅作为一种替那些攫夺一切而自己不生產品任何东西的人創造王侯般的財富的工具”。“擺在我們面前有一个值得我們學習的例子，那就是那不朽的技工群所实行的神聖結合；他們不顧对‘貿易与商業’的損害，仍然進行‘密謀、联合，并作出各种協議’，采取公开的行動將那些以‘只有納稅义务而無代表权利’为标志的茶叶傾倒到波士頓海港中去。”

有一个決議案說，“只有納稅义务而無代表权利”現在是又一次成为一个重要的問題了。普通人民都必須繳納賦稅，而現在却只是一些对工人階級毫無同情的人占据着司法与立法機構中的一切位置，普通人民是完全沒有自己的代表的。因此，現在已經是“和兩個政党都断絕关系，自己單獨提出一份真正是工人的候选人名

單”的時候了。僅只是表示需要採取政治行動是不夠的，大會更發出號召，決定要在一八三六年九月十五日在猶提喀舉行一次全州代表大會，並且選出了一個通信委員會以便進行關於這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該委員會中的許多委員都是紐約總工會和火柴民主黨運動中的領袖人物^④。

甚至在這個會議還沒有舉行之前，在紐約州的哈得孫，以陰謀活動的罪名受到審判的八名制鞋雇工已被宣告無罪的消息便傳來了。又過了幾天之後，更有一個消息說，在費列得爾菲亞一次陰謀案件的審判中，陪審團也做出了被告“無罪”的宣判。工人們的抗議迅速產生了效果的這種情況更加強了工人們的決心，他們要永遠徹底地消滅那一套所謂陰謀不軌的論調^⑤。

幾個星期之內，在坡啓普息、特洛依、阿爾巴尼和哈得孫各地都舉行了農民和工人的集會，一方面抗議審判官愛德華茲的判決，一方面推選出席大會的代表。一八三六年九月十五日，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技工、農民和一般工人的代表大會在猶提喀開幕了。出席代表共九十三人。這次大會的最重要的行動之一便是發表了它的“獨立宣言”，宣告工人與農民完全脫離一切舊的政黨自行獨立。它對於銀行鈔票與紙幣以及法院的專橫態度表示反對；並要求制定法律保障工人通過組織去要求增加工資的權利。為了確保法院不能再“如在封建主義的黑暗時代一樣獨斷、專橫、壓迫人民”，代表大會要求以三年一任為限度選舉法官。

按照它的宣言所提出的原則大會決議成立一個和州內“現存一切黨派有區別的獨立的”政黨。它決定以權利平等黨作為該黨的名稱，並提出布法羅的伊薩克·史密斯和摩西·杰克斯分別為州長與副州長的候選人，史密斯于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三二年曾兩

度为欧文派在工人的候选人名单上提出过，杰克斯是纽约的一个工会领袖。至于其他的职位，大会誓言只支持那些愿意签字保证反对一切垄断企业的候选人^{④⑥}。

“团结”报热烈庆祝犹提喀大会的举行，称大会所发宣言为“宣告我们独立的第二个宣言”，并称那即将到来的选举运动为“我们的第二次大革命的第一次战斗”。它说：“一七七六年的独立革命是反抗英国的君王和贵族的；而现在这个一八三六年的革命则是反抗专利执照与垄断企业的。”^{④⑦}

很快，权利平等党的候选人名单已经在二十个郡中被同时提出以及这一运动正为六、七种报纸所极力支持的消息传来了。这些报纸中的一种，阿尔巴尼的“显微镜”，引用第一个工人政党的历史作为教训，警告大家注意政客们的诡计，它说：

“大家应该牢记着工人们已曾遭遇过的值得悲悼的命运——他们由于同别的派别搭班子，和其他的政党混在一起，很快便遭到了严重失败。他们把那些早就不为任何人所信赖的破落的律师和政客们也都吸收到自己队伍里来。他们把那些仅仅提出名字就足以给工人们带来政治夭折与死亡的人也提上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他们的原则本来与现在构成平等党的原则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但他们被引入邪途，不自觉地便被卷入一个漩涡中去，永远也无法逃出。”^{④⑧}

在一八三六年的选举中，旧派的民主党人提出了马丁·凡·布伦和里查·约翰逊分别为总统与副总统的候选人。因为不能信赖“其他的候选人的忠诚、能力、或对民主的信念”^{④⑨}，权利平等党希望民主党的候选人能够支持他们的原则，并保证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纸币和垄断企业。约翰逊对他们的意见完全接受了，并保

証執行他們的一切原則，但凡·布倫拒絕採取反對壟斷企業的立場。因此，雖然權利平等黨知道凡·布倫是杰克遜所挑選的人，它仍拒絕在選舉中給他以任何支持。權利平等黨對於所有的正總統候選人完全不予考慮，稱他們為“四個二流角色”，認為他們如果當選了，對工人是沒有什麼好處的^⑤。

在同年舉行的國會與州議會中的選舉，權利平等黨掌握了自由黨人與民主黨人之間的勝敗決定權。權利平等黨所支持的四名國會議員候選人中有三名當選；他們在當選後也承認其勝利是完全依靠工人政黨得來的。權利平等黨同時還協助選出了一個州參議員和兩個州眾議員。但是這次選舉的最突出的成就是權利平等黨人的選票阻止了塔馬尼派對國會議員與州議員的控制。第二年春季，塔馬尼派在市長與市參議員的選舉中也大吃敗仗，只獲得全部選票的百分之十二左右。當民主黨人指責工人們不應該使自由黨獲得勝利時，他們回答說，他們所以單獨提出候選人是因為他們“看不出擁護合眾國銀行的自由黨人與擁護州銀行的民主黨人之間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⑥。

紐約工人撤除對舊派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這件事，其效果並不止於是促成了自由黨人的當選。他們更教育了這兩個政黨，讓它們明白，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工人的力量都是不容忽視的。保守派和听人指揮的政客們儘管也能提出他們的候選人來，但如得不到工人們的選票，他們就無法當選。

火柴民主黨運動的擴張

其他各州也都吸取了這個經驗教訓。在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之間，賓夕法尼亞民主黨內也發生了和紐約所發生過的類似

的分裂。由費列得尔菲亞工人运动所領導的該党的進步派在一八三五年的州选举中坚持自己单独提出的候选人名單。坚决反对銀行壟断資本家的亨利·慕倫伯格被提名为州長候选人，費列得尔菲亞的工会領袖威廉·英格利士和湯姆斯·霍根則被提名为州參議院与州众議院的候选人。結果是自由党的候选人獲得了勝利，但工人們却仍做到使民主党的政客們明白工人的意見是不能忽視的^④。

在麻薩諸塞州，民主党的左翼是由工人領袖塞斯·路得、查理·道格拉斯博士、錫俄菲勒斯·費斯克和奧瑞斯第斯·伯朗遜，以及一些开明的政界人士与知識分子如弗萊得立克·罗宾遜、乔治·本克罗夫特和小罗伯特·蘭道尔等人領導的。到一八三六年时，進步派在全國機構的支持下取得了對麻薩諸塞州整个民主党的控制权^⑤。

权利平等党的政治运动，或按一般的称謂，火柴民主党运动，在紐約發生了極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在紐約州以外有些城市里，憲法規定禁止工人組織从事“党派政治活动”。但就在那些城市中，許多地方的工人为大势所迫仍采取了坚定的独立的政治立場，例如关于紐約成衣雇工案件的判決便引起了那里的劳工核心組織書面向他們的州議會請求糾正。但很快大家都明白，如果工人在一切政治論爭中沒有独立的發言权，这类請願書是只会被忽視的。在一篇致宾夕法尼亞州、新澤西州及俄亥俄州的工人的通告中，“全國劳工”呼喊說：“站起來吧，工人們！丟开对任何政党的依戀，用你們自己的投票权去証明你們的权利是不能听人任意侵犯的。”^⑥

費列得尔菲亞工人的响应是來得并不迟緩的。一次重要的市与州的选举运动在一八三六年的秋季就要來到了。那年七月，費列得尔菲亞市長史威夫特由于他强迫逮捕和非法監禁了几名爭取

提高工資的罷工工人，激起了工人階級無比的憤怒。費列得爾菲亞的工人決心要阻止那個反對工會的市長重新當選。由費列得爾菲亞工會聯合會所召集的，八月末稍在獨立廣場舉行的一个群眾大會，對史威夫特市長的重新當選提出激烈的反對。大會更授權給一个由威廉·英格利士和約翰·費拉領導的委員會去和民主自由黨及民主一凡·布倫黨進行商談，必須堅持提出進步人士為市長及市議會議員的候選人。大會并指派該委員會向杰克遜總統提出請願書，要求在費城海軍造船廠中建立十小時工作制^⑤。

一個月之後，一群擠滿會場內外的聽眾來听取委員會的報告了，這報告說：民主自由黨人採取了完全忽視他們的態度，但凡·布倫派民主黨人却曾給他們以同情的響應，保證決不“在市議會候選人名單中提出任何堅持要重選史威夫特為市長的候選人”，并且說他們“也極度反對史威夫特市長勒索高額保釋金的違反憲法的專橫行為，以及他對那些僅是為要求他們無可置疑的正當權利的貧苦工人所施行的非法監禁”。此外，他們并贊同提出費城工會聯合會的會員威廉·愛德華茲為州眾院議員候選人。該委員會同時報告說，總統已經下令在海軍造船廠實行十小時工作制。

大會對委員會的報告熱烈歡呼，并特別通過了一項決議，頌揚總統“在海軍造船廠建立十小時工作制的問題上這種迅速滿足費城工人要求的作風”。

“決議：讓十小時工作制和工會等的敵人們在它們的英勇鬥爭下消滅吧，現在是連政府也表示讓步了。”^⑥

在隨即來到的選舉中，一个對工人採取友善態度而敵視史威夫特市長的市議會當選就任了。威廉·愛德華茲則被選進州議會以代表費城的工人階級^⑦。

权利平等党运动对于道尔的暴动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道尔的暴动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为争取在罗德岛制订比较合乎自由原则的宪法以及取消选举权问题上的高额财产限制的一个运动。著名的新英格兰劳工组织者塞斯·路得便是这个群众暴动中的领导人之一。无数的工人举行盛大的要求选举权的游行示威，他们高举着各种旗帜，上面写着：“没有代表权利就没有义务”，“选举权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自由就要革命”等口号。这时纽约的工人们也议决说：“我们认为道尔的要求与‘自由选举权的问题’不是关系着某一个政党的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我们并希望全国的工人弟兄们对这个问题的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⑧ 虽然道尔的暴动结果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已完成了它的任务。由于这次运动，“一八四三年五月付诸实施的宪法才较为合乎自由原则了”^⑨。

当在土地、运河、关卡道以及铁路线上的投机狂潮由于一八三七年经济恐慌的来临而告结束的时候，火柴民主党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在一切工商业的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失业的技工与一般劳工在当地的工人政治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示威游行运动，主要的口号是：“必须降低面包、肉类、房租和燃料的价格*！人

* 在这个总崩溃期间，物价飞涨上涨。在一八三五年三月时，面粉卖五元六角二分一巴礼；在一八三六年三月便卖到七元七角五分，到一八三七年三月便卖到十二元。猪肉，一八三五年三月卖十元一巴礼，一八三六年三月上升至十六元二角五分，一八三七年三月则升至十八元二角五分。煤的批发价从一八三五年一月的六元一担上升到一八三七年一月的十元五角一担。（见第二十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国会世界”，附录第五二八页；柯尔：“一七八〇——一八六一年美国商品批发价格”，一九三八年阿布里治版，第二四六——二四九页；又小阿瑟·施列兴格：“杰克逊时代”，一九四五年纽约版，第二一八页。）

民的意見絕對不容忽視并一定要得到實現!”一个由权利平等党所召集的紐約工人群众大会在它被警察驅散的时候，却仍作出決定說：“我們——权利平等党，共和國的自由公民們——为了要明确知道这个城市究竟是在民法还是在軍法的管制之下，決定于四月一日在公園举行另一次的人民公开的集会。”⁶⁰

一八三七年五月，当全國各地的銀行停止支付硬幣，并拒絕再以現金收回銀行紙幣的时候，工人階級的苦难是更加深重了。各地都有工人聚集起來开群众大会，要求銀行恢复硬幣的支付，并要求政府停止取消金融機構控制國家經濟的权力，在約翰·費拉、湯姆斯·霍根和其他一些工会領袖的号召下，有兩万人参加了在費城举行的群众大会。一位在杰克遜运动中極為活躍的費城律師亨利·吉尔平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說他还“从未看到工人階級如此激昂与憤怒过”。

他在一八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給凡·布倫總統的信中說：“今天下午，我生平所見到的最大一次群众集会在独立廣場开会了。这个会是通过昨天与昨天夜晚張貼在全城各处的一种通告召集的。完全是由工人階級的人在計劃和主持这次会；他們沒有同任何通常在[·]这类事件中居于領導地位的那些人進行商量或合作。大会的職員与發言人也都是屬於那个階級的……。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反对銀行，尤其是反对公司發行的小(?)票。我未能很清楚地聽見那些決議，但大意是銀行必須恢复硬幣的支付，必須立即收回它們發出的五元鈔票，并說必須采取步驟以防止黄金白銀的外流……。”⁶¹

在这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中，工人的政治运动达到了最高峰。他們要求政府在政府雇用的員工中建立十小时工作制，并采取公

营工厂的政策以解除失业者的苦难；他们要求建立政府控制下的银行制度以遏止由私营与州银行所鼓动起来的投机狂潮。这些要求都完全是合理的，“既然不论在平时或战时服兵役的重担永远是压在劳动阶级的身上，劳动人民就更有一种额外的权利要求合众国政府对他们予以保护”^②。

火柴民主党人的成就

馬丁·凡·布倫总统以雄偉的气魄对待工人的要求。在一八三七年九月四日致國会的咨文中，凡·布倫建議成立一种完全与銀行無关的金庫制度。所有联邦政府的款項都將存放在華盛頓金庫或其他指定城市中的金庫分庫中。独立金庫制度的目的是要將政府的基金从銀行中提出來，減少銀行可借以發行紙幣的現金准备，結束以銀行鈔票繳付國家歲收的办法，并規定一律用法定貨幣支付。这个計劃虽然并未能滿足工人們所有的要求，但它仍代表着自一八二九年以來工人們就一直在斗争中爭取的一种原則得到了勝利——那个原則就是，政府必須与銀行机构分离，限制銀行的权力和控制权，并采行硬幣政策。

紐約保守派的民主党人与自由党人举行會議，攻击凡·布倫，說他是“向火柴民主主义这个丑惡的怪物投降了”。他們說，現在的政府是正在实施“那个以方尼·賴特的信徒罗伯特·台尔·欧文为首的集团在一八二九年所發布的一套学說”。然而，在另一方面，紐約工人党过去的一位領導人奧瑞斯第斯·伯朗遜却寫信給凡·布倫說：“对于您在民主与本國的財富势力之間已進行了相当时期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堅定的立場，我希望能够在自由与人道的名义下向您敬致謝忱，……您現在是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了，同

時，總統先生，人民將一定會支持您的。”^⑬

一八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凡·布倫總統由於發布了一個政令，規定在公立工廠中對於一切政府僱用員工實行十小時工作制，並一律維持原薪，乃又一次獲得工人階級的愛戴，又一次激起了保守分子的憤怒。凡·布倫公開宣告說，十小時工作制“原是由技工與一般勞工們自己提出來的”，同時，當自由黨指責他這種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低工資的辦法是正開始一個帶着危險性的先例的時候，他回答說：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說一個勤勉的工人所付出的勞動力已經得到了足夠的適當的報酬，那他所得到的工資，加上他的家庭中其他的人的補助，他們當然也應該給他補助的，就必須足夠使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過着舒適的生活，教育自己的子女，並能儲蓄下足夠的錢以防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及防老之用。

“要達到這種目的，工人的工資數額便必須與物價、與生活必需品和正當享受所需設備之間維持一個合理的比例；一切想把工資壓到這個公平的标准之下的企圖，在我看來，都是違反人道的法則和違反健全、合理的政策的。……”^⑭

這些意見使得反動派氣得滿口白沫橫流，但工人群眾却因此而歡欣鼓舞。幾年後，一個勤勉自學的、在華盛頓海軍造船廠工作的自由黑人邁克爾·興納耳寫道：“……關於十小時工作制這件事，美國人民中的工人階級技工與一般勞動者應該永遠不要忘記了可敬的前總統凡·布倫。……為了十小時工作制，上帝保佑凡·布倫吧……他的名字應當印在每一個工人的心上。”^⑮

杰克遜時代，美國政治史中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發生了。由於工人們拒絕盲目地追隨任何一個政黨，並利用他們的選舉權來

作为解救他們的特殊苦难的办法，政客們不得不作一番特別努力并对工人讓步，以便獲得那日益增多的工人选票。在一八四〇年的选举中，自由党人至少在外表上放弃了他們的保守主义，他們把威廉·亨利·哈利遜作为“窮人的朋友”向大家提出來，并拿“拥护替拍卡努* 和不减工資”^⑤作为競选的口号來号召。一八四二年，麻薩諸塞州的審判長蕭，他是屬於自由党的，在“联邦政府对亨特訴訟案”中發表了一段意見，在这里，工人們可以組織起來進行集体交涉的权利，才第一次得到司法上的承認。

这个案件的發生是由波士頓的一次全市大罢工引起的，而这次罢工乃是由波士頓制靴工人雇工会为要阻止老板雇用那些不願加入工会的制靴工人而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發起的。那时有七名工会領袖被控为在制靴工業这一行業中，進行“非法的、惡毒的与欺騙性的陰謀，企圖繼續、保持、組織并把自己联合成为不法的会社、团体和机构，并要在他們自己以及其他行業的工人中間制定各种非法的法令、規章与制度”。沒有控告他們有什么暴力行为，訴詞中也沒有提出說这次罢工有任何要想破坏原告的企業的惡毒意圖。但是波士頓制靴工人雇工会的会章却被法庭拿來作为証据，認為那里面的各种規章就是足以構成圖謀不軌罪行的一些協議，虽然那些規章从來还不曾真正徹底实行过。因此，虽然，杰出的新英格蘭的改革家小罗伯特·蘭道尔为工会領袖們提出了强有力的辯护，这些制靴工人仍被市法庭于一八四〇年十月宣判为有罪。

兩年之后这个案件由工人上訴轉移麻州最高法院，在这里，市法庭的判決被批駁了，審判長蕭在宣判時說会社組織是完全容許

* 替拍卡努是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條河名。此處乃借以代稱威廉·亨利·哈利遜，因他于一八一一年在替拍卡努與印第安人軍隊作過戰。——譯者

的，這種組織所要採取的行動，其目的“可能有一種給別人帶來貧窮的傾向，那就是說，減少了他的收入與利潤，但是，這種目的，不但與犯罪或非法行為無關，倒可能是極值得嘉許並適合公眾的利益的”。

“因此，這樣一種會社是否合法，便只能看它是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以達到它的目的。如果它所採用的手段完全是公正的或者說正當的與合法的，那不管怎麼說，它至少也是無罪的；但如果它採用了欺騙或暴力的手段，那它就可以說是帶着圖謀不軌的性質了。”^{⑥7}

換句話說，工人們設法吸收同行的弟兄來加入工會作會員這種行動本身並不能構成陰謀罪，因而也不能是非法的行為。這種行動的是否合法要看為達成這個目的所採用的手段而定。自然，這最後的一條原則，給一些有意抹煞蕭審判長判詞中的基本精神的反動法官在其後審判其他案件時，仍留下了很大一個可鑽的空子。但無論如何，管轄一州的最高法院終於承認了工人是有進行組織的權利的。

這個判決正好在美國歷史中的這一時期出現是不是偶然的呢？華特·奈耳斯認為不是的。他相信審判長蕭那時完全了解工人在投票箱上的力量，因而希望在工人中間為自由黨拉選票。他寫道：“我深信當蕭在判決‘聯邦政府對亨特訴訟案’時，即非自覺地也一定是下意識地為這樣一種思想所支配的。”^{⑥8}

小阿瑟·施列興格在他的論文“杰克遜時代”中寫道：“現在大家似乎都已明白，在我們研究杰克遜時代的民主政治的時候，如果我們不是把它作為區域間的問題而是作為階級間的問題來看，那我們就能了解得更多。”^{⑥9}各種進步運動存在乃是杰克遜時代民主

政治的特征，而在这些运动中，工人階級所起作用的实际情况已肯定地証明了这个結論的正确性。很明顯，早期的工人政党已經給那种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富于斗争性的工会运动在这方面也作了有价值的貢獻，而这个运动的發展更大大地增加了工人在政治中的影响。有些研究劳工問題的歷史学家机械地把工会运动与独立政治行动分割开来；他們一方面，企圖証明当工人有着坚强的工会組織时他們对政治是沒有兴趣的，另一方面企圖証明工人所以轉向工会运动，完全是因为他們在政治行动方面已遭到失敗的結果。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时期中，工人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从來沒有分割开或甚至对立过。相反地，由于那时歷史的必要性，他們始終力圖使二者能够相輔相成。誠然，某些工人运动的領袖对工会主义并不甚感兴趣，他們認為劳工階級所遭遇到的灾害“都是由立法制度產生的，因此也必須通过立法制度來求得解救”，并視“投票箱为現代医治一切苦难的万灵良方”^⑦。但现实生活本身却告訴工人群众，必須把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結合起來。

在費列得尔菲亞，工人政党是由技工工会联合会中產生出來的。在新英格蘭農民、技工与其他工人联合会中，政治性与經濟性的行动也是相結合的。紐約最初的工人政党是从为防止延長工作日的勝利斗争中成長起來的。較短的工作日使得工人們的政治活动成为可能，而这种活动更是必要的，因为工人已把他們自己看成是國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中間，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与意見的。紐約总工会的創立增强了工人在塔馬尼派中的影响，关于这件事，工会主席的被选進了國會便是一个証明。一八三五年和一八三六年間危害工人組織权利的各种定工人

以陰謀罪名的案件再一次使工人們感到工會運動是必須靠政治行動為其輔助的。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在紐約以及其他的城市，工會運動與工人的政治運動之間已經有了極緊密的聯繫。但這並不是說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已變成同一體了。早期工人政黨所提出來的較為一般性的要求吸引了小店主、農民以及一些知識分子。但這些政黨的廣大基礎還是由有組織的工人所構成的。權利平等黨的組織便是由紐約的工會組織發動的。而最重要的是，由於这一时期中，工會運動與政治行動已結合起來，才終於使得工人進行組織的權利成為合法化了——儘管這種合法化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杰克遜時代工人的思想意識還並不是反資本主義的；他們所注意的是消除銀行對於美國政治生活的惡劣影響；他們要結束那種享受特權的壟斷制度；他們要求有一種穩定的通貨以使他們的工資不致於永遠在波動中。關於這一些勞工階級的看法，沒有人比安得魯·杰克遜說得更明確的了，他說：

“迄今，我的微弱的聲音始終在呼喊著以金屬的貨幣來支付我國工人所應得的報酬；只要脈搏還沒有停止跳動，我的聲音仍將繼續支持這樣一個制度。如果沒有工人的富裕，工商業就一定會陷於停滯，整個國家也會陷於苦難的境地。這個政府是屬於人民的政府，它是致力於人民的幸福與繁榮的政府，而不是要犧牲多數人來為少數幾個人謀福利的……。”^①

那些想要把銀行作為一個制度來消滅掉的工人實在是純屬空想的。因為，正如他們不可能阻止機器的採用一樣，他們是無法廢除銀行的。有思想的工人們卻極希望能加速工業與商業的發展；他們僅僅要防止由於少數幾個強有力的金融集團採行了盲目與近視

的政策而使它們的發展受到阻碍而已。基本上，工人們是都認為一个屬於人民的政府，應該是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資本家的利益的。如紐約州罗徹斯特的一般劳工与技工在一八四四年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即曾宣称：

“決議：我們——本城的劳工与技工——在此表示，对于一切法令，不論其屬於何種类型，如其目的在于或趋向于帮助資本家以不合理地压迫工人的办法發家致富，我們將予以嚴重的抗議与坚决的反对。

“決議：我們反对那种認為政府的責任在于‘照顧富人，富人則自將去照顧窮人’的理論；因为極端明顯，財富本身即代表一种力量；因此，如果必須对于社会中某一階級有所袒护或有所偏愛，則这一階級即应为其中最需要特別法令以为其保护力量的階級。”^②

在杰克逊时期，工人們已使得政府中的首腦人物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这一原則，同时他們还帮助建立了必須有了經濟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才能有真实意义的理論。到了这个时期以后，美國的政治領袖們对于这些原則全都忘了，但它們却仍然深深地留在工人階級的心中和他們的頭腦中，同时，在他們其后的一切地方性的与全國性的斗争中，他們还会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些原則的。

第十章

空想社会主义(烏托邦)时期

一八三七年的危机对于工会运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生产几乎完全停止，成千成万的工人陷于失业境地。早在一八三八年一月，据说仅仅纽约市一处，就有五万人失业，此外还有二十多万人被认为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穷困之中，他们除了靠别人的施舍，根本无法度过冬天”^①。

到处流传着一个同样的消息：在费列得尔菲亚、巴尔的摩、罗厄尔、波士顿以及其他许多工商业城市里，工人们“快要饿死”了。到处都可听到饥饿的工人绝望的喊叫，他们喊叫着：“不是要谁施舍给我们面包或柴火，而是要工作！工作！”纽约有一群工人说：“我们不要谁给我们什么施舍，我们并不是乞丐。但我们不能忍受这种终日闲坐着一无所事的日子，帮我们找工作吧。我们不需要任何别的帮助。”^②

工会运动的衰落

由于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了业，其余又大部分是处于半失业的状态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期间的工会组织简直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很多地方性会社，城市中的工会以及大家希望所寄的全國工会联合会，一个跟着一个消失，一些早期的劳工报纸也随着它们不存在了。老板们的进攻更是加速这种解体过程的一种力

量，他們看到不景气現象的出現正是他們可以打垮那些战斗性的劳工組織的一个好机会。当时的一种报纸“紐約客”更慫恿工商業老板們“不要再雇用任何不肯永远和工会断絕关系的工人”。它又說：“工会的一切关于工作時間、工資以及其他种种問題的規章必須从此全部予以取消。”③

只有很少几个工会通过無比坚决的斗争还維持着自己組織的存在。費列得尔菲亞制鞋工人会于一八三七年五月宣布說，景气也好，不景气也好，他們無論如何总要維持他們原來的工資标准。一个月之后，紐約的印刷工人也發表了一篇致同業工人的通告，要他們不要离开工会組織并繼續和一切要想降低工資的企圖作斗争。有組織的印刷工人們說，要叫老板們明白，“你們現在所得的用來維持生活的那么一点点微末不堪的工資，决不能听他們高兴再减少下去——你們决不会同意为了使他們变得更富而讓自己变得更窮”。这篇通告結論說：“沒有工会我們什么事都幹不了，有了工会什么事都可以办到的。來吧！你們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印刷工人們，快参加進來，拿出你們的一份力量吧！你們支持組織，組織就一定支持你們。”④

老板們的進攻仍在繼續着，到一八三九年，工人的工資已被迫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但这并不是說在一八三七年以后那些艰难的年头中，劳工运动已完全不存在，或者工人階級已經不再作任何努力以求增進他們的社会地位和經濟地位了。各种失業群众的示威活动、閱覽室和講演会的举办、以及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要求在法律上一律权利平等的各种工人集会等，都証明了劳工运动并没有消滅。它只不过是采取了另一种形式而已。

眼看着自己的組織一个一个地被打垮，工人們正如一个同时

代的人所生動地描寫的，“隨時都準備要爆炸了”^⑤。多少年來，工人們都一直在請求政府遏止那種瘋狂的經濟投機，停止那些盲目的徒事擾民的內部改革，並制止銀行數目和銀行紙幣流通量的發瘋一樣的增長，這一切，現在已使整個國家從繁榮陷落到苦難中去了。可是現在，當工人們所害怕的情況已經變成事實的時候，應該對這種災難負責的那些集團却竟告訴工人們“回家去種你的稻子去·吧”，“似乎工人應該對商業蕭條負責，而工人的妻子兒女應該為了使僱主們獲得和經濟繁榮時期一樣多的利潤而遭受懲罰，忍受飢餓”^⑥。有一位工人曾問道：

“像我們這樣富裕的一個國家，為什麼竟會缺乏一般的日用品呢？一群精壯、健康和聰明的民眾都為暗淡的前途而絕望……為眼前的災難和飢餓所壓倒了。”^⑦

機器的廣泛使用

一個工人曾說，一八三七年經濟危機時期的工業方面的集中經營和緊接着危機以後的那種廣泛採用機器的情況，已威脅着要消滅“一個正直的技工所僅余的最後一縷希望”了^⑧。工廠老板們不是已經公開地在喊着他們把工人們只不過看成是一些螺絲釘和齒輪嗎？有一個工廠老板在談到他所僱用的工人時說道：“只要他們能按照我所願意付給他們的工資替我做工，我就僱用他們，盡力從他們取得我所能得到的東西。在我的廠房四壁以外的工人們正幹些什麼或是處於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我全不知道，同時我也不認為有知道的必要。他們應該同我一樣，各自照顧他們自己。當我的機器用舊了，沒有用了，我就扔掉它們，再弄一批新的進來，這些人也正是我的機器的一部分。”^⑨

当成千的技术工人看到机器正威胁着要进入到美国各生产部门的时候，“我的机器的一部分”这几个字真使他們感到不寒而慄。机器对他們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工人階級領袖湯姆斯·戴佛尔說：

“一切布料生产工业差不多已經全部使用机器了；机器正穩步地——我們也可以說迅速地——在向各非制造业部門侵襲；新近發明的同时能鋸曲綫和直綫的鋸木机、刨平和挖槽的机器、以及制榫头挖榫眼的机器等已明白地警告我們說，它的王國一定要擴展到占領我們全部为止，我們的某些手工業現在已完全被消滅了，但它們中間沒有一种不是已經先嚐到这一种神秘力量同它們進行無情競爭的滋味的。”^⑩

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間，美國的勞工領袖們曾欢迎使用机器，但他們坚决認為它必須被用來为社会謀福利，而不是为少数的資本家造利潤。早在一八二九年，湯姆斯·斯基德默在他的論文“人的財產权”中說：

“当窮人能从蒸汽机獲得利益时，那它对他們就决不会是什么有害的东西；假定如此，在任何其他情形也永远是这样的，它就不会看成为是一种灾害，而將被看作是一种应受欢迎的，給人帶來幸福的東西。但如果相反的，比方說，大家只看見蒸汽机將可能要使窮人更陷于貧困，或甚至要毀滅他們的時候，他們除了將蒸汽机夺過來使它成为他們自己所有外，还能有什么別的办法呢？讓他們用同样的方法，并作为自己的权利……沒收一切棉織厂、翻砂厂、軋鋼厂、住宅、教堂、船只、商品、汽艇、農田吧……。”^⑪

工会运动和火柴民主党运动中的領導人物，約翰·康默福特，

在一八三五年舉行的紐約（及其近郊）總工會成立二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主張由社會來控制和使用機器，以謀取全體人民的福利。他預言說，總會有那麼一天，資本家將完全失去控制機器的權力，而機器將是為工人服務而不是有害於他們的。“那時，機器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被用來滿足少數人的利益，而將是為大眾謀福利的。政府則將成為法定的監護人，以保證機器的改進，它並被迫為了人民的舒適和便利永遠使機器在運轉中。”^⑫

當工廠制度日益普遍采行，而使機器服務於人民大眾的希望却漸漸消失的時候，美國的工人們則越來越對於那種他們稱之為“生長中的工業封建主義”感到惶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代表着麻薩諸塞州查里士頓城工人的意見的一篇通告說：“工人弟兄們，將這一切現象放在一起看一看，然後告訴我們，目前在我們國家中正發展着的這種自然趨勢，是不是要而且是在不久的將來要迫使我們陷於舊大陸工人階級所處的悲慘的境地？我們現在已是站在一個懸崖的邊緣上；我們已開始在下降了！什麼東西能解救我們呢？”^⑬

烏托邦主義者的信條

有人說，唯一得到解脫的方法是神前的禱告和精神上的慰借；更有人則堅持說如果工人們能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他們就用不着對於工廠制度所能影響他們身心的一切懷着恐懼。只有很少數的一部分人說，人民的痛苦完全是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所帶來的；他們解釋說，少數的資本家控制着一切生產資料，但他們並不利用這種控制权去為人民謀福利，而只是為他們自己謀得利潤。一到了得不到利潤的時候，他們就停止生產，使成千的人陷於失業，使

整个國家陷于苦难的境地。

按照这一派的說法，解决一切問題的方法乃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將使人民重新獲得对一切生產力的控制权，因而廢除掉各种形式的奴役和压迫。只有这样一种社会才能回答查里士頓的工人們所提出的問題，因为这样一个社会將帶來一个普遍自由、和平与融洽的时代，以代替現在的战争、糾紛和苦难。最后，他們更認為这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來的！計劃已經擬出來了；現在所唯一需要的，只是要那些富有的、有权势的人贊同这一計劃并且給它以經濟上的支持而已。那时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進來，共同建立一个合作性質的公社社会。一切怀抱着这种美妙的幻夢的人都是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兩位歐洲的偉大思想家，罗伯特·欧文和查理·傅利叶的美國信徒們。

罗伯特·欧文是威尔斯的一位工厂老板，他在很年輕的时候，就已經看到新的工業主义的危害。决心要在消滅这种灾害方面做点工作，他在蘇格蘭的新拉孛尔克郡建立了一些示范的紡織工厂。他付給工人較高的工資，减少他們的工作時間，为雇用人員的孩子們設立了学校和托兒所，以相当不錯的住宅代替了一般工人所住的貧民窟，以及甚至在他的工厂因为缺乏棉花被迫停工时，他仍然付全薪給所有他雇用的工人。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期間，欧文的 思想却已开始超出了这种依靠慈善的厂主們來建立模范工厂市鎮的範圍。他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商品生產者將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他建議建立一些由合作的劳动者共同管理的公社，在这些公社中私有財產制將被廢除，資本家和工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界綫也將不复存在^⑭。

雖然在英國，歐文式的公社的實驗完全沒有成功，但歐文對英國的工人運動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英國紡織工人一八四四年在洛芝得爾舉辦的那些著名的消費合作社，就是這種影響所產生的結果之一。正如恩格斯在他的權威性的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所說的，英國十九世紀的每一種進步活動，幾乎都帶有歐文計劃的標志。

在歐文為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而發展他的計劃的同時，查理·傅利葉正在法國進行着類似的實驗。和歐文一樣，傅利葉相信合作公社的組織將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災害；不過他的那種一般稱之為“法蘭克斯”的公社是一種由大家合股經營的企業，而不是歐文的那種建立在財產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這種企業所獲得的利潤將被分為三部分來處理——十二分之四作為資本的紅利，十二分之三付給有特殊技能的人員，十二分之五付給工人。

歐文和傅利葉的基本不同之點是前者廢除了私人財產所有制而後者卻保留這種制度。另一個主要的不同，是歐文相信如果人類社會組織得更好一些的話，工業發展是會有助於人類的進步的，而傅利葉則認為工業化本身就是一個大禍害，他相信唯一能使人類得到解救的是一種“農業的、手工業的經濟”。

在歐文的社會中“機械和科學將被廣泛地應用，以進行一切過分勞苦的、不愉快的或在任何其他方面損害人性的工作”。而傅利葉卻計劃要讓“法蘭克斯”的成員來完成這一類的工作。使這些工作變成一種光榮的工作，人們自然會對它感興趣的^⑮。

雖然有這些主要的差別，歐文和傅利葉還是有很多共同之點。他們都相信合作社會將能夠從那一小撮資本家的手里拿掉生產資

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他們都相信部分的改革是沒有用的，必須要“整个地改造社会，消滅一切冲突和战争”。一切追求進步的朋友們对于这些社会改革者为要建立一个較好的社会所作的努力是不能不表示讚美的，可是他們的这一切計劃都不是經過科学的思考得出的結論，因此是必然归于失敗的。

欧文和傅利叶都希望依靠剝削者自己自願地來結束剝削制度。只要有某一位慷慨的目光远大的國王、王子或是資本家肯將他的財富的一部分貢獻給这一事業，一个小型的、实验性的公社就可以有足够的錢开办起來。那末，在一、二年中，人民大众就可以看出了合作公社的生活和資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之間的差別。在那时，最大的問題將是要如何去应付那成千上万蜂拥而來的、急欲要建立起类似的公社的人們了。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間一定还会有很多資本家，因为，为了逃避覺醒的工人階級所造成的革命危机，他們也必要來贊助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因此，罗伯特·欧文向美國的資本家們發出呼吁，叫他們看清楚合作公社乃是他們能够逃出必將來臨的毀滅的唯一道路。他寫道：

“这种会社將使資本家和一些有廣泛的实际經驗的人們能够毫無困难地解决当代的重大問題，即如何使这种巨大的、不断生長着的、新的制造財富的科学动力，有利于全國人民，而不容許它像現在一样繼續極端有害地为少数人制造巨大的財富，而使多数人陷于貧困，迫使他們走向絕望的境地，而这种情况如果現在不及时地采用这一方法来加以阻止的話，到最后必定会帶來这些过分富有的人們的全部毀滅。”^{①6}

这里有一个关于查理·傅利叶的故事，很可以說明这些空想家們是如何地天真：“有一天他公开宣布說，他決計每天在一定的

時間內一定在家里等候，希望有某一位慈善家能够願意供給他一百万法郎，以便發展一个建立在傅利叶主义的原則上的公社。因此，在此后的十二年中，他每天中午便都准时在家里等着，等候有一位慷慨的不速之客來到，但，多么不幸啊！結果却始終沒有一个百万富翁出現过。”^⑮

有一个时期这些空想家們曾找到了不少的信徒，其中有很多是知識分子，他們由于对貧富日益懸殊情况感到不可忍耐，因而極欢迎有一种能够通过人的理性和良知來創建一个平等和幸福的时代的計劃。他們信奉着空想家的那种錯誤的理論，認為合作社会可以在資本主义社会里面自己生長起來，因此他們坚持說，工人階級对它本身的解放事業是完全不必过問的。欧文更直率地說，他从不希望征詢“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沒有知識的人的意見來決定任何使他們獲得解救和改善他們的生活情况的策略。決不可以的！关于这个問題，在他們学得較好的習慣，并有了適當的理性知識以前，他們的建議是完全沒有用的”^⑯。

欧文主义

早在一八二五年，罗伯特·欧文便來到了美洲，在这个顯示着無限前途的新大陸上，人民是沒有为“封建傳統的僵尸的手掌”所控制的。这种改造社会的企圖在美國所得到的廣泛注意及其所產生的深刻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八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和三月七日，欧文曾兩度在美國众議院發表演說，当时出席的有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罗和已当选的下届總統約翰·昆西·亞当姆斯以及各部首長和國會參众兩院的議員。美國的報紙都詳細地报道了欧文在从紐約直到新奥尔良这一区域内經常所作的一些講演的內容，

他所建議的公社的模式也被各報紙刊印出來，廣泛流傳。

在印第安納州的新哈姆尼地方，欧文向一个叫做拉比特会的宗教团体買得了三万畝的地方，建立了美洲第一欧文式的公社；拉比特会本來已經在窩巴士建立了一个公共团体，并且已經在那里开垦了土地，建筑了房屋、磨坊和工厂。一八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欧文的“荒野中的王國”邀請全世界“勤劳和善良”的人都來參加这个公社。一八二五年夏天，約有一千人从美洲各地結隊來到了新哈姆尼。另有一些人來得較迟一些，但他們中間却包括有当代的大思想家：費列得尔菲亞科学院院長威廉·麥克留尔；同时是經濟学家、博物学家和輪轉印刷机發明者的約西亞·華倫；昆虫学家湯姆斯·賽伊；世界聞名的荷蘭化学家和地質学家机拉德·特魯斯特；罗伯特·欧文的兩個兒子，罗伯特·台尔·欧文和大衛·台尔·欧文等人。

但这个公社結果是失敗了；缺乏計劃和缺乏明确的、有力的領導，致造成彼此間不断的爭吵和分裂，促成了公社的全部瓦解。在花了二十多万元購置公社的財產和清償公社所負債款之后，欧文便不再給公社以任何經濟上的幫助了。那些來依附公社的好奇分子、投机分子和游手好閑者，当欧文一宣布說他們必須要工作的时候，立刻就离去了。但很多工人却接受了欧文的意見以合理的租价向他租用土地和房屋。不过作为一个合作公社來說，那是已經完結了。

在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二七年間，在紐約、俄亥俄和印第安納等地曾建立了另外十八个欧文式的公社。可是它們都遭遇到和新哈姆尼的相同的命运。到了一八二八年，欧文主义作为一个运动來說，实际上是已經不存在了。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这个运动又

有点复活起來了。一八四五年欧文又回到美洲，并發出一个号召，要在紐約召开一个“世界代表大会”，以便“在新大陸开始建立一个有利于全人类的新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則將与具有远見的美國政府創建者們在建立美國政府时所依据的原則完全相同”⁽⁹⁾。大会一共進行了八天，但它的一切決議始終不过是紙上空文。欧文是又一次地失敗了。

傅利叶主义

欧文計劃曾在美洲引起廣泛的討論，在他的示范性的公社失敗以后的好多年中，他的很多信徒还繼續在想推行他的理想。傅利叶主义的所以能够流行也是靠欧文替它开辟了道路的。傅利叶自己从沒有到过美國，甚至他的理想在全國發生巨大影响的那一个很短的时期，他也沒有來得及看到便已死去。他在一八三七年十月十日死于巴黎，在他死后三年，他的最大的一个美國信徒阿伯特·勃瑞斯培恩出版了他的几部書中的第一部和一些論文，在这些作品里把傅利叶的哲学思想介紹到美國來。

阿伯特·勃瑞斯培恩是阿瑟·勃瑞斯培恩的父親和赫斯特的著名的代言人，是一个富豪地主的独子。当他旅行到法國去的时候，他讀到了很多傅利叶的作品。在他一八三四年回到美國的时候，乃决計要献身推行法國空想社会主义的事業。他的第一部書“人的社会命运，或工業的联合及其改組”于一八四〇年出版。該書一半的篇幅都是用于轉述傅利叶的作品，而其余的部分則是作者的一些評論和解說，讓大家明白如何能使这个制度適合美國的情况。

著名的自由主义的新聞記者霍瑞斯·格利雷，是傅利叶主义

在美洲的一个影响最大的信徒*。格利雷过去是一个印刷工人，曾經参加过紐約市的工人运动。一八三七年的危机所帶來的灾难，和四十年代期間日益增多的对机器的采用，使他相信一般所謂美國工人比他們的歐洲弟兄們享有較為优越的条件的說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要說到劳工自由……当事实上一个需要供养自己的家庭，住着租期一年的房子的人却随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話：‘如果你願意每天工作十三小时，或者照我們規定的時間工作，那你就可留在这里，不然，你可以拿了你的証件走路，你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里是沒有別的人會雇用你的。’——难道这不明明是一句毫無意义的廢話嗎？”^②

格利雷認為必須以“在我們的社会經濟里面進行的某种巨大的改革來对抗”^③工厂制度。有一天在去波士頓的旅途中，他讀到了勃瑞斯培恩論述傅利叶主义的一本著作；因此在他回到紐約的

-
- * 現代的歷史家們对霍瑞斯·格利雷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派認為他是一位真誠的、激進的改革者，認為他“对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社會革命的重要性有如湯姆斯·杰斐遜对于一八〇〇年的政治革命”。（見約翰·坎門司：“霍瑞斯·格利雷与共和党中的工人階級成分”，載“政治科学季刊”第二十四卷，第四六八——四八八頁。）另一派虽同意格利雷的动机是真誠的，可是他們指出他所主張的那些綱領轉移了工人階級对于为改善他們当前的生活条件而進行的各种最基本的斗争的注意力，而且他还反对罢工，同时对工会主义也不热心。（見諾曼·魏尔：“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的工業工人”，第二一——二二頁，及第一六七頁；又小河瑟·施列兴格：“杰克遜时代”，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二九四——二九六頁，第三六四頁，第三六七頁。）后一种看法大致是很对的，不过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紐約論壇報”的确曾辟出許多欄以登載一些有关劳工的重大問題的文章（有时也收費的）；它的確以比当时别的報紙都更为表示同情的态度报道着各种劳工运动的消息，并且对多次劳工运动所進行的斗争都曾予以支持（虽然常常是在一种动搖的状态之中）。

时候，他已經变成了一个当时所称的工業会社的热誠的信徒。他創辦了“紐約論壇報”，乃在該報中給勃瑞斯培恩留下大量的篇幅。一八四二年三月一日，“紐約論壇報”出現了一項大標題：“真正社會組織的組成或原則”。緊接着便在該報出現了按期專欄登載的許多論文中的第一篇，一直繼續到一八四三年九月九日为止。后來这个运动創辦了它自己的報紙——“紐約法蘭克斯”、“先驅”和“社會改進者”等等——可是這些銷路極有限的小型報刊，所能發生的影响远不如勃瑞斯培恩在拥有廣大讀者的“紐約論壇報”上所占据的那些專欄。勃瑞斯培恩曾分析了存在当时社會中的各种灾害，并指出傅利叶主义將如何把它們全都消除。下面摘錄了極典型的一節：

現存的这个虛偽的社會秩序和公社制度之間的一般对比，說明了一个是人間地獄，一个則是地上天堂。

我們目前的社會制度 所產生的結果	公社制度所產生的結果
一、浪費 二、貧困 三、欺詐 四、壓迫 五、戰爭 六、毫無辦法地與人為地造成的疾病 七、占着支配一切地位的各种成見；各种改革的障礙	一、普遍的節儉 二、普遍的富足 三、實事求是 四、真正的自由 五、永久的和平 六、醫藥方面的防疫制度 七、各方面的進步與大開各种改革之路

結束这种人間地獄和創造那种地上天堂所需的一切，只是足夠買六千畝土地的資金；对于这一部分財產的所有權問題將採取

集股联合社的形式，每一个成员都同时是公社的伙计和股东；参加这个合作公社的每一个工人都可以从公社按成本价买到生活必需品，获得相当高的工资，同时还可以得到股金的红利。一切是和平，幸福！只要能先建立起一个来，就为其他的公社建立了可供摹仿的范本；“它很快就能使整个美洲的人民确信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远胜于旧的社会制度，正如罗伯特·福尔吞的第一只汽艇一出来，就使得整个世界信服汽艇是比任何已有的船只都好得多一样”^{②②}。

但更使工人们感到兴趣的，还有一八四三年十二月罗彻斯特傅利叶主义会所散发的一本叫做“劳工苦难劳工解救”的小册子。这一本小册子猛烈地攻击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处境。这本小册子说，“在那些不从事任何生产的、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们的心目中，各国的工人阶级难道不是完全被看成牛马吗？看成既无感情又无灵魂，生来就只是为了工作和死亡的一群人吗？”这本小册子问道，到底什么东西是造成工人的穷困和痛苦的原因呢？然后它回答说，“你们的劳动所必须养活的游手好闲的人太多了，这些人认为工作是一种耻辱！”* 解救的办法是很明白的；工人们应该参加作傅利叶的法兰克斯社的成员，在那里，他们几乎马上就可以得到“至少比目前工人们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所能获得的数目多于四分之一以上的工资”^{②③} 作为他们劳动的代价。

对于技工们来说，这篇文告必然是极富于诱惑性的，在突然出

-
- 这本小册子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一观念已超出了傅利叶和勃瑞斯培恩的学说的范围，他们两人都认为欺詐或财富分配不均并不是造成劳工苦难的原因。他们认为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是失调的社会制度的组织形式，而不是资本家的贪婪。

現的工厂制度的驚恐之下，這些技工們正極力尋求回到杰斐遜民主時代那些好年頭去的方法，在他們的記憶中那些年頭似乎實在是安全和自由的日子。有一個時期，很有一些工人相信他們在這種公社運動中已找到了出路，正如當時有一些中產階級的社会改革家，他們也認為這個運動回答了他們一直所祈求要得到的一個原理，依靠着它，製造階級分化的力量可以被阻止或予以抵制，依靠着它，歐洲的無產階級所遭受的苦難以及在那裡發生的革命運動將可以不在美洲的土地上發生。

走向烏托邦的道路看起來是如此容易，傅利叶主義很快就在美洲獲得了成千的信奉者。早在一八四三年，阿伯特·勃瑞斯培恩到紐約州旅行了一趟回來便極興奮地向“紐約論壇報”報道說：“在所有大城市和許多較小的城市中，人們都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在進行這方面的活動——舉办了宣傳各種理論的會社，并已開始組織一些小型的公社了。”^{②4}

在此後的十年中，有四十幾個傅利叶式的公社建立起來了，散布在從伊利諾州到麻薩諸塞州這一片廣大的區域中。它們吸收進來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員，而特別是來自工人階級的成分更多。制鞋工、靴工、成衣工、木工、細木工、桌椅匠、油漆匠、地毯織工、鐵匠、翻砂工人、机工、石工、普通工人、畜牧工人、鐘表匠、店員以及還有很多不同行業的工人，都變成了美洲各個法蘭克斯社的社員^{②5}。

一八四三年，在西賓夕法尼亞地方，由原來在阿爾巴尼和紐約居住和工作的一群技工所建立起來的“夕法尼亞”是在美國建立的第一个法蘭克斯社。一八四三年一月十七日的“紐約論壇報”宣稱：“夕法尼亞公社是由一群智慧的、精力充沛的工人办起來的，他們

知道不可能从有資本的人們那里得到帮助，乃决定用自己的劳动力來修建一个公社。”

建立“夕法尼亞”的資金是由工人自己拿出來的，此外也从一些友人那里得到一些帮助，这些友人只要認購不少于二十五元一股就可以成为股东。在它很短的一段生存时期中，它一直感到無法獲得資金的困难。“它請求那些富有的和慷慨的人們”，联合公社的執行委員公开地發出呼吁說，“認購一些股份，以使公社的土地能够迅速地开垦和利用起來，并把一些必要的建筑修盖起來。”²⁶不幸的是，富有的人并不慷慨，而慷慨的人又都不富有。

同时，也还有一些别的困难。工人們过去并没有受过从事農民工作的訓練，而这里的工作又非常艰苦。气候是那样酷寒；建造起來的房舍不比臨時搭盖起來的小棚子好多少，西宾夕法尼亞曠野里的生活，舒適二字是絕對談不上的。好几种工業，包括制鞋業在內，都建立起來了，可是由于找銷售市場的困难阻碍了它們的發展。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勃瑞斯培恩宣告这个公社已完全失敗時說：

“我們不得不在这里向大家宣告：‘夕法尼亞联合公社’因确信它已無能战胜那不幸作为公社所在地特征的無情的土壤和殘酷的气候，决定解散。”²⁷

大部分在美國建立的法蘭克斯都和夕法尼亞一样，在建立后很短的几年中便失敗了。傅利叶主义运动尽其在本國所有的全部力量支持着的北美法蘭克斯維持了十三年，麻薩諸塞州的溪流農社維持了六年*。可是，絕大多數在成立后不滿一年的時間內就

* 虽然溪流農社在最初建立时不是傅利叶式的公社，但它仍然是在美國建立的所有法蘭克斯社里面最著名的一个，直接或間接和它發生关系的当代文

垮了。

造成這些失敗的原因，幾句話就可以很快交代了。在有些公社里面，關於是否遵守安息日放假的慣例和關於採取何種教育方案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執，因而加速了它們的衰亡。在另一些公社中，因為股東比工人社員所得的報酬多，在決定社務方面他們的權利也比工人的權利更大，很多人對此經常表示不滿，也就促成了公社的瓦解。更有一些法蘭克斯社則由於無法通過公司組織法獲得固定的法律上的權利，因而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可是幾乎在所有的公社中，主要的困難是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有些資本家也參加了傅利叶主義運動，甚至將土地租給法蘭克斯社。可是這種作為往往不過是要利用公社來提高他們地產的質量的一種奸巧的計謀而已，因為當那些法蘭克斯社解散的時候，他們原來租出去的一片荒野之地，收回時便都變成熟田了²⁹。但大多數的資本家們，儘管這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一再呼喊勸導他們來支持這一種將可以消除“階級反階級或是工人反資本家”的鬥爭的運動，他們仍是完全不理解的。

小說作家那桑尼耳·霍桑從溪流農社寫信給他的朋友，很早就預言這個嘗試是不會成功的。“我作出這種判斷，”他接着說，“不是依據溪流農社內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而是根據實際的客觀情況——那就是，籌積足夠的資金或想出一個什麼計劃來可以不要相當數目的資金也可以繼續下去，兩件事都是辦不到的。”²⁹到了一八四五年，喬治·雷泊萊，溪流農社的創辦人之一，寫了一封

化界中的名人有感讓·產寧、喬治·雷泊萊、拉爾夫·瓦多·愛默生、西奧多·派克、那桑尼耳·霍桑、約翰·格林里夫·惠梯爾、馬格利特·福勒和伊利莎白·皮巴底，此外還有很多人。

信給勃瑞斯培恩，請他幫助溪流農社籌劃一萬五千元資金。勃瑞斯培恩的回信表明，他的那種可以從富有的資本家那里獲得對公社的支持的原則完全破產了。他寫道：“你需要為溪流農社籌積資金，並且馬上要。可是現在，要我為溪（流）農（社）籌劃一萬五千元是和要我籌劃十萬元一樣地使我驚惶失措。那里去找這筆錢呢？”^②

生產合作社

法蘭克斯社的失敗並不表示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國的影響不再存在了。是的，它的确使許多工人已相信，“馬上要實現一種徹底合作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了”^③。但是這些工人仍然相信，如果他們想維持或是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一種新的生產和分配的組織形式是絕對必要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間走向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急速傾向，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大家當還記得，生產合作社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時期，便已在很多城市中建立起來。一八三六年，僅在費列得爾菲亞一地，就已有許多由桌椅工人、皮革工人和手紡織工人們所創辦的工場和商店。其他行業的工人也正打算要這樣辦的，但一八三七年的經濟危機的來臨却使早期這方面的一切努力全歸消滅了。

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生產合作社運動又活躍起來，並引起了人們很大的注意。這種情況的產生，當然大部分是由於傅利叶主義在工人階級中所發生的影響。但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大革命對於刺激這一運動的開展也發生了相當大的力量。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勃朗的救治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災害的方法，在巴黎工人階級中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勃朗建議，由國家來創辦一些社會

性的作坊和工厂，然后讓它們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去和私人資本主义競爭。一如欧文和傅利叶一样，勃朗深信这种競爭的結果將是資本主义生產的逐漸消滅和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

法國臨時政府因只得服从覺醒了的工人階級的要求，設立了几个“國有工場”，可是它們的工作範圍却只限于修筑道路和挖掘溝渠方面。美國的工人並沒有仔細去研究这些所謂國有工場的純屬敷衍塞責的本質，甚至也不十分注意到勃朗本人已經否認这种企業是建立在他所提出的原則上的。他們唯一感到興趣的是他們的法國工人弟兄們現在正以極大的努力在改變現存的制度。勞工報紙，如在麻薩諸塞州的罗厄尔出版的“工業之聲”，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報道在法國建立的那些工場的進展情況，并且号召美國工人起來摹仿他們在海洋彼岸的工人階級弟兄們的行動。總而言之，那些極力鼓吹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人們是从法國社会主义者的活動中獲得很大的鼓舞的^②。

不過，美國第一個重要的生產合作社是早在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大革命几个月之前就已出現了的。它是在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四八年間那個冬天，辛辛那提附近鑄鐵工人正在進行罷工的時候開辦的。為了在罷工中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二十個翻砂工人自己合伙辦了一個制造火爐和鍋罐的鑄造廠。他們的投資總數只有二千一百元，可是他們從兩位富有的慈善家那里獲得相當數目的

-
- 按照勃朗的學說，這種工人的聯合公司將為集體所有，按工作時間來計算勞動的報酬，並使用代表積累起來的勞動量的紙幣以便利貨物的交換。政府將通過它的“進步部部長”在財政上支持那些早期的聯合公司，以後則只需要監督整個制度的執行。在過渡期間，政府應將鐵路、礦山、法蘭西銀行、倉庫以及批發和零售貨物所需市場的一切設備完全收歸國有。

貸款，因此他們在罷工失敗之後仍能繼續維持下去，而且還從俄亥俄州政府以“‘鑄工雇工’聯合翻砂廠”名義領到了公司執照。一八五〇年時，這一個新型企業還正是一帆風順，資金已增加到了七千七百九十二元，並且按照工會的工資標準雇用了四十七個工人。那時，它還在辛辛那提辦了一個商店專門銷售這個合作工廠所生產的火爐和其他翻砂貨物。霍瑞斯·格利雷在一八五〇年時訪問過這個工廠，並把它描寫為“沿江一帶辦得最好的”一個工廠。深信合作制將解決工人階級的一切問題，因而予之以熱烈擁護的格利雷，向工人們介紹該聯合翻砂廠的優點說：

“其他翻砂工人的工作得依照着營業情況，‘時做時歇’，而鑄工雇工聯合翻砂廠的工人，却自從該廠開辦以來從沒有一天因為沒有工作閑下來的。”³³

但是，在格利雷來訪問了一次不久之後，那個合作工廠就倒閉了，因為它根本無法和那些私人企業競爭；它們有比它雄厚得多的資金，而且隨時準備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以迫使這個工人的新型企業關門。儘管這樣，辛辛那提這個工廠在初期很成功的情況和在法國建立了一些國有工場的消息卻刺激了其他的工人，使他們也想組織類似的企業。當波士頓的成衣工人雇工要求維持一八四九年夏天的工資標準的罷工失敗時，他們也決定開辦一個合作性質的店鋪。他們在波士頓舉行了好幾次群眾集會，籌募基金以便開始這一新企業，結果籌得了約五百元之數。一八四九年九月下旬，波士頓成衣工人聯合社便開始進行生產了。在這種風氣的感染之下，波士頓的一群罷工的印刷工人也開辦了一個叫做波士頓印刷工人自衛聯合社的合作印刷工廠。除了進行營業上的印刷工作外，這個聯合企業還出版了一種叫做“自衛聯合會”的周

刊，勸告工人們放棄從罷工中求得生活改善的辦法，集中力量來組織合作商店。它對工人們保證說，這些企業將使他們“成為自己的主人，它們不但將使工人永遠有工可作，而且還能保證他們享受自己全部的生產果實，決不像現在的情況，大部分都進了雇主的腰包”^{②4}。

很多工人正在尋求一個能使他們擺脫這個日益發展的工業制度的門徑，已不顧一切地在設法保持他們那即將消失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技術工人的地位，這些呼吁自然是正好打入了他們的心坎。一八五〇年春天，大批的生產合作社在全國各地開辦起來。在匹茲堡開辦了一個鐵翻砂廠、兩三個玻璃工廠和一個鍍銀廠。弗吉尼亞州的灰林城更以有一個擁有二萬五千元資金的合作翻砂廠和一個角釘聯合工廠而自豪。在波士頓、費列得爾菲亞、普羅維頓斯和一些別的城市中都開辦了一些女成衣工的合作商店。在紐約，制桶工、制帽工、彩色油漆工、德國式家具工和成衣工人都開始組織了自己的合作商店，甚至有人報道說，綢緞呢絨店的店員們也在計劃着要“辦一個合伙商店，以使他們自己擺脫任何一個雇主的控制”。當成衣工人們開辦他們的合作服裝商店的時候，紐約的工會運動者舉行了一個群眾集會，以代表全紐約的工人階級向這一新型的企業祝福。大會一致決議要極力推行“這種合作原則，並把它視為工人將自己從目前不幸的情況下解救出來的重要方法之一”^{②5}。

完全沒有例外，所有這些生產合作社都遭遇到法蘭克斯社所遭遇到的命運；可是它們的一度存在却明顯地說明了空想社會主義者在工人中的影響，也說明了美國工人在重大的經濟變化面前要維持他們的獨立地位的決心。

消費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运动的目的是想消除中間人剝削的机会，借以减低工人和農民的生活費用。自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三年，在維尔蒙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一些農民和机匠組織了好些合伙性質的“農工百貨商店”。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这类商店中的一位社員將这种新型商業描寫为“使農民和机匠在交換他們的劳动果实时，能够：第一，不会碰到价錢不公道的危險，第二，不会受人勒索和欺騙的一种机构”^⑤。

可是，消費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展开是一八四五年才开始的。一八四五年十月六日一群波士頓的机工建立了第一个工人自衛联合会。这个很快就成为数百个类似組織的藍本的联合社的主要宗旨是替它的會員們買得廉价的必需品。它同时也帶着一种互助社的性質，如办理疾病救济和老年保險等。只要繳納三塊錢入会費和按月繳納很少一点会費，一个工人自衛联合会的會員，就可以从联合会的商店里買到食品、燃料和其他貨物。据估計，这种商店所要的貨价每年可以使他節省六十六元六角六分，每十年，加上利息，則讓他節省八百七十九元六角二分。此外，一个會員，如果病了，只要他生病不是因为“生活放蕩或淫乱”的結果，他可以拿到每周三塊錢的津貼，同时年滿六十五歲并已入会滿十年以上的會員，还可以領到每周七元五角的老養費。

經常处于貧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况中的工人們，都以極高的热情贊助这种自衛联合会运动。到一八四七年十二月时，四十个分会已經建立起來，共有會員在三千人以上，这些分会大部分都設在东麻薩諸塞州。僅在一八五〇年一年中，新英格蘭自衛联合会

設立了一百零一个新的分会，吸收了五千五百六十四一个新會員。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六〇年的十五年中，在美國和加拿大共組織起來了八百个以上的自衛联合会。它們大部分都設在新英格蘭各州和紐約，可是甚至在密西根州、威士康辛州和伊利諾州也有一些这类的組織出現^{②7}。

自衛联合会运动所以如此开展，乃是劳工報紙和巡迴講演家們所共同領導的有組織的一次宣傳运动的結果。“工業之声”每周按期發表了一系列的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以介紹“自衛联合会”，因而在推廣这一运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波士頓工人自衛联合会所派出的演講人之一，約翰·阿尔維斯遍游新英格蘭和紐約州西部各地，向工人和農民們講解这个运动的各种原則。不僅如此，連勃瑞斯培恩和他的信徒們也都跑到講台上去劝告工人們参加自衛联合会和組織合作商店。联合公社运动的領導人將自衛联合会运动看成是“实现傅利叶主义的先導”，他們并深信，通过消費合作社的經驗，工人們自然会看到徹底改組社会的必要的。

在某种程度上說，这种感觉也还有他的道理的。尽管自衛联合会运动的領導人們主要的是強調这种組成可以節省金錢的一面，但他們却很少是就止于此而已的。他們也很細心地說明这个运动的最終目的是社会的徹底改造。同时他們毫不遲疑地告訴大家这种新的社会將怎样產生。它將从合并商店开始，这样做的結果，在一个有六十家雜貨店的城市中將只有六个左右的自衛联合店。取消中間人的剝削和減低灯火費及運輸費就將为工人減低物价，正如空出这么多可以改成住宅的鋪面，將会減低工人的房租一样。自衛联合会將以同样的方式接收和归并工厂和交通運輸企業。那时商人、經紀人和僱主都將被消滅，他們將被迫加入工人

階級。

但这也还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当自衛联合会遍布全國时，新的社会也就漸漸地形成。罗厄尔和林城的分会將專門經營紡織、制靴和制鞋業；在美國西部的那些分会則專門進行面粉的生產事業；維尔蒙州專門生產牛油和干酪；南部專門生產棉花、大米和糖。分会之間將互相交換貨物，自衛联合会的船只和鐵路將把这些貨物由一个地区运到另一个地区去。資本主义的工資制度很快地就会变成只不过是一个不愉快的回憶，真正的工人問題和妇女問題也不可能再存在了。

可是，自衛联合会运动中的一般群众是否都怀着这样一种夢想哩，那是很可怀疑的。“工業之声”承認許多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只知道这个运动可以節省几塊錢或是几分錢，此外則什么都不知道”。同时，新英格蘭自衛联合会的一个委员会也呼吁全体會員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局限于这个运动眼前的这点作用上：

“弟兄們，难道我們是只要能實現節省下几个錢这样一个可憐的理想就滿足了，而且就認為已經够了嗎？后代的人們，啊，正在成長中的下一代都在希望着我們能完成一些更高尚的事業……。我們必須从合并商店走向合并房屋，一直到在上帝的土地上建立全面的公共所有制，这片土地就是我們所要建立的巨大建筑的基礎。”^⑧

但归根結底，自衛联合会运动並沒有比法蘭克斯或生產合作社运动獲得更多的成功。到一八五五年，这个运动的影响便已漸漸衰微下去，虽然一八五七年的經濟危机又使它暂时地活躍了一陣，到內战开始时这个运动便已成陈迹了。

这个运动所以如此迅速衰亡的原因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商人

們压低物价以与自衛联合会的商店相競爭，并且以較过去任何时候都長得多的期限把貨物賒售出去。自衛联合会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資金來和私商進行这种价格战争，或同他們一样賒售貨品。而經濟充裕能付現款的工人又是極少的。运动內部爭取領導权的斗争，和对于廢除疾病津貼的不滿情緒，都增加了它的困难。最后还有，在同一个時間內，一方面是商人們公开攻击自衛联合会运动为“社会主义运动”，称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为私有財產的敌人，而另一方面，社会改革派又对它大加批評說它太保守。联合公社主义者很快就覺得他們已無法希望使自衛联合会的會員接受社会主义了。因此，一八五一年时勃瑞斯培恩鄙弃地說：“他們关心社会主义嗎？不，完全不。他們只是發現他們現在買东西所付的价錢比过去在雜貨店里買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他們也就只是关心这个而已。”^②

土地改革

当罗伯特·欧文和阿伯特·勃瑞斯培恩正呼吁工人接受他們的改革方案时，另一群被称为土地均分論者或是國家改良派的人們也正極力向工人階級尋找有力的支持。土地改革运动是那生長于英國的乔治·亨利·伊文斯所領導的，他过去是“工人拥护者”和“人报”的編輯，同时是杰克遜时代工人运动的領袖。一八三六年，伊文斯由于健康情况很坏，迫使他放弃了从事劳工報紙編寫工作的活动及脫离了与劳工运动的关系，他便跑到紐約州北部一个農庄上去休养。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他又回來重新参加活动，領導了爭取公地公有的运动。他对于土地改革的兴趣是早在三十年代期間就已明白表露出來的，但直到一八四一年他才提出一个具

体的土地改革計劃來。伊文斯所提出的理論是，土地壟斷是“一切壟斷之王，是一切巨大灾难的基本原因”，而唯一的解决美國工人所面臨的問題的方法是恢复他們的土地所有权。“如果一个人有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就應該有权獲得足够的土地來建造自己的房屋。如果他有权生活下去，那末他就應該有权獲得足够的土地來耕种可以維持他的生活的粮食。”^④

伊文斯認為，少数人控制着大片土地，就必然使得沒有土地的工人完全受着雇主的控制。他說，“窮人，除非他們有地可耕，否則他們就必得像英國工人一样在工厂中工作或忍受飢餓。”在美洲，如果通过一条法律，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遺產——一份公地，現在还來得及防止那种已在欧洲發生了的使工人階級地位日益沒落的情况。伊文斯爭辯着說，足够的工人，“將一定会充分利用这条法律，因而防止这种（像目前这样）使整个工人階級处于工厂主的挟制之下的工厂工人过剩的現象”。

土地改革不但將使工人脫离資本家的羈絆，而且当工人們迁移到西部的公地上去建立他們的居室的时候，雇主將被迫提高那些还留在东部的工人的工資，地主也將不得不减低他們的地租。伊文斯說，只有劳动力的不足才能使工厂中和商店中的工人獲得較好的生活条件。因此，通过这个計劃，“那些留下來的人和那些迁移出去的人全都一样能得到享受舒適生活的机会”^⑤。

不僅如此，土地改革還將“消除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后果”，使那些現在在机械方面的改進下受到嚴重打击的工人恢复經濟上的獨立。在現在的情况下，机械劳动力的勝利和人类劳动力的徹底破產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任何斗争都是無用的；一个人無法“逃避一种不可能的灾害”。在欧洲，要使劳动人民擺脫工業革命所造

成的困難和災害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在那里任何一小塊土地——“上帝留給人类的財產”——都已被貴族階級圈起來，成為自己的私產了。因此，歐洲的工人階級只要他們還留在舊大陸上，是沒有任何別的出路的，他們“只能不論價格多少出售自己所有的勞動力，在那點微末的收入還能維持他們生活一天的時候，就活下去，到了不能的時候，他們也就只得走入他們在世界上最後的一個避難所——坟墓——里去”。

在美國，無論如何，土地和它的富藏是屬於人民的，或者可以說是由政府代人民保管着的。那末，讓工人們收回他們的權利吧，讓他們到西部的土地上去，在那里的公共土地上建立起農村共和市鎮以為他們的居所。在那里，任何一個無地的人都可以獲得一片一百六十畝面積的土地或是一片農地，使他在那里定居下來——他不能占有更多的土地，而他已有的那塊農場或農地也是不能轉售的——每一個人一達到成年的時候都可以獲得相同的權利。在這些農村共和市鎮中，工人們將都是農民技工，他們拿一部分時間在地里工作，一部分時間用他們自己的工具製造商品。制鞋農民技工將以他用自己的工具製造出來的鞋和成衣農民技工交換他所做的衣服。他們也可以直接將他們的產品出售給在各地村莊的廣場上做生意的商人^⑫。

因此，照那些土地改革者的看法，只要一旦大家都能使用公共土地，工業城市很快就會完全消滅。所有城市里的居民都將離開城市到那些市鎮中去，尋覓幸福的生活，留在他們后面的，“除了在大海濱和內河港口地區還有一些為便利國際貿易的倉庫、船塢和廠房之外”，將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使工人伴着無情的機器永遠在貧困和苦難中流盡血汗的那種舊的社會制度將從此一去不復

返,代替它的將是一个繁荣、和平、高贵和安全的新社会。

伊文斯甚至作出了一張極具体的時間表,精確地說明一旦自由土地的綱領实施以后,这个和平的革命將經過一些什么样的过程。这个异想天开的進程表曾在一八五一年二月八日伊文斯自己的报纸“青年美國”上登載了出來,它預定如果國會在一八五一年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那末下述情况將会很快地出現:

“一八五五年——人类开化以來从未有过的普遍繁荣。自由貿易制度已建立起來……。欧洲人民瘋狂地向外移民。美國的政治家們感到無限恐慌,承認‘大憲章’……。

“一八六〇年——劳动完全是自願的,劳动力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八五〇年奧勒岡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劳动力价格相等,每人每日約为三元至八元。城市中的房租差不多已經只是名譽上还存在而已……。

“一八七〇年——在美國再也沒有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請求別人‘給他工作’……。

“一八八〇年——在南美洲和欧洲各地‘自由土地共和國’紛紛成立……。

“一八九〇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房屋,再也沒有找不到工作的事……。机器不再是損害工人的东西,而將是为他們服务而進行工作的……。

“一九〇〇年——美國現在已是一个自由產权人的民族。一七七六年的宣言中的全部理論已完全被承認和付諸实施……。人們都奇怪他們的父親們为什么曾經那么久容忍了土地壟斷……彼此爭辯着黄金时代是否已經來到的問題。”

伊文斯結論說，“而這一切，如果全國的工人都團結起來，那只要投一次票就全能得到了。”^⑬

顯而易見，伊文斯的計劃是包含着空想社會主義的成分的。不過土地改革，和聯合公社主義的綱領是不同的，它確為勞工運動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儘管人們並不能全部接受伊文斯的理論以作為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的办法。

在許多別的方面，土地改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有區別的。第一，他們並不呼喚資本家給他們以支持，也沒有將資本家包括在他們的計劃之中；事實上，他們正以沒有將“任何一個有錢的人”^⑭收納進他們的隊伍中去這一點而自豪。另外一點，就是在政治行動問題上，他們和傅利葉主義者的看法是不同的。勃瑞斯培恩和他的那些起領導作用的信徒們永遠反對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改革，認為這種改革是沒有用處的，只不過是浪費時間和精力而已。伊文斯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參加早期的一些勞工政黨的經驗使他深信工人的政治行動是有極大價值的，是能完成奇跡一般的事業的。因此，他以政治行動作為他整個計劃的基本支柱。為了使每個人都能使用那些公共土地，國會就必需通過一個法案。而這只有依靠群眾的壓力和政治行動才能辦到。為了使人民大眾能了解這個計劃，伊文斯組織了一個全國改革協會，召開了很多次群眾會議，組織了一些婦女的輔助組織，並散發各種傳單和建議書。此外，他使他的“工人擁護者”這個刊物後來改名為“青年美國”^{*}，同

• 伊文斯給該報取這個名字是根據舊大陸的一般被稱為“青年歐洲”的那個運動來的。他說它的意思是“偉大的進步之軍”。（參看一八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及四月十五日的“青年美國”；又見西瑞澤符大學一九四〇年索爾·瑞浦瑪所寫但未發表的一篇博士論文：“年青的美國：內戰前之美國民族主義研究”。

时他还利用格利雷的“紐約論壇报”上的篇幅，極力鼓动工人們为了爭取土地改革的实現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和他密切地联系着在一起工作的都是一些对劳工运动有多年經驗的人——塞斯·路得、約翰·康默福特和一些別的人^{④5}。

一八四五年，紐約街头的牆壁上貼滿了以“讓你的选票給你帶來一片農庄”为标题的通告。伊文斯和他的追随者在全國散發了無数类似的傳單。傳單提出問題說：

“对于这种奴隸生活，对于永远为別人做苦工的生活——对于貧窮和随着貧窮而來的一切痛苦，你是否覺得已經忍受不了了？是这样，那就讓你的选票給你帶來一片農庄吧。”^{④6}

对于这个呼吁的反响是使保守分子們非常吃驚的。整个北部和西部以至于少数南部地区的工人們都参加了全國改革协会，在各个选区組織了会社，并且簽名保證必須要所有自己选举的進入立法機構担任职务的人都用書面寫下，同意“在当选后利用他的职位上的一切影响來阻止美國各州的一切公共土地再有被買賣的情形，并使这些土地成为真正願意在那里垦植經營的人所完全專用的農庄或農地”。有些地方，工人們甚至發动了自己單獨提出候选人名單的运动，以推進土地改革的主張以及其他一些進步的改革，如充分的参政权、一切官員由人民选举、直接財產稅和改革立法制度等。在匹茲堡，約翰·費拉所領導發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一个时期中，曾掌握相当大的力量^{④7}。总而言之，看起來全國改良派所追求的黄金时代似乎就要來臨了。伊文斯的一个信徒曾說：

关于國家改良派在紐約州北部農民反地租运动中的活动情况，有一篇很有趣的記載，參看亨利·克利斯曼：“少爺小姐們”，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七一——七二頁，第一二一——一二三頁，第二一九及二三三頁。）

讓土地革命的車輪不停地向前滾動。
听哪！到处在响着那个貪婪魔鬼的喪鐘。
在我們美國佬自己的偉大國土上，
我們要讓每一個角落都在这巨輪下震動，
推呀！不停的推呀！

人民的事業正在無止境的發展中^{④8}。

不过，是否真有很大數目的工人認為土地改革是一個可以提高工人階級地位的綱領，那是很可懷疑的。就是他們願意向西部移居，真能夠去的人也是非常有限的。遷移的費用和一個農場的設備費就決不是一個普通工人所能拿得出來的，就算他已懂得耕種的技術，並且也願意離開東部城市的熟悉的环境。大部分城市工廠的工人，對於邊境農莊里的生活是既不熟悉也不感興趣的。一八四三年，有一位英國旅客問一群工廠工人為什麼甘願在資本家手下受剝削而不“離開這裡……到農地上去”，他們回答說：

“我們不能沒有一個錢的路費就能到西部去，我們也沒有辦法積蓄下一筆錢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已經够我們幹的了。我們現在沒有錢作路費，將來還需要錢買土地、農具、種子，然後還需要更多的錢維持生活，直到我們能出賣一部分地里的收割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錢也沒有。再說，就算我們能有這些錢，田里的活兒我們也完全不懂得——工廠里幹了一輩子，別的門道我們是全不知道，到了那里，我們又能幹得出什麼來？更不用說，我們在城市里住慣了，在這裡，只要有錢，啥都能買得到，真是，只有在荒野里住過的人才知道荒野里的生活是多麼可怕。”^{④9}

儘管如此，的確少數工人離開了東部的工業和商業中心向西

部迁移的事实，使土地改革运动在工人階級中仍沒有完全失去影响。劳工領袖的講演和劳工报纸的社論仍不断强調为争取自由土地而斗争的必要性，即使沒有工人肯到西部去，有了那一片自由土地，存在着可以向西部移居的这种可能性，就將使东部資本主义的压迫者不敢太放肆^⑩。

工人們中間普遍流行的另一种意見是自由土地將能阻止大批移民向工業城市集中，因此也就能避免由于工人集中而必然引起的工資下降。此外，在商業不景气的时候，自由土地的存在將使很多失業工人离开“人口过多的城市到廣大的西部去”。这样，劳动力的缺少就將使留下的工人能有“較好的机会”去找工作，并且很快地就能使他們獲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時間。但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同意的。在一八五七年的一个失業工人的群众大会上，工人們对那种要他們集中注意向西部移居問題的建議报以嘘声。一个工人說：“有人叫我們到西部去，哼，如果我們去了，我們所空出的位置馬上就会有从國外來的別的工人填上去！”^⑪

近來研究这一問題的人提出証据以說明那时工人向西部迁移的事是很少的，但我們完全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边境的存在对于劳工运动的發展的确發生了一种有真实意义的重大影响，并顯著地影响了工人階級的具体情况 and 思想意識。不僅如此，反对土地投机商和奴隸主以争取自由土地的运动，的确獲得了許多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正确地把它看成是在美國爭取更廣泛的民主运动的重要方面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改革者和工会主义

如果說欧文主义者，联合公社主义者和土地改革者在很多方

面是不同的，至少有一點，却是完全一致的：除非工人們採納他們的那些具體的綱領，他們就無法能夠使自己的問題真正獲得解決。歐文主義者和聯合公社主義者甚至公開指責工人們爭取縮短工時的努力，他們的理由是“單純的縮短工作時間”，只不過使工人從“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或十四小時的奴隸變成工作十小時的奴隸”^②而已。在這個問題上，工資的增加對工人階級也都是沒有什麼幫助的。有一位聯合公社主義者在一八四七年新英格蘭工人大會上說：“不，這些臨時辦法對你們全沒有用。整個這種為工資而勞動的制度就根本要不得，這是一種罪該萬死的制度。跟在它后面的就是死神的黑影。它同光明是不相容的。它不是充滿生命或產生新的生命的東西。像一般含毒氣的邪火，它毀滅着走進它的死亡圈中去的一切。在目前的制度之下，資本家的無饜的血盆大口吞食你們的情況，是和一個可怕的大漩渦吞沒一切不幸的、撞進它的勢力圈子中來的一切東西一樣的。”^③

這些話是很動聽的，但它的目的是要使工人相信除開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一切改革都是無用的。伊文斯也有這種看法——但形式却略有不同。他支持十小時工作制運動和提高工資的要求，他甚至还號召新英格蘭工人們發起縮短工作日的運動。但同時，他極力要讓工人們相信，如果不先完成土地改革，這種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和提高工資的活動是必然要失敗的。他宣稱，“土地改革，是我們必須完成的第一步，不先完成這一步而想完成任何偉大的改革是等於沒有工具而想要工作一樣完全徒勞的。”為當前的要求而作的一切鬥爭全是無用的，因為它不能“把他們提高到真正獨立的尊嚴地位”^④。

伊文斯和聯合公社主義者，在不同的程度上，對工會主義抱有

相同的看法。在联合公社主义者看来，工会组织之所以要不得，不仅是因为它将主要力量放在争取满足工人当前的一些要求上，而且还因为工会所领导的罢工，在这一切阶级正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却反激起了阶级仇恨。伊文斯虽然从来也不曾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可是，在他从事土地改革的那一段时期中，他却完全相信工会对于无地的工人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在“工人拥护者”上写道，“我不但不认为同業联合会的组织是解除工人遭受压迫的唯一办法，而且根本怀疑它能不能算是一个什么办法。多少次都试验过了，而结果几乎全都失败了*，至多也不过是变质成为一种合伙的公司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就只是因为，无土地的人所组成的这些联合会和任何一个人一样在提高劳动价格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此，罢工也不可能使工人阶级有任何成就，因为罢工不能击中“罪恶的总根源”——过剩的劳动力——它是“经常要迫使雇主们减低工资的”^⑥。

这些烏托邦的改良主义者还不止于公开宣传这些观点。他们参加工人的组织，出席工人的集会，一切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工人阶级相信，在目前他们这种组织内进行任何提高生活条件的斗争，全是无味地浪费时间 and 精力的。只要他们肯把全部精力使用于合作社运动或是用自己的选票来给自己争得农庄，那他们一切的苦难就都完全解决了。这些口似懸河、發起議論來头头是

* 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是伊文斯一个人。在一八四七年改良主义者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好几个人“都谈到目前在美国存在的一些工会组织是毫无用处的”。（参看“一八四七年工业大会会议录”，罗厄尔一八四七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道的社會改革者們常常能夠說服一些工人組織，使它們放棄為了滿足當前要求的工會斗争，而把它們變成一種合作社運動或是土地改革運動的機構。事實上，即使工人們對他們毫無興趣或甚至抱敵視態度的時候，這些空想家們也能夠抓住一些組織比較松懈的工人階級所舉行的集會，迫使它們通過一些決議，同意聯合會社或土地改革為“使千百萬工人群眾獲得永久繁榮的唯一途徑”。

由於這種情況，工人們所發動的爭取縮短工時和提高工資的運動，往往會變成是專門致力於在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州或伊利諾州的荒野上建立法蘭克斯社，或者是在西部建立農村共和市鎮的運動了。空想社會主義時代在美洲，也正如在歐洲的一些國家中一樣，完全沒有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切災害，不過它卻使得大家注意到，這種數百萬人民在無盡的財富中忍飢挨餓，而少數的幾百個人卻享受着千百萬工人所創造的財富、過着極奢侈的生活的這種情況，實在有改變的必要。為什麼千千萬萬的人應該為了那些從技術的發展獲得利益的人們而必須自己被毀滅呢？那些理想家們問，“為什麼工人，那些財富的創造者，每一代、每一世紀都要一点一点地喪失他們應得的公平的報酬呢？”^⑥

空想家們並沒有找到醫治工業社會的弊病的藥方。他們的那一套哲學不能發現工人階級最後的解放和當前的需要之間的關係。他們要工人忽視政治行動就是從工人手里拿走了工人可以獲得自由的鑰匙。要工人忽視工人階級當前的一些需要，這些空想家們就是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工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力量——而這些正是唯一能教育和鍛煉工人以進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的運動。此外，他們也不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乃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先決條件。正如卡爾·馬克思在批判土地改革運動時所說的，

他們所妄想避免的“資本主义禍害”，“在歷史上是一种福利，因为它能异常加速社会發展，而使新的更高的共產主义运动形式实现的时机更加接近多倍”^{①7}。也正如美國早期的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約瑟夫·衛登麥尔在一八五二年八月一日的“紐約体育报”上所着重提出的：“資金的積累本身并不是对社会有害的东西；为害的在于資本只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这一点。如果資產階級已完成了前一个任务，那末終結这种造成全面混乱的情况就是無產階級所应担当的任务。”

第十一章

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的 十小时工作制运动

当空想社会主义改革者正力求使人们更深刻地感觉到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灾害时，整个国家经济的工业化的情形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划下了更明确的界线。自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间，每年产量在五百元或五百元以上的制造业中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已由七九一,〇〇〇人增加到一,三一一,〇〇〇人。根据一八四〇年的调查，制造业的总产值为四八三,二七八,〇〇〇元；一八五〇年时为一,〇一九,一〇六,〇〇〇元；而至一八六〇年则计有一,八八五,八六一,〇〇〇元。全国铁路哩程数亦由一八四〇年的二,八〇〇哩增至一八六〇年的三〇,六〇〇哩。随着国家工业化而来的是日益加快的城市化；全国人口聚居在有八千或八千以上人口地区的，一八四〇年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一八五〇年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到了一八六〇年则增加到百分之十六点一。

美国工人很快就懂得了要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努力是完全徒劳的，同时也懂得了，欧文主义者、傅利叶主义者或是土地改革者们所提出的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使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的。要使美国的人民大众享受到工业发展的利益，只有依靠工人们经常不断地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和采取联合行动。一八六一年成立的美国家矿工协会的会章用作前言的一首诗，

正是这一認識的最好的表現，

万里長征一步一步地走，
总能达到目的，总能达到目的，
單个兒的石塊也能把大桥筑，
一塊一塊砌，一塊一塊砌。

天下沒有我們不能完成的事，
只要我們團結得緊，
無數的水滴可以轉动一个大車輪，
一滴却不成，一滴却不成。

工会运动的复兴

在一八三七年經濟危机的余燼中，工会运动又慢慢复兴起來。大部分工人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資本家將會來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的說法的完全否認，只是一个時間迟早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一群新英格蘭工人就已呼吁全國工人弟兄完全抛弃这类的幻想：

“弟兄們，我們懇請你們……对于那些說你們和你們的雇主們利益相同的一类話，一个字也別再相信了。你們的利益和他們的利益在本質上是敌对的，是不可調和的。因此不要希望从他們那里得到什么解救……。我們要想得救，上天憐見，必須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指望那些依靠我們的劳动發家致富的人們來解救我們是決不可能的。”^①

這些話激動了美國的工人們。在多年的郁悶之后，他們現在起來要抓住这个机会，通过自己的組織來爭取到較好的生活了。这

種情況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地方是新英格蘭，在那里，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技工和工人們的會社組織便如雨后春筍一樣成長起來。“組織起來，”“團結就是力量，”變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口號。那些工會運動中的老將，他們在不景氣現象最為嚴重的時期，曾因為自己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單而被迫放棄了自己的組織，而現在卻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們號召全體工人弟兄們起來組織工會，并讓資本家們看清楚他們才是“真正代表着那些曾以大無畏的精神反對英王在美洲的統治和暴政的高貴的靈魂的”②。

剛強的、富于戰鬥性的各種勞工報紙將這個消息傳送到新英格蘭的各個城市和市鎮中去。其中有波士頓“勞工報”、林城“鞋錐報”和林城“真正工人報”、羅厄爾“工人擁護者”和“工業之聲”以及“福爾河技工”等，而這些還只不過是對新英格蘭工會運動的復興有所貢獻的勞工報紙中的少數幾個例子而已。新英格蘭的工廠工人們在這時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戰鬥性的勞工報紙。

工廠工人和勞工運動

我們當還記得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工廠工人在勞工運動中是沒有什麼重大作用的。誠然，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間，多維爾和羅厄爾的女工們曾經進行了多次英勇的罷工，可是她們卻很少聯合起來繼續為爭取較好的生活條件而鬥爭，也不曾參加技術工人們所進行的有組織的運動。實際情況是，她們中的大多數都回到農村中自己的家里去了，她們咒罵那些企圖使她們降于奴隸地位的工廠主，同時警告別人永不要進到那些“工廠監獄”里去。

只要大部分工廠女工是來自附近農莊而在工廠中所得工資又

并非她们唯一的经济来源的这种情况还存在一天，工会运动者要想推动她们进行组织是不会有什效用的。但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情况的确是大大地改变了。一个相当固定的工人阶级渐渐在工厂里形成。在一八三七年的经济危机中新英格兰的许多农民都失去了他们的田地。研究一八四〇年至内战时期劳工情况的杰出的权威人士诺曼·魏尔写道，“由于新英格兰农庄的消失，工厂工人的自由是更减少了。他们已再不能采取逃避的办法……一种固定不变的工厂人口已成为确定的事实了。”^③ 正如一位女工在一八四五年所说的，组成工厂工人的成分“一大部分是穷人的女儿，她们的父亲们是连一呎土地都没有的，她们只得每天不停地工作赚一点钱去养活她们的一家人口。另外那许多外国人，他们的自由是：按照那种残毒的权势阶级的雇用契约的规定而工作……或是住到贫民院去，作乞丐去，或是过比乞丐更坏的生活”^④。

代表工厂工人的劳工报纸所以能创办起来，实际上完全是依靠这些工厂女工们的力量。这种劳工报纸的产生，乃是女工们为摧毁工厂主们所组织的一个巨大阴谋而做的重大努力的结果^⑤。新英格兰的制造家们用大酒大肉款待自欧洲来此的旅行家们，力求使他们在他们的旅行日记中写着：罗厄尔、窩尔坦、罗凌士和契科皮是真正的工业乐土，在那里女工们所受到的照顾完全像是“一个大学校”里的学生，根本不像是“以她们的勤劳来使资本产生利润的工人”。甚至有些诗人也被他们收买来写歌颂工厂制度的诗歌。一首极典型的、题名为“女工之歌”的诗中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啊！唱吧，给我唱一支女工之歌！

她是多么愉快、自由和欢乐！

如花的面頰顯露着她身体的康健，
啊，她真是一個幸福的小姑娘，
她監視着紡錘，照看着機梭，
在响亮的機聲中，她不停地愉快地工作，
她的明亮的眼睛閃發着亮光，
她的襟懷永遠是那麼歡暢、開闊^⑥！

一八四一年，一種流行很廣的雜誌“羅厄爾獻言”出版了。這個雜誌專門幫助散布關於新英格蘭工廠樂園的神話，成為工廠主們的一個有力的武器。在它的里封面上，永遠印有這樣幾個字：“真正工廠女工作品總匯”。因此，在好多年中人們都認為它真是代表工人們的聲音的。它極力避免登載任何對工廠情況表示不滿的文章，因此在建立仁惠的工廠制度的傳說方面它是盡了不少力量的。

“羅厄爾獻言”曾經獲得國際上的聲譽。查理·狄更斯在他的“美洲拾零”一書中將它說成是“第一種表現真正美洲生活的清晰的記錄”。有一個從英國歸來的英國人報道說：“‘羅厄爾獻言’在英國所引起的注意恐怕是超過任何其他的美國刊物的。不論在政界或是在文學界都有人不斷地談到它。”在法國，迪叶*曾有一次在眾議院中站立起來，手里揮舞着一份“羅厄爾獻言”，莊嚴地宣稱說，這個雜誌已証明了在民主政治之下，工人除了身體外是同樣還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和靈魂的^⑦。

工廠主們歡迎“羅厄爾獻言”并書面向該刊的編輯致敬，歌頌

-
- 一八七一年當反動勢力高漲的時候，迪叶對於巴黎公社的殘酷鎮壓和在“血腥周”中對於巴黎的無產階級進行大屠殺的活動，都要負相當重大的責任的。

“他們所从事的这种有价值的事業”当然是不足为奇的*^③。“罗厄尔献言”的編輯們对于工資和工作時間問題是一点也不会关心的。有一个編輯曾寫道：“我們是完全沒有办法調整工人的工資的，而且就是我們有办法的話，我們也不能那樣做，至少也不能使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刊物中成为一个突出的問題，因為我們認為还有很多問題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至于工作時間和工作条件等，那完全是工人自己所“無法控制”的东西。要解决这类問題只能依靠厂主們的慈悲心腸。公司將會在“它們認為合適的时候采用十小时工作制，难道这不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嗎”^④？

那末，什么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問題呢？該雜誌的編者說，唯一真正有关重要的事，“是提高、教誨和純潔工人的思想和灵魂；給他們以他們的灵魂所需要的精神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出路，給他們愉快的心境和光明”。因此讓这些工厂女工都到學習班中去讀書和學習吧。以学識和文化武裝起來之后，她們就自然能够保衛自己，使自己不受到那种使工人失掉人性、剝奪他們尊嚴和独立的机器力量的損害。同时她們將証明給所有其他的人看“紡織机間中也能有偉大的思想家”。只要思想和灵魂是自由的，肉体上的不幸遭遇有什么关系呢？工厂女工們的哲学應該是聖經里使徒們的哲学：“有了吃的，有了穿的，那我們就該滿足了。”^⑤

“罗厄尔献言”除了在工厂女工中間以外，到处受到欢迎。的确，女工們也为这个雜誌寫些詩歌、故事，但只是因为她們認為有

* 一八四三年一月，威廉·蕭勒把“罗厄尔献言”从原主那里買过来。蕭勒是工厂主的代理人，他是十小时工作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几乎所有的工厂女工都对他深惡痛絕。蕭勒在一篇由他簽名的通告中号召一切“对工厂制度的發展和声誉有兴趣的人”來支持“罗厄尔献言”。

必要証明給大家看一个工厂工人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而并不僅僅是机器的一部分。同时她們更送去一些暴露工厂中真实情况的文章，強調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必要。当这个雜誌的編輯拒絕發表这些文章时，女工們則公开斥責这个雜誌是公司的机关报，它的目的是要安慰那些住在波士頓和紐約的富豪的資本家的心，这些資本家是“依靠惨毒地挤軋工厂女工而得到的巨額利潤过着極端奢侈的生活”^⑩。

由于深惡“罗厄尔献言”的欺騙行徑，新英格蘭的工厂女工們乃創辦了她們自己的雜誌和報紙。一八四二年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一种叫做“工厂女工”的双周刊开始發行了。主編这个刊物的人是个男的，但另由“几位确实是有相当才能的女工”协助他，这个刊物宣称說，它的一切言論將是为了保衛“半無助的劳动大軍”。三年之后，一种名为“工業之声”的劳工周刊在麻薩諸塞州的罗厄尔出版了。这个周刊以相当大的篇幅來叙述工厂女工們所处的境况，甚至还辟出專欄來由一位女工領袖去主持編輯工作。一八四六年五月，这个刊物完全由女工們自己接办了。同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厄克塞忒“女工画册与工人拥护者”也开始創辦起來。虽然負責發行的人是男的，負編輯責任的却是“由在工厂做工的妇女們所組成的一個协会，因此她們也最能判断与她們所要推進的事業有关的人們究竟需要什么”。这个刊物宣称，“它將大胆地說出它所要說的話，將極力主張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和对于目前工厂工人們所身受的許多無理的待遇進行普遍的改革。”^⑪

这些新的期刊立刻便完全摧毀了关于所謂“美妙的工厂生活”的神話。由工厂女工們自己寫來的信札成为每期都有的特色。一八四三年三月一日的“工厂女工”登載了一位女工的來信，訴說她

和她的朋友們以每周一元五角六分錢的報酬被迫从早上六點鐘一直工作到晚上十點鐘的痛苦情况：

“在这个自吹为共和國的的土地上，我們享有多么光荣的特权呀，可不是嗎？說我自己吧！一个健康的新英格蘭女子，一向行为正当，但是我全部所有時間的整整一半，連星期天都算在內，都以不到兩分錢一小时的工价賣給一个公司了。”^⑬

另外的一些信則談到有些“所獲工資几乎不够維持自己生活”的女工們，为要得到額外的寵幸而被迫牺牲她們的貞操。它們也談到經理們如何看到女工們在一清早都顯得“有气無力”因而想出“絕妙”的計劃，强迫她們空着肚子進行工作。它們談到那些賺獲巨大利潤的工厂都將工人的工資降低百分之四十；又談到工人們如何被迫接受以公司商店購物証來付發工資，这实际是等于將工資的实值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許多來信都对于那种令人無法忍受的“高速化”表示憤恨，并且指出說，十年前女工們每人照看兩架紡机，每分鐘接綫二一六次到三二四次，而現在她們却被迫每人照管四架紡机，每分鐘接綫达四八〇次之多，“其增加工作是工人們做出來的，而所增加的利潤則仍全部为資本家所有”。这些信同时也猛烈的抗議各公司所采用的、用以恐嚇工人的黑名單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一个工人必須从他的旧雇主那里得到榮譽的解雇，他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工作^⑭。

这些新的工厂雜誌的每一期都着重指出：“在制造業老板和工人的經濟利益是如此完全相反的情况下”^⑮，誰要想采取中立的立場是不可能的。这种階級斗争的調子，漸漸在詩歌中、在故事小說和論文中都出現了——甚至下面的这些名詞解釋也正是表現这种情調的。这些定义登載于一八四三年一月十五日的“工厂女工”上；

“監工——經理人的奴顏婢膝的走狗；他以最低級、最下流和最卑鄙的辦法取悅于他的主人，并替無人性的公司裝滿它的金庫。”

“工人——一個被工廠所雇用的人，在一般的情況下，她所實際生產的價值是她所得到的三倍。”

“可厭——一個監工，在一個女工到他那里去接洽工作的時候，問她對於宗教怎樣看法。”

工廠雜誌的重要作用是无法盡述的。工人們將這些刊物偷偷地帶到工廠里面去，他們急切地閱讀着并互相傳遞着。這些雜誌刺激了并幫助了四十年代婦女勞工改革協會的形成。

在麻薩諸塞州的羅厄爾，由十二個工廠女工發起——她們都是棉織廠的工人——組織了第一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婦女勞工改革協會，該會于一八四五年一月開始活動。六個月後，它的會員增至五百人，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地增加中。一八四五年五月，該會主席沙拉·培格利說：“我們的人數正在日益增多，一般我們出席會議的人數也很齊，平等權利和正義的友人的真摯的熱誠是又重新被燃燒起來了。”⁽¹⁶⁾

羅厄爾婦女勞工改革協會的會章規定，每一個會員必須保證，“為了改革目前的勞動制度而積極工作”。^{*} 這個協會以不倦的努力發起了一個運動，要使一般人了解到工廠中的一切都有進行改革的必要。它并派定一個委員會以便專門揭露和破除一般報紙和

• 會章的第九條宣稱：“本協會的會員在一切和平手段完全証實無效之前，決不贊成採取任何敵意的行動、罷工和遊行等，但如果我們必須採取上述行動時，則維護和保持我們勇敢的祖先所遺留給我們的、浸染了他們的鮮血的獨立自由，是每一個人必盡的責任。”（見一八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工業之聲”。）

公司的辯护人所制造的虛假的印象。該会在“工業之声”上面設立了定期出現的專欄“女工問題”，到一八四六年，协会已能够將这个劳工刊物全部買过来了。同时协会組織了一些展覽会，五月集会和交际性的集会，在这些会上出售專門登載工厂女工所寫的詩歌和文章的“范倫泰献言”。它并創設了一个“工業改革研究会”，聘請一些卓越的学者对工厂女工們闡述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的必要性。协会也出版和散發一些有名的“工厂小册子”，内容都是一些工厂女工們所寫的激奋人心的詩歌^⑭。

但是罗厄尔妇女劳工改革协会的活动还不完全限制于“范倫泰献言”和詩歌这些方面。当罗厄尔的麻薩諸塞公司命令紡織工人每人由照看三架紡織机改为照看四架紡織机，并将每匹布的工价减低一分錢的时候，协会召集工厂女工举行集会，对这个命令提出抗議。在这个會議上，女工們草拟了一种誓約，決議：除非她們能獲得按照所增加工作的比例而增加的工資，否則她們決不肯照看四架紡織机。她們又決議任何人如在誓約上簽了名而又破坏自己的誓言，她的名字便將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叛徒，并在“工業之声”上面公布。每一个在这个公司工作的紡織工人都在誓約上簽了名，同时並沒有任何女工破坏这个協議。公司終于被迫撤消了它的命令。

該协会在政治方面也發生了相当的影响。当麻薩諸塞州立法机关的一个委員會在它的报告中反对十小时工作法令的时候，协会攻击委員會的主席威廉·蕭勒，称他为“公司的工具或走狗”，并且宣称协会將發起一个运动使他沒有連选的可能。运动結果是成功了，在选举完畢后，协会發表了該会的一种決議，表示对于“罗厄尔投票人的衷心的感謝”，感謝他們把“威廉·蕭勒送到对他最为恰当的隱退的地位去了”^⑮。

罗厄尔协会的代表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城和多维尔城以及麻薩諸塞州福尔河的工厂女工的群众大会，在这些城市里，妇女劳工改革协会也都組織起來了*。

通过各种“工厂小册子”，罗厄尔的协会和西宾夕法尼亞州的工厂女工也取得联系，不久西宾夕法尼亞州的工厂女工在她們那一地区也成立了协会。在一篇由罗厄尔协会發出的呼吁書中，它敦促全美國的女工們为了争取較好的生活而組織起來。它呼吁說，“我國尊榮的劳动者和紡紗工人之間必須建立一种坚固的团結”；“我們希望通过組織协会，在全國建立通訊網以及喚醒全國人民的人道主义的正义感的办法來推進这个偉大的改革运动的洪流，直到‘自由——一切人的自由！’的呼声响遍每一个肥沃的山谷和高聳的山峰。”^⑬

为了对于这个有趣的劳工組織作一番全面的研究，我們还必须提一提美國早期女工运动的先鋒，該协会的不屈不撓的主席，沙拉·培格利。当罗厄尔的組織成立时，培格利小姐已經是一个八年工龄以上的紡織工人。在这八年中的四年里，她在工余時間領導了一个为工厂女工而設的免費夜校，女工們是那样地渴望受到教育，因此被人称为“有文化狂的女工們”^⑭。

沙拉·培格利过去是著名罗厄尔学习互助社的會員，女工們在那里聚会，討論一些第一流作家們的最新的作品，“罗厄尔献言”也就是从这里產生出來的。可是沙拉·培格利很快就發現，在每

* 一八四五年三月一个工業妇女协会在紐約成立起來。在这个組織里面有下列各業工人的代表：女成衣工、粗縫工、縫衣縫工、拆書工人和裝釘工人、制帽工人、編草工人、縫制女裝和童裝的工人、皺花工人、綵飾和花边工人。伊利莎白·格雷是协会的主席。（見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工人拥护者”。）

天十三小时“高速化”的工厂工作后，再想讓他們來提高文化是完全徒劳的；因此她变成了“献言”的坚强的反对者。她公开斥責它是公司的工具，并且宣称它对于工厂情况以及工人对这种情况的反映所作的描寫是完全不真实的。当“献言”由于得不到工厂女工的支持而終于一八四五年停刊时，培格利小姐寫道：“願它从此安息吧，如果有一天的黎明它又复活了，那希望它已完全清洗了从前的罪孽，变成了人民权利的勇敢的維護者。”^{②1}

培格利小姐經常強調办劳工报纸的必要。她宣称說，“現在的报纸，是尽一切力量在誹謗我們的努力和嘲笑我們的活动的。”因此她終于成为美洲第一个妇女劳工报纸的編輯是不足为奇的。一八四六年五月，沙拉·培格利担任了“工業之声”的編輯职务。她向讀者們保證她的心是“整个浸潤在被压迫者的事業中的”，而她的社論更証明她是遵守着她的諾言。例如，在一篇社論中，她猛烈地斥責那些威嚇着要將参加罗厄尔工会組織的女工們列入黑名單的公司代理人說：“在使我們每日工作了十三小时之后，还要剝夺我們对生活抱怨的权利嗎？我們要使那些敢于这样做的人臭名远揚。”^{②2}

沙拉·培格利对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劳工运动作了很大的貢獻。一八四五年三月，她代表罗厄尔妇女劳工改革协会出席了新英格蘭工人协会的代表会。她并不是一个沉默的代表，她以滔滔的宏論呼吁男工們帮助他們的姐妹們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实现。由于女工們沒有投票权，她們对立法官們的呼吁是“完全無效的”，因此这个問題必須要請男工們來回答，到底他們的姐妹們和女兒們应不应该也享受到縮短工作時間的待遇。培格利小姐說，工厂女工們并不要求在劳工运动中占据“高超的地位”，她們僅僅

希望能“像大革命时期的女英雄們那样，……供給士兵們一条毯子，或是从我們的伙食房里拿出一点东西來裝滿他們的背包”⁽²³⁾。

她代表工厂女工們獻給协会一面錦旗，旗上寫着下面的標語：“从團結中求力量——这力量將帶來人类的幸福。”

十小时工作制的理論基礎

爭取十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促成了新英格蘭工人协会的建立和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男工和女工間的團結。新英格蘭的工人沒有分享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果实，在那里，絕大多數的工人、技工、和工厂工人們每天仍要工作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在別的地区，工厂工人也受到同等的压迫，而且在不景气的那些年头中，有些技工們竟被迫回到那工厂城郊的農業地区所一向熟悉的“从日出到日落”的工作制度中去了。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發展了它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理論，以証实这一要求的合理，并爭取社会人士的支持。为了工人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工人們必須有更多的時間來提高自己的思想并使他們的身体得到休息。从日出到日沒的劳动制度，在身体和精神上所產生的效果是如此地惡劣，以致于一般工人除了將全部精力用于無休止的苦工之外，永远不能希望幹一点任何別的事情。新澤西州的一个工人集会宣称：“那种認

* 我們必須將工人留在工厂中的時間和实际工作的時間區別開來。一天十四小时工作在許多情況下除去吃飯時間实际的工作時間是十二小时半。但那时也确有許多工厂工人每天的实际工作時間是十四到十五小时的。（參看諾曼·魏尔：“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工業工人”，一九二四年波士頓和紐約版，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为一般群众是生來做苦工的，而另外一些少数人則是生來用思想的学說，我們覺得真是無聊之極了。每一个人都有可供劳动的体力，每一个人也都有可供思想的头腦，所有的人都應該有時間來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享受進行思想的权利，同时也應該使用自己的体力。”²⁴一八四七年，田納西州的那士維尔，有一群建筑木工雇工說出了他們自己心里的話：

“我們是有血有肉的，我們也需要娱乐的时间。按照政治經濟学家們的估計，每人每天工作五小时就足够維持整个人类的生活了。因此如果我們每天工作十小时，我們总應該算做了我們应做的一份工作了。我們也有必須得到滿足的進行社交活动的感情。我們也有必須逐步提高的思想机能。我們热爱我們的國家，因此我們必須要有时间和机会來研究有关國家利益的一切問題。难道我們除了自己所幹的这一行的一些基本知識之外就應該一無所知地活着和死去嗎？难道我們所存在的社会，將因為我們有了知識而受到損害嗎？”²⁵

如果工人階級受到足够的教育，整个社会無疑是只会得到利益的。十小时工作制的維護者說：一个國家的繁荣和幸福“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才智、道德和精力上的”，因为只有工人的福利愈增進，他們的精力愈得到發揮以及他們的智力和体力愈發展，“一个國家才能變得真正的偉大和繁荣”²⁶。

有些十小时工作制的維護者認為減少工作時間是走向一个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前進的第一步”。当工人有了更多知識之后，他們会清楚地看到目前的經濟制度实在有予以結束的必要，因而將更急切地参加建立合作社会的运动。“福尔河技工”說：“在这个制度（十小时工作制）漸漸地建立起來之后，每一种为了提高工人階級

地位的改革運動，都將會獲得遠過于目前情況下所能獲得的更大的成功。”²⁷

十小時工作制的倡導者說，提高工人群眾的教養的可能性是無限的。美洲最卓越的學者之一，那位懂得全部歐洲語和一部分亞洲語，包括希伯來語、迦勒底語、撒瑪利亞語和埃塞俄比亞語的學者就正是那位“博學鐵匠”愛利休·伯利特^{*}。只要給他們時間來受到知識上和道德上的教育，其他的工人也會變成“博學”，也會像伯利特那樣對美洲文化的進步有所貢獻的。的確，“只要讓技工們每天除了十小時工作外有時間獲得休息和從事智力的修煉，他

- * 伯利特曾對全新英格蘭的工人作過有關智力鍛煉的價值和一些別的題目的講演。他特別渴望根除殘存于某些工人的思想中的那種認為有錢階級是天生的高等人的印象。他在他屢次的講演中不斷地說道，“永遠不要卑躬屈膝地在基納德們、亞斯特們、或是國內的任何一些投機的資本家面前脫下你的帽子表示敬意”，“他們是誰？或者說現在在財富集團中作為他們的繼承人的又是一些什麼人？他們是占有國內所有的銀行、倉庫、工廠和航運業的寡頭政治的執政者，不是嗎？這些且不要管它！但為什麼在這種巨大財富的前面竟會使你們感到自己所存在的整個階級都是卑下的呢？”（見歐耳·寇蒂：“博學鐵匠”，第三頁、第二三頁、第三四——三五頁。）

伯利特的講演必須和那些資本家代言人的類似活動區別開來，他們企圖通過講演來接近工人階級，並在工人的頭腦中灌輸那種認為窮人是美國社會中真正幸運的人的思想。這些屋主們的代言人說，一個人即使擁有巨大的財富，在他沉溺于以極充裕的財富也無法得到滿足的欲望中時，是同樣要忍受着貧乏的痛苦。另一方面，一個貧苦的工人，如不作他的經濟能力所不能滿足的任何奢望，他也會感到自己是相當富足的。威廉·埃勒瑞·產寧，那位一神論的傳教師，就最喜歡提醒工人們說，和那些常常因為“吃得太多”而遭受痛苦和折磨的有錢人比較起來，工人們的生活真是“最舒服的了”。（參看凱撒林·塞德威克：“貧乏的富人和富足的窮人”，一八三六年紐約版，又伊利莎白·皮巴底：“關於威廉·埃勒瑞·產寧牧師的回憶”，一八八〇年波士頓版，第四一五頁。）

們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最卓越的、影响最大的階級”²⁸。

僱主們以他們特有的那种無以名之的邏輯來反駁上述的議論。有一位工厂主說，“是的，我完全确信，日前在我們的紗厂里，有很多工人空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减少工作時間就会“增加犯罪行为，增加灾难、邪行和貧困”。麻薩諸塞州的契科皮地方的一个工厂經理更說：“使一个人的身体垮下來的并不是每天用在工作上的时间，而是消耗在放蕩生活中的时间……。减少工作時間的結果將是工資的减少，同时，按照我們的看法，还將是放蕩行为的增加。”²⁹

关于减少工作時間的結果將要降低工資的問題，曾作了充分的討論。他們中間有一派，这一派主要是由一些知識分子所領導的，觉得只有讓工人同意接受按照一定比例减少每日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日才有实现的可能。不过，他們辯解說，这种工資的降低只是暫時的，在十小时工作制普遍施行之后，工資仍会高的。另一派十小时工作制的維護人，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派——則認為工作時間的减少并不一定造成工資的降低。相反地，工作時間的减少只会造成工資提高的結果。他們爭辯說，因为，减少了每周的工作時間即等于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給，而既然工資是“受着强大的商業律——供求律——的支配的”，减少劳动力的供給的結果將必然是工資的增加³⁰。

在爭取較短工作日的方法上，这些維護十小时工作制的人們

-
- 为了回答縮短工作時間將只会使工人墮落的这种論調，“福尔河技工”号召那些已經獲得十小时工作制的工人們進行學習和研究來表現这个制度的真正效果。此外，它提議福尔河区的工人們“建立一所經濟而又实用的夜校”。（見一八四四年五月十八日和十一月三十日的“福尔河技工”。）

中間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有些人只贊成依靠政府法令的辦法，他們號召發起一個運動來說服立法官們，使他們相信無休止的勞苦工作是和工人的健康、幸福和自由不相容的，而且也是和社會福利的原則相違背的。根據這一原則，政府必須通過一些法令禁止僱主們使他們僱用的工人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以上。另有一些人則認為各地工人群眾應集中力量力求和他們的僱主取得協議，以便在他們自己的作坊或工廠中實行十小時工作制。還有一些人則贊成採用英國工人在他們爭取較短工作時間時曾經採用過而且結果很成功的一些辦法。這種行動計劃是由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來到美國的一位英國的勞工組織者，約翰·克魯爾介紹到美國來的。它包括三點：首先召開一個工人和工廠主的聯席會議來討論和協議一種減少工作時間的方案；如果會議失敗了，那就發起一個向立法部門請願的運動，最後，如果這個方法仍沒有效果，那就發動總罷工或者照當時一般的說法，發起“第二獨立日”。總罷工將在七月四日舉行，到了那天所有新英格蘭的工人將“對暴虐的工業權勢集團宣告獨立”^①。那些十小時工作制的維護者說，選擇七月四日作為發動罷工日子是很合邏輯的，因為這個運動的精神和獨立宣言的基本原則是完全一致的。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三日的“福爾河技工”說，“全日工作制，不容許你們追求幸福，因此把你們用於將無限制工作時數減少到十小時的努力和‘七四’連結起來是完全恰當的。”

新英格蘭工人協會

在進行討論的這一時期的絕大部分時間中，運動的主要目標是要通過立法制度以縮短工作時間。一八四〇年，凡·布倫總統

的行政命令使得十小时工作制在联邦政府的雇用的員工們中間建立起來。但要使一切私人企業中的雇用人員都能得到相同的待遇，那就要牽涉到批准那些企業的各州的立法機構。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組織足夠的群眾壓力以擊敗公司組織所掌握的对立法機構的控制權。

为求通过立法制度以實現十小时工作制的第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一八四二年新英格蘭的一群技工組織了十小时共和主义协会。这个組織一成立便立刻發動了一个請願运动，要迫使麻薩諸塞州的州議院限制本州工人的工作時間。請願書大部分都并没有明确提出十小时工作制來，但發自罗厄尔的一份有將近一千六百人簽名的請願書却極具体地要求通过一条法令，規定一切制造业公司“决不能要它所雇用的人員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以上”^③。

十小时共和主义协会虽然發起了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但因为它是極不明确而且是限于地方性的一个組織，它并没有能够將这一运动進行到勝利。一八四四年秋天，另一个新的劳工組織，新英格蘭工人协会成立了，它对于爭取縮短工作時間的运动提出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一协会可以說主要是麻薩諸塞州福尔河的技工們活动的產物。在一八四四年年初，这些人便組織了一个技工协会，在本区域内推進十小时工作日运动。該会曾發出一种誓約草案，凡在上面簽名的工人都必須保證每天工作决不超過十小时，它同时还領導了多次为爭取縮短工作時間的罢工运动。一八四四年五月，該会在这方面的活动并还得到它的輔助組織福尔河女技工协会的幫助。这一輔助組織，曾举行定期的义賣会，以聚集大量資金來支持这一

運動*。有一個工人曾寫道，這時這些婦女同志的工作使他想起了大革命時期的自由的女兒。他接着說，“我們感到，如果我們的老板們看到了她們現在的活動，他們也一定會說，他們實在應該表示讓步了。”^{③③} 技工協會本身對於這個婦女輔助組織也曾予以極高的贊揚：

“我們的成功是大部分依靠着她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如果沒有她們所給予的及時的鼓舞和幫助，我們的很多會員都將認為一切全無希望而放棄鬥爭了。但當敵對方面拿出他們的罪惡的武器，正向着我們擺開陣式的時候，當失敗的危險已正迫在眉睫的時候，技工的妻子、母親和女兒們却走出來支持我們了，她們囑咐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改革運動的工作中堅持下去。技工們，讓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了她們對於我們的仁慈的幫助吧。”^{③④}

一八四四年四月，福爾河技工協會設立了一個出版委員會，發行“技工”周刊以便“在各方面推動被壓迫的技工與一般勞動者的事業”。數周以後，這些富於戰鬥性的技工向全新英格蘭的技工們發出通告，嚴厲指責過長工作時間的不合理及其所附帶產生的對新英格蘭工人的屈辱，並號召大家聯合行動，以爭取實現十小時工作日和平等權利。它更發出一項具體的轟動全區的號召，要在一八四四年秋天舉行一次全新英格蘭工人代表大會。但它卻沒有明確地定出地點和日期來。七月二十日，林城的制鞋工人起來支持這一號召，提議於一八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波士頓舉行該會，

* 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三日，“福爾河技工”上曾出現下面一段啓事：“福爾河技工協會以無上的感謝接受女技工協會依靠她們所舉行的義賣會所得而捐贈給本會的三百元現款。代表本會全體會員，主席威爾伯·里德。”

并建議除了十小时工作日外，大会更应考虑“劳动力报酬过低問題及筹謀应如何改善的方法”。由于各方面一再要求延期，大会日期最后决定于一八四四年十月十六日。

福尔河技工协会并不是發出一个号召就認為够了的。因为在新英格蘭的很多地区都沒有对工人階級抱友好态度的报纸，讓那些地区的工人能够知道关于这么一种工会运动的消息，并确保他們也能派出代表來参加秋季的大会是完全必要的。因此，該会便派遣了一个技工希威特，到那些区域去作宣講員。它并且宣告說：“本会在此时际，派出宣講員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其他地区工人了解組織之必要性，并及时准备选派代表以参加九月將举行的代表大会。”^⑤

希威特于七月二十五日在罗得島的波塔刻特开始他的巡迴組織工作，而于八月二十四日在麻薩諸塞州的湯吞城將此工作告一結束。在一個月的時間中，他訪問了麻薩諸塞州、罗得島和康涅狄克州的城市与市鎮，并出席了一次林城制鞋工人雇工所举行的大會，他在該会上的一篇演講，使得他們立刻通过了支持召开代表大会的決議，并决定派遣代表前往参加。希威特進行工作的一般程序是，在清早進入到一个城市中來，即刻散發傳單，邀請工人們*來参加晚間的群众集会，到了夜晚便开始講演，說明工人們如何必須“自己負起責任來進行改革并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只有

* 最初希威特号召全体工人都來参加这个集会——以为女工們一定了解她們也是包括在內的。但他后来却發現在号召中特別提出女工是完全必要的。希威特相信，做工的妇女对于每一种有組織的劳工运动的活动是都参加的，“因为妇女一般地說，比男工做着更苦的工作，因此对于任何为了改善工人階級生活条件的运动都是極為关心的”。（見一八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福尔河技工”，）

把自己組織在協會里，他們才能希望實現十小時工作日并消除“現存社會生活中的一般的罪惡現象”。每次在作完講演之后，立即開始一種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熱烈討論。有一次（在羅得島的普羅維登斯），完全出乎希威特意料之外，竟有一位在該城工商業界居于領導地位的大老板也起來支持他了；這個僱主老板在大会上說，他在自己的工廠里已經實行了十小時工作制，“并發現工作的效果簡直是好極了”，因為工人“所做的工作完全和從前一樣多，而在工作中他們的心情却比過去要愉快得多了”。此外，在好幾個市鎮里，都有一些教士們在会上發言，幫助希威特鼓動工人們組織起來進行爭取縮短工時的戰鬥。

在演講之后，常常是立即開始組織協會的活動以便選出代表來參加秋季的代表大會。可是，在康涅狄克州的彌爾福得，到會的聽眾似乎全無感受性，任你說什麼他們也都無動于衷。因此希威特從彌爾福得寫的通訊中說：“如果在各地都遇上這種冷漠的情況，那真將使我的工作完全失掉勇氣了，但謝謝上天，事實并不是這樣——這不過是僅有的例子罷了。”

但老板們和各地政府當局所表現的冷漠却是隨處都遇到的。希威特的傳單被沒收了；不只是在一個市鎮里，他發現所有可做會場的大廳都不容許他進去。在麻薩諸塞州的烏司特城，管理市議廳的委員會的主席拿起希威特的傳單看了一眼，因傳單中曾有“壓迫”字樣，他便說道，他不能容許任何人利用他的廳房散布謊言，因為他“看不出新英格蘭工人有什麼受壓迫的地方”。在羅得島，一般拒絕希威特使用廳房的理由是說他正在發動“暴動”和“叛國”的罪行。

希威特並沒有被他們嚇倒。在康涅狄克州的挪利支，他在—

个骨相学家所占用的大廳中進行演說，而到会的听众却比平常更为众多。但他到了康州的司通令頓的时候，却連一个友善的骨相学家都找不到了。他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于是我決定在街头召集會議。”第二天晚上的会也仍是在街头举行的。

“今天曾向好几处接头借房子，以便進行我們的會議，但所有的地方都拒絕了！那么，我們是又得在街头开会了！！今晚到会的听众比第一次更多。我們尽力在黑暗中組織我們的會議！并仍采取了必要的步驟以便成立此地的协会組織。”^③

这里我們可以看出，在一八四四年——一如在美國劳工运动史中任何其他的时期一样——工人組織的形成完全是某些英勇的男人或女人的不倦的忘我的活动的結果，这些人不顧別人的排斥、攻击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对仍向工人階級宣傳各种重要的思想。

当希威特在某些大廳或街头進行演說的时候，麻薩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劳工报纸也正向其他的工人傳布关于代表大会的消息。同时在新英格蘭的大小城鎮中，各技工协会正热烈地对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議表示拥护。而在这个时候，空想社会主义的改良者，主要的是联合公社主义者(傅利叶主义拥护者)和土地改革派的人們，也都以極大的注意傾听着关于新英格蘭工人即將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他們并准备向波士頓集中以推动比十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資更为“基本的”各种改革。

一八四四年十月十六日，二百零七个代表聚集在波士頓的凡勒伊大廳，举行第一次新英格蘭工人代表大会了。从新英格蘭各市鎮來的技工占代表中的最大多数，但其中亦有从溪流農社派來的代表(乔治·雷泊萊、派尔克·郭特文及雷克曼)和土地改革运动方面派來的代表(乔治·亨利·伊文斯、湯姆斯·戴佛尔及爱尔

文·波費)。這兩派改革家都曾在大会上講話，各自強調必須採用他們的具体綱領才能逃脫進攻中的工厂制度所造成的恐怖后果。

大会对于這兩個綱領都頗表贊同。尽管有一些工人階級的代表表示反对，大会仍通过決議要求自由使用公共土地并支持傅利叶主义。但無論如何，号召普遍建立生產合作社作为一种手段來結束“目前的这种劳工制度”，結束这种使得應該屬於劳工的報酬却为資本家所有的制度的決議却是全体一致通过的。

大会更通过一項決議要求政府頒布十小时工作法令，同时并組織了一个經常性的新英格蘭工人协会，以推动立法机构，使其禁止任何公司企業以每日超过十小时的时间使用其雇用人員。

不幸的是，一八四五年三月十八日在罗厄尔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却推选了雷克曼做协会主席，乔治·雷泊萊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一情况肯定地表明，在立法制度方面的活动是完全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了。因为，这两个人虽然也都是很忠心的，但是他們的兴趣却在于推动一种更“基本”的改革，而不在于縮短工作日的运动上。此外，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雷克曼則更是对一切挑起上層階級仇恨的策略表示厭弃的。他娓娓动听地說，“我的目标，不是要讓一个階級反对另一个階級，而是要通过一种光荣的大團結，使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以达到普遍的諒解，普遍的提高和幸福。”^②

-
- * 該会并通过了新英格蘭协会的会章，規定該协会的會員將由各地方协会所选派之代表組成，每人付费二角五分以作为协会基金。代表人数的比例如下：五人以下派代表一人；五十人以上至五百人每多五十人得加派代表一名；五百人以上則每百人加派代表一名。会章第九条为：“本会章所規定之一切权利、特权和义务对于各妇女劳工改良协会完全同样適用。”

一八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这个新組織起來的协会在波士頓举行第二次會議了。傅利叶联合公社主义者完全控制了整個會議，因而絕大部分的时间都化于討論傅利叶主义是如何尽善尽美。十小时工作制偶而也有人提到，但只是順嘴提过而已，对于这个对新英格蘭工人最为切身的問題，大会却没有做出任何有实际作用的決定。

但現在，对于这种由一派烏托邦的改良主义者來控制他們的整个运动的情况，工人们实在感到厭惡了。他們对这些人的忠誠和热心虽都怀着極大的尊敬，也同意他們所作对于资本主义生產形式的攻击，但他們所要求的是立刻改变当前的不能忍受的情况——而不是什么在遙远的將來的天堂。同时他們对于那些改良主义者忽視他們的縮短工时的要求，并使得一个能够实现十小时工作制的組織陷于癱瘓状态的作为表示憤恨。觉察到这种情緒，罗厄尔劳工領導人物們所編輯的“工業之声”才致意那些烏托邦主义者，請他們从新估計一下他們在新英格蘭协会中所起的作用^⑳。

但这些联合公社主义者却决心要把他們自己的那一套坚持到底。他們仍然坚持“除了一个全面的社会革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除目前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雷克曼主席說，微末的問題如十小时工作制等，是毫無重要性的，而新英格蘭的工人们現在應該已經完全認識清楚，工人协会“所抱的目标”是要解决比縮短工作時間“更为基本的一些問題的”^㉑。而工人们都不是这样看法也沒有什么重要。

但有一个时期，新英格蘭工人协会确曾脫离掉了那些改良派的羈絆。当一八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該会在罗厄尔举行會議的时候，美國的傅利叶主义运动正处于消沉期間，該协会的主席雷克曼

以及溪流農社的那一班人就根本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土地改革派，因為對於新英格蘭工人的活動情況已失掉興趣，也全部缺席。因此工人階級重新恢復了對新英格蘭協會的控制權，而以這次會議為起點，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運動也重新活躍起來。在此後的幾次會議中，減少工作時間的問題已被毫不含糊地肯定為“新英格蘭工人的最大的最主要的目標”^{*④}。

爭取十小時工作制的罷工運動

正当新英格蘭的情況頗為緊張的時候，一件相當重大的事件在西賓夕法尼亞發生了。在匹茲堡和阿利根尼城的棉織廠中，工廠女工每周工作達七十二小時，所獲却是為數二元五角巨款。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了，于是在一八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五千名女工，那被描寫為“最美麗的姑娘和阿利根尼城及匹茲堡的基本骨幹”的女工們，開始舉行了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罷工運動。她們一共堅持了差不多一整月，但在絕望中，有些女工只得決定回去復工了。而她們却並沒有能夠繼續工作得很久。罷工工人從一個工廠走到另一個工廠，打開工廠的門，把機器旁邊的女工們捉住硬拉到廠外來。當她們走到那時最大的一个紡織廠布萊克斯多克廠的時

-
- 但其他的問題并不因此而被忽視了。在下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新英格蘭工人協會曾採取堅定的立場反對奴隸制。此外，在該會的林城會議（一八四六年一月）上，代表們對於當時流傳的美國即將和英國開戰的一種謠言也發表了很多意見。他們決議說：“我們不但決不能把海洋彼岸的勞動弟兄們看成是我們的敵人而對他們施行射擊，我們更認為他們是我們的的朋友，而我們要盡一切力量以改善他們的境遇。”諾曼·魏爾曾正確地引述這一段話以作為“早期美洲走向國際主義”的證明。（見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青年美國”；及“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工業工人”，第二一八頁。）

候，她們更得到了当时称为“男工輔助隊”的帮助。她們在那里活动的情况以及在布萊克斯多克厂所發生的一切，当时目击的一位“匹茲堡日报”的記者會有这样的描述：

“这时她們已經集中了全部的力量。大隊的男人和男孩子跟随着她們，以备在必要时作她們的帮手。一切都已准备好，臉上泛着必勝的紅光，……她們的隊伍开進了那偉大的战斗——‘布萊克斯多克厂之战’——的戰場。

“到达之后，她們向敌人發出三次挑战的呼声，并一致揮舞着棍棒和帽子。接着，經過一兩分鐘的偵察之后，她們便排列成坚强的進攻的隊形前進，直進到……厂院的白松木的大門前面。

“很快，大門被攻开了。但里面守衛的人却也决心要予以英勇的抵抗，于是進攻的隊伍被击退了，大門又关上了。第二次的進攻也仍只得到同样的結果。

“双方都需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开始談判。工厂女工們要求立刻把現正進行工作的女工們送出來，但里面的人却頑強地拒絕了这个条件，因此兩方面又准备用那勝負尙難分曉的战斗來作最后的決定。

“‘他們說不接受——讓我們再來一次進攻吧！’大声地喊叫着以互相鼓舞，大隊人馬立刻又开上來准备再一次進攻。在相当一段時間內，战斗还是勝負不分。守衛的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是那些白松木板怎能希望它有多大力量呢？……門垮了——‘哈啦！哈啦！’，立刻厂院里挤滿了人，堡壘被一次猛襲攻下了，守衛的人全变成了战争俘虏……。

“我們听說工厂老板們对于在星期一事件發生时警察方

面的態度表示極大的不滿。在我們看來，這似乎是很不公平的。那時，任何普通的警察隊要想維持秩序是絕對不可能的。成百成千的女工們的男朋友都站在附近觀望着，在情況必要時隨時準備進行干涉……‘只要他們有那么大的膽子’，在她們正打入布萊克斯多克廠的時候，站在我們身右的一個凶猛的雙手握拳的小伙子說，‘就叫他們動一動那些姑娘們看，咱們就有本事打得他暈頭轉向！’”^④

成百的婦女敢于打破工廠的大門，強烈地把破壞罷工的工人從廠里面拖出來的這種景象，激怒了保守的中間階級分子，他們認為婦女是應該永遠有婦女的一種行為標準的。因此，工廠女工們便沒有辦法得到社會方面的支持了，而沒有這種支持她們就必然要歸于失敗——因為她們自己沒有錢使她們能長期堅持下去。工廠老板們更是心如鐵石，他們說，在新英格蘭的工廠都還照常每日工作十三小時或十四小時的時候，他們決不能減少工作時間。不過他們答應只要十小時工作制在新英格蘭的各廠實行時，他們一定也在賓夕法尼亞采行這個制度。

匹茲堡的女工們乃轉向新英格蘭工人協會的兄弟姊妹們求援，催促他們加強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鬥爭，并向他們保證，在西賓夕法尼亞已經作好了一切“繼續進行戰鬥”的準備^⑤。

新英格蘭方面對於這一呼吁並沒有置之不理。工協的會員們是一直急切地注視着賓夕法尼亞的罷工活動的，因為就在那個時候，他們正在討論約翰·克魯爾所提出的行動計劃。按照這一計劃，大家當還記得，第一步是進行僱主與工人之間的協商，以便雙方同意建立十小時工作制，如談判無效，則第二步向立法機構提出申請，如再無效，便是——採用最後的手段——全面罷工。

于是，邀請工厂老板來和工人們在一起举行會議以商談減少工作時間問題的努力开始了。新英格蘭工人协会甚至还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來筹划这种會議，但是老板們却对工人的要求完全不理睬，那么，克魯尔計劃中的第一步是失敗了。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到底應該怎么做。

协会中有某些派贊成集中力量發請願書和進行立法方面的活动。但其中占很重要地位的一派却主張采取罢工手段，并以一八四六年七月四日作为第二个“独立日”，开始全面罢工。因此，該协会通过了一項決議促請各地方工会及各分会“开始募集基金”以为即將來臨的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之用。这一計劃在协会的代表大会中也通过了^④。

一八四五年九月西宾夕法尼亞工厂女工的罢工曾被新英格蘭工人看成为总罢工运动的头一炮，他們并对那里的罢工工人提出了給她們以同情和支援的保証。但这次罢工竟遭到了失敗的結果，这对于第二个“独立日”运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五千名工人經過英勇的斗争竟沒有能得到勝利的事实，使得倡議全面罢工的人們失去了勇气，同时使那些主張依靠請願書和群众压力的一派領導人更有了論辯的根据。但是罗厄尔和曼徹斯特的女工們却堅決不屈地要繼續進行她們的計劃，她們甚至決定一八四六年七月四日为总罢工开始的日期。然而，这个运动却沒有能够得到外面的多少支持。

十小时工作制的法令

从这个时期以后，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几乎完全是依靠進行立法方面的活动了。大批的請願書，由“工業之声”印制出來，

送到新英格蘭的各个城鎮中去，再由各地的女工协会或妇女劳动改革协会四出散發。在已得到几千人的簽名之后，請願書被送到各州州議院去，同时还附加了一条要求，請各議院立即采取一定的步驟，以防止工人們迅速地“經由痛苦、疾病和貧困而走進對他們尚为时过早的墳墓”^④。

在麻薩諸塞州，这一請願运动的結果是，州議院派出了一些特別委员会以調查各工厂中的情况，并回報是否有制定較短工作時間法令的必要。可是州議院是很仔細的，它派到那些委员会里去的全都是公司老板方面的人，他們的报告同他們这些团体的性質自然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个委员会报告說，調查結果已使它完全覺得“各工厂內外的一切設備以及工人寄宿舍中的情况，似乎無一不是尽量以衛生和舒適为目的的”，該委员会看到“各工厂內外的秩序、各种裝备及一切事物的一般外貌更認為非常滿意，他們既不可能提出任何建議，議院也不可能通过任何法令以再進一步地改進”^{*⑤}。另有一个委员会承認工厂制度确有很多弊端，也承認工作時間过長，可是它覺得并不需要頒布什么新法令。它宣称說，“劳动階級是足够聰明的，沒有我們的干涉，他們也自然会为自己爭取条件和照顧自己的利益的。”通过“藝術和科学方面的進步的改革，以及通过人的思想的提高，如更尊重人的命运，更减少对金錢的愛好，和日益加深对社会的幸福和才智的熱愛等”，工厂制度中所存在的一切罪惡在一定時間內自然会全部消滅的^⑥。

該委员会所說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要在一紙正式議院的文件

* 但無論如何，工人們所处的可怕的境地以及各工厂中極端惡劣的衛生条件，在許多証人的报告中是完全被揭露出來了，这些材料一經發表后，对于那种所謂“美妙的工厂生活”的神話也差不多全部揭穿了。

上，重新肯定有錢階級的代理人所一直力圖使工人階級及其在進步的改革派中的一些同盟者完全接受的一套論調——那就是，政府或者工人們自己都是決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改進他們的生活條件的。一八四四年，華特斯吞在其論貧窮之原因及其防止辦法的一篇報告中即說：“法律決不能起任何作用，工人階級自己的團結怕也不可能產生任何有永久性的效果。這問題只能交付給雇主們的正義感和慈悲心腸去決定。”^{④7}

有几个州对于工人們所提出以政府法令减少工作時間的坚决要求終于接受了。第一个十小时工作制法令于一八四七年在新罕布什尔州議院通过，一年后，宾夕法尼亞和緬因州也都通过了同样的法令。

为促使十小时工作法能够順利实施，新罕布什尔的立法委员会提出論辯說，縮短工作時間对于雇主們是完全有利的，因为他們“虽使工人工作的時間較短，而由于工人們得到了適当时間的休息，工作更積極，效力更高，却一定能从工人獲得更多的利潤”^{④8}。顯然，新罕布什尔和宾夕法尼亞的老板們对于这种道理是不十分相信的，他們坚决要求在該法令中加了一条規定，即容許老板們和工人訂立進行超过每日十小时工作的特別合同。于是，甚至在这种法令还没有通过以前，老板們便送給他們的工人們这样一份合同，并通知他們自己進行選擇：或是簽字繼續工作下去，或是拒絕簽字走向失業。他們同时威脅着說，拒絕簽字的工人們的名字將被傳送到本区域中其他各厂去，那末他們也就不可能在別的工厂找到職業。

不顧这种黑名單的恐嚇，工人們仍采取堅強的斗争，彼此同意决不簽署这种特別合同以保證十小时工作制法令的实施。在新罕

布什尔和宾夕法尼亞的許多工厂中，工人都在一种保證書上簽字保證：

“九月十五日起及九月十五日以后，我們決不超過法定的每日工作時間進行工作。

“我們決不在任何要我們每日工作超過十小時的合同上簽字。

“我們宣誓以我們的生命和神聖的榮譽來支持我們的這些決議。”⁽⁴⁹⁾

新英格蘭勞工運動的低落

新罕布什尔州的工人並沒有能夠執行他們的保證。資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拒絕在特別合同上簽名的工人全被解雇，而當他們到別處去找職業的時候，更發現所有的工厂都對他們關了大門。從此以後，新英格蘭工人協會已不再是一個强有力的勞工組織了，它也沒有能夠給那些決定拒絕簽署特別合同的工人們以任何支持。到一八四七年新英格蘭工人協會——現在已改名為新英格蘭勞工改革同盟——乃又一次落入烏托邦主義的改革分子手中了。工人對這一運動已完全失掉興趣，一八四八年三月這一組織也就宣告結束。

婦女勞工改革協會也遭到同樣的結局。一八四七年一月，該會的羅厄爾單位更名為羅厄爾婦女工業改革互助會。這一組織的宗旨是要喚起工厂女工的“自愛心”和“她們的更高尚的天性”。通過智力方面的啓發和教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命定要永過着奴隸生活”的工厂女工，一定會聯合起來共同結束這種“使人民大眾屈辱于那些古老國家中的農奴地位的社会狀況”。

这段話却表现出当时的女工們已經了解到她們的痛苦的根源是生長在那一社会的經濟結構中的*。但是,正和那些曾影响着她們的思想意識的烏托邦主义者一样,她們所采取的道路本身就必然阻止了她們的理想的得到实现。比方說,她們相信僅是依靠智力的啓發和教育就可以使人民大众完全团結起來致力于進行符合工人階級利益并有助于建立社会新秩序的各种急需的改革方案⁵⁰。而事实上,要对付各公司方面所掌握的巨大的力量,僅僅智力方面的啓發是还差得远的。

宾夕法尼亞劳工运动的高潮

但在宾夕法尼亞州情况却完全兩样。在这里烏托邦主义的影响可以說根本不存在,而这里的工人們更始終保持着自己坚强不懈的斗争精神。一八四八年西宾夕法尼亞的公司老板們曾試圖强迫工人簽訂容許老板將工作時間延至十小时以上的特別合同。工人們却拒絕順从老板的这种要求,因此他們关掉了自己的工厂并声称,在工人簽訂合同同意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以前决不开工。他們更威脅說,他們要把自己的机器搬到別州去。

这是一八四八年七月初發生的事。三个星期过去了,工人們却仍然坚持着。最后,到七月底左右,約有一百名工人感到实在絕望了,乃同意簽訂合同回去复工。匹茲堡有一家报纸报道說:“工厂开門了,蒸汽鍋已沸騰起來,机器已在开始轉动了。”可是,老板

-
- 一八四八年五月,費列得尔菲亞手机織布女工所通过的一項決議也表現了同样的了解。該決議要求改变这种“化劳力最多而得報酬最少、化劳力最少而得報酬最多的不公平的制度”,并决計“要使劳动制度建立在聖保罗所宣講的那種基礎上,即任何人如果不工作他也就不應該吃飯”。

們高興得太早了一点。他們完全忘記了一八四五年所發生過的情況。工人們却沒有忘記。她們又一次開出她們的隊伍要把“工賊”從廠里驅逐出來。罷工女工手執着巨斧，以“真正亞馬孫婦女的勇猛和強悍”砍開了工廠的大門。因為門上還有一些鐵支架，她們沒有辦法砍開一條路進入廠院中，於是乃決定用猛攻的方式來攻奪這個工廠。她們全體衝到工廠門邊，把門板打碎，又打退了一隊阿利根尼的警察，終於把那個工廠攻下來。破壞罷工的工人被迫離開工作架，隨着大隊一起開出來^⑩。

很多女工以破壞他人財產的罪名被逮捕審判。審判時女工們很明白地講，她們原本沒有意思要去攻打工廠，她們所要做的只不過是抓出那些“工賊”。瑪麗·福爾吞說，“我們到那里去是要求我們的權利”；伊利莎白·海格爾蒂更補充說，“我們到那里去只是要叫那些女工們出來，盡我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叫她們出來”。這些女工仍被判為有罪并被處以徒刑。老板們自然認為這是他們的勝利，他們更認為這一判決將可以使這“由於阻撓了新的投資并使某些已投入的資本被原投資人收回因而已經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嚴重災害的”^⑪ 罷工運動從此結束了。

但老板們錯了。罷工一直堅持到八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十小時工作制終於變成了事實，雖然工人們也被迫接受了減低工資百分之十六的條件。最初，很多女工仍拒絕在這種條件下復工。但經過全體參加罷工的工人充分討論之後，一致結論說，十小時工作制的實現本身便是一個重大的勝利，同時，她們還可以在復工後繼續進行鬥爭以求將工資提高到原來每日十二小時工作時的比例。不久以後，這一點也實現了。

五十年代期間的活動情況

爭取十小时工作制的活動到五十年代期間仍然在繼續着，不過這一時期的運動和前十年的運動已不相同了。在四十年代期間，麻薩諸塞州要求施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活動主要是工人們自己在進行，擔任領導的也全是工廠中的工人和技工。但到了五十年代，這一運動的領導權却完全是掌握在中間階級的改革派和政治家們的手中了。

雖然五十年代期間十小时工作日運動主要仍是依靠着立法方面的活動，但老板和工人之間進行集體協商的事已較前更為增多。如在一八五三年中，賓夕法尼亞州麥地亞城中的所有工廠工人便都“以僱主僱工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辦法”爭得到了十小时工作制。在慶祝這次勝利的群眾大會上，工人在他們的領導人中委派了兩位代表，讓他們出去巡行新英格蘭各州，宣傳建立堅強的工會組織的必要性，以及在進行爭取十小时工作制的鬥爭中如何必須採取集體交涉的策略。據羅厄爾的“美國人報”一記者報道，這兩位代表，“在各方面所得反應甚好并頗有助於工人事業的推進”^⑤。

五十年代十小时工作日運動爭取到了很多有關這一問題的法律規定，可是，這些法令完全同四十年代時期所頒布的那些法令一樣，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它們或者只是一些不生實際效用的空文，或者就仍是那種附加有“特別合同”規定的老套子。一八五一年，新澤西州宣布在某些工業部門十小时工作是“合法的勞動時間”，但如有人進行“不合法”時間的工作將受到何種處分則並沒有作任何規定。同年，羅得島也發布了十小时工作法，但它却是更仔細的特別規定說，十小时工作日僅在“有關雙方沒有其他協議”的

条件下为“合法時間”。兩年后，康涅狄克州也作了同样的决定，規定“除非另有協議，在一場機械生產或製造業中，十小時應為每日勞動的合法時數”^④。

經過了十年的鬥爭，麻薩諸塞州的工人却仍然未能得到任何十小時工作日法令的實施。像新罕布什爾州所通過的那種類型的法令——那種拖着“特別合同”的尾巴的法令，他們倒是也曾經爭取到的。真的，在議院極有權勢的工廠代言人方面的領袖人物李那斯·柴爾德就曾公開宣稱，他和他的同仁們“對於通過一條和新罕布什爾州所行相類似的法令是完全沒有反對意見的”。這也許會引起一些麻煩，但決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危險性。他並且說，“我完全有把握說，我不要費多大力氣，就可以使我們所雇用的人員同意接受一種使廠主們完全滿意的勞動時數”^⑤。

但麻薩諸塞州的工人們認為這種附有“特別合同”條件的法令是與他們毫不相干的。他們所要求的是一種簡單明白地規定十小時為一個工作日的法令。因此，為要實現這樣一種法令，麻薩諸塞州的運動乃放棄了對請願書的依靠轉而致力於組織政治行動。一八五一年，新英格蘭工業同盟——實際上也就是四十年代期間勞工改革協會的復活——成立了，它號召麻薩諸塞州的工人們組織起來，並選派代表出席州代表會議，以便為秋季的選舉運動進行準備工作。這次代表會並沒有產生任何帶全州性的政治行動，但在羅厄爾，班哲明·伯特勒卻因提出十小時工作日綱領在鎮選舉中獲得勝利，而這個勝利還正是在工廠方面向工人提出警告的威脅下獲得的，他們警告工人說：“本廠所雇用的任何人員如在下禮拜一投票贊成班·伯特勒（十小時工作日）綱領，則將立被解雇。”

在羅厄爾的勝利結果的鼓舞下，新英格蘭工業同盟的領導

人——罗厄尔“美国人”报的编辑威廉·罗宾逊和过去曾任“工业之声”编辑的威廉·扬格——一起来号召举行麻萨诸塞州十小时工作日州代表大会。大会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三十日举行，会上当即成立了一个全州中央委员会，并由大会授权该委员会起草致全州人民的公告；竭力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保证支持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募集进行教育运动的基金；并组织各地分社。没有作任何努力以成立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大会却决定将它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限制于争取让各党派的候选人提出书面保证以支持一种真正有实效的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这一方面。所有的候选人都被要求解答下面的问题：

“你是否赞成用政府法令来禁止本州一切工厂以超过每日十小时的工作时间雇用任何工人；你是否愿意尽你最大的努力以求通过这样一条法律？”⁶⁰

一八五二年麻萨诸塞州的选举运动，凡在有工厂存在的市镇中，几乎完全是环绕着十小时工作日这么一个问题的。州长和副州长的候选人以及参议员的联合（独立党和民主党的联合）名单中的全部候选人都在十小时工作日保证书上签了字。独立党本身在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巨浪前面也只得屈服，它宣布说，它“极希望能通过一条法令……规定十小时的劳动为一天的工作时间，但这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或是为了造成社会分化，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选举结束后，十小时运动的领导人宣称，他们现在已在议院的下院中掌握到十分之一的控制权。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可是还不足以打破公司老板方面在议院中的控制权。甚至紧跟在一八五二年的选举之后的巨大的请愿运动，也没有能够减弱公司老板方面在议院中的影响。一八五五年，有一个立法委

員會確曾在它的報告中表示贊成一種強制性的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但正如查理·考萊在他的“羅厄爾歷史”中所指出的：“波士頓方面的公司老板們……用秘密收買某些擁護該法案最力的人的辦法，使得該案已無法通過了。”⁶⁷

如果麻薩諸塞州的工廠工人曾經有過更大一些的政治影響，這些有關立法方面的運動或許還不會得到這樣一種結果的。但是，雖然在五十年代期間已有大批的男人進入工廠工作，但那時工廠中極大多數的工人却仍還是沒有投票權的女工。比如在一八五三年，羅厄爾的麥利麥克製造公司所雇用的女工人數為一，六五〇名，而男工却只有六五〇人。這個比例數正可以代表當時各個紡織廠中的一般情況，從這裡我們也就更可以充分地了解到那時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政治運動所受到的限制。而且，也還並不是所有的男工都有選舉權的，因為他們中有很多都是剛移居到美國不久的。此外，自一八五三年以後，由於州議院中的獨立黨人以秘密投票“有辱於勞動人民的人格和其獨立地位”⁶⁸為理由，廢除了不記名投票規定，公司老板們對於投票箱的控制權是更為加強了。

十小時工作日運動雖沒有能夠實現這樣一條法律，却也迫使老板們作了某些重要的讓步。為了在即將來到的秋季選舉運動中減少十小時工作日擁護者的票數，一八五二年九月，五個重要工業城市中的老板們都將機器廠房的工作時間減低為每日十一小時了*。到了第二年，在烏司特城十小時工作制“幾乎成了普遍情況”。甚至很多紡織廠也被迫在這種運動前讓步，因此，到一八五三年九月，羅厄爾、羅凌士、薩勒姆以及其他許多城市都將工作時間減低為每日十一小時了。自此以後，麻薩諸塞州各紡織廠的工

* 但女工的工作時間却仍然沒有改變。因為，女工說來說去總是沒有選舉權的。

作時間，一般都是从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中間有四十五分鐘的吃飯時間，星期六下工則更早一点。

新澤西的政治行动

有关十小时工作日斗争的一个極端有趣而且極有意义的政治运动于一八四七年在^①新澤西州开始發動起來。虽然那时各行業的技術工人都已經实现了他們的十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他們仍热烈地参加工厂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的活动，以求通过一种在一切工業部門生效的法令。同时，虽然运动的矛头仍是十小时工作日問題，其他一些進步的改革方案也正在这时被提了出來。如一八四七年九月在特令敦所举行的群众大会，除了認為十小时应为本州一切工人每日正当的劳动時間外，并決議要求州議院通过法令限制工厂使其所雇用的童工每日工作時間不超过八小时以上，且須使每一兒童都能有受到良好的一般学校教育的机会。有一項決議，要求廢除对陪審官的財產限制的法令，另一条決議則要求州政府“將从卡(姆登)安(博义)鐵路(公司)及第(拉瓦)拉(瑞敦)运河公司所得收入撥作办理公立学校之用”。在提出这些要求之后，該会宣布說：“我們相信以上各項決議是包含着重要的民主原則的，凡不願支持这些決議的人，在选举运动中就决不能得到我們的支持。”^②

一八四八年初，十小时工作制之友組織了特令敦工人协会。在整个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兩年中，这一組織曾不断地召集群众會議以推动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及其他一些要求，如廢除对于陪審官和由选举產生的政府官員所加的財產限制等。在那些會議上，工人們極端明确的表示他們决不支持任何不贊成这些方案的人作

議員候選人^⑩。

當一八五〇年議院所舉行的會議拒絕採納工人們所提出的任何方案時，特令敦的工人立即對議院大加斥責，並派出一個委員會去向全州的工人弟兄們宣傳召開州代表大會的必要性。此外，他們並號召新澤西的工人們起來組織工人會社，同時決不選舉任何不贊成這些改革方案的人去擔任政府職務^⑪。

兩大政黨都出來不遺余力地爭取工人的選票了。民主黨在它的政綱中包括了好幾項工人的要求，並特別保證支持十小時工作日法令。此外，該黨並提出特令敦工人運動的領袖、制鞋工人查理·斯凱頓來擔任本城在國會中的代表。獨立黨則提出贊成一種“使所有的人都能受教育的免費學校制度”，贊成廢除必須是自由財權人才能擔任政府職務和陪審官的限制，贊成“在法律保護下的一切財產都必須按劃一稅率付稅”，並贊成通過一條法律以保護“善良的債務人”的妻子兒女，“使其不受強暴的債權人的殘酷的勒索”，和以另一條法律“調整各製造業中的勞動時間、保護童工”^⑫。

如果不是當時已有的政黨採取了這樣一種立場，特令敦的工人們很可能會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勞工政黨的，因為那時他們在這方面已經做了相當的努力了。而現在工人們卻只決定去征詢兩黨所提候選人對於各種勞工方案的意見。他們的回答證明，政客們已開始尊重工人階級在本社會中的政治力量了——因為所有的候選人都表明願意在議院中投票贊成工人協會所提出的各種方案^⑬。

選舉結果是民主黨得到了勝利——這也就是說斯凱頓被選入了國會。在州議會一八五一年的會議上，特令敦工人協會所要求進行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已在法律上規定下來^{*}。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全州實行十小時工作制的法令。

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成就

十小时工作制法令在新澤西州的实施乃是工人階級無日無夜進行活动的結果——这种活动更是在無数次悲痛的絕望中坚持下來的。簡括地說，这也就是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期間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全部歷史。在那一时期中，工人的極大部分的精力和組織力量都是化在進行爭取縮短工作時間这一斗争上的。有些歷史家認為照其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來看，十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成就是相当微末的。实际上，这一运动确有其重大的意义。它使得整个工人階級——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机工和工厂工人——都团結起來并創造了一种坚强的組織傳統。虽然直到內战时期很多工人还並沒有实际得到十小时工作日的利益，但一般工人每周正常工作時間的顯著减少**实在完全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

* 特令教工人协会在它所要求的法令实施后並沒有立即解散。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它仍舉行經常的集会討論当时各种主要的政治問題。在有一次會議上，說起事是很有趣味的，大家竟集中討論这样一个問題：“在这一期的特許証期滿后，政府是否應該完全將鐵道和运河運輸公司接收過來？”（見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二日“特令教每日州報”。）

** 下面所抄原載“第十次調查”（第二十卷第二八頁）中之一表乃是許多可以表明漸次縮短每日工作時間這一趨向的材料之一：

年 度	工 厂 經調查 之工厂 总数	1843—1860 年每日工作时数					
		8—11 小时 的工厂		11—13 小时 的工厂		13—14 小时 的工厂	
		总 数	百分比	总 数	百分比	总 数	百分比
1840	69	36	52.2	25	36.2	8	11.6
1845	103	60	58.2	33	32.0	10	9.7
1850	173	104	60.1	63	36.4	6	3.5
1855	250	161	64.4	84	33.6	5	2.0
1860	350	235	67.1	107	30.6	8	2.3

六〇年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的努力所換來的結果。到一八六〇年，大部分的熟練技工和不熟練工人的標準工作時間都已是十小時，工廠工人雖然不在內，但他們的工作時間也相當的減少了。在麻薩諸塞州的大部分工廠中，工作時間已從十三小時減至十一小時*，同時在新罕布什爾州，由於好幾次共有着五千多人參加的英勇的罷工的結果，老板們被迫決定將每日工作時間改為十小時又五十分鐘^④。機器運轉的速度的確是比以前加快了，但從每日工作十三或十四小時改變為十或十一小時，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是大大的跨進一步了。

在一八三〇年，美國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是每日十二小時半。三十年後，這種平均數已是十一小時了。這種減低並不是依靠老板們的仁慈心腸得來的。它是工人們組織起來進行了無數次英勇鬥爭的結果。現在，有了這種工作時間較短的条件，工人們將可以利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加強他們的組織，以便在以後的運動中爭取進一步縮短工作時間了。

* 但在本州某些地區的工廠中的工作時間一直到一八六五年以前却還有十三小時的。

第十二章

工会組織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劳工斗争

除了上面所講述的以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十年中，劳工运动还有許多其他方面的重大的發展。在这十年中間，許多城鎮中的各制造业部門和建筑行業中的技術工人，已經为將在內战期間及內战以后时期急剧爆發的劳工运动打下了基礎。这些工人虽然对于其他的問題并不是完全漠視，但他們所主要关心的是自己所在作坊或工厂中的工作条件，雇主所付的工資，每日工作的時間，工头的为人，对学徒的控制，進行組織而不致被控为圖謀不軌的权利，以及技工財產留置法和反对公司購物証等条約的实施。他們所組織起來的各种工会，虽然只不过代表这一时期中更廣泛的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些組織却使工人階級的斗争从此帶有一种永恒性，并增强了劳工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活动的力量。主要以各地地方工会为代表，工人們在这个十年中間，已开始通过一些略具粗形的全國性組織來進行他們的斗争，这些組織在適當的時間中便將給全國劳工联盟的形成开辟道路。

劳工情况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虽然由于工会斗争的結果，工資的票面數額是增高了，但因为在加利福尼亞州發現了金礦，以及在一年的

時間中國內金融市場忽然增加了五千万元的硬幣后，生活費用急劇提高，實際工資的數目却反而下降了。從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物價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那時只有兩種工業——五金業和木器業——還使工人工資與上升的物價保持着一種平衡^①。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紐約論壇報”公布了一份生活費用預算表，估計一個五口之家一星期的預算最少需要十元五角七分。表中除糧食、衣服、房租、燃料以外，唯一列入的其他雜項費用是“家具和器皿”損壞后的添置費二角五分和報紙費一角二分。霍瑞斯·格利雷更評論說：

“我要問：難道我把工人的生活定得太高了嗎？娛樂費從那里出？吃冰淇淋和布丁，星期天為了吸一點新鮮空氣到河上去旅行一趟的錢從那里來呢？還有醫藥費呢？教堂座位費呢？買一本書或一點樂器呢？”

下列的每日工資表可以說明霍瑞斯·格利雷所作的估計是完全沒有誇張之處的^②：

建 筑 業			
砌磚工人	1.88 元	泥瓦工	1.60 元
木工	1.74 元	油漆工	1.73 元
家具木工	1.74 元	雇牆工	1.75 元
機械工人	1.38 元	鉛管工人	1.90 元
磚瓦搬運工	1.00 元	鑿石工人	2.00 元
鋼鐵和五金業			
滾軸工人	0.61 元	機器工人	1.37 元
模型制造工人	1.63 元	水車制造工人	1.63 元
普通工人	0.89 元	翻砂工人	1.41 元
鐵工	1.56 元	木模工人	1.41 元
鍋爐工人	1.28 元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期間，許多女工如果一星期能賺到兩塊多錢，就是幸运的了。“紐約論壇報”中有一篇報道說：“关于女縫工‘工資’問題最坏的一种情况是，那些雇用她們的人从不給她們工資的現象簡直成了極為盛行的一种風气。”③

工人們居住的区域也是他們的收入的一种反映。亨利·大衛·瑟魯在發現新英格蘭非技術工人的居住条件时，真是感到無限驚恐，他們是“住在猪羊圈中，为使屋里有一点光綫，整个冬天都敞开着門，沒有任何可以見到的，虽然在想像中觉得一定会有的，木柴堆，以及老人和兒童們的外形都因長久在冷冻和苦难中瑟縮的習慣永远縮成一团，他們的四肢和机能也都完全沒有能够正常地發展”④。在紐約城中，情况也并不比这好。成千的人都是住在大雜院中，那些房子算是还有几面腐朽的牆壁就是了，另外还至少有兩万人組成了紐約的地窖人口。

地方工会

工人們很快將中斷了的綫又接上了。一八五〇年六月在紐約城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有四十三個工会的代表出席。根据会上的报告，那时只有成衣工人是紐約城中唯一尚未組織起來的技術工人。波士頓、費列得尔菲亞、紐亞克和特令敦等方面的报告，都曾談到各該城的組織运动的热潮。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員講述了旧金山工会組織的發展情形。到一八五三年八月为止，旧金山的木工、油漆工、制革工人、造船工人、油灰工人、碼頭工人、成衣工人、畜牧工人、印刷工人、砌磚工人以及运貨工人等都已成立了自己的工会⑤。这是美國史中第一次出現的遍及全國的巨大的工会运动。

这些新組織起來的工会發动了多次的罢工，其中有許多在提

高工資水準方面獲得了勝利。到了一八五四年，工人的罷工運動在全國各工業中心地區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八五四年四月二十日的“紐約論壇報”曾報道說：“每年春天都會看到在本城或在其他城市中的某些行業——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行業的話——為了提高工資而舉行的新的鬥爭。”保守派的機關報誣蔑說，“這種四處泛濫的狂潮……”是“從美國開始的”一種國際陰謀活動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推翻健全的政府與私有財產制度^③。但是這些報紙很快就受到一些較進步的報紙的反駁，它們說這種罷工狂潮乃是从美國社會中的一些基本矛盾中產生出來的。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羅徹斯特工會日報”在一篇以“工人群眾的惶惑”為標題的社論中說道：

“黃金如狂潮一般涌進來，紙幣制度更為擴張，其必然的結果是，差不多工人階級所生產或消費的每一樣東西的價格都上升了；但是勞動力本身的价值哩，……它幾乎還保持着多年以前的標準……。非常明顯，那些以過去的價格買進勞動力，而以現在高漲的價格出售生產品的人們所購進的更多的錢，正是勞工們所遭受的損失，我們只要拿工業擴展以前的價格作為標準來比較一下看看吧。這就是為什麼當物價上升的時候，製造業商人，特別是奸滑的經營生產業和不動產的人們所以大發其橫財的主要原因……。而同時通常正是這個雇主階級，你總是聽到他們頭一個在那里天天叫反對罷工，要求一種制止聯合起來破壞工商業的法令立即嚴厲施行，以反對那些除了這個辦法再想不到任何方法可以爭取到工資的合理的增加的人們。”

一八五四年技術工人們通過英勇的工會戰鬥，使他們的工資

比一八五〇年的水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这种战斗精神在一八五〇年紐約城的砌磚工和刷牆工的談話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現，他們在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宣稱說，“在資本家和雇主的意志的奴役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們〕現在認為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他們都有一種不能推卸的責任要團結起來，成立各種組織，以互相保衛，以為自己的勞動力爭取到合理的報酬——這種報酬應該是固定的、划一的，不能叫雇主們利用我們的需要或工作缺乏的情況任意改變。”他們更提出論證說：“我們和社會中的其他的工人階級一樣，有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的勞動力是我們能拿到市場上去出售的唯一的商品——也就是我們的資本，我們的一切，因而我們肯定說，如果我們听从購買的人任意規定我們的勞動力的價格，那我們就是甘心忍受最卑賤的奴隸生活。”^⑦

正如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時期一樣，美國工人已經認識到間歇性的、只在危機發生時才發動的這種斗争方法，是不能保證他們的勞動力得到足夠的報酬的，因此他們現在要設法在較堅固的財政基礎上建立更有永恒性的組織。但是，在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開始組織以前，一八五四年的不景氣情況便摧毀了大多數原有的工會，其會員總數在二十萬以上。當一八五五年春天各地方工會開始復興的時候，他們便非常小心，決定要創立永遠性的救濟基金機構。但是在他們還沒有募集多少基金以前，一八五七年的危機，又一次摧毀了大多數的工會，雖然由於他們設立了救濟基金機構，和過去類似的情況相比，是有更多的工會保存下來了。一八六〇年，各地工會組織又大為興盛起來，但不久，南部各州脫離聯邦的運動却又大大地阻撓了這一運動。

五十年代期間地方工會的歷史是無數組織忽生忽滅、忽滅又

忽生的歷史。五十年代的工人運動和過去不相同的一點，就是在這一時期中組織的綫從沒有完全中斷過，而且從此以後也再沒有完全中斷的情況發生。

五十年代的工會全部都是由技術工人組成的行業工會。非技術工人幾乎無法加入這些組織，而且其中有些如印刷工人、旅館侍者、鞋工和成衣工人等，還不讓婦女參加他們的工會組織和在他們那一行業中工作。不過，有些工會倒允許會員的妻子或女兒在各會社所控制下的作坊里作工*。

像它們的三十年代時期的前輩組織一樣，這些新的工會所關心的仍是關於學徒的規定、入會的會費、工資的標準、集體交涉、以及罷工基金等。只在五十年代的頭幾年，合作社問題和互助問題還是工會業務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技術工人們逐漸使他們的工會擺脫了烏托邦主義的影響，而集中力量推進工會的當前要求，五十年代的工會運動在許多方面是都比三十年代時期的進步多了。會費按照一定的規定征收，罷工基金也積聚得較多起來。單身罷工工人一星期可有五元津貼，結了婚的人的津貼除了自己的三元外，妻子每周一元五角，十歲以下的子女每周每人五角錢。有許多工會還租用了固定的大廳，以便經常舉行會議進行會務。

有時這種工會會廳也同時作為臨時出租收費的廳房或作為職

-
- * 有些工會在罷工期中不讓婦女參加工會是愚蠢的，因而改變了他們對女工的敵對態度。克里夫蘭成衣縫工工會曾呼喚那些正是他們所曾排斥的婦女在罷工期中來支持他們。他們呼喚說：“成衣業中的某些雇主拒絕了男工的要求，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能夠用自己規定的價錢來雇用女縫紉工。因此，女工們，為了爭取你們的權利罷工吧！”婦女們罷工了，但她們提醒男工們不要忘記了好施應有好報。因此，此後克里夫蘭成衣工會就允許婦女參加了。（見一八五〇年八月十九日和二十九日的“克里夫蘭先驅報”。）

業介紹所之用，在那里失業工人可以來登記找工作，雇主們也可以來這里找工人。紐約麵包工人工会中有一个領導人是蘇格蘭人，他曾經在蘇格蘭的工会运动中積極參加過活動，而且那里的許多工会是都設立有職業介紹所的。毫無疑問，正是由于他的影响，麵包工人工会于一八五〇年七月在紐約各報登載了下面一則啓事：

“致麵包房老板們。麵包工人工会職業介紹所……現已在格蘭德街一二七號開業。每天从上午六時到下午九時，而星期天从三點到九點，經常有固定的人員在所值班，以便給本城親自來或外地寫信來尋覓雇工的雇主們以尽可能的方便。”^③

五十年代期間工会組織的工作進展最大的是集体交涉方面的工作。虽然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工会已不存在了，但它們在集体交涉方面的成就却並沒有被人遺忘。一八四七年新澤西州特令敦的木工老板們和木工雇工协会訂立了一种集体協議。“特令敦每日公報”于一八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对这个協議提出評論時，盛讚雇主們承認工人們有权為自己爭取較好的生活進行談判的这种開明態度。該報并接着說：“一个人應該永远有权要求使他所付出的勞動力得到合理的代價，而我們相信他們的要求是很少超过这种限度的。”

五十年代的各工会一經組織起來以後，就開始以整个行業為單位來采行集体交涉的原則，以便使一行業中的全体工人都能享受划一的工資标准。要达成这样一种協議，工会組織就必須制訂出一种他們認為合理的工資表，然后在報上刊登啓事，邀請“所有開明的雇主們”來和他們的委員會進行會議，討論他們所擬訂的工資表，并協商出一种双方都須遵守的協議來^④。下面就是一則典

型的这类的啓事：

“致紐約成衣商人——

諸位先生：敬希于星期一，九月十六日（一八五〇年）十時于莎士比亞旅舍參加有成衣工人協會代表出席的集會，以便商討與雙方共同利益有關的諸問題。”^⑩

一八五〇年初紐約印刷工人工會，委派了一個委員會四出調查該行業中的勞工情況。所調查的項目計有工人每周收入、童工的工資、工作時數、被雇用人數、不同種類工作的工價、付工資的時間和辦法、以及工作條件等。被調查的一共有八十八個單位雇用了八百五十個熟練工人和三百個童工，約占紐約印刷工業中全體雇工人數的百分之五十。印刷工人工會根據這些材料，仔細地草擬了一份關於一般工作的報告，並提出了一些改善的建議，其中最着重的一點是要在全市實行劃一的工資標準^⑪。

一八五〇年五月，印刷工人工會又委派了另一個委員會，從事探詢雇主們對於在本行業中建立實行劃一工資標準的協議的意見。該工會在採取這一步驟之前，更曾經派定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過這個問題，這個委員會“發現採取適當方法以維護整個印刷業的利益的情緒在老板中是同在工人中一樣普遍的”。于是在一八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印刷業的雇主和代表鉛版制造工人的一個工會委員會在紐約市中的史泰曼旅社舉行會議了，在會議結束後，雇主們給報館送去一份很簡短的啓事說，他們已接受了工會所提出的工資標準表^⑫。

分析一下一八五三年的許多罷工運動，就揭露雇主們是利用着一切機會來破壞已成立的集體協議。當一八五四年的不景氣時期工會運動沒落的時候，那些集體協議也就全部失效了。各工會

虽然还必须重新进行争取集体协议的斗争，过去的經驗和一些旧的書面的协议却也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新移民入境的劳工

在五十年代期间有組織的工人所遇到的一个最嚴重的問題是，雇主們利用新移民來的劳工以破坏已建立起來的工資标准。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中，我國發生了近代最大的一次大批劳工移民入境的情况。从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移民到美洲的人数是一，七一三，二五一人，而在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〇年期中却增至二，五九八，二一四人。一八六〇年时，在國外出生的人数，占紐約城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六二；占芝加哥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九；占費列得尔菲亞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九三；占匹茲堡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九九；占聖路易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六。

許多美國本地的工人对这种入境移民的巨流是怀着恐懼和仇恨的心理的。美國的技工們抗議說：移民來的工人們会願意“每天工作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而工資却又听憑資本家們賞給多少是多少”^⑬。一八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先驅報”說道：“有些人經常注意着在等待能够制造家具的德國移民，甚至在他們尚未登陸以前，就跑上船去，以一年除供給伙食外二十元或三十元的工价，或尽可能以更便宜的条件把他們雇下來。”

土著的美國政客、報紙以及那些企圖破坏工人之間的團結的雇主們，都用尽心机來利用工人的这种恐懼心理。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中，土著的宣傳家們把生活水平的下降完全諉罪于入境的移民。他們說：美國工人是不可能和那些外國人競爭的，他們“吃的是最粗、最賤、最惡劣的飲食——衣衫襤褸，骯髒不堪——这

批人既不配與美國勞動者和美國技工為伍，也根本不是任何一個社會中的良民”^⑭。

有些工人竟相信了這種宣傳，並有不少人加入那種荒唐的反外國人的運動。各種會社組織起來，要求改變移民歸化法，以使得外來人口更難入籍為美國公民，並要求制止勞工移民入境。所有這些工人會社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是一八四四年在紐約建立起來的美國人聯合社，“作為一個保護會員不受老弱貧困之苦和不受同移民競爭之害的慈善的愛國主義的團體”。只有美國土生的工人才能加入作會員。該會的婦女輔助組織，美國女兒聯合社，是在一八四五年三月成立的。美國人聯合社在十六個州中都設有分社，在一八五五年的時候，它號稱已有會員五萬人了。該社出版了一種週報，即名“美國人聯合社”，另外還出版了“共和國，一種美國文學、政治與藝術月刊”。這兩種刊物都是攻擊移民入境的勞工的^⑮。

有一些土生的美國工人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偏見，更參加在五十年代中興起的一種反天主教的、排外的組織，一無所知黨*，進行活動，但大多數的美國工人已逐漸認識到要限制移民進入美國來是和“一個人要想阻止地球運轉一樣”^⑯徒勞的。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一種極有影響的勞工報紙，“美國自己的園地”呼喚說：

“美國的技工們，如果你們真正關心你們全體伙伴的利益，你們就永遠不要忘了你們應該作為一群技工而且要以技工身分為唯一條件團結起來……。現存的這種對外國技工的仇視心理乃是僱主們所挑撥起來的，他們的目的是分散你們

* 美國民主黨之一派，因其黨員每遇人問及有關於其黨綱或政黨問題時均答以“不知道”，時人因稱之為“一無所知黨”。——譯者

的注意，使你們忽視那些最后真正會對你們有实际利益的重大的斗争活动。”

許多工会拟定了專門处理移民問題的計劃。紐約面包工人工会在它的会章中規定說，該会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幫助和保护所有新移民來的面包工人”。紐約城的鐵工和水車制造工人也在他們的会章上宣称，“給新來到的技工們介紹情况，幫助他們并替他們找工作”，是所有美國工人都不应忽視的責任。有些工会还不只这样做。为了防止雇主欺騙新移民來的工人，这些工会在欧洲的各大報紙上刊登廣告，并在新來的移民的住宿舍門前散發傳單，告訴新來的工人們何處“可以找到能得到適當工資的工作，及如何可以逃脫‘工作高利剝削者’的魔掌”。通常它們劝告新來的工人在找工作以前先到工会里來，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證他們能得到較高的工資，同時也可幫助維持某一行業中原有的工人所已爭取到的条件^{①7}。

在有些行業中，不同國籍的工人們各自組織單独的工会，遇到采取較重大的行动时，彼此進行合作。但常常几种不同國籍的人也在同一个劳工組織中團結起來，如紐約的房屋裝飾工人工会的會員，在一八五〇年时就有德籍美國人、爱尔兰籍美國人、法籍加拿大人、英國人、以及土著美國工人等。紐約成衣工人工会是由土著美國工人和德籍美國工人組成的。最初他們相处得并不很好，但是由于在罢工期間，警察对各种不同國籍的工人的同样的殘暴，增加了他們彼此間的了解。德籍成衣工人們在警察局外面示威，抗議對他們的美國弟兄們施行監禁。他們所举着的標語中有一条寫道：“我們沒有料想到在这个自由的國家中竟会有俄國的警察，我們也不能相信人民竟会容忍这些官吏如此明顯地濫用职权。”^{①8}

因为許多愛爾蘭來的移民都是沒有技術的，他們因而很難進入五十年代的那些只允許技術工人參加的工會作會員。雖然他們大多數在過去並沒有參加工會運動的經驗，但他們本國中幾十年來不停的鬥爭經過却使得這些愛爾蘭工人到美國來後能夠進行英勇的戰鬥。誠然，這些活動常常只是在反壓迫時強烈地爆發一陣，並沒有因此成立什麼經常性的組織。但真是很少工人在罷工鬥爭中能像運河和鐵路上的愛爾蘭工人那樣富於戰鬥性的。僱主們替他們自己所宣稱“不要愛爾蘭人”的罪惡的招僱工人廣告辯護說：“如果他們被僱用了，他們不是第一個就會要堅持提高工資，〔亦即〕用他們的行話說，進行罷工嗎？”^⑩

英國的影響

許多從英國和德國來的移民，對於美國的勞工運動，貢獻出了他們過去在工會運動方面的經驗。例如，福爾河的棉紡工人，全都是過去在英國時參加過工會的，他們乃將工會運動的各種原則在新英格蘭的各紡織業中心作了普遍的宣傳。一八五〇年冬天，麻薩諸塞州福爾河的棉紡工人為反對僱主降低工資，發動了一次英勇的罷工。他們組織了一個工會，派遣代表到新英格蘭其他有紡織廠存在的城市去募集了兩萬元作為他們的罷工基金，同時依靠着織布工人們的幫助，開始印行了“工會與福爾河紡織工人報”。經過了六個月的鬥爭，罷工仍失敗了，棉紡工人們被迫到別的地方去找工作。但無論他們走到哪里，他們也就把工會運動的各種原則帶到哪里去。

無論如何，福爾河的棉紡工人很快就又重新組織了他們的工會，到一八五七年他們又發動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在很短的

時間內，他們獲得了部分的勝利，而到一八六〇年時便實現了他們的全部要求。一八六〇年組織起來的棉紡工人聯合會就是英國紡織工人所作工作的直接結果，他們在新英格蘭各個紡織業城市散布了工人必須進行組織的意志^⑳。

英國工會主義者的影響最大的地方是在礦區中，在那里工資低微以及用公司購物証償付工資的制度造成了很大的不滿。美國第一個礦工工會就是那些曾在英國工會中很活躍的英國工人組織起來的。約翰·佩特斯，一個曾積極參加大憲章運動的英國礦工，領導了賓夕法尼亞州斯庫基爾郡的礦工，組成了美國的第一個礦工工會。該會的名稱也就跟着它的創建人和主席的名字，稱為佩特斯工會。一八四九年春天，擁有五千個會員的佩特斯工會，在無煙煤礦區發動了第一次有組織的罷工，一方面為要爭取較高的工資同時還要廢除公司購物証制度。僱主們被迫同意選舉一個代表工會和礦主的聯合委員會來處理這些問題。最後，由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工會方面認為滿意的協議。

這次罷工結束後，佩特斯被工會聘用為該會的代理人，負責到各處去組織礦工。他的津貼是每周十二元，同時還給他一匹馬和一座二輪輕車。但不久，他却向僱主們投降了，他在一八四九年提出一條議案，大意說“我們相信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僱主們的利益是如此地密切聯系着和完全一致的，要想把它們分開也是不可能的……”^㉑到了一八五〇年的年中，該工會也就結束了。

但是，工會運動的傳統却並沒有從此結束，一八六一年一種工業工會美國礦工協會組織起來了。該會的創始人但尼爾·威福爾，過去是憲章黨員，在他一八六一年的一篇報告中曾宣稱：“在礦工中，在一切與開礦工作有密切聯系的其他部門的工人中，建立以提

高礦工的物質、精神与社会生活为目的的會社的必要性这点，是礦工中有思想的一部分人多少年來便早已感覺到的。”威福尔更強調各不同國籍的工人群众必須在一个工会里團結起來：“美國有一位不朽的名人曾說，‘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叫做東部，也沒有什麼叫做西部，沒有什麼叫做南部，也沒有什麼叫做北部’；我現在要說，讓這裡沒有什麼英國人、愛爾蘭人、德國人、英格蘭人、或是威爾斯人的分別。”^②

德籍美國勞工運動

在有些地區，德國工人是在工会運動中居于領導地位的。五十年代期間，聖路易勞工運動就是一些被稱為“四八活動分子”的人們所領導的，“四八活動分子”即是指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中從本國流亡出來的德國人。在其他城市中，德國工人常常對於美國工人採取嚴格的宗派主義的態度，認為他們在政治上不夠成熟，不值得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克服語言上的障礙，以便和他們接近。因此，德國工人組織了他們自己的工会和合作社運動。後來新出現一些更精明的領導人，德國的工人組織才和其他工人階級的一些運動很好的結合起來了。

德籍美國勞工運動的領導權最初是掌握在赫爾曼·克利格的手中，他是一八四五年來到美國的。克利格在歐洲時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過，但後來因為他毫無保留地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並在喬治·亨利·伊文斯所創立的全國改革協會中積極活動，便完全失去了他們對他的信任。因此，克利格在美國的影響也就很快消失了。

一八五〇年這一領導權轉入威爾漢·威特靈的手中了，他是

一八四六年年終时到达美國的。威特灵曾積極参加过欧洲的革命运动，并于一八四六年加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德國工人协会。他最初到美國來是被一群德國的土地改革者邀請來的，但不久他又回國去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斗争去了。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威特灵于一八四九年又回到美國。他在美國創辦了一种劳工报纸，“工人共和國”，并且致力于使各个德國劳工組織归于集中領導的工作。在他的指導之下，紐約工会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于一八五〇年四月成立起來。第一次联合会上的代表是由下列各組織的代表組成的：面包工人、鞋工、家具工人、成衣工人、房屋裝飾工人、旋工、雕刻工人、技工、制帽工人及毛皮工人。此外还有从美國自衛会中的一派社会改進黨派來的代表，及威廉茲堡和紐亞克劳工会派來的代表。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所代表的會員总数約为二千四百人。

类似的团体在別的城市中也組織起來了，同时，号召德國工人召开全体工人代表大会的运动也开始發动了。召开这个會議的号召是一八五〇年九月發出的，在下一个个月，德籍美國工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便在費列得尔菲亞举行了。聖路易、巴尔的摩、匹茲堡、費列得尔菲亞、紐約和布法罗的劳工会，路易斯維、威廉茲堡、紐亞克、辛辛那提、馬里斯維、底特律、罗徹斯特、杜标克和特令敦的总工会都派來了代表。据大会中最活躍的人物威特灵估計，有关各工会的會員总数为四千四百人。会上所討論的有教育問題、政治組織問題和威特灵的得意計劃——劳力交易銀行*。这个新的

-
- 劳力交易銀行是这样一种組織：生產者可以將他的生產品集中存入一个倉庫，而換得一紙同等价值的票據，憑此票據可以完全按票面的价值在該行的商店按成本价購買一切商品。

組織定名為工人同盟總會^②。

但實施大會所通過的綱領的企圖却遭到了失敗，這是因為德國工人中發生了分裂。首先，在一八五一年時，由於奧古斯都·威里西和格拉赫·金克爾等人力圖使工人們忽視在美國的經濟鬥爭，而盡力來籌募款項援助德國的革命運動，因而分裂了德籍美國工人的勞工運動。而同時，威特靈又正極力要使工人們相信他的勞工交易原則的實現將可以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在威特靈看來，勞工運動實際上是他實現這個計劃的一種工具。像其他的一些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威特靈認為工時和工資方面的鬥爭和工業合作制運動相比起來是無關重要的。他說，工會的唯一用處就是它將工人們聚集在一起，使他們更容易接受較重大的綱領。政治行動也是無用的，因政客們經常會出賣工人階級。

多數德國工人一經認識到威特靈對於他們當前問題所抱的主觀偏面的看法，立刻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而且因為他那種專擅的態度而對他表示反對。在一八五二年六月十九日的“工人共和國”所載一文中，威特靈竟認為在一八五二年五月時工人同盟總會中的會員只有三百名是可靠的了。又過了一些時候，當工會問題在該會中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時，威特靈竟憤然離去，從此以後，直到他一八七一年死去時為止，他完全失去了對勞工運動的興趣。

德籍美國勞工運動，後來經過約瑟夫·衛登麥爾的領導，又獲得了新的生命。約瑟夫·衛登麥爾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在歐洲時曾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過密切聯繫^③。他於一八五一年來到美國，那時他是三十三歲，決定要將他的一生貢獻於正在美國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憑著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了解以及與馬克思保持密切的通訊聯繫，衛登麥爾看到了德籍美國工人中的狹隘觀點的錯誤，

看到威里西和金克尔所領導的革命借債运动的不正确，并看到威特灵的綱領是完全不適合工人階級的需要。

一八五二年一月，衛登麥尔創辦了一種雜誌称之为“大革命”^{*}。一年后，更名为“改革”，由衛登麥尔与格斯塔夫·克勒尔博士合編。在这兩種刊物中，衛登麥尔尽量揭露那时在德籍美國工人中流行的一些錯誤的理論。他指出說革命借債运动是純烏托邦主义的思想，因为要靠外國的刺激力量在一个社会大变革即將开始的國家去制造革命是决不可能的事。而这一計劃的唯一成就即是造成了德籍美國人劳工运动的分裂。同时，衛登麥尔反駁了威特灵的見解，詳述为当前的要求進行斗争的需要，以及在劳工运动中必須將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問題結合起來的重要性。衛登麥尔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号的“改革”中寫道：“經濟与政治是决不能分割开的”，同时，因为威特灵喊叫着政客們总会要出賣工人的，他乃回答說，劳工必須積極参加政治运动，不过这种活动和一般政客們所搞的是完全不同的。劳工階級必須要領導人民中的其他階層來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方面的斗争。衛登麥尔不断強調說：“劳工階級是一切一般或特殊的改革运动所必須視为主要依靠的基石。”^⑤

但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劳工應該組織起來和團結起來。衛

-
- 一八五二年一月一日，“紐約体育报”（社会主义体育协会所办）登載了这样一条啓事：“‘大革命’系由衛登麥尔編輯的一種周刊。衛登麥尔是前‘新德报’編輯，該报已被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警察查封。‘大革命’將於每星期日出版，在編輯工作方面有前‘新萊茵报’編輯馬克思、恩格斯、佛第蘭·弗鏡里格拉茨等人合作協助。該刊辦事处設于前柏斯街七号。”

該刊只出了兩期。第一期完全登載着馬克思寄來的稿子，即他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馬克思的这部偉大的歷史著作直到一八六九年才在欧洲印行。

登麥爾很快就已看到德籍美國工人的狹隘的宗派主義已使他們自己與美國勞工運動的主流隔離開了。因此，他的目的是要組織一種把經濟和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的統一的勞工運動。一八五二年後期，衛登麥爾在紐約組織了一個無產階級同盟。在這個組織中，關於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勞工運動的問題才作了初步的討論。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八日，無產階級同盟發出一個號召，要在紐約城的技工大廳舉行一次工人群眾大會。這個號召強調美國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才能進行提高勞工地位的鬥爭。該號召肯定說，“如果工人階級不團結起來，它就不可能實現它的一切權利。”最後並結論說：

“只有一切行業團結起來，並按照一個具體計劃進行活動，我們才有可能消除一切使工人日益降低到牛馬地位去的各種罪惡現象。

“向更大的工人組織的道路前進吧，不僅是為了要進行爭取提高工資和實現政治改革的鬥爭，而且為了要創造一種能够使所有的工人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完全團結一致的綱領。全體工人都應該來參加這個會議。讓我們一心一德地團結起來吧！眾人為我，我為眾人。”^{②6}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大會開始進行了，並且組織起來了美國勞工協會。這個新的組織宣稱它要盡全力去組成一個“不分國籍的，包括全體美國勞動者的聯合會，以改進勞工的生活條件”，並宣稱說：“所有的勞動者，不管他屬於何種行業，均能以完全同等的權利加入本協會；一切工會組織，不論其宗旨為政治性的、商業性的、慈善性質的、或者僅僅是一種社交性質的，只要他們承認本協會的目標，也均可以參加本協會。”^{②7}

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外，領導規定，該組織將致力於：

“使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方法進行斗争，以求通过國家法令制止資本家們爭奪劳动力的競爭，以及工人之間彼此的競爭。

“采取步驟保护工人，使他們不致在雇主們的手中遭受到任意減低工資，任意加長法定的工作時間等行为的損害，同时，在必要时，通过共同的努力以求爭取工資的提高。

“此外，并將采取步驟，徹底消滅一切用欺騙和非法手段來剝削工人的現象……。

“強調工人同盟对現有一切政党关系上的独立性。”*

这个新的組織很快就有了很多区域組織（首先于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間在紐約成立，后來在別的城市也成立起來）和一些工会作为它的基礎了。各类的工人可以加入这种名为各業工人会的区域組織，每周有定期集会討論一切政治問題。工会只有某一特殊行業的工人才能參加，因为工会是以行業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区域組織和工会兩者都有代表出席美國劳工协会的中央委員會，而最初区域組織在委員會中的力量却更为强大。作为中央委員會領導人的衛登麥尔立即設法改变这种情况，他指出說，美國劳工协会應該建立在工会的基礎上。甚至当作一个政治运动來說，如果劳工协会沒有强大的工会的支持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因此衛登麥尔建議在中央委員會中增加工会代表的数目，并成立特別委員會在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中間組織工会。這兩個建議都通过了，組

-
- 这次會議的这种关于政治行动方面的立場是符合衛登麥尔在数月以前所提出的主張的。在“紐約体育报”（第十五期，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中，衛登麥尔曾強調指出，現有的政党沒有一个是真正关心工人階級的需要：“在民主党和自由党的綱領中，以及在其他小党派的綱領中有一件东西是永远找不到的，那就是劳工綱領的制訂。而这实是一件急切需要的、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事。”

織成衣工人和制鞋工人的委員會也立即成立起來²⁸。

紐約會議的成功激起了其他城市中的團結會議的召開，尽管威特灵以及追隨着他的一些人極力反對，這個運動仍在全國展開。一八五三年九月，使用英語的工人的工會代表大會在紐約召開了，並組織成一個聯合會，採納了美國勞工協會的綱領。數月後在華盛頓方面，使用英語的工人們在山姆·勃瑞格斯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會，其正式名稱為全國工人協會，並創辦自己的機關報“全國工人擁護者”，以宣揚美國勞工協會的諸原則：獨立的工人政治組織，將無組織的工人組織進工會，以及加強全國工人的團結。

山姆·勃瑞格斯寫道：“我們的目的，不僅是要為我們的工作爭取必不可少的工資；我們更要想到——利用從工人階級的隊伍中選出人來參加全國一切立法機構的辦法，將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提到與它的作用相符的高度……。讓敵人嘲笑我們的這種建議吧，如果他們高興的話；然而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權利，同時，我們中有很多人是完全懂得應如何去完成這個任務的。”²⁹

不幸得很，這個新的美國全國工人聯合會，在它成立的那一年就夭折了。美國勞工協會的生命也是同樣的短促。中央委員會發現各行業工會對於其他行業工人的問題仍然是非常地不關心，而且只在有關其本身福利的重大問題發生時，它們才表現出關懷。一八五七年十二月，美國勞工協會以各業工人聯合會的名義又在紐約復活起來，可是在一八六〇年以前便又告結束。那時衛登麥爾在密爾窩基經常與紐約的共產黨人俱樂部* 保持接觸，他曾提出了盡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指導方法，希望使這個運動復興起來。到一八六〇年芝加哥勞工協會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這個協會也

許是美國最好的一个德國工人协会,而就在这里,在西美的中部地区,衛登麥尔及其伙伴們繼續極力推進他們的努力,以求使所有美國工人在一个結合工会运动和政治要求的組織中團結起來^⑩。这些努力暂时是失败了,但是各种教育工作的效用和健全領導的經驗,已經使德國工人漸趋于和美國工人接近。衛登麥尔業已在美國播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种子,最后,他所夢想着的那个將使土著美國工人和外籍工人相联合、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相联合的美國劳动联盟,也就是他所想望的一种將使工人階級的政治要求和工会运动的要求相結合的一种組織,是終归会要實現的。

約翰·坎門司及其副手所編“美國劳工史”**对于衛登麥尔的

* 紐約共產党人俱乐部成立于一八五七年十月。其会章要求全体會員“承認一切人的完全平等——不論其膚色或性別如何”,以及“竭尽努力以求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制度……并以一种合理的制度來代替它;在这种新的制度之下,每一个人有机会,而且尽可能地適合他的需要,去享受世界上一切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幸福生活”。会章并規定說:“本俱乐部將使用一切它認為合適的办法,包括私人談話、群众會議、与美國及欧洲的共產党人保持通訊联系、以及依靠适当的报刊或書籍的流通等,以对于本会的各种目标大事宣傳。”在本城其他区域如有三十个加入了本俱乐部的會員,便立即可以开始筹划成立新的支部。(見“紐約共產党人俱乐部規約”,底稿存于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政党”部分之“劳工問題文稿”,第二十五箱。)

一八五八年美國曾力圖建立一种國際劳工协会以便与欧洲的类似的运动進行合作,而在这方面,共產党人俱乐部乃是最主要的动力。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紐約召开一次國際會議曾宣言說:“我們否認一切國籍或种族,出身或地位,膚色或性別的區別;我們的目的就是在于調和全人类的利益,實現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以及實現一个統一全世界的共和國。”共產党人俱乐部曾積極从事組織德籍美國人加入國際协会的活动。它号召:“一切主張推認現存制度及現存社会关系,要求實現全人类的自由和平等的坚强的革命分子完全團結起來。我們是为着無止境的進步來宣傳革命的。”(見卡尔·欧伯尔曼:“約瑟夫·衛登麥尔”,一九四六年紐約版。)

** 見該書第一卷,第六一七——六一九頁。

活動所作的分析，是表現這些作者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那里，衛登麥爾被描寫成為“力圖利用當時工會運動的熱潮，利用工會以作為一種有階級自覺的人們的廣泛組織的基礎”，並影響它們使它們將“工會運動的要求和對立法方面的要求結合起來”的一個“煽動分子”。該書並在結論時說，他的這種要“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介紹到工會運動中來的努力”，在各工會組織一了解到它的真實本質以後，就立即遭到了失敗。

這種分析，無疑問，曾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衛登麥爾通過他對於那些認為工會活動無足輕重的人（如威特靈輩）所不斷進行的反抗運動是幫助了“當時工會運動熱潮”的造成的。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衛登麥爾看清了加強工會運動的重要性，同時他也看到了當工會在經濟戰綫上作戰的時候忽略立法方面的要求是不妥當的。他更相信工會運動不應是技術工人的專有品，因提出無技術工人必須和有技術工人一樣組織起來的問題。誠然，他對於工人階級問題的見解並沒有得到五十年代期中許多行業工會的熱烈贊同；但美國工人實在還必須從經驗中去慢慢了解衛登麥爾所提出的綱領的正確性，這一點也是真實的。同時，就是因為衛登麥爾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才能適當地估計他那個時候的工會運動的各種缺點。早在五十年代時期他就能夠提出這些問題，這就說明他對於擺在美國工人階級面前的一些主要問題已確有真知灼見。今天，勞工運動在其過去十年的活動中已証實了衛登麥爾強調立法方面的要求和工會運動的要求必須結合起來，無技術的工人必須和有技術的工人一樣組織起來等問題是完全正確的，那麼，對於一個差不多在一世紀以前就已了解到這些問題的人，我們是完全應當予以適當的推崇的。

全國劳工組織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間，其他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企圖使全國的劳工运动完全联合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五六年間每年举行一次會議的工業大会。一八四八年以后，乔治·亨利·伊文斯的信徒們抓住了对这个組織的控制权，將它变成了便利他們進行土地改革計劃的宣傳機構。几年之內，差不多所有原和工業大会有关的各工会完全和它脫离了关系；在一八五三年的大会上，出席代表只有二十五个人，三年以后，代表数目更降到十一个了。不久以后，这一运动便加入了曾有無數組織参加的一种活动，这一活动以联合全國的工人階級为目的而开始，以变成为一小撮烏托邦主义改革派的專有品而告結束。

一八五〇年，在各工業中心都成立了市工業大会。最初，这些組織曾得到大批的工会的支持（如一八五〇年六月六日在紐約召开的第一次市工業大会，就有四十六个不同行業的劳工組織派代表出席了）。但是在这里，烏托邦主义者的影响很快就明顯地表露出來，不久，大多数城市中的工業大会就已完全处于这批土地改革者的控制之下了。其結果是，許多工会或拒絕再派遣代表出席，或是將自己的代表撤回去了。最后，这类組織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紐約市工業大会就为塔馬尼大廳的組織所吞并了^①。

虽然在五十年代中，沒有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包括各不同行業工会的全國劳工联合会組織起來，但只包括同一行業的各地方工会的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機構却有不少。市場的迅速擴張，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交通運輸業的日益發展，使得工人們認識到这一类組織的必要性，因为这些新的力量告訴他們，如果不从本國的

其他地區得到支持，他們要想在一個地區維持某種工資標準是決不可能的事了^②。

印刷工人首先開始建立了全國性的組織。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印刷工人雇工在紐約城舉行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吸引來參加這次會議的有紐約州其他地區、新澤西州、賓夕法尼亞州、馬里蘭州、及肯塔基州的代表。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設立起來，以便在大會休會期間進行本會的一切活動，並通過了一連串的決議案，以便送達各地方工會指導它們的工作。大會對全國各印刷工人工會發出號召，要它們一起來“調整或改變各種不同的工資價格的標準，以免彼此互相衝突”；發給所有的會員一種旅行執照；將“工賊”的名單送到各個工會去以防止不良分子加入其他工會作會員；籌募罷工福利基金；貸款支持在困難中的兄弟工會；以及限制學徒數目，並將學徒期限規定為五年。

一份致全體美國印刷工人雇工的通告，簡括地說明了全國工會的目的。通告在一開始便指出，“無組織的勞工在反對資本家的戰鬥中是完全處於無力狀態的”。通告繼續說，“……為了消除從這種權力不平衡的現象所產生出來的各種慘痛的災難”，工會運動是必不可少東西，同時只要目前這個工資制度還繼續存在一天，工會運動就一天也不能終止。事實證明，“一個包括全國範圍的廣泛的組織，將使我們自己，或任何其他行業保有一種不可能通過別的方法得到的權力”。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可以使我們有可能調整不同地區的工資標準，同時，給工人準備下自兼雇主與雇工的條件，而使工人得到最後的解救^③。

在這個通告的刺激下，好幾個地區的印刷工人工會都組織起來了。一八五一年一月九日，“特令教每日公報”報告說：“在去年

十二月二日于紐約城召开的印刷工人全國代表大會的推动下，一个印刷工人工会于上星期六在本城成立了。”一八五二年五月，新組織起來的全國印刷業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会时，有來自十二个城市的代表出席，代表着紐約城、阿尔巴尼、費列得尔菲亞、哈里斯堡、波士頓、里士滿、巴尔的摩、辛辛那提、以及特令敦等地的地方工会。四年后，在一八五六年的代表会上，則更有來自路易斯維、孟斐斯、新奥尔良、納斯維尔、布法罗和芝加哥等地的代表也参加了⁽¹⁴⁾。

印刷工人經常感覺到在他們進行全國性的組織工作时，他們是正給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人們，那些焦灼地等待着希望出現一种他們全能采用的确切的改革計劃的工人們⁽¹⁵⁾ 樹立下一个榜样。自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〇年这一时期中，大約有八个到十个重要的全國工会已組織起來*。虽然这个数目似乎很可观，但它們大多数所做的工作只是开开会，通过几項決議而已。全國印刷業工会，以及机工、鉄工和翻砂工人的全國工会实是突出的例外。在一八六〇年时，屬于全國機構的机工和鉄工地方工会有五十七个之多；而在同一年中翻砂工人地方工会加入全國組織的共有四十七个。

* 这些組織是家具業全國工会(一八五三年)；制帽業全國工会(一八五四年)；管子工人全國工会(一八五四年)；建築業全國工会(一八五四年)；美國全國自衛协会(鉄路机工)(一八五五年)；美國和加拿大石工工人协会(一八五五年)；石印工人全國工会(一八五六年)；雪茄制造工人全國工会(一八五六年)；电鍍工人全國代表会(一八五七年)；美國全國紡棉工人协会(一八五八年)；机工和鉄工全國工会(一八五九年)；油漆工人全國协会(一八五九年)；制鞋工人全國工会(一八五九年)。差不多所有这些工会全都是行業工会。不过，建築業全國工会却包括房屋油漆工人、石工、刷牆工人、木工、砌磚工人、管子工人及泥瓦工等。

一八六一年，“辛辛那提每日詢問報”曾指出全國鑄工工會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技工協會^⑤。在一八五七年的危機以前，翻砂工人的組織還完全是地方性的，但在一八五七年以後，由於機器的採用和工業的集中化與專門化的結果，這些工會中的領袖們就深感到要獲得較高的工資，必須通過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才有可能。當時占重要地位的費列得爾菲亞鑄工工會的行政秘書威廉·夕威斯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費列得爾菲亞地方工會的委員會寫信給所有的地方工會，說明組織一個全國工會的必要性，這個建議當被採納，信也立刻發出去了。各方面的反響都表示贊同，因立即發出號召決定於一八五九年七月五日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十二個地方工會派出的三十五個代表到達費列得爾菲亞來參加這第一次鑄工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中並沒有產生任何實際行動，只決定下一次會議於半年後舉行。這樣，一個組織鬆弛的全國聯合會終於出現了，雖然它只有建議的權力，但對於整個運動說，也總算是前進了一步。一年後，全國鑄鐵工人工會產生了，夕威斯任該會全國財務總管。主要由於夕威斯的努力，這個工會變成了其他許多勞工組織的模範。他竭力使得所有地方工會都成立各廠的職工委員會，並選定負責人，並於一八五九年寫了一篇極為動人的、後來并被放在該會會章中作為序言的通告，這個通告曾被很多工會幾乎原封不動地抄來作為自己的序言：

“團結就是力量，組織一個包括國內每一個鑄工的全國性的組織，也就是說形成一種建立在以我們所居住的全部土地為範圍的這樣一個廣泛的基礎上的團結，這裡乃是我們的全部希望所系。單槍匹馬，我們是什麼事也成不了的；但是聯合起來，我們就會感到沒有任何一種強大的惡勢力我們不能予

以公开反抗的。”^{②7}

夕威斯所提出的这种全國性組織的概念在这个时期还不能充分地見諸实行，因为一八五七年的危机和随此而來的一段不景气的年月將先一年所組織起來的各地方性的和全國性的工会，大都破坏無余了。僅只有三个全國工会——印刷工人会、制帽工人会和石工会——算是保存下來了。危机过后，工会运动的复兴又因为南北分裂和內战的爆發受到了嚴重的阻碍。

失業工人的示威运动

虽然一八五七年的危机破坏了工会組織，但它並沒有能够破坏工人階級的团结。在普遍失業的情况下，一切存在于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土著美國工人与外籍工人、男工与女工之間的分界线消失了。一八五七年十月，至少有二十万工人失業了，以千計的外籍工人都拥挤在各港口地区，乞求着想找一个机会在船上做点工作，以便回到欧洲去。一八五七年十月十六日的“紐約时报”說：“現在每条开赴利物浦的船都拥挤着載不完的旅客，更有無數的人，因为付不起船費，提出想在船上作点工作。”“費城北美人报”則說：“那些早已回到本國去的爱尔兰人真是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②8}

好些城市里的失業工人，不能閑坐着等待不景气时期过去，因而組織起來，强迫市政府解救他們的危难。費列得尔菲亞的失業工人运动在开始时只是由各区域的工人举行了一些集会。在这些分区的集会中的某一次会上，工人們說，“在現在承上帝的恩惠使得我們这片國土上正堆集着大量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時候”^{②9}，他們实在不能再听任自己的孩子們啼飢号寒，不能再安靜地忍耐下

去了。而自己單獨舉行會議的費列得爾菲亞的德國工人則宣稱說，他們決不能“不為了挽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們拿出自己的力量來作一番掙扎而竟這樣羞辱地死去”。德國工人乃開始組織一個協會以進行爭取失業救濟的鬥爭。這個協會並隨時準備着“與任何美國工人可能組織起來的其他協會採取一致行動”^⑩。雖然這種分區集會是各個分散的，但它們是向着“費城北美人報”所稱“第一個走向失業工人全國代表大會的真正表現”的方向前進着的^⑪。不久，一個由二十四人組成的委員會出現了，每一個委員代表着一個分區，這就是後來定名為中央工人委員會的最初的組織形式。在這個委員會中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土著的美國工人和外籍工人都派來了代表^⑫。

委員會前去拜訪市長，而市長却告訴他們說：“時間自會消除一切災難的。”他并向這個代表團斷言說，群眾集會是沒有什麼用的。你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信心。信心“像太陽所放出的光一樣，它的和煦的溫暖可以使得一切枝葉繁茂”^⑬。為了使市長所說的信心有其物質基礎，委員會要求市參議會和市議會發行四百萬元小額的市府支付証以作通貨使用。同時更敦促市議會發行五千萬元公債，以設立公立工廠。他們並在呈市議會的請願書中寫道：“在顯見的無盡的財富中，我們卻忍受着貧困，我們周圍的一切，無處不表露着我國的富有，但我們現在却不能滿足我們最低的生活上的必需。”^⑭

與此同時，在新澤西州的紐亞克，失業工人也正在進行組織。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六日，當地的報紙上出現了一則通知，號召全體失業工人到軍事廣場去開會。大會於十一月八日舉行，有好幾千工人參加了。演說的人一個接一個的肯定說，既然“飢餓的情況產

生在如此富饒的國土中”，他們就認為“任何人如甘願死于飢餓，那他是死有余辜的”。當時有一個人說這種思想是外來的，是不合乎美國精神的，聽眾中立刻發出無數的聲音喊着說：“如果我們真具有美國精神，我們就應該為面包進行戰鬥。”^{④⑤}

在這個大會休會以前，工人們決議說，他們並不要依靠任何人的施舍，而是要有機會工作。會上當即選出一個委員會，以便向市政當局交涉，要他們給失業工人找工作。德籍工人在他們的集會上也選出了一個類似的委員會，以便同其他的委員會一致行動。這個聯合委員會立即向市長和市議會申請救濟：

“這裡向你們請願的我們，雖然不認為在任何一般情況下可以向本市的市政當局要求代找工作，但現在却不得不冒昧提出，失業的貧苦工人必須從其他方面得到某種幫助，或者是給他們工作，或者給他們救濟。”^{④⑥}

費列得爾菲亞和紐亞克的失業運動和紐約的運動比起來，是相差得很遠的。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日，紐約報紙上出現了這樣一條通告：“茲特通知一切沒有職業的工人前來湯普金斯廣場參加集會。會議的目的是——為了使我們的家人免于飢餓，必須採取迅速的、堅強的和有決定性的行動。”^{④⑦}

有一萬二千名失業工人參加了這個集會。根據報紙上的一篇報道，這次會議的組成部分包括了“德國人、愛爾蘭人和美國人”。主要的演說是由一個失業木工約翰·保羅講的，他所講的下面的一段話，曾引起聽眾們熱烈的歡呼：

“究竟是什麼人給我們造成這種災難的？究竟是什麼人搶奪去了我們的面包？是那些壓迫勞工的人；是那些資本家們。這一群強盜土匪，他們逼着我們走到忍飢挨餓的境地。這

一群我們的政治上和社會生活中的敵人，他們要使我們的家人飢餓而死。如果我們不組織起來反抗這批土匪強盜，我們還能有什么辦法得到救濟？誰敢說我們不應該得到救濟？讓我們團結起來；讓每一個區域立即成立各地的組織；讓我們將一切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問題暫時擱置在一邊吧。”^{④8}

十一月五日在湯普金斯廣場上又舉行了一個有一萬五千人參加的群眾大會。當一個失業的制鞋工人鼓動聽眾們到商人的交易所去，“告訴他們說，我們必須要、一定要工作”的時候，一支遊行示威的隊伍便開始出動了。到達華爾街時，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在走過“股票交易所”的時候，都高聲呼喊著：“我們要工作。”^{④9}

儘管進行了這種有組織的爭取工作或請求救濟的努力，工作和救濟仍然兩者都落空，大批的工人在萬分無奈中，乃打進了面粉商的商店，任意拿走他們所能找到的東西去救濟他們的飢餓垂死的家人。美軍被派遣出來保護商店，防守海關和國庫分庫。有些商人誣蔑說：“領導這個失業運動的完全是一些極端赤化的暴亂分子……和其他一些外國人，他們所居住的土地和所依附的政府雖然改換了，但他們那種希望食物自己進口、工作自己到手的根性是完全沒有改變的。”^{⑤0}

費列得爾菲亞、紐亞克、紐約及其他各城市的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對於某種形式的、可給工人一些工作和減少一些工人痛苦的公立工廠的舉辦是有幫助的^{⑤1}。此外，這一類的群眾運動教育了工人們，使他們看到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之間必須要有更大的團結，並使他們看到了進行政治行動以選舉同情勞工的人參加政府工作的必要，以及組織全國工會以維持全國劃一的工資標準的必要。

工会运动的复活

有些工会并没有等到不景气时期结束，就已开始组织了争取较高工资的斗争，此外更有一些新的地方工会形成起来，证明即或在商业不景气时期中工会活动还是可能的。在费列得尔菲亚，印刷工人工会的罗伯特·布鲁司从一个集会走到另一个集会号召工人们起来组织工会。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努力的结果，技工和铁工在一八五七年的危机时期中还成立了新的工会，到一八五八年的夏天，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包括六个地方工会了，其中有三个在费列得尔菲亚，一个在勒定，一个在巴尔的摩，另一个在维尔民敦。

在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费列得尔菲亚的制鞋工人成立了他们的组织，通过了会章，并决议“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因危机发生厂主们所减去的工资”。到一八五八年四月，恢复联合十二个协会的宾夕法尼亚协会总会，已拟订计划“一俟足够数目的协会在各州成立时，即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代表机构”^②。

一八五九年二月，宾夕法尼亚协会总会发动了一次为恢复危机期中所减削的工资数目的全业总罢工。罢工于五月一日胜利结束，想利用种族偏见来分化工人的企图是完全归于失败了。“费列得尔菲亚纪录史”的一记者写道：“厂主们……极力用使德国人仇视爱尔兰人，以及使美国人也反对爱尔兰人的办法来分裂罢工工人。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却是彻底地失败了。”^③

一八五九年全年及一八六〇年的前数月，这种复苏的劳工运动组织了很多新的地方工会，建立了机工和铁工和翻砂工人的全国工会，并发动了一个争取将工资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准的罢工高潮。在这一时期中最突出的一次罢工运动是新英格兰的制鞋工人

們所進行的。三十年代期中，在費列得尔菲亞曾出現过一次全面總罷工，但一八六〇年制鞋工人的罷工運動差不多遍及新英格蘭各地，從緬因直到佛羅里達整個這一區域都為之震動。在內戰以前從沒有一次罷工有如此廣大的規模。

新英格蘭制鞋工人的罷工運動

五十年代的制鞋工人已不再是住在半農村的社會中，遇着冷季和不斷發生的不景氣時期，則依靠自己的菜園和自養的豬和牛以維持生活的那種藝匠了。各工業部門已開始採用了機器，這使得未成年的男女兒童也都可以做技術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生活費用日高，鞋工的工資卻不斷下降。工資一減再減，到了一八五九年秋季的又一次減薪後，工人一星期已只能掙到三塊錢了^④。女工的工資則更要低些，許多婦女一星期的工資只有一塊錢。“波士頓旅行者”曾報道說，有一個女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時，而一星期卻只能賺到一塊錢。該報記者繼續說道，“她有六個孩子要靠她養活，怕她只有把他們送到愛爾蘭或英格蘭去。”^⑤

罷工開始時，大多數新英格蘭城市中的制鞋工人是沒有組織的，但在林城，在這個鬥爭的中心，制鞋工人于一八五九年時已組織了一個技工協會；該協會的領導人便在罷工期中盡力幫助其他城市的工人們進行組織。愛隆卓·德萊泊、詹姆斯·狄隆和拿破侖·武德都是這次罷工中的領導人物。德萊泊那時還只有二十四歲，他一方面在鞋廠工作，一方面則利用業餘時間學習法律。在林城技工協會組成時，德萊泊當選為該會主席及協會報紙——“新英格蘭技工報”的編輯。詹姆斯·狄隆在罷工的時候是三十五歲，他生于英格蘭的柴郡，一八四五年來到美國。他在一八四六年秋季，

开始在林城的制鞋業中工作，技工协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副主席。拿破侖·武德那时是二十五歲，他出生于加拿大，自一八五一年起便在林城作工。一八五六年他参加了一个五十人的团体，离开林城到堪薩斯“去协助維護自由州的人民的权利”，但因病被迫回到麻薩諸塞州。武德是美以美教会的領袖，在整个罢工时期中他都極力宣傳，为了合理的生活水准進行斗争是与宗教信仰并不冲突的⁶⁶。

一八六〇年二月初，林城技工协会的領導人們在麻薩諸塞州的林城和拿蒂克召集群众集会，决定采取何种步驟以提高現在这种使他們僅得不死的工資水平。制鞋工人們决定对所有的厂主發一通知，告訴他們一种新的工資标准，并选出一个委员会，以便和雇主們商談。拿蒂克的制鞋工人于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三日所發出的一份通知曾宣告說，在請求提高工資时，工人們“心中之想到厂主的利益，正和想到我們自己的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利益一样的，因为人民大众的富足將必然增高不动產的价值，增加对于制造品的需要，并有助于社会在道德及智力方面的發展”⁶⁷。当厂主們拒絕与工人委员会商談时，他們乃选定了一八六〇年華盛頓生日的那一天开始罢工，因为：“这一天是我們应当怀念那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的神聖的日子，在今天來發动一次進攻以推進你們所从事的偉大事業，是完全合適的，同时，想一想他一生辛勤坚苦的歷史，每一个曾宣誓要以自己的榮譽來維護这与他自己及其家人生死相关的事業的人是應該感憤起來的。”⁶⁸

二月二十二日清早，有三千制鞋工人在林城的呂希額姆大廳集会，准备發动罢工。大廳內完全挤滿了人；記者們一致認為这是“新英格蘭所举行过的这类會議中的最大和最热烈的一次”。会上

指派了一个一百人的委员会以防止运送大批鞋子到别处去加工；另指派了一个一百人的委员会到本城各工厂去巡视，把任何甘作工贼还在继续工作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此外，更设立了一个警戒委员会“帮助维持秩序，制止暴力行为和酗酒事件，逮捕捣乱分子，并与市府的警察进行合作”^{*}。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保证必须服从警戒委员会的命令^⑤。

数百个拿蒂克的工人举行了集会，决定罢工，他们一面在街头游行，一面按着“扬基歌”的调子唱着：

飢餓向我們露出猙獰的面孔。

我們不能在這樣低的工資下工作。

這種工資簡直是一種殘毒的侮辱，

我們的孩子們一個個腹穿衣破。

(合唱)

起來吧，讓我們全體大罷工，

我們所得的工資必須要合理。

讓我們堅強地聯合起來，

把全國的工人團結在一起。

-
- 各地罢工工人都很注意防止自己的队伍中有人酗酒生事。例如在麻萨诸塞州的嘿味立尔，罢工工人通过决议要通知所有出售啤酒或其他麻醉性的饮料的商人停止交易，并授权主席指定一个委员会来防止一切暴乱行为。同时大家举手通过，任何人如经发现醉酒，他便不能再从罢工基金中得到任何津贴。（见一八六〇年三月十六日“嘿味立尔报”。）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三日，“纽柏里登每日先驱报”，在谈到罢工工人时宣称说：“在他们的队伍里从没有暴乱和酗酒的事件发生。”

木匠已經起來罷工了，

泥瓦工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我們要用全力支持下去，

要使我們的名字永被人推崇^⑩。

几天之內，全新英格蘭的制鞋工人都参加了“起來吧，讓我們全体大罢工”的合唱。林城和拿蒂克的罢工領袖們到麻薩諸塞州的紐柏里潑、嘿味立尔、馬波赫德及其他城市，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撒尔曼福尔斯、法明敦、罗徹斯特、多維尔及巴令敦，到緬因州的柏立克，到那里去号召制鞋工人們組織起來，举行罢工。到二月末，所有有制鞋工業的城市都全面罢工了。至少在二十五个城市中已組織了技工协会，共有將近兩万制鞋工人参加了罢工^⑪。

各報紙上出現了头号字的大标题：“北部的革命起來了”、“新英格蘭工人的暴动”、“制鞋工人的罢工——社会革命的先声”、“劳資斗争已开始了”^⑫。

也就是这些報紙更为加强了妇女們在这个罢工中所起的作用。它們的社論一篇接着一篇地大声喊叫着說，制鞋工人罢工运动的發生乃是女权运动所產生的邪惡影响的活生生的証明。那些罢工女工不是在大声疾呼，她們要爭取同工同酬嗎^⑬？再下一步就該是社会主义了！

罢工开始一兩天后，林城的綢鞋女工和女縫工都参加了罢工。在她們通过参加罢工的決議案的群众会上，一个办理女工登記的委员会成立起來。数天以后，委员会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会的人是如此之多，許多人都沒法挤進会场去。这次会上格林里夫太太（一个綢鞋工人）是主要的演說人。有一个記者寫道：“她認為她們的事業是一种神聖的事業，而且是和那些被迫自己拿出材料來

工作而又得不到任何報酬因而只得離開埃及的猶太長老們的事業完全一樣的。”⁶⁴

在其他地方，婦女們也都熱烈地加入了鬥爭，她們說，像革命時期的婦女一樣，她們要作戰到底。有很多曾眼看到罷工婦女們這種勇邁精神的記者，都深信這次罷工是不能不勝利的。“紐約先驅報”的一個通訊記者因也從麻薩諸塞州的馬波赫德寫出報道說：“女工們正準備參加罷工了——而馬波赫德的婦女們從來所打算要做的工作，她們是一定能夠勝利地完成的。”此外，他在談到關於林城的罷工女工時說：“她們對廠主進行攻擊的方式，使人想起了參加第一次法國大革命的那些和藹可親的婦女。”⁶⁵

如果曾經有人懷疑她們的勇敢精神，這種懷疑在三月八日偉大的婦女遊行運動以後也就完全消失了。這次遊行預定在早上十點開始。八點鐘的時候，卻來了一場極大的風雪，到十點時街上看樣子已不能通行了，但是婦女們却在狂轉的雪花中踏雪前進，手中高舉着她們的旗幟。有些旗幟上的標語已模糊不清了，但有勇氣出來參觀這次示威運動的人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婦女決不能做奴隸！”“我們的團結是堅強的，我們一定要成功！”“體力雖弱我們的勇氣是無限的，和我們的父親、丈夫和弟兄們肩並着肩，我們毫無懼怯地要為我們的權利進行戰鬥！”⁶⁶

十天以後，婦女們又在林城遊行示威了，但這一次却是在鮮明的太陽光下。從薩勒姆、馬波赫德、紐柏里潑及其他城市來的代表團都加入她們的隊伍。而同時，林城和馬波赫德的兩個步兵連和幾個鞋業城市中的救火隊也都把隊伍開出來了。那一天有一萬罷工工人出來遊行，整個隊伍差不多有兩哩多長，路旁排列着的觀眾也有幾千人，里面包括很多剛放學回家的學生們。所有的人都異

口同声的說，这是“新英格蘭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劳工示威运动”^①。

僱主們企圖借州議院將剝奪德國和愛爾蘭工人的選舉權來威嚇他們以破壞這次罷工。但在聽到這種恫嚇時，拿蒂克的德國工人立即舉行了一次會議并一致決議說：“對於喪失我們的政治權力的恐懼，以及我們的所謂主人們的恫嚇，都決不能阻止我們在戰鬥結束、勝利到來以前，嚴格遵守拿蒂克的罷工工人們所制訂的規約。”^②

為了滿足林城的僱主們的請求，州檢察長菲利浦斯於二月二十三日跑到這個鞋業城來了，他要原來對罷工工人還抱着友善態度的市長調出輕步兵，并向波士頓方面請求調一隊警察來。當工人們知道波士頓警察快要到達時，他們乃全集合在火車站附近，以譏嘲、噓聲和大聲的吼叫來歡迎他們。八千人一起怒吼道：“回家去吧”，“讓他們去生氣吧”，“這裡不需要你們”，“這裡不需要外來的警察”。這種因為波士頓警察侵入林城而引起的義憤，使得林城一些有法治頭腦的公民們也都激動起來。因而竟有很多商人捐出大量的錢來充實罷工基金，另外更有一些人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表示要堅決支持這個運動”^③。

而以最大的決心來支持他們的乃是一些傳教士。查理·薛克福特牧師是第二公理教會（唯一神教會）的牧師，他對前來聽他講道的廠主們說，他認為他們是不對的，他們早應該接受罷工工人們的要求。史垂恩神甫勸導“每一個天主教的鞋工，在一般美國人都站起來要求提高工資的時候，決不要動一下鞋錐；同時，如有任何一個美國人不夠堅強，就要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去影響他，使他忠誠於罷工的目標”。著名的黑人傳教士德賴弗爾牧師更一再為罷工

工人提出辯護。他很驕傲地說：“如果我对他們了解正確的話，我可以說我是完全同他們站在一起的。”他更对他的會眾說：“你們，我的黑人弟兄們，應該知道如何去同情那些得不到報酬的勞動者。可憐的雇工真像是被眾鳥所啄擊的一只鳥啊。他的命運乃是和那在壓榨機下被擠汁水的蘋果渣一樣的。”^⑩

在罷工的第二個星期還沒過去以前，許多雇主們都已準備要照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資，但是他們却拒絕承認在罷工期中組織起來的工會，同時也不肯和工會的代辦們簽訂成文的協議。制鞋工人的回答則是，在雇主簽訂協議以前，罷工必定要繼續下去。有些雇主終於在協議上簽了字，如在林城，當三十個廠主已在協議上簽字，願將工資提高百分之十以上時，即有將近一千工人於四月十日復工了。雇主們願意增加工資而不肯承認工會的態度造成了這個運動的分裂，許多工人沒等到簽訂明文的協議便回去復工了。而有些工人多堅持了一兩個禮拜，但也終於沒有簽訂協議就復工了。不過，在宣告罷工結束以前，他們發表一篇聲明說，他們要使他們的勞動得到合理的報酬的這個主要目標業已達到，因此他們現在回廠復工了。他們並在該聲明的結論中說，在罷工期間他們已“組成了一種為了保護我們的利益的永久性的協會”，他們將要繼續鬥爭，直到他們的組織得到承認時為止^⑪。

這樣，大多數的罷工工人都在增加工資的條件下復工了，只有很少幾個工會簽訂了協議。而另一方面，由於大多數的雇主不肯簽訂協議或不肯承認工會，在許多過去沒有組織過工會的城市中，現在也都有了工會組織了。正如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嘿味立爾報”所說，這次鬥爭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一種技工協會將從這個運動中生長出來，而這種協會無疑將要在保護勞工

权利方面做很多工作的。”

劳工和政治

在一八五七年的危机时期和一八六〇年的鞋工罢工时期中，經常有人提到劳工运动完全忽略了对政治的密切注意。在每一次失業工人所举行的集会上，几乎总有人站起来批評工会，說它对政治太不关心，并說政府当局所以拒絕適当地救济工人，乃是工人自己“选出了那些对他們不利的政党”的結果。因为工人們在投票时沒有發揮他們自己的作用，因此“沒有一个政党肯站在劳工一边，而全部都去制定符合資本家利益的法律了”⁽²²⁾。

在鞋工罢工期中，原籍麻薩諸塞州袁多尔夫的一个制鞋工人基底翁·霍華德，也發表过类似的見解，他曾提醒过工人們說：“麻薩諸塞州的制鞋工人雇工为数儿达五万人，如果他們能集中他們的政治力量，他們差不多將能够完成任何他們所想要做的事情。他們自然可以制訂保护劳工利益的法律。”另有一些作演講的人則說，各工会組織現在應該开始想到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工作是同等重要了，因为經驗已經証明，經濟斗争所得到的收穫是能够被直接違反工人階級利益的法律完全否定掉的⁽²³⁾。

这种批評是完全正确的。五十年代的劳工运动在經濟战綫上有了許多進展，如工資的增加，集体交涉所產生的協議，关門制度的建立，以及对于学徒的規章的决定等。但在政治战綫上，工会的成就則差得多了。在整个五十年代期中，就沒有一个略可和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期中所成立的工人政党相比的工人政党出現。

然而，这里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例外。一八五〇年七月，旧金山的畜牧工人們在一起会商要成立一个协会，其目的之一是要：“提

出一个候选人來以便在市議會占據一个席次，那末我們就至少可以有一个代表，他將尽力來保护本市的劳动人民。”會議召开了，畜牧工人协会成立了，他們提出了詹姆斯·格蘭特为市議會的劳工候选人。格蘭特本是美國民主党所提出的人，因而以極大的多数獲得选举的勝利^⑭。

六年后，紐約城中一些工会主义者所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向全州的工人發出号召，要他們合力击败美國党（反外籍美國人）所提的州長候选人伊銳士特斯·布魯克斯。号召說，布魯克斯因“其一貫地仇視劳工利益和劳工組織，已为工人們所深惡痛絕”，現在有必要教育一下和他同类的那一班政客，讓他們知道“在这个自由的國土上，那些最富有和最有野心的國人的政治生命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的”^⑮。但在布魯克斯徹底被击败以后，工会主义者們却忘記了以同样的課程去教育其他一些恣意胡為的政客們。

新澤西州特令敦的工会运动者肯定地認為，僅在选举运动开始前的最后几分鐘發出几份通告是决不够的，因而在一八五八年九月他們举行了一次會議，并通过了一項包含各項重大原則的綱領，这些原則“直到工人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完全实现以前”，他們必將坚决地支持^⑯。一个月以后，特令敦工人联合会組織起來了。主持該联合会的乃是当地一些居于領導地位的工会，它的目的是要在政治問題上代表劳动階級講話。工人階級生產着“文明社会的全部財富和給人类帶來幸福的一切”，但是他們“从未和那些自己不劳动而且要消費別人的劳动果实的人們享受过同等的社会的及政治上的权利”。

这个組織的目标，可以分为兩类：一是有关全國的，一是关于本州內的。有关全國的最主要的要求是，政府应从投机商的手中

收回原屬於政府所有的土地，然后照原价定量的賣給那些真正自己經營垦殖的移民。各鐵路公司及各壟斷企業強占着全國的公地，它們“剝奪了人民公共的遺產，并且將千百万劳动人民为要逃脫压迫者魔掌所唯一能利用的一种安全的避难所的门給堵死了”。关于本州內的問題，工人联合会的要求是，所有政府从各特許公司獲得的稅收，“因它是政府出賣特权的代价，是屬於全体人民的”，應該撥作办理本州的公立学校之用，同时，“因教育为自由人民的一項最重要的需要，这种公立学校必須大量擴充，直到人民要取得知識能像我們要呼吸空气一样的自由”。关于立法方面，則要求給技工和普通劳动者以永久的和充分的对于雇主們的財產的留置权，以使工人更容易獲得他們应得的工資，而“不致遭受到工資一再扣押和千悬万求之苦”。此外更要求州法院進行徹底的改革，使得法院所应維護的正义不致叫劳动人民花費过多，最后則要求更大数目的政府官員应由人民选举^①。

在拟定了他們自己的綱領以后，特令敦的工人們就組織起來進行政治行动。他們派定了一个委员会去詢問所有参加競选的候选人的意見，以“确定我們还是不得不单独提出自己的名單呢，还是讓一个或兩個現存的政党來支持我們的綱領”^②。所有經過詢問的候选人都回答說，他們極願支持工人联合会的綱領；其中有一个候选人詹姆斯·瓦尔則更肯定說，他已認識到在这个綱領中所反复申說的一些原則，实在就是“拥护特权階級及拥护吸人血的壟斷企業的人們和那些从組織政府的基本原則出發而經常反对他們的人們之間所不斷進行着的这一斗争”所包括的原則。“特令敦真正美國人報”对这种主張發出热烈欢呼，它并补充說，工人联合会所發起的运动正可与杰克遜时代所組成的那些工人政党媲美，那时

它們終於達到建立公共學校制度，廢除因負債而判徒刑的法令，取消對於擔任政府職務的人的財產限制，及實現其他民主改革等的目的^②。

所有候選人都願同意工人聯合會綱領的這一情況，竟反而阻止了工人成立獨立政治組織的運動。在十月二十六日的一次會上，要求單獨提出勞工候選人的提案，以三十三票對十八票被否決了。就在這次會上，工會決定在其綱領中更加上一項要求，即要求州議院修改關於圖謀不軌罪行的法令，“使工人們可以正當地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而不致遭到他人任意的控告”。後來又添上了一些其他的要求，如廢除以公司購物証抵付工資的制度，除司法官以外一切政府官員必須由人民直接選舉，以及要求直接選舉美國參院議員等。這最後的一項要求乃是企圖實現這方面的改革的最早的努力之一^③。

工人聯合會並沒有能夠使這些改革得到法律上的承認。但那時一切推進民主運動的活動也都因為愈來愈猖狂的奴隸政權的侵襲受到了阻撓。烏托邦主義者的合作社會的實驗，工會所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十小時工作日的運動，擴大選舉權由人民選舉一切官員的運動，土地改革，爭取婦女權利，以及這一時期的一切其他的改革運動，都被日益增強的反奴隸制運動的高潮所吞沒了。五十年代時期的一個積極的工會運動者在數年後曾寫道：“美國的勞動人民，那時實已準備着要和那些業已篡奪了華盛頓政府的棉業大王們進行一次最殘毒的鬥爭。”^④

第十三章

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部的劳工运动

在内战前的一时期中，工会运动几乎是从没有超越过梅遜—狄克遜綫*的，虽然在南北战争以前的南方也有一些工会組織起來并也举行过一些胜利的罢工。内战前新奥尔良共有四个劳工組織存在：技工社、印刷業工人社、棉花裝卸工人福利协会**和联合劳工福利社。其中有兩個組織是互助性質的会社，但棉花裝卸工人协会和印刷業工人社則是战斗性的工会組織。一八五四年，棉花裝卸工人工会，那时已有會員三百二十四人，由于一次胜利的罢工运动的結束，將每日工資从兩元五角提高到了三元。同年新奥尔良印刷業工人社，因联合通訊社利用不景气現象的存在將工資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也進行了一次胜利的斗争。当联合通訊社企圖从紐約运來工人以破坏罢工的时候，“新奥尔良每日瑣聞”乃立即停止發表联合社的电訊。該报宣称說：“我們認為劳动者所得报酬实为其名份所应得，因此我們謹在此公开宣布我們將与任何意圖剝夺劳动者所应得的合理报酬之通訊社断絕一切关系。”^① 联合社內部的分裂和印刷工人的团结，終于迫使雇主們投降了。一

• 梅遜—狄克遜綫原指宾夕法尼亞州与馬里蘭州間的分界綫。此綫介于蓄奴州与無奴隸州之間，故为南北分界綫。因其在一七六三年至一七六七年时为英國兩個天文学家查理·梅遜及節銳米亞·狄克遜所跑过而得名。——譯者

** 此处裝卸工系指將棉花包裝卸于船艙中之劳动者。

八五五年五月七日“新奧爾良商業公報”竟宣布說：

“無疑的，誰都知道聯合通訊社業已被迫向印刷業工人會投降了。我們豎起降旗，并非自甘屈辱，而實出于情況之必要。我們被多數人所壓倒，較弱的一方屈服于較強的一方，是沒有什麼可耻的……。過去存在于我們的排字工人與我們自己之間的一切，現都已調停解決，一種友善的團結也完全建立起來了。”^②

這些工會運動方面的成就，並不能否定南部工人對於早期美國工會運動的發展實無多大貢獻的事實。在一八六〇年時存在着的三百五十萬奴隸，既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也不能進行集體交涉以提高工資，減少工時，及爭取較好的工作條件。同時，當自由的白色工人要想發動組織的時候，他們隨時都碰到奴隸政權的無情的反抗。

奴隸的生活狀況

在南北戰爭以前的南部，組織奴隸勞工進行工作的方式一般有計工制和分隊制兩種*。計工制是用在種植稻子和煙草的農地上，即是將每人每天須完成的定量工作，按照工人的體力，分成“四分之一工”、“半工”、或“四分之三工”數種。在理論上，每一個奴隸一天所必須完成的工作是不算重的，但事實上，當奴隸們做完了地

-
- * 種植園中開溝，開渠，墾荒以及砍伐森林等勞動通常都是由愛爾蘭勞工們擔任，因為黑人的生命是太寶貴了，不能讓他們做這類冒險的工作。在輪船上裝卸棉花包的碼頭工人也主要都是愛爾蘭工人。有一位船長曾回答一位喜歡探聽閑事的旅客說：“黑人價錢太大，不能讓他們在這兒冒險。”“如果這些愛爾蘭人翻下水淹死了或背骨壓斷了，誰也不會受到任何損失。”（見烏爾利其·菲利浦斯：“美國黑奴制度”，一九一八年紐約版，第三〇二頁。）

里的工作时，他们总会被派去做其他的事情的。安伯雷中尉曾参观过一个采用计工制的烟草种植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他曾在他的日记中作了一些叙述：

“他们（奴隶们）在天刚一亮的时候便被叫起来，并……立即被驱赶到地里去，在那里他们毫无间歇地从事着劳苦的工作，直到正午吃饭的时候，而吃饭的时间也很少允许超过一小时的……。饭后，他们又回到地里操作，直到晚上天黑为止；这时，人们总以为这些可怜人的一天的劳动应该算完了吧，完全不然，他们还要到烟草间去，那里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烟草要剔叶整理，这项工作必须几个小时才能做完；再不然，他们必须剥多少玉米的皮，而他们如果对于这些工作略有疏忽，第二天一清早就要被捆绑起来，挨一顿皮鞭……。”③

棉花生产区是采用分队的。奴隶们在总监工的经常监督下进行工作，总监工则更用一批执鞭的小工头来决定工作速度。从日出到日落，奴隶们都一直在棉田上工作着，一星期整整工作六天。

密士西比的一个居民曾写道：“这些工人们通常是在天刚一见亮，或者还更早一些，便被一只大钟或是号角唤醒，那末，在天光刚可以让人看清棉花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下地开始工作了……。他们身上带着吃的，在田里一直工作到天黑得看不清什么是棉花的时候为止。”④

无论何处只要有了二十个奴隶，一般就要雇用个监工。只要棉花生产得多，监工打死了多少奴隶，种植园主是从不过问的。监工的工资普通是从两百元到六百元，而一个真正自己拿鞭子的监工有时可以拿到一千元。他可能把地给毁了，把奴隶们不分老少也都给累垮了——但只要他能拿到手多少包的棉花，一切都算

不了什麼。為湊齊必需的包數的棉花，他就不停地使用他的皮鞭。旅行家弗萊得立克·歐姆斯台德曾有一次對一個監工說：“像你這樣殘毒地鞭打他們，你自己心里也一定覺得很不好過吧？”“啊，是的，對於那些不慣于此道的人們一定是那樣的，但這是我的職業，完全不覺得什麼。啊，先生，在我，打死一個黑奴是和打死一條狗差不多的。”^{⑤*}

奴隸主的賬簿對於一般生活水準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一七九五年南卡羅來納州一個種植園主曾估計“……一個黑奴的費用，包括捐稅、伙食、衣服和醫藥費在內……一年是十二元到十三元”。三十年以後，湯姆斯·皮克里將軍寫道：“在南卡羅來納州的下郡，種植園奴隸的每年平均費用，據幾個種植園經理人和管理人連續四個年度的賬簿上所記的材料，是每人三十五元。”但是這個數目，除了食物衣着外，還包括捐稅、監工工資、醫藥費、以及“犁耙、工具、釘子、鎖、鉸鏈、釣魚鈎、烟斗、食鹽等等”在內。美國農業部的一位統計學家詹姆斯·華特金斯曾估計，一八二二年時工作在棉田上的成年奴隸的一年費用，包括醫藥費、伙食和衣服費用共為二十三元一角。

一八四五年，路易斯安納州四十八個糖作物種植場在給財政部長的報告中曾說，供給他們的重要的地里工人的糧食、醫療和

-
- 一八五四年一月，查里士頓的英國領事在私人函件中寫道：“蓄奴制度這種使人驚駭的罪惡情況，必須詳為揭露……。我的近鄰是一個頭等的律師，同時也是‘南部貴族’中的一員，他親自告訴我，他曾鞭打過他所有的每一個黑奴，不管男的還是女的，只要他們敢有一點調皮……。他們真是認為打死一個黑奴和殺死一只狗是完全一樣的。”（洛那·懷特：“英國領事眼中的一八五〇年時的南方”，載於“南方歷史報”第一卷，一九三五年二月號，第三三頁。）

衣服的费用是每年三十三元，其他奴隶则为每年十八元。九年以后，德葆在其所著“南方富源”一书中公布了一张表，说明“……根据他十五年的经验所知”，养活一个奴隶的费用，每年是七元五角，或约二分钱一天^⑥。真难怪弗莱德立克·欧姆斯台德在一八五六年去南部旅行了一趟之后写道：“事实上，就在最幸运的情况下，大种植园中的奴隶们所受到的待遇，无论在质上或在量上，都比不上我们的感化院中的罪人所受到的待遇。”^⑦

反抗斗争

毫無疑問，有些黑人对于自己遭受压迫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认了；很多家用奴隶则更是不像他们那些弟兄姐妹那样对于奴隶制度抱着不可调和的仇恨。但两百年來，大多数的奴隶却已利用了一切可能想到的手段，进行了争取自由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始终也没有以工会斗争的形式出现，但是在整个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很少几页是比黑奴为反抗奴隶锁链而进行的战斗的历史更为重要的，任何一本讲述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也决不能忽略掉这一部分史料。

这种斗争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个人的反抗行为和集体行动。关于第一种形式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可以在路易斯安纳州的一个监工写给他住在外地的主人的一封信中看出，他写道：

“说到对付薩麥尔的困难方面，是起因于我轻打了他的老婆几下，因她作事作的太慢了，后来等我回到田地上去的时候，发现薩麥尔抛下他的活兒有二十到三十碼之远，手里拿着他的甘蔗刀，气势汹汹，说他对此事忍无可忍，又说我是一个不讲理的人，说我可以回去拿我的枪，杀死他，把他埋掉，但是

他說如果再對於他自己或他的家人有任何打罵的事他就決不答應……。”^⑧

有些奴隸不但不甘忍受殘毒的懲罰，且在殺死他們的主人或監工之後自殺掉。在南部某些地方，作為一種反抗形式的奴隸自殺事件是如此普遍，以致一切向種植園主建議應如何對待奴隸的文件經常要化相當多的篇幅來討論這個問題。有一篇文件敘述說，奴隸們常常“用縮緊舌頭以堵塞氣管的方法將自己悶死，此外更有服毒死的，或逃跑出去甘願死於飢餓困苦中的”^⑨。還有一些其他的文件則警告種植園須防止奴隸特意殺害自己的子女以免其成年後背負奴隸枷鎖的傾向。曾有一次，父親和母親彼此同意“將他們的孩子們的靈魂趁早送上天堂，以免使他們沉淪於奴隸制度的地獄”。在殺掉孩子們後，父母兩人也自殺了。另有一個奴隸母親親手將自己的十三個孩子全部殺掉，“僅只為了使他們免于遭受作奴隸的痛苦”^⑩。

別的奴隸則採取了集體行動這種更有效的方法，他們一致停止工作以抗議鞭打或他種殘酷無人性的懲罰。喬治亞州有一個監工曾在寫給他的外住的種植園主的信中，談到過關於這種集體停工的實際情況：

“先生，我倉促地寫這封信給您，向您報告，您的六個奴隸都不辭而去了——除了喬克全都走了。我不滿意他們的工作，於是稍稍鞭打了他們几下，打了湯姆和另外幾個人。於是星期三早上他們就都不見了。我想他們是躲藏起來要等着見您或您的叔父傑克。”^⑪

通常，停止工作的奴隸都跑到附近的沼澤地區和森林中去，然後送信回來說除非能得到給他們公正待遇的保證，他們決不願回

來。有一个已得到自由的奴隸約翰·霍尔姆斯，曾講述过他自己如何因監工威嚇着要鞭打他，乃逃出藏于沼澤地帶中，直到他得到決不再受到鞭打的保證才回來工作的經歷。他寫道：“最后，他們对所有的鄰人說，如果我回家，他們決不鞭打我。我在工作上是一把好手，我替他們掙了許多的錢。”^⑫ 北卡罗來納州有一种植園主，因他的奴隸逃亡到沼澤地区去并坚决要得到他不再鞭打他們的允諾才肯回來，乃向他們提出保證說：“如果这些人中有任何个人或全体一起能適时回到我的种植園來繼續恢復工作，我保證對他們完全寬恕。”^⑬

更有成千上万的奴隸逃亡出去就从此沒有再回來，他們大多數都逃跑到了北部*。逃亡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毅力的，因为逃走的奴隸必須在黑夜跋涉数百里的敌視地区，深藏在沼澤和森林中，再一步一步地逐漸向自由走去。著名的奴隸取消主义者西奥多·魏尔德在談到一八三八年逃到紐約的一个奴隸時寫道：“他从阿拉巴馬的边区步行了一千二百哩長的路程來到这里，行动全在夜間，而賴以充飢的則只有樹根和野莓。他从阿拉巴馬的达斯加盧薩到宾夕法尼亞，沿途所經的每一·条·河·流，他都是泅水過來的。”^⑭

南方報紙上所登載的一則典型的廣告，說明了一个逃亡的奴隸曾面臨着何種危險：“五十元懸賞。一八一七年一月十二日，一黑人从本居处北卡罗來納州富蘭克林郡逃走，該黑人名袁多尔，年約二十六、七歲……。在其臀部、腿部、頸子和臉頰等处可能有槍

* 据希塞丁教授說，“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六〇年間，每年有兩千左右的奴隸，穿行地下鐵道，走到自由的土地上來。”（見“南方史”，一九三六年紐約版，第二五八頁。）

伤痕跡，因他曾遭到數次射擊。”^⑮

要知道關於逃亡奴隸的歷史的全貌，我們還必須要談到保護地下鐵道的白人和黑人之間的英勇的團結。這種地下鐵道的路綫是無數支綫所組成的一個鐵道網，北起北卡羅來納的高原地帶、田納西州、弗吉尼亞州及肯塔基州，直到加拿大。據西伯特估計，僅是通過俄亥俄一州的路綫就有十二條之多，而一八四〇年時，自威士康辛和伊利諾以東的每一北部的州境內，都經常有一些奴隸穿行過去，向加拿大前進，或者走向美國某些對他們比較安全的、不致於遇到種植園主手下的惡棍或代理人的地區去^⑯。大多數的奴隸都認為不到加拿大，他們是始終不安全的，下面一首歌更可以證明這一點：

加拿大是我要去的目的地，
儘管它是一個冷酷慘淡的地區；
為人作奴隸的悲痛的情況，
我已不可能再忍受下去^⑰。

有很多從前原是奴隸的工人都來到地下鐵道上做工，擔任售票員或車務員職務，他們中有一個極著名的人，那就是哈利特·塔布曼。她在自己已逃出了奴隸鎖鏈以後，決心要回到南部去，拯救出她年高的父母、弟兄、姊妹、朋友以及任何願意跟着她走向自由的奴隸。哈利特·塔布曼在她一到達北部時即說：“但是我自由了，他們也應該自由，我要在北方安置一個家，并把他們都接到這裡來。”

她雇了一個北方人替她寫信給馬里蘭州的一位能讀能寫的自由黑人，這個黑人是極願意幫助奴隸們逃跑的。信中有引述聖經辭句作為暗語的一段話。這段話是這樣的：“請將我的信念給我的

老父老母听，并請告訴我的兄弟們經常注意不要忘了祈禱，一俟古老的天國之船來到时，准备立即上船。”

当她知道她的父親因帮助一个奴隸逃跑自己陷于困难中时，哈利特立即筹了一筆錢，回到南部去。她看到她的父親在下一个礼拜要受審判了，于是，照她自己的說法，她“將他的審判移到更高的法院中去了”，她的父母被她帶到了加拿大。

哈利特·塔布曼一共曾有十九次回到南部去，她親手救出的奴隸約三百人，同时还鼓励了其他数千奴隸自己逃出來。到一八五六年时，懸賞捉拿她的金額为二万五千元。奴隸取消派运动中的一个新英格蘭領袖湯姆斯·希金生称她为“她那个时代的最大的女英雄”，而黑奴們認為她是“他們的同胞中的摩西”^⑭。

很多从种植園逃出的奴隸并未到北方去，而竟在南方的沼澤地帶、山区或森林中躲藏起來了。他們在那里聚集一起定居下來，并慢慢以那个地方为根据地向附近的种植園發動進攻。一八二三年五月十二日，“諾福克先驅報”曾报道說，弗吉尼亞州諾福克郡南部地区之居民，“……曾有一个时期經常处于極度不安和苦痛的狀態中，原因是該处居民皆明白感到彼等生命誠無时不受到一群殺人兇犯的威脅，此等殺人犯之殘毒意圖，竟置法律之尊嚴、及时之警戒与夫个人之勇猛于無用之地。此輩亡命之奴实即俗称为化外野人之逃亡黑人也……。”^⑮ 这些化外野人常常就是奴隸暴动中的領袖人物。

在南部的社会生活中，奴隸暴动并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或完全無計劃的行動。根据極不完全的歷史材料，在美國黑人奴隸制度存在的那个时期中，包括十个或十个以上奴隸的暴动事件，至少有二百五十次是見之于官方报告中的。南部社会組織的形式，便是

以武力鎮壓黑奴的必要性為基礎的。每一個種植園都有它私有的軍火庫，幾個種植園聯合起來有一支私人的巡邏部隊，夜間在通道上巡察。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羅伯特·海因曾說道：“永遠在軍事準備的狀態中，對於我們也就是永遠在社會安全的狀態中。長時期的和平及因而產生的麻痺現象，就會使我們要遭受到發生內部暴動的危險。”^②

有一種南方報紙承認說，奴隸主們是永遠都不能感到安全的。它說，“我們在南方的人，是……永遠被一群危險分子所緊密地包圍着的……。如果他們相信暴動並不會立刻給他們帶來死亡的話，他們會要重演聖多明各*的把戲的。”^③但是許多奴隸雖然知道可能“暴動會帶給”他們死亡，他們仍然要起來反抗。奈特·透納，偉大的黑人領袖，在談到一個前來參加他的暴動運動的奴隸時說：“走近他們時，我向他們敬了一個禮，馬上我問魏爾為什麼也到這兒來了，他回答說，他的生命並不比別人的寶貴些，而他卻同別人一樣熱愛自由。我問他決心要獲得自由嗎？他說他決心要，不然寧願犧牲他的生命。”

一八〇〇年，弗吉尼亞州有一個因加布利爾暴動案被逮捕的奴隸，在審訊他的法庭上也表現了同樣的精神：

“我現在所能說的只是，如果喬治·華盛頓被英國的官員們捉住了，並對他審訊時他所可能說的話。我冒着生命的危險希望使我的同胞們得到自由；我現在也願意為了他們的事業將自己作犧牲，因此我請求你們算是給我一個恩惠，將我立

* 指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和十九世紀初期，在杜聖·魯菲却爾的領導下，在聖多明各發生的多次奴隸暴動事件。結果並有一個黑人共和國在海地建立起來。

即处死。我知道你们早打定主意要杀害我，又何必来这一套审讯的把戏呢？”^②

许多奴隶暴动的领袖都是黑人技工和工匠，因此，毫不奇怪，奴隶主们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竟提出下列的一套计划作为更有效地控制奴隶的手段：“最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地使奴隶从事于农业劳动。现已证明凡从事农业劳动的都是最守秩序和最驯服的奴隶……。不允许有任何黑人技工或黑人工匠存在，至少在城市中应该如此。”^③

在内战以前的罢工运动很少有能像某些奴隶暴动组织得那样好的*。一八二二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生的丹麥·維西暴动事件，其组织之严密，使得奴隶主们亦承认它在机密性、纪律性和范围的广大方面来说，已都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維西是一个自由黑人，他决意要帮助他的同胞。他拒绝听从奴隶主所说自由黑人应回到非洲去的劝告。他要留下来，“看看自己能为同胞弟兄们尽多少力量”。

維西开始组织奴隶们进行暴动，他对他们高声诵读“圣经中以色列的子孙如何逃出了埃及的奴隶锁链的故事”。有一篇当时所作的记载告诉我们：“就在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走过街头的时候，他还是在进行工作的；因为，如果他的同伴对白人鞠了一个躬，他就

-
- 现在可以找到证明，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确有一个范围极广大的奴隶秘密组织在南卡罗来纳州存在着，其主要目的是争取自由。据曾经拜访过那个地区的吉尔摩尔说：“……那里的黑人有一种秘密的、范围很广的互助社性质的组织，他们有握手的暗号，有特别口令，并有固定的宣誓辞。领导人有不同的等级，都是有能力和忠诚的人，而该组织的最后目标是自由”（伊德孟·柯尔克（吉尔摩尔）：“在松林中”，一八六二年纽约版，第二〇、二五、五九、八九、九〇——九一、三〇一頁。）

要責備他，並對他說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說他簡直奇怪，為什麼會有人以這種行為來自尋侮辱，並且說他自己從不要對白人討好，任何一個拿自己當人看的人也都不應該那樣。”

暴動于一八二二年七月在查里士頓爆發，但在六個月以前，維西和他的伙伴們已在以該城為中心的五十哩方圓的地區內，聚集了將近九千名奴隸與自由黑人。每一個奴隸都擔任了一項任務。有一個是專管製造兵器的，他做了差不多二百五十個矛頭。另一個奴隸則給這些矛頭裝上把柄。還有其他的人則對一切藏有武器的店家進行偵察。所有飼養馬匹或有機會使用馬匹的奴隸，都得到通知屆時把馬牽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不管他們如何機密，奸細分子仍混入了他們的組織。一個名叫彼得·坡牙士的奴隸木工，曾警告決心參與暴動的人們說：“注意千萬不要和那些接受他們的主人的舊衣物等的傭人們談到我們的事，稍一不小心他們就會出賣我們的。”正當那些暴動者們定下最後計劃，將如何把人散布在查里士頓各處，如何占領軍火庫以及如何使每一個奴隸恢復自由的時候，有一家的僕人發現了他們的密謀，向有關當局報告了。此外，出賣他們的人還有一些是特來作奸細的奴隸。結果，一百三十個黑人被逮捕，其中有三十五人被處死刑。其他的人則被放逐或運往別州去了。

奴隸主始終沒有知道到底有多少奴隸參加了這次暴動的計劃工作。彼得·坡牙士和另一個奴隸被用鐵鏈鎖在牢房的地板上，加以各種殘酷的刑罰，以逼使他們講出其他同謀者的姓名。最後坡牙士的同伴，因不堪於痛苦的折磨更想苟全性命，竟開始表示願意屈服了。“彼得依着自己的手臂強撐起自己的身子，兩眼望着那個可憐的人，靜靜地說道：‘要死得有志氣一點’，說完便立刻又躺

下了。但这句话已经足够了；此后他始终没有再吐出一个字来。”后来，更有很多其他的奴隶们都等着处以死刑时，彼得·坡牙士对他们说：“永远也不要动一动你们的嘴唇；看看我死去时的样子，沉默地死去吧。”所有的人都听从了他的意思^②。

内战以前最大的奴隶暴动是一八三一年在弗吉尼亚州扫桑波敦郡发生的奈特·透纳暴动。奈特·透纳于一八〇〇年生于弗吉尼亚州，一出生便带着奴隶身分；自幼虔信宗教，自己相信曾得到上帝的启示，要他解放他的同胞。一八三一年初他便开始计划进行一次总暴动，打算先在扫桑波敦郡发动，然后向整个南部推广。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晚上，暴动在离里士满七十哩的地方发生了。奴隶们以阔斧和镰刀武装着自己战斗着前进，沿途各种植园的奴隶们也都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短期内，他们还很为得势，可是州军和联邦军队的联合力量实是远非他们所能抵御的。透纳逃躲了六个礼拜，最后却终于被逮捕审讯，并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被处死刑。其他受到审讯的黑人，有十七人被处死，十二人被流放。在这次起义中间，有五十七个白人和七十三个黑人死难。

透纳暴动以后，奴隶主们经常怀着对暴动的恐惧，心神不安。曾有一个当时的人说，“由于这个问题，他们是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夜晚偶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惊惶失色。他们叫着说：‘什么事？’‘孩子们全在家吗？’”被人怀疑有计划暴动嫌疑的黑人会遭到暗杀，任何人如被判断曾在黑奴中煽动“暴动、阴谋叛乱或反抗的精神”，就将被判以死刑。立法机构更加强制裁帮助奴隶逃亡的人们的法令，极力限制奴隶的解放，进一步控制自由黑人的活动，并禁止任何人教奴隶读书和写字。乔治亚州曾有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任何人教一个奴隶读书识字，这个奴隶就将要受到罚金和

鞭笞的處分；而那個犯法的教員也要受到五百元以內的罰款和監禁處分。該法令並規定：“如有一自由黑人教導另一黑人，則由法院自行決定罰款和鞭笞的數目。如有自由黑人敢於在其同伴中宣傳鼓動，則不需任何拘捕証即可予以逮捕，重責三十九鞭，在場所所有聽眾亦可每人予以同樣數目的鞭笞處分。”^{②5}

為了減少暴動的危險，亦曾有人採取了減輕對奴隸的剝削的辦法。南卡羅來納州重新實施了原在一七四〇年通過的一項法令，限制奴隸做工時間，在春夏兩季為十五小時，秋冬兩季為十四小時。大多數的州都宣布除非絕對需要，星期日一律不做工。喬治亞州的法律規定，使自己的奴隸過度勞役的奴隸主將受到一定的懲罰，而路易斯安納州亦明文規定從五月到十一月對任何奴隸必須容有兩小時的吃飯時間，其餘的幾個月必須有一小時半的吃飯時間。這些保證是並不全有什麼实效的，但它們終能在正式法典上出現，已足說明奴隸暴動雖始終沒有得到成功，亦不是完全的失敗，一如北部的工人們所進行沒有能夠得到勝利的罷工運動一樣。

白色工人與奴隸制度

暴動者的堅毅精神和勇氣對於那些進行消滅奴隸制度的鬥爭的取消主義者更是一種極大的鼓舞，而同時，那種在鎮壓暴動時所採用的極殘毒的手段，已使更多的人民大眾深信奴隸制度實有完全廢除的必要。於是，奴隸主們便要在他們的那些自己不蓄奴隸的鄰人們中間尋找同盟者了。一八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北卡羅來納旗幟”報論辯說：“不蓄養奴隸的人們與那些蓄養奴隸的人們，或是在血統上，或是在宗派關係上，或因他們共同的利益以及商務上

的來往，总是互相关連着的；因此，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减削了南部这一方面的势力，或損害了这种制度的安全和价值，那他們也就一定会遭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完全一样地归于毀滅。”⁽²⁶⁾

在南部的白色人口中，从黑奴的血汗中榨取利潤的人数所占百分比是很小的。在一八六〇年时南部白人蓄养奴隸的还不过三十万人*，其所蓄养奴隸数連家人全計算在內亦不及三百万人。而在各蓄奴州中的白色人口总数是九百万左右；因此，实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南部白人得到奴隸制度的利益。經濟力量是完全集中在几千个占据着最好的土地的家族們的手中，它們攬得每年生產总量的四分之三。一八五〇年的联邦調查指出，那里有一千戶一年所得收入总数为五千多万，而剩下的六十六万戶一年总共所得亦不过約計六千万元⁽²⁶⁾。

奴隸制度对于整个南部說实在是一种大灾患。成千上万的貧苦白人其生活情况“只好与羅馬帝國極度衰微时期的羅馬平民相比拟”。他們住在被人抛弃的一些村舍中，耕耘着某些大种植園所抛弃的一些荒地，这些田是那些种植園主已認為失去生產能力，不值得再在上面花費他們的奴隸的勞力了的**。据南卡罗來納州的一位頗有济世之心的公民威廉·哥利格估計，在他那一州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白人是在这种，或甚至更坏的情况下生活着的。一八

* 此处原文为五十万人，但据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战”为三十万人。本書俄譯本也已改。——譯者

** 著名的奴隸权政論家德葆曾毫無掩飾地承認：“不蓄奴的人一般只拥有極小的資產，而同时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也差不多普遍都是極貧瘠的，这种土地的產量之少，使得耕种的人至多只能从里面掏出一点餬口之資而已；肥沃的土地永远为蓄养奴隸的人們所占有，沒有奴隸的人是永远也無法得到它們的。”（見德葆：“西南各州的工業資源等”，新奥尔良版，第二卷，第一〇六頁。）

六〇年，“德葆氏評論報”亦估計在全部南方已有好几百万貧苦白人。威廉·西渥德在其著名的演說，“不可調和的沖突”中，更有力地爭辯說，奴隸制度所以成爲一種罪惡，不僅是因為它以沉重的鎖鏈壓在黑人的身上，同時更因為它“對於一切的自由人也幾乎是完全同樣殘毒的，那些人由於必需，不能不充當勞動者，而它却破壞他們找工作的機會，同時，如果它不能奴役他們，使他們完全變成一種商品，它就會把他們從社會中驅逐出去”²⁷。

有一個阿拉巴馬州的種植園主曾狂吹說：“就在我的家門以內，我現在已有了奴隸木匠、奴隸鐵匠和奴隸車匠，因此，我已經完全無需依靠自由技工了。”²⁸ 儘管買奴隸要花很高的價錢，且用於工業上奴隸勞工的效率也比較低，僱主們仍發現使用奴隸勞工比使用自由勞工合算得多。據喬治亞州德卡爾伯紡織廠報告，一個黑色工人一年所費僅七十五元，而一個白色工人却需一百一十一元；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附近的塞魯達紡織廠，共用有一百二十八個成年奴隸和童工，看管一千五百個紡錠和一百二十架織機，但據它報告說每年可節省百分之三十。在五十年代期中，密士西比州杰克遜城的棉花紡織工廠所僱用的奴隸一天只有二角錢的伙食費，而白色工人却要拿三角錢的工資。北至巴爾的摩一帶，奴隸技工和有技術的德國工人之間的競爭是如此強烈，以致許多德國工人被迫只得離開城市²⁹。

南部最大的一個鐵工廠，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特瑞德格鐵工廠也僱用有奴隸勞工。一八四七年當羅伯特·安得生接過這個行將破產的企業的時候，大多數的自由工人都被他解僱，而代之以奴隸。他寫道，“由於在奴隸州中要控制以高價僱來從事鐵工廠工作的白色勞工非常困難，我乃決定大量僱用奴隸，試行這一策略的結

果使我很滿意。”到一八四八年，該公司已能獲利九八，二七二元，因而安得生宜揚說：“一切在奴隸州中的鐵工廠最后都必須要盡量雇用奴隸。”^{③①*}

奴隸之所以受歡迎，不僅由于他們的价格低廉，而更由于，如北卡罗來納州費耶特維爾的一家紡織廠的廠主所說的：“用黑人就不会發生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事件，也不会因为訪問老板及其他公开活动浪費掉很多時間。”^{③②} 对于奴隸勞工的日益增強的競購情況造成了白色自由工人的失業，將他們的工資降到和奴隸相同的僅足糊口的水平。一八五五年八月，据“北卡罗來納州拉里城農民報”估計，当时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家屬是“年复一年地在半飢餓

-
-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在工業中大量用奴隸的辦法已證明并非善策。有一个曾研究过這一問題的人，对于其失敗原因提出了以下几个理由：

“奴隸們从种植園轉移到工厂，不易变为制造工厂中的良好工人，因為他們只是种植与收割之間的那一段時間被雇在工厂中作工，由于地上的工作与織机上的工作經常轉換，因之使得他們連慢慢積累工業技能的可能性都很小。

“工厂自己購買奴隸当然能够消除这种情况，但是如果那样却又会有甚至更大的困难發生。第一，買奴隸要立刻付出一大筆資金。据估計这样就需要將开办時的資金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而事实上資金不足的困难是始終存在着的。第二，購買下來固定的勞工正是工業所决不能忍受的一种情况。占有大量的奴隸勞工这件事將立刻僵化南部的工業，使其不可能再相互自由地擴充或縮減。而同时如果生產量增加就需要更大一筆添購奴隸的資金，那如果任何輕微的蕭条現象發生，就將會帶來相當大的損失。奴隸不像自由勞工可以隨便‘解雇’，把他們拋入公开的市場上去；相反的，不管賺錢或賠本，廠方都必須要維持他們的生活。此外，在不景氣的市場中強求出售黑人，一如出售任何其他过剩的商品一樣，是会遭到極大犧牲的。但反過來，如在興隆的時期中：則由于廠主和种植園主競爭購買，則又会使奴隸的价格急剧高漲。”（見費畢恩·林登：“南北战争前南部製造業对美國的影响”，“北卡罗來納州歷史評論”，第十七卷，一九四〇年十月号，第三二六——三二七頁。）

狀態中生活着……。就本城中，有許多工人的妻子兒女都因為缺吃少穿，痛苦萬分，他們如果再在這裡停留下去，顯然是永無逃出苦難境地的希望的……”。威廉·哥利格經常談到南部的“白色工人大量失業的情況”³²。

一八六〇年時，南方的工資水平是全國最低的。一八六〇年，北方一個零工的每日工資約為一元一角一分，而在多數南部各州中則只有七角七分到九角左右。同年中，北部木工的每日工資約為兩元，而在南部的許多州，則都不超過一元五角六分。在喬治亞州紡織廠工人一月的收入是七元三角九分，而在麻薩諸塞州做同樣工作的紡織廠工人們，卻可以得到十四元五角七分³³。

經常在失業和低微工資中討生活，是打在奴隸州中的體力勞動者身上的烙印。自由勞工在社會中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在這裡勞動被認為是一種可恥的、一個白人所不應該做的事。北卡羅來納的著名人士埃本奈澤·披提格儒寫道：“我們所感到的奴隸制度的最大罪惡，並不是它所代表的極不人道的觀念，而是它使得勞工和勞工的職業在大人先生們的眼中被看成為一種可恥的東西的事實，那些大人先生們是寧願做騙子也不願做工的。”³⁴ 沒有一個移民願意到南方去，因為在那個“勞動就是做奴隸，就是像一個黑人一樣工作”³⁵ 的社會中，他們是永遠被人看不起的。也就因為這樣，一群被紅利和較高工資所吸引來到南部的新英格蘭女子，“發現由於在那裡勞動階級普遍被人鄙視，他們所處的境地是非常地難堪”，她們仍只得回到北方去了³⁶。另有一些來到南部的工人，卻因為在任何行業中都不能為他們的孩子找到一些機會，便又離去了。一位來到美國的英國旅行家查理·來伊爾曾記下了四十年代末期在喬治亞州哥倫布斯所聽到的一些談話：“有好幾個從北方來

到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的新英格兰人曾对我叫苦说，在这里他们不能让他们的小孩们学到木工、家具工、铁工或其他任何类似行业的手艺，因为种植园主经常训练一些最聪明的奴隶来担任这些职业中的工作。”^⑳

一八四七年当特瑞德格铁工厂的白色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即被控告并传到法院里去了。几年后，新奥尔良的搬运工人为了提高工资举行罢工时，也遇到了同样的结果^㉑。另有印刷工人却还能够勉强保全自己的劳工组织，因为印刷业是少数几种没有奴隶劳工的激烈竞争的行业中的一种。然而，一般地说在奴隶州中罢工运动是很难得到成功的。罗彻尔·夏格指出说：“在南方另一种族的工人既然是那样众多，很少有人想到要和这一种族的工人们进行任何交涉。”^㉒

在内战以前，南方自由工人劳工运动的活动大都是以阻止黑人奴隶参加技工职业为目标。但这并不是说白人技工和黑人技工经常发生冲突，在南部的许多地区，白人技工和黑人技工肩并肩地在一起工作，也很少有什么磨擦。一八三六年三月十八日，“乔治亚联邦大团结”报道说：在一个造船厂中“有十个或十五个白人技工和约二十多个黑人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六年以后，英国旅行家白金汉对于乔治亚州亚森斯城纺织工厂的情况深为感动，在那里白色和黑色工人完全在一起工作，“不同的肤色不会引起任何问题，白人姑娘和黑人姑娘在同一个车间，以至同一架纺机上工作，不同肤色的男孩子、成年男工或女工大家都在一起工作而没有任何嫌恶和敌对的情绪发生……。”^㉓内战以前，在圣路易，白人技工和黑人技工同在一个工厂中工作了好多年，他们之间也很少有彼此敌视的情况发生^㉔。

但是，戰前的南方，白人技工是正進行着不斷的努力以減少或阻止黑人技工找到職業的。最初他們依靠請願活動。如在一八三〇年時，弗吉尼亞州諾福克的一群失業的石工即曾向華盛頓的海軍部請願，要求停止在建造海軍部船塢的工程中雇用黑奴。他們申訴說，他們是有家庭負擔的人，若被迫須與奴隸們進行競爭，他們就無法使自己的兒女免于飢餓。他們因不得不“認為雇用黑人對他們是一個最嚴重的危害，它損害本社會中勞動階級的利益，而且破壞一切平等的原則”。

當海軍部詢問船塢的工程師為什麼雇用奴隸的時候，他立即回答說為要替政府省錢。黑人奴隸只需要七角二分錢一天，而那時白人石工倒要求一元五角到兩元一天。他並且說，還有一個差不多同等重要的理由是，他要借此讓奴隸主們明白他們是可以很成功地將自己的奴隸用于工業生產方面的。他結論說：“對於奴隸人數在勞工中占如此巨大一個數目的本州，教育弗吉尼亞州的人們，讓他們知道黑人可以用在他們一直所夢想不到的更有價值的工作方面去，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海軍部為這些論點所說服，竟贊同在該項工程中仍然雇用奴隸。諾福克的石工又向議會請願，但也仍沒有得到任何支持^⑫。

有的時候，白人技工抗議雇用黑奴，只因為不如此，他們的工資會立即被減少了。當特瑞德格鐵工廠的工人為制止在該項工業中使用奴隸舉行罷工時，他們所得到的回答是他們的要求“是要破壞老板們一切權利和特權的基礎”，因而是“充滿着”奴隸取消主義的罪惡思想的。奴隸勞工仍繼續存在下去^⑬。

最後，白人技工轉而進行政治活動。最初，他們所能發生的影響是很小的，但當他們的壓力日益加大時，也有某些法令頒布了。

一八四五年，乔治亞州州議院規定雇用一個黑人技工或泥瓦工，不論他是奴隸或是自由黑人，皆屬違法。其他各州也都曾考慮要發布類似的法令，同時一般人民反對在工業中使用黑奴的情緒是那樣強烈，以致南方政界領袖人物麥明格爾預言道：“不久，就因為這個問題我們會看到一個強大的黨派出現的。”^④

奴隸主們頗為驚恐。限制奴隸的使用不僅將限制住他們的權力和威風，同時更阻塞了他們的一項重大的財源，因為種植園主常常在艱危時期，要把他們閑下來的奴隸向工業部門出租的。如果白人勞工得到一次勝利這就開創了一個先例。而這一情況如任其發展，則會愈來愈嚴重地限制住奴隸主的權力。“查里士頓旗幟”報的編輯史普拉特寫道：

“他們會對於主人們的那種可以在認為必要的任何工作中使用其奴隸的權利表示懷疑……。他們有可能要取得決定市選舉運動的權利……。這樣，深處在奴隸制度的核心中的查里士頓城，就會要變成一種反奴隸制的民主力量了。”^⑤

他們的這種論斷其實是很合邏輯的。抗議在工業中使用黑奴的運動將使南方的白人技工們組織起來，而當他們一經組織起來以後，他們就要要求民主改革的。也正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壓力，才有許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已經實現了。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所以能廢除因負債而坐牢的法令，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一年間在各該州的憲法中所以會補充關於已婚婦女財產權的規定等，都應主要歸功於產業工人^⑥。在乔治亞州，技工協會強迫州議院於一八五三年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在一切棉織廠、毛織廠及其他製造廠或機器廠中工作的，年在二十一歲以下的白人的法定工作時間應為“從日出到日落，並容許有符合一般慣例的用飯時間”^⑦。這是在內戰

以前那一时期中在南方实施的唯一的一条劳工法。

为使从价税成为一种更为公平的税制的斗争，在北卡罗來納州曾达到相当剧烈的程度。虽然从十二歲到五十歲的奴隸稅，按其价值每百元課稅五又四分之三分，土地稅按其价值每百元課稅兩角，而工人所用工具却每百元課稅一元。來自北卡罗來納州拉里城的一个工人在一八六〇年時問道：“对劳动者的工資課稅而对他們的僱主們的收入却反免稅，这难道能算公平嗎？”^{④⑧}

要求实行平等稅則的領袖是威克郡的州議員摩西·布勒德索。当他在—八五八年支持成立不久的拉里工人协会的时候，奴隸主們就在民主党中將他除名了，但在—八六〇年时，他却单独参加競选，結果当选了。这个关于从价稅的运动对于奴隸制度下的政治和經濟特权是一种直接的打击^{④⑨}。

从攻击奴隸發展到攻击奴隸制度的轉变过程是很慢的，有許多白色工人竟始終都沒有完成这一轉变。但在—八六〇年时，阿弗瑞得·馬休士在他南游归來的报告中却說：“我曾親眼看見自由的白人技工，一任其家口衣食無着，也只能袖手旁觀，一筹莫展，而有錢有勢的人家所养的奴隸技工們却能找到無数工作的机会；我更听到这些白人技工对于奴隸制这种制度以及奴隸政权發出最惡毒的咒詛。”^{⑤⑩}弗吉尼亞州的工人們号召开一次憲法大会以“鏟除那些專門在背后牽綫的政客，并抬高應該受人尊敬的劳动者的地位。那么，陈旧的貴族政治就会被人認清它的真实面貌而如糞土一样的被人抛弃，生產一切商品的劳力也就將得到它应得的报酬”^{⑤⑪}。

有奴隸制存在的肯塔基州的勒克星敦城的技工和工人們，在一八四九年春天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通过了下列的決議；同时

并决定印发一种要求解放奴隶的通告两万份。

“决议：奴隶制度对于本州各种人的利益都是有害的，它有害于奴隶主，同时也有害于不蓄奴隶的人；它降低劳工的地位，削弱工业，扰乱从事劳动的自由公民的职业，造成急剧的贫富悬殊现象，将劳动阶级摒弃于教育的幸福之门以外，并倾向于逼使本州内一个依靠个人劳动为生的人们向外逃亡。我们承认目前的法律所规定的占有奴隶的财产权，但我们认为劳动者对于他的职业和他的劳动所应得的报酬一如奴隶主对他的奴隶一样，是完全有同样的权利的；而现在奴隶制既日趋于壟断劳动力并贬低其价值，因不论为公为私都必须将其彻底消灭。”⁶²

直至五十年代时，贫苦白人和奴隶之间实行联合的情况才开始在整个南部逐渐发展起来。南方报纸也开始攻击各城市中的那些帮助奴隶组织暴动的“恶毒的白人”。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敦新闻”警告种植园主要谨防“那些经常怂恿我们的奴隶发动暴乱和制造流血事件的白人”⁶³。四年以后，在阿拉巴马州有大批种植园主聚会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下流的贫苦白人们”所造成的危险，这些人已和奴隶们混在一起密谋推翻奴隶制度，然后将土地、骡马、钱财重新均分。“流动小星报”评论说：“奴隶们经常与并非奴隶主的下等白人互相交往。这班人是社会中的危险人物。”⁶⁴

对于奴隶制度有同样危险性的是那些德籍美国共产党员，他们在南部许多州内组织反奴隶制度的活动。后来变成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阿道夫·杜埃发行一种奴隶取消主义的周刊，“圣安多尼时报”。曾在自一八五三年七月五日至一八五六年三月期

中，在時報出刊之前，已有好幾種小型的反奴隸制度的公報，由聖多安尼地方德國工人們所組織的一個協會編印發行，他們全都是共產黨員，而其中大多數是威爾漢·威特靈的信徒^⑤。雖然得克薩斯州的奴隸主們將杜埃驅逐出去了，但他們是不可能消滅他的反奴隸制度的思想的，這一點到內戰時期中他們就完全明白了*。在戰爭時期中，在得克薩斯州的聖安多尼城到處散發着一種由一群德籍美國共產黨人所編印的傳單，号召全體人民起來反對南部聯邦。雖然這次反叛並沒有實現，麥克卡羅克將軍在他自聖安多尼寫給杰斐遜·台維斯的信中亦承認：“該傳單說出了此地居民的大部分的意見，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正竭盡全力在秘密地破壞我們的事業，如果他們胆氣稍壯時，他們還會公開地來破壞的。”^⑥

奴隸制度的兩難境地

在五十年代行將告終時，少數奴隸主所維持的那種寡頭政治局面已面臨着一個日益增強的階級鬥爭。一八五〇年，南卡羅來納人泰勒寫道：“因為關懷着我們的社會制度的存亡，現在我們人民大眾的動亂情況實使得我們感到異常恐懼。”十年以後，阿拉巴馬州蒙特哥馬利的一個公民說道：“人民已經分成了兩個大的階級——富人和窮人，他們之間的距離和差別是和地球的南北極一樣的。”^⑦

* 一八六八年，杜埃收到一份自得克薩斯州寄來的報紙，該報第一版的第一欄便以大號字印着如下的一段通告：“本報為黑人所創辦并由黑人編輯，而本報之印刷所，即杜埃博士于得克薩斯州首倡解放黑人運動時所曾利用的同一印刷所。杜埃博士為黑人爭取自由所作之種種努力，吾等實未敢或忘，今敢獻此報以表全體有色人種對其感恩之意。”（摩利斯·希爾奎特：“美國社會主義史”，紐約一九〇三年版，第一九一頁；又“紐約人民時報”，一八八八年第四期。）

在五十年代期中，奴隸主們还更遇着了另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况，如果不讓奴隸進入工業領域，那就等于是为自由工人階級的兴起讓出了一条大路，而这个階級从本質上就是敌視种植園主所組成的貴族政治的。但如果讓奴隸們仍在工厂里工作哩，那又会削弱了整个奴隸制度，因为經驗業已証明从事工業方面工作的奴隸很快地就会变成了为自由而斗争的領袖。不僅如此，在工業方面使用奴隸，虽然在一八四〇年初期时看來似乎極其妥善，但在具体實踐中却証明这个办法是完全失敗的。

这时奴隸主們乃以傾全力阻止南部工業兴起的办法來对付这些困难問題。那些主張發展南部工業的人对于奴隸主們的反对态度表示極大的憤恨，而这些奴隸主却“对于这日益强大的‘威脅’抱着永不妥协的敌意，因進行坚决的斗争以阻止工厂的建立”^⑧。路易斯安納州的一种報紙“摩尔浩斯拥护者”曾对这个“威脅”的本質作了一个極簡單的說明，它說：“來到我國海岸的大批的外國人全都是工人，自然他們就与奴隸劳工發生了彼此競爭的問題。为了滿足他們的利益，他們就要力圖廢除奴隸制度；促進一切和自己利益有关事物的發展，乃是人之本性，这一点是我們大家都完全明白的。”^⑨一种居于領導地位的奴隸主的報紙，“查里士頓旗帜”报也同意这种說法。它在五十年代时即宣称說：“移民來南部的大批工業生產力，对于我們是一种灾害，而不是什么可慶幸的事；一般地說，他們乃是一个猥賤的不法的階級——是我們所特有的制度的敌人——是社会的灾禍，是奴隸人口中的危險分子，他們并随时准备联合起來反对奴隸主的利益，破坏國家的法律，擾乱联邦共和國的安寧。”^⑩

一八五三年霍瑞斯·格利雷說，奴隸主們反对工人从北部進

入棉花王國去是十分有道理的。他說，“每一個進入南部的自由勞工，實是一顆要給奴隸制釘好棺材的新鐵釘。”^① 奴隸主們抑止住工業的興起，因而在一個時期內，確曾延遲了南部自由工人階級的成長，但是他們却並不能禁止北方的工人們給奴隸制釘好一口棺材。北部勞工雖然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才慢慢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積極活動，但在加速這一束縛人類的制度的死亡方面，他們却盡了超出他們份內的努力。

第十四章

北部劳工与奴隶制度

內战以前，美國劳工为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时，改進劳动条件等所進行的各种斗争，是和反黑奴制度的斗争密切地互相关联着的。但最后，工資收入者却不得不把他們的全部力量投到这个反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去，因为这时他們已經認識到，不徹底粉碎奴隶制度，工人階級是不可能向前發展的。

但这种認識的得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反对私產奴隶制的斗争剛开始的时候起，就有大批的工人准备参加要求廢除存在于美國的这种束縛人类的制度的斗争。許多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在紐約州組織起來的劳工政党，也都曾以要求取消“这个有辱國家声名的最大最濃的污点”的黑奴制度^①作为它們的政綱之一。一八三〇年麻薩諸塞州各工会向州議院提出的“工人請願書”中也有这样的要求：“讓我們从我們美好的声譽中除掉奴隶制度这块髒污的瑕疵吧；讓我們同胞們不僅是在口头上被称为自由平等的人，而应讓他們真正享受到天赋給他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②

湯姆斯·希金生曾在他的雜記中寫道，反奴隶制的运动“有一个时期在工厂和制鞋厂中(新英格蘭的)進行的情况是比在教会和大学中要强烈得多的”。希金生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那些作为这些工厂和制鞋厂老板的資本家們。这些工商業者在“棉花王國”里有他們的可圖厚利的市場。一八三五年一个紐約商人向一个奴隶

取消主義者所說的話又在波士頓和羅厄爾的商人們的口中重述出來，在這兩個城市中，一如在王國城*中一樣，“奴隸大王”、“紡織大王”和“碼頭大王”已結成了三強同盟^③：

“先生，我們決不能讓你和你的伙伴們實現你們取消奴隸制度的企圖。這對我們倒也並不是什麼原則問題。但這是商業上的需要的問題。先生，我們決定要把你們這些取消主義者鎮壓下去，如能有效，我們也願用溫和的手段，如勢在必需，我們就得要用強硬的手段。”^④

保守派的商人們企圖用強硬的手段來壓倒取消主義者這種態度，並沒有使工人們感到驚奇。因為這是他們在破壞罷工時所一貫採用的手段。當奴隸主們和他們北部的同盟者在國會中進行剝奪取消主義者的請願權的活動的時候，費列得爾菲亞的工會就已看出，取消主義者的請願運動已和各工會為要求十小時工作日的請願運動得到了同樣的結果^⑤。“紐約晚郵報”代理編輯，杰克遜時期勞工運動的代言人，威廉·萊杰特曾對政府干涉反奴隸制報紙享受郵費減免權的行為表示抗議，他並警告工人們說，再下去政府就要干涉勞工報紙了^⑥。當費列得爾菲亞市長阻止法朗士·賴特在該城作有關奴隸制度問題的講演時，“全國勞工報”曾發表意見道：

“大家對這個問題是不必感到驚奇的，因為大家當能記得向司庫基爾的勞工們勒索二千五百元巨額的保釋金，才讓他們出庭答辯暴動罪的，正就是現在的這位市長，而那些勞工却終於被證明完全無罪而予以釋放了。”^⑦

* 紐約別稱。——譯者

歧途徘徊

要保持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自由权利，就必须支持取消主义者为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一信念在工人群众中日益增强起来。罗厄尔的女工们，当她们在一八三二年组织妇女反奴隶制度会，以及后来发动取消奴隶制度的签名运动的时候，也同样表现了这种信念^⑧。她们进行这种反奴隶制的活动，乃是她们对于为她们生产工作原料的奴隶劳工们的一种报答。南部的商人曾经威胁北部的厂主们说，如果他们的工人不停止反奴隶制的活动，他们就要向别处购买衣服和鞋子了。厂主们自然愤怒之极，但罗厄尔和福尔河的女工们却依然举办她们一年一度的义卖会，以为奴隶取消主义运动筹集款项；许多技工协会也预祝取消主义者的事业顺利成功^⑨。

有些工人认为，这些技工协会和女工们的分散的行动，应当由自由劳工领导，使其发展成为一种遍及全国范围的运动，以便彻底清除美国的奴隶私有制度。一八三六年，大宪章运动的先驱组织英格蘭工人协会，也曾向美国工人呼吁，要他们开始发动这样一个运动。这一建议立即得到费城劳工领袖鲁易士·格恩的赞同，他乃向美国工人们发出号召说：

“只要我的脉搏尚在我身体中跳动的时候，束缚在锁链中的黑人就一定得到我的同情和我最大的关心……。因此，我请求你们也永远不要忘记了他们……。让我们的呼声响遍从緬因州到喬治亞州，从大西洋到密士西比河的这一片地区——这是一个由信仰共和制度的人民和基督徒组成的民族的呼声，它用一切道德和正义的力量要求着，要求立即解放所

有的奴隸。”^⑩

英國工人們和格恩都因他們的呼吁沒有得到什麼結果而感到失望。大部分的工人，在那時還沒有準備參加取消奴隸制度的運動，而另有一些工人却更願打擊取消主義者而不願攻擊奴隸主。要使美國的工資工作者在反奴隸制的鬥爭中負起他應負的責任來，還有很多障礙，必須首先予以克服。

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有些工人則更懼怕奴隸問題會造成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因而加強了杰克遜民主政治的敵人方面的力量。奴隸主是民主黨中極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如紐約總工會主席伊力·穆爾等工會運動的領導人都表示恐怕他們會因此分化出去了，穆爾曾宣稱說：工人階級對於取消主義運動的支持，是極有害於“杰克遜運動”的。他說，一旦民主黨分裂了，“擁護銀行，反對杰克遜的貴族階級就可能會實現了他們最甜蜜的醉心已久的夢想”^⑪。

甚至當民主黨愈來愈為奴隸主們所完全控制的時候，許多北部的工人們，還仍然因為害怕分裂了民主黨而不敢於支持反奴隸制的運動。那些被要求立法機關限制移民、延長取得正式公民權的歸化年限的喊叫所嚇倒的愛爾蘭籍美國人、德籍美國人以及其他一些外國工人尤其如此。民主黨是反對這類法令的，而一向以反對外國人著稱的獨立黨，卻出來公開支持這種政策。因此他們相信，民主黨如果分裂了，就會帶來排外分子和反天主教分子的勝利；這些人是在他們的“美國主義”的口號下暗藏着“非美主義”的原則的。

工人們除了害怕民主黨發生分裂外，而且還懼怕奴隸得到解放以後，就會有成千成萬的黑人流入北部各州來，這樣就加劇職業

上的競爭，降低工人們的工資和生活水平。奴隸主們的北部同盟者自然就尽量利用这种恐懼心理。在与“棉花王國”之間的貿易关系最为密切的紐約州，商人們、銀行家們、政客們以及拥护南部的“惡魔新聞界”乃發動了一个極有組織的运动，以使工人階級相信，奴隸們如果獲得自由，就必然会要“降低了白色工人的生活条件”，因此，取消主义者就是北部白色劳工的敌人^⑫。那些永使黑人被奴役的奴隸主才正是他們真正的朋友。不少本來就难以維持一家人生活的工人，加上确曾看到工厂雇用非工会會員的自由黑人以代替工会會員工人的事实，就真相信这一套理論了^⑬。

这种拥护奴隶制度的宣傳，对于爱尔兰籍美國工人的影响，恐怕比对任何工人都大，因为他們大多数都是沒有技術的工人，很容易被黑人劳工代替掉他們的工作位置。天主教報紙在这种以利用工人們的自然の恐懼心理为基础的宣傳运动中，常常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因此，曾一度变成紐約大主教私有机关报，并在爱尔兰籍美國工人中大量消售的“自由人报”，乃經常誣蔑取消主义“为从英國輸入的东西”，并断言奴隶的解放將帶來北部白色工人的毀滅。这样一种观点，实是天主教报界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人在奴隶問題上所采取的最典型的看法，無疑对于全國的天主教徒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天主教教会方面既然不作任何努力來阻止这种影响，于是也就得到了“奴隶制度拥护者”的称号了^⑭。

-
- 黑人和白色工人在一起工作和共同進行罢工的实例是很多的。一八三五年七月，華盛頓海軍造船所就發生过白人木工和油灰工与黑人油灰工罢工的事实。（見國會圖書館手稿室所藏，“迈克尔·兴納尔日記”，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兴納尔为自由黑人，他自一八一二年至一八六五年間曾在海軍造船所与白色工人共同工作。

愛爾蘭的天主教工人曾經努力想取消天主教在美國所獲得的這種稱號。一八四一年，在偉大的愛爾蘭的解放者但尼耳·奧康奈爾和著名的禁酒運動領袖馬太神甫的主持下，他們發出了一封有七萬愛爾蘭人簽名的告愛爾蘭籍美國工人書。這份通告嚴重地攻擊奴隸制度，並且呼喚在美國的愛爾蘭人要取消主義者站在一起。“在美國的愛爾蘭男女同胞們，你們應該把有色人種看成是和你們平等的人，看成是你們的弟兄。為了表示你們對愛爾蘭的關懷，望你們永遠熱愛自由——痛恨奴隸制度——和取消主義者緊密地攜手——在美國為愛爾蘭爭光。”^⑮

這個通告發表以後，在波士頓和紐約的愛爾蘭工人們就召開了一連串的大會，並邀請取消主義運動中的領導人物們來參加。在波士頓的凡勒伊大廳召開的一次大會上，取消主義派的演說家，文德爾·菲利浦斯曾向數千愛爾蘭工人宣讀了但尼耳·奧康奈爾的那篇通告，到會的工人們對於通告的每一段都報以熱烈的歡呼，並大聲喊着否定的字眼以回答他的那些問題：“你們願意把已到達麻薩諸塞州的土地上的奴隸們，交還給他們的主人嗎？（不，不，不）你們願意讓那些不肯保證為反對奴隸制而努力的人占據政府職位或權要地位嗎？（不！不！不！）”^⑯

奧康奈爾所發出的呼喚，如果能夠得到天主教會和天主教報紙的支持，那它在愛爾蘭籍美國人中間當能發生更大的影響。但是紐約的大主教休士却攻擊奧康奈爾，並對於這份愛爾蘭人呼喚書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同時他說，不管這個呼喚書是真的還是假的，每一個在美國的愛爾蘭人，都有責任以憤怒的心情來抵制它、反抗它，因為這是外國對於“我國內政和民族政策問題”的干涉。許多天主教報紙仍繼續進行它們的宣傳運動，使白色工人們相信，黑色

工人如果獲得解放，就会把白色工人完全排挤掉^⑰。

劳工和奴隶取消主义者

取消主义者并没有作任何努力以克服工人階級对所謂解放黑人的危險所怀抱的恐懼心理。实际上，他們却是努力在讓大多数工人相信，他們所唯一关心的是黑奴的福利問題，而認為自由劳工問題是毫無重要性的。在“解放者”的第一期中，威廉·加里生即痛斥工会运动是“毒化工人階級思想使其反对較富裕的人的”有組織的陰謀活动。他說：“工会組織是極端罪惡的东西”，因为它要使工人們相信他們的雇主是他們的敌人。此外他更說，“如果說技工彼此之間的仇恨大于富人和技工之間的仇恨，那是更为接近事实的。”^⑱

加里生并不是孤立無援的。美國反奴隶制协会的机关报“全國反奴隶制度旗帜”，更在一八四七年宣称，任何一个真正的取消主义者，不应对那些誹謗工資奴隶制度为罪惡的人們表示同情。甚至文德尔·菲利浦斯当时也抱着同样的看法，虽然到后来他已轉而为工資奴隶爭取自由而進行斗争。他在一八四七年时曾寫道：北部的工人們实在并不真正需要什么工会組織，因為他們“既沒有受人欺負，也沒有受人压迫”。而且即使他們真受到了欺負和压迫的話，他們只要“在家里一呆……立刻勞力供給量的減少就自然会替他們解决一切問題”^⑲。

很幸运，菲利浦斯不久就改变了他的看法。一年以后，他即反对一項号召抵制奴隶劳工生产品的決議，該決議的理論根据是“大家根本不應該購買或使用勞力未花代價的产品”。但菲利浦斯却爭辯說：如果因为这个理由我們就只應該購買自由劳工的生产品，那

么同样理由，除棉花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我們都應該拒絕購買，“因为世界上極大数量的劳动力，虽然也許比奴隸付出的劳动力所得代价略多一点，嚴格地講起來，实际上仍是沒有代价的，沒有得到充分的報酬的”。他請大家看一看做襯衣的女工、工厂工人、英國的礦工、以及愛爾蘭的工人等，这些都是勞力“報酬少得可悲”的例子，他們“从各制造厂的純利中所分得的一份是極小極小的，小到了完全不公平的程度”。他接着說，“我所謂的報酬，是必須能够使一个工人滿足他生活上的需要——有提高智力的時間和財力，能為防老防病存下一點積蓄。这是每一个勤勞者一天工作所應該換得的代价。”^{②0}

不久以后，取消主義派的領導人物中接受菲利浦斯的觀點的愈來愈多了。偉大的黑人取消主義運動領袖，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曾經常發表言論，對工資工人的聯合爭取改進生活條件的努力表示贊助*。工會主義者都對他極表歡迎，羅徹斯特的印刷工人雇工會并曾邀請他參加了紀念富蘭克林誕辰的慶祝大會。霍瑞斯·格利雷，另一個反對奴隸制度的戰士，在使取消主義者和勞工運動各部分的互相接近方面曾做了不少的工作。格利雷斥責那些不肯好好對待他們自己的工人的取消主義者，有一次，他甚至拒絕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反奴隸制度的大會，因為大會的多數代表對於北部工資工人的問題是完全漠不關心的^{②1}。

但在某些取消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物對於自由勞工問題的看法

* 陶格拉斯更同樣經常發表言論，批評各工會拒絕組織自由黑人技工，甚至不容許他們和白色工人在同一工廠工作的作風。他在一八五一年曾說道：“真是多么可悲啊！我們的白色同胞們竟不能找到一套有創造性的合乎天意的原則來，現在它們虽完全足夠用來保障白人的權利，却對黑人產生了相反的結果。”（見“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文稿”，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發生改變以前，他們和工資工人之間是決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友好關係的。這些工人們認為取消主義者只在“張着耳朵傾聽抽在被壓迫的黑人背上的鞭子聲”，而同時對於北部受壓迫的工資工人的呼聲，却完全不予理睬。對於這一點工人們是感到異常氣憤的。因此，極端忠心於反奴隸制運動的沙拉·培格利也不得不因取消主義者的領導人物不關心北部工資工人們的處境而對他們多方斥責。她責問加里生說：“成萬的女工們，事前沒有得到任何通知，就突然被趕到羅厄爾的大街上去，任其流浪，你對這個覺得怎樣呢？”有些工人為這個呼聲所感應，乃向反奴隸制的人們呼喚，要他們在他們的大會上，千萬“不要忘記了北部的白色奴隸的權利”。又有些工人們則痛罵那些只“憐憫南方的奴隸，而對北方的白人勞工施行無情壓榨”^②的取消主義者。工人們的這種不滿情緒，可以在一首曾在許多勞工報紙上登載過的、描寫一個工廠女工被餓死時的情況的詩中看出，下面是這首詩的最後一節：

在她躺下的那天晚上，
一輛馬車駛過她的身旁；
車里是老板的小姐們，
正奔赴一個晚會；
黑人的悲哀，
倒能打動她們溫柔的心腸；
但這却是為她們的父親賺錢的
一個白人奴隸的死亡？！^③

工資奴隸制和私產奴隸制

大部分的工人都一致同意私產奴隸制是一種不可容忍的罪

惡，但是他們同時感到，他們自己在北部工廠中所處的境遇也實是同樣不可容忍的。在他們看來，奴隸制度的是否存在，並不在於有無此種名稱，而只在於有無此種事實。貧困生活的鞭策在他們看來是沒有什麼兩樣的。一八四四年時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工人”報曾說道：

“北部各州已發出巨大的呼聲反對南部的奴隸制度。在那裡奴隸制度的罪惡誠然是不可容忍的，但是難道這裡的情況有什麼兩樣嗎？他們有黑人奴隸，我們不是也有白人奴隸嗎？在這裡北部某些勞工的生活情況比南部奴隸的情況究竟好多少呢？也許有人會說北部的勞工能夠享受自由，但是我們的一般工人，我們的工廠工人之中，有多少人享受着和自由這個美名近似的權利呢？

“……我們的勞動者有自由聽從資本家的意志進行工作，或拒絕工作，但是如果拒絕，他們就只能挨餓！而如果工作呢，資本家們却要从他們的勞動所得中拿去十一分之九。那麼，請問，我們白人，北部勞工們的情況比南部某些黑奴的情況，到底好多少呢？”^②

羅伯特·台爾·歐文、阿伯特·勃瑞斯培恩以及霍瑞斯·格利雷等人不僅反對黑奴制度，而且反對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他們的思想在下面的一段宣言中已完全表現出來，這個宣言是在一八四五年一月舉行的有二萬五千名紐約工人參加的一次大會上通過的：

“不管是抽象的奴隸制度，還是具體的奴隸制度；不管是絕對的奴隸制度，封建的奴隸制度，還是工資奴隸制度；不管是名譽上存在的奴隸制度，還是名譽上不存在的奴隸制度；從

把耳朵贴在门上任凭主人用锥子刺扎的第一个以色列人到佩着奴隶标志的亚当的最后一个子孙；不管以任何形状、任何变态出现的奴隶制度，我们都一律坚决反对，我们的这种坚定严肃的目标，是至死不能改变的。”²⁵

在劳工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工人们首先应该重视反工资奴隶制的斗争。一八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全国劳工报”曾宣称说：在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不论是施之于人的身体还是施之于人的思想的，不论受奴役的人是何种膚色，或其被奴役达于何种程度——的时候”，我们感到“为工人们争取按照自己所定价格出卖劳动的权利，并使劳动价格公平合理、与他们所付劳动力相称而进行斗争，是有组织的劳工的责任”。但这种要首先反对工资奴隶制的概念在工人阶级中真正发生影响，还是到了乔治·亨利·伊文斯在隐退后又重新出来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才开始的。与同时反对各种奴隶制度的欧文主义者和公社主义者*不同，伊文斯和他的土地改革者认为，取消工资奴隶制是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唯一重要问题。既然关于黑奴制度问题的争论已分散了工人们对于当前的主要问题的注意，他们最好暂时忘掉私产奴隶制的问题。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全部精力和时间充分地用在这一个主要问题上；取消工资奴隶制——土地改革！

伊文斯曾劝说取消主义者参加他的运动，而不必再浪费时间

-
- * 一八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公社主义者的机关报，“先驱”，曾向取消主义者提出以下的建议：“我们相信，取消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如果在他们的进攻目标中更包括了在全国极为盛行的两种奴隶制度——南部的私产奴隶制和北部的资本奴隶制或者说北部的工资制度——黑奴制和白奴制——那就一定会使他们的力量无比地增强起来。”

向國會去請願。他并向他們保證說，土地改革將比無數次的請願和群眾大會都能更快地達到取消私產奴隸制的目的。是以伊文斯更預言說，如果一八五〇年國會通過一項土地改革法案，二十年後，下述的美妙景況就會在南部實現：

“南部各州的私產奴隸制，在自由公共土地法的施行下，已逐漸消滅了……。這時被解放的黑人已在公共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區，其面積幾與一州相等，他們將彼此爭辯，還是追隨着他們的同胞們到利比里亞*去哩，還是要求政府承認他們建立一個獨立州。”^{②6}

為要證明他的首先取消工資奴隸制這一理論的正確性，伊文斯竟隨聲附和奴隸主及其北部同盟者們所經常用以為奴隸制作辯護的一套論調，那就是在對比之下，北部的自由勞工是“貧窮、悲慘、受壓迫、無衣無食”，而南部幸福的奴隸却是“享有無限能滿足本能要求的舒適”，並在疾病或衰老時能得到仁慈的主人的細心照顧的。一位有名的南部代言人喬治·費茲赫曾寫道：“自由勞工所享受的權利和自由，尚不及黑奴的千分之一。”^{②7}

雖然伊文斯沒有公開替奴隸制作辯護，他却供給擁護奴隸制度的報紙許多有用的材料。他曾經說，解放黑人而讓他們變成工資奴隸，這對於奴隸們是極端不利的，因為他們所失去的是“老病時期的生活保障”，而換來的是貧窮和失業^{②8}。他認為取消奴隸制度，就要使數百萬的黑色工人流入勞工市場，降低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標準，因而極端不利於北部的工人們。伊文斯的信徒，湯姆斯·戴佛爾也說：“首先解放白人——把他們從貧困的桎梏中解放出

* 位於非洲西部海岸的一個黑人共和國。——譯者

來，在這一工作完成之後，我們將立即開始解放在我們國土內的身受嚴重壓迫的黑人。”²⁹

在工資制度之下解放奴隸將會對北部工人發生威脅的這一理論，頗得到愛爾蘭籍美國工人的贊同，而伊文斯的激烈響亮的辭句使得不少的德籍美國人也大為感動。然而究竟有多少北部工人真接受伊文斯的說法，認為工資工人的生活還不如黑人奴隸，這是極可懷疑的。工人們發出疑問說：為什麼有那樣多的奴隸會冒着生命的危險逃避他們生活上的“保障”呢？為什麼從沒聽說有北方的自由黑人逃到南方去呢？

有組織的工人們是了解私產奴隸制和工資奴隸制之間的根本區別的；工資工人可以組織起來為改善自己的生活進行合法的鬥爭。有一個工廠技工曾在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民主主義者”中寫道：

“有人曾經在國會中發言道：‘北部的技工和勞工大眾是和南部的奴隸相等的一個階級。’然而在這個階級還可以利用它現在仍掌握着的力量，通過投票箱去和平地糾正他們所身受的不平待遇時，這種言論，只足以表示發言人的無知和荒唐而已。”

差不多又過了二十五年之後，在一八六〇年二月，麻薩諸塞州的林城制鞋業罷工工人大會上，有一個工人也發表了同樣的意見：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生活是絕不比南方的奴隸生活更壞的，雖然由於我們自己的愚蠢，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比我們應享受的生活差了不止十倍。他們不能選舉，不能抱怨，而我們能夠。大家想想吧，奴隸們不能召集群眾大會，也不能進行罷工，但是，感謝上帝，我們還沒有喪失掉這種權利。”³⁰

在土地改革運動者影響較小的新英格蘭，有組織的工人們都反對伊文斯，新英格蘭工人協會則鼓勵奴隸們起來爭取自由的暴動，說明他們有這種權利，並號召北部的工人們拒絕參加鎮壓暴動的軍事行動。

“我們深望我們的全體兄弟們，以全社的名義，或個人的名義發出巨大的呼聲，不能再讓人認為我們北部的勞工，一面在進行維護自己權利的鬥爭，一面却又是一支要使他們的三百万兄弟姊妹在刺刀的威脅下永被奴役的常備軍。”^⑳

一八四八年五月九日，工會主義者在波士頓的凡勒伊大廳召開了一個慶祝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的群眾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所通過的決議中有這樣一項：“當我們因為自由制度在舊大陸上建立起來而感到慶幸的時候，我們並未忘懷這種制度對於我們的幫助。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南部奴隸制度的專橫霸道，和北部占統治勢力的金融寡頭政治是同樣地敵視勞工利益，同樣地與人民權利的保障不相容的。”^㉑

“廢除私產奴隸制和工人奴隸制！”是當時新英格蘭工人的口號。他們反對奴隸制度的激烈程度，可以在一八五二年新英格蘭奴隸取消運動的流動組織者喬治·潑特倫給加里生的一封信中看出：“工廠工人們感到，北部的資本家是和南部的奴隸主血肉相連的，奴隸政權和金融政權的陰謀計劃是要徹底征服黑人以及白人的。”^㉒

伊文斯的一個信徒，曾向出席一八四六年新英格蘭工人協會的代表們發表過談話。和伊文斯一樣，他要工人們不要過問南部的奴隸制度問題，而通過土地改革運動以求消滅北部的工資奴隸制。代表們不同意他的意見，並通過決議說：“美國的奴隸制度必

須从根鏟除，劳工階級的地位才可能得到提高。”^{③④} 新英格蘭有組織的工人們在一八四六年即說出了馬克思在若干年后所說的話：“北美合眾國，在尚有奴隶制度染污共和國的一部时，任何独立的劳工运动，都是不能奋起的。劳动在黑皮膚上受着压迫的地方，無論如何是不能在白皮膚上得到解放。”^{③⑤}

在馬克思以前，著名的“博学铁匠”爱利休·伯利特在其歷次对工人的講演中亦曾說明，奴隶制度因迫使自由工人与私產奴隶進行競爭，降低了自由工人的地位，同时在北部資本家們的心目中，奴隶的生活条件是“他們一切活动的基綫和基本出發点；自由劳工的報酬和地位，是或多或少由这一制度所决定的”^{③⑥}。伯利特并不是新英格蘭思想家中唯一發現这一真理的一个人。当时一位工会主义者，乔治·爱德文·麥克尼尔亦曾寫道：“許多明智的劳动者，都認識到不摧毀私產奴隶制，任何較大的進步都是不可能實現的。”^{③⑦} 新英格蘭的劳工報紙也常常強調这种理論。一八四七年，“工業之声”即發表社論說：

“奴隶制度問題实际上就是劳工問題。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我們一談到劳工权利問題或是我們堅持要進行任何种类的劳动改革，奴隶制度下的各种势力立刻就会向我們擺开了陣勢……。”

一年后，波士頓的一种工人報紙，“新时期”，也对这一理論加以發揮說：

“你們不可能接触到任何一种一般性的政策問題，而不使奴隶制度感到它受到了攻击。这是無法逃避的事，奴隶制度必須要被消滅掉……。不管有什么問題發生……这条巨大無比的毒蟒总会發現那里有危害它的利益的地方……。我們一

定要與這個怪物進行直接的你死我活的戰鬥……。”^⑳

然而，在一八四八年時，要想讓大多數的工人接受這樣一種進步的理論，實在是不大可能的；在內戰以前，大多數工人就從沒有提出過“奴隸制度必須消滅”的主張。但是，慢慢地，愈來愈多的工人也終於從自己的經驗中認識到，為了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必須要“與這個怪物進行直接的你死我活的戰鬥”。

奴隸制度擴張時的壓力

工人們所以能得到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奴隸制度並沒有肯安坐在南方等待工資奴隸們在解放了自己之後，然後集中力量來消滅它。它已經漸漸擴張到奴隸州以外的地區中去，而且如不加以制止，則大有無限擴張的趨勢。工人們立即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們接受了伊文斯的勸告，把私產奴隸制問題丟開不管，那他們就會在有一天的清早醒來時張眼一望，發現所有他們所依靠着來解放他們自己的那些土地，已完全落在奴隸主們的手中了。那時如果他們對這個問題仍然不管，那另一個早晨，他們將發現他們自己也都已變成奴隸了。

一八四四年，阿拉巴馬州杰克遜維爾的“共和黨人”報宣稱：“原來的均勢局面，已發生了不利於我們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將得克薩斯州連同它的奴隸一同劃歸我們，是使南部得到解放的唯一辦法。”^㉑一年以後，奴隸主們居然竟把得克薩斯州并過去了。一八四六年，他們又對墨西哥挑起了戰爭，以求擴張奴隸制度的領域，並在政府中取得更大的政治權利。四年以後，他們又威脅着要退出聯邦，使得相當數目的北部保守分子，尤其是那些與南部有貿易關係的商人們，在無限驚恐下，阻止了禁止在從墨西哥得

來的任何一塊土地上建立奴隸制度的“威爾摩特但書”的實現。奴隸主們一方面把退出聯邦的退堂鼓敲得更響一點，一方面乃把奴隸制度擴展到猶太州和新墨西哥去，而且獲得了一種更為嚴酷的限制奴隸逃亡法的實施。然而，這些勝利還並沒有使奴隸主們感到滿足。一八五四年，奴隸們更爭取到一八二〇年所訂立的密蘇里協議*的廢除，因此又把這一片曾經國會宣布為自由土地的地區變成了奴隸區。一八五七年，德萊德·司各脫決議則更規定在合眾國的任何地區都不得禁止奴隸制度，各地区的政府都有保護奴隸制度的責任。

最初，大部分的工人並沒有對奴隸政權的勝利感到驚慌。有些工人同意喬治·亨利·伊文斯的說法，認為得克薩斯州的被歸併不過是“富人和貪婪的種植園主之間，富人和貪婪的工廠主之間爭奪獨占權的鬥爭”的一個方面^{④〇}。然而“工業新時期”，卻對奴隸政權的這種侵略行為感到異常驚恐。“奴隸制度問題一天一天更令人感到無限煩擾……。它的丑惡的面貌，從它企圖在裡面藏身的每一個縫隙和狗洞中時時暴露出來了。”^{④一}

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在紐約城舉行的各次工人大會曾反對將得克薩斯併入南部“而不作必須在其境內消滅奴隸制度的規定……”。大會認為，如將得克薩斯作為一個奴隸區併入南部聯邦，則勢必將加強奴隸制度的力量^{④二}。在新英格蘭，工人們在愛利休·伯利特的領導下，也舉行會議，抗議關於得克薩斯的決定。一八四四年八月，“曼徹斯特工人”發表言論說：

-
- 一八二〇年，美國國會中擁護奴隸制和反對奴隸制的議員，雙方訂立的一種協議。密蘇里北緯三十度三十分以北的地方禁止奴隸制度，以南則為奴隸區。——譯者

“关于得克薩斯州的归并問題，我們一直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因為我們要看一看我們的國家是否真會要作出这样卑鄙的事來。我們說卑鄙，因为这种举动是要使那些靠吸人血膏为生的人們，有机会把他們的血手更進一步伸入到奴隸制度的罪惡中去……。我們現在已有的奴隸还不够數嗎？我們全体人民中三分之二不是已經在过着卑賤的奴隸生活嗎？在南部，我們無時不听到鎖鏈的叮当声，听到非洲的兒女們令人心碎的要求自由的呼声——而在北部，我們的劳动階級希望他們也能从貴族政权的可怕桎梏下解放出來的虔誠祈禱的呼声亦真可上聞于天。我們的國家現在不是已經很够瞧了嗎？为什么要已够令人痛心的奴役和人吃人的罪行之上，还要加上这种卑鄙的罪惡呢？”^⑬

在紐約、波士頓和罗厄尔等地有大批的爱尔兰工人举行了反对归并得克薩斯的示威运动，这說明，他們虽然不願参加取消主义者的陣綫，他們是反对讓奴隸制度擴張的。一八四六年五月，紐約工人召开的反对墨西哥战争的會議，很多爱尔兰工人也参加了。大会称这个战争为奴隸主及其“依靠工人的生產成果过着奢華和游蕩生活的”同盟者所共同進行的一种陰謀活动。他們要求波克总统，把美國軍隊撤回到不会發生任何爭端的屬於美國的地区去^⑭，以避免更進一步的冲突。

在新英格蘭工人协会一八四六年的年会上，新英格蘭有組織的工人們，通过他們的代表，痛斥了擴張奴隸制領域的“这种邪惡可耻的活动”，并宣誓他們自己“决不拿起武器去帮助南部的奴隸主們搶劫全國同胞中五分之一的人的劳动力”^⑮。

在对于“威尔摩特但書”問題發生爭論的时期中，工人們对于

奴隶制度问题的看法，始终是分歧的。当关于但书问题的争辩在国会中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德籍美国工人曾召集了一个全国会议，然而关于私产奴隶制的问题，他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而威尔汉·威特灵和赫尔曼·克利格两人的机会主义应对这种沉默负主要责任；克利格是一个土地改革运动者，他在坚持工资工人不应完全忽视奴隶制度问题方面的决心是使伊文斯也要感到相形见绌的^{④6}。

其他主张土地改革的工人们，最初是完全采取他们的领导者们所采取的态度。在那些领导者看来，“威尔摩特但书”乃是一种用来不是掩饰黑人奴隶制而是掩饰白人奴隶制扩张的烟幕。一切的奴隶制度在土地改革实现后都将被消灭。“但正是由于土地改革要实现提高人民群众的地位的目的，而这是政客们决不愿作的事，于是他们就提出一些新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转移人们对于‘土地但书’的注意力，以使一切奴隶制度中最大的一种奴隶制度——罪恶的土地独占制度下的贫困永存下去。”^{④7}

一八五〇年夏天，纽约市工业大会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它宣称说，国会中的争论“对于我们工人们来说是毫无什么重大关系的，除非说，它将威胁到美国联邦的生存，同时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这只是南部资本家和北部资本家之间，关于谁应得到最多的私产奴隶，谁应得到最多的工资奴隶问题的斗争。因此决议，争取自由使用公共土地乃是我們当前的首要问题”^{④8}。

有很多证明可以使我們看出，即是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也渐渐对于奴隶政权的侵略行动感到不安起来。一八五〇年六月，全国工业大会曾经痛斥奴隶制度为“道德上、社会生活上及政治上的罪恶”。他们决议：“我们反对奴隶制度再进

一步地擴張，我們對於那種認為為了滿足南部的要求，為了維持聯邦的永存，全體美國人民都必須同意……‘奴隸區’以及‘自由區’都應擴張的論調表示深惡痛絕。奴隸制度決不能拿來作為團結和自由的保證。”⁽⁴⁹⁾

一八五〇年的妥協成立之後，一個名為費列得爾菲亞勞動兒女的土地改革運動機構，攻擊國會“不應制訂有辱工人階級的奴隸逃亡法*和妥協法案**”。這個機構堅決認為：“一切在土地上、在工地上或工廠里作工的勞動者，不論其性別、膚色、或所處地位如何，都是自由人，都有權利成為自由人。”⁽⁵⁰⁾

當要求廢除密蘇里協議的罪惡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議案提到國會的時候，很少工人能再沉默下去了，仍然表示毫不關心的人可以說是沒有了***。新的領導人物從德籍美國工人們中間出現，他們立即參加了一個由男女工人所組成的反對奴隸制度、為自由

* 該法令規定在一州服役之奴隸不能被主人強迫退役，亦不能脫離一州逃亡他州。——譯者

** 該法令規定將猶他州和新墨西哥劃入非奴隸區，將加利福尼亞劃為自由州。——譯者

***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期間曾積極參加反奴隸制度鬥爭的一個工人，於若干年後曾說過，工作時間的縮短與一八五四年後努力在反奴隸制度運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有極大關係的。他寫道：“一八五四年，全國正陷在一個最後釀成內戰的巨大的糾紛中。全國各地喧鬧着跑進各農村教堂里去的人們主要都是屬於同一階級的，但他們是一天只工作十小時，而不是工作十四小時的。我真要請問那些反對縮短工時的人們，如果一個國家的全部人口都必須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他們有可能像我們一樣來對這一發生爭辯的問題進行討論嗎？我肯定說，不可能。我國近五十年來的歷史真要重新寫過了。自由和奴隸制之間的可恥妥協，無疑會更推遲了我們目前所懷抱的崇高理想的實現。”（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所藏，“愛德華·羅杰士自傳”，一九〇二年所寫手稿，第五章。）

為文明而鬥爭的小團體。這些新的領導人物，主要是一些共產主義者，是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逃到美國來的馬克思的信徒。他們在約瑟夫·衛登麥爾的領導之下，立即變成為勞工運動中最有力的奴隸制度的反對者。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共產黨人俱樂部”在一八五一年年底決議：“要用一切辦法取消奴隸制度——這種和真正民主原則完全不相容的制度。”^⑤各共產黨人俱樂部“曾盡了很大的努力以使大家正確地了解這一問題，他們是那樣堅定地反對奴隸制度，以致會員中如有任何人被懷疑曾對南部表示同情，就會立即受到查訊”^⑥。

那些馬克思主義者，開始使工人階級漸漸了解：私產奴隸制存在一天，自由勞工是不可能獲得自己的解放的，奴隸制度勢力的擴張，“就會嚴重地削弱自由勞工的力量”，同時，如不粉碎奴隸主的權力，奴隸勞工就會像在新墨西哥農場上急劇發展着的情況一樣，變成為北部工廠和店鋪中的最主要的勞工制度^⑦。

奴隸主的政綱

馬克思主義者所作的這種明白透徹的分析，更從奴隸主們所提出的喪心病狂的一套論調中得到了証實。他們大聲地叫囂：管他黑色工人，白色工人，叫他們都變成奴隸吧！為什麼要搞出一個自由工人階級來給自己找麻煩？把所有的勞工一律保持在和牛馬相等的地位上吧，因為，“一旦一個工人有了自由人的尊榮、知識和希望，他就再不能安於他自己的地位了”。奴隸制度，對於一切工人，不論其膚色如何，都是“正當的、自然的和必要的”。“查里士頓水星報”更狂叫着說：“奴隸生活是勞工的自然的和正常的生活。”它又說：“主人和奴隸在社會上的關係，是和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一

样完全必要的，而这种关系在北部各州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自由社会的理論只是一种幻想。”^⑤

奴隸主們則更說，自由社会不僅是一个幻想，而且是一种有危險性的东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根本不配和南部紳士的听差來往的”、“滿身油泥的技工”和“汗臭薰天的工人”都將要組織工会，進行罢工和其他各种搗乱活动了。“取消主义”只不过是北部許多“主义”中的一个。从反奴隸制运动中已出現了各种平庸得可憐的学派、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主义。但所有这些运动就都不可能到南部去發展。有一个南部的种植園主更得意揚揚地說，奴隸制度保障了我們南部“不会受到要求限制土地……和反租稅运动的麻煩，不会受到工人罢工、病态的博爱观念、过急的民主主义以及一般社会主义思想發展的危害”。

北部的資本家也應該在北部建立奴隸勞工制度。这样就可以解除工人政党、工会組織以及德籍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子所帶給他們的一切煩擾，这些社会主义分子，“胆敢在我國組織会社，制定計劃，企圖把我們良好的美國制度变成类似法國和德國的自由的那种血腥而瘋狂的幻夢”。只有依靠北部資本家和奴隸政权的联盟，才可以制止其暗藏的目的在于取消一切私有財產制和建立共產主义的取消主义运动的發展。他們更論辯說，最后，北方的資本家們終归要認識到奴隸制度对于他們是完全必需的^⑥。

实际上，这些主張在北部的工厂和作坊中用奴隸勞工代替自由勞工的建議，是和美國資本主义的發展直接冲突的。工資制度对于这种發展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以工厂、鐵路以及近代化技術为主的經濟体系中，奴隸制度是沒有它的地位的。可是尽管如此，上述建議对于北部工人發生真正危害的可能并未減少。他

們知道，在南部的工業部門中，奴隸勞工正以極大的速度代替了自由勞工，而每當他們組織起來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的時候，他們的老板和各種商務報紙也常常要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來威脅他們。早在一八四四年，福爾河紡織工廠的廠主們就告訴他們的工人說：“為了要和南部的製造工業者競爭，你們必須要和南部的奴隸們一樣進行長時間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資。”⁶⁶ 四年以後，“費列得爾菲亞共和日報”也警告賓夕法尼亞州的罷工工人說，如果工人們不停止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的要求，北部的製造工業者們就要遷往南部去使用奴隸勞工進行生產了。它說：

“在南部，製造工業是可以進行的，是安全的和有好結果的。製造工業完全可以而且已經在使用着奴隸勞工，因此——勞動力的價格比自由白人勞工，甚至比英國以工代賑的工價都要便宜些……。當然奴隸們，因為沒有什麼可以推動他們的力量，沒有熱情，或者說，沒有任何責任感，如果像在小規模農場或者其他單獨進行工作的生產部門中一樣，一切聽他們自便，不對他們加以監視，那他們自然只能是工作效率極低的一種勞動力量，可是如果像他們冶礦廠和大規模的棉、毛紡織廠中的情況一樣，分組接班，在嚴格的監督下進行工作，那也很容易用強迫的辦法來彌補他們所缺乏的熱情和興趣……。”⁶⁷

總之，私產奴隸制對於自由勞工所起的這種屈辱和癱瘓的作用，使得每一個美國自由工人的地位都確定地受到了威脅。膚色的不同再不能成為隔離南部黑奴和北部自由白色工人的壁壘了。正如有一種擁護勞工的報紙曾經說過：“他們（黑奴）之所以應被重視，是因為他們也能夠變成木工、鐵工、泥瓦工等等，因此，美國的每一個白人勞工必須對這個使勞工變成私產的問題予以直接的注

意。”⁵⁸

有組織的工人起來反抗了。一八五六年，新澤西州紐亞克城有約十萬工人在一次反奴隸制度的群眾大會上通過了下面的決議：

“決議：我們以激憤和懷疑的心情注視着我國奴隸政權在西部自由區域建立私產勞工制以降低勞工階級和人民中之生產階級的大胆企圖；我們反對并憎恨他們那種要想把黑奴雇用到我們的工廠中來的努力……。我們在此堅決表示，全城的人民完全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自由和獨立的勞工的存在……。我們將不遺余力地反對以奴隸勞工來代替他們的一切活動。”⁵⁹

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城，有無數的工人參加了一次抗議“內布拉斯加丑行”的大會。在匹茲堡，工人們也召集了一次群眾大會，反對將在內布拉斯加州采行奴隸制度。直到一八五四年二月，還有五千余名技工和普通工人在紐約市的百老匯教堂舉行會議，堅決認為內布拉斯加法案“為破壞民法的卑鄙行為和降低勞工地位的企圖”。他們更決議說：“我們紐約的技工和工人們以精誠團結的精神對於廢除密蘇里協議的威脅表示嚴重抗議。”⁶⁰

幾天之後，紐約市的德籍美國工人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召開的德籍工人工會的群眾大會上，約瑟夫·衛登麥爾所提出的一項議案，獲得了數千德籍美國工人的一致擁護。這個決議說：既然內布拉斯加法案損害人民的利益以支持“資本家的土地投機活動”，使“奴隸制度的進一步擴張”合法化，并划出大片的土地使將來任何的農地私有條例都不能對它適用，“過去曾經反對、現在正在反對、將來仍要積極反對黑奴制度和白奴制

度”的紐約德籍美國工人們只能毫不妥協地“对这个法案提出嚴正的抗議，并把任何一个拥护該法案的人視為反对人民、損害人民利益的叛徒”^①。

新澤西州、伊利諾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麻薩諸塞州、密西根州、弗蒙特州、康涅狄克州、印第安納州和威士康辛州的工人們也召开了同样性質的大會。每一次大會上都通过了斥責奴隸政权、反对“內布拉斯加法案”的決議。費列得尔菲亞的工人們決議說，“我們反对在北部的处女地上实行可咒詛的、丑惡的奴役人类的制度。”“密苏里協議”廢除不久，全國工業大會舉行年會，乃完全改变了以往認為私產奴隸制对于工人階級并非重大問題的觀點。他們現在正确地認識到私產奴隸制問題应当放在劳工問題議程的首要地位上去，他們并且号召北部的工人們起來要求“立即取消‘內布拉斯加法案’和‘奴隸逃亡法’，并且立即恢复‘密苏里協議’”。他們一致決議：“在將來我們决不能允許我們所選出來的州議院或國會中的任何代表可以不保證以反对南部奴隸政权的向外侵略及維護投票的公民的自由权利为自己的神聖任务。”^②

共和党的出現

當全國工業大會誓言只拥护那些反对奴隸政权向外侵略的候选人來担任政府职务的时候，一个致力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新政党出現了。曾任全國工業大會財務秘書、紐約工人运动領導人之一的爱尔兰·波費在威士康辛州列本城，將厭惡独立党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改革家們組織起來，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組織，以反对奴隸制度的進一步擴張和拥护自由土地政綱为其主要宗旨。波費給这个組織所定的名称即他从前的領導人乔治·亨利·

伊文斯早在一八四六年時所曾用過的一個名字。在那個時候，伊文斯即預料，在十年之內美國將只會有兩個政黨存在：“一是進步的偉大的共和黨，一是落后的渺小的保守黨。”^②

伊文斯曾以土地改革作為這兩個政黨的分界綫，然而當波費將在列本出現的那個政治組織命名為“共和黨”時，土地改革運動和反對奴隸制度擴張的運動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了。奴隸主們知道，農地私有條例將會阻礙奴隸制度的擴張，而且會加強反奴隸制勢力的政治力量。“北卡羅來納旗幟”曾宣稱，它之所以反對農地私有條例是因為這一條例的實施就會使得更多新的州參加到參議院中去，“以便否決每一件與我們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議案，而最後取得對政府的絕對控制權”^{*}。北卡羅來納州議院也說，農地私有條例對於奴隸主們是有極大的危險性的，因為它既為勞工運動所擁護，因而也就是“走向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一步……。”^③

共和黨運動迅速地在西北部地區發展着，不久以後，在東部的各工業中心也有了相當大的力量。在這個時候，整個美國的政治生活也普遍發生了變化。因奴隸主們控制了民主黨而不願再留在該黨中的民主黨人和那些對自己的黨在奴隸問題上採取騎牆態度的行為而感到厭惡的獨立黨人，現在都希望有一個新的政黨出現。至於那些一受到奴隸政權的威脅即便投降的保守的獨立黨人，則都參加了一無所知黨運動，而最後又都歸併到民主黨中去了。新組織起來的共和黨則代表着以反對奴隸政權更進一步擴張為基礎而結成的幾個階級的聯合。

* 在若干年中，北部製造工業者，亦因認為農地私有條例將引起工人西遷，因而造成東部勞動力缺乏的現象，對該條例加以反對。而移民增加的實際情況以及力圖擴張國內市場的慾望，却使他們逐漸轉而擁護農地私有條例了。

在共和党运动开始發展以后，北部資本家中的主要部分都参加了共和党，他們并捐助了相当数目的錢以作为該党的活动費。这些工業及商業資本家們决心要削掉奴隶主及其北部的同盟者所掌握的对于政府的控制权。在这些資本家，这些棉織厂、毛織厂以及煉鋼厂的厂主們看来，共和党勝利的結果，將是保稅的实现，將使鐵道建筑工程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助，將使他們有机会可以尽量開發公共土地上的富源，并將实现國家銀行制度和統一的幣制。这一切实在早就該实现了的，而只是因为奴隶主势力始終控制着政府，因使其至今不能得到实行。因此資本家們心里想，要消除農場貴族在政治上的权力，而進一步維護北部資本主义的利益，現在正是时候了。北部資產階級新聞界的一个代言人曾說道：“如不采取步驟以保障并改良北部以至西部所采行的一切制度，借以打击我們南部的那些主子們，如果我們竟完全被他們打下去，我們的重大利益完全被他們所破坏，那末，一次巨大的革命將不可避免地終于要爆發起來的。”^⑤

并不是所有的北部資本家們都了解到奴隶制度阻碍了南部的工業發展这一事实的，只有像波士頓的反奴隶制資本家約翰·福尔布斯，進步的宾州鋼鐵老板、國會議員薩丟斯·斯蒂文斯，北部工業的政治代表人物那桑尼尔·邦克斯和約翰·雪耳曼等人才認識到奴隶制度是“阻止工業進步和高度經濟繁榮的大敵”^⑥。大部分的工商業資本家，因为害怕喪失掉和南部的貿易关系，害怕南部的奴隶主們退出联邦，却都参加了反对共和党的运动。一八六〇年，居于領導地位的共和党人威廉·伊瓦慈曾說：“北部各州銀行界和金融業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与奴隶主們联合在一起拥护奴隶制度的。”金融界的人物更害怕如果奴隶主被剝夺了把自己的奴隶

帶到北部來的這種財產權，其他一切財產權便將立刻受到更廣泛的攻擊。他們極同意“紐約先驅報”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所發表的言論，該報說，共和黨人如一旦取得勝利，工人們“立即就會將他們的注意轉向他們周圍的富人們所有的貨物和財產，較大的各共和黨人報紙很早就教給他們那種共產主義的理論，認為‘一切財產都是靠搶奪得來的。’”

“波士頓快報”也是代表着那些相信共和黨要破壞財產權的人們說話的。

它在一八六〇年四月一日說：

“事實上共和主義與急進主義是毫無二致的。我們並不是說一切共和黨人都是急進主義分子。完全不是這樣——可是，共和黨的一切理論，實行起來則是完全會走向這樣一個結果的。這一鬥爭的目的是要逃脫一切制度和法律所加于人的限制，這樣下去，你有一天將看到所有道德上、宗教上、政治上以及社會革命中的投機分子都加入了他們的隊伍。至於黑人及他們的處境問題，不過是他們主要問題中的一個微末的細節而已。”

保守派們認為，共和黨的各种理論，已經使得工人階級覺醒起來。如若不然，那將怎樣去解釋工人階級在一八五七年的大恐慌時期中以及在一八六〇年制鞋工人大罷工時期中所舉行的那些英勇的失業示威運動呢？北部的保守分子們推論說，這些運動必定是共和黨理論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共和黨人對這些保守分子提出抗議，說他們不主張取消奴隸制度，說他們反對使用暴力和敵視約翰·伯朗等人組織奴隸暴動的活動等，但這樣作也是完全徒勞的。許多從廣大階級利益出發本應該急求加入共和黨的工商業者，却

也被狭隘的階級恐懼嚇昏了頭腦。

但整个工人階級也并不是一致拥护共和党的。許多工人，因为民主党对外籍工人采取友好态度，乃仍然留在民主党內，繼續進行使該党采取拥护自由土地并反对奴隶制度再度擴張政策的党內斗争。不少的土著美國工人却竟参加了一無所知党运动。一部分工人拒絕参加共和党的原因是，如果他們参加了，他們就要和剝削工人、調出民兵來鎮压罢工运动的資本家們携手。有一个工人說，这些人不論对于白人或对于黑人都是毫無同情的。而他們参加共和党运动的唯一目标只是“要使資本家集团如在新英格蘭一样，能得到政治上的权力，以便其指揮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达到少数人統治多数人的目的”^⑦。

很多工人了解到，他們对老板們的敌視态度不应阻止他們支援共和党反奴隶政权的运动，同时他們也知道大部分的資本家实际上認为共和党过于急進，并正以全副力量在進行反对共和党所提候选人的斗争。他們更明白奴隶政权对于政府的控制存在一天，他們就决無希望实现農地私有条例，同时，相当数目的为实现土地改革运动進行斗争的工人，已使得这一問題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劳工問題。此外，他們也并不認为保护关税的法令將只会有利于工業家，因为他們真誠地相信保护关税將可以保护美國的劳工，使他們不致与“旧世界的廉价劳动力進行毀滅性的競爭”，并將使美國的資本主义能够給工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德籍美國工人中的馬克思社会主义者們也論辯說，諸如保护关税等势將加速美國資本主义發展的各项政策，是應該得到劳工階級的拥护的，因为資本主义的發展乃是劳工运动發展和成熟的先决条件。一八五八年十月九日，“紐約論壇報”曾經正确地指出：“工人們，除了極少的例外，是

都希望實行保護關稅的，他們同時已開始看到奴隸政權是並無意思要使他們達到這種目的的，因此，他們想着，如果讓北部勢力高漲幾年，會是很有好處的一件事。”

有些工人認為共和黨對於奴隸制度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實過於保守，而只有完全消滅奴隸制度才能滿足他們的願望，但大部分的工人和很多小種植園主一樣，卻認為基本問題並不是消滅奴隸制度，而是禁止奴隸制度向新的地區擴張。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德籍工人工會的機關報，“社會主義共和國”所說的，正表達了工人階級在這一問題上的一般意見，它說：“當前時期的當前問題不是取消奴隸制度，而是阻止奴隸制度進一步的擴張。”

一八五六年的選舉運動

在一八五六年的選舉運動中，勞工是起着領導作用的。工人們在共和黨所領導的火炬游行的行列中前進着，他們手中的旗幟大書着此次運動中的主要口號：“自由土地，自由勞工，選舉福利蒙（Fremont）”和“決不以一天一角錢的代價出賣我們的勞動力”。許多著名的“四八活動分子”及勞工領袖們在工人集會上講話時，也都以上述第二個口號作為他們的主要論點。他們指出，南部的奴隸勞工已使南部的自由工人的工資降得極低。如果准許奴隸制度向北部發展，那不要很久，一角錢的工價也就將變成這里最普遍的工資標準。

共和黨在它向勞工提出的希望在選舉中得到他們的支持的呼聲中，更向全體人民群眾表示，只有依靠他們，整個國家方可以得救，因為大部分的資本家都是反對新的政治運動的。資本家們是決不能作為依靠的，因為只要奴隸主們一提出退出聯邦作為威脅

时,这些富人就立刻忘了自己的见解而向农场贵族们保证,他们将要“尽一切努力并不惜牺牲一切以求保持联邦的完整”。因此,工人们必须“起来反对金钱和野蛮的暴力互相结合的这种恶势力”。共和党人呼吁说:“农民们,工人们,只有你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脱离这种联合势力的危害,这种势力现在威胁着要将所有的白人劳工从所有的土地上排挤出去,以使它完全为奴隶和蓄养奴隶的人所占有。”^⑧

共和党所提的这个希望得到劳工们的选票的呼吁,并不是空洞的宣传词令,因为这是和这个新政党产生的根源及其政纲——制止奴隶制度的再度扩张,要求联邦政府协助国内的建设事业,实行农地私有法案,以及保障公民自由等——相符合的。在一八五六年的竞选运动中,共和党在它所发出的一本小册子中还能诚实地说:“目前之政治斗争所不同于往昔之一切政治斗争者,乃在于此斗争直接关系着劳工阶级之利益。而其他诸重要问题则更为直接有关于资本家及各种公司组织。”因此,在这本小册子中它又问工人们,是否觉得有可能通过投票赞成“那种以造成奴隶劳工和自由劳工直接竞争为其中心政策的政党的候选人”^⑨而满足自己的利益呢?

美国的工人群众是完全了解一八五六年选举运动中的各种问题的,这一点可以从两万五千名匹兹堡工人所发出的一份通告中得到证实,这些工人中有土著美国人、德籍美国人、爱尔兰籍美国人,也有铸铁工人、纺织工人、煤矿工人、木工、印刷工人、泥瓦工以及其他行业的技术工人等。这份通告名叫“匹兹堡工人致宾夕法尼亚工人同胞书”。其中有如下的几段:

“在署名的匹兹堡城的工人们,因深感我们整个阶级的利

益和目前的政治斗争發生嚴重的关系，乃向你們，賓州的工人同胞們致意，要求你們和我們一起來保衛我們的現已处在極大危險中的共同的权利……。

“讓我們來看看这些实际情况吧！”

“在我們國家的另一部分，有一个占有劳工的貴族階級存在着，他們因此已經可以完全不需要我們了。在这些貴族們看來，‘劳工’就是奴隸，而‘自由’是只有主人才能享有的。他們看不起我們这群‘滿身油泥的技工’、‘汗臭薰天的工人’以及‘做自己的苦工的小農民’，認為我們‘根本不配和南部紳士們的听差來往’——自己也是紳士的人們自然是相信他們的話的。由于我們在那里的工人同胞——或者照他們的說法，‘貧苦的白人們’永远生活在愚昧和被压迫的慘痛状态下，我們國家的那一部的政权是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的。这群貴族們現在却想將这种奴隸制度擴展到全國各自治州去。將这个制度擴張到了各自治州去就將使他們可以得到駕于政府之上的無上权力，那时，他們就要把奴隸制度使用到我們身上來了。

“賓州的自由工人們，我們能讓他們这样做嗎？目前的總統选举运动將最后决定一切了。”

工人們可以投民主党的票嗎？匹茲堡工人們的回答是：不可以。民主党現在已經不再是人民权利的維護者。目前的民主党已是正在“为奴隸主的事業進行斗争了”。如果民主党獲得勝利，奴隸主們就將要占据所有的自治州。在奴隸主們一旦占据了自治州以后，就不可能再有工人願到那里去，因为，他們將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呢？該通告說，“奴隸制度深惡‘自由教育这个可厭的东西’。

知識应為富人所專有，愚昧才是窮人應有的東西……。”*

通告更說，對於民主黨的政綱，我們是不能寄予任何希望的。工人們唯一的希望是共和黨，它反對將奴隸制度向任何地區擴張，它反對國會、或任何自治州議院、或個人、或團體握有准許奴隸制度在美國任何自治州合法存在的權力。

“工人同胞們，在這裡，我們找到了我們自己的政綱，在這個旗幟下，我們已決心要為了保障人的權利進行戰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所說的都是真話，那就請加入我們的隊伍吧……。在巨大的危險面前，我們已放棄了一切較小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因為它已使一切較小的問題在目前失去重要性了，我們已許身給這個為了保存各自治州使其不受奴隸制度侵犯而結成的大同盟了。宗派主義、狂熱主義和取消主義的呼喊聲，我們是聽到的，但是我們並不因此驚怕。曾經用明確的不容誤解的言辭提出過同一原則的華盛頓、杰斐遜、富蘭克林、亞當姆斯、門羅、杰克遜、克雷和韋布斯特等人都站在我們一起。有這麼多向導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相信，我們是沒有走錯路的……。

-
- 這個通告對提出的這些問題實無誇大其詞之處，因為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里士滿詢問報”確曾說過下面的話：

“我們現在真是痛恨一切帶有自由頭銜的東西——從自由黑人到自由農場、自由勞工、自由黑奴、自由意志、自由思想、自由戀愛、自由妻妾、自由兒女、自由教育等等一切屬於這一範疇的，令人深惡痛絕的政治花招、色情暴露、哲學思想、狂熱主義和愚昧行為。

“而其中最使人厭惡的乃是現代的自由教育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一經建立，就會變成其他那些可厭棄的東西的溫床和孵育器。一知半解的一點知識對於舊思想的保持，和對於一般事物的穩定，都是異常危險的。”

“大家可以自由地对这个重大的問題多想一想。丟开过去的一些成見，并当心那些怀有陰謀的領袖們。自己細心地作一番尋求真理的研究，根据事实，根据常識使自己真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然后再为了你們自己，为了你們的工人兄弟，为了你們的國家和权利進行罢工吧。”^⑦

这一通告也許要算表現內战前大部分北部工人对于奴隸制度問題的看法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宣言。它不要求取消奴隸制度，它也並沒有攻击奴隸取消主义者。它只是強調那在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中都被認為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如果允許奴隸制度繼續擴張，北部的劳工就將會降到和南部黑色工人同等的地位。該通告明确地提出：“將这个制度擴張到各自治州去就將使他們可以得到駕于政府之上的無上权力，那时，他們就要把奴隸制度使用到我們身上來了。”

在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布加南当选后数月，最高法院就作出了德萊德·司各脫決議，准許奴隸制度向美國的任何地区發展。紐約市技工与工人总工会即对这个決議嚴加駁斥，認為它毫無疑問是“奴隸政权要想使自己在各州中都取得合法地位的坚定决心的一种明証”，它企圖通过最高法院的权力以使自由劳工丧失保护自己“不受到与奴隸劳工進行競爭的危害”的能力^⑧。

向共和党內的保守主义作斗争

共和党在一八五六年的总統选举中虽失敗了，它却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在其后的三年中，在北部和西部的許多地区，它的力量都在繼續增强。这种情况表現最顯著的莫过于宾夕法尼亞州，該州的选票，在一八六〇年的选举中竟掌握着全國选

举的决定权。一八五八年，称为人民党的宾州共和党組織，曾在費列得尔菲亞市选和州选中都獲得了勝利。一八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費城北美人报”曾說，人民党在这兩次选举中所以能獲得勝利，完全因为它“是致力于維護我們工人階級的利益的”。該党的口号——“建立民主权和保护美國工業”，得到了宾州工人和工業家們的拥护，因为一八五七年的恐慌已經使他們認識到，將保护自由劳工使其不致与奴隶劳工發生競爭和保护美國劳工使其不致与欧洲廉价劳工發生競爭，二者結合起來是完全必要的。

但关于这种保护綱領的提出，有些人心中是存着一些顧慮的，因为这个政策將會吸引一部分保守派進入党内來，而他們是早已在企圖緩和人民党对于奴隶問題所采取的立場的⁽²⁾。他們向約翰·伯朗的瘋狂進攻則更加深了这种顧慮。北部的工人們召开群众大会对約翰·伯朗表示同情。在俄亥俄州，大部分由德籍馬克思主义者組成的辛辛那提社会劳动者协会曾通过了一系列的決議，宣称說：“約翰·伯朗的行动在使大多数人民的潛在意識表面化方面發生了極大的力量。”⁽³⁾

首先提醒共和党的領袖們应对人民負責的也是德籍美國工人。他們对于共和党内那些曾經参加过反对外國工人的一無所知党运动的保守分子，尤其表示怀疑。在一八五八年的时候，这群保守分子曾經运动在麻薩諸塞州州議院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通过了臭名远揚的麻州修正案，使新归化的外國人在兩年之內还不能得到选举权。如不对这些保守分子加以控制，則到一八六〇年时，他們就会要來决定共和党的政綱，指定大选时共和党的候选人了。

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三日，即共和党將在芝加哥举行的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大会开幕前两个月，紐約市的德籍美國工人曾召开了

一次特別會議來討論這次選舉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他們通過數項決議，表明他們“反對一切意在擴張奴隸制度及使其永存的努力的堅定立場”，痛斥一切延長歸化期以侵犯移民權利的行為，並要求立即通過農地私有條例。他們說，只有在共和黨“依據上述原則”決定候選人的情況下，他們才能“和共和黨並肩合作”，在大會閉幕之前，德籍美國工人們更發出號召，主張召開全國會議，以商討美國人民當前的各項問題，並設法防止保守勢力控制整個共和黨。

在共和黨的全體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兩天，一次重要的、但為大多數人所忽視的德籍美國人的全國會議在芝加哥的德國僑聯召開了。這是一次廣泛的、代表着全部德籍美國人口中各個階級的會議，但工人代表却起着領導作用。代表着芝加哥德籍美國工人運動的約瑟夫·衛登麥爾是大會上最激動和最有說服力的發言人之一。在得克薩斯州聖安多尼城編輯反奴隸制度報紙，剛從擁護奴隸制度的暴徒中逃脫出來的阿道夫·杜埃博士則和衛登麥爾進行了緊密的合作。他們兩人的影響，清楚地表明在代表們所作的幾項決議中。

這些決議，以紐約市共和黨中德籍美國工人所已通過的決議為其基礎，要求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德籍美國人的代表們向該代表大會提出五項原則，作為聯邦中大多數德籍共和黨人選民的意見，並要求他們“用一切正當的手段使該代表大會正式承認這些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反對麻州修正案，要求通過農地私有條例，並要求將堪薩斯州作為一個沒有奴隸制度的獨立州併入聯邦。在提到共和黨在奴隸制度問題上所應採取的立場時，決議說：“我們堅決維護一八五六年費列得爾菲亞政綱中所決定的共和黨的各項原則，同時，我們還希望這些原則在執行時能夠充分表露

出其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的精神。”

決議又說：“我們保證拥护任何一个要想竞选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只要他贊成这个綱領并且从沒有反对过一八五六年的共和党政綱，也沒有对麻州修正案表示过贊同。”^⑭

这些決議經過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們同意以后，立刻就付印了，因此这也就等于一个通知，說明只要共和党的政綱及其候选人反对一無所知党运动和奴隶制度的繼續擴張，德籍美國人，其中大多数为工会主义者，就將会投共和党的票。这一部分选票是不能輕易放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德籍美國人在很多有决定作用的州里，是可以有力量左右选举結果的。

这些決議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很难确切判断的。曾对一八五六年共和党代表大会作了一次精密研究的威廉·貝灵格尔，認為这个作用是相当大的。他曾寫道：“如从数十个大会出席人对德人大会抱沉默态度的情况看，这些決議对于大会的討論似乎沒有發生什么影响。但是在大会所議決的政綱上，以及在佩特斯因其为西華德的主要反对者乃迅速失去威信的事件上，却都可以明白地看出它們所產生的压力來。”^⑮

林肯和劳工

威廉·貝灵格尔还應該补充說，德國侨联大会的影响，在亞伯拉罕·林肯因其为西華德的主要反对者而迅速兴起，以及他后來竟被选为共和党領袖等方面，是也可以明白看出的。常常有人說林肯之所以成为共和党的領袖，不过是竞选鼓吹，互相标榜，背后操縱等等活动，加上一些純粹偶然的因素的結果。这种說法完全忽略了林肯早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群众这个事实，而这些群众就是

在共和黨中占主要部分的小農民和工人。美國西部中心地區的瑞典工人親切地稱他為“工人之子林肯”，伊利諾州的德國工人在一八六〇年初便組織了一些擁護林肯為總統的會社，以表示對他的熱愛。一八六〇年四月，工人居于領導地位的美國德人體育協會的中央機關報“巴爾的摩體育報”，即出來擁護林肯做總統。該報曾說：“有像他這樣的一個領袖，共和黨一定會得到勝利的。”^⑥

體育報所採取的這種立場，對於那些誤認為林肯在一八六〇年時尚毫無政治地位的人們說來，也許是使他們頗感驚奇的一件事。林肯早已因為堅決反對一無所知黨運動，而獲得了外籍工人的愛戴。在一八五五年的時候，林肯即曾經對一無所知主義大加攻擊，並拒絕同意讓共和黨與一無所知黨發生聯合關係。

他曾寫道：“他們的那些原則，我從不認為比那些奴隸制度擴張論者的原則好多少。我真不能了解，任何一個自認為關心黑人的不幸遭遇的人，怎麼可能要去參加意在降低一般白人的地位的聯盟。我不反對與任何人進行聯合，但這聯合必須要建立在我認為正確的一種基礎上。”

自此以後，林肯便利用一切機會攻擊一無所知黨運動，他經常講述德國人、愛爾蘭人、法國人以及北歐各國的人對於美國文化的貢獻，並且說，在他看來美國民主的真正標志就在於“那些自己從歐洲來到這裡，或是因為他們的祖先來到這裡而在這裡定居下來了的人們”，能夠在這個國家里“享受各方面的平等”。如果允許一無所知主義者得到勝利，那就將危害到美國制度中某些最優越的特點。

林肯也極力反對麻州修正案。在其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七日致著名的德籍美國人報紙編輯西奧多·卡尼西亞斯博士的信中，林

肯說，他反对“在伊利諾州或在任何其他他有权利反对的地方”实行麻州修正案的。他更說：“在对受压迫的黑人表示同情这方面，我是有一点小小声名的，如果我贊成减削白人現有权利的任何計劃，即使那些白人是在另一个國家出生而且說着和我不相同的語言的，那我也会顯得是荒唐地自相矛盾的。”这封信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并使林肯獲得了德籍美國人以及其他許多外國籍的工人們的热爱。

林肯在反对奴隶制度繼續擴張方面所采取的明确立場，以及他对于劳动人民切身問題的同情关怀，在一般工人中也同样產生了对他極为热爱的情緒。从沒有一个像他这样身分的全國政治領袖，表现过如林肯在一八六〇年三月六日就当时正在進行的制鞋工人大罢工問題所作的新港演說中，所表现的这种坚决地保衛劳工利益的立場的：“我很高兴地看到，現在在新英格蘭出現的这种劳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們在想要罢工的时候，他們就可以罢工，他們不論老板給他們工資与否都不会被迫地工作。我極高兴有这样一個制度，它允許工人完全有自由辞去自己的工作，更希望这个制度能在其他各地实行起來。这里大家也正可以看到我所以反对奴隶制度的原因之一……。”

林肯对于奴隶制度問題所采取的立場，乃是一种为工人們所了解、所讚美的立場。他并不是一个奴隶取消主义者，但他反对奴隶制度及奴隶制度的繼續擴張。一八六〇年三月，他說道：“如果你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主張，而認為奴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制度……那你們就是要讓奴隶制度的枷鎖加在你們自己的身上。那时你們就不再是可以举行罢工的白人劳工，而很快就变成了不能举行罢工的黑人劳工了。”

林肯在內戰以前所作的那些講演，也許從沒有一篇像他一八五九年九月在威士康辛農業協會主辦的一次州博覽會上的講演那樣地引起工人們對他的熱愛。林肯痛斥了那種認為“磨坊中蒙住眼的馬是最完美的勞工的形象”，以及“給工人以教育不僅是無意義的而且是有毒害的、危險的”等關於勞工的下流理論。這種理論本身才真是無意義的，有毒害的，危險的。林肯說：自由勞工是美國的自由的主要堡壘，而作為“供給人類需要的主要源泉”的更是勞工，而不是資本。提倡那種下流理論的人們把資本放在第一位，而把勞動力放在最後。林肯說他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勞動力存在於資本之前，而且是脫離資本獨立存在的。事實上，資本是勞動力所製造的成果，如果沒有勞動力首先存在，資本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勞動可以沒有資本而存在下去，但資本決不能沒有勞動力而尚能維持其存在。因此……勞動力的地位是高于……远高于資本之上的。”^⑦

一八六〇年的大選

說共和黨是作為一個自由勞工的政黨，在一八六〇年的競選運動中鬥爭着向勝利之路前進，這並不是誇張。卡爾·叔爾茨在他歷次的演說中都肯定地說，“共和黨的立場可以強調地說即是一個自由勞工政黨的立場”，他更用一句話說明共和黨的全部哲學：“對於人——求得他的天賦人權；對於勞工——求得他的自由；對於願意勞動的人——為他爭取工作機會和獨立地位；對於已有工作的人——為他爭得他應得的報酬。”反奴隸制運動的領袖，代表麻州共和黨人的國會議員，亨利·威爾遜對這次運動的主要問題提出解釋說：“一方面是共和黨的嚴整的陣勢，它要維護自由勞工

的尊榮，保障数百万劳动人民的权利；一方面則是它的以民主为幌子的敌人誣蔑劳动人民为奴隶，并为了滿足以財势压人的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和目的而出賣自己的節操。”^⑮

在美國过去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任何一个政党，曾像共和党在一八六〇年那样有意識地尽最大的努力以爭取工人們的选票。共和党的报纸称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單为工人的候选人名單。一八六〇年六月十五日的“波士頓新聞”更指出，这种称謂是完全恰当的，因为林肯及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漢尼巴尔·漢姆林都是：“对于工人們的需要和願望表示同情的。他們自己艰苦工作的經歷尚在記憶中，只要有机会，他們决不能忘掉致力于促進自由劳工的利益。”共和党的一位領導人物，班·魏德也肯定“工人候选人名單”这一名称的正确性說：“亞伯*·林肯正是美國劳工的集中代表。”^⑯

当共和党在努力爭取劳工选票的时候，強調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問題。它反对奴隶制度的繼續擴張，以便給自由劳工开辟更廣闊的地区并保衛劳工使其不致与奴隶劳工發生競爭；它贊成通过農地私有条例，以便减低工業城市中職業競爭的情况；它贊成实行保护关税的法令，这就將使劳工处于有利的地位。有一篇典型的共和党宣言曾說：

“工人們！如果你們要想得到合理的報酬和私有農地，你們就选举那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过去的行为上已表現为維護該兩者的朋友們吧！共和党人認為一切独立州的本來情况就是合乎自由原則的，而这种自由必須保持下去；他們也認為

* 亞伯拉罕之愛稱。——譯者

沒有土地的人們應該在獨立州能够自由地建立自己的家園，美國的工業更应当受到保護。”⁸⁰

共和黨的反對者攻擊共和黨人，說他們忽視了自由勞工的福利，因為“他們的同情乃是完全表現在對於埃塞俄比亞* 人種的溫情上……。他們對於自己周圍的罪惡情況視而不見，却要為他們想像中的南方奴隸的苦難，假惺惺地流着眼淚”⁸¹。但是民主黨人很快就發見這種論調是不能在工人中發生作用的，因為他們已完全了解共和黨的政綱已提出了很多對他們極關重要的問題。於是，民主黨人乃開始發動一種“恐怖攻勢”。他們說：林肯當選總統，就會造成聯邦的分裂和毀滅，就會使千百萬的工人走向失業。“哥倫布斯每日俄亥俄政治評論”於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警告俄亥俄的工人說：

“如果極端不幸，林肯終被當選，那所有的北部工人，那些為了養活自己和家庭，需要經常有工作，而且需要得到像他們現在所得到的最高工資的工人們都將要受到沉重的打擊。因此，俄亥俄的勞工們如果要想保持自己及其他工人弟兄們的獨立和富裕的生活，他們就應當毫不猶疑地選舉那真正是自由勞工的朋友的總統候選人，而且，只要工人們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是能够在俄亥俄擊敗林肯的。”

民主黨人提出的第二個論點是，如果共和黨的“取消主義”獲得勝利，這就會使得成千的自由黑人到北部來與白色工人進行競爭。他們甚至警告波士頓的自由黑人也不要投林肯的票，因為隨共和黨的勝利而來的奴隸解放，將會危害到他們的職業。一八六

* 一切黑種人之泛稱。——譯者

○年十一月一日，“紐約先驅報”發表了一篇致愛爾蘭和德國勞工的特別宣言，這篇宣言是在許多其他報紙上重載過的：

“如果林肯當選總統，你們就要和四百万新解放的黑人勞工進行競爭。他的當選將不過是聯邦最後瓦解的先聲。那時大批的自由黑人將如潮似地涌入北部，白人勞工則必將陷於身價日低、地位日落的情況中。”

在這類宣言之外，許多廠主還另提出他們自己對工人們的警告。“紐亞克每日廣告人報”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報道說：該城的工廠老板們“毫不隱諱地力圖使他們為數眾多的工人們在選舉中反對共和黨的候選人，他們如不聽從則將立被解雇”。紐約一些和南部有貿易關係的公司也向他們的工人發出通知，警告他們決不能選舉林肯。通知警告工人們說：“你們如不選舉林肯，你們等于是照顧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家人。因為，如果共和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南部就要和我們斷絕商業關係，那時你們既沒有工作可作，工資也會要降低。”^②

但共和黨人却鼓勵工人們堅持鬥爭，決不要為他們的恫嚇所壓服，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紐約論壇報”向工人發出呼喚說：“工人們！覺醒起來吧！加強警惕！”“德籍同胞們，嚴守在你們的崗位上吧！堅決地擁護林肯和自由。決不要被奴隸主們的寄生蟲所嚇倒而去選舉聯合名單中*的候選人。”結果證明德籍工人是完全堅決地擁護林肯的。布魯克林的德籍織布工人也曾被他們的廠

* 聯合名單乃是反對共和黨的各黨派（包括斯蒂芬·道格拉斯—貝耳—勃列肯立芝等派勢力）聯合提出的總統候選人名單。他們相信，這種聯合名單就能使林肯不能在紐約獲得勝利。（見菲利浦·方納：“商業和奴隸制度”：“紐約商人和不可調和的衝突”，一九四一年北卡羅來納州卡波山城版，第一七二—二〇七頁。）

主召集在一起，勸告他們說，如果他們還想繼續工作，就不要選舉林肯。可是，不但沒有人听从廠主的話，社會主義者的工人們竟掌握了會議的進行，因而作出決議說，在政治問題上我們決不能听信那些拒絕增加工資，並從外地運來工賊以破壞罷工的老板們的話。在這個會上，約瑟夫·衛登麥爾也向工人們發表談話，鼓勵他們選舉林肯，並擁護保護關稅法令的施行^⑤。

為反對林肯而發動的“恐怖攻勢”是完全失敗了。當然，也還是有些工人投了民主黨候選人的票。翻砂工人會的威廉·夕威斯，以及還有許多愛爾蘭籍選民*，都曾投票選舉了斯蒂芬·道格拉斯。但投票贊成道格拉斯，並不等於贊成奴隸制度，因為道格拉斯所領導的那一部分民主黨人，在反對奴隸制度的擴張及要求在各獨立州維持“自由土地”這方面是與共和黨極為接近的。同時也並不是所有的愛爾蘭籍美國工人都擁護道格拉斯。在紐約、波士頓、費列得爾菲亞等地，都會有不少由愛爾蘭籍共和黨人所舉行的擁護林肯的會議。費城有一個愛爾蘭籍美國工人曾說，他和其他數百個和他一樣的人都已決心要脫離民主黨。他更宣稱說，他們已完全相信，代表奴隸政權的政黨是決不會保護自由勞工的。“我所以加入民主黨是因為該黨會自稱為勞動人民的朋友，特別是

-
- 部分愛爾蘭籍工人不願選舉林肯的原因，實是由共和黨人所寫並曾在他們中間廣泛流傳的“燃眉危機”一書所造成的。興登·海爾浦：“燃眉危機”曾經攻擊愛爾蘭籍美國人為奴隸制度的擁護者。他說：“我們完全可以不需要這群來自‘綠島’（指愛爾蘭。——譯者）的無知的天主教分子……。奴隸制度、教皇政治以及奴役黑人的民主主義之間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我們現在看到這三個東西互相勾結起來在有人類的地方或無人類的地方進行魔鬼的活動，是完全不足怪的。”（“南部的燃眉危機及其克服辦法”，一八六〇年紐約版，第一七三頁。）

外籍工人的朋友。但我在民主党中所經歷的如此長久的時間，已使我确切地知道他們所說的那一套全是假話，完全是用來欺騙那些無知的人以便獲得他們的選票的，選票一旦到手，這些人的權利和利益就完全被置之不顧了……。”²⁴

德籍美國工人為選舉林肯所進行的活動是異常廣泛的。從紐約直到聖路易，各個城市中都有由這些工人召開的推薦共和黨候選人的群眾大會。瑞典籍工人的活動情況亦並不落后。“芝加哥新聞論壇報”曾對德籍及北歐籍工人們“在昨天為最後完成他們對於整個競選運動光榮貢獻的工作中所表現的熱情和積極性”予以讚揚。芝加哥德籍工人工會，由於它曾不斷努力爭取勞工對於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更獲得了特殊的讚揚²⁵。

究竟有多少工人投了林肯的票，當然是無法確定的。不過有幾點是肯定的。在賓夕法尼亞、密蘇里、伊利諾、俄亥俄和新英格蘭等地，勞工都曾予林肯以強烈的支持。在波士頓、費列得爾菲亞、辛辛那提、羅厄爾、芝加哥、特令敦等處，勞工選票也大都為共和黨候選人所得，甚至在棉花王國北部的勢力範圍的紐約市中，林肯從各工人區域得到的選票仍有相當的數目²⁶。

共和黨的發言人承認，勞工選票對於林肯的當選起了重要的作用。紐約有一個共和黨人說：“我們應當感謝工人們，他們使我們得到了勝利。”共和黨的領導人之一拉法士·安德魯士也說：林肯的當選“是在工人的協助下實現的，我黨應該替他們爭取到農地私有條例和保護關稅以作為對他們的報答”²⁷。

林肯的當選乃使反奴隸制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告一結束。這一鬥爭一直來主要是防止奴隸制度向各獨立州的擴張。此後雖然還有一部分為數雖少影響卻頗大的人們更向前推進這一運動，

以求达到取消奴隸制度的目的，但在这时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准备接受他們的主張。

在为了阻止奴隸制度的擴張而組成的偉大同盟中，勞工是一种重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由于許多取消主义运动的領袖对工人階級的要求取敌对态度，由于民主党也参預其間，由于懼怕解放奴隸就会增加劳动力市場上的競爭，更由于乔治·亨利·伊文斯和其他一些土地改革运动者提出了一些假革命理論而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工人們的活动起初是很不够積極的。但在这些障碍一經消除后，工人階級就立刻在反奴隸政权的大同盟中，負起了它应負的責任。

工人們扭轉了大局，結束了奴隸政权在政治上控制國家命运的权力。不久以后，工人即將参加一次偉大的人民战争，从这次战争中，將出現奴隸制度的消滅，將出現一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义，和一个更为强大的勞工运动。

第十五章

劳工与内战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日，即林肯当选后的第三天，一种和劳工运动极为接近的德人报纸，“纽约民主党人”，在其社论中综述进步势力的当前任务说：

“我们参加林肯的竞选运动，并不是因为我们我们是共和党的信徒，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自私的目的，而只是因为共和党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最为接近，因为我们相信它的胜利将保证人类的事业在将来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因此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保证在我们的帮助下所已得到的成就不致再遭受破坏，而且要使它更加巩固和发扬。如果反动势力党派中的反动分子要来破坏我们的成果，我们就必须立即组织成一种对抗的力量，进一步求得重大的胜利。”

这一警告的提出是正当其时的。

一八六一年二月末梢，在林肯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前几天，奴隶主们召集了一个代表大会，在阿拉巴马州的蒙特哥马利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以杰斐逊·戴维斯为美国南部联邦的总统。这群分裂制造分子因知道他们这种破坏联邦的运动是不会得到南部大部分白人的拥护的，于是他们竟拒绝在为数极有限的南部选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一八六一年二月份的“密士西比那契兹快讯”说：“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寡头政治的统治下，执政当局是连累人民

說一聲同意的胆量都沒有的。”^① 当这群奴隸主的寡头政治集团正在策动分裂、准备战争的时候，布加南总统除禱告上天保佑一切平安外，沒有提出任何的政策，而北部的商人們，因为担心發生市場蕭条現象和吃倒賬，則尽一切力量推动國會使其不惜向奴隸主們作任何讓步以求他們回到联邦中來。自然，这些企圖緩和局面的人也希望得到工人們的支持。早在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拥护奴隸制度的“紐約先驅報”就發出呼吁說：

“在我們面前所發生的这些事件，已在最不易动情的人們心中都引起了一种感到嚴重的財政危机即將來臨的恐懼，因此这是一切大大小小階級的责任，尽它們所能尽的力量來穩定目前这种紛乱的局面。而尤其重要的是，工人們——北美的骨幹和中堅——更应發表自己的意見，讓南部的人們了解，瘋癲地喊叫着提高黑人地位的猖狂的共和党人，將要毀滅掉國家的繁榮，而他們，在他們所進行的——一天知道將把我們領到什么样的危境中去的——是决不可能得到工人們的支持的。因此我們盼望本市以及北部各州的其他每一个城市和市鎮中的工人們，都將尽早召开群众大会，說出他們自己对于当前問題的真實意見……。”

劳工与联邦分裂危机

在几个星期的時間內，全國很多地区的工人确都举行了群众大会，但他們所表示的意見，却很少有適合“紐約先驅報”的口味的，該报肯定地認為南部各州有权要求退出联邦，并对任何一切向奴隸政权作讓步的措施都表示贊同。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維城的工人們，

在鑄工工会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选举了一个三十四人委员会*，以便喚醒全國的工人起來進行保衛联邦的工作。这次大会所通过的決議說：“工人們的物質繁荣……幸福的希望，以及將來的保障，都依靠着联邦能繼續維持目前的狀況。”他們并号召他們所有的工人兄弟們“一致因結起來，为了保持联邦这个單一的目标而奋斗”，并且讓那些“現在正在联邦的首都中陰謀破坏人类所建立的最偉大最健全政府制度的分化分子和叛徒們知道，以我們目前所处的地位，我們——全國各項工業的生命、力量和技能的泉源，在必要的情況下，將自由地走上戰場去冲鋒陷陣的战士——只要这只滿載着兩千五百万以上人口的自由、幸福和繁荣的优美古老的联邦之船，尚有一塊木片在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着，尚有一点半点國家統一的标志还在她的桅杆的梢头存在着的时候，我們是決不肯輕易抛弃她的”。在將來，路易斯維的工人們，“決不拥护任何具有或被大家認為具有分裂思想的人担任政府的任何职务”②。

这样的決議，“先驅报”是認為不宜予以發表的，但“辛辛那提商务报”于一八六一年一月四日却在提到这些決議時說：“路易斯維主張分裂联邦的人們受到了該城工人們的最嚴重的打击。”在同一次大会上，另一个委员会被指派出來以便起草一篇“告全國工人書”。这个委员会是由路易斯維各重要劳工組織的代表們組成的，其中有翻砂工人、机工、鉄工、印刷工人、磚瓦工、木工、石工、桌椅工人、粉刷工人、鋼琴制造工人、鍋爐工人、雪茄制造工人及馬車制造工人等。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个商業方面的代表，一个从事南部

* 委员会所以为三十四人是因为当时美利坚合众國包括三十四州。此三十四人委员会对工人的教育主要是強調运动的全面性。——俄譯本譯者注

貿易的商人約翰·吉利士。有他參加在該委員會中的這一事實，部分地說明了為什麼這一告全國工人書，完全和大會的決議不同，竟極力製造對於內戰的恐懼空氣，並力促國會接受克利夫頓協議*。但儘管有這方面的錯誤，這篇告工人書亦曾聲言說，工人們相信聯邦保存與否實國家繁榮及工人階級未來幸福之所系，而林肯的當選更決不能用作借口以實現破壞國家之企圖。它更號召各有权選舉國會議員的地區的工人們舉行會議，要求所有那些“現在在行動上破壞聯邦安全”的國會議員們辭職。不久以後，他們更號召各地工人派遣代表出席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將在費城召開的全國勞工代表大會③。

這篇告工人書曾發生極廣泛的影響。在印第安納州的厄凡士維爾和新阿爾巴尼，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和阿爾吞，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和費列得爾菲亞，田納西州的那士維爾城，弗吉尼亞州的溫徹斯特和灰林以及其他一些工業城市中，工人們都召開了大會。而其中以馬里蘭、弗吉尼亞和田納西各州所召開的大會最為重要，因為在這些地區的會議中，南部的自由勞工的信念得到了明確的表露。他們所作的各項決議的主要精神，表現了對於分裂聯邦的寡頭政權的一致反對④。在巴爾的摩召開的一次工人大會上，工人們對分裂聯邦的運動大加駁斥，擁護聯邦和憲法，並且選舉了馬里蘭勞工運動中反奴隸制的領導人物詹姆斯·達區司東為代表以

-
- * 克利夫頓協議規定自密蘇里河至加利福尼亞，以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為界劃開，在該綫以北地區內，永遠禁止實行奴隸制度。但在以南地區，則奴隸制度應受國會法令的保護；任何地區新立州治時，其應為自由州或奴隸州全由當地人民自行決定，在奴隸制度已存在的地區，國會再無權取消其奴隸制度，亦不得干涉各州間的奴隸貿易。

参加费城的工人大会。在马里兰其他地区的矿工、技工、以及其他一些自称为“联邦和宪法拥护者”的劳工们，也举行了反对分裂联邦的会议^⑤。弗吉尼亚州弗莱得立克郡的技工和其他工人们所举行的会议，则一方面攻击北部的“狂热分子”，一方面斥责“南部政治煽动家们的愚昧的狂妄和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次大会认为南卡罗来纳的脱离联邦是一种极不聪明、不公正、并对于其南部各姊妹州“极为无礼的行为”，它同时更宣称说，“这种使联邦支解的结果，将使我们遭受到人类在上天的庇护下所从未遭受过的长期和严重的苦难”^⑥。在田纳西州的那士维尔，一次由自由劳工召开的代表大会，宣告了他们“对于联邦所怀抱的永生不渝的热爱”，并且称分裂联邦的活动为“怀着阴谋的疯狂的政客们企图用自己的鲜血冲灌密士西比河流域的叛逆行为”^⑦。弗吉尼亚州的朴次茅斯城的工人们也宣称说：

“我们认为一切破坏我国政府或分裂联邦的企图都是侵害全国人民的权利，意在破坏我们所处的平等地位的行为。我们认为美国联邦的组织形式并不是一群各自有独立主权的州治组成的一种同盟或协议，而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同意和宪法的规定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完整的政权，因此，除了依照宪法的规定而召开的全联邦代表大会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有权力解除一个公民对于联邦的从属关系。”

他们在闭会时，更发出了向全国工人弟兄的呼吁，要他们“起来坚决维护宪法和联邦，视它们为自己的一切希望的最后寄托”^⑧。

梅逊—狄克逊线以北地区的工人们也召开了大会，通过了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德拉瓦尔州维尔民敦城的工人们发表宣言

說：“對於南卡羅來納及其他各州的這種企圖使聯邦的一部分脫離兄弟般的聯合組織的叛逆行為，我們感到異常的憤恨。”^⑩紐亞克工人們的擁護聯邦大會，則以向國家的旗幟、憲法、以及向保衛薩木特堡壘的安德孫少校歡呼致敬來結束他們的會議^⑪。在費城的各工廠和製造廠中，工人們也在舉行會議，從這些會議中最後出現了一月二十六日的大遊行，和一次盛大的群眾大會。在他們高舉着的旗幟上大書着：“賓州蒸汽機及鍋爐工廠的工人們正在為了聯邦的安全前進着”。“聯邦是國家的基石”。“擁護聯邦和克利夫頓決議”。“我們要求在國會中只有真正工作的人，而沒有空談家”。“我們的國家機器已經損壞了，技工們必須對它加以修理”^⑫。

這次群眾大會的主要精神是“維護聯邦贊成協議”。當大會主席在宣讀克利夫頓提案的時候，聽眾中有人大聲反對那些“建議將密蘇里協議的有效範圍擴大到太平洋區域的詞句”^⑬。大會主席，賓州鐵路局的一個總監，抹煞工人們對克利夫頓提案的反對的那種獨裁態度，也引起了群眾的抗議。機械工與鐵路工會的著名領袖，喬納桑·芬區爾因不能忍耐這種強使群眾通過一些毫無意義的決議的方式，乃和大會斷絕了一切關係^⑭。但最後的一條決議倒是恰當地表明了勞工的立場：“如果在盡了一切公正的合理的辦法後，仍不能達到一切熱愛聯邦的公民們所衷心懷望的目的，我們，所有的工人們，則將支持聯邦政府，採用一切正當的合法的手段以執行我國的一切法令。”“費列得爾菲亞詢問報”于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發表評論說：“他們首先贊成和平協議，如果不成功的話，那時，也只有到了那時，他們才會贊成使用武力來保衛政府。”

我們可以說抵抗奴隸政權是所有有組織工人的共同主張，但這卻決不是他們的最高要求。這一點從一八六一年一月由匹茲堡

印刷工人协会所召集的一次大会上可以看出，该会的口号是“决不和叛徒们妥协”。这次大会向政府提議，决不向那些施行恐嚇和威脅的人們作絲毫的讓步，而必須“以政府的法律制裁一切叛徒”^⑭。賓夕法尼亞州伊斯吞和新卡瑟城的技工及其他勞動者所舉行的群眾大會，堅決反對“分裂和任何形式的妥協”，並要求政府當局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國家憲法，執行國家法令”^⑮。一八六一年二月初，辛辛那提的一次工人會議宣布說：“在聯邦所轄之一切地區，必須採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用法律的力量來保持聯邦的完整。”^⑯

當林肯經辛辛那提前往赴任的時候，他在旅館中會見了由兩千人組成的德籍工人協會所派的代表團。在這些代表中，有些人乃是奴隸制度和奴隸政權不共戴天的敵人——馬克思社會主義者。他們中間的一位代表弗萊德·歐伯克來因，在他向林肯的談話中說：辛辛那提的自由工人們反對一切“自由勞工利益和奴隸勞工利益之間的妥協”。

“我們，辛辛那提的德籍自由工人們，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向我們眾望所歸的國家元首謹致熱誠的衷心的敬意。您所以得到了我們的選票，乃是因為您是自由勞工和自由農場的堅強的維護者。而今天那些被我們所擊敗的敵人，却不時在利用工人和工人會議等類名詞為號召以造成一種印象，好像工人群眾贊成自由勞工利益和奴隸勞工利益之間的妥協……。我們是仍然堅持着那促使我們投票選舉您的那種原則的。

“如果為了達到實現這一原則的目的，您需要人的話，德籍自由工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人當會隨時一致響應您的號召，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以保持自由戰勝奴隸制度方面我們已獲得的勝利。”

林肯向代表團保證，他完全贊同他們的意見，並且說：“工人是一切政權的基礎，他們人數最多就是一個最淺顯的理由……。”^{①7}

反對分裂的人們常常提出勞工的獨立政治行動問題，認為這是对付國會的會議廳里的那些委曲求全的人們的最好辦法。於是，在辛辛那提乃決定要召開一次勞工代表大會，該城各行業工會都派出了代表。會議於二月十六日舉行，會上組織了一個勞工政黨，提出了一個選舉該城政府職員的工人候選人名單，並宣布說：

“決議，經驗明白地告訴我們，政党政客們是決不能作為我們的依靠的。因此我們呼吁全體勞工群眾立刻認識清楚，我們應該，不，我們絕對必須和一切政黨脫離關係，而使自己在各種組織中團結起來，這樣我們才可以選出能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執行法律和其最高的目的必須是促進我們的特殊利益並致整個國家于富強的境地的人來。

“決議，既然我們國家的前途是依靠着勞工階級的，在目前的危機之中，我們決不逃避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幫助政府從慘痛的災難中挽救聯邦的命運，這種災難，通過陰謀分子的各种陰謀活動，已經迫在眉睫了，這種災難，如不即時予以克服，就將會造成我們的共同毀滅。”^{①8}

一八六一年二月下旬，全國工人代表大會在費城開幕了。這個會議於二月二十二日，以一次“偉大的工人大示威遊行”開始，以翻砂工人、機械工人、鐵工、大車製造工人、雕刻工人、旋工、馬車製造工人、貨車製造工人和木器工人等為領導力量，參加這次大示威的費城行業工會共有五十個以上。但這個全國代表大會却只有“全國”之名，因為一共也只有八個州的代表參加。另一方面，因為這八個州——賓夕法尼亞、馬里蘭、肯塔基、弗吉尼亞、田納西、印第

安納、俄亥俄、德拉瓦尔——实在都是和南部有着密切的歷史上和經濟上的联系的，这一事实，則又略可补偿代表面較小之不足。

宾夕法尼亞火車制造厂的依薩克·凡·浩頓被选为主席，大会乃开始進行會議了。会上許多發言人都号召工人們積極参加政治活动。來自肯塔基州的一位渥尔夫先生則号召立即組織一个工農联合的政党，以便挽救联邦。他說：“我們所要的代表是剛离开工厂的技工和剛离开土地的農民。”他的這項建議得到了其他一些代表的同意。代表費城劳工的伯恩斯也号召，希望有离开工作的工人們到國會中代表人民大众，以進行反对分裂运动的战斗。

大会开始后的第二天，議案委员会作了一次报告，其中包括如下的八項決議：（1）贊成克利夫頓協議，（2）拥护联邦，反对北部或南部的一切叛徒，（3）分裂运动是危害國家并为一切工人所痛惡的行为，（4）向政客們提出警告，工人們已决心以來自工厂和制造厂的人代替他們的地位，（5）反对可能引起內战的强制政策，（6）要求廢除北部数州所施行的旨在阻止逃亡奴隸重返南部的“人身自由”法令，（7）号召在三十四州的每一州中組織州工人协会，（8）決議成立一个三十四人委员会，以便組織全國工人進行政治活动^⑨。

大会通过了这些決議案，选出了固定的職員，并定于一八六一年七月四日在路易斯維召开下一屆的全國劳工代表大会。当大会正要宣告閉幕的时候，巴尔的摩工人的代表詹姆斯·达区司东却起來要求發言，以便提出某些他認為“應該由奴隸州的代表提出的議案”。他在未提出議案之前，先作了一篇極為动人的演說，痛斥那些給人民帶來危机的叛徒們。

“費列得尔菲亞詢問報”登載了該演說的一部分如下：

“讓叛逆的行為在全國各地如此猖狂，這對於我們真是一件莫大的耻辱。我們的參議院和眾議院，因有許多矢志為叛徒的分子存在，已弄成一團烏煙瘴氣，不論地位高低的人都已毫無操守可言了。叛逆，黑得好像黑夜的小魔鬼，却披着天使般的服飾的白色外衣，在全國各地招搖。工人們必須反對叛逆。它是貴族們所扶植起來的，貴族們的唯一目的是要讓他們可以騎在技工們的脖子上。

“分裂分子們聲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抵制北部的侵略，但是兩件錯誤行為，或者更多的一堆錯誤行為加在一起，也決不能湊成一個正確的結果的，這樣是永遠不能解決問題的。非常明顯，這種行為完全是富翁和貴族們企圖篡奪人民權利的一種勾當，新聯邦方面如果干脆承認這種事實，那比用一些無恥的狡辯來欺騙人民倒可能還顯得光榮一些。發動這個運動的人所以這樣做，並不是為了什麼抵抗別人侵犯的目的，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要破壞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利並在它的廢墟上建立獨裁統治。這一點，從他們向來的作為，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們加重了稅率。工人們會願意嗎？他們要對人民的選舉權加以財產的限制。技工們能願意嗎？他們選舉了一個任期十年的總統，並提議在他退職的時候還給他一筆養老金。技工們能願意嗎？工人們應該發表自己的意見來反對這些侵害他們的權利的行為。”

達區司東要求大會通過他所提出的各項決議案，其主要內容為擁護憲法並擁護全國政府所採取的一切它所認為必要的措施，以“維護現存的合法的政權，撲滅那些企圖推翻政府以便破壞人民權利的叛徒們”。決議中有一條說：“棉花不是君王，而美國的人民

才是國家的主人。”另一条決議說：“大会对于脱离联邦的各州中的工人弟兄深表同情，并保證为恢复他們的被人用武力所强夺去的憲政权利而奋斗。”^②

当这些決議在被宣讀的时候，曾博得大会热烈的掌声，許多人更發出喊声要求通过这些決議，但最后的决定却認為，当企圖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重要談判正在華盛頓進行着的时候，通过这些決議是不很合適的。列席大会的新聞記者們都承認，尽管大会所最后同意的乃是一种妥协政策，但以达区司东所得到的拥护來看，大部分的代表都是主張必要时用武力來保衛联邦的^③。

全國代表大会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休会，从此以后再也沒有重开*。

即便不是大部分，也确有相当多的工人，曾主張和奴隸主成立妥协借以保存联邦。这种錯誤的想法并不是來自工人階級本身，而是由外在的影响强加之于工人階級的。商人、政客、以及一些和奴隸主們保持友好关系的報紙，都在这方面利用工人們害怕失業

- 三十四人委员会曾經繼續活动了一个时期。据該委员会通訊秘書威廉·夕威斯說，該委员会曾一度准备組織工人進行独立的政治活动。一八六一年三月，夕威斯曾寫道：“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在本城和本州的劳工階級之中，建立一个完善的永久的組織，其目的在於使那些被公認為正直和有才能的人；那些了解人民的真正需要并將以我們的願望为根据作我們的代表的人；那些不是以政治为投机買賣，不会为了取得一点报酬就將为髒臭的公司組織和貴族壟斷企業充当走狗的人；以及那些願意利用全部時間和精力制訂良好的法律，并使法律的执行能够最好地滿足全体人民利益的人們，來担任一切人民委托他們担任的职位。”（詹姆斯·夕威斯：“威廉·夕威斯的生平、演說及論文”，一八七二年費列得尔菲亞版，第四五頁。）很明顯，不論是夕威斯或是三十四人委员会中的其他工会代表們，当时都沒有認識到消滅奴隸制度实是劳工進行有效的獨立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然而不久以后，实际發生的事实却使他們明确地認識到这一点了。

的恐懼心理。這些奴隸主的北部同盟者聲言說，如果不多方讓步以使南部不退出聯邦，則北部商業即將全部破產，大量失業將成為工人階級的唯一前途。南卡羅來納脫離聯邦后所引起的商業上的蕭條，以及由於這次危機所造成的普遍失業現象，更使大家認為此種論調之可信，尤其那些受苦最深的無組織的工人們則更是如此²³。

在與奴隸政權經濟上的聯系最為密切的地方，如紐約、費列得爾菲亞、波士頓諸城，那些準備犧牲一切民主原則，以維持他們和南部之間有利可圖的貿易關係的商人們，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是極為強大的。在這些城市中，由工人們所召開的幾次反對戰爭、贊成妥協的大會都是在這些商人或他們所雇用的政客的控制下進行的。而在這個運動發展過程中，商人們却日益抓住了對這一運動的控制權²⁴。在紐約和波士頓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那里，從事南部貿易的商人們和反對共和黨的政客們組織了一個所謂的工人大會，把分裂危機所以產生的原因完全歸之于取消主義者，並要求向奴隸主們作一切讓步²⁵。只有一個工人曾被允許在波士頓凡勒伊大廳中舉行的大會上講過一次話；但他的話卻被認為過分擁護聯邦，過分反對分裂，而被從紀錄中刪除掉。其他的發言人，一如在紐約市布魯克大廳召開的一次所謂工人大會上的情形一樣，全部都是民主黨的政客們²⁶。

要對於內戰前夕許多工人所採取的這種息事求和的立場作一番分析，我們必須要注意在愛利休·伯利特的領導下已進行了十有餘年的那個反戰運動。伯利特曾於一八四六年七月組織了世界工人弟兄大同盟，以致力於“提高人的地位的活動——一切的人，一切弟兄，不論其為屬於何種國籍、何種膚色、何種性格或現處于

何种地位”。其中的盟員，主要是一些工人，都曾宣誓永不參加陸軍或海軍，永不自願擁護或贊同任何的“戰爭準備，或實際進行戰爭的活動，不管這個戰爭是為了什麼目的，或由什麼人所宣布或發動的”。

一年後伯利特發表了他的署名“美國一工人”的“向基督教國度的工人們進一言”：

“美國的工人們！年青的共和國的選民們！在投票場中你們將給你們的舊大陸上無數勤勞的弟兄們豎立什麼樣一種榜樣啊，他們呢，是沒有像你們所有的這種選舉權可以把戰爭——這個血腥的魔鬼迎上寶座的！你們不願意讓國家的大官員代表和平和不願意讓向你們收稅的人代表正義嗎？或者你們認為那滿身血污專以屠殺人類為務的妖魔們，才有資格作為享受國家所能給予的最高榮譽的候選人嗎？”²⁶

伯利特的和平主義思想使得他甚至不惜容忍奴隸主們脫離聯邦以便和他們成立妥協。

為了證明工人們在送交國會的請願書中所提出的以武力消滅叛逆分子的決心，很多工人都加入了各種軍事組織，決定獻身於聯邦政府。這些軍事組織，大部分是由德籍工人創立的，但也有一些，如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協會，則是由愛爾蘭籍工人們組織起來的²⁷。一八六一年二月五日愛德華·瓊斯上校向麻薩諸塞州州長報告說：“大部是由有家室之累、一向依靠自己流盡血汗維持生計的人所組成的”麻州第六團，隨時準備在國家的號召下，起來保衛國家的旗幟²⁸。

在分裂危機時期中，工人階級內部的意見分歧，始終只是圍繞着如何保存聯邦這一問題，這一點我們是必須要了解的。對於“聯

邦必須而且應該被保存”這一重要問題上，是並沒有任何分歧存在的。如果和平的辦法不能生效，那幾乎所有的工人都準備用武力來鎮壓叛亂的。當時的一個工人報紙曾總結這方面的情況說：“全國的勞工大眾是站在聯邦方面、擁護聯邦的，雖然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南部的）曾受罪惡的領袖們的欺騙而舉行叛亂，對於這種叛亂，他們並沒有什麼很高的熱情，而它所帶給他們的也只是艱難和困苦。”^⑳

武裝起來！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薩木特堡壘已遭受攻擊之後，林肯總統發出了一個組織志願軍的號召，工人們乃首先報名參加了。木工、油漆工、制鞋工人、成衣工人、小職員、工廠工人以及許多其他行業的工人們都放下了自己尚未完成的工作。出身木工的詹姆斯·霍爾斯上尉所領導的羅厄爾技工的法蘭克斯社，因其為第一個可以立即參加軍事行動的組織，獲得了一百元獎金^㉑。威士康辛的伐木工人是最早參軍的人們中的一部分，他們很快就變成了第二十三團和第二十九團中的著名的“松林健兒”^㉒。據“紐約論壇報”稱，一八六一年七月參加作戰的紐約第三十四團“主要是由農民和技工”組成的^㉓。完全由德籍工人組成的德卡爾伯團，於七月八日參加作戰，那時候，紐約的意大利籍工人組成的加里波的志願隊，也已準備開赴前綫了。一八六一年四月底由紐約的波蘭籍工人所組織的“波蘭兵團”和由愛爾蘭籍工人組成的一個連，都於幾個星期之後出發上前綫^㉔。當各方面的報告說明波士頓和紐約的愛爾蘭籍工人參軍人數日益增加的時候，“紐約論壇報”對於那些“盼望從北部愛爾蘭籍居民得到援助的杰斐遜·台維斯的朋友們”的

失望表示慶賀^{③4}。不久，在“王國旅鳳島團”發出了下面的号召之后，成千的爱尔兰籍工人都参加了軍隊：

“鳳島，勇敢的爱尔兰人之母，号召她的曾参加过一四二八年运动的孩子們團結在她的‘綠色旗帜’之下，同时在与‘星条旗帜’并肩前進中，把联邦的歌声傳送到全國每一个边远的角落。”^{③5}

根据战争進行时期以及战争剛結束以后的調查，在北部軍隊中，工人几乎占了全軍的半数，以他們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說，这个数目是大得驚人的。战争結束后，据參議院發出的一个报告估計，共有約五十万至七十五万的工人，离开了北部各州的工業部門，参加到軍隊里去了^{③6}。那时北部工業所雇用的工人总数是九四一，七六六人，因此，实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人都参加了軍事工作。高尔德于一八六九年所發表的“美國軍人兵种及人种統計研究”，也說出了同样的事实。高尔德报告說，每一千名联军士兵中，就有四二三名*（二五二个技工，六个印刷工人，一六五个普通劳动者）是属于工人階級的。而每千人中，从事農業的有四八七人，从事自由職業的有一六人，从事商業的有三五人。如在麻薩諸塞和康涅狄克等工業州中工人所占百分比則还要高得多。根据高尔德所列比例表，麻州方面每千人中有技工五〇二人，印刷工九人，其他劳动者一八六人，合計为六九七人，而農業人口則僅占千分之一百四十。康州方面則为每千人中有技工四一一人，印刷工七人，其他劳工二〇三人，总計为六二一人。

高尔德所作关于志願軍的統計，虽然紐約和罗得島兩处的数字未經列入，仍甚有参考价值。在查明職業的四〇九，六七六名志

* 此处原文为四二一名，据俄譯本改。——譯者

願軍士兵中，技工為一〇三，七〇八人，普通勞工為四九，四六四人，印刷工為二，六六四人，合計一五五，八三六人。據高爾德的精密的研究，全部自願參軍的人數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或每千人中約有三八三人是勞動人民。征兵數字，雖然關於羅得島、明尼蘇達州和奧勒岡州的統計均付缺如，却仍更加說明了這一事實。全部被征入伍的二二九，六四一人中，有六四，二二一名為技工，五九，一六一名普通勞工，一，四九九名印刷工人，共有勞動人民一二四，八八一名。換言之，被征調的士兵中，百分之五十四為工人^②。

他方面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更証實了高爾德所作的結論。如麻州第八團普爾少校曾在其報告中談及該團兵士所屬職業情況，說明該團士兵八〇三人中最少有四七六名為工人，此外農人僅有二二人，職員四八人，商人一七人，小販三一人，名門子弟五人，自由職業者一〇人。而羅厄爾第十五炮兵隊中，自願參軍士兵的職業情況，為工人六〇人，農民二二人，商人三名，學生二名，商業代理人及名門子弟各一人^③。

以上的數字證明勞工超額完成了政府的參加戰鬥的號召的要求*。正如約翰·馬漢少校于一八六五年時所說：

-
- * 廠主們常常由於大部分工人離開工廠參加了軍隊，因而造成工業上人力的缺乏而百般埋怨。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的“波士頓商業公報”報告說，靴鞋製造工業因被抽調出大批的工人，已受到嚴重的影響，有些工廠甚至已被迫關門了。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波士頓有三十五個資本家曾向作戰部部長斯坦頓請願，並訴苦說：“在自由州中，從工廠和農田中抽調出去大批人口，已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生產賴以支持的許多工業部門……。”（轉引自詹姆斯·羅得茲：“一八五〇年妥協成立後的美國歷史”，一九〇五年紐約版，第五卷，第二〇五頁。）

毫無疑問，失業情況確曾刺激了工人們去參加軍隊，但許多歷史家則過分強調了這一因素。

“在一八六一年薩木特堡壘失守之后，仍旧坚强地团结在國家的旗帜之下的是些什么人啦？不要求得任何獎金，不要求任何的代价，抛开自己的家去保衛共和國的光榮的又是些什么人啦？我可以告訴你們，那就是我國賴以生存的骨干和血肉；从那时起一直到現在，在每一个洒遍鮮血的戰場上，他們都表示了他們对于國家的忠心。”³⁹

在这些工人之中，有数以千計的工会运动者。某些地方工会，曾响应林肯的号召全部参加了志願軍。布魯克林的油漆工人工会曾決議要自成一个單位以進行“保衛國家旗帜”的战斗⁴⁰。費列得尔菲亞的一个地方工会在它的會議錄中紀錄道：“本会已決定和山姆大叔共同参加战争，在联邦脱离危險或我們被完全击败以前，本会暫時停止一切活动。”⁴¹波士頓印刷工人工会共有一百个會員参加了陸軍和海軍，以尽他們“保衛自由人的旗帜”的責任，同时参加在麻州第十一团中的各印刷工人工会的會員們，曾因他們各种突出的表現，而常被人將他們作为一个特別的單位提出來⁴²。全國印刷業工会則因其所屬威士康辛第二十三地方工会的大部分會員都已参加了軍隊，乃不得不暫時解散。麻薩諸塞州福尔河紡織工人工会，在战争期間，竟無形地消失了，而屬於鑄工工会的一个地方工会，在一八六一年二月时却拥有會員三百八十四人，但由于应征入伍的結果，在几个月的時間內，就減少了九十七个會員⁴³。屬於國際机械工与鉄工工会的許多工人都走上了前綫，因此該組織所屬地方工会的数目乃急剧減少了。根据該会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所有参加軍隊的本会會員在战争期間一律免交会費⁴⁴。伊利諾志願軍团中的許多連都是由礦工工会的會員們組成的，同时，在薩木特堡壘遭受攻击前两个月組成的美國礦工协会，也送出了大批的

會員參加到軍隊中去^④。

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對軍事力量方面有極大的貢獻。主要由德籍社會主義者的工人組成的體育組織，工人工會以及各個共產黨人俱樂部都曾送出一半以上的會員參加了聯軍。在紐約，這些體育協會的會員們，在林肯第一次組織志願軍的號召發出後的幾天之內，一個團就組織起來了；在許多別的地方，他們也都曾派出一個連或更多的士兵。在密蘇里第一團中就有三個連由體育協會會員組成，而其第十七團則幾乎完全是由他們所組成的。在攻打杰克遜營壘的時候，密蘇里的德籍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紅色團旗下進行戰鬥，旗上畫着一把斧頭砍開鐐銬的圖案^⑤。

關於為保衛祖國而犧牲的人的各種統計，並不能告訴我們哪些人是工會主義運動者，但是每當一個工會會員為國犧牲的時候，工會方面卻不斷發出報告。下列由費列得爾菲亞第一號石工和金屬器具鑄造工人工會在報紙上刊登的一個通告就是很典型的：

“全能的上帝已經從我們中間奪去了我們從前的會友，輜重軍士大衛·約翰孫，我們僅在這裡對於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鑄工以及作為一個戰士的高貴品質寄以無限的懷念；他永遠毫不遲疑地站起來保護他的同胞和祖國，他是我們中間最初呼喊團結起來以保護我們利益的工人之一，而當國家需要他服役的時候，他也是最先在星條旗幟下应征入伍的一個士兵；現在他因在不列斯車站受傷而死去；我們今天聽到他的死訊感到無盡的悲痛，而我們更希望他的熱情將進一步鼓舞着我們其他的一切會員。”^⑥

第一次派出保衛華盛頓的幾個團是由威廉·夕威斯征募的，

夕威斯本人，則由于他妻子的反对（他有四个很小的孩子）沒有参加到軍隊里去，虽然他可以得到上尉軍官的任命。几个月之后，他組織了一个由鑄工組成的民兵連，不久，当宾夕法尼亞州受到侵略的威脅时，这个战斗連首先参加了战斗。夕威斯这时乃以一个傳令兵身分在該連中工作了数月之久^{④8}。

鑄工协会的領袖馬丁·波义耳也招募了一連志願兵，他自己并被选为連長。他的这种貢獻曾得到極大的重視，該連所屬的那一团的团长竟請他再去招募一个連來^{④9}。全國印刷業工会的主席約翰·法卡尔参加了联軍伊利諾州第八十九团充当上等兵，后来累升至少校軍官地位。費城成衣工人工会的領袖，后来并为劳动者协会創始人之一的罗伯特·威廉遜·吉恩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参加了軍隊，在宾州第二十二团服务了三个月之后；第二次入伍则在宾州第九十九团服务了整整三年，最后他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腓特烈斯堡战役中受了重伤，但不久在健康恢复后又回到了前綫。辛辛那提印刷業工会主席塞米尔·列芬威尔于一八六一年八月被任命为俄亥俄州第三十一团的少校軍官，在战争的全部过程中，他一直在联軍中参加战斗，直到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一日光荣退休。全國鑄工工会前主席伊薩克·尼耳曾在战争中受伤，后来重新入伍則任上尉之职。該工会前任會計員法蘭西斯·罗其却于战争中牺牲了^{⑤0}。

許多社会主义的領袖也都参加了联軍，有些竟慢慢升到很高的职位。德籍美國工人中的杰出的領袖之一約瑟夫·衛登麥尔在内战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軍隊，受任上尉之职。后来由于他曾征募了一团德籍美國工人，更因为一些其他的特殊功績，他被提升到上校职位，并被林肯任命为聖路易軍区的司令官。馬克思的一位

親近的朋友，奧古斯都·威里西也曾升到上校地位，并于一八六二年升為準將。在參加紐約共產黨人俱樂部以前，曾在普魯士軍隊中作過軍官的羅伯特·羅莎則被任命為紐約第四十五團的少校。弗利茲·雅可畢最初以上等兵的身分參軍，而當他在腓特烈斯堡戰役中陣亡之前則已升為少尉。

很多參加聯軍的工會主義者以及勞工領袖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都是外籍人，其中有不少甚至還沒有取得公民的資格，但是他們竟毫不猶疑地為他們所歸化的這個國家貢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大多數，和在加里波的領導下作過戰的意大利籍工人一樣，都具有他們在歐洲軍隊中得來的戰鬥經驗。

為什麼而戰？

下列一八六一年五月二日國際鑄工工會特洛依地方工會所通過的一項決議中的一部分，典型地說明在薩木特堡壘遭受攻擊之後，大多數的工人主要是在什麼力量的推動下參加聯軍的：

“特洛依鑄工工會已有不少會員參加了美國聯軍，其真實之目的，乃為保衛法律和制度的無上尊嚴，維護參加一八七六年革命運動的人們所精心制訂的憲法，保衛聯邦首都，也更為了保衛我們國家的古老的星條旗幟。”^①

在戰爭剛一開始的時候，衛登麥爾和威里西等便已看出，在黑人不能得到解放以前，這個戰爭是不能算勝利結束的。其他許多工人也都有和他們相同的看法。在戰爭的初期，有一個工人在他寫給留在家鄉的工會弟兄們的信中說：“我毫不隱諱地向這裡的弟兄們說，我所以參戰的原因，完全是為了給奴隸們求得自由。”曾經在一八六〇年選舉運動中擁護過道格拉斯的威廉·夕威斯說：“從戰

爭的第一炮剛發出的那時起，我就熱切地希望着這次戰爭非到奴隸制度結束時決不結束。”⁶²

必須使人民的戰爭獲得徹底勝利的理論使得工人們了解到，奴隸制度的消滅對於軍事上的勝利是完全必需的。成千上萬的黑奴現都已被利用着在南部各工廠、煉鐵廠、機器廠、軍火製造廠以及紡織廠中，為南部聯邦生產戰爭物資。此外則有更多的黑人被調到種植棉花和谷物的田地中去，以代替出來作戰的南部白人。奴隸主們曾經誇口說，奴隸制這種制度就將為他們取得戰爭的勝利。“塞凡那共和黨人”即聲言：

“他們（北部的人）忘記了我們的制度的特性，忘記了我們的工業制度的穩定性，更忘記了南部的勞動力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勞動力，是不被用來作為戰鬥力量的。當歐洲或北部發生戰爭時，勞動人民就必須放下自己的犁，離開自己的工廠和製造廠以便為他們作戰。因此生產就必定要隨着所需軍力的增多而相應停頓下來。在南部的各州，尤其是在生產棉花的各州中，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在這裡所實行的勞工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制度。我們的棉田是純由奴隸耕種的，僅只喬治亞一州就可以送出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到前方去而不會減少一百包棉花的生產。”⁶³

一八六一年八月，當約翰·福利蒙將軍下令釋放曾在密蘇里舉行暴動的奴隸時，匹茲堡、羅厄爾、以及其他一些工業地區的許多工人都對這一行動表示歡呼，而當林肯撤銷這個命令的時候，工人們反對的呼聲更是非常激烈的。據反奴隸制的人們報告，在很多城市里，几个月以前，在工人群众中还只能找到为数極少的几个奴隸取消主义者，而現在却已有成百的工人認識到他們必須將戰

爭一直進行到奴隸制度徹底消滅時為止^④。

當解放奴隸的呼聲在工人羣眾中日益堅強的時候，奴隸政權的北部同盟者乃企圖利用各種威脅和恐怖的謠言來恐嚇工人。他們說，工人們如不起來反對取消主義者這種將使奴隸布滿整個北部的陰謀，一切都全要完蛋了。內戰的叛徒們說，這裡的廠主們已經解雇了好些白色工人，而雇用了一些逃亡的奴隸來代替他們的位置。一八六二年六月五日，“賓夕法尼亞印第安納民主人”發表了一篇捏造的報告說，坎布利亞鐵工廠的工人們，因為老板以兩角五分錢一天雇用了一批“卑賤的自南部逃來的黑人”，“都放下自己的工具停止工作了”。“從這一件事，我們的朋友們很可以看出，林肯總統的解放奴隸政策產生了多么美妙的結果”^⑤。

該報雖然為那些它所假擬的罷工工人所迫，撤銷這篇撒謊的報道，但北部所有銅頭蛇* 的報紙却都轉載這一消息，並且發表了各種激動的社論，聲言要保衛白色工人使其不受到南部的威脅。各處都有一些工人被他們的宣傳所欺騙，在伊利諾州昆西城舉行的一次工人羣眾大會竟通過決議，表示他們決不能容忍使他們與自由黑人發生競爭的情況^⑥。

可是贊成解放黑人的人們向林肯總統所呈遞的無數信件、電報和請願書，終於擊敗了銅頭蛇運動。紐約工人報紙“鋼鐵論壇”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提出它為什麼必須呼喚解放奴隸的理由說：

“有一個真理是聯邦中的每一個工人都必須了解的。那就是黑人奴隸制度結果將會造成白人奴隸制度……。如果‘資本家應該占有勞工’這一罪惡的理論是合乎真理的，那他

* 原指北美所產的一種毒蛇，此處系指南北戰爭時同情南部的北美人。

們的邏輯結論也必是正確的，就是說，一切勞工，不論黑色或白色，都是也都應該是奴隸。”^{⑥7}

在人民的教育和軍事需要的推動之下，林肯開始認識到解放奴隸“對於挽救聯邦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必須解放奴隸，否則自己必須屈服於奴隸制度之下”。這時林肯不但不像過去一樣去聽從如喬治·麥克可利蘭將軍——麥曾警告說，在奴隸制度問題上如採取任何過激的觀點即將立使我們的軍隊瓦解——等一派維護南部利益的人們的意見，他却注意傾聽着自工廠和農田中發出的呼聲，“解放黑人，解放黑人”^{⑥8}。

英國工人和美國內戰

發出這種呼聲的還不僅限於美國的工人和農民，歐洲人民也發出了同樣的呼喊。馬克思說：“使西歐避免了為在大西洋彼岸永遠鞏固和推廣奴隸制度進行可恥十字軍征討冒險的，並不是各個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英國工人階級對於他們那種罪惡的胡作妄為所進行的英勇抵抗。”^{⑥9}

在一切國家中，對於美國內戰影響最大的是英國。她不僅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而且法國極願在她的對美政策方面與她合作。正如約翰·羅塞爾爵士對美國駐英大使喬治·达拉士所說，這兩個國家早已協議“在承認外交關係方面，毫無保留地採取一致行動”^{⑦0}。當牛奔河一戰*的消息傳到歐洲，證明南部已有一支能夠打勝仗的軍隊的時候，英國就承認了南部聯邦的交戰國地位，同時，在美國大使查理·法蘭西斯·亞當姆斯到達倫敦的那一天，

* 牛奔河在弗吉尼亞州東北部，該戰役於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開始。

維多利亞女皇乃發表了“宣告中立”的聲明。在南部聯邦看來，這是英國將進行有利于它的武裝干涉的第一步。

而英國却始終並沒有實行武裝干涉的原因，一部分乃是由于俄國拒絕與英國聯合共同反對美國北部。此外，英格蘭的商人們的思想也正惶惑不定，因為一方面他們的國家需要得到北美的麥子，一方面英國商人正從交戰的南北美雙方賺獲極大的利潤^①。但是阻止英國承認南部聯邦和阻止她進行有利于南部的武裝干涉的最重要的力量，乃是英國工人所作的英勇的努力。內戰期間在大英群島住了很久的瑟羅·韋特曾寫道：“在英國，所有的商業城市，所有的資本家，自然，貴族階級是更不待言，都是反對我們的。但是他們却不能實現他們的願望，因為工人階級是擁護我們的。”^②馬克思曾在“紐約論壇報”上寫道：“美國應該永不忘記，從這次糾紛的开始直到它的終結，至少英國的工人階級從來沒有拋棄他們。”^③

一個奴隸主曾經警告“倫敦泰晤士報”的威廉·羅素說，一旦棉花停止向英國進口的时候，工人們就要挨餓，他們就會立刻要求政府實行武裝干涉以打破北部的封鎖。到一八六二年，則僅有極少量的美國棉花能夠通過封鎖綫運出來了。因此大的紡織工廠都關閉了，失業現象更逐漸向其他工業部門發展。據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報道，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兩千萬人口中，已有九十萬人失業。數月后，據統計，則在許多工業城市中失業人口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八^④。一八六二年四月，“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了一封講述工人們的慘痛遭遇的信：

“我居住在一个廣大區域的中心地帶，这里有許多的紗廠，在平常的时候，这些紗廠不但能供給成千上万的人以工作

机会，而且供給更多的人以維持生活，已使我們完全了解了它的滋味。晌午的时候，家里是年老的父親帶着陰郁的面孔，一声不响地坐着，孩子們以期望的眼神四处張望，有时，他們哭喊着希望得到一片無法得到的面包。在困难的日子來臨以前，也都是極知尊貴的人哪，他們也認為罵他們为‘乞丐’乃是人們可能加在他們身上的最大的侮辱，但是現在妻子兒女飢餓垂死的景象已使他們完全失去了自尊的感覺，他們跑到‘救濟委員會’去，以最大的耐心和無比的忍辱精神，听人千查百問以求得到一点救濟，这情况是悲慘的，差不多是聳人听聞的……。但还有比这更要悲慘的是，我們工厂中老老少少的女工們，她們游蕩在街头，拖着疲倦的脚步，一門挨着一門走过去，乞討一点点面包……。

“看到那些我們一向熟識的和為我們所尊敬的人們的家庭，虽然他們不过是一些工人，現在都已經連一件家具都沒有了——看到平日極被珍愛的書和画，一件一件地都被送到当鋪里去以便換一点錢來購買粮食——看到那种質量太坏几乎令人惡心的但数量又不够一飽的粮食，……这一切真是非人所能忍受的啊。然而这还不算是最慘的情况。在許多居住農村的家庭中，除了还可要求增加几个便士当押金的已当出的东西外，是什么都沒有了，我們‘郎卡郡少年’的母親們已都在街头行乞，而她們所敲打的門戶，其貧困的情形常常是正和她們自己家里的情形相等的；至于他們的父親和他們自己，如果能够靠打扫街道，敲打石塊，一天賺到了一兩個先令，那他們就会感到自己已是無上幸运。”^⑥

这些工人們和他們的家庭並沒有如奴隸主們所預料的那樣，

呼喊要求英國站在南部聯邦的立場實行干涉。英國的工人們了解，支援北部也就是增強他們自己爭取自由的鬥爭，因為，如在倫敦的一次工會的會議上一個工人所說：“整個世界的勞工的事業和爭取自由的事業，都是聯結在一起無法分割的。”^{⑥⑥}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美國三杰辛托號戰艦艦長約翰·魏克斯上尉攔住英國特倫特號郵船，帶去了兩個南部的使官——梅遜和史奈德爾以及他們的秘書們。英國的保王黨報紙乃立即抓住這一事件為根據。要求對北部美國宣戰。英國政府也立即威脅說，如不將被扣人員迅予釋放，它就將那樣做了。法國的腐化報紙也慫恿路易·拿破侖支持英國。

雖然大多數的英國工人並不能參加投票，但他們通過他們的會議和示威遊行活動，亦能使人不能忽視他們的力量。在全國各地公開的集會上，工人們始終堅持用調解的辦法解決特倫特郵船事件。在布來屯舉行的一次大會上，一位頗有聲譽的議員懷特先生說：“應該由工人階級來講話，他們是這次會議的發起人，組織這次會議的一切費用是由他們的委員會負擔的……。”^{⑥⑦} 在倫敦居民最多的地方馬麗立波恩所舉行的一次大會上，一致通過了下面的一項決議：“本會決議：正在從美國來到英國的途中的叛亂者的代理人梅遜和史奈德爾，是絕不值得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的精神上的同情的，因為他們是奴隸主，而且是正在反叛美利堅共和國，并且是各國工人階級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死敌的那一派人的直認不諱的代理人。”^{⑥⑧}

代表諾桑普吞郡的美國國會議員吉尔平先生于一八六二年一月說道：“沒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口才和能力，能够使得在全國任何地方举行的、有相当数目的我國工人参加的大会，通过一項有利于

奴隸制度的決議。”⁶⁹ 同時，通過武裝干涉去打破封鎖以恢復繁榮的喊叫，也不能發生任何作用。工人們的回答是很清楚的：“不管我們還將遭受什麼樣的苦難，不管我們還要付出多大的犧牲，我們決不允許我們的政府為了蓄奴的南部聯邦的利益放棄嚴格的中立原則。”⁷⁰

然而也有一條理論確實發生了作用，確實迷惑了許多工人。同情南部的英國報紙說，為什麼為了一種北部美國人自己也並不尊重的事業，而我們却因此要受盡痛苦，忍受無窮的災害和苦難呢？北部所進行的戰爭並不是為了解放奴隸。在麥克可利蘭擔任總司令官的時候，他不是曾向奴隸主們保證，他們不必擔心聯軍會干涉奴隸制度嗎？麥克可利蘭不是答應過他們，他一定用高壓的手段壓服任何的奴隸暴動嗎？福利蒙將軍和海萊克將軍要在他們的地區內解放奴隸的命令不是被林肯撤銷了嗎？認為南北美之戰是關於奴隸制度問題的戰爭的看法是無味而且不合事實的。那麼為了這樣一個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在保護關稅和銀行制度問題上所發生的戰爭，我們為什麼要忍飢挨餓，甘受一切犧牲呢？為什麼我們去打破北部的封鎖以恢復英國的繁榮呢？⁷¹

由於美國人民的推動，由於迫切地希望激起歐洲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热情以反對他們政府對支援南部聯邦所作的一切努力，林肯開始行動起來。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三日，他批准了國會提出的一項議案，禁止陸軍和海軍官員強制送回逃亡的奴隸，如違反命令則將受到撤職處分。一個月之後，哥倫比亞區的奴隸制度便廢除了，雖然曾給了奴隸主們一些錢。一八六二年六月九日，參議院通過了一條法案，容許華盛頓的自由黑人享有選舉權；一天之後，國會又通過了一項決議，使逃亡奴隸有通過陪審官受審的權

利，同时原告还必须提出证据，证明他对于该奴隶的所有权以及他自己对联邦的忠心。接着在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林肯又发表了“解放宣言”草案，宣布凡至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仍在参加叛乱活动的奴隶所有者的一切奴隶，均被视为自由人⁽⁷²⁾。

虽然这一切措施使得美国和英国的一般人民都感到无限欣慰，但他们仍害怕反动势力将会在最后关头阻止奴隶的解放。于是大批的请愿书、来信和电报就开始从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发出来，要求林肯坚持立场，完成解放奴隶的事业。英国的工人们也坚决地鼓励林肯坚持下去，直到消灭奴隶制度为止。

当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林肯总统正式批准“解放宣言”时，南部联邦欲求英国武装干涉的希望受到了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美国驻英国大使亨利·亚当姆斯自伦敦寄给他的兄弟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无限欣喜地说：“这一宣言在整个英国引起了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巨大反响。‘伦敦泰晤士报’愤怒若狂，竟变得像一个醉酒的娼妇胡咒乱骂。的确，这里的一般舆论都表现出一种异常激动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各种集会、各种致林肯总统的电文、很多派往我国去的代表团、各种进行宣传影响舆论的常务委员会以及其他一切表示出一个伟大的人民运动的迹象中充分地表露出来，对于这一人民运动，这里的上层阶级是感到非常厌恶的，因为它完全是以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为基础的。”⁽⁷³⁾

“解放宣言”批准后的第四个礼拜，亨利·亚当姆斯又给他的兄弟写信说：“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现在向你报告一下会议的情况：这是一个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会议，它对于一切事物的现状真是一个莫大的威胁，莫大的危险；这次会议的气势之浩大是在这个首都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也是异常惊人的。大会的举

行是为要通知政府說，他們決不容許‘對我們作任何干涉！’”^⑭*

這次會議的組織者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戰爭一開始的時候，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就都支援北美，因為他們知道，美國奴隸制度的消滅，就將使美國的資本主義獲得解放，使美洲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得到發展，因此也就將使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運動進一步地擴張。馬克思相信，只要北部能夠以革命的精神，進行一種為了消滅奴隸制度的戰爭，它是一定能夠得到勝利的^⑮。

第一個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工人協會——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兩個月後，國際工人協會的常務委員會在倫敦組織了一連串的工人大會，以抗議英國政府對於美國聯邦所採取的敵對態度。這件工作在維護美國利益方面究有何種重要性，可以從一八七九年麻州參議員喬治·霍爾在國會的演說中看出來：

“歐洲和美洲的工人們所組成的國際協會，除他方面外，值得我們對它表示尊重的是，它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了一種

-
-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亞當姆斯更參加過工會運動者在倫敦聖詹姆士大廳舉行的一次大會。他在會後送給美國國務院的一篇報告直至一九四二年才公開發表。他在報告中強調說，參加大會的約有三千人，而“除了少數幾個被特別邀請的人以外，全都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人員，或從他們的技術方面講，全是技工”。他接着說，會上發言的人“也都是工人，他們毫無疑問曾在自己工會中受到過講話的訓練，但很明顯，他們是真正從人民大眾中涌現出來的……”。所有的發言人都強調說，“他們的利益和美國聯邦的利益是一致的；自由制度在美國的勝利，是對於英國極關重要的一個政治問題，因此他們決不能容許任何不利於美國北部的干涉。到會的人都明確地表示了對於發言人所提的意見完全贊同，會議的目的何在，實是不容懷疑的”。（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新英格蘭季刊”第十五卷，第七二四——七二八頁，查理·格利斯堡所編“亨利·亞當姆斯關於一次工會會議的報告”。）

新的关系，它認識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兄弟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从共同的劳动义务中成長出來的，是比單純的國籍关系或比任何居民之間的关系都更要偉大、更为坚强、更为緊密的。对于这种偉大的成就，美國，在所有其他的國家中最應該表示無限的感謝。當我們的戰爭進行到最艰苦的时候，英國的統治階級真是很願意和法國的皇帝一同承認南部联邦的，那时阻止英國政府这一行动的并不是別的什么力量，只是郎卡郡的工人們所發出的憤怒的呼声，他們向英國政府說，‘我們对于美國北部的工人的热爱千百倍于我們對美國的貴族的愛，我們和美國工人在利益上和情感上的联系也都要比我們和英國貴族的联系密切得多；你們所作的很多事，我們都容忍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們是絕不能忍受的，那就是，你們決不能使用一切力量以損害美國工人們所正在進行的事業！’”^④。

黑色工人的貢獻

北部工人以其在前綫及在生產戰綫上的成就，証明他們實是憑自己的能力換得自己的自由的。甚至在“解放宣言”發布以前，黑色工人已經是盡一切可能在援助聯軍了。當聯軍的隊伍向南推進的時候，奴隸們盡力給他們幫助，供給聯軍的司令官以極有價值的情報并破壞南部联邦的戰爭設施。羅伯特·斯馬爾斯俘獲南部联邦種植園主號汽船的事，就足以說明黑人在內戰期間所表現的英勇和机智的一个例子。那时船長和白人水手都不在船上，斯馬爾斯就負起指揮該船的責任來，他偽稱為南部联邦的船長向薩木特堡壘發出正确的信号，而當这个計謀被發覺的時候，船已經開出薩

木特堡壘炮火的射程以外去了。种植园主号乃被送交给停泊在查里士頓港外的联邦艦隊了。

因为黑奴們不断供給联軍的將軍們以極有价值的情报，南部联邦的司令官們乃經常派出大批的軍隊四出搜拿“美國黑人”。在密苏里州，奴隸們更是特別積極地帮助联軍的軍官們，肅清当地的游击隊。有一次，邦克斯將軍所率領的全軍，幸賴一个騎馬飛跑的奴隸趕在南部联邦軍隊的前面送來情报，才得以脫出了遭受襲击的危險^①。

在“解放宣言”發布前的几个月，黑人們就服务于联邦的事業，建筑工事，挖掘战壕，甚至在因为没有鞋必須赤着脚去踩鋤挖土时，也仍坚持着工作。另有些黑人則参加了修建鐵路，砍伐木材以供給汽船燃料，以及替政府裝卸船只等工作。他們也有些人在担任封鎖任务的联軍中工作，在那里当木工、裝卸工、舵工、炮手以及一般的水手等^②。

逃亡的奴隸常常能給联軍帶來有关南部联邦各种活动的重要情报。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有兩個黑人來到停泊在北卡罗來納州維尔民敦不远的海面上的孟梯西罗号軍艦上，对于南部联邦軍在新海口和济克島兩处的防御工事作了一个極為詳盡的描述。在联軍攻下这些工事以后，海軍当局对于這兩個奴隸所給的帮助曾特予嘉獎。已進入到敌区中的北部軍隊在尋找給养方面，也同样得到黑人奴隸很大的帮助。他們供給騎兵司令官新的馬匹以代替疲憊不堪的旧馬，并給因缺乏給养無法前進的軍隊送去大批的牛羊、粮食和草料^③。早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一日，“紐約論壇报”就建議联軍的司令官們用奴隸作斥候兵和偵探，并且警告联軍的軍官們說，誰要拒絕奴隸們的帮助，便等于是使联軍失去一支重要的同盟

軍。“他們熟悉地方的情況，習慣于避開大路，黑夜在森林中、在沼澤地區、在叢林中行走，他們有辦法避開別人的耳目，有辦法找到白人很難找到的食物”。

當武裝黑人得到法律的許可時，成千的黑人都參加了軍隊。到一八六四年，在聯軍中服務的黑人已達一八六，〇一七人，其中有一三四，一一一人系來自奴隸州。他們中間，共有六八，一七八人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紐約論壇報”曾就這一問題發表評論說：“為了爭取自由的事業，每三個黑人中就有一人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自認為是無限勇敢的我們自己，在這方面能趕上他們一半嗎？”^⑩

黑人士兵忍受了不可容忍的種族歧視。直到一八六四年七月以前他們所得到的薪餉都是低於白人士兵的；很少有黑人會得到過軍官的委任，而大部分的黑人都被迫在戰鬥任務外還要擔任許多勞苦的工作。然而，在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的領導下，黑人仍不斷地加入到軍隊中來，並且建立了不少卓越的戰功，陶格拉斯一再呼告他的同胞們，千萬不要讓對黑人歧視的心理使自己變成了瞎子而竟不能看清整個戰爭的重大意義了。黑人士兵共參加了一百九十八次大小戰役。一八六三年五月邦克斯將軍肯定地告訴林肯說：“若無他們（黑人軍隊）的幫助，哈得孫港的勝利，要在那個時候取得是不可能的。”^⑪ 這個黑人士兵團曾被遣去襲擊叛逆工事中的一個最主要的陣地，他們在進攻中的無可比擬的勇敢，使他們獲得了震動全國的聲譽。

一八六三年八月開始在一個黑人團擔任指揮的約翰·華星吞·愛木斯寫道：“在我到黑人的隊伍中來以前，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有人能以猛襲的方法攻奪敵人的工事，也從來沒有見到過有人俘獲

过敌人的大炮，更不知道还有將俘獲來的大炮立即用來反击敌人的这回事。但是我們的黑人战士在这些方面是从未失敗过的。”⁸²曾在佛罗里达州指揮过一个黑人支队的湯姆斯·希金生上校也曾对这一問題提出过同样的見証。他在一八六三年二月寫道：“如果誰想要用最勇敢的白人軍隊來完成(我)帶領着的黑人軍隊所順利完成的任务，那他簡直是患了瘋病了。”⁸³

然而使黑人士兵表現得最为突出的还是游击战。一小隊一小隊的黑人軍隊不断進入“叛逆地区”，毀掉敌人的倉庫、鹽厂和火藥庫，还帶回木材及其他北部所需要的物資。同时他們还常常給联軍帶回來新的士兵。一八六四年，北卡罗來納的一家报纸报道說：“在那片陰暗的戰場上，黑人的襲击所造成的殘暴凄慘的結果是沒有文字可以形容的。”⁸⁴

但任何人的貢獻也都比不上那个著名的女人——哈利特·塔布曼——的光輝成就。沒有人能比她更熟悉農村的地形，她在“地下鐵路”綫上多年的工作使她对于農村情况具有人所决不能及的知識。一八六三年，联軍方面同意她放下陸軍医院的护士工作，而去組織一个游击旅到南卡罗來納地区進行活动。挑选了一批熟悉当地情况的奴隸，她于是就和蒙特哥馬利上校在一起开始活动了。他們活动的情况可以在下面的一則电文中看出，該电曾于一八六三年七月十日在“波士頓联邦政治”上发表：

“哈利特·塔布曼

“蒙特哥馬利上校和他的三百个英勇的黑人士兵，在一个黑人妇女的領導下，突入敌区，給了敌人一个勇猛的、有力的打击，毀滅了价值千百万元的軍用倉庫、棉花、和無數巨大的建筑，在叛逆地区的腹心地帶造成極大的恐怖，并帶回了將近

八百个奴隶和价值千万元的物资，而我们却没有损失一个人或受到半点轻伤。这真是一个光荣无比的成就。”

远征回来之后，蒙特哥马利上校对那些新的士兵作了一次講演，接在他的后面演說的就是那个領導这次襲击、并且是在她的建議下才組織这次襲击的那一个黑色女人。

当一八六四年失敗主义分子压迫林肯放弃使用黑人軍隊的政策并遣散已在軍中服役的黑人时，林肯回答說：

“現在大約有二十万青壯年有色人种在美國的軍隊中服役，他們大多数都正拿着武器在保衛和擴張联邦的領土……。如果我們現在放弃掉由黑人所守衛的陣地；从我們这里抽出二十万人來而把他們放在敌人的戰場上和田地里去，那在三个礼拜之內，我們就不得不放弃整个的战争了。”^⑧

从工人的隊伍中，黑色工人同白色工人都在內，曾出了極大数目的真正战斗員参加了內战期間的战争。新英格蘭工会的机关报“波士頓夜声报”，在它結束关于劳工对北部的貢獻的評價时，表示着一种驕傲的情緒。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报宣称：“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曾在自由的旗帜之下前進着，以保衛政府权利的完整和維護法律的無上尊嚴。为了不使我們光荣的共和國被支解，他們放弃了自己的職業，离开了自己的家鄉，而把自己的鮮血作为牺牲貢獻到他們的祖國这个神壇的前面去。工人們坚强的右臂是我們國家在最危难时期的有力保障。每一个戰場都可以拿來作为他們忠于國家热爱自由的明証。”

第十六章

劳工与铜头蛇

内战时期劳工在战场上以及在迅速发展着的北部工厂中的贡献，实是美国历史中最使人为之鼓舞的一页。但是历史家们或者是忽视了劳工的作用，或者是仅把劳工与“征兵暴动”连在一起来予以评价。他们争辩着说，这些暴动活动，就可以证明劳工并没有热烈支持战争，“而自始至终只是偶然对它尽了一些力量，而且对于这一战争的各种最高的目标是完全拒绝接受的”①。

劳工和征兵问题

实际上劳工并没有反对征兵制度，而只是反对它们代表的阶级性，只征穷人，不征富人，只征人力，不征财富等。关于劳工的这种态度，当时著名的劳工刊物“芬区尔工会评论”和当时最重要的劳工代言人威廉·夕威斯都曾作过极明确的表示。该劳工报纸曾经说：“为了国家的利益，让我们实行征兵吧。但是让它在富人中也同在穷人中一样的实行。”② 夕威斯更说，如果工人们说他们决不参加军队，国会就会命令带武装的士兵到工厂中来，“强迫我们参加军队，而那样做也是完全对的……”。那么，现在如果国会需要钱，它不是也同样可以那样作吗？如果它有权利征调每一个人，它不是同样有权利可以征用每一块钱吗？”③

但是一八六三年所通过的征兵法则确是一种因人而施的法

令。其中有一條規定，使一個人可以完全合法地買一個替代的人或付出三百元的折價金就可以逃避兵役。其結果是，正如“全國反奴隸制旗幟”所指出的，這項法令等於授給“有錢階級一紙免除兵役的文狀”^④。有錢的資本家或他們的兒子在軍隊中幾乎是從來看不到，因此在軍隊中服務的差不多一律被認為是一班為社會所擯棄的人。賓夕法尼亞州，梅隆財富的創業者梅隆審判官對他的要想參軍的一個兒子說：“只有傻子才要去當兵。”^⑤

因此工人們對這種不公平的征兵法感到憤怒並不是什麼值得驚奇的事。而且各工會和勞工報紙，雖然一方面在發動要求修正該法令的運動，一方面仍極力勸告工人們服從法律。一般地說，工人們也都聽從了這種勸告，特別是那些有組織的工人們。但是一小部分工人，主要是無組織的工人們卻聽信了銅頭蛇的宣傳。

銅頭蛇充分地利用征兵法中所表現的階級性。他們裝出勞工的朋友的姿態，通過他們的報紙，痛斥該法令中所列允許凡“占有從人民手中搶奪來的三百元的‘綠背票’的人”就可以逃避服兵役的規定^⑥。一八六三年夏天，在紐約和其他城市的勞工區域中有無數印着“壯丁之歌”的傳單在四處流傳着。這裡只摘錄了其中最典型的一節：

我們來了，亞伯拉罕老爺子，一共三十萬人還有多，我們
離開了自己的田園和家人，心傷淚婆娑；

既然貧窮是我們的罪惡，我們只能恭敬地接受您的命令。

我們是一群窮人，那裡能有買取自由的金銀鏹^⑦。

銅頭蛇們問道，工人們參加戰爭是為了什麼目的呢？他們又回答說：“為了讓‘取消派的資本家們’能夠運些黑人到北部各城市來以代替那些為要求增加工資而進行罷工的愛爾蘭工人。”^⑧“紐

約銅头蛇”劝告工人們只服从那些“容許窮人和富人享受平等权利的法律”，而“每日新聞”則更寫道：“我們在这里敬告全國人民，我們全体公民的每兩個半人中必須有一个要被送到‘林肯公司’的停尸間里去。上天也不容！我們希望大家采取行动來制止这种暴行。”④

銅头蛇們的叛國活动帮助造成很多破坏性的征兵暴动流血惨案。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三日，在征兵剛开始后的几天內，紐約市的一群無組織的群众就拆毀了該市最主要的征兵站。接着有整整三天，这群暴民便在紐約市区中到处活动，击毀了造船所、鐵路、电車道，以及很多已关闭了的工厂和机器厂，打入很多重要的共和黨員的住宅和办公室，并打死和打伤了很多的黑人。在这次暴动被鎮压下去以前，已有四百多人死伤，和价值約在五百万元左右的財產被毀掉了⑤。

暴动同时还蔓延到其他的城市中去。在紐約州特洛依城的倫色列尔鐵工厂和阿尔巴尼制釘工厂的三百个工人在街头游行，高喊反对征兵，搶劫了“时报”报館，揚言要燒毀非洲教堂，并打破監獄放出了所有的犯人。在印第安納州的哈特福特、威士康辛州的華盛頓港，以及在宾夕法尼亞州的几个礦区中，許多征兵站的办公室都被搗毀，征兵官被驅逐出去。在礦区中，因为工人們怀疑礦厂老板們为了破坏礦工的工会組織曾請求征兵官特別增高礦区中的征兵名額，因而他們的憤怒是更为加强了*⑥。

-
- 負責在宾夕法尼亞州办理征兵事务的人員中，有一位很重要的后勤司令官是一个臭名远揚的反工会运动的煤礦厂主，这一事实更增加了工人們的怀疑。（見一九四一年威廉·伊特尔在南卡罗來納大学所寫但未發表的博士論文“內战时期宾州的征兵問題”，第一四四頁。）

銅頭蛇是部分地达到了他們的目的。他們吹噓着說：“沒有任何預謀的組織活動，工人階級就以武力來抗議聯邦的征兵制了，因为它將從……無數依人為生的家庭中奪去它們唯一的依靠。”^⑫然而，由印刷工人、制帽工人、木工、桌椅工人等工會的代​​表所組成的紐約民主共和工人協會却揭穿了銅頭蛇的這種謊言。該會在作了一次詳細的調查之後，聲明道：

“一八六三年的暴動事件，完全不是由紐約的工人發動的。它只是一群領導發亂的人們長期處心積慮的結果，他們煽起了一小部分但已足夠產生巨大惡果的人們的偏見……。紐約市的工人並不是暴徒。少數游離于感化院和黑牢之間的無行的狂徒並不能代表紐約市的工人。”^⑬

在許多工人的群眾大會上，大家也都指出，工人階級只有一小部分參加了暴動，而大多數參加在暴民群眾中的工人，完全是在如果實行抵抗即將被殺害的威脅下被拉出工廠的。就是那些實際抵抗征兵的團體也都早已動員了很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工人——參加了志願軍。大會更指出參加聯邦軍的愛爾蘭籍人口，按人口總數的比例說，是比土著美國人更多的。會上還有些發言人更談到了紐約著名的“戰鬥的第六十九團”以及其他英勇的愛爾蘭兵團的輝煌戰果^⑭。在紐約市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紐約房屋油漆工人協會的主席巴特立克·濟笛，宣讀了他致該會會員——大多數是愛爾蘭籍工人——的一封信：

“我絲毫不懷疑你們中間會有任何人參加了最近的暴動活動。以你們對於自己的利益的深切了解，你們是決不會那樣作的；但是你們應該從各方面發揮你們的影響以制止類似的可恥的情況再有發生的可能——那種情況已證明正直的

工人是不会参加这种活动的，参加的只有本市或附近城市来的强盗流氓们，他们一生也从没有好好地作过一天工，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征兵，而是为了抢劫……。

“因此，作为你们的一个朋友，我请求你们尽一切的力量防止这种大批杀害生命、大量毁灭财产的惨剧重演，而这种惨剧乃是这一类的暴动活动的必然结果。

“我已经看到了被逮捕的人的名单，其中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油漆工人的名字。这自然是很值得嘉许的一件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城里是住着很多的油漆工人的。你们能够永远保持这种清白的历史吗？你们能够尽一切的力量劝服那些没有到会的人们也这样作吗？”^⑮

工会主义者指出，在暴动的混乱情况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一群社会主义分子曾冒险突入愤怒的暴民中散发传单，劝告工人们：“拥护联邦、宪法和法律！……回去好好地工作！”^⑯

“拥护联邦！”在整个战争期间各工会及各劳工报纸都曾一再喊出这个口号。一八六三年十月，当林肯总统号召再动员三十万人入伍时，“芬区尔工会评论”立即呼吁工人起来响应，因为“弟兄们，如果我们不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之下，我们就将要失去我们的国家了”^⑰。三个多月以后，这个劳工报纸，“因深明劳工阶级是能够使它的号召不落空的，因而以骄傲的心情”迎接了又一次的征兵运动。这一次，劳工报纸并利用这个机会警告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政府，“注意不要再轻视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民族的意志了，他们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他们所坚守的原则的”^⑱。

銅頭蛇的宣傳

若沒有有組織的勞工和勞工報紙的積極努力，銅頭蛇們是很可能在他們企圖徹底癱化美國政府的戰爭力量的叛逆活動中獲得勝利的。同時，銅頭蛇們的陰謀，還不僅限于制造暴動這一方面。他們還發動了一個運動，要求和奴隸主貴族們進行和談。收割機大王，銅頭蛇的头目之一西拉斯·麥克科爾米克曾狂喊着說：“停止戰爭！”“宣布停戰！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以討論媾和的條件……。”^①

因為銅頭蛇們懼怕內戰將要造成像“法國大革命時所不幸產生的那種恐怖統治”的一次革命戰爭。他們說，取消主義者是“一群狂徒和革命論者”，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②。

同時，他們又裝出勞工利益的熱烈擁護者姿態，極力論爭說：擁護戰爭，繼續戰爭，對於勞工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銅頭蛇們更喊叫着說，征兵法中所規定的容許頂替一款，實是“政府當局無時不欲犧牲窮人以照顧富人利益的又一證明”。此外，他們更進一步地爭辯說，政府現行的政策就是有意容許廠主們加強對於窮人的剝削的。現在的戰爭是要在美國造成一個“像英國那樣的制度，它將使人民群眾日益貧困，而把他們的勞動所得全部搶奪去以供養驕奢淫佚的貴族們”。戰爭已經以多數人為犧牲而使少數人大發其財，已經使得“富的更富，窮的更窮”了，已經在強迫工人們“接受使他們的生活費用增加百分之一百、二百有時甚至是百分之三百的貶值貨幣，作為他們的勞動報酬”。然而還有更糟糕的是，銅頭蛇們繼續發揮議論說，“解放宣言”將成千上萬的黑人散放到北部來了，他們擠掉了白色工人的工作，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並組成

了一支罢工破坏分子的军队，以便“镇压白人劳工阶级”^①。

战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幸赖劳工阶级对于内战的各种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因而很少工人受到铜头蛇宣传的迷惑，因为，他们所提出的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穷的说法，实在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战争一开始，由于失去了南部市场，由于近三亿元的南部借款倒账，商业立刻陷入严重的危机中了。但在政府开始有计划地订购战争物资时，情况就已大为改变。

一批新的百万富翁出现了，而他们的财产则主要是依靠在美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的贪赃枉法行为得来的。行同拆白党的承包商卖给政府的枪枝一发放就会炸掉兵士的手。政府买糖，而拿到手的往往是砂子；买咖啡，得到的是裸麦；买衣服和氈子，得到的只是以工厂的废料所制成的一些旧东西；买来的鞋子，则是极坏的皮子和纸鞋子连缀在一起的玩艺儿^②。被派往海上去的水兵们所乘坐的船只是用嫩树枝制成的，“上面装的是早该送到旧货摊上去的机器”；可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内，乔治·摩尔根仅从出售这种船只一项，就获利九五，〇〇八元。兵士们穿的军装一着雨就变成了一塊塊的布片兒，但是承包商就依靠卖给政府这样的装备聚积自己的财富。更有些人则借和敌人进行非法的贸易大开财源。

而在这个时候，工人的生活水平则急剧地下降着。在投机买卖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食物、衣服和房租都直线上涨，而工资却仍然如故，或极慢地略有增加。工业品的批发价格一八六三年比一八六〇年增高了百分之五十九；到一八六四年更增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一八六五年亦增高了百分之一百零七^③。如果按绝对

必需品的價格計算，高漲的情形則更為驚人。一八六一年，紐約市牛奶的購價是每夸爾一分五厘；但到一八六四年，每夸爾就漲到一角錢。黃油在一八六一年四月每磅價格是四分，而到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時，則每磅漲至二角五分錢。在一八六一年冬季每桶售價六元的牛肉，到了一八六四年冬季就漲到十三元。一八六一年冬季，煤價是每噸五元五角，在三年之後就漲到了十一元^②。一八六四年，“紐約論壇報”指出：生活費用已經增加了一倍，“而工資只比戰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至二十左右，因此許多的家庭已處在極端的貧困中，成千成萬應當上學的孩子們，都因為要讓他們賺幾個錢來補助家用而被關到工廠去作工去了”^③。

國會的法令和財政政策更幫助加重了勞工的困苦。一八六二年國會通過了一項農地私有條例，規定凡願在公共土地上連續耕種五年者，都可以得到一百六十畝面積的土地。自從喬治·亨利·伊文斯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發動以來，勞工和西部農民所一直共同要求的一項政策算是終於實現了。但是這個法令又規定，耕種土地的人在六個月之內可以以每畝一元二角五分錢的價格購買他所耕種的那一部分土地。於是，在許多真正願意就農的人口還沒有來得及利用農地私有條例所給予他們的這個機會以前，為土地投機商作爪牙的一批假“農民”就立刻出來圈定土地，要求備案了，到了六個月之後，他們就可以任意挑選着購買。不要很久，大部分最好的農地都已完全落在土地投機商的手中了。

而這種強奪土地的方式還只不過是一個大的搶奪運動中的一個方面。國會撥給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四年間批准的聯邦太平

• 內戰末期，勞工的生活開始略見好轉，這一方面是由於工人的工作機會增多，‘淨得的工資’已隨之增加，一方面也是由於工會鬥爭的結果。

洋、中太平洋和北太平洋等鐵路公司的公共土地共有七千余万畝，此外又共撥給各州一億四千万畝。但是不久，这些土地也都为土地投机商所有了。

行騙，貪污，搶奪土地——這就是大部分美國大富翁財富的來源。而他們的这些財富，又由于政府所实行的財政政策，更進一步地增大起來。在戰爭期間所發行的綠背票貶值的結果，最后低到一元紙幣只能換到四角金元。但因為这种法定的紙幣在購買政府公債時是可以照面額使用的，于是手中有現款的人就爭着向这里來投資。他們所獲利潤，据估計在百分之三百至四百左右。一方面士兵和工人所拿到的薪餉或工資是每元只值五、六角錢的綠背票，一方面國會却向債券所有人保證，他們一定可以得到一元值十角的金元⁽²⁶⁾。

一八六四年合同劳工法的施行，則更進一步增高了他們的利潤。这种經法律許可的，同願意來美國工作的外國工人所訂立的合同，一方面向商人們保證，这些工人決不会被征調入伍，同时还使为美國厂主們充当代理人的美國移民公司得到了合法的地位。工人們在离开欧洲以前，必須和移民公司簽訂一种合同，按照合同的規定，这些移民也就差不多降低到和“合同雇工”相等的地位了*⁽²⁷⁾。在这項法案于一八六八年被廢除之前，它已經給各工厂供給了數千名可以經常用來破坏罢工运动的工人。

在为“鼓励移民入境法案”所激怒的情况之下，劳工們明白表

* 該法令規定：“一切移民已簽訂的、保證將以為期不超過十二个月的劳动所得償還其移民过程中所花的費用的合同均在法律上生效，并可由美國法庭強制執行……同时，此項預付工資对于移民在此后所得土地亦有扣押抵償之权。”（見“美國法令一覽”第八卷，第三八六頁，）

示，他們雖然不願阻止外國工人入境，但他們堅決反對利用外國工人們來減低工資，破壞罷工。

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芬區爾工會評論”說：

“通過我們一致的努力和緊密的團結，我們已將工資標準提高到使我們略可分享一點安適生活以為我們終日辛勤勞苦的唯一慰藉的程度了；因此，如有任何人跑到工廠里來，打算以較低的工價擠掉別人的位置，我們將不僅認為他是不義之徒，而且將認為他是人類的敵人。”

戰時的罷工運動

勞工階級很不願讓罷工運動妨礙了戰爭的進行。因此他們請求廠主們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他們的困難，應允增加工資，並且要求政府控制物價，以使生活費用能降低到戰前的水平。“芬區爾工會評論”說：“我們，數百萬工人們，只要一切生活必需品仍能保持和平時期的價格，願意接受和平時期的工價；但如果我們買東西時必須付戰爭時期的價錢，那我們就必須要得到戰爭時期的工價。”^②

但是政府始終沒有作任何控制物價的努力。而且，正如我們前面所談到的，當時的財政政策，卻只是幫助促使情況更加惡化的。至於大多數的老板們却完全明白自己當時所處的有利地位，是決不願去聽那些理性的和愛國的呼聲的。

在這種情況下，勞工除了進行罷工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勞工的領袖們，包括威廉·夕威斯在內，都承認罷工是一件“極不幸的事”。但是，如“芬區爾工會評論”所說：“那麼，工人能怎樣辦呢？”夕威斯曾經講過一段話，那是代表着許多工人的意見的，他說：“如果事情逼到我們頭上，我們也無法逃避。如果資本家們堅決要逼

得我們無路可走，要使我們陷于貧困和只能靠行乞過活的境地，要剝奪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所應享的權利，因而引起強烈的鬥爭的話，那是應由他們負一切責任的。”^⑳

因此，在大多數的罷工運動中，工人始終是把責任放在資本家的身上，而這件大事是很值得注意的。他們化錢在報紙上登廣告，列舉生活費用上漲的情況，指出“那些從政府訂購合同中獲取暴利的老板們的”橫蠻態度。他們因此“以忠誠的公民、聯邦政府的堅強不屈的朋友和高尚的技工的身份”，呼喚大家起來支援他們這種被迫進行的鬥爭^㉑。

許多資本家自然立刻向政府施加壓力，使其禁止罷工，逮捕罷工工人。那些以自己的罪惡貪污活動嚴重地損害着戰爭進行的人們，這時却都出來呼喊着說，如果政府當局不援助他們，軍用物資的生產事業就將要受到嚴重的損害了。例如，曾經抬高煤價的密蘇里的煤礦老板們在一八六三年礦工舉行罷工的時候，便向政府提議說，既然政府“確屬必須得到充分而經常的煤的供給”，它就應該派出聯軍來驅逐罷工工人^㉒。

聯軍的將軍們立即響應了廠主們的這種呼喚，一八六四年四月，威廉·羅斯克蘭斯少將從他的聖路易司令部發出了第六十五號命令，禁止從事軍事生產的工人成立組織，禁止工人組織罷工糾察隊，保證武力保護工賊，並將敢于組織工會的工人們都列入黑名單。柏布利智將軍也從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發布了同樣的命令。據說他是“深得廠主們的信任，並對他們的一切計劃都極為熟悉的”^{㉓*}。

* 當時也有某些少數的將軍是同情勞工階級的。班哲明·伯特勒將軍便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當他率領聯邦軍到達新奧爾良的時候，他看到成千失業的工

这些命令都实行了。在紐約州的冷泉，联邦軍就被派出鎮压巴洛得兵工厂的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的罢工运动。有四个工人被捕，并被扣押了七个星期，不加審判，也不許回家，最后他們和他們的家屬都被驅出本城境外。在聖路易，举行罢工的机工和成衣工人，在刺刀的威脅下，被迫复工。在田納西州，湯姆斯將軍逮捕了兩百名罢工的技工，并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境”^③。勒定鐵路公司机工的罢工和宾夕法尼亞州提奧加郡礦工协会所領導的罢工运动，也都遭到了軍隊的鎮压。

政府竟然会听从那些吸尽全國脂髓以自肥的投机商和承办商們的意見，这使得工人階級感到無比的憤怒。“芬区尔工会評論”問道：难道僅只去攻打“國家的敌人，而不在后方更与本國的同胞進行战斗”，这对于联軍中的工人們还不够嗎？^④“这个我們大家所热爱的政府，这个至少已有二十五万工人同胞为了保护它、支持它已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不止一百万工人弟兄在今天还正在和要想毀滅它的敌人作殊死战的政府，真要僅僅为了人民中一点意見上

人，都已陷于飢餓不堪束手待斃的境地。食物的价格已經漲到他們絕對無力購買的程度：面包賣兩角錢一塊，面粉賣十四元一桶。伯特勒于是开始限制物价，并且讓南部联邦的債券所有人和商人們納稅，救济失業工人。在这些有錢的人們提出抗議的時候，伯特勒就直截了當的對他們說：“窮人必須要有工作，有飯吃，你們必須吐出一部分贖款。如果當你們自己舒服地躺在安樂椅上，嘗珍饈，飲美酒，衣錦繡，出外時坐着堂皇富麗的馬車的時候，硬要想讓瘦削的餓影游蕩在一度繁榮的街頭，讓貧困跟在失去工作權利的餓影后面予以不堪的嘲笑，老實說，那就不可以。”有錢的人終於吐出了約達三十五萬元的贖款。這些錢完全用于對貧民的救济上。每月以價值七萬元的食物分配給九，七〇七家貧民，以兩千元補助五個孤兒院和寡婦救济院，并以五千元捐給慈善醫院。同時，伯特勒又采行了一些以工代賑的方法以救济失業工人。市政府雇了一千多工人打掃街道，修理碼頭。（見一九三七年霍華德·約翰遜在耶魯大學所寫但未發表的博士論文，“伯特勒將軍時期的新奧爾良”。）

的分歧，竟动员武装的公民来和自己的同胞开战吗？”³⁵

当时著名的工会运动的领袖们，都不断的警告政府说，任何为了帮助资本家而采取的反劳工的措施，是都将增强铜头蛇的宣傳在工人階級中的影响的³⁶。

铜头蛇运动的失败

看到南部联邦已絕無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了，铜头蛇们乃加强其企图通过和谈以立即结束战争的活动，他们警告工人们说，如果工人们不迅速设法以求在满足南部利益的前提下结束战争，资本家和政府兩方面的联合力量将加在他们身上的鎖鏈，要比一般所假想的黑奴们所背負的鎖鏈更为沉重³⁷。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紐約每日新聞”說：“和平就可以停止屠殺，可以制止社会道德更进一步地墮落——可以改变陷劳工于飢餓境地的物价……。”

但是铜头蛇们并没有能够煽动劳工们去采取背叛國家的行动。虽然也有一部分工人受到了铜头蛇宣傳的毒害*，但大部分劳工是完全拒絕他們的那一套論調的。他們也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結

-
- * 一个与铜头蛇运动有关系的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工会运动者爱莉莎·麥克康納斯，竟能影响芝加哥各業工人大会，使其通过了一項以战争与工人無关为理由，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建議。麥克康納斯在其为芝加哥的一次工人大会所起草的一項決議中說：“目前的战争，不是为了什么有关北部工人的事件所引起的，也不是在他們的領導下進行的，更不是为了他們的利益在繼續堅持下去——他們在战争中的唯一地位，就是担負战争的浩大費用，和在戰場上流尽自己的鮮血。”（見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四日“芝加哥論壇報”。）但芝加哥机械工与鉄工工会却拒絕与麥克康納斯所領導的这种反战运动發生任何关系，并公开指出这种运动乃是在铜头蛇的控制下進行着的。（見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四日“芝加哥論壇報”，及一八六四年十月八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束，但是，他們說，這個結束必須是勝利的結束。聯邦軍中有一個署名“聯邦人”的士兵寫信給“芬區爾工會評論”，要求該報團結後方的全部勞工起來反對和談。這封信獲得了北部各個工會組織的贊同。他在信內說：

“我們犧牲家庭中的幸福，犧牲和朋友們的友情的交往，犧牲世界上我們所珍愛的一切，自願地來到這裡，乃是為了戰勝一次萬惡的叛亂活動以保衛我們的憲法和聯邦，多年以來這種叛亂活動通過它秘密進行的罪惡勾當，積蓄力量，已一度威脅着要顛復整個國家了。

“我們聯邦的兵士們，回看一下那洒遍了千萬個遭殺害的同志們的鮮血、鋪滿了他們的白骨的無數戰場，耳听着自己腳下的土地都正在發出要求復仇的呼聲時，除了武裝反抗這個上帝所給予人類的最好的政府的那些叛徒們全部屈服外，是沒有任何其他的條件可以使我們接受和平的。”^③

在後方，勞工們也向政府保證決心幫助政府徹底平復叛亂。機械工與鐵工工會於一八六四年八月底在費列得爾菲亞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實在說，他們在資本家和政府官吏的手中所遭受到的痛苦，是很少工人曾經遭受過的。然而他們仍然決議說，消除工人階級痛苦的道路是在戰場上徹底摧毀南部聯邦。大會的決議說：

“決議：除開我們對於家庭的責任，對於工人弟兄們（成千成萬的工人弟兄現已都在軍隊中了）的責任，以及作為公民對國家所應盡的責任外，我們作為工人所應維護的權利和利益也都要求我們盡我們所有的力量以幫助政府消滅這種極端罪惡、極端無理的叛亂活動。

“決議：不管在一些較細微的問題上我們有着何種意見上的分歧，但當這有關我們偉大共和國存亡的問題發生時，我們工人們一定將堅強地團結起來，以保衛不朽的傑克遜所提出的原則：‘聯邦必須，而且絕對要保持下去。’”^⑳

可以在這裡引述的同樣的決議是不下數十種的^㉑。它們都證明了銅頭蛇們所發動的企圖使工人們對於發戰爭財的人和資本家們的憤恨改變為對於戰爭本身的憤恨的這一運動是完全失敗了。這種失敗的造成，我們不能忘記，絕大部分是有賴於各工會的領袖和勞工報紙的努力的。他們曾經經常不斷地讓工人們注意到必須很仔細地將資本家和政府區別開來。

沒有人會像威廉·夕威斯那樣激動地駁斥過派兵鎮壓罷工運動的舉動，然而他却始終沒有肯把過錯放在政府和林肯的身上，他說：“政府和林肯始終只看到問題的一方面。而我們有責任把我們這一方面的問題讓他們知道，如果那時他們還要讓類似的事情發生，我們就可以責備他們了。”為說明這一問題，夕威斯更引述斯庫基爾礦工工會的情況作為例子。因為該會的工人們自己並沒有盡他們的努力讓政府了解他們的痛苦情況，於是資本家們才能使華盛頓的政府當局相信礦工們聯合起來的“目的是為了背叛政府”。因此，夕威斯說，教育政府乃是勞工的責任^㉒。

“芬區爾工會評論”同意夕威斯的意見。該報亦宣稱說，應該對勞工所忍受的殘暴的壓迫負責任的，不是林肯，而是“那些有辱自己所處的地位而又濫用其職權的驟登顯貴的官吏們”。各勞工報紙都相信，一旦總統得悉這種糾紛的真實情況時，他一定會站在維護勞工的立場上來的^㉓。

勞工轉向林肯

因此，工人們便轉向林肯，要求他解除他們的災難。據謁見過林肯的一個女工的委員會報告說，林肯在“聽到她們受苦和被壓迫的情況時，大為感動”。委員會報告說，他極為同情地告訴他的軍需司令：“如果今後你能够設法讓這些女工在擔負製造政府訂購的軍用物資時，得到她們應得的勞力報酬，我將認為我个人也應對你感恩不盡。”^④此外，有一次當造船所的工人們為了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的時候，林肯却提出要陸軍和海軍的將領去和勞工進行商談以解決罷工問題。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海軍軍官蒙特哥馬利副少將，因為拒絕和布魯克林海軍造船所的工人代表進行商談，並開除了一些進行工會活動的工人，乃奉令由斯特靈漢海軍上將代替他的職務。一位工會的工作人員寫道：這一新的任命，使大家普遍感到滿意，這件事同時保證說，“政府對於它所雇用的人員是一定要保持正當的態度的。”新的司令官並立即讓被開除的工人復職了^④。一年以後，當羅斯克蘭斯將軍派兵鎮壓聖路易印刷工人工會的罷工運動時，印刷工人們也向林肯提出呼嘯。在他們的呼嘯書中，他們提醒國家元首記起他自己在一八六〇年曾說過的話：“感謝上帝，在我們的制度下，工人是可以舉行罷工的。”林肯乃下令禁止“聯邦政府的官吏干涉勞工的合法要求”，並命令立即將軍隊撤回^⑤。

但是引起工人們對於林肯發生最高熱愛的，還是在紐約機械工與鐵工工會的代們於白宮中會見總統後所作的一次報告。一八六三年秋天，該會約有會員七千人，為了要求增加工資以適應生活費用日益高漲的情況，舉行了罷工。廠主們乃向華盛頓方面提

出要求，希望延長訂購合同的期限以便击败工人的罢工运动。机械工与铁工工会因此立即派遣一个委员会到华盛顿去謁見总统。随同代表們会见总统的一位記者記載当时会谈的情况如下：

“我們一進去时被接待的情况，就肯定地表明，这位可敬的老先生并没有將他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和他在草原州*时所使用过的大槌和木楔一同抛弃掉。在听完我們的报告之后，他告訴我們，以总统的身分說，他是什么办法也沒有的，但以亞伯拉罕·林肯的身分說，他完全同情我們，同时，因为他是在農村中長大的，他自己从來也沒有参加过任何罢工活动。他所唯一見過的一次，是麻薩諸塞州嘿味立尔制鞋工人的罢工……在这次罢工运动中，工人战胜了老板。至于目前的罢工运动，他認為厂主們是首先举行罢工的人，因为他們拒絕接受工人們所提出的条件，强迫工人們停止工作了……那末，現在既然兩方面都進行罢工，还是讓最优秀的人們勝利吧。然后他又建議代表們去会见海軍部長，要后者立即接見他們，他們到那里拿出这封信，因也立即被接見了……。海軍部長乃向我們的委员会保證說：除了國会有这种权利外，海軍部里是沒有任何人有权允許延長合同時間的。”

委员会向該工会會員所作的报告“是在劇烈的欢呼声中進行的，大会在向总统、海軍部和他們的公正处理的三呼万歲的欢声中閉幕”⁽⁴⁶⁾。

不久以后，机械工人工会听到一种謠言，說厂主們已經得到允許延長了合同期限，于是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去。代表人

* 伊利諾州的別名。——譯者

之一馬尔孔·麥克里德曾为“芬区尔工会評論”寫了一篇叙述代表們被接見的經過情形的报告。林肯告訴代表們，关于合同的事他是一無所知的，因此他仍建議他們去見海軍部長。同时，他交給那些工会运动者一个短簡，上面寫道：“衛尔茲部長，請接見并傾听这几位先生的意見。（簽名）林肯。”

麥克里德接着說：

“林肯先生又詢問关于我們的工資的情況——現在拿多少，要求增加多少。听到我們的回答后，他說：‘工人們的生活自然一定很困难。虽然我住在这里，我的生活也并不很闊綽。但是，我現在的生活費用仍比兩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当代表們問林肯，究竟同情罢工的那一方面的時候，他回答說，以自己所处的總統地位，他不能公开表示站在那一方面。但他又接着說：“我深知工人們艰难困苦的情況，我常常想到他們。我知道，差不多在每一次罢工事件中，工人們都是有正当的理由提出要求的。”代表們接着拜見了海軍部長，他的态度，据麥克里德說，“是比他的上司冷淡得多的”。然而，他也仍肯定地告訴工会运动者們說，他們的老板並沒有得到延長合同期限的許可。麥克里德最后以下面的話結束他的报告，这一段話好几个月后都还在工人們当中傳述着：

“如果僅僅說總統曾以仁慈謙和的态度接見了工人們的卑微的代表們，因而他就值得全國工人的衷心感戴，那是很不够表达我們对他的崇敬的。如果再有人說工人們不應該進行團結，那就請他看一看我們的元首吧——他对待工人代表們的态度是謙和而直爽的。要去見老亞伯，我決不用換衣服，穿着工人服就行了。”^①

林肯常常是不甚热心以强力去对付铜头蛇的（他甚至撤销了博恩赛德将军所发出的查封罪恶的“芝加哥时报”的命令）。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工人们知道他们可以向“白宫”寻求支持，铜头蛇们是可能在企图使劳工转而反对战争方面获得更大成功的。

劳工报纸所起的作用

铜头蛇运动在工人群众中基本上是没有成功的，因为大部分的工人都了解，他们的命运乃系之于战场上的胜负。但推动工人使他们有这种了解的功劳，大部分是要归之于如“芬区尔工会评论”及“钢铁论坛”等劳工报纸的。“芬区尔工会评论”一再申述工人们进行组织的权利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和这一斗争分不开的。因此，该报说，虽然一方面劳工必须组织起来以摆脱战争加予他们的重担，但另一方面仍必须不惜作一切必要的牺牲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同时，如果劳工认识到，这次叛乱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实现一个“要在毁灭劳工一切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政府……的企图”，如果他们了解，他们现在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将来，而且是为了全世界的工人，那他们也就会觉得更容易忍受这种牺牲了。“芬区尔工会评论”说，“我们所作出的例子，已经给世界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已经使各国人民得到他们的政府方面的某些让步。”劳工是不能容忍这些已获得的成果被破坏掉的^④。

第二个劳工报纸，即由纽约印刷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们所编辑和发行的“钢铁论坛”，也对这一理论多方发挥。这个工人刊物在每期中都一再强调说，这一次战争决不仅仅只是为了应由那一阶级或那一政党来控制政府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改革内政或

實行農地私有法的問題，不管這些問題本身是如何重要：

“我們所進行的鬥爭是牽涉着一種比這一切都更為重大的問題的，因此，每一個工人都必須明確地認清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願意成爲一個自由人，願意讓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們享受自由的幸福——如果他要想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南部的工人——如果他忠心於全世界勞工的利益，他就應該積極工作，利用自己的選舉權以求消滅叛亂，並不惜犧牲一切以保衛政府。”^{④9}

“鋼鐵論壇”更發動工人階級支持主戰派的候選人。一八六一年十月，它發動了爲“人民聯合候選人”競選的運動，這些候選人是在紐約州擁護聯邦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大會上提出的。它向紐約市的工人提出：“不投任何政黨的票，也不選舉任何黨派的候選人。”“讓這一偉大城市中全體工人像一個堅強團結着的組織，一致選舉‘人民聯合候選人’……。讓我們的選票證明我們對於聯邦的重視是遠過於黨派政治的。”^{⑤0}結果，“人民聯合候選人”在選舉中大獲全勝。

一年後，“鋼鐵論壇”又號召在紐約組織一個民主共和黨，以便使主戰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團結起來。但不幸民主黨却拒絕合作，因此選票就被分散了^{⑤1}。

由於紐約的民主黨拒絕在主戰的綱領下進行聯合，因此，一個名爲民主同盟的組織便於一八六三年五月成立了。這個組織包括一切對政府忠心並擁護主戰候選人的民主黨人。“鋼鐵論壇”的編輯威廉·阿蘭德·布尔恩乃是該同盟的執行委員會中的勞工代表^{⑤2}。

民主共和工人协会

一八六四年初，“鋼鐵論壇”的編輯們和其他一些工会运动者共同組織了紐約民主共和工人协会，因而進一步擴大了支持战争的运动。接着，在芝加哥、波士頓和費列得尔菲亞等地，也都有类似的組織成立起來，并各設通信委員會以便彼此联系^④。这些协会的目的在于團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工人，以支持联合候选人，教育工人使他們了解有关战争的基本問題，以及團結工人階級全力支援政府。一八六四年三月，該协会的負責人員謁見了林肯总统，并把劳工們要决心支持他的保證帶了給他。林肯回答他們說，这次战争，对于任何階級的利益都不像对于工人們的利益有那么重大的关系。他劝告工人們“要防止偏見，防止在自己之間發生分裂和彼此仇視的情況”；并遺憾地提到，当紐約的征兵暴动事件發生时，有些工人被另外一些工人殺害了。接着他說：“这种事情决不能再容許發生了。除家人关系外，維護人类彼此同情感的最坚强的联系，應該是全世界不分國籍、不分語言、不分种族的一切劳动人民之間的联系。”^⑤

在一八六四年这次有極大重要性的总统选举运动中，民主共和工人协会積極活动以求使林肯再度当选。在致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麥克可利蘭將軍信中，該协会提請他注意，“作为一个階級”來說，劳工的利益是系之于战争的勝敗的。該信接着說，國家，現在是正处于一种“民主政治对貴族政治及專制政治作殊死战的斗争中”。因此，这次大选的結果如何，对于工人是有極大的重要性。最后，該协会在信中向麥克可利蘭提出了下列的問題：

“1、如果你当选了总统，你是否將認為自己是統轄第一个

脫離聯邦的宣言發布前的全部聯邦領土的美國聯邦總統？

“2、如果你擔任了總統職位，你是否願採取最有效的策略以反對國內外的一切敵人？

“3、你是否將認為美國聯邦的領土範圍應包括第一個脫離聯邦的宣言發布以前的全部土地？

“4、在你擔任了總統職位之後，你是否將承認南部聯邦的獨立地位以此作為進行和談的第一步？”^⑤

但是這位銅頭蛇中的英雄卻拒絕作答。民主共和工人協會將這一事實廣為宣傳，並進而加強重選林肯的運動。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許多工會打破以往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傳統，也都參加了協會所發動的運動。

於是，紐約市的技工工會乃在該協會的請求之下，召集了一次特別會員大會，首先採取了具體的行動。該會主席在一封公開信中說：

“每一個人，不論他的地位是多麼低，都必須要慎重地投票的時候已經到來了。本來是不容許有人在我們的會議室中討論政治問題的。然而，現在為了即將到來的選舉鬥爭，我們卻作為一個政治團體組織起來了，在這裡，……有人提議擁護聯合候選人名單……經過相當時間的討論之後，這個提議幾乎是全體一致地通過了。”^⑥

有些擁護聯邦的觀察家懼怕“糧食價格奇昂”的事實將驅使工人們加入銅頭蛇的陣營^⑦，但仔細檢查一下整個競選運動期中的“紐約每日新聞”，也找不出任何例子，可以說明曾有一個工會或工人協會通過贊成和談的決議，或贊成過讓麥克可利蘭當選*。

結果，林肯除開三個州外，在各州的選舉中都獲得了全部勝

利。美國人民已經下定決心要取得战争的勝利，挽救联邦。

最后的勝利

國際工人协会常务委员会，由馬克思起草，以全欧洲工人的名义致書林肯总统。一方面向美國人民祝賀林肯的再度当选，一方面对于將由林肯來領導美國進行这一战争表示慶賀，因为这个战争乃是标志着工人階級的一个新时代的起点的。馬克思寫道：“从美國的这次巨大的斗争，欧洲的工人們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所屬的階級的命运是維系在美國星光燦爛的國旗上的。”因此他們以“極大的耐性”忍受着“因棉花的恐慌所造成的困苦情况，積極地反对有利于奴隸政权的干涉——尽管那些比他們地位高的人們曾一再那样强求——而欧洲各个部分的工人們也都为这一正义的事業貢獻了自己的鮮血”^⑧。

在美國國內，工人們也同樣是以極大的耐性在忍受着战争所帶來各种困苦。銅头蛇們一方面援助南部的奴隸主，一方面，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用尽一切方法以利用工人階級对于發战争財的人們的仇恨心理。但是他們的活動是終于失敗了。工人們仍不斷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以爭取联邦的勝利，他們在礦坑中、在煉鋼廠和造船廠中、在鋪鐵軌、在开动紡織機以及制鞋的工作中，每天勞苦地工作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劳工

-
- 一八六四年初夏，曾有一个紐約市与郡工人政治联合会成立起來，以为麥克利蘭活動競選。这个機關不过是民主党的一个虛招，紐約的許多工会中并没有一个对它表示任何兴趣的。这个虛構的組織的主席麥克唐諾·伯克林就是民主党的組織人之一。（見一八六四年八月五日“紐約每日新聞”及約瑟夫·亞當·薩格特于一九三九年在威士康辛大學所寫未發表的碩士論文，“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國內战争时期的北部劳工”，第一—四頁。）

的支援，內戰的結果一定會是那認為一切工人都應變成奴隸的奴隸政權的勝利。威廉·夕威斯有一段話簡括地綜述了勞工在內戰時期所起的作用，他于一八六五年一月在芝加哥召開的國際鑄工工會的代表大會上講道：

“我想，我完全用不着提出什麼論證來以證明占全國人民中大多數的、作為國家的骨幹和中堅、作為我們的自由神壇唯一支柱的工人是忠於國家的；如果那樣做，我認為，那等於是嘲弄他們，等於是有意損傷他們，侮辱他們；誰要想詳細知道我們忠於國家的事實證明，只要去翻一翻戰爭時期的歷史就夠了；他只要看一看：當武裝的叛國活動、叛亂運動正威脅着要徹底摧毀我們的一切制度的時候，當本國驕橫的富人們正陰謀顛覆我國政府的時候，而千百萬的勞動人民却筑成了一道鐵石般的壁壘，屹立在國家的一切敵人的前面。”^⑤

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的工人們告訴統治階級說，在將來他們是要在以他們的力量所保存下來的民主制度中，充分地享受他們應得的正當權利的。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波士頓工人在凡勒伊大廳舉行的一次群眾大會所作的決議中有如下的一段：

“……南部謀反的貴族政權被推翻了……現在……在我們勝利旗幟的光輝之下，每一個人不分地域、種族或膚色，都得到了自由人的權利，這是值得我們為之慶賀的。但是，當我們一方面決心以極大的忍耐來承擔國家的債務時，一方面我們必須要大家知道，在將來美國工人一定要要求更公允地分享他們的辛勞所創造的財富……更平等地享受到一切自由制度——依靠他們的英勇從無數浴血的戰鬥中保存下來的自由制度——下的特權和幸福。”^⑥

第十七章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六年的劳工运动

在内战初期，工会运动几乎是完全停止了。很多勉强渡过了一八五七年的大恐慌和南北分裂危机的工会，在第一次組織义勇军的号召發出后，也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會員了。在此后还能繼續透露一綫生气的組織，却又在战争初期的不景气的現象下受到了嚴重的影响。

全國性的工会則是和地方性的劳工組織一样的不幸，而那些以南部的地方工会为基础的則更是特別地削弱了。一八六一年年底，許多地方性的鑄工工会已瀕于消滅的境地，因此，預备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就根本沒有能够舉行。全國机械工与鉄工工会的主席卡辛更沮丧得連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召開的全國會議也沒有出席。該會的全國总書記乔納桑·芬区尔在这次会上（在匹茲堡舉行的）只見到了很少几位尙抱乐观的代表。但是，当芬区尔報告說，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时还存在着的八十七个地方工会現在只剩下三十个了，會員人数也自一八六一年四月起已由二，七一七人降到一，八九八人的时候，这几位代表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就低落下來了①。

然而，就在这种極度困难的时期，在这有組織劳工的活动似乎已陷于絕望境地的时期，却还有一些組織表現着相当活躍的气象。在紐約、波士頓和費列得尔菲亞等地都还有好些工会仍很經常地

舉行會議，多少維持着一個沒有中斷的組織形式。更有些工會甚至還在設法進行要求提高工資的活動。但整個地說起來，工會運動這時實是在日益衰落中了。

工會復興的原因

但是，美國勞工運動的一個新時代已漸漸來臨了。到了一八六二年六、七月間，戰爭初期的不景氣現象已經差不多完全過去，工商業又開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了。然而工人們却並沒有在一八六二年年底開始的這段好時光中得到絲毫好處。高漲的物價使得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生活較之一八六〇年時更為惡化。在美國社會的各階級中，只有對於工資收入者戰爭所帶來的是日益加深的艱難和困苦。

在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巨大變化，使他們迫切地感到有組織起來的必要。費列得爾菲亞的制鞋工人們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時說道：“為了調整我們的工資和保護我們的一般權利，已經到了絕對必需在我們的行業中建立起組織來的時期了。在糧食、燃料、衣服等等的價格都如此高漲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要提高我們目前所得的工資數……但這個沒有組織的力量是辦不到的。”^②

物價昂貴也還不是需要進行組織的唯一的理由。在戰爭中，“資本”已變成了一種極強大的力量，如果勞工們不立即組織起來，那在戰爭結束時，他們將會發現“資本和資本家已使工人階級完全處於他們的掌握之中了”^③。現在已是開始的時候了，由於不斷有人參軍和被征入伍而產生的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使得工人們確切相信，廠主們即非決不可能亦很難找到非工會會員來代替工會會員的工作。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喬納桑·芬區爾曾說：“或許在整個勞

工歷史中就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充滿着有利于工人的條件。沒有什麼人閑着——工作多得很。”他呼喚說：“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吧！每一個村庄的勞工都組織起來以成為區、郡、州以至全國性工會組織的支脈和輔助力量吧！”④

早在這個呼喚發出之前，工會運動的復興就已經頗為廣泛地開始了。那些在戰爭初期尚能經常舉行會議的工會，在一八六二年夏季以後便很快吸收了許多新的會員。許多行業都重新組織了強有力的工會，制訂了新的會章，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要求，並且，在廠主們拒絕讓步的時候，便舉行罷工以求得到這些要求的實現。到了一八六三年初，工會運動的復興工作正是以最大的速度在進行着，那時候，差不多每一個星期都會有新的工會在國內某些地方建立起來。常常，一個工會組織在宣告成立的時候，便同時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四年間成立的工會，其中有相當大一個數目都是在罷工中或緊跟在罷工後組織起來的。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斯柏令費爾德共和黨人”報敘述說：“差不多每一種行業中的工人在過去幾個月中都曾舉行過罷工……。而幾乎每一次工人們的要求都被接受了。這些一致都開展得非常迅速的罷工活動……，使得許多的聯盟和工會都隨之建立起來了。”“舊金山晚報”更報道說：“為要求提高工資而舉行的罷工，現在已變成了舊金山工人羣象中最流行的風氣”，同時該報說，所有的罷工毫無例外地都得到了勝利，並因而產生了工會組織⑤。

但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中，並不是所有的罷工，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工資以適應日益上漲的生活費用。在某些特殊的行業中開始採用機器，也是許多罷工運動發生的原因。隨着機械的發展，技術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用，因而在很多行業中，技術工人被換掉的事

已成為一個問題。現在的問題已不再是限制每一個技術工人只能帶幾個學徒的問題了，而是失業和不斷降低工資標準的威脅已擺在工人們的面前了。於是，美國的工人們乃發起鬥爭，以制止機器的採用和工廠的擴張，錯誤地認為這是能夠維持他們的地位的唯一道路。

但鬥爭並沒有產生任何效果。一八六一年與一八六二年間的冬天，谷物輸送機在紐約港口開始使用了，它在一小時內可以完成過去需要十小時的工作。一八六二年七月，有兩千名工人停止工作，要求不再使用谷物輸送機。紐約糧食裝運工人自衛會呼喚糧食商人放棄對機器的使用、恢復舊的裝運工作方法，以便解決這次罷工問題。“我們並不要求增加工資，我們所希望得到的只是二十年來我們所一直掙得的那個工資數目。我們只要求讓我們能像過去一樣勤勞地平靜地工作下去，做着對我們自己、對我們家庭以及對於整個的商業界都有利的工作。”^⑥ 罷工終於失敗了。清道夫和鐵工們為同樣的要求而進行的罷工也都沒有得到勝利^⑦。

美國工人很快就了解到進行反對新機器的鬥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們必須要採取集體行動的辦法來改善他們自己的境遇。這一了解在一八六三年夏季的“芬區爾工會評論”上完全反映出來。接連着幾個星期，該報的主要論題都是環繞着“千百萬群眾行動起來了”這一大標題的。費列得爾菲亞制鞋工人的組織者們，在其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所發出的呼喚書中，告訴他們在工廠中的同業弟兄們說，“本城中的每一種行業差不多都已組織起來，並使自己的工資獲得了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增加。”如果克利斯平* 的子孫

* 鞋匠之神。——譯者

們不这样作，那么“嘲弄的手指”就会并非無理地指向他們了。在这个工会运动思潮汹涌的时期，普通劳工、工厂工人、甚至傳教師也都参加到有組織的劳工行列中來了。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九日的“費城公共記錄报”曾登載过这样一个通知：“傳教師地方联合会今晚七时半……举行例会。”

女 工

沒有任何其他的工資收入者比女工們对于組織的需要更为迫切的了。無論在公私企業中，和男人作同样工作的妇女，只能拿到男工工資的百分之五十，而在有些工業部門中，她們甚至常常拿不到工資*。而有一次当里查·特萊夫立克在底特律的一个工人群众大会上講述了女工的困苦境况后，听众們虽然都大为感动，但却不能决定出任何的計劃來。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工人們对女工問題的看法是非常分歧的。聖路易成衣業雇工协会的書記就曾經說过：“我們坚决反对招收妇女学徒，因为这将会鼓动她們放弃對她們更为合適的作傭人或作其他的工作，而跑到工厂中來从早到晚和男工們混雜在一起。”^③“芬区尔工会評論”最初对这种落后的态度也是深表贊同的，它曾爭辯說：既然女工工資只有男工的

- 对內战期間紐約城女工工資的調查揭示出了令人震驚的情况。縫傘女工每天自上午六时工作到午夜，每周只能掙到三塊錢，老板还要从中扣除針錢錢。做總子的女工每天自上午六時半工作到下午十时，在一八五三年时她們每周工資六塊錢，而到一八六三年时每周工資則只有四塊錢左右。縫制內衣的女工在一八六四年三月时，每一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大約能掙一角七分錢。做布襯衣的女工以同样時間的工作掙二角四分錢。并且虽然軸錢已从四分錢漲到一角錢，女工們还得自己買錢。（參看一八六三年十月九日及十四日“紐約論壇报”；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紐約先驅报”和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紐約論壇报”。）

一半，如果她們到工業部門中來工作，很快就將引起男工工資跟着降低的結果。同時，該報更說：參加到部隊中去的工人們，當戰爭結束之後，“發現每一條道路都擠滿了只能拿到半薪的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犧牲竟換來這樣的代價那未免是太不幸了”^⑨。然而該報主編芬區爾，正如其他聰明的工會運動者一樣，很快就認識到這種消極的態度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戰爭需要很多女工參加工作，同時事實已經證明，迫使女工重新回到家里去的鬥爭是毫無效果的。要防止各工業部門工資下降到女工工資的水平，男工們就必須起來幫助女工組織工會以提高她們的工資標準。因而一八六三年九月芬區爾乃發起一個運動，讓工人們相信只有“為女工爭取合理的工資”，才是最可靠的維持一定工資標準的辦法。他更號召女工們起來組織工會，向她們保證，男工一定會幫助她們，“因為任何人如果自認為是一個男人，是決不會逃避在這樣一種事業中他所應盡的責任的”^⑩。

在發出這個號召兩個月以後，在紐約市召開了一次女工群眾大會，它得到紐約市許多男工工會的幫助，並且有幾位男工代表曾在會上發言。後來，這些工會中的大多數會員對該會所通過的決議都表示深為贊同，並決定對於這一組織運動給以經濟上的援助。大會的決議號召“立即着手成立一個組織，其目的是為了團結全紐約市女工以進行爭取提高她們現在所得工價的運動”^⑪。

當這種將婦女組織到工會運動中來的工作正積極進行着的時候，另外一種形式的婦女組織也在这時出現了。在一八六三年下半年，女工自衛聯合會在紐約市成立了。它的產生乃是一個紐約工人拜訪了一次“紐約太陽報”的編輯莫塞斯·畢赤的結果。這個工人曾促請該報編輯同他合作發動援助紐約市女工的運動，因為

当时有很多女工都处于飢餓状态中。畢赤被他的談話所感动，乃發出号召，邀請紐約的女工在軍事大廳舉行會議。开会的那天夜晚，到会的人拥滿了整个大廳，其中有做襪圈女裙的工人、縫襯衫的工人、做內衣的工人、使用縫紉机的工人、印刷机送紙工人、擦銀器工人、印像片工人和制傘工人。据会上調查的結果，她們的工資平均是每周二元到三元左右。該会并选派了一个女工委員会以便和男工委員会商討爭取提高工資的方法和其他解救困难的策略。在这个委員會商談回來作了一次报告之后，女工自衛联合会就成立了^⑫。

自衛联合会举办了一个職業介紹所，在該所成立后的最初十个月中，前來申請登記的便达到六，四二二人。为了防止在某些行業中發生工人过多的現象，該会乃着手訓練妇女學習新的技術，并教導用手縫制的女工學習使用縫紉机，因为这种工作的工資比較高一些。一八六四年，自衛联合会帮助就業的女工共三，五〇〇名，一八六五年，共三，六〇八名^⑬。虽然該会始終总尽極大的努力以使用它所安插的女工能得到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时，可是事情却并不能常常都很順利，因为該会所依靠的只是“人們的同情和本來在其他方面就不能自衛的女工們的支持”^⑭。

但自衛联合会在給女工以法律上的保障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女工們所感到的最主要的痛苦是做了工作得不到工資，以及在所謂“工作不完善”的名目下扣去很大一部分工資的罪惡制度。現在主要由于自衛联合会努力的結果，政府終於通过了一条法令，規定不付發女工工資的工厂老板將受到徒刑处分*。至于在虛構

* 这条法令并未能使这种罪惡的現象完全消滅，因为工厂老板們可以讓自己的妻子或其他的妇女出面來和女工接头，借以逃避法律的限制。

的“工作不完善”的名目下扣除工資的問題，聯合會可以向法院起訴控告犯罪的老板，因而到一八七〇年時，自衛聯合會只要提出要控告廠主的威脅來就足以迫使他付發全薪了。自衛聯合會的會計在一八八〇年時報告說，該會自一八六四年以來一共解決了二七，二九二件糾紛事件，其中有兩萬件是沒有經過法庭的。為女工爭取回來的款項總數為二四，六四七·四九元，平均每人三·三八元。而一切訴訟費用是從來也沒有被判由女工負擔的^⑮。

紐約聯合會還並不是這一時期中唯一的女工自衛組織。在芝加哥、聖路易、印第安納波利斯、波士頓和費列得爾菲亞等地也都有女工組織成立起來。在一八六四年成立的費列得爾菲亞的組織曾要求女工們“把她們所得的工資數目，每日工作的時間，以及其他較特殊的情況向該會報告”，並保證絕對對她們的姓名保守秘密。在收集到了足夠的材料以後，該會就根據這些材料向政府官員方面施加壓力，以提高在兵工廠和承受政府訂購合同的工廠中工作的女工的工資。

所以這些自衛聯合會完全都不是工會組織，但是它們卻能鼓勵女工們進行抗議和組織起來。費列得爾菲亞工人協會曾公開表示願“幫助女工組織自衛聯合會”並發行了一種“婦女雜誌”，以便在女工群眾中推進工會運動的事業^⑯。

最早成立的女工工會之一是由紐約城和布魯克林的一千名縫傘女工組織起來的，她們實是女工中遭受剝削最為嚴重的一群。縫一把傘所得的工資是六分至八分錢，而她們從早晨六點工作到午夜以後也只能縫十二把傘。此外，她們所使用的針線還得自己化錢買。一八六三年十月，女工們曾為要求增加二分錢作為縫傘頂的

工錢而举行罢工。許多厂主是勉强同意了，但其他厂主却坚持不加，同时她們的組織过于微弱，也沒有办法使自己的罢工运动獲得胜利的結束。

一八六四年初，一个“女用雪茄工人工会”在罗得島的普罗維頓斯組織起來，同年九月該会就議決一致拒絕为一个雇用工賊的厂主作工^{①7}。紐約市使用縫紉机的工人在一八六四年四月成立了一个女工工会，这一組織却將福利事業与工会运动事業兩者結合起來了。該会書記曾說：“我們組織起來以求尽可能地改進我們的社會地位，絕不再容許老板們減低我們的工資，而且在我們有了相当多的人数和基金之后，我們立刻就要設法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时。”一八六五年初，該会在它的主席垂恩波女士的主持之下，召开了一次大規模的群众集会。不少杰出的男子工会主义者在会上發表演說，并代表他們自己的組織保證支持該会。紐約行業工会主席威廉·哈尔丁向女工們保證，劳工的市中心組織將随时給她們幫助，而他只希望請求女工們勸導她們那些還沒有加入工会的男朋友們赶快加入工会。他說：“如果他們不肯加入，你們就从此和他們斷絕关系，告訴他們說，你們不願意和一个拒絕參加为自己的伙伴們謀福利的运动的人交往。”在这次会上有十八个新會員被接受入会了。在她們举行宣誓的时候，全体會員們排成一个圈子把她們圍在中間，高唱着：

“欢迎你們，姐妹們，欢迎你們來
參加我們的隊伍和我們同心攜手；
我們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安閉的生活，
而是要在堅固的團結下——战斗！”^{①8}

日益壯大的工會組織

組織起來的浪潮自一八六二年夏季开始后便一天比一天高得更为強烈，到了一八六四年春季，便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芬區爾以無限的欣慰寫道：“我們的老訂戶都可以證明，在我們的刊物‘芬區爾工會評論’開始創辦的時候，各行業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數目有了完整的組織……。但現在，拿‘評論’的最初六個月的廣告欄和現在的對比一下吧，你就會發現一長串的各种工人會社的名稱，它們都代表着一種令人懼怕而又令人不得不尊重的巨大的力量。”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時，工會名稱住址錄只占據該報半欄的篇幅；六個月以後就占了滿滿的兩欄；一八六四年十月時占四欄半；而到了一八六五年五月却占滿了共有七欄的一整面。

根據這裏的通告我們知道，在一八六三年十二月，有七十九個工會組織起來，其中包括二十種行業；一八六四年六月，有二百零三個工會包括四十種行業；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百零七個工會包括五十三種行業；到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則有約三百個工會其中包括六十一種行業。據估計在一八六四年時共有約二十萬工人參加了工會。雖然大多數的工會都是建立在那些重要的工業州中，如在一八六四年時，紐約、賓夕法尼亞、麻薩諸塞、舊金山都曾以擁有二十個以上的工會而感到驕傲，同時，工會運動在南部各州也正在發展着。第一個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吞城組織起來的工會，休斯吞印刷業工會（第八十七號），是在內戰期間成立的，而在一八六三年時，西弗吉尼亞州的灰林城也開始有工會組織出現了。一八六三年三月十日，“灰林通訊報”向讀者報告說：“第四、五、六區的

工人都已在組織工会了。”^①

在內战时期全國性的工会也已經在开始兴起。因为几条大的铁路幹綫的修建,全國性的市場已慢慢形成了,在这种新的市場上出現的猛烈的競爭,使得老板們極力想减低劳动力的成本。熟練的雇工常常被解雇了,而代之以只需付予極低工資的男孩子和妇女。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芬区尔工会評論”便已指出,联合各地方工会,以組成全國性甚至國際性的機構的工作,已因为巨大的經濟变化的發生,成为刻不容緩的事了*。該报宣称:

“我們廣大的各行業現在已是处于國內各边远地区,有时甚至是各鄰國的影响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附近的城市如費列得尔菲亞、波士頓、巴尔的摩、普罗維頓斯、阿尔巴尼、紐亞克、澤西市等地的技工們,都保証执行他們的紐約朋友所坚持的原則,那末紐約城即使組織了一个把所有行業都包括在內的工会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只要在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城市,發生了某种劳动力过剩的現象,立刻就会有一种远非我們的工会組織所能控制的逆流冲進紐約市來了。”

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六年間有十二个以上全國性的工会組織起來了**;到一八七〇年就已有不下三十二个全國性的工会存在。但并不是所有这些工会都有充分的全國代表性,同时在組織

-
- 机器的采用对于某些全國性工会的兴起也有相当的影响。一八六七年三月七日在威士康辛州的密尔窩基城成立,而且在不久以后,就变为全國最大的一个劳工組織的制鞋工人协会,最初發起組織的首要目的,就是因为六十年代时在本行業中已开始采用机器,而它要保护熟練技工使他們不致受到必須和不熟練工人(“生手”)互相競爭的危害。該会尽力設法要使自己的會員在新發明的机器被使用以后不致失業。(參看唐·賴斯柯义尔:“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四年的制鞋工人协会”,一九一〇年威士康辛州麥迪生版。)

形式和宗旨方面也并不完全相同。它們中間有最英勇的全國鑄工工會，也有最保守的、反對一切罷工運動的火車機工兄弟會。有些全國性的工會很快就解体了，但很快又會有另一些組織起來代替它們。總之，由於美國全國性的經濟體系的形成而產生的全國性的工會運動是要從此永遠堅持下去了。

從六十年代全國性的工會中產生了很多勞工運動的杰出領袖。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勞工領袖之一威廉·夕威斯就是來自鑄工工會的；來自機械工與鐵工工會的有後來成為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的領袖的伊拉·史都華，和“芬區爾工會評論”的主編喬納桑·芬區爾；永遠熱情充沛的勞工理論家和組織者里查·特萊夫立克，是屬於造船木工與油灰工人工會的；積極從事勞工運動達三十餘年的羅伯特·施依靈，最初是與制桶工人在一起工作的。而特別是有着自己的最好代表的印刷工人，直接從他們自己的隊伍中產生出來的計有惠雷、亞歷山大·褚浦、約翰·柯林斯和凱默昂等人，他們都是全國勞工會中的積極活動者，凱默昂同時還是“芝加哥工人擁護者”的編輯。

由於篇幅所限，要把這一時期中所有全國性的工會組織的發展經過詳加敘述，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將在內戰期間興起的國際鑄鐵工人工會的發展情況作一番討論，我們就不能算看到

** 其中有美國礦工協會（一八六一年），火車機工會（一八六三年），沃堪之子（鑄鐵工）（一八六二年），電報業工人工會（一八六三年），泥瓦工工會（一八六四年），雪茄工人工會（一八六四年），制帽工人工會（一八六四年），木工和裝配工工會（一八六五年），磚瓦工和泥水工工會（一八六四年），成衣服工工會（一八六五年），油漆工人工會（一八六五年），制革工人工會（一八六四年），造船木工與油灰工人工會（一八六五年）。這些工會中有些並稱為“國際”組織，因為它們更包括加拿大的有組織的工人在內。

了美國劳工运动的全貌，因为它曾被看成是美國所有的工会中“無論从人数、財力和組織的完整性方面說都是最为强大的”，領導得最好的一个組織，而这种看法也是很恰当的。

鑄鐵工人

一八六二年初，威廉·夕威斯寫信給那些仍在繼續活動着的鑄鐵工人地方工会的領導人們，开始發动重建全國鑄工工会的运动。自战争开始后就不會举行的全國代表會議，在夕威斯的坚持下終于一八六三年一月在匹茲堡召开了。参加这次會議的有來自十四个地方工会的二十位代表；他們的第一步工作是选出威廉·夕威斯作为全國工会的主席。会上重新徹底修訂了会章，并正式通过采用國際鑄鐵工人工会这个名称。会上的討論強調集中領導的重要性，因为在过去，所謂全國工会只不过是許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工会所湊成的一种極不嚴密的联合機構。各地方工会的会章常常彼此矛盾，有时甚至与全國機構的会章都發生冲突。在夕威斯的領導下，一八六三年的代表會議才算結束了这种混乱現象。地方工会的会章必須和全國工会的会章一致，地方組織的一些單行法也必須要得到全國工会的批准。

这种对会章的重新修訂，說明工会在組織形式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財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財政收入除每年會員應繳的会費外，还靠征收會員証費和執照費聚集一些基金。这个制度由夕威斯自己掌握，使得工会从此有了一个巩固的財政基礎。他并在全國鑄鐵工人工会的办公室中建立了一种卡片索引制度，这样領導方面随时都可以知道那些人是工会會員，誰已繳了会費，誰的会費尚拖欠未繳。他并且堅決主張，如果一个會員要从一地方

工會轉往另一地方工會，他必須先向原工會了清一切經濟上的手續，才能再領取新的會員証。這些制度有很多是在過去也都曾有過紙上規定的，但現在夕威斯是真正實行了。

在夕威斯擔任主席以前，對於罷工基金的管理也一直是極混亂的。處理事務的能手夕威斯非常了解，如果沒有全國性的財政機構，全國工會是永遠不能發揮它的最高的效能的。因此，他堅持要通過一種強制的按人收費的辦法來聚集一筆特別罷工基金^②。

夕威斯堅決反對違反會章的罷工運動，雖然他知道有很多地方工會的領導人對他極不滿意。他要求：所有的罷工必須事先得到批准，因為只有這樣，全國工會才能給予它們以全力的支援。他經常告訴工會會員們：在你們的組織還不夠健全的時候，不要舉行罷工，有了健全的組織以後，再去進行決不屈服的罷工活動。他爭辯說：違反會章的罷工是一種罪惡，因為它只會將工人的精力無謂地浪費在冒進的無結果的鬥爭中。罷工要獲得成功必須要在事先有充分的準備，並自始至終在一定的組織方式下堅持到底。只有在這種策略下才能使它達到勝利^③。

夕威斯所實行的工會運動的原則，有很多是早就有人想到過的，不過他們從來沒有有效地運用過那些原則。以往的工會就從來沒有如此積極地要建立一個緊密結合着的、經過周密計劃的全國性的機構，並使它有健全的財政制度、適當的會費制度、充足的罷工救濟、簡單而統一的卡片制度，以及傳閱工賊名單、定期散發關於物價、房租、工資和計件工工資情況的報告等類的制度。

夕威斯于一八六三年二月三日離開費列得爾菲亞，前往各地去重新組織舊有的地方工會和建立新的地方工會。他走遍了全國，和加拿大的一部分，全部旅程約達一萬里^{*}。他身邊攜帶的一

百塊錢很快就用完了，此后就只是依靠各地的鑄工們送給他少数的一点錢。他的兄弟詹姆斯·夕威斯曾寫道：“他穿衣服总要穿到实在破旧不堪，不能再穿的时候……他的一条直到他死的时候还用着的圍巾上……到处都是小窟窿，那是他在不知多少陌生的城市中，恳求鑄工們進行組織时，被他們鑄杓中濺出來的鉄漿的火花所燒的。”^{②②}然而，夕威斯当时却只感到从來未有的快乐。他在旅行回來之后曾寫道：“我將永远也不会忘記我在一八六三年所經歷的一切，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②③}因为，他不是曾經新組織起來了十九个工会，恢复了十六个从一八六一年起就已經不存在的工会，并且为另外的十二个工会建立了巩固的基礎嗎？当他在

- 在一八六三年一年中，夕威斯共作了三次旅行，到过一百多个鑄造工業区。在第一次旅行中，共歷時間四个月，他到过宾夕法尼亞的中部和西部、俄亥俄州山谷区的各市鎮、密苏里、伊利諾、密西根、加拿大、伊利和紐約州的布法罗及罗徹斯特。第二次旅行的時間是六个星期，他到达的地方是阿尔巴尼、特洛依、罗徹斯特、伊利、克里夫蘭和匹茲堡。他的第三次旅行是从紐約克，穿过俄亥俄州到底特律，最后到达加拿大。三次旅行所共化的費用是九〇〇·〇三元，其中六二〇·九〇元是旅費，其余的二七九·一三元是他自己及其家庭的花費。

在一八六四年他也为進行組織工作出去旅行过几趟，他走遍了新英格蘭中所有能够組織起工会來的城鎮，更到过巴尔的摩和芝加哥。（關於他这几次旅行的詳情可參看一九四五年紐約出版的乔納桑·格羅斯曼：“美國劳工先驅——威廉·夕威斯”，第五七——七二頁，第七〇——七四頁；又參看一八六三年八——十月、一八六四年二——五月“芬区尔工会評論”所發表的夕威斯的信。）

当时全國的進步界都以夕威斯的旅行為談話主題。女权运动的領袖伊利莎白·凱第·斯坦頓曾于一八六八年七月表示对他無限敬佩地寫道：“自从一八六三年他第一次被选为國際鑄鉄工人工会主席后，他差不多走遍了全美國的城鎮和村庄，参加过数百次公开的和秘密的會議，并且結識了数十万工人弟兄。（見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革命報”。）

一八六四年的全國代表會上再度當選主席的時候，他總結一年的工作說：“我們的工會在短短的一年中，已經由一個幼弱的孩子成長為一個巨人了；像一株活力充沛的橡樹，已經是巍然大觀了，它粗壯的枝幹向四方伸展出去，伸展到全美洲大陸凡有我們這一行業的每一個角落。”²⁴

一八六三年時，全國鑄工工會共有會員兩千人，分屬十五個地方工會，代表八個州；而兩年以後則已共有五十四個地方工會，會員六千人，其所在地域除十八州外還包括了哥倫比亞區及加拿大。全國工會的全部收入在一八六三年時是一，六〇〇元，至一八六五年就增為二五，〇〇〇元了²⁵。一八六五年，夕威斯曾報告說：“從我開始負責的兩年多以來，全國工會所發出的工會執照，其中只有一份被退回了；這表明了我們工會的繁榮和鞏固的程度，已非大陸上任何類似的組織的歷史所可比擬的了。”他並且說，這個工會所給予會員們的已不止於增加工資和關門制度了*。

“除了增加工資之外，我們的工會為會員們所爭取到的福利，是無法一一列舉的。一種強烈渴求接受教育的願望充滿了我們整個的組織。學校、圖書館、閱覽室、講演會以及其他一切傳播有用的知識的機構，都在我們這裡成立了……到處存在着的是一種像親兄弟般的感情；每一個人對於其他的人的福利的深切關懷，急劇地破除了一向在我們之間存在着的自私觀念；一種巍然獨立的大丈夫氣魄已代替了以往那種常使我們被人看不起的卑躬屈節的可憐相。”²⁶

* 鑄工工會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間已在全國大部分的鑄造廠中建立了關門制度。一個沒有工會會員証的鑄工幾乎就不可能找到工作。（見前引格羅斯曼書，第八四——八七頁。）

夕威斯的工作影响了很多其他的全國工会，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会都仿效鑄工工会采取了高度集中的組織形式。他那很有成果的巡迴組織工作，使其他很多全國工会也都派出了一些巡迴組織者四出進行工作，大大地帮助了这些工会的發展。威廉·夕威斯之所以被称为美國第一个全國劳工运动的組織者和劳工領袖的先驅，实非無因的*。

劳工出版物

战时工会运动的复兴得到了劳工出版物的帮助，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劳工出版物的發展。在自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三年的十年中創辦起來代表劳工的和推动劳工改革运动的日报、周刊及月刊共約有一百三十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在

- 夕威斯还不僅僅是一位杰出的劳工組織者、优秀的工会領袖及策略家。他更是一位对于劳工問題有極深刻研究的学者。階級斗争的經驗和对于經濟理論的分析引導他進一步發展了劳工运动的理論。他清晰地認識到階級斗争的存在，因而他認為那种主張劳資利益一致的一套理論是“一派胡言”。他反对亞丹·斯密、馬尔薩斯、約翰·司杜尔特·米尔及其他一些古典派經濟学者的理論，他把他們称为“超高級”的經濟学家。他的工資理論是非常簡單的：工資的数目必須要使工人們能够維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使他們能够渡过失業时的困苦的日子，“能够維持停工或生病时的生活，能付得起医藥費”。有一次他曾質問那些信口雌黃地說工人們只要自己節省就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人們，“如果做丈夫或是做父親的人生病了——身体已經因無法忍受的痛苦而倒下，神思已經因眼看全家人將陷于飢餓的恐懼而变成混乱一团，那时他能怎么办？有誰去过問他的痛苦——又有誰能了解他所身受的灾难？”（見前引詹姆斯·夕威斯：“威廉·夕威斯的生平、演說及論文”，第三九五——三九七頁。）

夕威斯論辯說，慈善事業和救濟事業是不能滿足劳工的需要的。他說：“对痛苦的喊叫声感到驚恐的財主老爺們，把窮人收容到救濟院里來，施給他們一点殘羹冷飯以略安自己的良心，而到他們死后，还要把他們的尸体賣到解剖室去，以补償一部分他們所花去的費用。”（同上書，第三六三頁。）夕威斯

費列得尔菲亞創办的“芬区尔工会評論”；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在印刷工人罢工期間于芝加哥發行的第一期“工人拥护者”；一八六四年十二月由被停工的印刷工人創办的波士頓(及其近郊)工人大会的机关报“夜声报”；罢工的印刷工人依靠合作社的基礎在聖路易創办的“每日新聞”。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約翰·兴赤克利夫在伊利諾州的柏利維尔創办的“礦工周报”，乃是美國礦工协会的机关报。該报的“主要目的是广泛推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特別是推進向來都被人忽視的礦工的利益”⁽²⁾。

在內战期間及內战剛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內，在丹佛、印第安納波利斯、那士維尔、明尼苏达、堪薩斯州的哥倫布斯及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都有劳工报纸开始發行；在旧金山、聖路易、芝加哥、波士頓和紐約等重要都市中也都有多种劳工报出現了。一八六五年，乔納桑·芬区尔曾向“工人拥护者”、“布法罗礦工”、“布法罗前哨报”及“紐約工会拥护者”等报社建議創辦一种全國性的劳工日报，但是贊同这一建議的只有“布法罗礦工”的編輯約翰·兴赤克

所要求的是增加工資，而不是什么施舍救济。但这只不过是他所提出來的劳工綱領中的一部分。这一綱領所包括的項目还有爭取縮短工时，爭取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實現合作社性質的企業以廢除工資制度，改善女工的待遇，建筑適當的工人住宅以代替現在的大雜院兒，加强國際劳工的團結，進行独立的政治行动，實現土地改革，廢除罪犯劳役，建立技工学校和劳工統計局以及實現幣制改革等。对上述的这一切他并不是都已有了很明确的思想，但是凡他所竭力進行的每一項工作，都是受着同一个願望的推动的——那就是推進劳工的事業。他把他的一生都貢獻于这一事業，工人們对他的一切号召所表現的热烈响应，便是他所得到的最偉大的報酬。有一次他曾寫道：“当我知道自己对人类的事業及社会改革事業所尽的一点微末的努力已得到各地工人弟兄的嘉許的时候，我眞感到無限的驕傲。”（見一八六三年八月八日“芬区尔工会評論”。）夕威斯最后死于極端的貧困中。当他死的时候，他連一百元的財產都沒有留下，他家里的人竟無法支付他的殯葬費。

利夫一人。凱默昂却拒絕說，“工人拥护者”已經办得很不錯，它現在能够为西部中心区的劳工运动所尽的力量已远勝过一种全國性的劳工报纸了²⁸。

費列得尔菲亞工会总会和机械工与铁工工会的机关报“芬区尔工会評論”，是內战期間影响最大的一种劳工报。該报編輯及發行人乔納桑·芬区尔在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該报的創刊号上，即概括地提出該报的中心政策：“贊助工人事業，并在無論什么样的糾紛發生时都站在拥护工人的立場上。支持政府及一切通过正当程序制訂的法令。”对于妇女，它提出將为她們“辟出相当的篇幅登載各种精选的文藝作品；以使我們的报纸能獲得家庭妇女的热烈欢迎”。

該报于每周星期六出版，每期是四大張，每張七欄。其中有一欄用以專門报道战况的進展，而第一版則是完全登載工人們自己所寫的作品。此外，社論、工会消息、工会通告及当代最重要的劳工領袖們所寫的文章，則占滿了其余的篇幅。“芬区尔工会評論”实际就是一种全國劳工的机关报。該报編委会中包括有鑄工、印刷工、造船木工、石工、桌椅工、木工、制帽工和制鞋工等工会的代表²⁹。

芬区尔并接受免費廣告，希望能依靠訂費和工会的捐贈來維持报纸的費用，因而在該报存在的三年中，是無时不感到財政上的困难的。該报訂費是每年兩元，而这筆收入即是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时也都不敷开支，那时該报在全國三十六州中有三十一州有它的訂戶，此外在哥倫比亞区、三个加拿大省及八个英國城市中也都有人訂閱該报，每期总發行額在一万一千份左右³⁰。有不少的工会曾在野餐会、舞会和宴会上为該报捐募基金，也有些工会就从

自己的基金中拿出錢來捐贈給該報。為要償付日益加增的債務，芬區爾自一八六四年六月起對工會的通告開始收費，但一切解決該報財政困難的努力均歸失敗，乃終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發行最後一期後，宣告停刊。

“芬區爾工會評論”是美國所曾發行過的最好的勞工報紙之一，但是該報的最大缺點是它反對政治活動。芬區爾所提出的反對政治活動的理由是，這種活動會使得兩個敵對的階級間產生一種兄弟般的友善感情，因而阻撓了工人們的“爭取和維護那些對自己、對家庭和對全體工人弟兄的福利都極關重要的權利”的努力^②。而當勞工聽從這個建議，把自己的一切活動都局限於單純的工會主義運動的時候，他們卻發現老板們在充分地利用政治方面的力量剝奪掉工人們的最重要的權利*。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七年間，由凱默昂主持，在芝加哥和辛辛那提發行的周刊“工人擁護者”，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以求克服芬區爾所堅持的勞工不應參與政治的偏見。在該報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一期上，凱默昂曾聲言將他的這一報紙敬獻給勞工的獨立政治行動的事業。“盡我們的能力所及，今後‘工人擁護者’的政策將是要幫助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不附屬於任何政治黨派的工

-
- 在他的這種關於政治活動的立場受到批評時，芬區爾曾撰文回答說：“我們一向主張在政治方面盡量利用我們的消極的力量，而不要利用積極的力量；或者說，利用我們的拒絕投票的權，而不使用我們的力量擁護任何人——採取這樣一種計劃，就可以使得工人在政治活動方面不致於變成政治煽動家的尾巴，同時，工人們更可以自由地利用自己的投票權以結束那些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們的政治生命。”（見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芬區爾工會評論”。）但是，芬區爾並沒有說明，如果工人們拒絕在各候選人競選時盡任何力量，那當選的代表們為什麼要關心工人們的利益呢。

人党；要使州議院和國会的各个部門中都有从我們自己的隊伍中選出的代表；而这些人对于各生產階級的利益的关心和同情必須远勝于他們对于資本或任何党派的忠心。”

在該报其后的各期上，凱默昂經常使讀者們想到劳工政党這個問題。今天他可能發表一篇社論，討論代表应按一定的人口比例進行選舉的問題，明天他又可能利用一整欄的篇幅來解釋为什么工人永远是最適當的候选人，因为他們不需要別人告訴就完全知道工人的需要。該报虽然在后来太过于強調了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并且在幣制改革运动的紛乱狀況中迷失了方向，但全國磚瓦工人工会主席塞米尔·高尔所給它的称譽，它仍可当之无愧。高尔曾称譽該报为“極有力量的真正忠心于劳工事業的报纸”^②。

所有这一时期中的劳工报纸关于工人階級需要大众教育这一点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它們一致号召成立劳工学校、劳工圖書館、閱覽室和演講会。“柏利維尔矿工”曾宣称說：“为了改善工人階級的情况，就必需教育他們，使他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們自己与社会中其他階級之間的关系。”^③“芬区尔工会評論”亦曾說，如果不对于新組織起來的工人施以一种大众教育，战争时期中急剧恢复的工会运动也是不会發生什么重大的意义的：“必須有系統地對他們作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講演，講演的主題則應該是肯定我們進行組織的正确性，以及这种运动的必需性。”^④*

- 芬区尔利用他的报纸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徹底打破当时流傳的一种神話，認為美國工人根本用不着建立什么劳工組織，因为他們很快就可能要跳出自己的階級，自己变成为資本家的。他抗辯說，工資收入者的絕大多數，是会永远不变地作为工人階級中的成員的。因此，如果他們盼望能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他們就必需組織起來進行無情的斗争，以从資本家的手中夺取較好的条件。（參看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十三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各勞工報紙的那種極不充裕的經濟情況，使得它們在一般新聞採訪方面不能與商業性的報紙競爭，但儘管如此，它們所發生的影響仍是很大的。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喬納桑·芬區爾曾說：“從經濟觀點來看，‘芬區爾工會評論’是失敗了；然而，作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的事業中的一種進步運動來說，該報無疑的是成功的，這一點，只要拿今日的勞工運動和三年前比較一下就可以得到充分證明。”³⁵ 夕威斯完全同意這種看法。他在討論勞工報紙的價值時說：“在沒有勞工報紙以前，我們在使工資與生活費用保持平衡方面的工作是毫無進展的；而且如果沒有這些報紙的支援，我們在爭取制訂八小時工作日法令及進行其他改革運動方面的努力是都不可能收到成效的。”同時他說，如果沒有獨立的勞工報紙的存在，工人們就無法對付老板們在企圖剝奪勞工組織權方面所發動的攻勢³⁶。

老板們的反攻

到了一八六三年夏天，老板們就開始對有組織的勞工們進行反攻了。在美國，早就出現了各種由僱主們組成的會社，但是他們從來還沒有採取過像現在這樣的聯合行動。在大多數的工業部門中，地方性的廠主聯合會都已成立起來，雖然它們也進行一些別的活動，但它們主要的目的是破壞工會運動。它們用閉廠停工的辦法對付工會運動者，并把他們的名字列入黑名單，同時拒絕重新僱用任何不肯簽名保證自己確已脫離工會組織的工人。代表着十九個廠的紐約工業家協會，曾于一八六三年十二月發出下述的一種秘密通告：

“我們反對任何以調整工資為目的的組織。在此後的九

十天之中，凡参加本协会的各厂，除现已雇用的技工以外，对于任何其他技工，除非他持有原服务厂厂主的介绍信证明确系被正当辞退，则应一律拒绝雇用。”^{②7}

内战时期的厂主联合会，主要都是地方性的，虽然在少数工业部门中也存在着一些较大规模的联合组织。一八五九年组织的阿尔巴尼铸造业协会目的是为了对抗铸工工会的，该会曾向其他城市的老板们建议要组织一个全国铸造业者同盟，但是，一直到了一八六六年三月，才有一个名为全美制炉业与铸造业联合会的全国性组织建立起来*。一八六三年，俄亥俄州福尔区铸造业与机器制造业协会成立了，该会并宣称，它将“和所有各地与本协会会员经理同样业务并遭受同样不幸的工商业者”进行联络^{②8}。这里所谓的不幸，即是指铸工们要求增加工资使其能够追随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的努力。

此外组织厂主联合会的还有布法罗的船运业、圣路易的服装业、布鲁克林的技工老板、麻萨诸塞的铁钉制造业、波士顿的铅管工老板、西部的铁路公司及其他一些行业。在底特律，各行业的资方，通过密西根各业厂主协会而彼此合作以推动反工会的活动。

-
- * 该协会在宣告成立时曾宣称说：

“兹决议：本国的铸铁业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应该而且必须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联合会，以保卫大家的共同利益，增进会员之间的友谊和彼此的信赖，而特别是借以达到对抗铸工工会的一切行动的目的，该工会现已采取各种手段干犯我们管理自己的工厂和经营自己的企业的权利。

“兹决议：我们将立即在我们的厂中雇用一切我们认为合适的徒工和工人；我们决不容许有任何工会委员会在我们的工厂中存在；同时我们要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使我们的厂从此不再受到被雇人员的挟制或干涉。”（见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七日、二十日及二十三日“波士顿夜声报”。）

当时大多数的报纸都曾支援厂主联合会所发动的巨大的反劳工运动。很少的编辑没有颂扬这种联合会组织，认为它们是一种爱国组织，是保护勤劳的美国劳工，使他们不致受到邪恶的外来的煽惑家的影响的。他们说，这种煽惑家，是在工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晚报”的编辑詹姆斯·瑞德司东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当俄亥俄州福尔区铸造业与机器制造业协会邀请他参加反对国际机械工与铁工工会的斗争时，他回答说：“我的答复是，我决不参与任何企图要对正直的劳工进行压迫的阴谋；我认为任何反对劳工的组织，都会带来同欧洲一样的压制劳工的后果。愿上帝保佑，这种事情永远也不要在我们这里发生吧！”³⁹

在内战期间，厂主们还不只是采取了传送黑名单，实行闭厂停工，以及强迫工人签订“黄狗合同”等办法，他们并且还取得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同他们进行合作。联邦政府鼓励他们从外国运入合同劳工以破坏本国的罢工运动，而联邦的将领则更使用武装去驱散或逮捕罢工工人。当时在政府官员中，只有林肯一人是公开对有组织的劳工抱友好态度的，由于他对劳工问题的同情与了解，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们对于工会的野蛮进攻有好几次都终被阻止了。

州政府使劳工遭受到的苦难也是极严重的，好些州政府都允许厂主使用罪犯劳工。一八六四年，纽约城的斯柏依顿·杜威尔铸铁厂的厂主约翰逊接办了星星地方的铸铁厂，他付给纽约州政府的罪犯劳动力的工资是每人每日四角钱。那时工会规定的工资价是三元。但约翰逊之所以始终并没有能够消灭强有力的斯柏依顿·杜威尔铸工工会，是完全有赖于夕威斯所组织的胜利的斗争的。其他的工会在遇到这种竞争的时候，情况可就很坏了⁴⁰。

这些厂主們的集团，为了進一步推進它們的攻势，乃在若干州議院中提出了各种議案以求制止工人們的組織活动，并在法律上剝夺工人的罢工权利。一八六三年初，明尼苏达州首先通过了一条对于干犯其他工人的罢工者科以一百元罰金，或处以六个月徒刑的法令*。一八六四年春天，在紐約州和麻薩諸塞州的州議院中也提出了禁止“威脅”或干涉其他工人的議案，但是由于有組織的劳工的努力，这些議案終未能通过**。伊利諾州州議院对于煤礦老板們更是如此地表示友善，当他們要求州議院协助破坏礦工协会在一八六三年所發动的罢工运动的时候，州議院竟匆忙地制定了一連串后來被称为“拉薩尔黑律”的法令，禁止任何人以威脅、

- 明尼苏达和宾夕法尼亚还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許厂主驅逐居住于属于工厂所有的住宅中的罢工工人的家屬。一八六五年二月，宾夕法尼亚州更通过了一条法令，承認各鐵路公司有权成立自己的私人警察隊，后來，慢慢地各煤、鉄公司也都取得了这种权利。这种法令使得某些社会集团实际上被划出于州議院的法律范围之外，并使这些社会集团中的工人降低到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地位了。煤、鉄公司的警察具有大城市中的警官所有的一切权力，并且成了厂主可以用以進攻有組織劳工的一支私人軍隊。（參看杰瑞米亞·沙魯：“以宾夕法尼亚州为重点論私人警察制度”，一九三三年費列得尔菲亞版，第五八—六一頁。）

許多州政府又恢复了圖謀不軌法案，以之反对工会，并迫使各劳工組織付偿高额的訴訟費以消耗其基金。圖謀不軌案件發生得最多的是紐約、新澤西和宾夕法尼亚各州。

- 在某些州議院中也曾提出少数改善劳工境遇的議案。在有組織的劳工的压力之下，威士康辛州通过了一条制止厂主扣压劳工工資的法令。紐約、新澤西和宾夕法尼亚各州也都通过了廢除以公司購物証或公司票据發付工資的制度。然而不幸的是，正如芬区尔所指出的，这种法令“在購物証制度最为流行的各郡中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实行”。（參看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七日“波士頓夜声报”和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恐嚇或任何其他手段阻止別的工人進行工作，違者將科以一百元的罰金。在罷工期間，如有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彼此聯合，目的在於阻止其他工人進行工作者，則可被判处以高至五百元的罰金，或長至六个月的監禁在郡監獄中的徒刑^⑪。有一個礦工工会的會員曾寫道：“天知道，這個國家現在到底變成了一個什麼玩藝兒呀？一方面大家在那裡呼喊解放黑人，可是另一方面，那些有权勢的大人先生們又要礦工們簽下出賣自己的自由的賣身契！”^⑫

勞工嚴整自己的隊伍

工会主义者都非常了解，很少的地方工会能有足够的基金和會員去對抗各廠主聯合會的進攻。而要想對付這種進攻，則只有採取互相配合的行動並加強勞工的團結。因此目前最迫不及待的事是組織一個強大的工会聯合組織。這種聯合組織，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芬區爾工会評論”寫道，“其所以在此時成為最迫切的需要，是因為在目前資本家們已經聯合起來要比過去更為變本加厲地迫使勞工對他們完全百依百順。”

從這個危機中產生了美國工会運動向前發展的又一階段——建立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勞工組織，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行業工会。其中的第一個是於一八六三年二月在紐約州的羅徹斯特成立的；三個月之後，接着在波士頓和紐約也先後成立了這種組織。截至是年年底，已成立了行業工会的城市計有阿爾巴尼、布法羅、路易斯維、費列得爾菲亞、匹茲堡、聖路易和舊金山。而到內戰結束前後，全國已共有三十多個工会協會，遍及從新英格蘭各州直到加利福尼亞的每一個產業中心城市。

這些行業工会有很多都是從罷工運動中產生出來的，因為在

这种时候工人们才最容易看清厂主方面的联合力量，并認識到他們唯一的对付办法是更廣泛的加强劳工团结。在旧金山組織行業工会的号召，是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成衣工人爭取增加工資的罢工遭到失敗以后發出的。这号召宣称：“我們認為財富的主要泉源——劳动力，是只有依靠一切从事劳动的人們联合行动和坚决努力，才有可能得到它应得的报酬的。”同样的思想，在紐約举行的一次筹备組織工会的集会上，也表露出來。一个工会的發言人曾說：“要使自己得到保障，那每一种行業都必須先自行組織起來，然后進而建立一个总的联合組織。”^⑬

在整个內战期中，工人们一般是依靠地方性的行業工会，而非依靠全國工会替他們解決問題的。那时，除去鑄工、印刷工、机械工和鐵工外，其他工人的全國性的工会組織，还都不过在剛剛發起的階段。甚至有許多已屬於全國性組織的會員，也仍把地方性的联合組織看作是支援他們的主要力量。这些行業工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紐約市工人协会。該会主要目标是要联合多种行業的工人組織的力量，以保衛工人的权利，推進工人的利益；要在工人之間建立互相合作的感情，以使他們能够迅速而坚决地采取一致的行动；要对那些可能是侵犯了劳工权利的法令加以討論，并采取有效办法以求取消或修正那些法令；要尽力調停勞資之間的糾紛，但对于一切被迫举行罢工的組織則予以坚决的支持；要做到只有那些願依照工会的工資标准付發工資，并願遵从其他各种工会規定的厂主們，才能得到工会會員的帮助^⑭。

除了罗徹斯特行業工会外，其他城市的工会联合組織都沒有罢工基金，但在某一工会举行罢工时，它們却都尽力帮助募款。同时它們的影响和威望是也能够發生一定的作用的。例如在費列得

尔菲亞，当一次很重要的印刷工人罢工运动發生时，行業工会即曾出面要求那些对劳工抱友善态度的政界人物对厂主加以压力。結果因这一呼吁曾得到某些方面的注意，厂主最后只得接受了工会所提出的条件。旧金山的行業工会，在鑄铁工人工会于一八六四年四月举行罢工时，也曾帮助該会打破了厂主联合会要想使用工賊以破坏罢工的計划。当厂主們运來破坏罢工的工人剛剛到达巴拿馬运河峡口的时候，便被旧金山行業工会的代表和一些鑄工及制鍋爐的工人們赶着前去找他們会談。代表們以高度的說服力向他們講解罢工的理由和厂主們向全体劳工举行進攻的真实意义，竟使得他們在到达旧金山之后，拒絕充当工賊并申請加入工会。而厂主們乃只得承認自己的失敗，增發工資^⑮。

行業工会所使用的另一項武器就是現時称之为“不与交易”的一种抵制办法。底特律行業工会主席兼油灰工國際工会主席里查·特萊夫立克曾对这种抵制办法說明如下：

“一切行業都必須联合起來以达到这一目的，凡遇压迫劳工的事件發生时，工会协会即派出一委员会前往拜訪冒犯劳工的厂主，請其立即采取补救办法，如果該厂主对于委员会的要求拒絕遵从，行業工会即通知各个行業，使各本行業中全体工人与該罪惡工厂停止一切商業上的來往。同时并派人在該厂附近巡視，以便將此告知尚不知情的來往行人，而結果是每一次都使厂主被迫屈服了。”^⑯

行業工会，在不必与厂主進行斗争的时候，則忙于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在內战时期急剧高漲的工会运动中，担任組織中心的这种榮譽是应归之于各行業工会的。某些行業工会不僅曾委派專人四出組織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并曾委任特派員开办合作社，

以减低工人的生活費用。阿尔巴尼、波士頓、芝加哥和特洛依的行業工会都举办了油鹽菜蔬合作社；特洛依行業工会更成立了一个工人百貨店，这是一个頗受工会會員們欢迎的小型の百貨公司⁽⁷⁾。此外，特洛依工会还創辦了一个免費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在那里經常有工会領袖們來对工人作演講。威廉·夕威斯曾参加过特洛依行業工会为要替圖書館和閱覽室征募資金而举办的一次盛大的野餐会。他在一八六四年九月十日致“芬区尔工会評論”的一封信中曾叙述这件事說：

“毫無疑問，这是在國內从未有过的一次最偉大的盛会。全部所花費用总在一个二百元至一千五百元以上。如果費列得尔菲亞行業工会中的那些守旧的先生們也來参加了这次大会，我想他們的眼界也会随着大銀餐盤的尺寸而放大一些的……。这个城市中的男女工人們对于他們自己的利益是無时不关心的……。”

政治行动

內战期間，联合政治行动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紐約州行業

- 由木工和裝配工人工会、印刷業工人工会、鑄鉄工人工会、鋸木工人工会和油漆工人工会組織的罗徹斯特行業工会，在成立之后不久就建立了一个組織委員會，其“目的在于协助任何行業中希望組織工会，并願与本工会协会建立連系的工人們進行組織工作”。截至一八六三年十二月，該委員會为行業工会增加了五个新的會員会：机械工会与鉄工工会、制桶工人工会、成衣工人工会、鉄皮工人工会和制鞋工人工会。一八六三年年底，一位工会运动者在其自罗徹斯特的來函中寫道：“在这里，工会联合会組織，正处在一种多少年來我們都从未見到过的繁榮狀況中。而这主要是应归功于我們行業工会的良好影响及它所進行的工作的。”（参看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芬区尔工会評論”，和約翰·格利生于一九四〇年在罗徹斯特大学所寫但未發表的碩士論文“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罗徹斯特的劳工运动”，第九六一—九八頁。）

工会所發动的反对哈斯丁斯—佛格尔反罢工法案的运动，这一法案是一八六四年初春在議院中提出的。名为“非法干涉雇主与雇工惩治条例”，这一法案却使得任何个人或团体“如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威脅……阻止工人接受別人的雇用，或阻止雇主雇用他所願意雇用的工人……即構成擾乱治安罪，而可判以長达一年的徒刑或高至二百五十元的罰金，或同时受到徒刑与罰金的处分”^{④8}。紐約市商会和紐約州北部各区的一些極力希望消滅鑄工和机械工工会的老板們，曾多方活动以求通过这一議案；而該議案內容之嚴酷，照威廉·夕威斯の說法，“是可以將全紐約州所有的工会組織全部徹底消滅的”^{④9}。

击败哈斯丁斯—佛格尔法案这件事是內战期間的一个頗使人感奋的插曲。这一运动是以紐約市第五木工工会主席馬丁·凱里致报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的。

“关怀着本市無数的工人群众，我对于哈斯丁斯先生最近在參院中所提出有关‘罢工’的法案感到非常驚恐，很明顯，这不过是要想進一步侵犯我們的一点已經多方受到限制的权利与特权的企圖。我們中間有些人認為这件事一定会因为得不到支持的力量自形消滅的；但是我却不能那样想。回顧一下过去关于議院制定法案的經驗，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到，对于許多填滿議院席次的那些人的忠誠与品德我們实在不能予以多大的信任，我深深地感到全州的工人們必須采取迅速的有效的行动來击败这条万惡的法案。現在，組織該專案委員會的时候馬上即將來到了，我們必須立即行动起来，击败这一法案……。”^{⑤0}

紐約行業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凱里的建議，該會議

决派遣一个代表团到阿尔巴尼去，并决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以反抗已被提出的这一反罢工法案。群众大会于一八六四年四月七日在湯浦金斯廣場公園举行。参加該会的共有四十个工会，其中有最强大的斯柏依頓·杜威尔第十一号鑄鉄工人工会，亦有剛成立的紐約市毛皮工人工会。中午的时候，参加游行的人就都在他們的工会总部集合，然后排成一支坚强的隊伍向公園开去。在那里一共設立有三个講壇，其中兩個供講英語的發言人使用，一个供講德語的發言人使用；講壇四周飄蕩着美國國旗和工会的旗帜。在會議進行的时候，到会的工会會員不下一万五千人，每人都佩戴着表明自己所屬工会的白綾子的条子^①。

紐約杰出的工会領袖們都曾在会上發言，他們在敘述了劳工在贏得战争勝利时所起的作用后問道，难道議院應該这样协助厂主消滅工会以酬报工人对國家的忠心嗎？紐約市制桶工人工会主席約翰·凡·華特高呼着說：“为什么他們尽一切力量要想粉碎工人階級？他們依靠工人階級替他們進行保衛國家的战争，維護着美國的國旗。难道現在这些人應該忍受着連一点維持自己生命的面包都得不到的痛苦嗎？”

該会警告所有的議員們，誰要贊成了那个可詛咒的議案，他就無异是簽訂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死亡証。制桶工人工会的罗伯茲說：“紐約的工人們已經聚集了自己的强大力量站起來了，他們已决心不支持任何贊助該法案的人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他們要告訴他們的議員先生們，只有工人才是國家的骨幹和支持者，誰要想嚇倒工人，使他們变成自己脚底下的奴隸，誰就会被拋出政治权力的圈子。”这时会上發出大声的喊叫：“我們要在下次选举中送他到地獄里去！”紐約重要的工会負責人之一湯姆斯·苦泊尔号召工人

們在一切政治運動中更加提高警惕。該會通過決議，要求所有正直的兩院議員們否決那個在醞釀中的暴行，並且說，“如果這一法案竟被容許發展下去，我們嚴肅地要求全國各地的工人，除了採取其他措施外，必須詳細記錄所有曾投票贊成這一法案的議員的姓名，以便在將來採取行動。”^②

同時，特洛依、羅徹斯特、阿爾巴尼和布法羅的工會協會也都組織了類似的抗議大會。布法羅的會議斥責該法案是“毫無道理的……特別是現在當工人們正奮不顧身地開上前綫保衛聯邦和憲法的時候；這時資本家們（除了極少數幾個較正直的人以外）都舒適安逸地坐在家里，拿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從勞工身上壓榨來的錢財買了幾個替代兵，而工人卻拋撇下自己的家，拋撇下既無經濟來源又無任何保障的親愛的家人到前綫去了。”該會在閉幕時發出警告說：“我們對參眾兩院的每一個代表都要精確地記下一筆賬，等到投票的時候再一一按照他們所盡的力量還報他們。”^③

由於全州巨大的群眾性的抗議的結果，這個法案乃於四月十二日交回參院立法委員會重審，而州議院的會議不久就休會了，對該法案竟未作任何進一步的決定。於是在紐約、阿爾巴尼、布法羅和特洛依的街頭都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

對全國性勞工組織的嚮望

反勞工法案在紐約州和麻薩諸塞州的失敗，顯示了行業工會的力量，但廠主方面的攻勢却也日益加強了。在一八六四年年終的時候，廠主們的聯合組織對許多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所作的努力都曾予以抗拒和進行反擊。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波士頓夜聲報”報道說，麻薩諸塞州的廠主聯合會已將

各制釘工厂工人的工資，強行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第二年春，在本州鑄造業厂主联合会的指使之下，特洛依城的倫色列尔鉄工厂將工人的工資每日减少了一元；布魯克林的牆壁粉刷業工头老板联合会將工人原每日三元五角的工資強行減低至三元⁶⁴。所有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全國性的工会运动的一个开端。夕威斯自己曾經引述过一个資本家在一八六四年年終時用以警告他的話：“劳工情况將坏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的日子已經不会太远了。总有那么一天，現在積極从事劳工运动的人，將要被迫跪着求人給他一点工作……。每一个厂主的胸中都燃起了要求报复的火焰，这將產生什么样一种結果，是可以从目前廣泛普遍地存在着的、以粉碎你們的工会为其具体目标的資本家的組織中清楚地看到的。”⁶⁵

到了一八六四年年中，一部分工会領袖已明白感到，以各地方性的工会协会單獨去对付厂主的進攻是不能獲得勝利的了。有一位劳工領袖曾說：“这不是某一特殊行業与資本勢力之間的战争。这是代表劳动力的劳动人民与他們的代表資本勢力的老板之間的战争。”因此，他接着說，我們的組織的形式就必須要能够配合这种斗争的新的特性；那就是說，所有各州的工人都必須在一个全國性劳工联合組織領導之下，采取一致的行動⁶⁶。

这种團結全國劳工的意識，是直到战争結束之后才开始真正發展起來的；虽然在战争期間也确曾有過几次想要實現这种大團結的企圖*。一八六一年，國際機械工与鉄工工会曾选出了一个委員會，并“要求其他全國性的或巨大的工人組織也都派出同样性質的委員會來共同会商，讓它們有全权去進行組織一个全國行業

* 一八六五年成立的紐約州工人协会就是介于城市工会与全國性工会之間的一种組織。

工会总会的工作”，但是由于战争的爆發，竟使这个組織全國性劳工联合機構的建議被擱置起來了。到了一八六四年，夕威斯推动全國鑄工代表会，使它起來支持机械工与鉄工工会从前提出的那个組織全國行業工会总会的建議。阿尔巴尼的机械工与鉄工工会的會員們也極力推动他們的工会参加鑄工們所發动的实现全國劳工大联合的运动。他們非常願意“花費〔他們〕最后的一塊錢，及其全部時間和才智，以使全國範圍內所有各地的技工的权利不致受到侵害”⁵⁷。

首先發动成立全國劳工联合機構运动的并不是全國性的工会組織而是那些行業工会*。在一八六三年与一八六四年間的冬天，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的市行業工会的代表們，經常討論关于組織这样一种联合機構的必要性。一位工会运动者曾說：“代表們看到資本家已經組織起來要想全部推翻那一时期的劳工运动，乃感到自己有一种不容推卸的責任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以加强、巩固和進一步發展劳工事業，并在有利于劳工的原則下，結束現正進行着的劳資之間的斗争。”他們的結論是，如果工人們“由于把自己組織到行業工会中去而得到了利益，那末，如果他們能够組織一个國際同盟，他們就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利益”⁵⁸。該行業工会因指示其通信秘書致函全美國各地及加拿大的行業工会，征詢它們对于召开一次全國代表大会的意見。

在这些信發出之后，緊跟着在一八六四年八月，路易斯維行業工会和友好同盟会的主席罗伯特·吉尔克賴斯特又發出一个号召，邀請各行業工会的負責人及會員們前來出席將于九月二十一日在

* 前者虽为全國性組織，但全采限于一种行業的；后者虽均为地方性組織，但其成分是包括多种行業的。——譯者

肯塔基州路易斯維举行的會議：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資本家和老板們不是都已經組織起來了嗎？每一个人不是都完全明了他們的目的乃是要消滅我們的組織嗎？但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們会不会恐懼地畏縮了呢？我們的回答是：决不会……这只会刺激我們，使我們發揮出更大的力量……。如果老板們企圖團結在一起攻击各行業中的任何一个部門，其他各部門或团体的技工們，就要把受攻击的那一行業或部門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事業，并且要予以支援和同情。”

把一切力量團結起來，有組織的工人將变成如此强大，使得“資本家或老板們將从此再不敢拒絕我們的合理的要求”^⑤。

当路易斯維會議举行时，到会的只有來自八个行業工会的十二位代表；然而，人們对它的关怀却是普遍的。特洛依行業工会曾致函該会，說明時間限制是它所以未能派代表参加的唯一原因，它向路易斯維工会致賀，并預祝代表們在他們正开始進行的光荣工作中獲得勝利^⑥。

會議的主要工作是起草会章和一些決議。北美國際工業大会这个新的組織的目的，是在“双方互惠”的原則下，調解勞資之間的糾紛。罢工，“除非是到了絕對必要的时候”，尽量避免。而当这种罢工一旦發生时，該会所建立的一个財政機構，將对“任何一个可能受到資本家無理攻击的工人組織給以实际的經濟援助”。为此目的，該会有权通过全美國各行業工会攤派每一个有組織的工人五分錢捐款，“这筆錢由各該行業工会的財政機構保管，但听从國際工人大会調度”。

路易斯維大会的決議确实反映了美國劳工的許多問題。決議

中有一條號召各行業工會，積極推動立法機關使其宣布公司購物証制度為非法，並消除使罪犯勞動力與勞工競爭的情況。另一決議促請各行業工會對縫紉女工加以幫助。又一決議則頌揚消費合作社運動，並建議各行業工會都成立油鹽菜蔬合作社。更有一條決議建議各行業工會由會里開支雇用一些巡迴組織工作人員，接受國際工業大會的指揮進行工作。同時該會也通過了一條決議，贊成在華盛頓成立一個全國勞工部，“由屬於勞工階級和擁護勞工的人在該部擔任一切職務”。

但由該會所發出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也許就是該會所通過的一條肯定工人們有權決定自己勞動力的價格和自己應得報酬的數量的特別決議。“我們認為這是人類生來就賦有的一種權利——一種天賦權——因此我們以我們的作為人的神聖榮譽為誓，將在一切情況下，不惜任何犧牲來維護這一權利。”^①

國際工業大會在閉會以前，即訂出計劃將于一八六五年五月在底特律舉行第二次會議，但這次會議却始終沒有舉行，因為在那時認識到全國性組織的必要性的工人為數還太少。在群眾中影響較大的領袖，如夕威斯和芬區爾，又都確信一個以各行業工會為基礎的全國聯合機構永遠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廠主的進攻。芬區爾認為工業大會沒有力量在沒有行業工會的區域組織勞工，“這一點，行業工會乃是地方性工會的產物這一簡單的事實便可證明”。只有以全國性工會為基礎的全國聯合機構，才能負起這個責任來，因為這些全國性的工會，“具有為大家所承認的約束各工會組織的職權與力量”^②。

芝加哥“工人擁護者”的編輯凱默昂却反對芬區爾的意見。在評論路易斯維會議時，他答辯說，國際工業大會是較優於全國性的

工会的，因为“在美洲大陸上有成千上万的技工和工人从不曾，而且將來也永远不会有專只以他們的某一个別行業为基础的國際性工会”^⑬。在凱默昂講这一段話时，全國性的工会数目实在还太少，根本不能說代表着多大一部分工人階級，而那些較强大的全國性工会却又正忙于对付厂主联合組織的進攻。从这些情况來看，我們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國際工業大会很快就消亡了。

向八小时工作日前進

即当路易斯維的代表大会尚在進行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問題產生了，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战后第一次發动成立一个强大的全國劳工联合組織的运动的原动力。虽然路易斯維會議并未強調這個問題，但代表們也并没有完全忽視它，因为該会所通过的決議中有一条決議宣称，現在已是在全國範圍內开始活动，以使八小时工作日成为合法制度的“最良好的时机”。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在战争結束以前并没有真正开始，但正如在战后时期劳工运动所提出的其他一切重要問題一样，这个斗争的根源却是可以一直追溯到战争时期以前去的。当战争还正在進行着的时候，已經作好了一切准备要在叛乱被压服以后便立即开始進行这一巨大的运动。

虽然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美國劳工关于工作時間的要求僅限于十小时或九小时工作日，但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日的宣言也时或出現的：例如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國劳工”即曾宣称，虽然現在費列得尔菲亞的技工已經实现了十小时工作制，要求縮短工作時間的运动决不能因此停止。該报說：“我們决不希望永远保持十小时工作制，因为，我們相信每日劳动八个小时对于任何

人都已經太够了。”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時期，對於八小時工作日的要求便已日益加強；在該十年的開頭一年中，紐約各工會所召開的一次群眾大會即曾一致議決：“對於任何人八小時工作都是最合理的，都是完全足夠的工作時間。”一八五一年，在費列得爾菲亞有一個名為技工與工人聯合大會的組織成立起來，以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為其主要目的^④。波士頓的有組織的油灰工人於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則開始實行了八小時工作日，在其後的幾年中，這一制度在其他幾個勞工團體中也實行了。到了一八五九年，全國機械工與鐵工工會建議其所屬各地方工會考慮八小時工作日問題，這一建議更曾在該會一八六〇年的年會上再次提出。次年，全國鑄工工會指派了一個委員會，草擬關於“進行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的計劃。該會曾報告說，許多鑄工都贊成普遍採用八小時工作制，並且相信，這種制度“對於工人階級的生活的改善，以及對於工人階級的文化和教育都將有所幫助”。

但美國勞工為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組織方面所採取的第一個重要的步驟實發生於一八六三年。那一年，機械工與鐵工工會的代表會通過了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日的決議，並稱它為“對於我們工人們的一個極端重要的改變，和這個問題相比，其他的一切就都只是次要的問題了”。同時，波士頓行業工會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這兩個機構各派出了一個委員會，並且共同保證委員會有八百元的財政預算；委員會的職責是發動一個對工人進行教育並在議員中進行活動的運動以實現這一改革^⑤。“芬區爾工會評論”於一八六三年十月十日也參加了這一運動，該報說：“今天我們把‘每日勞動八小時’這個旗幟釘在我們的旗杆頂上了。”

各商業報紙仍一如往昔地攻击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領袖們，說他們都是些外國人⁶⁶。自然，外籍工人在此运动中确曾起着很重大的作用，但这一运动所以發生的根源乃是決定于美國的工業情况，而与其拥护者的民族籍貫是毫無关系的。同时，該运动的主要領導人实是一个土著的美國工資收入者，机械工与鉄工工会中的一个忠誠的會員。这个人就是波士頓的一个机械工伊拉·史都華；社会主义的“劳动旗帜”报曾称他为“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發起人和創造者”⁶⁷。在一八六三年說服了机械工与鉄工工会及波士頓行業工会因而使它們發动了偉大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是史都華。使一个由一些分散的組織所領導的要求縮短工时的运动，变成一个統一的向各州及全國立法机关提出請求以实现这一目的的运动的是史都華。進一步發展了証明縮短工时这一要求的合理性的重要理論的也是史都華。

一八五〇年，当他还是一个十九歲的青年的时候（他那时是一个机械工人的学徒，每日工作時間是十二小时），史都華就決定要終生献身于爭取縮短工时的事業。而在他剛一开始对于縮短工时的問題進行宣傳时，就立即被厂方解雇了。这一次的經驗更增強了他要推進縮短工时斗争的意志；他在他所寫的小册子中和寄給報紙的書信中，在他所作的講演中以及当他能和立法委員會發生接触时，他都尽力提出他的理論。厂主們和那些商業報紙当然決不会为他所动，可是知識分子、工人和許多政界人物却都被他的理論所說服了。議員查里·薩姆尔在和伊拉·史都華進行了五個小時的談話之后，就改变了主張，投票贊成八小时工作法令。杰西·瓊斯牧师承認他在听一次史都華的演說之后，原來对八小时工作日的建議所怀的反感就完全消失了。他說：“我所見到过的一切学

院里的教授或政治經濟學專家，我認為他們中沒有一個不可以從史都華的講演中學到一些有關勞工的政治經濟理論方面的可寶貴的知識。”⁶⁸

史都華的主要論點是，“人民大眾的風尚、習慣和意見”，代表着世界上最強大的一種力量。他論辯說，勞工對生活的要求是極有限的，但這是因為過長的工作時間使得他們簡直沒有機會想到他們還有更大的需要。一個每日工作十四小時的勞工既沒有這種意念，也沒有精力去要求得到更多的工資。在過度勞動的折磨下，他一天所能想到的只有吃飯和睡覺兩件事。史都華問道：“在他們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享受較高的工資所能買到或取得的享受時，他們又如何會因為這方面的刺激而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呢？”如果工作時間減少了，空閒的時間就可以產生出新的要求和欲望來。而要為了滿足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就必須逐步提高工資。他說：“變更或改善了勞工的日常生活習慣，他們就會不顧世界上任何敵對的力量去爭取增加自己的工資；但這種情況，只有使他們有更多的空閒或時間時才有可能！”⁶⁹

史都華一再強調他的這個主要論點，以使工人們了解，即使工時減少了，工資也絕不會降低的。他甚至还使他妻子瑪麗·史都華所寫的一聯詩普及到群眾中去，這詩向工人保證：

不論你的工作是計件還是計天，

工時要縮短，工資要加添⁷⁰！

在史都華看來，八小時工作日還不僅只是一種獲得較高工資和更多閑暇時間的手段；它更是保存美國民主制度所不可缺少的東西，因它使民主制度不致受到“資本家通過對全國文學、政治和報紙的控制所進行的腐化”。較短的工作時間就會使得資本家們

和各个公司不可能違背工人們的意志，去剝奪他們为要研究本國的政治制度所必需的時間和机会。

而且，史都華更進一步論辯說，八小时工作日，对于減除工人階級的一切困苦，和为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秩序准备下先决条件來說，也是必不可缺的。第一，当更多的空閑使得工人群众有机会看清富有的人的衣飾、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时，他們就会要对自己的遭遇感到不滿。第二，更多的空閑將使得工人們有時間去研究各种为求改变社会現狀的建議。史都華說：“如果工作時間不減少，劳工們就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去考慮那些可以把他們从奴役、愚昧、邪惡和貧困中完全解放出來的必需的策略。”第三，八小时工作日可以使熟練技工和不熟練工人團結起來“求得自己的解放”，因为“只要給群众以時間，使他們可以聚集在一起，任何人也就再不能使他們分开了”。第四，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更高的知識水平”，才有可能以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來替代資本主义制度。史都華保証說：“八小时工作制將使做鞋的人和買鞋的人联合起來；他們將比較一下制鞋时所付出的劳动力的代价和買鞋时鞋商所要的价格；在看到这其間的差別时，他們就要开始思考了。”

通过这种思考，就將会产生出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要求，而使資本主义制度归于消滅。在史都華看來，八小时工作日，由于可以使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將能帮助工人階級开始向“最后要达到更平均地分配劳动果实的長途邁進”，因为工資將繼續不断地增加，“直到資本家和劳工完全合而为一时为止”。因此，“通过由于縮短工时而產生的高額工資，乃是跳出工資制度的唯一出路”^①。

照史都華的这种說法，是認為八小时工作日將“保証財富的合

理分配因而最后消滅貧窮現象”⁷²；將取消工資制度，并消滅“懶惰、投機、有階級性的法律、經濟波動、酗酒、賈淫及戰爭”現象等，實是在重彈四十年代烏托邦主義者的老調*。不僅如此，如果相信人民群眾的風尚、習慣和意見是一種可以強迫廠主們自願滿足勞工要求的力量，那也實在是一種太天真的想法。這種強制資方讓步的力量，是只有依靠工會運動和勞工階級的獨立的政治組織才能得到的。

史都華雖然是機械工與鐵工工會的一個很積極的會員，他却并不相信通過工會的活動可以達到縮短工時的目的。他儘管并不反對工人和廠主訂立縮短工時的協議，但他認為這種協議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他的理論是，這種協議，也許可以使一小部分工人享受到八小時工作制的待遇，可是對於廣大的無組織的工人群眾却仍是不相干的。而同時，這些無組織的工人，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仍然長，很快就會削弱了有組織的工人的力量。但如果通過一條法令，規定每人每日只准工作八小時，那麼，所有的資本家就不得不採用較短時間的工作制。那麼，由於閒暇產生出來的新的需要，肯定地將會使得工人們要求並且實際得到較高的工資，生活水平較低的勞工很快就會被提高到和那些享受高額工資待遇的工人

- 在一篇題為“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的意義”的未發表的手稿中，史都華曾爭辯說，他並不認為“只要勞工的八小時工作制一建立起來，所有這一切美好的情況就都會實現”；這樣說，乃是完全歪曲他的理論的。他接着說，“我們的意見是，只要勞工階級在日常工作之外能有更多的閒暇，那可以說不要再借助別的力量來實現北部各州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了……。一切追求進步的策略都是從屬於給生產階級爭取更多的閒暇這一問題的。”（手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伊拉·史都華文稿”中。）

但是像這種片斷的說明，是并不能改變人們對史都華的理論即是八小時工作日將給人類帶來永恒幸福的理論的觀點的。

的水平上去。

配合着他一貫對於進行立法活動的強調，史都華向工人們宣傳把“讓你的選票給你帶來一片田莊”的口號，改變為“讓你的選票給你帶來八小時工作日”。在每一次選舉之前，工人必須詢問所有的候選人：“如果你當選了，你是否願意盡你自己的一切力量為所有工人和技工爭取到八小時工作日……並且使工資仍保持十小時工作日的標準？”^⑬

史都華從不認為工會能夠領導這一政治鬥爭。不僅是許多工會根本禁止討論政治，而且在各本行業中也很少有能代表足夠工人人數去團結全體勞工的工會。很少工會同意放棄其他一切問題，完全集中力量於八小時工作日的要求，因而史都華於一八六四年在波士頓成立了第一個進行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的組織，叫工人大會，後來又更名為勞工改良協會。該會的宗旨是以八小時工作日作為解放美國工人階級的第一步驟。那一年在歐洲舉行的、由馬克思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的代表會議曾宣稱說：“限制工時是使工人階級得到最後解放的第一步。”^{⑭*}

-
- 現在我們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說明馬克思與史都華在這一時期中曾 有過什麼聯繫，但這位美國八小時工作日運動之父對於這位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建人的事業懷著崇高的敬意卻是非常明顯的。在寫給內戰后期美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領袖左爾格的一封信中，史都華曾描寫他在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讀到其中論勞工工作時間那一章時所感到的快樂。他接著說：“我希望人人都能讀到馬克思這一部分著作的譯文，心中永遠存有這種想法，因而我常因為里面有几段對於英語讀者意義晦澀而感到不安。一般的讀者是不會費很大的力氣去求了解的。馬克思博士的才能使我相信，他用自己的語言寫成的原作一定是清楚易懂的。要是我能夠在我自己寫作之外，還能抽出一些時間來，我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將‘論工時’一章及前面的几章重新編寫成一種內容摘要或內容概述的東西。這也特別是因為意義最

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以極大的速度發展着。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共有数百个八小时工作日的同盟会成立起來；一八六八年初，即在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五十多个这一类的同盟会在進行活动。在那个时候，以州为單位通常称为八小时工作大同盟的組織也已在伊利諾、印第安納、密西根和爱俄華等地存在。这些組織的主要力量虽然是來自工人，但是許多農人和其他非工資收入者也参加了这种同盟。一八六六年时，紐約市所有的工会差不多都有代表参加了在該市成立的八小时工作同盟总会，全國木工和裝配工人工会的主席湯姆斯·克拉克是該总会的副會長^⑮。

战争期間，劳工为八小时工作日所進行的活动，都是对于战后的計劃的一种貢獻。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中極少有人曾要求在战争尚在進行期間就开始進行爭取縮短工时的活动，因为工人們都懂得那样做会損害战斗力量，延長取得勝利的時間。他們的主要論点是，八小时工作日將有助于战后必然發生的失業問題的解决。另外一个有力的論据就是，如果全國政府和各州政府准备在將來开始实施較少时数的工作制，軍隊的士气就一定会提高^⑯。僅用一些空洞的政治辞令來向退伍軍人作保證是不够的。“芬区尔工会評論”曾提出質問說：“尽管并沒有人反对，我們的光荣的兵士們在战争結束後应当受到正当的照顧，可是我們作了些什么積極的准备以便在那时給他一些，那怕是極少的一点幫助呢？”劳工們要求在

晦澀的几節都正好是在原書的第一部分。我以后將多引用几段馬克思博士的文章，以便把他介紹給我國讀者，使他們更熟悉他的名字。我從來不知道他对于工时問題談过多少。”（原信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伊拉·史都華文稿”中。着重点系原信所有。）一八七七年美國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英文節譯本，譯者是約瑟夫·衛登麥爾的兒子奧托·衛登麥爾。“資本論”第一卷的權威性的英譯本是由恩格斯編輯，塞米爾·穆爾翻譯的，該書于一八九五年出版。

战争结束后实施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实在是完全合理的。“在軍隊中服役的技工和工人們都起來为此而呼吁吧，讓这一呼声响遍自得克薩斯直到馬里蘭这一区域中的每一角落！”^①

正忙于为搶夺着公共土地的奸商們的利益服务的國會和各州議院，对于这种合理的、愛國的呼吁是完全無动于衷的。数百万畝的公共土地都已落在投机商人們的手中了；这样，兵士和水手們便被夺去了一大部分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打算要在那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的土地。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者的預言很快就变成了事实。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七日，“芬区尔工会評論”的一位記者寫道：“正如人們所預料的，街头已經挤滿了找不到職業的退伍軍人了。”此外，原來參加战争物資生產的一些工人，也参加了他們的这种尋找職業的隊伍。一篇叙述制鞋工業情況的文章曾談到“劳工之間在尋找職業方面的可怕的競爭”和随之而來的工資的減少^②。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芬区尔工会評論”的社論說：

“要是國會当时能够聰明一点，通过一条有实效的法令，宣告在和平恢复后必須縮短工作時間，那我們的这些勇敢的弟兄們一定还能够有一条出路；可是現在他們却只能依靠某些人的仁慈心腸了，而那些人却又是从不肯放过任何机会去牺牲別人的福利和幸福以飽自己的私囊的。”

有远見的劳工領袖們說，当前的情况要求劳工和复員軍人團結一致共同進行建立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一位評論家曾提醒各工会和八小时工作同盟會說：“只要采取適當的方法，成千上万的复員軍人，其中大部分在战前本都是工人，都可以被團結起來以壯大它們的隊伍，增強它們的力量。”^③ 在某些地区这一建議頗受重視，并有一些工会會員和联邦軍复員軍人的联合組織因此成立起

來了。在一八六五年七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麻薩諸塞州的某些工會及復員軍人聯合會的代表們開了一次聯席會，議決在全州各地組織地方性的八小時工作同盟會。很快便有若干擁護“士兵和工人權利”的地方性組織成立起來了^②。

許多工人都認為唯一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是縮短工作時間，這樣就可以把現有的工作分配開來。另一些工人則認為從生產合作社和幣制改革可以找到解決辦法。史都華的綱領卻把一切進行縮短工時運動的工人們都團結起來了，雖然這種團結仍只是暫時的*。無疑問，也有少數一些有組織的工人沒有參加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巨大運動，他們害怕工時的縮短將會使工資因之降低。但這些人肯定只占少數。許多決議、群眾集會以及無數次的罷工運動已使得八小時工作日問題成為內戰後的數年中美國工人階級“當前最重大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這一運動“以特別快車的速度，由大西洋傳布至太平洋，由新英格蘭傳布至加利福尼亞”^③。一八六七年木工和裝配工人全國會議所發表的談話，實在是代表全部美國工人的意見的：“我們認為工人階級目前的最重大的問題就在於減少體力勞動的時間……。”^④

使得全國工人都在單一的一個問題上團結起來的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鬥爭，給全國勞工聯合機構的組成提出了新的推動力量。

* 爭取以八小時為合法工時的最有力的論點之一是，即使不能做到實行八小時工作日，這一鬥爭至少可以迫使廠主們實行十小時工作日。

第十八章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劳工运动

要最好地了解紧跟在内战时期以后的劳工运动的各个方面，就必须研究一下全国劳工会的兴起与衰落的情况，必须分析一下该劳工联合组织所关心的各个问题。同时，如果再研究一下全国性和地方性工会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我们就可以了解全国劳工会所采取的立场，对于各个地方工会来说究竟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性。

全国劳工会的成立

全国劳工会的产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地方性的劳工组织的力量永不可能消除工人所遭受的苦难。非常明显，“只有使自己的斗争成为全国性的斗争，并且建立全国各州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工人们才有希望争取到较好的生活^①。内战对于美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已使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了。正如“罗彻斯特工会与广告人日报”于一八六六年九月五日在号召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合组织时指出：

“开始行动的时间愈延迟，工人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愈困难。资本家已渐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强大。刚刚结束的这一战争以及由战争而产生的一切，已使得资本家的力量较前更为壮大了。他们完全依靠牺牲本国劳

工們的利益已積累無數萬元的財富，而這種日益集中的資本，就會要在不同的程度上被用來打擊工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方面的努力。”

雖然全國勞工會並沒有能夠完全建立起那迫切需要的“全國各州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動”來，但該會興亡的歷史却頗值得我們作一番廣泛的研究，因為差不多現代美國勞工運動所面臨的每一個基本問題都曾在該會的代表會上經過詳細的討論，同時因為，如果不对這一組織的歷史作一番精深的分析，我們就無法了解內戰後美國工人運動的基本理論。

在一八六四年國際工業大會失敗之後，人們更曾幾度試圖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勞工聯合組織。一八六六年二月，馬車制作工人國際工會主席威廉·哈爾丁、國際鑄工工會主席威廉·夕威斯和鐵工與機械工人工會秘書喬納桑·芬區爾曾在費列得爾菲亞會談，討論建立全國性勞工聯合機構的必要性。他們曾發出通知，邀請各地方性和全國性的工會派遣代表出席預計在紐約市召開的籌備會議。有十一位代表，其中大部分來自新澤西和紐約，应邀出席了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紐約召開的會議，並計劃於八月二十日在巴爾的摩舉行全國勞工會議。該會委派了一個由威廉·哈爾丁領導的委員會以便與巴爾的摩的行業工會聯繫，共同籌劃召開全國勞工會的工作。

他們向全國各行業工會、工人工會、八小時工作同盟會以及各個勞工組織中的負責人和會員們發出號召，請他們派代表來參加這一會議。號召宣稱，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運動現已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它要求我們“在一切有關勞工改革運動的問題上採取互相配合的、一致的行動”。因此，舉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以作為我

們在行动上互相配合或采取一致行动的基礎”实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會議并將以如何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使每日工作時間減至八小時的問題視为本会的特殊任务②。

第一届代表会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會議開幕的那一天，一面橫掩瑞斯頓大樓的大幅標語飄動着歡迎到会的代表們，上面寫着：“歡迎來自東、南、西、北各个方面的劳动兒女。”出席代表共六十人，其中有來自四十三个地方工会的代表三十八人，十一个行業工会的代表十二人，四个八小时工作同盟会的代表六人，一个國際性机构的代表二人和一个全國性工会的代表二人*。据“紐約时报”估計，派代表参加該会的五十九个机构共代表六万多人民群众。代表中的大多数虽都是來自东部各州，芝加哥、底特律和聖路易也各派來三位代表。以地方性的工会論，建筑業的代表最多，其次是造船木工業、鑄造業和机械業。只有全國皮革業工会和馬車制造業工会派來本工会的負責人，但另有三个全國性工会的負責人是如波士頓工人大会和聖路易工人协会一类的机构派來的。此外，机械工与鉄工工会的秘書乔納桑·芬区尔和主席奥特雷，磚瓦工人工会主席槐特和木工与裝配工人工会主席蕭都自始至終参加这个會議，并享有發言权。总起來說，至少有六个全國性工会的十一位負責人参加了这次會議③。

該会的許多工作都由各委员会分头進行，如全國經常組織問題委员会、工会組織与罢工問題委员会、合作会社与罪犯劳工問題

* 此处全國性工会的代表原文为一人，但細数相加不符。据俄譯本改。

委員會、八小时工作制与政治行动問題委員會以及議案委員會等。同时并另設有一特別委員會以起草一篇“致美國工人書”。

以“工人拥护者”的編輯安德魯·凱默昂为首的工会組織与罢工問題委員會，着重提出將所有熟練及不熟練的無組織工人組織進工会的問題，并進一步建議在一切尚無工会組織的地区和行業中成立工会。該委員會并建議成立各工業部門的國際性組織。了解到許多不熟練工人不能參加現存的行業工会，該委員會因号召為他們成立一般性的工人协会，附屬於全國劳工会，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該委員會所作关于罢工問題的一篇很長的報告，称罢工為“給劳动階級造成極大損害”的东西，并且劝告工人們，除非“……在用尽了一切和平的、正当的办法”，不得不以之作為最后手段时，应極力反对罢工。該報告建議用協議的办法代替罢工，并建議每一工会协会都指派一个处理一切劳資糾紛的調解委員會。

會議一致通过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并在兩項重大的決議中充分發揮了該報告的精神；第一項決議宣稱，參加劳工組織，和在尚無此种組織存在的地方成立这种組織，乃是每一個工人的最重要的責任。該決議号召每一工会派代表參加工会协会或工人大会，并協助組織各行業的全國性及國際性機構。第二項決議則对罢工頗有疵議，主張非在已經用尽一切正当手段后，不得采取此种行动^④。

會議也討論了政治行动問題，因八小时工作制与政治行动問題委員會曾提出報告，建議各地区自己決定究應單獨提出工人候選人名單，或与現有的政党合作。少数一些代表曾主張对這一報告不予考慮，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政治行动問題已超出了工会活动

的範圍，如果大会通过了該委員會的报告，即將使本会变成一种政治性的組織。但代表芝加哥德籍工人协会的爱德華·施列格尔的發言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說，該报告所提出的一切，实在还不够得很，他号召劳工們立即与旧有的兩個政党脫离关系，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工政党。他說，“一个由美國劳工組成的新的劳工政党，必須成立起來。我們似乎覺得不便和旧的政党作斗争，这是不应当的。如果我們的主張是对的，那我們就应坚决幹下去。自由土地党最初只是由几千有投票权的人組織起來的，但如果沒有該党的出現，林肯就永远也不可能当选美國总统。”

他的主張得到會議的一致同意，于是該委員會更被指示重新修正原來的报告，加强在独立政治行动方面的主張。修正后的报告肯定提出，歷史已經証明工人階級决不能信賴任何現存的政党。工人必須与“一切党派断絕关系，打消对它們的偏爱并自己起來組織一个全國劳工党的时期已經來到了”；这个党的第一个首要目标就是使國會和州議院通过八小时工作法令。如果有任何工人有权当选任何职务，委員會的建議是首先就应选举他來担任。但在反对采取政治行动的人們的努力下，該报告又被交回委員會，結果，建立一个全國劳工党的主張却化成为一种極含糊的指示，只是就要“尽快地采取步驟以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党。报告就在这种形式下，以三十五票对二十四票通过了⑤。

虽然大会对于工会組織与罢工問題委員會及八小时工作制与政治行动問題委員會的报告曾予以極大的重視，很多其他面臨工人运动的重大問題也都曾在会上加以討論。大会号召除非罪犯劳工所得工資数能达到工会所定标准，大家应对罪犯劳工所制造的產品進行抵制。會議的決議呼吁取消貧民窟并改善工人的居住条

件；堅決提出公共土地必須為移民群眾所用；建議成立技工學校和專為技工而設的講習班和閱覽室；要求工人們全力支持勞工報紙*；並建議各工會開辦合作性質的工廠，更向它們保證說，“合作制度是消滅目前工業制度中各種不合理現象的最可靠、最能持久的辦法”。另有一條有關女工的決議，則保證對全國縫紉女工及其他勞動婦女予以個別的及全力的支持，並號召希望得到她們那方面的衷心合作^⑥。

會議不僅討論了有關勞工的問題，同時還討論了許多有關整個國家大計的重要問題，如土地改革，居住條件及教育問題等。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霍瑞斯·格利雷曾于“紐約論壇報”發表評論說：

“總起來說，這次會議充分地表現了全國工人的智慧、教養與意向，該會議一定會產生普遍而持久的影響……這個會議，這種代表我國各個區域工人的勞工會議所作的各種討論和決議，標誌着我們的歷史從此走進了一個新時代。”

馬克思在其一八六六年十月九日致一美國友人的信中也曾極深刻地評論說：“與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會議在同一時期內舉行的巴爾的摩美國勞工會議的召開，使我感到非常快慰。那里的會議的口號是：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而最使人注意的一點是，我為日內瓦大會所起草的那些要求之大部分，在那里同樣由工人底正確本能提出來了。”^⑦

-
- 幾種被特別提出來的認為最值得工人們予以支持的報紙是：芝加哥“工人擁護者”、波士頓“每日聲報”和“每周之聲”、底特律“每日團結報”、費列得爾菲亞“國際鑄工報”、特洛依“先驅報”、聖路易“工業擁護者”和芝加哥“改良報”（德文）。

这种不謀而合的情形的一种最顯著的例証，是兩個會議對於八小時工作日問題所採取的共同立場。巴爾的摩會議於一八六六年八月十六日宣稱：“在今日，要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把這個國家的勞工解放出來，頭一件要做的事，是通過一條法律使美國各州，都以八小時為標準勞動日。”兩個星期以後，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會議決議說，“勞動日的限制，是一個必要的預備條件，沒有它，一切別的求解放的努力，都會沒有結果。……我們提議以八小時為勞動日的法定限制。”^② 決議更說：“這種時數限制既然代表着美國北部各州勞工普遍一致的要求，本會議因決定將此項要求列於全世界工人的總政綱中。”

但巴爾的摩會議也的確存在着某些缺點，這些缺點在不久以後，便使這個組織走向了衰亡的道路。這種錯誤就是該會認為罷工“給勞工階級造成極大損害”的這種態度。雖然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期中的某些次罷工運動確曾產生了不利的結果，但這些罷工仍然加強了工人階級的團結，而巴爾的摩會議本身亦即是這種團結的一方面的表現。儘管各工會組織已同意罷工只應用作最後手段，許多工會主義運動者對於這樣一個主張以調解代替罷工的全國性的勞工組織實是不甚信賴的。當然，從事罷工鬥爭的工會也不能從這裡得到任何經濟上的援助*。

* 實際上，全國勞工會根本沒有任何基金，它甚至窮得連自己的會議錄都沒法印發。財務委員約翰·興赤克利夫在一八六六年中只收到地方工會繳來的經常事業費二〇五·二一元，而支出數為一八七·二五元。如不是因為有一個極熱心的秘書，一位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的堅強擁護者吉伯生，這個組織就根本沒法進行任何活動。吉伯生毫不吝惜地以自己的勞力和金錢來維持着這個組織的存在。沒有任何書記人員的幫助，他一共寫過一，三八七封信，分發過二，一五七封油印的公告和五，八一六份宣言和通告。他從財務委員

另一个重大的缺点是該会对于組織黑人勞工問題完全未加考慮。也許有人說，組織一切工人，一切熟練和不熟練工人的号召便已包括了黑人勞工問題，但大會不是曾特別注意到女工所受到的特殊剝削嗎？該會沒有以同樣的態度去關心黑色工人的這種表現，還不過只說明它對於黑人的特殊問題普遍缺乏了解的一個方面而已。該會議竟完全忽視了關於建議問題的鬥爭，而僅只說，“南部農業經濟利益的迅速恢復對於北部勞動人民是有着極大的重要性的。”^⑨

對一切現存政黨一律予以反對，該會議似乎對於黑人勞工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問題——共和黨與他們爭取土地和政治權利的鬥爭的關係——也要完全置之不理了。

該會議的另一項缺點是沒有作出任何如何去成立一個有效組織的決定。因病未能參加會議的威廉·夕威斯認為，會議不曾制定成立全國性組織的全面計劃實是一種嚴重的疏忽過失。他總結這次會議的情況說：“事實是：大會開幕了，會議進行了五天，一條路綫的漂亮的鐵軌已鋪設下來了，上面已放好了一個零件俱全的火車頭；司機和各種助手都有了，他們也都被安插在駕駛台上並且告訴他們往前開去了，但這時不供給他們發出蒸汽的燃料和水便突然停止了自己的工作，讓那座機器不動地在那裡等着，等待一八六七年八月的第三個星期一，那時自會有一次令當地年歲最大的人都感到驚奇的工人大會出現，而那在巴爾的摩以如此的隆重的儀式開始的工作，也自然就會全部完成了。”^⑩

興赤克利夫那里只拿到七五·三八元，一共花費的却有七九一·六二元，不足的錢數完全是他從自己腰包里掏出來的。該會的主席惠雷差不多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領導人。

加强全國劳工会

上述的这些缺点，其中有一些在此后举行的几次會議中已得到了矯正。一八六七年的芝加哥會議，出席代表共有七十一人，代表着六十四個組織。其中有十位來自十個八小時工作同盟會，十二位來自十三個行業工會。地方工會的數目已較前減少——巴爾的摩會議時，代表與工會數各為二十八與四十二，此次則僅有二十七位代表共代表三十三個機構。但全國性工會的正式代表卻從兩人增至六人了——印刷工人、磚瓦工人、馬車製造工人、鑄鐵工人、成衣工人和雪茄制作工人的全國性工會都派來了代表^⑪。

因為過去一年的經驗表明了組織方面的缺點，此次會議仍通過了一種會章。大會授權主席指派組織人員協助建立工人聯合會，各會員並必須簽字保證遵守中央機構的會章，執行中央機構的綱領。全國機構所需要的活動經費，則向各會員工會按其會員人數比例征收^⑫。

這一新會章加強了這個組織，但仍直到一八六八年夕威斯當選為主席後才真正開始為建立全國勞工會而努力。是年十二月執行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會議，決定授權夕威斯“前往全國各大重要都市和村鎮進行活動，以便在群眾中廣泛進行關於全國勞工會各項原則的討論，並在各地建立支會以與總會合作”^⑬。不久以後，夕威斯就和特萊夫立克一起開始了南部各地的巡迴組織工作。在他們三個月的旅程中，他們組織了二十個全國勞工會的支會。夕威斯常給工會的機關報——芝加哥“工人擁護者”——寄去一些令人興奮的消息。他從莫比爾寫道：“我們到處宣講工會組織、合作運動及全國勞工會等的效用，人們似乎都非常感覺興趣。”^⑭

全國勞工會的各州主席，在這種成功的消息的鼓舞下，也開始在各本州發動了組織熱潮。密西根州主席羅伯特·赫特金發表了一個宣言號召工人們在所有各選區、各市鎮或各學校區域中成立勞工組織。他寫道：“任何贊成我們的宗旨，並願為勞工改良運動盡一份力量的七個工人或其他的好公民都可以組織一個工會。”他們只需要寄給威廉·夕威斯一份申請書、五元工會執照費、和一份開列主席和秘書姓名及五個以上會員姓名的名單就行了^⑮。在一八六八年和一八六九年年初那一時期中，從各州送來的報告都表現着一種極熱烈的情緒。俄亥俄州主席報告說，他已組織起來了二十個工會。同時他說：“我向您保證，我決不就此滿足，我要使這一事業不斷前進直到每一個村鎮中都成立了工會組織時為止。”^⑯“工人擁護者”也從其他各州的工人組織者收到很多類似的信。一八六九年年初“芝加哥論壇報”估計全國勞工會會員人數已達八十萬，而夕威斯自己卻認為僅在六十萬左右^⑰。兩種估計實都過分誇大，但會員人數亦確在飛速地增加着。

“紐約先驅報”在評論全國勞工會一八六八年會議時說：“他們所提出的關於重大工業問題的理論及各種有政治家的卓越的見解，實可為我們華盛頓的立法家及一般政客們所接受而使全國貿易及商業之繁榮受益無窮”。夕威斯完全同意這種說法。他乃決心要讓這種新形成的勞工力量在華盛頓方面也能具體表現出來，所以，在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全國代表會舉行會議時，他委派了一個五人委員會作為駐華盛頓的全國勞工會的代表。該委員會的職責是，“監守着我們的工會的利益，讓國會會員和議員們明了我們的計劃和宗旨，並且利用一切機會協助各項工作的進行。”^⑱這是美國工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在國家首都有了一個在國會中進行

活动的机构。

关于全国劳工会究竟做了些什么和还打算要做些什么的问题，最好的回答是对于下列各劳工问题分别作一番研究：（一）八小时工作制；（二）女工的组织和对女权的维护；（三）黑色工人的组织；（四）国际间劳工的团结；（五）合作社和幣制改革；（六）政治行动。

八小时工作日

在一八六六年的巴尔的摩会议休会以前，以会议主席约翰·兴赤克利夫为首的，由每州各选一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即筹划前往会见安得鲁·约翰逊总统。兴赤克利夫将巴尔的摩会议的各项纲领开送约翰逊，要求他给与合作以实现八小时工作日，限制对公共土地地权的任意转让，并终止罪犯劳工制度。总统对八小时工作日问题保持沉默，他仅只说，他个人“赞成在能完成个人职责、满足国家需要的条件下，尽可能缩短工作时间”^①。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会、各八小时工作同盟会和各工会所进行的运动开始发生了效果。国会通过了规定联邦政府所雇用的一切劳工、技工及其他工人一律每日工作八小时的法令。自马丁·凡·布伦总统在一八四〇年发布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十小时工作日的法令之后，这是第一次联邦政府正式承认劳工所提出的要求。

然而，这一胜利所引起的一些更大的希望却并没有实现。有些部门的首长决定按照减少的工时数减低工资。一八六二年七月政府更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政府所付工资数应与造船厂附近私营企业中所采用的工资标准相等。利用这一法令，海军部部长波恩

乃將海軍造船廠所有技工的工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同時他更受到伊瓦特總檢察長及其繼任者霍尔總檢察長的支持。霍尔規定一切政府工作承包人不受八小時工作法的限制²⁰。

勞工們對這些決定曾痛加駁斥。夕威斯寫信給檢察長說：“你和你的在華盛頓的上司們似乎絲毫都沒有意思願為人民辦一點事。”夕威斯接下去說：“國會會員和議員們都可以任意增加自己的工資……。專事欺騙的鐵路公司，土地、黃金及威士忌酒壟斷集團，債券所有人集團，以及其他各種的騙子們的代表都可以得到仁慈的照顧，享受各種特權，而只有勞工則必須接受侮辱，永遠不能抬頭。”但事情決不會長此這樣下去的，他警告說，幸而工人們手中尚握有選票，只要他們能“適當地予以利用”，他們总有一天會得到他們所應得到但“暫時被依靠我們的選票占據政府職位的人們所剝奪”的一切的²¹。各工會及八小時工作同盟會的群眾會議都曾一致保證“在全國都已實現八小時工作日原則以前，決不放棄鬥爭”²²。

夕威斯曾要求格蘭特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對八小時工作法令提出正當的解釋；那時他對這種要求卻完全置之不理，但到一八六九年時他卻被迫不得對勞工的要求予以更大的注意了。他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規定：“對於按日計酬的工人，不得因工時之減少……而減低其工資。”五月二十九日，“工人擁護者”向工人們發出這一可喜的消息說：最後勝利終於來到了！八小時工作已是法定的一個工作日了。

但因為違法的行為是如此普遍，到一八七二年時，格蘭特乃不得不重申一八六九年的命令。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國會因看到選舉期已將臨近，乃撥款補發因政府官員對八小時工作法“解釋

不当”而减除的工资，但因为仍没有作出任何必须执行这一法令的规定，官员们对该法令之忽视则依然如故^{②③}。

至于工人们对于这种不断违抗法令的行为是怎样的看法，一八七四年全美工人代表大会曾作了很好的说明：“美国政府对于有利于富人之一切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法令之执行不遗余力，而对于有利于劳工之八小时工作法，则肆意予以无理破坏，显见该政府本身实为一残暴之行骗机构，而应为诚实正直之人所共弃。”^{②④}两年以后，最高法院更宣称说，八小时工作法并不妨碍政府和劳工商订“多于或少于八小时工作”的协议^{②⑤}。

感到沮丧与悲观的劳工日益增多，他们并觉得一直来为争取在全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法所作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浪费。但这种错误的看法却受到德籍社会主义工会运动者的指责，他们在他们的报纸“工人联盟”中解释说，将每日工时减为八小时的这一法令的重要意义，在于最高立法机关已“承认了缩短工时的必要性，并在原则上和在法律条文上批准了在全国各地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②⑥}。官员们可能会违反这一法令，但全国政府终将采取，并将通过立法程序规定下来的这一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原则是不能变更的。

国会对于八小时工作法令的通过，促使各州议会也通过了同样的法令。一八六六年初，加利福尼亚州州议院曾收到一份长达二十二呎、上有一万一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通过八小时工作法令。结果因为州众院虽通过了这一法令，却又被州参院否决，各工会于是改变了它们的策略。每一工会自行决定一个全体会员只进行八小时工作的开始日期，然后通知厂主，希望他们能够同意这个新的关于工时的规定。一八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洛杉矶共和党周

刊”曾登載了一則典型通告，通知廠主們說，洛杉磯技工同盟會的木工、磚瓦匠、石工、裱糊工人和油漆工人“自公元一八六八年八月十日起，將視八小時為每日合法工作時間，並不容減低目前的工資標準……”²⁷。太平洋沿岸各州八小時工作日運動的領導人亞歷山大·肯納第于一八六八年報告說，加利福尼亞州的每一個認為應該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工會，“都只須簡單地通過一個決議便達到了目的，他們並沒有舉行罷工。廠主們都接受了工會的通告中的要求”²⁸。

加利福尼亞的州議院最後也只得對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法的壓力讓步，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為了慶祝這一法令的通過，工人們曾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火炬遊行。每一工會在遊行隊伍中排列的秩序完全決定於它實現八小時工作日的日期的先後。排在隊伍的最前列的是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就實現了八小時工作日的造船業油灰工人。鉛管工人和煤氣裝置工人們所打的旗幟上則標寫着一八六七年七月，跟在他們後面的則是機器工人、鐵工、銅工及他們的徒工，所有這些人的每日工作時間都還是多於八小時的²⁹。

到了一八六八年，有六個州和一些城市都已通過了八小時工作法。全國的工人都為這些法令歡欣鼓舞，齊聲歌唱：

歡笑吧，你從不會放出笑臉的人們！

如果你一向很快樂，今天你應該發出更高的笑聲！

但這些歡笑的聲音很快就沉默下去了，因為各州所通過的那些法令只不過是一紙空文。紐約在一八六七年通過八小時工作法，但州長芬頓卻拒絕協助該法令的實施。當紐約工人大會要求州長發布公告，命令廠主遵行這一法令時，他回答說，“發布公告要求大家來遵守這一法令，應是一種不正當的僭妄行為。”³⁰

厂主們虽然不能阻止八小时工作法的通过，他們却可以在这些法令中附加一些發生反作用的条款，使之失去实效。“芬区尔工会評論”在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初期就曾对这情况提出警告。劳工必須謹防一切置政府法令于不顧的企圖，該报于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宣称“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条具有積極性的、不論資方或雇工都不能設法逃避的法令”。

这些法令大部分都是充滿漏洞的。加利福尼亞州所通过的一条法令，規定八小时工作日“为本州內任何地区都必須遵行的制度，除非有关双方另有其他明文協議”。伊利諾州所通过的法令則只在“沒有訂定与此相反的特別合同”的地方生效^①。在这些法令通过之后，厂主就通知工人們說，只有願簽定合同，同意進行較長時間工作的人，可以繼續工作下去。私营工業自然毫不迟疑地做效政府所樹立的榜样，工时如减少工資就一定跟着降低。伊拉·史都華于一八七一年呼吁麻薩諸塞州州議院，通过一項禁止减低工資的八小时工作法令，以便向工人們証明，八小时工作日实际上是会使工資增加的*。“首先必須通过实际的體驗”知道工資絕不可能因現在所提議的工时的减少而有所降低，工人們“才会感到滿意”。这一切便是史都華所說八小时工作日將自然產生高額工資的理想的全部結果！全國劳工会的一个委員會报告說，“八小时工作法尽可以不必放在我國的法典中，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愚弄劳动人民的一种騙局而已。”^②

-
- 史都華于一八六九年时寫道：“我們，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者最首要的要求是：在全國、在各州、各城市進行一种實驗，以便讓廣大群众充分滿意地看到，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也决不会使工資因之降低。”（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所存伊拉·史都華文稿中的手稿，“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意义”一文。）

勞工逐漸明白完全依靠法律是不行的。在某些州中，堅持八小時工作日的機構成立起來，並號召用罷工來強制執行這一法令。一八六八年四月，八小時工作法令剛剛通過，賓夕法尼亞州斯庫基爾郡的各煤礦公司就發出通告，要工人們簽訂同意進行長于八小時工作的合同，礦工們于是就進行了罷工。礦工、普通勞工以及技工的代表們在一起舉行會議，並發表宣言反對一切使州法令失效的合同。二萬五千名以上的工人參加了這次罷工；最後，罷工雖然失敗了，但由此次罷工在工人們的心中所喚起的鬥爭精神，却產生了斯庫基爾郡工人福利會^{③③}。紐約城的磚瓦工于一八六八年舉行罷工，原因是州政府當局拒絕實行八小時工作法令中之各項規定。雖然這個歷時十四周的罷工仍終歸失敗，却亦有一千八百工人達到了實現八小時工作日的目的。

三年以後，紐約市各工會發起了一個實行八小時工作法的運動。參加游行的工人在二萬以上。油漆工人工會的大門旗標示出整個游行隊伍的情緒。門旗的前面是一尊大炮，旗上寫着的口號是：“如能有效，我們也願用溫和的手段；如勢在必需，我們就得要用強硬的手段。和平手段如果失敗了；那末就要革命。”^{③④}

次年春天，一次有十萬工人參加，歷時三個月的罷工運動，終使得十個工會——其中大部分為建築業工會——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日的實現。一八七二年六月十日，十五萬以上的工人曾舉行一次盛大的游行來慶祝這次勝利。這次游行所表現的強大的力量使得“紐約時報”也只能說：“調查一下，充實這巨大的罷工工人行列的成千上萬的人里面，真正的土著美國人究竟占多大的比例，那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③⑤}

紐約工人的成功鼓舞了全國的工人。“紐約論壇報”一八七二

年五月二十二日报告說：在数十个城市中，为爭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的罢工都獲得了勝利，其中有澤西市、費列得尔菲亞、布法罗、芝加哥和阿尔巴尼等。这样，到了一八七三年，在許多州中所進行的有組織的斗争，都或以强迫执行法令，或以与資方進行協議的办法，爭取到八小时工作日的实现。但是，一八七三年的大恐慌，却又使这些已得到的成就大部分消失了。

尽管如此，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并不是毫無成效的。这一运动把全國的工人团结起來了，因使工人們有可能在其他方面獲得勝利。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斗争教育了工人，使他們了解，必須要有随时警惕及富于斗争性的工会組織作后盾，在法律方面爭取到的勝利才有可能維持下去。而最重要的是，經過这些斗争，工人們已理解到，劳工必須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進入政治活动的領域。一八六八年，亞歷山大·肯納第在談到加利福尼亞州爭取縮短工时的运动時說：

“……这个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最重大的結果——在那些希望着有一天，有組織的、受过良好訓練的劳工們將在政治界取得正当的合法地位的人們看來——已明白地表現于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們的性格上的顯著改進中。数年以前，加利福尼亞的劳动人口，除开極少数的例外，是完全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自己是散漫無組織，因而也只能对資本家唯命是听。可是今天，每一个技術工業部門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工会，它們規定自己的工資率，調解內部的意見分歧。一种独立的精神，一种互相信賴的感情鼓舞着每一个會員，完全代替以往充滿他們心中的那种怯懦和彼此不信任的思想。”^{②③}

女工和女權

虽然，到內战后期时，工会运动在女工中已漸發展起來，但大部分女工的情况实沒有多大改善。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全國工人”寫道：“尽管我們的工人和技工已是受着極端惡劣的待遇，但誰都知道，为了生活而被迫出來工作的妇女們的境况則比他們更是百倍不堪。”不幸的是，很多男性工会运动者对于这些妇女們仍抱着一种公开敌視的态度。他們認為女工只会加重战后失業現象所產生的困难，并且深信最方便的解决方法是从各个行業中將女工清除出去，并不容許她們加入工会。

然而，战争却使得这个簡單的解决办法沒有实现的可能了。經濟上的需要，使得成千的妇女都進入了工業領域，她們的丈夫很多都在战争中死亡了，或是受了重伤。資本家們对于在战争期間介紹一千五百名妇女参加政府机关工作的特萊維·埃利阿斯·斯平納將軍的报告是很感兴趣的。这一嘗試的結果不僅頗为成功，他并且还报告說，“年薪九百元的”妇女工作者，“和那些比她們多拿一倍工薪的男办事員們相比，在工作的質和量兩方面都更要好得多”^{②7}。如果在政府机关中，只拿半数工薪的妇女們可以和男工作人員作同样的或甚至更多的工作，那末，精打細算的資本家們就要問，在其他的職業中为什么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呢？

一点也不錯！“工人拥护者”于一八六八年报告說，詳細調查后所得結果証明：差不多所有的行業都已开始在雇用女工，借以“破坏工資制度了，那一种劳动力一般是低于……作同样工作的男工的”。其結果則是將工資普遍地降低到女工工資的标准^{②8}。

男工們能把这种工資降低的情况归咎于女工，但是这种敌視

态度却并不能遏止女工数目的日益增长。如果要保持男技工的工资标准，那就必须将女工组织到工会里去。纽约成衣工人雇工工会于一八六五年六月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会员们“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吸收本行业的女工加入工会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自己，同时也使女工们得到最好的保障”^③。

因为有些工会不打算接受女工入会，她们常常不得不自己另行组织工会。在战后期间，女工成立工会的已有女雪茄制造工人、硬领制造工人、缝纫及成衣工人、缝伞工人、制帽工人、纺织工人、印刷工人、家具工人、洗衣工人和鞋工。很多有组织的男工曾经帮助这些女工们建立工会，卓越的工会领袖们也经常在会议上发表言论，号召大家援助妇女工会运动者。当纽约州犹提喀的制鞋业老板们宣称他们将永不雇用参加了制鞋业女工工会——当时极出色的一个女工组织——的女工时，数百名制鞋业男工工会的会员们都扔下手中的工具进行罢工了。当纽约州特洛依的硬领业女工协会，另外一个很杰出的女工工会，号召举行罢工以捍卫自己的组织，反抗厂主们的破坏企图时，它从本市的各男工工会得到很多经济上的支援。自己曾经受到过硬领业女工协会的帮助的铸工工会，捐赠了五百元并保证“宁愿每周继续为她们捐款，也不能眼看着如此英勇的一群妇女受到洗衣店大老板们的铁蹄的践踏”^④。一八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铸工工会一会员在“罗彻斯特工会和广告人报”上写道：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做工的女孩子和妇女们中有很多已在最近的一次决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亲或爱人；但现在这不是太不成话了吗，那些有钱的大公司——钱是它们赚来的，很多都是靠供给政

府的敌人以武器以夺去我們的士兵們的生命賺來的——我說，这不是太不成話了嗎，現在这些大公司竟要剝奪那些孤兒寡婦們——这些孤兒寡婦是它們帮忙造成的呀——正当地賺一点錢來維持生活的权利？但是，有人說公司是沒有灵魂的东西，它們因而也就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虽然大多数工会仍旧不允許妇女直接加入他們的組織，寧願讓她們另行組織工会，可是也有少数的工会了解到只有在妇女們獲得和他們完全平等的地位之后，他們自己的問題才能解决。國際雪茄制造工人工会于一八六七年修改了自己的会章，規定接受女工会員，数年后并采取特別措施將女工組織到和男工相同的工会中去。在全國印刷業工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發展着。該会的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五五年的年会曾反对雇用女排字工人。当代表們出席該会的一八六九年年会时，他們收到了紐約第一号印刷業女工工会的一份申請書，这个女工工会是由紐約印刷業工会在一八六八年时組織起來的。

这份申請書是一份極有价值的談論女工問題的文件。它一方面說明，極大一部分在这一行業中参加工作的妇女們的利益完全被人忽視；同时提醒男工工会主义運動者們說，这些妇女們所处的境况是“不利于整个行業，并極端有害于全体印刷工人的利益的”。她們的劳动力一直是被用來在罢工时期击败有組織的男工，而当这一工作完成之后，厂主們又会把她們遣散了，她們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接受一种低得不够維持我們自己的生活、而同时趋于破坏你們的工資标准的工資数目的工作”。女排字工人，深信“劳工的利益，不論是男还是女劳工，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完全应当受到同样的保护、得到同等的工資”，因而她們組織了自己的工会。紐約

印刷業工会的“援助、積極努力的精神和值得欽佩的榜样”鼓舞了她們。現在她們申請國際印刷業工会承認她們的組織，并准許她們派代表出席國際工会的會議^①。

附在申請書一起的还有紐約印刷業工会所通过的一些決議，表示希望大会能对这一女工工会予以承認。此外，國際工会主席罗伯特·麥克肯基也对此事深表贊同。麥克肯基在他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說，对于妇女劳工的地位的承認，是現在擺在代表們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他并且以紐約的印刷工人在罢工时期曾如何受到女排字工人的帮助为例，說明一个地方工会的能否存在常常是决定于它对本行業的女工所采取的态度。

代表們都深为感动。他們一致通过決議，接受紐約第一号印刷業女工工会的代表們所呈遞的申請書，并尽力帮助女工們单独組織地方工会。一年以后，他們重申他們的这种主張，同时还选举了紐約的古西·魯易斯女士担任全國印刷業工会的通訊秘書^②。該会一八七二年的年会所委派的一个專为研究女印刷工人問題的委员会报告說，“試行单独建立女工工会的結果頗不能令人滿意……其主要原因实以現行的两种（男工和女工的）工資标准甚有差异。”因此大家决定，工会必須維護“能力相同的工人不应因性別不同而予以不同报酬”的原則。同时为使这一決議發生实际作用，乃更决定此后將不再頒發女工工会執照，而建議所有各地方工会，“在与男會員各方面一律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女印刷工人入会”^③。自此以后，女工乃可以直接加入工会，并与男會員享受平等的权利了。

这种对待女工的友好态度的產生，实是頗受全國劳工会的影响的。該会在一八六六年的成立大会上，即曾保証“对全國……劳

動婦女予以個別的及全力的支援……”。兩年以後，該會在其一八六八年的會議上，表揚了特洛依硬領業女工協會主席凱特·穆朗尼為女工的利益所作的“不倦的努力”，並選舉她為該會的副秘書。此外，此次會議更勸告婦女們“學習手藝、參加各種活動，加入我們的工會或者組織她們自己的自衛會，並採用一切其他的正當手段勸請或強迫廠主們公正地對待婦女，對相同的工作應付以相同的工資”^④。這是美國歷史中第一次由一個全國性的勞工組織提出了贊成相同的工作應付以相同的工資的意見。

馬克思曾表示，全國勞工會的這種進步的立場，已使它成為世界勞工運動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組織。他曾給一位美國朋友寫信說：“上一屆美國勞工會的代表會議很顯著地表現了極大的進步，這裡，尤其是它曾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來對待女工。在這一方面說起來，英國人，甚至一向更為善視女性的法國人，也都顯得思想非常狹隘。任何一個略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沒有女性的鼓舞，任何巨大的社會變革都是不可能的。女性的社會地位可以說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程度的精確的標尺。”^⑤

急切地希望從勞工運動方面得到援助的婦女參政運動，也很自然地 toward 全國勞工會求援了。有四位婦女勞工組織的代表參加了該會一八六八年的會議，她們是第一和第二號女工自衛聯合會的代表蘇生·安桑尼和瑪利·開洛格·普特倫；紐約費爾農山女工自衛聯合會的瑪利·麥克唐納和婦女參政運動會秘書伊利莎白·凱第·斯坦頓夫人。除去斯坦頓夫人外，其餘的代表都被接受了，斯坦頓夫人的申請書被送交大會討論。反對接受斯坦頓夫人的人們辯論說，參政運動協會按照會章規定不能算作勞工組織。最杰出的女權運動領導者蘇生·安桑尼却出來為她自己的同志申辯，並

警告代表們說：“不同時提高妇女的地位，我們就不可能提高男工的地位，而要使她們的地位提高，就必須讓她們有选举权。”威廉·夕威斯更給她坚强的支持，他在建議讓斯坦頓夫人參加會議時宣稱：“她是她所生活的时代中最勇敢的作家之一，就我所知，她在为提高她自己的階級，以及我的階級的地位方面所尽的努力，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而上帝知道，这些階級的地位是需要提高的。”^{④⑥}

經過許多人發言之后，終於達成決議，接受了斯坦頓夫人的申請書，通過決議時的票數是四十四對十九。當十八位代表威脅着要離開會場，並退出全國勞工會時，該會乃又通過了一項緩沖性質的決議，明確規定：接受斯坦頓夫人作代表決不表示全國勞工會已經贊成了“她的一些特殊主張”，或已決定從事爭取婦女选举权的活動。婦女參政運動者所遭受的另一次失敗，是代表們拒絕了婦女勞工委員會所提出的必須在決議中包括“爭取选举”一語的建議。

但在婦女參政運動的領袖們因會議拒絕了她們的建議而感到失望時，她們卻又因看到大會所決定的一些積極援助女工的措施而深為感動，並認為這是“工人會議的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斯坦頓夫人說，“如果，國家的利益掌握在這樣一些人的手中，那一定是極為安全的”，並且說，這次代表會上所提出的討論，“比美國大陸上任何一次政治家們的集會上的討論都要高明得多”^{④⑦}。

然而，女權運動領導者們與全國勞工會並沒有能夠長久保持友善的關係。當該會舉行一八六九年的年會時，女工自衛聯合會的代表蘇生·安桑尼和麻州第三號精誠同盟會的代表馬薩·瓦伯利支都提出了入會申請書。但紐約第六號印刷業工會的代表華爾許，因反對接受安桑尼女士為代表，乃向大會提出他自己本工會的

一个決議，該決議說，“接受她為代表實是對整個組織的一種侮辱。”同時指責她會利用女工自衛聯合會作為一種專門破壞罷工的機構，在罷工的時候供給女排字工人以代替男工的工作^{④8}。

安桑尼女士對這些指責完全承認，但她辯解說，她所以這樣做，乃是因為這是婦女能在這一行業中獲得經驗的唯一方法。結果在第一次投票時以五十五票對五十二票的多數通過了接受安桑尼女士為代表，這就說明許多代表是了解她所處的困難情況的。這一決定後來又被推翻了，第二次投票以二十八票對六十二票拒絕了她的申請。安桑尼女士自辦的“革命報”於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宣稱說，“男性勞工階級將永遠是婦女參政運動的最凶惡的敵人。他們最近以來對待安桑尼女士的行為，乃是他們仇視她所代表的思想的一種表現。”

這種攻擊是不大公正的，因為會上的發言證明，大家所反對的並不是安桑尼女士，而是她對於工賊活動的辯護，這是“違反所以建立工會組織的主要原則的”^{④9}。事實上，夕威斯、特萊夫立克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全國勞工會的男性領導者都是最先進的女權維護者。夕威斯曾說，“為什麼婦女不能享受男子所享受的一切社會和政治權利？我希望，不會很久，全民選舉和全面自由將在全世界實現。”*^{⑤0} 全國勞工會的另一領袖休姆也同樣有極明確的表示，他寫

-
- 夕威斯於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全國勞工會舉行一八六九年年會的前夕突然死去，無疑是極不利於勞工與女權運動領導者之間的合作的。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的“美國工人”發表談話說，“我們不禁想到如果夕威斯先生還活着，對於反對安(桑尼)女士，是決不會採取如現在這樣如此有組織、如此積極和堅決的行動的。無可懷疑，故主席與安桑尼女士的觀點在各重大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同時‘革命報’的影響一直是有利於她曾出席作代表的那個機構的。夕威斯先生……始終都熱誠地贊助她的報紙。”

道：“只有劳工事业的胜利可以解除她们的痛苦，而这种胜利实深有赖于她们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的取得。我们可以信托我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们在投票箱边帮助我们推翻财神的统治。”^⑤

但并非全国劳工会的全体会员都已有了如此进步的了解。他们中仍有一些人认为妇女是比男人低下的，而且在智力和气质方面都不适宜于参加选举。另有些人则认为，选举问题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事，全国劳工会既然维护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原则，即等于是“承认了一切有关妇女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参政权”。更有一些人则认为要争取妇女选举权决非短时期内所能做到。而“我们的事业是只和那些已有选举权的人有关的”^⑥。这种狭隘的观点实为造成女权运动者的敌对态度的重要因素，但是安桑尼女士和她的同志们也同样采取了一种极狭隘的观点，她们只知道攻击，而不去教育那些落后的工人。

安桑尼女士和全国劳工会的关系的破裂，并未影响劳工会对女工问题的关心。该会仍不断鼓励女工们进行组织，并经常希望得到她们的合作。全国劳工会的组织工作者随时都邀请女工们出席地方工会和州工会所举行的会议，并且推动她们入会。在该会

虽然女权运动的代表们对于劳工问题实是不甚关心，但“美国工人”指出，“革命报”对这些問題一般都采取一种进步的态度，这一点仍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篇于苏生·安桑尼所有，由伊利莎白·凯第·斯坦顿和派克·皮斯伯利先生担任编辑的周报，曾于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发表评论说：“劳资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资方从工业中吸取超过它所应得的利润。劳工则被剥夺去了他们名分中应得的报酬。富者越来越富，而穷人则是一天比一天更穷。”该报并经常提醒工会主义运动者说，“在受压迫更深的女工的权利不能得到实现以前，他们的一切自救和提高自己的努力都只会是徒劳的。”（见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革命报”。）

一八七〇年的代表會上，四位女代表中的一位，芝加哥縫紉女青工工會的維爾拉德夫人當選為該會的第二副主席。一年以後，已改任芝加哥女工工會代表的維爾拉德夫人又再度當選^⑧。

全國勞工會在尚未準備贊助婦女參政運動的時候，却已成為女權的擁護者了。該會曾保證對有組織的女工予以援助；要求在女工中同樣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要求國會和州議院通過法令，規定在政府中工作的婦女和男子同工同酬；在各個行業中堅持同工同酬的原則；並在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上，接受婦女代表，更委派她們參加重要的委員會，選舉她們擔任本機構中某些領導職位。

但儘管如此，在一八七三年時女工的地位較之十年前並沒有多少提高。三十多個全國性工會中只有兩個接受女會員——印刷業和雪茄製造業工人工會。而婦女們又發現要靠各個分散的工會來維持她們的組織形式根本不可能，到了一八七二年大多數的女工組織也就全瓦解了。完成美國女工的組織工作尚有待於將來的努力，而且還要經過很多年的鬥爭，大多數有組織的勞工才能逐漸了解全國勞工會的領導者之一和起領導作用的社會主義者休姆的話。他在一八七〇年時說，經過長時期仔細的研究之後，他才深刻地認識到，美國女工的處境要想得到改善，必須要等到有組織的勞工已完全了解勞工的勝利基本上依靠着“加強勞工力量中的最軟弱的一部分的時候，因為資產階級的主要力量實系產生於勞工隊伍內部的分裂”^⑨。

第十九章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 劳工运动(續前)

在內战結束了兩年以后，全國劳工会曾向美國工会运动者發出通告說：“黑人人数共有四百多万，他們之中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劳动的人所占的比例数，較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入种都要大，我們怎么可以拒絕他們自願的合作，而使他們成为我們的敌人呢？如果我們要坚持这种愚蠢的作法，我們將會比資方联合力量所能够做到的更嚴重地危害劳工改革事業……。所以南部和北部的資本家們，为了他們的利益和情况的需要，总要在白人与黑人之間制造紛爭，使他們彼此互相攻击，借以維持他們的优越地位并繼續其压迫人民的統治。”^① 該通告極力主張白人应与黑人团結。

正由于在美國工人之間，存在着对這一問題的混乱思想，工会运动的發展数十年來都受到相当的阻碍。北部的有組織的工人完全只注意到他們自己的爭取增加工資和反对資方進攻的斗爭，而沒有認識到南部爭取民主的斗爭的結果，將如何影响到他們的前途。

劳工与國家建設

內战剛剛結束之后，南部的黑人劳工馬上就發現，他們新獲得的自由与过去他們所处的奴役地位是沒有什麼差別的。种植園所

有者仍舊是主子，旧的束縛自由黑人的自由權的種種限制依然存在。自由主義的德籍美國人領袖卡爾·施爾茨，戰後不久到南部去游歷了一趟後報告說，以前的奴隸主仍舊把已被解放的黑人看作為自己的當然財產來對待，在從前的那些主子們中間一般最流行的態度是，“黑人的存在只是專門為了替白人種植棉花、谷米、和糖作物的，因此他們完全沒有權利像其他的人一樣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追求自己的幸福”②。

黑人雖曾以歡欣的心情迎接“解放宣言”，但除了政治權利和人權之外，他們還要求讓他們的自由有其物質基礎。具體地說，他們要求土地——四十畝土地和一頭驢子。這種民主的要求，雖然在從前的奴隸主和他們的北部的同盟者看來簡直是可惡的及荒謬的，實際是和四十年代時期北部白色工人所提出的“讓你的選票給你帶來一片農莊”的口號一樣自然的。在黑色工人看來，土地的占有才真正表明他們是從奴隸主、監工和奴隸制整個那一套制度下解放出來了。他們一般的口頭禪是，“除非到了每一個人都能栽種自己的棉花，並且能說：‘這是我們的’的時候，我們仍將是奴隸”③。

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絕大多數的黑人羣眾並沒有得到土地。相反的，在約翰遜總統的統治下，他們所得到的“黑人法”^④

- 在“黑人法”的名義下，沒有工作的黑人要被逮捕和監禁起來。為了償付牢獄費用和罰金，他們又要被租出去給別人作工。如，黑人在合同期滿之前，脫離了自己的工作，他就要因違背合同規定而被逮捕監禁，逮捕他的人的報酬則從他的工資中扣除。法令中某些條款規定，如黑人勞工自動離開他的雇主，他的“離去前應得的全部工資將完全被沒收”。黑人兒童的父母如被認為已窮得不能供養他們時，他們就必須送出去為人做學徒，女的到十八歲為止，男的到二十一歲為止。密士西比的法令規定，黑人如果付不出貧民救濟稅款，他將被作為游民看待，並被租出為人傭工；此外，更明文規定，在這種情況下，“除法律已規定改變的審判和處罰的方式和方法外”，奴隸私有制時期的一切

这一法令，解放人事务所向國會报告說，“实际是帮助过去的奴隶主階級獲得他們在战前所一向慣于享受到的那种免費的劳动力。”^④在大多数州中，解放人事务所終能使得“黑人法”从政府的法典中一筆勾消。但是由于事务所不能分配土地給黑人群众，它也就不能为南部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經濟基礎。最后，因为解放人事务所威脅着要以游民罪控告所有未訂合同和未被雇用的劳工，黑人被迫仍回到他們原來的主人那里去了。事务所里的梯尔遜將軍說：“这个計策真像符咒一样灵驗。”^⑤

在一八六五年的夏季和秋季，黑人在南部举行了数次會議以抗議約翰遜政府和“黑人法”。出席这些會議的代表大部分都是种植園工人，但城市技工却常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南部黑色人口开始進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他們僅僅要求政府承認黑人作为合众國的公民的权利，因为在保存这个國家的生命方面他們也曾經尽过一份力的。他們要求合理的、公平的劳动报酬，使他們的兒童能有受免費教育的机会，保障他們的家庭，以及取消“黑人法”^⑥。“这些”，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在查里士頓召开的南卡罗來納有色人种會議所通过一項決議說，“是自由人应有的权利，并且是任何共和政体的政治所固有和必不可缺少的东西。”^⑦

当南部黑人群众正在進行反約翰遜政策的斗争时，奴隶取消主义者亦正組織一个全國性的运动，以制止他的要想使奴隶主寡头政治复辟的企圖。北部的許多工業家們也在这一偉大运动中和

法律仍为完全有效。(見弗尔農·華爾頓于一九三九年在北卡罗來納大学所寫而未發表的博士論文“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〇年間密士西比的黑人”，第一四五——一五〇頁；又保羅·李文遜：“种族、階級与政党”，一九三二年紐約版，第三二頁及以下諸頁。)

他們聯合起來，這些工業家們很了解，他們對於全國政治的控制，是有賴於摧毀地主階級的寡頭政治和建立南部的民主政治的。而約翰遜的計劃則威脅着要使戰爭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成就全部歸于消滅。南部北部的民主黨人以及西部懷着不滿情緒的農民團體之間的團結，已使工業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共和黨的權力受到了威脅。保護關稅可能很快就要為自由貿易所代替；國家銀行制度很可能被完全取消；金融制度定可能會被消滅而代之以人民均可得到低息貸款的制度。因此，毫不奇怪，在戰爭期間抓到對政府的控制权、現在更希望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保衛這種既得權利并同时使美國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國的那些人們，現在已開始認識到，只有擁護南部的民主事業，才有可能確保內戰的勝利果實^②。

急進共和黨人之所以反對約翰遜計劃，後來並以建設法案作為他們的政綱的主要焦點是有其一定的原因的。建設法案中的第一項是在一八六七年二月通過的，規定授黑人以公民權，褫奪南部聯邦主義領導者們的公民權，並召開新的立憲會議以制訂建立男子普選制度的州憲法，其所制訂之新憲法必須經大多數公民及國會通過。然後，方允許南部各州重新加入聯邦。

在這一反對南部寡頭政權的鬥爭中，勞工運動採取了什麼樣的立場呢？有些工會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德籍工人，參加了反約翰遜建設計劃的取消主義者與工業家的聯盟。他們認為，沒有一個人應該“僅僅因為他的種族、膚色、信仰或財產的關係”被剝奪掉選舉權。過去的奴隸主，有一位工會運動者曾說道，實是“文明世界上最壞的一種資本家；他們這些人沒有一天不在主張資本應該占有它自己所需的勞動力，認為窮人所處的地位就應是奴隸的地位，不管他是白人還是黑人”。要想消滅黑色工人的那些人，如果得到

了勝利，他們立刻就要尽力去消滅白色工人的。不久以后便成为劳动者协会的領導人的尤利亞·斯蒂芬斯，在建設时期的初期，即曾強調“为南部已得到解放的自由人爭取到选举权和土地占有权的必要”^⑨。

劳工隊伍中对約翰遜政策反对最力的，是“波士頓夜声报”，波士頓及其近郊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該报指責过去的奴隸主实决心要使黑人“处于比奴隸制更坏的——如果还有什么可能比它更坏的話——一种暴戾統治下”。該报警告說，“任何工人，都不应被發現同那一帮人混在一起。”

“如將黑人选举权問題交給过去举行叛乱的各州中的白人去处理，那即等于是那个黑人曾經为它尽过力的政府現在要完全抛弃这些完全無力自衛的自由人了……。在充分承認黑人的人格以前，就不必談什么建設，而对于各叛乱州的情况更应加以嚴格的監視，直到它們可以被信托以政府权力时为止。”^⑩

一周接一周，“夜声报”不断攻击那些准备投降的人，用簡明的道理教育那些思想混乱的人，并引導讀者們進行反对約翰遜的罪惡政策的斗争：

“我們要請工人們想一想，这一(約翰遜的)計劃是会要貶低黑人劳工的地位，降低他們的工价，因而也就將降低白人劳工的工价的……。把黑人劳工放在一种他可以站起來作人的地位上，他們就一定会为自己的工作爭取到一种合理的价格，那我們敢說，同他們競爭的白人也就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工价；但如果使他們变得像一条狗，那他們就只能得到狗的待遇，在那种情況下，無論我們在同他們的競爭中如何占优势，

也決不可能比他們好到那里去的。”^⑪

工業正在向南部轉移，“夜聲報”論証說，南部工人能否得到合理的工資對於北部的工人是有極大重要性的。如果他們工作所得只是“農奴的工資”，那北部的標準就一定要下降。因此，勞工（包括南部與北部的勞工）的共同權利必須得到維護^⑫。該報更說：

“黑人在得到解放後，已進入了自由勞工的範圍並變成了白色工人的競爭者。因此，他們在智力和權利方面，必須在工人運動的原則下，提高到與白人相等的地位，這樣他們就可以與白色工人合作，而不致於因接受低工價的工作而和他們處於敵對地位。而要保證使他們在這些方面提高，就必須讓他們享有選舉權……。如果工人們已經從經驗中學到了什麼教訓，那就是沒有團結——一切勞工的團結——就決無勝利的希望。智力的提高是勝利的必要條件。舉起一只手贊成壓迫黑人勞工，卻伸出另一只手要求提高白色工人，這是何等瘋癲和自取滅亡的行為！資本家是不知道白色工人和黑色工人有什麼區別的；勞工自己也不可能創造出任何區別來，除非他們要破壞自己的計劃，拆毀自己自衛的城堡。

“要想勝利地反抗資方的聯合力量，就必須將全部勞工的力量團結在一起。否則的話，那些被拋棄在團結以外的人們，為了自衛，就會被迫採取和自己的弟兄或階級對立的立場而與敵人合作。如果白人的工會組織擯棄所有的黑人，他們勢必得接受低工資的工作而損害白人的事業。在同樣的原則下，黑人勞工如永停留在愚昧無知任人侮辱的地位上，那也就同樣會損害白人勞工的事業……。”^⑬

有些勞工報紙，特別像“底特律每日聯合報”，卻出來攻擊“夜

声报”，它的理論是，如果“提倡黑人的选举权”，工人思想中原來存在着的偏見就可能引起內部的分裂和冲突。“夜声报”回答說：“我們可以多考慮考慮人們的偏見，但是，如我們已曾清楚地表明过的，我們現在是正在進行一項巨大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黑人或一切男丁均应有选举权的問題——全面自由，徹底的民主制度問題——实是基本的、有決定性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大家認識真理——我們必須要使自己处在光明中，否則我們一定会中途摔倒，而無法达到我們的目的的。”^⑭

大多数的工人不同意“夜声报”的見解。南部的經濟生活究竟是以自由劳动力为基础还是以半農奴的劳动力为基础，这和他們毫無关系。大多数工人仍然把安德魯·約翰遜看成是田納西州的一个貧苦的成衣工人，仍記得他曾于五十年代期間在國會中提出農地私有法案并于一八六二年爭取到該法案的通过。他們看到一个曾經当过工人的人現在却進入了白宮而感到高兴，他們并且和費列得尔菲亞工会协会一样相信，“他將利用他現在的职位所容許他享有的特权維持并提高全國政府，而同时推進工人階級的利益”^⑮。更因为約翰遜曾对某些工人的要求表示过同情，許多工人極願忽視他正在力圖使过去的奴隸主恢复政治权利的事实。当約翰遜下令在政府的印刷厂中成立八小时工作日的时候，劳工報紙乃称他为劳工階級的堅強拥护者，并說他是正协助“解放北部的白人奴隸”。他撤銷作战部所發減低該部雇用人員工資的命令的作为，更使他受到了許多工会的群众大会的讚揚，認為这是“又一次表現了他对工人的同情”。“全國工人”更頌揚說，“一切榮譽归于这位实际同情劳工的總統。”^⑯

同时，工人們对于反約翰遜建設政策的联盟中的各个集团都

抱着懷疑的態度。大部分北部的奴隸取消主義者，頗不像文德爾·菲利浦斯，他們對於有組織的勞工們的各种要求完全不感興趣，並對於八小時工作日問題特別表示反對。民主同盟中的領導力量乃是工業資產階級，這一件事本已足夠使大部分有組織的工人拒絕參加，因為很多工人都認為他們當前的敵人不是那個舊的而是另一個新的奴隸政權。“工人擁護者”曾說，“勞動兒女還不過剛剛在無數的戰場上表露了自己忠於國家的英勇氣概，他們還不過剛剛以一次血的洗禮維護共和國的權利以使它屹立于世界國家之林，有色奴隸的肢體上的鎖鏈還不過剛剛被敲碎，一個從地獄中產生出來的，要想奴役北部白人技工的陰謀却早已形成了。”

工業家與金融家的計謀，該報接着說，不過是要分散群眾對於“勞資鬥爭”的注意，進而“使人民的思想完全不考慮到對於勞工大眾最關緊要的一些問題”。同時，金融家和工業家們將仍繼續搶奪公共土地，並使全國處於一個不合理的金融制度的蹂躪下。那時，當工人們再喚醒大家放棄南部問題轉而注意到北部的發展時，這一陰謀將已經完全實現了，那時美國將不再是一個什麼共和國而只是被金融與工業專制帝王所統治的一片土地而已^①。勞工領袖們不了解，為了一個進步性的國家大計而和工業家們進行聯合，是並不需要勞工放棄反對他們的獨立的經濟鬥爭的。

夕威斯對於急進共和黨的綱領的敵對態度，也反映了勞工思想中的混亂。當夕威斯於一八六九年往南部各地進行組織工作的时候，新的從事建設事業的各州政府正在推行大眾教育，推行對於白色以及黑色的貧苦人民均有重大意義的社會改革法令，並從各方面（在從前由少數幾個富有的，永遠毫不關懷群眾福利的人們所統治的地區），建立更為民主的生活秩序。但在夕威斯給“工人擁

护者”所寫的通訊中，他并没有讓人觉得他对于在南部發生着的各种革命性的变革有多少了解，也没有对共和党的建設政策表示任何同情¹⁸。

但夕威斯却懂得內战并没有彻底地解放黑人。他在一八六八年时曾說，“对于黑人奴隸制的消滅，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感到高兴，但是在奴隸鎖鏈已从四百万黑人的手上解脫下来后，他們却并没有得到自由；他們僅只是从一种奴隸状态轉入另一种奴隸状态而已；他們被放上了白色工人的站台，以便所有的奴隸都集中在一起。我們現在就是一个包括所有奴隸的奴隸大家庭，而（劳工）改革运动就是第二个解放宣言。”劳工改革运动，在夕威斯看来，即是一个新的反奴隸制运动，其目的是在“全國的每一个角落”消滅奴隸制¹⁹。

夕威斯相信，黑色人口的前途完全决定于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但新解放的奴隸却拒絕一个忽視他們的基本要求的劳工政党，他們的要求是：保护他們的政治权利和人权，平分土地及經濟机会均等。而且在共和党的勝利正必需要依靠他們的选票时，他們决不会投劳工党的票。因为共和党，尽管有它極嚴重的缺点，在那时的确代表着黑人的前途。如民主党得到勝利，他們所已爭取到的民主方面的收穫就会立刻全部消失。

因看不出兩大政党之間有什么区别，劳工乃拒絕支持急進共和党中的革命分子。这一政策削弱了急進共和党，使得它与黑人的联盟更不穩定，而加强了劳工敌人方面的力量。如果劳工运动及其在西部農民中的同盟者，和在內战前的那几年一样，極力去影响共和党中的工業家与金融家，南部各州的進步政府被推翻的事也許决不会發生的。

黑色工人的組織情況

阻止白人和黑人勞工間成立必需的聯盟的另一障礙，是有組織的白色工人，對於那些已在北部工業部門中和那些現正大批走到工業領域中來的黑人所抱的敵視態度。黑人技工在南部工業中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據一八六五年估計，在南部，黑人技工人數共為十萬人而白人技工則僅為兩萬人。在煙草、制磚和船用油灰工業以至在鐵路建設及造船廠中，均雇用有大批的黑人^⑳。

北部的情況則不同；在這裡黑色工人只占工人階級中極小的一部分。戰爭一結束，黑色工人與日俱增地轉移到北部來。但一如那些在戰爭期間在他們之先來到的弟兄們一樣，他們到處受到歧視，這種歧視使他們無法進入技術部門工作。很多工會都拒絕他們要求入會的申請，並有不少工會命令它的會員拒絕到雇有黑人技工的工作間中去工作。這種歧視政策更經常得到某些宣傳家的經心扶植，他們堅決認為這種移民情況將加重失業現象，黑色工人將會更降低已在下降中的工資標準^㉑。

磚瓦工人工會哥倫比亞區華盛頓地方工會曾於一八六九年，因為幾個黑人被雇用，在海軍造船廠中發動了一次罷工。該會中的六個會員因曾與黑色工人在一起工作而被開除會籍。該會中有一會員曾公開表示不同意這種政策。他宣稱說，“在我個人方面，我相信我們應該提高黑人的地位，這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我們自己，如果讓他們這樣下去，沒有辦法參加到工會里來，他們只有不管是任何人，給他什麼樣的工價也只得去為他工作”^㉒。而這一工人也並非僅有的例外。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擁護者”即說，“我們還須花費相當的時間，去消除過去的偏見，去克服

那也許是一個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培養出來的那些感情。”

关于黑人劳工的問題，第一次是由全國劳工会在其于一八六七年芝加哥代表会召开的前夕所發表的“告工人書”中提出的。在这一文件中，凱默昂排除那些对于某些會員的成見怀着恐懼心理的人們的反对，坚持說，“尽管这是一个極為复雜困难的問題……但如果对这一問題竟諱而不談，那实在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态度”。現在所需要的，他接着說，“是每一个工会都各尽自己的力量來發揚那个偉大崇高的观念，就是說，讓大家明白，一切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应有什么种族或國際的区分；更不应有什么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分別；世界上只有一条分界綫，那就是將人类区划成兩個階級——劳动階級与依靠別人的劳动为生的階級——的那条分界綫”^②。

一八六七年的代表会上，关于組織黑色工人的問題曾引起激烈的爭論。这一討論是以菲尔浦斯所領導的有色劳工問題委員會的报告为基础的；菲尔浦斯自己的工会——新港木工与裝备工工会——就是排斥黑人的。該报告宣称，委員會已認識到这一問題的重要性以及与黑人劳工競爭的危險，但因为这一問題“是如此錯綜复雜”，委員會提議將这一問題留待下次會議討論。

特萊夫立克和夕威斯不同意这个意見，主張容許黑人参加劳工运动，因为沒有这种团結，工会就会“被殺害掉的”。特萊夫立克坚持說，黑色工人將会是工会运动的一种可珍貴的財產，因为“如果他们作了工会會員，他們就一定会英勇地坚持自己的立場”。代表芝加哥鞋靴工会的凡·多恩也支持特萊夫立克，并強調指出，容納“黑色工人乃是大家对于共同团結所应負的职責”。

大会虽決定將該报告發回重審，委員會却仍对此問題極力逃

避。該委員會所提出的最后聲明是，既然會章并未特別規定黑色工人不能參加全國勞工會，這一問題實無需再加討論了⁽²⁾。

一八六七年八月七日的“夜聲報”，在討論代表會的整個情況時，曾特別着重談到關於在勞工運動中容納黑人的問題的辯論，該報說：

“關於黑人問題的辯論，對一個美國勞工改革者的團體來說，實在是一件極不榮譽的事。這一問題之不應發生是和我們不應提出什麼紅頭髮藍眼睛的勞工問題一樣的。當然黑人應該完全和白人一樣有權利工作和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白人拒絕和他們在一起工作，或者不讓他們有同等的機會，他們為了自衛，當然只得被迫接受低於白人工資的工作；勞工代表會中的某些會員竟會如此受着那種最愚蠢、最邪惡的偏見的影響，而猶豫於對黑人的承認，這對勞工代表會真是一個侮辱。在我們必須排除一切偏見，學習建立大同主義觀念的時候，他們却在這一綱領上把他們的偏見給固定下來了。如果沒有一種較明智的觀念為大家所接受，如果不將這些偏見連根拔出拋擲盡淨，我們是永遠不會勝利的。”

一八六八年的代表會，仍對這一問題採取了逃避的態度，但這時因為有一個新的因素產生更使得進一步的逃避成為可能了。黑色工人已開始組織他們自己的會社，並進行着英勇的罷工鬥爭*。一八六七年，一次罷工巨浪沖遍了整個南部。一八六七年初，莫比

* 好多場合，白色和黑色工人是在一起舉行罷工的。一八六五年，新奧爾良一位觀察家曾寫道：“前幾天碼頭上的白色勞工和黑人共同舉行了爭取提高工資的罷工，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他們原來只拿到二元五角及三元一天，他們罷工要求增高到五元及七元。他們的漫長的行列沿河前進着，白人和黑人都完全在一起”。（見特勞伯利支：“南美：戰場與廢墟的懸吊”，一八六

尔灣的一次罢工慢慢向其他的工業部門發展，結果產生了南部歷史中最激烈的一次群众示威运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查里士頓的黑人碼頭工人也成立了碼頭工人自衛会，并勝利地進行了他們的爭取提高工資的罢工。这次罢工后，查里士頓“每日新聞”称該会为“南卡罗來納最坚强的一个有色人种劳工階級的組織”。二月，乔治亞州塞芬那的船塢工人，他們几乎全都是黑人，也在一次罢工中得到勝利，这一罢工运动是为了要求市議會取消对每一个在碼頭上工作的人課取十元人头稅的規定^②。

一八六七年二月九日的“全國工人”評論塞芬那的勝利時說：“自他們被解放以來，这并不是第一次他們堅決地肯定和維護他們自己的權利。事實是，黑人願意讓他們的工作得到完全和白人一樣的報酬，而他們正迅速地學習着如何去實現他們的要求。”

到一八六九年時，黑人勞工已如此迅速的組織起來以致急需有一個中心機構以聯結各個分散的地方工會。因此，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九日，第一個全州性的勞工代表會在巴爾的摩開會了。召開這次會議的通告是貼在各教堂前面和登載在各種黑人報紙上的，全州各地各工廠及工會的代代表都聞聲而至。

巴爾的摩油灰工人，伊薩克·麥爾斯在其致代表的歡迎詞中解釋說，這一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組織整個馬里蘭的黑人技工。一個全州性的組織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為許多工會都擯棄黑人，而更因為自行組織是黑人技工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希望。麥爾斯

六年康州哈特福特版，第四〇五頁。) 這一罷工，在工人停工不過兩個多小時後便得到了勝利。這裡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次罷工是由新奧爾良螺絲釘製造工人工會領導的，而該會在戰前是不容許自己的會員和黑人在一起工作的。

并結論說，只有依靠勞工組織才有可能保持他們的投票權。從這次大會中，一個永久性的組織產生出來，由伊薩克·麥爾斯擔任主席，并由出席該會的每一行業所派出的代表組成了一個執行委員會。這一新的中心勞工組織乃是全國黑色工人的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中心⁽²⁶⁾。

在巴爾的摩代表會上，代表們必須作出一個長遠的決定。他們究竟應該繼續鬥爭以求在平等的原則下加入到現存的工會組織中去呢，還是應當自己組織單獨的工會？他們決定兩方面同時進行。他們一方面選派代表參加全國勞工會八月在費列得爾菲亞舉行的代表會，同時更發出號召決定于十二月在華盛頓舉行全國黑人勞工代表會。

是以，在全國勞工會一八六八年及一八六九年的兩次代表會之間的那一段時間內，黑人勞工已有了很廣泛的組織，并以他們數次勝利的鬥爭證明他們是美國工會運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夕威斯在其自南部各地區寫給“工人擁護者”的信中，曾熱烈地講述黑人勞工的組織情況。他已相信“只要有適當的計劃和一個熱烈的運動就可以將南部的全部勞動人口，包括白人与黑人，都在我們的綱領下團結起來”。他認為爭取黑人起來支持全國勞工會的計劃實是一八六九年代表會議上的重大問題之一。他自北卡羅來納的維爾民敦寫道：

“如果我們能夠使這些人相信，在這些重大的全國性的問題上和我們在一起共同作戰，是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我們就將在我國的這一區域有一個足以搖撼華爾街的根本基礎的力量。”⁽²⁷⁾

夕威斯是在全國勞工會一八六九年的代表會召開以前死去

的，但这次代表会仍反映了他所談到的这一新的趋向。在一百四十二位代表中，共有九位黑人代表*。全國劳工会第一次通过了一个組織黑人劳工的計劃。由紐約的霍瑞斯·戴义所提出的一項議案曾宣稱說：“全國劳工会不知道在爭取劳工权利的問題上，有什么南部、北部、东部、西部的区别，也不知道有什么膚色和性別的差异，它号召我們的一切有色的會員弟兄們，在合法的範圍內，尽量成立自己的組織并派遣代表从联邦的每一个州前來參加下一屆的代表會議。”大会不僅通过了这一決議，同时，还指派了一个特別委員會以“帮助宾夕法尼亞的有色人种組織工会”^②。

大会極注意地傾听黑人代表們所做的几个报告。代表們曾听到馬里蘭有色人种机工协会的罗伯特·伯特勒說，黑色工人所追求的不是“客廳里的社交而是人类的权利”。他們更听到巴尔的摩有色人种油灰工人工会的代表伊薩克·麥尔斯發表了他的在一切美國工会运动者所作过的演講中最为雄偉的一篇演說。他的报告一开始便是頌揚代表們深明黑色工人和白色工人必須建立团結的重大意义。“沉靜、坚强而有長远意义的一个革命；已由于你們携起黑人的手來并告訴他說，他和你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开始了”。接着，他透徹明晰地分析了这种团結的必要。“奴隶制或奴隶劳工，这使白人劳工遭受屈辱的主要根源是从此不存在了。我一生中覺得最可驕傲的一件事是，奴隶自己在敲碎一端拴在他的脚上、一端套在你們的脖子上的那条鎖鏈的工作中，也尽了他的一份

* 五位黑人代表來自費列得尔非亞小工与一般劳动者联合会。其余为：巴尔的摩有色人种油灰工人工会的伊薩克·麥尔斯，有色人种鑄工联合会的依格勒歇斯·格罗斯，馬里蘭有色人种机工协会的罗伯特·伯特勒和巴尔的摩有色人种印刷工人工会的詹姆斯·黑尔。

力量。”

他繼續說道，黑色工人，現在最希望的是能有同等的機會在與白色工人相同的條件下進行勞動。他們希望自己所得到的工資，可以“保證他們的家人能夠過一種舒服的生活，能教養他們的子女，還能給困難的日子和自己的老年積蓄下一兩塊錢”。而他們是極願意在這一共同的鬥爭中盡全力與大家合作的。他承認，這種合作，在過去的確並不是一直都很明白的，但這是因為各個工作間都對黑人關門，而許多工會組織又排除了他們作會員的機會。因此黑色工人被迫只得把他們的勞動力放到市場上去聽人給價。那一切現在都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了。“我們現在忠誠地提出我們的衷心的合作……一直來，只要有機會，我們也總表現了我們的這種態度的。我們沒有任何成見。我們極願讓已死亡了的過去從此永被埋葬掉。”他最後結論說，“主席先生，如果黑人竟被禁止進入國內的一切工廠，那美國授黑人以公民籍就實在是一件完全無意義的事了。”^②

這次大會上所形成的團結，使得“紐約時報”的駐費列得爾菲亞的通訊員深為感動：

“當你聽到一個土生的密士西比人和退職的南部聯邦政府的官員，在向大會作報告時，把在他之前講演的一位黑人代表稱為‘喬治亞州來的那位先生’，當你看到一個第一次穿過梅遜—狄克遜綫來到這裡，而且是他作孩子時的時候便被教導應將黑人看成不過是一種財產的土生的阿拉巴馬人，和另一位烏黑的臉發着非洲的光彩〔原文如此〕的代表，並坐在一起細心地商討問題，同時在他的有色人種的代表同志的報告上簽名時，當你聽到一位熱心的民主黨人（並且還是從紐約來

的),帶着‘極重的愛爾蘭土音’宣稱說,作為一個技工或一個美國公民,他決不要自己享有任何特權,而這種特權是他不願意讓每一個其他的人,不論白人或黑人,都可以同樣享受的——我說,當我們在一个全國代表會上,不管這個會議的目的是什麼,聽到和看到這一切時,我們真可以有保證地說,時間實能創造出神奇的變革。

“而這一切,我們在这个美好的一八六九年的八月,在費列得爾菲亞城中,確已聽到和見到了。現在,有誰還能說,成見,不管他是如何根深蒂固地生長在人的心中,是不可能連根拔除的呢?”^②

“工人擁護者”號召勞工運動向全國勞工會學習,結束將黑人擯于工會門外的行為。有些組織立刻起來響應這種號召。在一八七〇年初舉行的紐約工人總會的代表會上,主席杰索浦盛贊費列得爾菲亞大會的行為並號召各所屬工會立即組織有色工人。他說,黑色工人不應“再在各行業或任何職業中委屈的居于和白人不平等的地位”。數月後,在木工與裝配工全國工會的一八七〇年的代表會上,主席菲爾浦斯也強調了相同的論點,並要求代表們取消前一年所通過的一項決議,那一決議聲稱,由於“我們許多會員有歧視黑人的成見”,容許黑人參加我們的組織作會員或讓他們在全國工會的領導下成立自己的組織是“不適宜的”。菲爾浦斯說,“我認為我們決不可以再將有色人種的技工擯棄于工會組織以外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我們必須在一个共同的事業中大家緊緊地攜起手來。”在經過討論之後,大會決定邀請所有的木工與裝配工,“不管他的皮膚屬於何種顏色”,前來成立新的地方工會,並號召每一現有的地方工會,“容納據他們判斷為最好的有色工人參加作會

員”^⑳。

但其他的工会却并没有一个願意步木工与裝配工的后塵。全國劳工会費列得尔菲亞代表会所选派的委员会，在报告自己的工作時說，很多工会均不願接受黑人技工，并建議將黑人另行組織成“基姆·克勞”* 地方工会。國際印刷工人工会一八六九年的代表大会上更發生了黑人領袖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的兒子魯易士·陶格拉斯的問題。哥倫比亞印刷工人工会的華盛頓分会拒絕魯易士·陶格拉斯入会。某些代表斥責这种作風違反工会的原則。結果虽然反对容許黑人加入組織的議案終以五十七票对三十八票被否決了，大会却仍支持了哥倫比亞工会的行为^㉑。到一八七〇年的代表大会召开時，陶格拉斯的問題，又一次被提出來，于是委派了一个委员会，由它去整理应当容納有色人种印刷工人的建議案。但这一委员会的全部报告却只是对黑人問題不幸在工会中提出表示遺憾。他們也提出了一個建議，那就是將容納或拒絕有色人种印刷工人的問題，完全留交各地方工会自行处理^㉒。

印刷工人工会的机关报“印刷工人报”，在提到陶格拉斯案件時，宣称說，“一种反有色人种的、根深蒂固的成見仍然存在，这是沒有人能否認的；这种成見在許多地方工会中是如此地強固，如欲完全忽視或强行压制这些成見，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無政府状态和工会的解体……因此，毫無疑問，沒有任何一个重視本行業工人福利的人会鄭重地爭辯說，为了使少数黑人享有作會員的空头榮譽，寧可使以千計的白种印刷工人的工会組織归于消滅。”^㉓

这种妥协行为实給其他一些黑色工人人数并非如此微小的工

* “Jim Crow”，对黑人的蔑称。——譯者

会樹立了一个榜样；“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帜”报告說，紐約的某些工会，凡提到會員成分时，都逐漸加上了“白人”字样^⑳。

一八六九年的黑人劳工代表大会

黑色工人，認為僅只是頌揚那些容許有色人种工人参加的工会，和斥責那些仍然固执地抱着旧的成見的工会是不够的。馬里蘭州黑色工人会乃号召于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召开一次全國代表大会。大会的目的是“巩固各州中的有色工人的力量，以便在联邦的每一个州和各个地区，与反对在雇用法上作出膚色区分的我們的白种工人弟兄們進行合作，并繼續这种合作直到单独成立組織之必要被認為完全不必要时为止”^㉑。

在各州举行的推选代表制定綱領的會議中，首以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南卡罗來納的哥倫比亞举行的那一會議最为前進。代表中有种植園的工資劳动者，有佃農，有城市技工和一般劳动者。更有些有色人种总工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虽然不少黑人的政治領袖們也参加了这一會議，党派政治并没有成为大会的中心問題。而大会却集中全力以决定“國家財富的生產者，全國人民賴以达到繁荣的劳动人口，將如何始能保障自己的权利，推進自己的社会方面和物質方面的利益”。代表們都分到一份印好的問題表以便他們在会上進行討論：各郡的現行工資标准是什么情况，工人工資應該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做佃農的現在分到多少收穫，他們應該分得多少？种植園主对待劳工的情况怎样，應該采取何种行动以制止种植園主欺騙和掠夺工人？

大会上的討論暴露出了很多使人震驚的情况，并証明組織黑人劳动者实已成为刻不容緩的事了。代表們說，有些雇主，拒絕給

他們所雇用的勞動者任何工資，另有一些僱主則用盡一切方法欺騙工人。有一個代表報告說，“我們的人不能購買較好的衣服，不能買藥品，也不能送自己的孩子上學。地里莊稼收起來後，種植園主說，‘現在，我得我的三分之二，你得你的三分之一。你欠我多少多少，你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是這些。’最後佃農得到的不過是兩三塊錢。地方官從來沒有一個是公正的。白人任意一再進行欺騙，而地方官每一次都認為白人有理。我們無處可以伸冤。”

強大的有色人種碼頭工人自衛會的代表，却對於這個“可能並應該採取何種行動以制止這些不合理現象”的問題，作了回答，他的辦法是各個地區的黑色工人立即“成立工會，並堅決要求增加工資”。他說道，通過組織，查里士頓的黑色碼頭工人已保證自己的工資較前大為提高，而他們的經驗證明，要想“使自己的工資增高就必須要成立組織採取聯合行動”。工會組織一旦成立之後，就必須爭取得到政府已承認的一切權利及法律上的規定，以保障這些勞工組織。這一提議得到大會熱烈的贊許，大會因選出一個委員會以便在各郡建立工會。當代表正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更接到耶吉菲爾德郡的白色勞工們送來的一封信，以表示他們對於大會的目標以及在各地組織工會的計劃深表同情之意。他們並希望大會的各種決策將“有利於整個勞工階級”。

大會在休會前，任命了一個常設組織委員會，並派定了出席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的代表。但是因為有人批評常設組織委員會中的委員全都不是工會運動者，原被提出的那些人均自動請求退出，而以另一些“現在實際在農莊或在某些機械部門工作”的人們代替了他們。查里士頓有色人種碼頭工人自衛會的主席克拉克當選為這一新機構的副主席。提名選舉他的代表說，“碼頭工人是偉

大的劳工运动的先驅，因而完全有資格享受这种榮譽。”^⑳

因为工人階級的代表們無法籌得赴華盛頓的旅費，出席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的差不多全是些政治方面的領袖和律師。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五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屆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來自南部的五十四位代表中僅有九人是工人；其餘則都是律師、教士、教員和商人。但北部代表中却頗有一些真正是代表黑人劳工的。紐約市的代表們是于十一月初在天國教堂舉行的一次大會上選出的，這次會議代表着四百個侍食工人、七個制籃工人、三十二個烟草工人、五十個理髮師、二十二個箱櫃工人和木工、十四個泥瓦工和制磚工人、兩個碾鐵工人、六個翻砂工人、二十四個印刷工人、五十個機器工人和五百個碼頭工人^㉑。

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

虽然非工人階級的代表在華盛頓大會中占大多數，這次會議仍實現了“紐約論壇報”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作的預言，該報說，該会“在人数方面，在其所發揮的影響和表現的才智方面，都將成為我國有色人种所曾經舉行過的類似的會議中的最大的一個”。制鞋工人協會的領袖，出席此次會議的白人代表之一塞米爾·克明斯曾為“美國工人報”撰文描寫這些“十年以前尙在南部種植園做奴隸”的人們所表現的才能與見解。他說，這次大會已證明，黑色工人將和他們的白人弟兄們在一起“通力合作，以使劳工利益成為我們各州及全國的立法機構最為關切的一個問題”的一天已經不遠了^㉒。

伊薩克·麥爾斯欲使代表会只注意一切工会問題的努力，并未完全成功。是否應允許從麻薩諸塞州劳工改革党帶着介紹書的

代表們參加會的問題，在大会上引起了辯論。著名的黑人律師和共和黨的領導人約翰·蘭斯頓反對接受他們，並指責他們正圖破壞共和黨。他爭辯說，如果容許他們到大会上來為勞工黨的事業進行活動，這一群很可能就會要脫離共和黨，並因此使它轉而反對黑人。

但並不是所有的代表都同意蘭斯頓的看法，他們中有些人更責備他是“因為膚色不同而要拒絕白人代表”。最後，這些代表的入會申請書終於被接受了。大會執行主席喬治·當寧提醒蘭斯頓說，共和黨，雖因它在推翻奴隸制度方面所作的努力，應受我們的尊敬和擁護，但它也決不是無瑕可擊的。他接着說，“我們認為，在對付我們的，同時是全國的敵人的時候，共和黨應該更堅定、更積極一些……。我們實在應當得到那曾用我們的勞力和鮮血使之肥沃，因而我們有雙重權利占有它的那些土地。”^④

儘管“工人擁護者”曾提出脫離和無聊政客們的聯繫，而與全國勞工改革黨進行合作的建議，大會所決定的綱領卻仍對獨立勞工行動問題一字未提，而只是專注意於種族歧視和黑人被擯棄於工會和工作間之外的問題。種族歧視被大會描寫為“對上帝的褻瀆，對我們的欺凌和對人類的侮辱”^⑤。會上更有人提議成立黑人合作工廠，借以對付“我們的人，因為膚色關係被一般工廠所擯棄”的情況。這一綱領更表示贊成自由移民政策，但卻斥責中國勞工的入口為“一種新形式的奴隸制度”。大會更號召黑人爭取受教育的机会，避免“酗酒的罪行”，並在各個州成立工人會社^⑥。

伊薩克·麥爾斯當選為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的主席，這一機構在組織形式上是和全國勞工會極為接近的，並經決議與全國勞工會發生聯繫。一個稱為全國勞工局的執行委員會成立起來，設

总部于華盛頓，以便在一年一度的选举之間領導这一全國機構。执行委員會每月举行會議一次，它有权頒發各州各种工人組織的成立執照，并在主席同意后，有权“指導和監督工会組織及各州中一般的有关土地、借貸、和建筑問題的团体和合作社等”。劳工局更有責任“特別注意保衛經全國劳工会批准的各个組織中的工人的权利，在各个州中爭取實現为了劳工階級的利益及为了提高他們的生活条件所必需的一些法令”^④。

一八七〇年二月，該局發布了一种包括黑色人民各主要要求的簡明表；它号召組織人員在議院中活动，以實現使黑人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待遇的法令；它建議發動一个教育运动以消除各行業中白人技工对黑人的反对；它更向黑人提議組織合作社和爭取私有農地。

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發起了一个强烈的运动以實現这些要求。它的机关报——“國家新时代”——更对这一綱領廣为宣傳，經常強調成立黑人劳工組織之必要，并时常主持各种劳工大会。当塞拉·馬丁被选为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的代表要出席第一國際的巴黎會議时，伊薩克·麥尔斯已开始在南部各地進行組織黑色工人地方工会的工作。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一日在華盛頓演講时，麥尔斯向一群由黑色工人組成的听众說，如果他們不立即組織起來，他們很快就將被驅出各技術行業部門而变成“僕人及扫木屑、括瀝青和扛大炮的苦力了”。一周后，在弗吉尼亞的諾福克，他更号召成立白人与黑人共同的工会組織。他說，“建立以膚色为基础的組織”的那种日子已經过去了。“我們是为了工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都在內）的利益而成立組織的，而为了这个目的，組織中的負責职位就应由白人和

有色人種共同擔任。”*在他這一次的組織旅行中，麥爾斯不論走到哪里都呼喚黑色工人加入工會和成立合作會社。不止一次，白色工人和黑色工人都一道兒前來聽這位極富于鬥爭性的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的領袖的報告^④。

他的這些活動，曾被“工人擁護者”譽為“巩固南部各州有色人種的力量的……偉大運動的發端”，它“最后必然達到一個結果——那就是和全國勞工會成立明確的聯盟，并支持它的各種原則”^⑤。然而，達到這一明確的聯盟的道路上的障礙，還並沒有被清除掉。蘭斯頓在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第一次代表會上所發動的反对接受白人代表的爭辯，當四位黑人代表拿着他們的入會申請書來到全國勞工會一八七〇年的代表會上時，却立刻發生不利于自己的反響了。這四位黑人代表是：伊薩克·麥爾斯；費列得爾菲亞小工與一般勞動者聯合會的約西亞·維爾；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有色人種教師互助協會的比得·克拉克和約翰·蘭斯頓。

他們的名字剛一被宣布，會上馬上發出了反对蘭斯頓與會的呼聲。全國印刷工人工會及波士頓工人總會的會計亞歷山大·褚浦和制鞋工人協會的塞米爾·克明斯在這一活動中起着領導作用。他們對蘭斯頓的反对純粹是從政治立場上出發的，他們都明白表示，他們所以不贊成蘭斯頓參加會議，是因為他們相信，他的主要目的是想站在維護共和黨的利益的立場上來影响這一會議，并且說他在黑人勞工代表會上曾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以制造黑色工人和白色工人之間的分裂。經過相當慎重的討論后，證明這種反对

* 白人勞工領袖柯林斯也曾在同一會上發表演說，他說，“如果成立了這樣一個勞工會……白人和黑人兩方面的工資一定都會比現在的高得多”。（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國家新時代”轉載“諾福克報”。）

完全是政治上的,而并非由于种族关系,蘭斯頓终于以四十九对二十三的投票結果被拒絕与会。

当組織第三全國性政党的議案被提出时,伊薩克·麥尔斯曾極力反对,理由是,共和党是白色和有色工人的朋友,而民主党却是整个工人階級的敌人。他說,“虽然共和党并不是最適合我們理想的一个政党,工人的階級利益却要求他們,既不应組織一个新党,更不应和民主党联合,以拿自己的事業的成敗作冒險”。他更宣称說,既然只有通过共和党,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法令才有实现的可能,全國劳工会如与共和党携手,实將是最好地尽了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責任⁽⁴⁶⁾。

成立劳工党的議案仍通过了,大会的綱領宣称,“既然現有的兩大政党均为非生產階級所控制,我們的有色同胞們的最高利益是和工人的利益一致的,这些工人,和他們一样,也是資本和政客們的奴隸”。但因这一綱領完全忽略了黑人群众的基本要求,他們因繼續他們对共和党的支持。全國劳工会代表大会主張成立劳工党的这一行动,竟从此結束了这两个全國性劳工組織之間的团结。在下次會議时,黑人劳工代表会則已与全國劳工会脱离关系并公开宣称忠心于共和党。

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登載于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國家新时代”上,指明是“致美國有色人种的工人、工会、劳工及工業会社”的⁽⁴⁷⁾。麥尔斯在其开幕辞中說,黑人决不願意以膚色为基础单独組織工会,并且重申了他自己的信念——“白色劳工的情况必会因与有色人种劳动者合作而相互提高”。大会除指示來自南部各州的代表立即組織劳工会外,在加强劳工团结方面并無任何成就。會議的主要重点是放在政治問題上,而弗萊得立克·陶格

拉斯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实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已漸变成共和党附屬部分的又一証明⁽⁴⁸⁾。

虽然如此，在代表大会休会后所發动的組織活动却証明，尽管非劳工成分主持着一切，这一运动并没有放弃对經濟問題的重视。好些工会在南部成立起來，并开展了爭取提高工資的斗争。一八七一年三月，劳工会的州負責人号召召开一次代表会以便在得克薩斯州成立劳工会联合会*。两种种族的工人于六月八日在休斯吞举行了會議。此外在田納西、阿拉巴馬、乔治亞及密苏里等地也都有过类似的會議召开，但其中并没有一个產生出永久性的劳工組織。

很多地方，在劳工会的鼓舞下，黑色和白色工人組織了不少地方工会并得到了多次的罢工勝利。在它的协助下，巴尔的摩第一号碼頭工人协会于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組織起來。劳工会的一个委员会更曾領導这些黑人碼頭工人進行斗争以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条件。它送了一份請求書給各碼頭工的工头，要他們將每小时工資由二角增至二角五分，因为“目前的数目不够維持他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碼頭工工头答应了他們的要求，并和他們簽訂了協議⁽⁴⁹⁾。

如果有色人种全國劳工会能够將政治活动和黑人群众的每日斗争結合起來，它可能將变成全國一个很大的力量，但伊薩克·麥尔斯竟日益失去了作用，而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却很快变成了

-
- * 号召中有一段話是这样的：“所有的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是同样关心这一偉大工作的。我們的利益只是一个共同的利益，那种引起膚色上的区分的令人惡心的矯情，在这一偉大工作中將被完全抛弃。劳工的称号是完全足够的一种資格，一切劳工都被欢迎來参加會議。”（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一日“國家新时代”。）

这一运动的代言人。陶格拉斯則僅僅知道強調支持共和党的必要，称它为“本國真正工人的政党”^{*⑤}。

內战后的数年中开始的，在白色和黑色工人之間成立坚固的团结的各种努力，結果都归于失敗了。全國总工会的領導人以及如伊薩克·麥尔斯等黑人劳工領袖們，是了解与此有关的各种問題的重大意义的。但各地方工会和工会协会却常常拒絕採納全國总工会的代表大会所决定的一些進步的策略。此外，那些領導人自己也不够成熟，不能了解黑种人民向他們提出的一些特殊問題。但他們却了解，不到他們能够帮助完全解决这些問題时，美國的劳工运动是不可能有着長足的發展的。“工人拥护者”于一八七〇年五月七日，对于这一問題曾簡明扼要地說：“我們坚决地、恳切地相信，今后無数年中劳工运动的勝利也仍完全要依靠与有色人种的合作以及他們的勝利的……。他們的利益就是我們的利益；我們的利益也就是他們的。”

-
- * 陶格拉斯也常在言論和寫作中支持劳工的縮短工时和提高工資的要求，但由于許多工会拒絕黑人这一事实在他心中所引起的憤恨，和他自己所認為独立的劳工党將會助成共和党的失敗因而不利于黑人的信念，却使得他采取了反工会的立場。但他了解黑人的前途是和整个工人階級密切地連結在一起的。他于一八八三年時說道：“他們的事業是世界劳工階級的事業的一部分。我國的工会組織實不應拋棄有色人种这一部分力量……。劳动者中的任何一部分，如采取孤立自己的政策并因而削弱一切背着劳动的重負和苦難的人們之間的兄弟般的团结，實是一个極大的錯誤。世界上幸运的人們，他們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更不知道什么是劳动階級所遭受的困苦和貧窮的壓榨，他們可以对这种要求正义的呼声完全漠視，但各劳工階級却没有理由可以漠不关心……。經驗已經証明，世界上可以有一种工資奴隸制，其殘毒与無情的程度是和私產奴隸制相去并不甚远的，而且这种奴隸一定要和另一种奴隸一道日益走向不堪的境地。”（“敬告美國人民，一八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有色人种代表会上的講話”，第一二——一三頁。）

第二十章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二年的 劳工运动(續完)

我國第一次企圖實現不分性別的或不分膚色的全体工人大同盟的时期，也就是國際劳工大團結向前發展的时期。这一發展是在內战期間从欧洲工人所給予美國工会的英勇的支援开始的。战后，欧洲工人在國際工人协会英明的領導和鼓舞下所進行的壯烈的斗争，在美國劳工報紙上經常有詳細的報道。“芬区尔工会評論”每期以顯著的地位登載关于“世界較古老國家劳工改革运动实况”的報告^①，并于一八六五年四月八日宣称，該报即將开始發表摘自外國劳工报刊中的重要論文，深望此种“努力”將“最后實現世界全体工人大團結”。

國際劳工大團結

“工人拥护者”的每一期都有以“旧大陸劳工运动發展概况”为标题的一个專欄。普法战争开始时，該报發表了由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协会一八七〇年九月八日宣言的全文^②。当馬克思寫作“法蘭西內战”一文时，該文原为馬克思在总委員會上就巴黎公社問題所作的報告，“工人拥护者”即自一八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九月二日这一时期中分期轉載了該文全文。自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在整整一年的时期中，这一報紙不断發表了很多篇威

廉·李卜克內西所寫的文章，李卜克內西為德國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和第一國際的會員。該報對第一國際美國組的活動情況亦經常予以注意，美國組秘書左爾格的信件更不時在該報發表。凱默昂雖不贊成使全國勞工會與第一國際發生聯繫，但他的報紙卻在美國各工會中造成了向這一方面發展的情緒。

紐約工人協會的機關報“全國工人”也經常以極大的篇幅登載關於歐洲勞工活動的消息，並詳細報道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各項決定^③。紐約德籍社會主義的工會運動者所建立的德籍工人協會總會的機關報“工人聯盟”，在這方面也發生很大的影響。該報所發表的許多有關國際勞工問題的論文和社論，常有其他勞工報紙翻譯轉載。這一報紙，由杰出的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阿道夫·杜埃編輯，曾不斷強調國際勞工團結之必要：“世界東西兩半球的工人階級休戚相關的情況很久以來即已有目共睹，一方面的災難亦即他方面的災難，兩方面的苦難實有其共同的原因。”^④

主要是通過德籍社會主義的工會的領導者們——他們全都是美國勞工運動中的出色人物——的影響，夕威斯、特萊夫立克及杰索浦等人才知道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存在，才了解到國際勞工團結的必要。夕威斯曾一再宣告：“全世界勞工的利益都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的勝利也將是我們的勝利。”約翰·伯朗林，全國勞工會的另一領導人，曾向古巴人民保證說，“美國勞工運動對於他們的爭取自由的鬥爭是極為關懷的”^⑤。

夕威斯和杰索浦兩人在他們的本行業中都曾在加強國際勞工團結方面盡了很多力量。夕威斯常與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及威爾斯鑄鐵工人工會的領袖們保持通訊，意在阻止破壞罷工的工人運入美國並制止美國移民公司招攬大批鑄工向美國移民。結果沒

有能够得到他們的合作，夕威斯乃直接向那些工会的會員們呼吁。他在英格蘭和蘇格蘭散發通告，向他們警告，移民局所宣傳的，說工人到美國以后將有如何良好的机会等等全是一派謊言。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產生什么具体的結果，但这一經驗却使得夕威斯相信“國際勞工間必須建立有力的團結，在一切有关勞工問題的事件上必須採取一致的行動”。这种團結，他肯定地認為，一定能击败資本家的力量，使他們不能“从世界的这一部分運工人到世界的那一部分以代替那些为爭取自己的权利而進行斗争的工人”。他預言說，“國際勞工的團結將能產生一种可以反抗世界一切力量的威力”^⑥。倫敦木工与裝配工协会的秘書耶波加斯在回答紐約造船木工协会的秘書威廉·杰索浦的來函时，建議將兩個协会合并，“我們的目标和你們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彼此的同情自然也会是完全一样的。”他并且提醒杰索浦說，英格蘭的工業家联合会就已在美國好些地方成立了它的分会。

“全國工人”在發表耶波加斯的信时，也表示贊成成立國際團結的建議，并敦促紐約造船木工工会接受那种請求。該报宣称，这样一种國際間的組織关系將可以結束厂主們所極力扶持的本國工人与外國工人的競爭。該报接着說，資本家們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在外國替自己進行活动，为什么我們工人們不應該採取同样的方式進行联合呢？^⑦

美洲劳工与欧洲劳工成立联合組織的問題，在一八六六年全國劳工会的成立大会上又一次被提出。因为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因此派代表參加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的請求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大会却致意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們，願他們“在他們的光榮的事業中一切順利”。一年后，在一八六七年的年会上，与第一國際建立关

系的問題已成為極重要的問題。主席威廉·杰索浦提出了參加國際的建議，並得到夕威斯的支持。大會雖否決了這一提案，但仍決定派遣里查·特萊夫立克參加第一國際下一屆的代表會*，並通過一項決議保證願與歐洲有組織的工人在其一切反對政治壓迫或社會壓迫的運動中進行合作③。

同年中緊接着發生的兩件重大事件，更加強了全國勞工會與國際工人協會成立聯盟的可能。一八六九年四月，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收到了紐約排字工人工會的一封公函，請求它制止從歐洲運送破壞罷工工人到美洲來的活動。總委員會決議對該工會進行援助。這一行動立即在美洲工會主義運動者的圈子中引起了對第一國際的無限尊崇。同年，當關於“阿拉巴馬事件”**的爭端威脅着將造成英美之間的戰爭時，則又有另一種表現國際勞工互相關懷的事件發生了。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由馬克思起草，寫給全國勞工會主席夕威斯一封信，其中有一段寫道：

“你現在是要使工人階級，不再是一群任人役使的追隨者，而要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一種充滿着責任感，並能在他們的所謂的主子們呼喊戰爭的時候堅持維護和平的力量，進入歷史舞台了，你的任務是一種極為光榮的任務。”

夕威斯則在他的回信中說，全世界的勞工鬥爭只是一個共同的鬥爭。代表着美國的勞動人民，他向第一國際及“歐洲被蹂躪、被壓迫的勞動兒女們”伸出團結的右手④。

* 特萊夫立克終以無法籌措旅費未能成行。

** “阿拉巴馬事件”，牽涉到美國在內戰期間及內戰後一時期對英國的種種不滿，而特別牽涉到南部聯邦在利物浦裝備起來的阿拉巴馬號船隻所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這一爭端到一八七一年簽訂華盛頓條約時才得到解決。

一八六九年夕威斯的去世，對於國際勞工團結實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在他死后，全國勞工會通過其一八六九年年會，決議派遣代表參加第一國際的巴索爾會議。是年秋，當選的代表凱默昂，依靠幣制改革倡導人在全國勞工會中漸居于領導地位的霍瑞斯·戴義墊出一部分經費首途赴歐洲。凱默昂回國時，帶回了第一國際所提出的如何和全國勞工會採取聯合行動的若干建議。建議之一是，由該兩機構成立一移民部，與歐洲各工會及移民會社保持聯系，以便傳遞關於勞工情況及罷工運動的消息，“并在他方面協助實現一切為我們的改革事業而努力的人們的最高目標……即實現世界勞工大團結和全體勞工的解放”。另一建議則說明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將“極力阻止美國資本家在歐洲雇用工人供反對美國工人之用”^⑩。

這些建議都受到一八七〇年代表會議的贊許，但它仍決議反對參加第一國際。凱默昂的報告影響了很多代表投票反對參加第

- 在夕威斯逝世的消息傳出后，全國勞工會所收到的如雪片飛來的吊唁信中，更有下面的由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寄來的一函，該函日期為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簽名者有馬克思及國際中其他領袖：

“你們的光榮的偉大的主席，為你們的事業進行鬥爭的忠誠的、堅定的、不屈不撓的戰士，威廉·夕威斯忽如此意外地中年夭折的噩耗傳來，使我們感到無盡的悲哀和傷痛。這樣一個久經考驗的英勇的戰士竟于他的盛年中死去，這對於勞動人民偉大的兄弟般姊妹般的團結真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我們大家都同樣為這一損失感到悲傷。雖然有才能的策略家和經過考驗的領袖人才並不是到處都可找到的，但我們因知道在你們的隊伍中仍有其他的人願意而且能夠以同樣的熱情和忠心代行他的職務，仍能感到一種安慰。我們完全相信，你們在目前的這一次會議中，一定能夠選舉出適當的人擔負適當的任務，并能作好一切準備，以使你們能夠不受到任何阻礙，繼續進行你們的偉大的鬥爭并保證鬥爭的勝利。”（見一八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一國際，因为他極力強調美洲和歐洲勞工之間的差別。第一國際的綱領較之美國工会所提出的任何計劃都要更為前進得多。這一點，凱默昂說，只要看一看“在歐洲，其目前的社会制度及社会形态乃是暴君政治下的正常的產物——必然的結果”这一事实，就可以完全明白了。而在美洲，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一切罪惡的產生并不是由于政府的本質有問題，而只是由于施政失当。在歐洲，一个革命性的大变革是必需的，而在美洲，最大的需要就只是“对于政府所依以建立的一切基本原則予以正确的执行”。因此，第一國際所采用的各种方略，虽然对于歐洲是必要的，却“不可能用于美國，也不適合美國的國情”^①。

夕威斯也承認歐洲的情况和美洲的情况是有極大差別的。但他知道，本質上，“貧窮对財富的战争”在世界上是相同的；國際工人协会所提出的願与全國劳工会彼此合作的建議，实是以有关美洲工人并同样以有关歐洲工人的各种問題为其基礎的。因此，他相信，同第一國際的联合必將會加强全國劳工会的力量*。

全國劳工会和第一國際的关系最为接近的时期是該会在其一八七〇年的年会上通过如下議案的时候，这一議案宣称：“全國劳工会在此宣布，此后將坚决維護國際工人协会所提出之各种原則，并計劃于最短期內加入該协会”^②。但这一計劃却始終未能实现。

第一國際在美洲

國際工人协会的諸美國小組乃是由本國的社会主义会社組織起來的。由左尔格、孔瑞德·卡尔及西格弗瑞德·迈尔等人于一

* 关于第一國際与全國劳工会相似之处的一些頗有趣味的分析，請參看乔治·魏克斯：“國際工协之原則与目标”，一八七一年紐約版，第五頁。

八五七年所建立的共產黨人俱樂部，在一八六七年十月時，改變成了美洲的一個第一國際的小組。到一八七二年，第一國際已在美國共有約三十個小組和五千名會員。成立這些小組的地區計有芝加哥、舊金山、哥倫比亞區的華盛頓、新奧爾良、紐亞克、斯柏令費爾德以及紐約市。紐約市的小組中，一屬法籍人，一屬波希米亞人，四個屬於德籍人，兩個屬於土生美國人。美洲各第一國際小組中的會員的大多數，據左爾格稱，是“普通的工資工人和各種職業的工匠”^{*⑬}。

一八六九年，強大的德籍工人總工會變成為紐約的第一個小組。該會系一八六五年十月，在四位拉薩爾派分子的主持下，於紐約市成立的，其最初所通過的會章曾稱，本會創建人認為斐迪南·拉薩爾“在力求正確地了解一切社會問題方面，為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戰士”^{**}。以他的哲學思想為基礎，該會章更宣稱，“對於選票予以有效的和智慧的使用……即能最後使勞動人民從資本的桎梏

-
- 費列得爾菲亞小組的記錄讓我們看到關於會員成分的一種極有趣的情況。該小組系一八七一年十月九日由“少數幾個為了自己和家人的衣食住所需而為人作零工的人”組織起來的。該小組的創建人中間有一制鞋工、一織布工、一小職員、一教員、一石版影印工人、二成衣工人、一商人、一製造商、一醫生、一土木工程師、一女縫紉工及一制帽工人。該小組的會員，自其成立時起至一八七三年一月這一時期中，為七機器工人、五制鞋工人、六醫生、一土木工程師、一馬車製造工人、一醫藥器械製造工人、一馬具製造工人、一建築工程師、一製造商、一成衣工人、一牙醫師、一銅器製造工人、二法科學生、一雕刻師、二木工、一房屋油漆工人（八歲）、一煉油工人、一石工、一簿記員、一藝術家、一制帽工人、一烟火製造工人、二小販、一制表工人、一教員、一管家、一箱櫃製作工人、一建築工人、一照相師、二印刷工人、一女縫紉工、一法律辯護士、二磚瓦工人及一鞋具製造商。（國際工人協會費列得爾菲亞第二十六小組記錄簿，一八七一年十月九日至一八七三年一月，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

中被解放出來。”很明顯，該工会对于这种拉薩尔主义是頗不重視的，因为它曾受到德國一拉薩尔派組織——工人总会——的批評，說它是太过于馬克思主义化了。一八六八年該工会与共產党人俱樂部合并，成立了紐約及其近郊社会党。左尔格任該党主席。

一八六九年初，社会党作为紐約第五号劳工会参加了全國劳工会。該会代表曾出席全國劳工会一八六九年及一八七〇年的代表會議，但在第二次會議后，該組織为了集中力量進行美國小組的工作退出了全國劳工会⁽¹⁴⁾。

一八七〇年十二月，紐約的三个國際小組組成了美國的臨時中央委員會，由左尔格担任書記。几个月后，到了一八七一年五月，該中央委員會已代表着十个小組，其中有八个在紐約，兩個在芝加哥。这一委員會，其正式名称为國際工人协会北美中央委員

•• 德國社会主义的劳工領袖，斐迪南·拉薩尔在創建德籍工人协会总会的工作中曾起着極重大的作用，該会系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起來的。在其一八六三年二月寫“致萊比錫工人协会工人委員會之一的公开信”中，拉薩尔便肯定了該协会的兩大主要要求：普选及由州政府貸款成立生產合作社。他对于政治行动的極端重視，以及他的“工資鉄則”理論——即：因为工人数量永远过多，是以在一般情況下，工人只可能得到最低的工資——使得他完全忽略了經濟斗争和工資收入者的工会組織。他相信政治行动就可以解决工人階級的一切問題，因为通过这种行动，工人可以强迫政府供給他們資本或貸款給他們，这样他們就可以組織生產合作社。馬克思曾寫道，拉薩尔所發生的有歷史意义的作用，是他“在德國重新喚醒了已沉睡十五年的工人运动”，而列寧更說，拉薩尔的主要貢獻是他使得“工人階級从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表示，拉薩尔曾被迫向普魯士的反动势力作了極大的讓步，因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工会組織。（馬克思、恩格斯：“通訊选集（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二年紐約版，第八二——八三頁、第一四六——一五二頁、第一九三——一九七頁、第二五〇——二五一頁及第三三二——三三九頁。）

會，曾几度向美國各工會及勞工團體發出通告，請它們踴躍參加。在參加後，那些工會或勞工團體則必須承認并遵守國際工人協會的各種原則，并按期寄繳會員年費，繳于常務委員會的是每人每期二分錢，繳于中央委員會的是每人每期五分錢。中央委員會的綱領強調工人階級經濟上的解放是“最重要的目的，對於它，其他的一切政治運動應該是居于從屬地位的一些手段”。而所以至今尚未達到這一目的的原因，是由于“在一國中，各種極為分散的勞工組織間缺乏團結，而各國工人階級之間又沒有兄弟般的堅強的連系”^⑮。

接受這種邀請前來參加的工會為數甚少。而中間階級改良派中却有不少人起來響應了，這一事實竟造成了第一國際美國組內部的紛爭，并因而迫使中央委員會不得不花費極大部分的時間來解決這一問題。左爾格則忙于極力排斥兩位熱烈的女權擁護者和性愛自由的提倡者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及田納西·克萊福林；她們兩人同着那時已不存在的新民主會或稱政治共和主義會的會員們，于一八七一年夏天在紐約成立了第十二號小組。新民主會原為美國知識分子的組織，主要提倡通過復決權以實現自願社會主義。

左爾格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雖然極熱心于維護女權的事業，但對於那些堅持要“混入勞工隊伍中來，或欲實現其知識階層的目標，或欲借助于勞動人民以提倡他們自己的某些幻想的”知識分子改良主義者，却是極為反對的*。左爾格在寫給總委員會的信中

* 使左爾格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最感憤怒的，是第十二小組所發行的機關報，“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這一刊物實是一種誣毀馬克思、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左爾格在寫給該刊編輯們的信中說道，“你們的刊物，是明白表

說道：“这里的政客及其他某些人們的用心是相当明顯的——他們要使我國的國際工人協會組織被完全認為是一種進行爭取婦女權利，宣傳自由性愛及其他類似運動的機構，而我們則必須堅苦鬥爭，以使我们不为这些由別人妄加的称号所污。”^⑯

由于左尔格的明确領導，第十二小組以及其他一些為中間階級改良派所把持的美國小組終被倫敦總委員會加以擯棄了。一八七二年七月，在這個總委員會所委派的調查美國情況的特別委員會已決議下令驅除第十二小組時，費列得爾菲亞小組的一次會議公開宣稱完全同意該總委員會的決定。這種驅除知識分子改良派的行動，使得美國各小組產生了一種新生的力量。一八七三年美國小組聯邦常務會宣稱說，“現在，土地已完全預備好，只待耕種了，在目前，一切勞工運動先驅的職責是，不要再像過去一樣，把時間和精力花費於進行各種令人厭惡的爭吵，而應將一切工人組織成爲一個階級並在他們中創造階級感情，這種感情將永不容許任何工人再願放棄這向實現國際工人協會的偉大目標——解放勞工——前進着的這一組織。”^⑰

被組織到國際的美國各小組里去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們所發生的影響，是遠超過以他們微小的數量所應發生的影響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和紐約州工人大會以及和賓夕法尼亞的礦工福利自衛

示着支持國際工人協會的，並爲不少國際的會員和友人們所經常閱讀的”。因此，它不應該，“除正確有據的報道外，更發表……任何其他關於國際工人協會的材料。”（一八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

這一刊物雖然也常登載一些對於勞工及第一國際的會員們有極大重要性的消息，但大部分篇幅却是用於無盡無休地討論愛情自由、性愛自由、靈魂學、人生科學及其他類似問題的。（參看該刊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一日及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八日出版各期。）

會，都建立了極為密切的關係。一八六九年十月，紐約的第一小組委派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以便在黑色工人中組織工會，并于數周後使那些黑人工會加入了紐約市的勞工核心組織工人工會¹⁸。

當愛爾蘭的反英運動領袖多洛凡·羅莎于一八七一年前來組織力量以支持愛爾蘭爭取自由的運動時，美國各小組發起組織群眾大會以對他表示歡迎。它們更主持了各種支援巴黎公社分子的示威運動，而在公社運動失敗後，它們則熱烈地歡迎那些逃亡的公社分子。當國際中的會員們參加在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紐約舉行的八小時工作日示威運動的行列中前進時*，他們沿途都受到對它們表示歡迎的公社萬歲的呼聲。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紐約不少居于領導地位的工會組織都參加了由美國各小組所發起的、抗議將三個杰出的公社分子處以死刑的示威運動。在這一類的活動中，黑色工人是同國際的會員們排在同一行列中前進着的¹⁹。

一八七三年大恐慌後，在失業工人進行各種鬥爭的時期，正如我們將在下文看到的，國際實為那些鬥爭的組織核心。因此，儘管全國勞工會始終沒有在組織上和國際工人協會發生直接連系，這一運動的影響却是深入於美國工人階級內的一般群眾中的。

合作社運動

在全國勞工會早期的幾次代表會上，八小時工作制、黑色工人

-
- 一八七三年四月，國際工人協會美國聯合會的聯合執行委員會曾在紐約主持了一次各工會聯席會，商討應採取何種步驟以使八小時工作法見諸實施。這一由十五個工會共同舉行的會議，因此建立了一個八小時工作法令促進會。（見“國際工人協會費列得爾菲亞小組文稿”中召集此次會議的通告，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又見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紐約太陽報”。）

的組織及妇女权利及國際劳工团結等均被視為重大的問題。但由于在內战期間及內战后一时期中,厂主們日益加緊進攻,不少居于領導地位的工会主义者,包括威廉·夕威斯在內,都認為这些新兴的工会組織,單靠自己,是不能解决工人階級的問題的。他們辯論着說,工会組織,不可能阻止代替技術工人的机器的使用範圍愈來愈擴大。同时也不可能維持一定的工資标准,因为厂主們是不断地在設法压低工資,而工会只得被迫不断地举行罢工。但罢工,根据他們的說法,是不能解决問題的。即使罢工得到了勝利,它也只能帶來一点暫时的安慰,因为厂主們很快就又会搶夺去他們从勝利中得來的东西。非常肯定,甚至随伴着勝利的罢工而來的那些苦难,和微薄的勝利的收穫相比較,也是得不偿失的。工会也好,罢工也好,这些都不能解救工人在工資制度下所受的屈辱,也不能使他們獲得永恒的保障*²⁰。

現在必須要找出一种新的武器來,以使工人們能够用以对付厂主們的反攻,并能用以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劳工可以被提高到他們在社会中所应处的地位以結束劳工所受的屈辱。这一武器便是合作社运动。如“印刷工人报”所強調說的,合作社乃是“工人

-
- * 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八年間,礦工們在多次罢工运动失敗后所遭受的慘痛結果,对于合作社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如果这样一个杰出的美國工会,就几乎不能在厂主联合会的凶殘的進攻下維持自己的存在,那些力量更为微薄的工会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是在这样想。对于作为工会主要策略的罢工运动的失望使得很多人,如夕威斯等,对于整个工会都感到失望了,他們并因而作出結論說,“通过工会的活动是决不可能实现任何有永恒意义的改革运动的……。”(見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及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与七月三日“工人拥护者”。)在促使若干美國劳工領袖改变目标方面,我們不应忽視那些一向对于組織强大的工会毫無兴趣的拉薩尔派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可以用來抗拒資本的強大勢力的唯一真正的保障”^{②1}。一如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間一樣，現在所提倡的合作企業仍是兩種形式：消費合作社與生產合作社。如果生活費用的高漲可以搶奪去工人們的工資所得，因而被迫只得借債維持自己家人的衣食住所需，那末，增加一點工資實際上又會有什麼意義呢？這一問題，只有依靠合作社才能得到解決。以合作社所賺來的利潤，工人會社就可以購買合作性質的作坊和工廠。

大家所最重視的是這種生產合作社。某些由工會舉辦的成績良好的生產合作社，將可以供給它們必需的資金以對付僱主們的進攻。它們將變成為工業中的標尺，而那些僱主們則將被迫接受合作社所採行的合理的工作標準。不僅如此，它們還將制止僱主們歧視那些積極參加工會運動的工人們，因為這些人既然可以在合作社中找到“遼闊的避難所”，那時再想迫害他們也是完全無用的了。這樣，合作社便變成了工人的“包有鐵甲的拳頭”，而那時對於僱主們就可以，如一個工人所說的，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改變他們的政策，他們作為製造商的地位就會要被那些正是他們……打算用飢餓的方法使之屈服的人們所代替了”^{②2}。

合作運動，根據這一套理論，不僅是可以完全代替工會運動的作用，它更是一支強大的支柱，有了這一支柱，工人將可以完全脫離“對資本主義的僱主們的依賴”，而目前存在着的這種不合理的工資制度，這種使勞工只能得到“自己的生產成果中極有限的一部分，不容許他們有可能過着舒適生活”的制度，這種使生活變成一種“無盡的屈辱，隨時的殉難和向着坟墓前進”的制度，也就將被徹底消滅了。它將帶來一種新的人類文明，那時，所有的人的“思想將完全以道德原則”為依據，全人類皆如兄弟的情感將無限發展。

在那將來的社會中，每一個工人都將“有一個舒適的家——一種快樂的家庭生活——一個相當富足的家庭，作為他所應得的勞動果實……”²³。

關於合作社的討論，佔據了內戰時期勞工報紙的極大篇幅。夕威斯在鑄工代表會上所作關於合作社運動的重要討論，以及關於英格蘭羅其代爾的先進人物們已經完成了何種成就的說明，都曾在“芬區爾工會評論”中先後發表。在這裡發表過的，還有對於羅其代爾的實驗以及對於工會運動兩者都感覺興趣的一個費列得爾菲亞制鞋工人，湯姆斯·菲列浦的演說辭和書信。雖然有些合作商店是在內戰期間根據羅其代爾計劃成立起來的*，但一般都同意，認為要實現合作運動的諸原則還必須等到勝利取得之後。

自一八六六年開始，這些原則便被付諸實行了。在此後數年中，麵包工人、馬車制作工人、硬領制作工人、鑄工、造船工人、機械工與鐵工、造船木工、油灰工、鍋爐工人、制鞋工人、制帽工人、鉛管工人、成衣工、印刷工及女縫紉工等的工會都各自成立了合作協會。黑人工會主義者也走進了合作運動的領域，要在這裡尋找方法解決他們被擯棄於各工廠之外的問題²⁴。在這一時期中組織起來的最壯觀的一個合作企業是由鑄工工會所建立的。該會一八六六年的全國會議，通過了合作運動的原則並號召所屬各地方工會

-
- * 羅其代爾社系于一八四四年由二十八个熱烈擁護歐文主義和大憲章運動的工人組織起來的。最初，該社的商店每週僅在兩個晚上營業，所售亦僅雜貨店中的一些零星貨品。漸漸就有更多的商店成立起來，組成了一個聯合機構，並進而成立了玉米磨面廠和一個專為批發的合作社。雖然羅其代爾社基本上是一種消費者的組織，它卻擁有工廠、作坊、面粉廠、輪船運輸及他種工業。該社對於社務的管理系以查理·何華茲所擬的計劃為基礎的，根據這一計劃，所得利潤依據社員購買量為準按比例分紅。

成立合作鑄造廠。一八六六年三月，當阿爾巴尼和特洛依的翻砂廠老板們在廠中張貼通告，聲稱他們將不容許在他們的廠中存在着工會委員會，並將開始雇用任何他們願意雇用的工人或學徒時，特洛依工會乃着手組織一個合作翻砂廠，以作為對他們的回答。在威廉·夕威斯的協助下，該地方工會發出招股的通知，聚集了二萬六千元資金，置產開業了。

這一企業在一個時期中還頗為順利。在最初的六個月里，經常雇用有鑄工三十五人。除正常的工資，他們每天還可以得到兩元算作他們應從該合作企業中分得的紅利。每日工作八小時，這些工人在夏季時每周可以賺到約三十元，即在生意清淡的冬季亦可賺到二十五元左右。在工資數目和工作條件方面，本行業中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可與相比。而這個合作企業亦頗有盈利——第一個六個月共獲利六千元，次年，雇用工人人數已增加了一倍以上，獲利一萬七千元。

特洛依的成功結果鼓舞了夕威斯，他乃號召在全國各地組織同樣的合作社，以使“全國鑄工都可以生活在和平與繁榮的空氣中”。他盼望着有一天，由工會所組織起來的“無數鑄造廠所發出的火光和煙霧”將能給“風雨飄搖中的勞動者”預備下避災的港口。在特洛依翻砂廠成立了兩年後，在全美國已共有十個合作翻砂廠，另外還有二十幾個正在籌備建立中。夕威斯決定將翻砂工人國際工會的大部分力量，用於在全國建立一個由無數翻砂廠組成的密網。匹茲堡的國際合作協會也因此成立了。鑄工工會，在其一八六八年的代表大會上，改名為北美鑄鐵工人國際自衛合作工會^⑤。

但是，鑄工們很快便發現，合作翻砂廠為了要在這個激烈競爭

的世界中存在下去，便必須要放棄合作的原則。股票持有人無止境地要求得到更多的紅利，而因為要滿足他們的要求，那些合作社便被迫不得不減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取消了工會的标准。很多合作社，不但不能成為供私人資本家們作參考的標尺，倒都變成了廠主們對勞工發動進攻的一種樣本^{②6}。

木工、印刷工及其他工人工會所組織的合作社都沒有能夠維持很久*。報紙攻擊它們為法國共產主義的雛形。工業家們賠本出售商品以阻止合作社發展為市場。管理的不善也常常增加了它們的困難。但最主要的困難還是找不到資本。合作社必須請求有錢人來向這種以消滅工資制度為目的的企業投資。自然，銀行家們更是要要求高額利息的，總之，很快整個合作社運動便墮落成為一種對於牟利比對於爭取勞工解放更為關懷的股份公司了。

金融改革

思想欠深刻的人們竟看不出，合作社的失敗實證明他們的全部理論已經破產。他們認為，並不是理論不對，只是由於無法得到資本才造成合作社事業的失敗**。當貸款和現金還掌握在私人手

* 但也並不是所有的合作社都遭到了失敗的結果。費列得爾菲亞制鞋工人協會所建立的一個合作鞋廠，據說至一八七一年時還極為興盛。明尼蘇達制桶工人工會於一八七〇年建立的一合作工廠，很快便共擁有七個作坊，生產着本市面粉廠所需的大部分木桶。（見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費城公共記錄報”；又美國經濟學會“叢刊”，第一卷，第一二九頁及其後諸頁。）

** 夕威斯的結論是，政府的協助是合作社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在全國勞工會一八六七年的代表會上，他曾提出了一項為代表們所熱烈贊同的下列計劃：“既然美國國會為了各鐵路及其他壟斷企業的社會福利曾不時支付大量資金和劃出大片公共土地……讓我們決議，我們將懇求國會在下屆會議時撥款二千五百萬元協助建立八小時工作制及合作社。”（見一八六七年八月二

中的時候，工人們就不可能“通過任何聯合或合作的制度保障他們的天賦的權利”。因此，現在必須將國家的金融體系歸還到人民的手中；一旦這一點實現後，一切合作企業就可以得到合理利率的資本，而工人們也就能夠得到“一大部分他們自己的生產果實了”。合作社的失敗，就這樣幫助着使得此後的勞工運動迷失在金融改革的荒野中了。

內戰後，勞工運動隊伍中主張金融改革的人們所抱的那些關於這一改革的基本觀念，大部分是從愛德華·開洛格得來的，他是紐約城中一個很大的布商。由於一八三七年的大恐慌使他瀕於破產，他於是開始研究金融制度中的各種弊端。他的第一篇論文，“通貨之罪惡與效用”，於一八四三年在“紐約論壇報”上發表。六年後，他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勞動力及其他資本”。美國的金融法則，開洛格寫道，是應該對於勞工所處的屈辱地位負責的。這種法則容許銀行家製造貨幣和發放貸款，因此，他們只需要簡單地扣壓住資金，就可以造成市面貨幣缺乏的現象，而這種現象就可以轉過來給他們帶來他們所最感興趣的高額利率。這些法則的結果對於美國人民是極為慘痛的。

開洛格相信，工人如果忽略了降低貸款利率這一“基本改革”，他就完全沒有力量能夠改善自己的生活標準。為了完成這一“基本改革”，他建議政府設立一個國家安全基金委員會，並在各州設

十七日“波士頓夜聲報”。)夕威斯是不自覺地重復了拉薩爾對德國工人所講的話：“國家必須要來救助你們……國家應當認為，在保證你們能夠完成自己的組織和聯合行動方面盡一分力量，是它的神聖的責任。”(見斐迪南·拉薩爾所寫“致德國全國勞工協會之一封公開信”，何恩·愛倫與弗瑞德·貝德爾合譯之英譯本，一八七九年辛辛那提版，第二二頁。)

立分会。这种基金將被用來發行用不动產作准备金的紙幣，利率固定为百分之一。有这样一个政府貸款所向外貸款，一切私人的金融企業就被迫要降低它們的利率。其結果將是“一切農業家、工業家、技工、种植園主，一句話，一切願意依靠自己正当的勤劳維持生活的人”，都可以用很低的利率得到他所需要的資金。同时，“安全資金”既可以使各工会得到低利率的資本，这一“基本改革”也自然会不必經過任何痛苦的斗争逐渐达到工資制度的消滅^②。

开洛格的“基本改革”，对于正从四十年代的烏托邦主义的危害下漸次恢复过來的五十年代期間的劳工运动，是沒有發生什么影响的。各种野鷄銀行所發行的紙幣所帶給他們的慘痛的經驗，已使得工人們对于一切紙幣理論深感怀疑。但到了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时，很多工人、農人及一些工業家却又相信現在已到了應該对金融制度实行一次改革的时期了。一八六二年所發行的綠背票已大大貶值，但銀行家們却仍可以用这些綠背票去購買最后可以兌換金元并可得到金元利息的政府公債。“制桶工人月刊”曾說，公債兌現的这一情况，由于它的高額利息，使得有錢的人們都更願向國家債券投資而不願把自己的資本放到工業、商業或制造業中去了”。工人們所建立的合作社也同样面臨着無法以低額利率獲得資金的困难；因此，在私人工業中以及在他們的“自己雇用自己的”那些企業中，工人們都同样遇到資金和利率的問題^③。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內战后，曾經數度任代表出席全國劳工会代表大會的亞歷山大·堪浦別尔發表了若干小冊子，綜述了开洛格的金融理論。瞬息之間，开洛格的著作竟变成了劳工改革主義者的聖經了。凱默昂在“工人拥护者”上面整章地重印了开洛格的“劳动及其他資本”，夕威斯是如此深信开洛格的各种建議，竟

于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發表言論說，“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制度建立起來后，工会便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②

虽然全國劳工会的金融改革方案是以开洛格的理論为基础的，但兩者也并非完全相同。該会呼吁取消國家銀行制度，要求由政府，而不应由各銀行規定利率，并請求政府將公債利率降低到百分之三，同时規定可以用綠背票兌回公債，綠背票对于以之購買公債的人應該是法定貨幣。政府必須直接貸款給本國人民，以他們的工商業或其他財產作抵押，利率百分之一。这样，各合作社就可以在固定的、合理的利率下得到資本，小工商業者也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資金以維持營業，給失業工人預备下更多的工作机会。

全國劳工会中某些金融改革的热烈拥护者所理想的还不止于是使合作社能得到資金。他們的計劃是要消滅華尔街及那“可咒詛的”銀行制度。他們認為，这些东西是应对劳工所受的痛苦負完全責任的。劳工大众的主要敌人因此就变成是“金融寡头集团”，而不是那組織强大的攻势反对工会的、日益兴起的工業資產階級了。工人們爭取較高工資和較好生活条件的各种斗争，在金融改革者們看來，和打破“金錢貴族”的势力的斗争一比較，就是完全無足輕重的了。

伊拉·史都華很了解这种金融改革万应灵膏对于劳工运动的危害。他提出警告說，不管是有意还是無意，劳工运动中的金融改革家們是“正在替資產階級做着他們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工作”。厂主們，只要工人們肯放弃关于工資和工时的那些基本問題，是决不反对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時間和精力用于進行金融改革运动的。史都華辯論說，“使人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荒謬的經濟理論上”，那正是对資產階級最有利的，“那些理論即使完全順利地得到

实现,也只会讓工人仍作他的工人,資本家仍作他的資本家,而兩者之間仍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冲突”^⑩。

但史都華的論辯却沒有能够說服夕威斯,特萊夫立克、凱默昂以及其他的一些主張金融改革的人們;到一八六七年,这些領袖人物仍感到全國劳工会的金融計劃决定着美國工人階級的前途。夕威斯宣称,“我們的中心目标,是一种新的金融制度,这一制度將从少数人手中剝夺对于金錢的控制力量,而使人民能够得到利息低的、穩定的和充裕的貨幣。这一目的达到后,人民就已完全得到了自由。那时,就会自然出現一种世界上从來还没有过先例的巨大的社会革命……。”^⑪虽然这种思想的确代表着已覺醒的工人階級的領袖們要想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热烈願望,但金融制度改革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真給工人帶來自由。相反地,它却帮助加速了真正代表着改善劳工生活的主要希望的全國劳工联合機構的死亡。

政治行动

“工人联盟报”声称,“造成这种不合理的,使得劳力的生產成果全为資本所攫去的制度的”,乃是國家的法令。除了通过政治行动,还能有什么別的办法“建立一个公正的,合理分配劳动果实的金融制度呢”?^⑫坚定的金融改革主义者和許多全國劳工會的領袖,現在乃日益集中力量來進行政治活动了,完全忽略了那些不为政治行动所影响的問題。他們的錯誤并不在于他們重視政治問題,而在于他們緊抓住一个錯誤的目标,并且忽視工人的經濟斗争。

在內战期間以及內战后的一个时期中,各工会組織对于政治行动的态度是頗不一致的。有些工会禁止自己的會員“在任何借

口下，提出或討論政治問題”，并為這種禁令辯護說，在選舉中對於某一候選人贊成與反對的意見上的分歧，可能會造成工會的分裂^③。但這也不是說工會運動者應該完全脫離政治。工人的政治活動是必要的，但必須到工會以外去進行^④。

很多其他的工會都認識到這種看法是有缺點的，因而在它們所舉行的一切會議上，政治問題以及經濟問題都同時被提出來討論。木工與裝配工、制桶工、刷牆工、雪茄製造工人以及礦工們的工會是勞工組織中，在自己的代表會上專門着重討論政治行動的需要的幾個少數的例子。一八六六年一月舉行的麻州木工與裝配工工會的州代表會議，在進行了這一類問題的討論後，並通過了一連串的決議，號召麻州有組織的工人更加強政治活動。該會的最後一條議案說，“決議，我們鄭重宣稱，我們不僅要在工作間中和塵土飛揚的工地上，而且要在州議院的會議廳上，要在法院里和美國的國會中，要求、支持和維護我們的權利。”^⑤

賓夕法尼亞的礦工是全國工人中最有政治頭腦，警惕性亦最高的一群，這是因為他們的工業性質要求法律方面的干涉，更因為他們已有在英格蘭進行爭取實現這種法律的運動的經驗。一八六八年由約翰·西尼所建立的礦工及其他勞工福利會（原名斯庫基爾礦工福利協會）很快就變成一種有效的集體交涉的力量，在一八六九年及一八七〇年間一直和礦廠老板維持着一種雙方認可的協議。通過該會的政治活動，它并使本州州議院于一八六九年通過一條法令，承認了工會組織的合法地位。該法令規定，任何及一切技工、雇工、小商人和普通的勞動者，均有合法權利“為了互助、互利或自衛的目的組織會社或協會，和平地舉行會議，討論并制訂一切為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規則及會章——其他一切全部或部

分与本法令抵触之法令，自即日起一律作廢”^{⑤6}。但因該法令并未免除工人或他們的工会遭受被控以圖謀不軌罪行的危險，工人福利协会乃为另一条新的法令進行斗争，以使工人及他們的工会不再受圖謀不軌法令的威脅。这一斗争于一八七二年勝利完成，州議院通过了一条法律，“使工人、普通劳动者及雇工們在共和國的民法下从此不再遭受某种以圖謀不軌罪名提出的公訴或控告”。

第一个礦場檢查法案是于一八六九年四月，在礦工工会發动了一个激烈的运动，使本州人民都注意到这一問題后，經議院通过的。这一法案規定在“礦坑中裝設較好的調節和通風設備，保障斯庫基尔郡礦工生命的安全”，并授权州長委派礦場檢查官。礦工們繼續斗争希望有一条法令可以在整个無烟煤礦区生效，但議院却听从礦区老板們的意見，認為其他各郡的礦坑是不需要通風設備或檢查制度的。数月后，阿風得尔（盧瑟恩郡）礦区压死一百零九个礦工的慘剧發生了，这才引起社会輿論的注意，一致要求通过一条更有效的、在本州一切無烟煤礦区均適用的法令。当州議院举行會議的时候，礦工工会派出代表住到哈里斯堡去，并在那里一直停留到新法令通过以后^{⑤7}。

并不是所有的工会在政治行动方面都像礦工工会这样積極，但八小时工作制問題、中國劳工的入口以及使用圖謀不軌原則以攻击劳工組織等問題，实为迫使各工会不得不考慮政治行动的理由。当兩大政党对于工人所提出的方案都完全不感興趣的时候，許多州的工会本身乃來領導成立独立的政党。加利福尼亞的工会变成了为应付中國劳工入口的威脅而組織起來的第三党运动的基礎，麻薩諸塞州的制鞋工人协会，渴望能通过联合力量以獲得法律上的承認，極力幫助創建麻州的劳工改革党，并給它以全力的

支持³⁸。

一八六九年，麻州勞工改革黨獲得了一次驚人的勝利。一個在選舉日之前三個星期成立的，既無基金又無報紙支持的組織，它的候選人却竟有一位被選入州參院，二十二位被選入州眾院，共得選票一萬三千張。一夜之間，該黨便成為美國政治界一個重要的力量了。共和黨，為求自衛，乃極力責備工人並且說，它“在提高美國勞動人民方面的成就是比過去，自美國政府成立以來，任何時期的成就都更為巨大的”；因此，它以“驚奇和憤怒的情緒觀望任何其他組織無禮地稱自己為勞工黨”³⁹。

共和黨的憤怒並不能嚇倒他們，麻薩諸塞州的工人更準備要參加一八七〇年的州長競選運動。他們選出了偉大的美國人文德爾·菲利浦斯作為他們的州長候選人。完全不同於其他的奴隸取消主義者，菲利浦斯始終認為取消奴隸制度只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個方面，而當奴隸制度取消後，他乃以他大部分的時間進行勞工改革運動。早在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日，菲利浦斯即在波士頓的凡勒伊大廳發表贊成八小時工作制的講演，他在講演中說：

“從我第一次站在凡勒伊大廳的講台上，向波士頓的公民們講演，到現在已整整二十九個年頭了。那時我便感到我是在為勞動人民的利益講話，而今晚，如果這就是我這一生中最後的一次講演，我也仍很高興，因為我的談話依然是本着同一個精神——為了勞動人民和他們的權利的。”⁴⁰

菲利浦斯領導了一個極熱烈的競選運動，但結果勞工改革黨和禁酒黨共得選票僅為二一，九四六，而共和黨却得選票七九，五四九，民主黨亦得四九，五三六票。這次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組織性，這種困難即如菲利浦斯的辯才也是無法克服的。勞工改革

党,正如这一时期中多数的劳工政党一样,在一次选举和另一次选举之間很少進行什么政治活动,而到选举时期又沒有地方組織去活动选票。

麻薩諸塞州劳工改革党的州代表会是一八七一年九月四日在烏司特举行的。出席代表共有四百二十五人,中有女代表十人。菲利浦斯向代表們表示欢迎并發表主要的演說。他說,“在一切旗帜下面,永远只是一个相同的偉大的运动。那就是使人民和平地取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东西……我們現在以我們在数量上占多数的权利要取得世界上的統治权。”

由菲利浦斯所拟訂的政綱在一开始便說:“我們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坚决肯定,劳工——財富的創造者——完全有权享有他所創造的一切。”大会的各項決議則向“奴役工人”的工資制度宣战,向目前的“搶劫劳工,鯨吞資本”的金融制度宣战,向無限制地將大片土地划归投机公司的政策宣战,以及向“以發行和大量增加有息公債”而使資本家致富的制度宣战。大会更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及終止強运中國劳工入口等要求。另有一条要求則是:“凡以政府經費雇用之妇女工作人員,如其工作性質与数量均与男性工作人員相同,則应付与相同的工資。”①

一八六九年州候选人名單第一名張伯齡是劳工改革党的州長候选人。菲利浦斯虽然拒絕參加競选任何政府职位,他却仍又一次为了劳工党在全州四处奔走。他曾說:

“在我們执政以后,有一件事我們一定要做。如果一个人有一幢房子,我們每年向他課稅一百元。如果他有同样价值的房屋十幢,我們就不会是課他一千元的稅;而是六千元;一个人变得越富,他所負擔的稅就要越多,这样,当他共有財產

四千萬元時，他每年也不可能有多於二萬元的收入作為他的生活費用……。”^{④②}

勞工黨僅得六，八四八票。菲利浦斯認為票數所以如此少，是廠主對工人的恫嚇所致。當他在有工廠工人出席的大會上演講時，他說，他們沒有一個人敢坐到主席台上來，或者出面來為他作一番介紹，因為害怕會有奸細向廠主密報。這些話倒是對的，但這次失敗的主要原因，實是由于制鞋工人協會及新英格蘭其他的一些工會在這一期中正处于衰落狀態中^{④③}。

一八七二年，麻州勞工改革黨分裂成了兩個敵對的集團：一是菲利浦斯領導的勞工會，一是伊拉·史都華和喬治·麥克尼爾領導的八小時工作同盟。分裂的發生是由八小時工作制問題引起的。史都華認為這是有關勞工的唯一重要問題，而他更特別反對關於金融制度的問題。文德爾·菲利浦斯，因為受到愛德華·開洛格的作品的影响，却一天一天更熱心於金融改革。當他堅持要將建立一個新的金融制度的要求放在勞工黨政綱的首要地位時，八小時工作制的擁護者乃拂袖而去，另行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④④}。這種金融改革派與八小時工作制派之間的矛盾，嚴重地削弱了好些州里面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力量。兩個集團都各自認為只有它的政綱可以謀得工人階級的解放。但工人群眾對這種由一群主要是為了提倡他們自己所偏愛的一些理論的人們所領導的勞工黨是愈來愈失掉興趣了^{④⑤}。

州勞工政黨的迅速衰落，並不證明它們毫無成就。勞工已在進行獨立的行動這一事實就迫使其他已存在的政黨不得不更重視工人們的要求，此外勞工會也還為勞工爭取到某些有重大意義的勝利。一八六九年麻州勞工統計局的組成就是一個例子。一八七

一年八月五日，“工人拥护者”曾說，僅就這一項成就說，我們也完全有理由在麻薩諸塞州建立一个劳工党，因为現在統計局在推進劳工改革原則方面所已完成的事業是較之用其他一般的方法，在多少年中所能完成的还要超过的。事实是擺在人民的眼前了。他們現在不僅看到“他們自己而更看到他們的鄰人在独占資本的鐵蹄下所遭受的深重的压迫了……。”

全國劳工会在其一八六七年的代表会上曾通告一条決議說：“工業階級应完全擺脫同任何政党的連系和情感，而自行組織一个全國劳工党的时机已經來到了。”^{④⑥}一年后，一八六八年的代表会更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以拟訂建議中的全國劳工党的党綱。但因必須向某些坚决反对独立政治行动的代表們讓步，大会同意这个新的政党將不参加即將來臨的总统选举运动；而依“独立宣言”为式而拟出的“原則宣言”却公开发表了。这一文件几乎有三分之二是討論金融改革問題。除提出廢除全國銀行制度以及由政府規定利率外，这一宣言更要求：土地只应無偿地授与真正的垦植者；成立劳工部；國會聰明公正地表明对八小时工作制問題的态度；以及“在國家政府的經營下，为了人民的利益”建立更民主的鐵路、運輸、水运及電訊交通制度。这一文件結論說，“我們虔誠地要求全体人民，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一致合作，團結互助以使上述諸原則逐步实现。”^{④⑦}

第一步組織工作是在一八七〇年的代表会上开始的，那时，尽管有某些代表提出反对，代表会仍选出了全國劳工改革党的执行委员会，并授权該委员会決定召开候选人提名會議的日期。这一由十四州的代表組成，以制鞋工人协会的克民斯为首的委员会，于一八七一年初在華盛頓举行會議，建議于十月召开提名會議。后又

決定延期至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延期的結果之一是因此造成了執行委員會內部的分裂，其中一派在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單獨開了一個會，並宣布于一八七二年七月四日召開全國會議，以便提出全國改革黨的候選人。但這一派却不能得到全國勞工會的承認，主席特萊夫立克公開宣告他們無權單獨行動⁴⁸。

約有一百個代表，代表着十四個州，出席了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斯舉行的提名會議。代表中大多數從未參加過全國勞工會的代表會議，而其中共只有約二十五個人是和有組織的勞工有連系的。這二十五人中有一個是約翰·西尼，他是賓夕法尼亞無煙煤礦區有組織的礦工的領袖。

金融改革派整個控制了這個會議，使得綠背紙幣計劃變成了這一新黨的主要要求。其他的決議則是要求建立八小時工作日，公共土地只應無償地授與墾植者，結束強運中國勞工入口以及減低關稅，“以我們所不能製造或生產的一般日用品免費進口，而主要依靠奢侈品征課國家稅收”⁴⁹。

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提出候選人。共和黨已經分裂了，其中的一翼稱自己為自由共和黨。切望在訂于四月召開的自由共和黨的會議上被提名為候選人的政客們，對於哥倫布斯會議的進行是極感興趣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帶着一部分勞工的支持前往出席“自由共和黨”的會議，那他們就會有更大獲得勝利的機會。哥倫布斯會議是相當嚴重地受着政界人物的代理人的幕後操縱的，他們那些人過去都從未表示過對勞工的福利有多少興趣。

當這類人物之一大衛·台維斯被提名為全國勞工改革黨的總統候選人時，爭端又開始了。某些地方性的工人委員會，通過決議，聲稱對哥倫布斯會議的提名不予考慮，而要求另行召集提名會

議。在全國勞工會中極為活躍的霍瑞斯·戴義和伊斯拉·伍德都極力反對挑選台維斯的決定，並宣稱他們將支持即將召開的婦女權利會議及該會所提總統候選人^⑩。

台維斯曾經表示欣然接受作為勞工候選人的這一“意想不到的榮譽”，但當自由共和黨的會議提出霍瑞斯·格利雷為候選人時，他卻完全失掉了興趣，于是他通知全國勞工改革黨說，他已不能作該黨的旗手了。因此該黨乃向曾出席哥倫布斯會議的全体代表發出號召，要他們前來參加將於七月三十日在紐約舉行的一次集會。有三十五個人響應了這一號召，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全國工人階級在格蘭特總統與霍瑞斯·格利雷之間沒有什麼可選擇的”。八月二十二日在費列得爾菲亞舉行預備另選候選人的一次會議，更議決派遣代表參加一個由一部分民主黨人所舉行的會議，這一部分民主黨人是拒絕接受他們的黨所提出的支持霍瑞斯·格利雷的決定的。無原則的政治行動，竟使得查理·奧康諾，一個居于領導地位的奴隸制度的維護者和黑種人民的敵人，被提名為全國勞工改革黨的候選人了。那曾有勞工改革黨所派代表出席的、殘余共和黨人會議也同時提出了奧康諾。該黨在這次選舉中僅得到二九，四八九票是當然不足為怪的^⑪。

在這時，拒絕和那些持異議的共和黨人合伙的一派，卻又在哥倫布斯另舉行自己的會議。出席的共十二位代表，該會在凱默昂的主持下，作出決議說，“沒有必要在這樣晚的時候”再提出候選人來補充大衛·台維斯和覺伊爾·派克爾意想不到的退出所留下的空缺^⑫。

全國勞工會的衰落

一八七二年的這一失敗，結束了全國勞工會的短暫的生命。左爾格在一八七〇年給馬克思的信中曾說明了該會早衰的基本原因：“在一開始時呈現着無限光輝前途的全國勞工會，因受到綠背紙幣運動的毒害，已正慢慢地但肯定無疑地在走向死亡了。”一年後，他更說：“全國勞工會的領導者們一直來是什麼都沒有學到，而且，我恐怕他們將永遠也不懂得應如何去了解勞工問題”^⑧。

在美國的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的影響下，全國勞工會中的很多領袖都得到一個結論，認為只有選票箱可以“消滅我們所厭惡的一切罪惡現象”。他們完全忽略了那個極端重要的真理——沒有工會作後盾，政治行動對工人階級來說，常常是完全無用的。如果說八小時工作法令的經驗曾證明了一個什麼道理，那它就是證明了這一點。因此，一件使人最感痛惜的事，是凱默昂、特萊夫立克及全國勞工會的其他的領導者們，竟沒有仔細地注意到下面的寄自紐約州的阿爾巴尼的一封信，這封信曾出現於一八七〇年二月五日的“工人擁護者”：

“自從工會組織大為興盛以來，我們的州議院中的實際情況的精神已經有了一種驚人的大的改變，我們現在要求我們的權利，而他們一直來只好一切聽我們的主意。我們要那個機構中的人提出我們願意要通過的法案，並告訴他們所有的人說，如果我們不能從他們的手中得到公正的待遇，我們就將要把我們的直接代表安放到那里去，讓他們在下一次議會的會議上讓我們得到它。並且我們會要求並已經做到借州眾院會議廳開一次工人群眾大會。王國州的尊榮的眾院暫時休會

讓那些可怕的圖謀不軌的分子，那些工会人，开了一次会。”

这一通訊說明了工会組織与劳工政治力量之間的直接关系。但那些金融改革主义者却没有从这种經驗中学到任何东西。

全國劳工会迅速衰落的情况，从它的各次代表会的組成成分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在其一八六八年的會議上，五个全國工会——印刷工人、鑄工、机械工、木工及磚瓦工——派來八位代表。十五位代表來自十三个行業工会，另有四十三个地方工会派來四十三位代表。在其一八六九年的會議上，三个全國工会，即鑄工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及木工与裝配工工会派來了代表，此外，六个工会协会、五个州劳工組織及五十三个地方工会均有代表出席^④。

一八六九年代表会之后，紐約州工人协会公开表示不同意全國劳工会的領袖們所提出的那种“通过工会的活动是决不可能实现任何有永恒意义的改革运动”的說法。同年木工与裝配工全國工会也参加進來批評全國劳工会的領導者們对于工会活动所采取的消極态度，并決議此后不再派遣代表参加劳工会的代表会了^⑤。

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中，一切工会都和全國劳工会脱离了关系。三个全國工会——鑄工、鞋工及印刷工——还曾派代表出席一八七〇年的代表会，此外还有三十四地方工会和八个行業工会都有代表出席。但从此以后，所有这些組織几乎全都再沒有派出任何代表來了。全國印刷業工会的代表們报告說，他們“从會議進行的情况，看不出它在任何方面和从純工会組織中派來的代表們有什么关系”^⑥。威廉·杰索浦亦向紐約工人协会报告說，全國劳工会已經完全迷失了它的最初的目标。他以一八七〇年的和一八六六年的代表会相比較，并且在第一次代表会上說：

“……每一个代表都代表着技工職業的某一部門，而在最

后这次代表会上，我們看到的是一个离奇的混合，这里有技工、工人、牧师、律师、編輯、有專門在議院會場外進行活動的人物，还有一些根本無一定職業的人，有些一心想組織一个劳工政党，另一些則又極力反对这种計劃以維護現存政党的利益。各个代表有着如此彼此不相同的目标，这个會議就根本不可能不是它現在的情况——一团糟。”^{⑤7}

一八七一年，磚瓦工和雪茄制造工人的全國工会也和全國劳工工会断絕了关系。雪茄制造工人工会說，我們“此后不应同劳工代表会發生任何关系了，理由是它已完全是一个政治机构，从那里我們得不到任何好处”^{⑤8}。在一八七一年的代表会上，僅只有兩個代表还可以算是代表劳工組織的，一是伊利諾州俄特瓦的鑄鐵工人地方工会的代表，一是加利福尼亞州技工大会的代表。二十二个代表中的大多数均是土地改革主义者。

出席一八七二年代表会的七位代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协会，“其主要目标是討論非政治性的問題”。会上派定了一个由特萊夫立克、凱默昂和制桶工人國際工会的代表佛蘭所組成的三人委员会“致函各州、全國國際工会及劳工会的主席，請他們……考虑召开一次全國工業大会的必要性……”^{⑤9}。从此，全國劳工工会便已变成历史中的陈迹了。

全國劳工会，尽管存在的時間很短，但仍代表着美國劳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發展階段。它明确地歸納了在当时最重要的一些問題，并通过它的教育方面的活动，帮助全國劳工使他們環繞着这些問題團結起來。它是世界劳工組織中最早提出妇女应和男工同工同酬并应同样居于領導地位的問題的組織之一。它是美國第一

个欢迎黑人代表的全國劳工联合机构。作为美国第一个在華盛頓有一个强有力的議院活动小组的劳工团体，它推动了劳工部的建立；它引起了大家对于必需建立較短時間工作制的注意，并协助在联邦及各州政府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它領導劳工進行活动以求修正不公正的法令；它進行了反对將土地無償地划归铁路公司的不合理現象的斗争，并要求將一切公共土地还之于人民。它是由國際工人协会，作为美国的劳工代表組織起來的，并还会派遣正式代表出國参加过第一國際的會議。它协助發动过好几个州劳工党的組織工作以及美国劳工运动史中第一个全國劳工党的組織工作。

全國劳工党的以金融改革为重点的政綱是一件極不幸的事，但这样一个政党的存在，尽管它是为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所統治着的，也仍然說明了工人階級中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准备在全國的政治生活中采取独立行动了。虽然在其最后的一兩年中，过分強調了政治行动和金融改革問題而忽視了工会运动，全國劳工会却亦提起了美国人民的注意，讓他們看到美国政府已越來越为工業与金融壟断企业的利益所控制，而要想保存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必须有一个团结工人、農民以及一切小生產者的偉大的人民运动。

第二十一章

劳工协会的誕生

虽然劳工协会直到我們目前所討論的这个时期之后，才成为劳工运动中的一个巨大的力量，但它开始組織的时期却是属于全國劳工会时期的。一八六九年，費列得尔菲亞的一部分裁衣工人組織了一个新機構，名为“劳工神聖协会”。这个機構的產生乃是一八六二年成立的費列得尔菲亞裁衣工人协会的失敗所促成的^①。协会的積極會員之一，尤利亞·斯蒂芬斯認為該协会所以失敗的原因，是由于缺乏秘密性。那时，斯蒂芬斯曾說：“我决心要努力創立一个与众不同的機構。如該协会終於瓦解了，我將努力集合一些善良的人，共同來創立一个与我們以往所有的機構迥然不同的組織。”^② 劳工协会的第一个地方协会便是这个所謂迥然不同的組織了；該协会的建立是美國劳工运动中一件極关重要的事件。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九日，裁衣工人协会決議解散，而緊接在該会解散之后，斯蒂芬斯与原屬該会的其他八个會員立刻便变成了这个新機構的基本會員。大家宣誓嚴守秘密，并派定了一个委員會起草一个如何管理这一新機構的秘密計劃。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新的协会正式定名为劳工协会。該会的各負責人員于一八七〇年一月六日选出，斯蒂芬斯被选为“工会总会長”(master workman)，这是該会主要負責人的头衔，詹姆斯·賴特則是“大哲人”或榮譽主持人。其他一些負責人員更有所謂“榮譽領班”、“草野騎

士”、“档案秘書”、“财务秘書”和“财务保管”等头衔。入会費为每人一元^③。

劳工协会的各种仪節

这一时期中的許多工会都对于会里的負責人加以离奇的头衔，并規定很多复雜的仪節，但从来也沒有一个組織曾达到和劳工协会一样的程度。任何人要想参加該会——在一八七八年以前，是只有工資收入者才可以作該会會員的——在他被允許加入以前，他必須参加一个秘密會議，在那里他首先要回答三个問題：“你是否相信上帝，那世界的創造者和主宰？在你用自己的血汗賺得自己的每日粮食的时候，你是否願意服从上帝的一般法規，你是否願意鄭重宣誓，嚴格保守秘密，絕對服从指導并尽力执行互助原則？”如果申請人对这些問題都予以肯定的回答，他就得宣誓服从該会的一切法令和規章，并且保證“維護該会一切忠誠會員的生命、利益、名譽和家屬，幫助一切在职的或失業的遭到不幸的或陷于困苦中的弟兄們，使他們得到職業、得到正当的報酬、解除他們的苦难并發動別人去幫助他們，这样使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都能够得到并享受到他們所付的劳动和运用自己技藝所產生的正当的果实。”

宣誓之后，这个新會員就被帶到“聖堂的密室”（議事室）中去听受“榮譽領班”的教誨。在这里他將被告訴說，劳工組織之所以需要完全是因为在任何一个行業中資方都有他們的“联合組織，而且不管是有意还是無意，这些联合組織正在粉碎着一切劳动者的作为一个人的正当願望，并对貧苦的人群加以無情的蹂躪”。劳工协会的會員并不打算要“同任何正当的企業發生冲突，或对資本家

采取敌对态度”，但他們却知道“利令智昏”的人們常常要忽視他人的权利，“有时則甚至要侵犯那些他們認為可欺的人的权利”。为防止这种侵犯行为，劳工协会的會員們决心要“創造出一种健康的关于劳工（价值的唯一創造者）問題的輿論，并要維持正义，以使劳工能够从他們所創造的价值或从資本中充分獲得他們所应得的一份。他們將拥护一切“調和劳資利益……以及減輕过度劳动的痛苦的各种法令”。他們并不贊成全面罢工，但在它成为“教訓一个压迫人的人所必需的正当行为时，我們就將保护并帮助我們的每一个可能因此遭到損失的會員，并在条件許可的情况下，向参加正当劳动的各个部門伸出援助的手”④。

当申請入会的人熟悉了劳工协会的宗旨以后，他就会被引去拜見“大哲人”，由他向他講述該秘密会社的組織情况，如握手的特別方式，特別口令，以及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將要举行會議等等。这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至一八七八年或甚至一八七九年以前，該会的正式名称就從來沒有听人提到过。在当时一般都称它为“五星会”或“五星号”，因为在一切印刷文件上它总是印上五个星号——* * * * *——代表自己。召集會議的通知則經常是用粉筆在人行道边和路旁的柵欄上画上一些只有本会的人才能懂得的神秘的符号。 $8 \frac{148}{8000}$ 这个符号的意思是說第八千号地方协会將于八月一日八点鐘开会⑤。

尤利亞·斯蒂芬斯的作用

要了解这些入会仪式的意义，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关于尤利亞·斯蒂芬斯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劳工协会的机关报，“联合劳工报”，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五日所載斯蒂芬斯的計聞曾說：“在我們所有的

各种仪節和規章中都可以找到他的思想的烙印，以及他对于当前重大問題的敏銳的觀察所給予我們的啓示。”

斯蒂芬斯于一八二一年生于新澤西州揆普美城，早年曾入浸礼教会傳教士团學習。一八三七年大恐慌來臨后，他被迫放弃學習，入成衣店做学徒。后来，他还在新澤西州教过書，到一八四五年，他便搬到費列得尔菲亞來作成衣工人了。他是奴隸制和奴隸政权的坚强反对者，在共和党剛成立之后，他就加入了該党并曾为拥护福利蒙和林肯的競选运动積極活动^⑥。

斯蒂芬斯在六十年代初所進行的活动我們知道的很少。据傳說他曾到过欧洲，并在那里和某些卓越的馬克思主义者發生过接触；同时据可靠記載，在他回到美國时他曾从欧洲帶回了一份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党宣言”。并且据說斯蒂芬斯曾和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說，这本小册子“差不多包容了所有我曾想到的問題，因此在我起草本会的‘原則宣言’时，我曾尽量引用这些材料”^⑦。但研究劳工协会的一位歷史学家諾曼·魏尔教授对这些傳說却表示怀疑，他怀疑斯蒂芬斯曾到过欧洲，或得到过任何馬克思的著作。的确，斯蒂芬斯关于劳工問題的理論很少有和馬克思主义相同的地方，他本人并反对左尔格以及其他的一些美國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并不願“以个人或以团体的名义与他們發生任何关系”^⑧。

斯蒂芬斯对于“团結”一詞十分強調。他說，劳工必須使自己强大起來，团結起來，以对付有組織的資本家的力量。而唯一能够对付資方强大力量的劳工組織必須是一个团結各行業的工人，并帶有世界性的組織。他認為行業工会，在組織上和在活动的範圍方面都太狹小了。它們不去团結所有的工人，反而極力把不熟練

的工人、黑人以及其他部門的工人摒棄在組織之外。斯蒂芬斯堅決認為，既然所有的工人的利益都是共同的，很自然的他們就應該屬於一個共同的組織，並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緊緊地團結起來^⑨。

而要达到这种團結，必須通過三個原則：秘密，合作和教育。秘密有三個作用：它可以保護工人不受反勞工運動的僱主們的侵害；它可以防止資本家們發覺工人們的計劃；同時，各種秘密的儀式可以使新入會的會員深感這個組織的重要性。在議事室的秘密的聖所中，一切行業、宗教、國籍、種族、以及政治見解上的差別已全部不復存在。在這裡一個工資收入者不論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表現就只是一個工資收入者，而不再是什麼白人或黑人，美洲人、歐洲人或亞洲人，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猶太教徒。斯蒂芬斯有一次曾說，“教義、政黨組織和國籍不過等於穿在身上的衣服，它們並不能阻止崇拜上帝——那宇宙的主宰——的人們的心靈的結合，也不能阻止人類的勞動者——那四海一家的兄弟們——的心靈的結合。”^⑩

斯蒂芬斯不僅注意於在工資制度之下尋求改革的途徑。他更相信勞工協會會員們的一個重大的目的是，“使財富的生產者從工資奴隸制的剝削和奴役下得到徹底的解放”^⑪。

通過合作的方式，勞工協會的會員們將可以獲得較好的生活條件，並逐漸以合作制度去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工作條件的改善須賴以行業工會組織為基礎的各行業的工人大會，而以合作制去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任務則必須由那種團結着各個行業的工人的、混合性的工人大會去完成^⑫。

教育在斯蒂芬斯看來，對於實現勞工協會的當前最重要的目

标將發生極大的作用。它將破除現存于工人群众中、造成工人階級的分裂的各种成見和彼此敌視的心理。在劳工协会的秘密的聖所中，每一个會員都被教導說，所有的工人，不管他們所从事的職業如何不同，他們的目的和利益却是完全一致的。教育也可以培养會員們，使他們从事政治性的活动，因为只有在他們了解了政治經濟学和政治学的理論之后，他們才能在本國民族的生活中發生效用*。

斯蒂芬斯曾說：

“在各地方协会中，有关政治經濟学的問題必須要自由而充分的加以討論。这样，也只有这样，會員們才能徹底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应享的权利，上帝的，抽象的，或者說最高的法則中所定的权利，法定的或者說國家現行的法律中所規定的权利。这样，他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周圍的各个合理或不合理的現象，更能明智地去完成一个公民应尽的職責，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并确切地認識到自己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場，究竟应属于什么样一个階級。”⁽¹⁹⁾

斯蒂芬斯的目的是要不分性別、种族、信仰和膚色，把所有的工人都團結在一个一般性的群众組織中。据傳說他曾經說过，“我

-
- 劳工协会初期所采用的一个很有趣的入会程序，也反映出了斯蒂芬斯对于教育的重視。当一个會員進入議事室的門廳或前房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个三角形的小桌子，桌上放有一个裝滿着卡片的筐子。一个會員要想進入聖所或者說議事室去，他就必須在一張卡片上寫下自己的名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迫每一个會員學習文化；后来成为劳工协会的杰出領袖的泰倫斯·泡德利曾說，据他所知，在斯克蘭吞有一百多人是因为受到这种卡片制度的影响“才学会寫字的，結果他們不僅能寫而且能讀他們的姓名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了”。（見泡德利：“我走过的道路”，一九四〇年紐約版，第五四頁。）

決不是認為預言將發生什麼力量，但我現在在我的前面確已能看到一個將包容全世界工人的巨大的組織。它將包容各種行業、各種信仰和各種膚色的男人和女人；它將包容一切值得保存的種族。”^⑭ 在強調整個勞工隊伍的內部必須彼此團結和互相關切方面，很顯然，斯蒂芬斯是遠勝過與他同代的許多只知強調自己個別行業的利益並只為那種利益進行鬥爭的勞工領袖們。同時，在重視教育以及強調討論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的重要性方面，他也比那些主張勞工組織中的會員們只應重視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問題的工會領袖們要進步得多了。

然而，斯蒂芬斯之為人道主義者更過於他之為工會主義者。他所想建立起來的機構不是工會，而是一個群眾性的兄弟會，一個工人階級的友愛互助團體。同時，他的那種只須依靠秘密性、教育與合作制就可以造成勞工之間的團結，並且解決一切勞工問題的信念，實使人感到他是一個被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所控制着的夢想家。

勞工協會最初的組織形式

雖然斯蒂芬斯曾批評當時的各種工會組織，認為他們代表着一種“極狹隘的思想，並過度限制了自己的活動範圍”^⑮，但是勞工協會早期的各地方協會也仍是地方性的屬於行業工會一類的組織。除能證明自己曾作過一段時期學徒的裁衣工人外，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加入該會的第一號地方協會作會員。婦女也沒有入會的資格；直到一八八二年以後，才有婦女入會。泰倫斯·泡德利曾寫道，“在對外寬容和對內友善方面，勞工協會都是遠不如當時的一般工會組織的。”^⑯ 該會早期的各分會的主要特點，就是要使自

己成为一个严格的行会組織*。直到該协会擴展到西宾夕法尼亞州的煤礦和鐵礦区以后，这种狹隘的行会主义的观点才开始逐步消滅，也只有到了那时，劳工协会才真正开始向前發展。要想了解劳工协会这一組織形式方面的变化，我們必須研究一下七十年代时期的長期不景气現象。

-
- 劳工协会的大閉結观念，只是表現在允許其他行業的工人参加这些裁衣工人的地方协会方面。那些工人——被称作“会友”——不能参加關於該行業的事务的討論，也不交納会費，但可以成为他們自己那一行業的工人中的組織者，組織他們另自建立地方协会。第一个“会友”是在一八七〇年入会的，而第二个地方协会則系於一八七二年七月十八日，由参加第一号地方协会作会友的一群造船木工和油灰工組織起來的。直到一八七二年才有第二个地方协会出現的这一事实，証明該协会在最初是發展得極慢的。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八年的 長期不景气現象

尽管有战后不景气現象的存在，但由于劳工通过工会組織和各种政治機構進行許多偉大的活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三年間工人的实际工資却仍然有所增加。宾州劳工統計局宣称，在这一期間有組織劳工工資增加的情况較之無組織劳工要高出百分之四十^①。但到了一八七三年九月，当杰庫克公司的銀行倒閉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一夜之間，全國的信用機構全部垮台，到這年年底以前，商業破產事件共已發生了五千多起。

工会會員人数的驟減

在此后可怕的六个年头中，失業現象一天嚴重一天。据紐約貧民福利促進會估計，在一八七三年年底，紐約市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或者說大約有四三，六五〇名工人都已处于失業狀態中。其他工業城市中的類似的機構也報告了同樣的情况^②。在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間，失業工人人數達三百万，而整個工人階級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長期失業。五分之二的工人在一年之中只有六、七個月的時間有工作可做，至于經年有工作的則不滿五分之一^③。一八七七年秋天，有一个紐約工人曾說：“我們的木工們在幹什么事？什么也沒幹！我們的磚瓦工在幹什么事？什么也沒幹！他們

將依靠什麼來度過這個冬天呢？什麼都沒有。”^④

極少的工會渡過了長期不景气時期的這個難關。在一八七三年危機爆發時尚存在的三十個全國性工會，到了一八七七年就只剩下八、九個了。機械工與鐵工工會的會員減少了三分之二；全國制桶工人工會的會員在一八七二年時為七，〇〇〇人而至一八七八年時則已降至一，五〇〇人；全國雪茄製造業工會的會員，由一八六九年的五，八〇〇人降至一八七七年的一，〇一六人；全國印刷業工會的會員，由一八七三年的九，七九七人降至一八七八年的四，二六〇人。在一八七二年年初，擁有會員五萬名左右的制鞋工人協會，到一八七八年時實際是一個會員都沒有了。

以紐約市論，全市工會會員人數在一八七三年時約為四五，〇〇〇人，而至一八七八年則降至五，〇〇〇人。在一八七八年，整個辛辛那提一地工會會員總數僅在一千人左右；而克里夫蘭，這個在不景气現象發生前的重要的工會中心，到一八七八年時工會組織已在全市絕迹了^⑤。雖然在不景气現象發生的前夕全美國工會會員總數究為多少並無可靠的統計，但據估計在一八七三年年初共約有三十萬工人已參加了工會。而一九〇〇年，當塞米爾·岡伯斯在美國工業委員會上講話時，則估計一八七八年時全國工會會員總數僅為五萬人^⑥。

廠主們更極力採用閉廠停工，傳遞黑名單，向法院控告以及訂立“黃狗”合同等辦法以破壞工會組織。在一八七六年，當法國工會主義者的代表團到美國來參加“獨立宣言”一百周年紀念的全國慶祝大會時，他們非常吃驚地看到，“在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共和國中”竟有許多工人不敢擔任代表來歡迎他們，因為害怕因此被人指為工會會員。他們更聽人說，一個工會會員是“像一條瘋狗一樣被

人搜捕着”。在他們向法國工會所作的報告中，代表們說，這一次經驗已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資本在美洲，是亦如在歐洲一樣主宰着一切的^⑦。

百折不撓的工會運動

儘管這樣，工會運動却並沒有被消滅，美國帽業精工工人全國工協在不景氣時期中，不僅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並還堅持實行着關門制度。一八七四年，沃堪之子更組織了二十個新的鐵工廠。一年後，該工會還在一次極艱苦的罷工鬥爭中獲得了勝利。一八七六年，沃堪之子聯合會（煉鐵工）、鋼鐵業爐工兄弟協會（粗鑄工、軋鐵工及鉚工）、軋鋼工人工會以及制釘工人聯合會團結在一起，組成了鋼鐵工人聯合會^⑧。

在瀝青煤礦或有烟煤礦工業中，按照英國煤礦業工會的形式組織起來並採用與它相類似的名稱的美國全國礦工工會即是在不景氣時期組織起來的。一切被雇用在礦坑中或礦坑外工作的工人均可為該會會員。該會於一八七三年十月成立，雖處在不景氣時期中，亦仍能繼續不斷地發展着。到一八七四年五月，該會已共有會員二萬五千人。一八七五年五月，該組織的負責人約翰·西尼曾寫道：“我們的希望是我們的組織將不斷發展，直到我國所有在礦山中工作的勞動者都變成了全國礦工協會中的良好的、有能力的會員時為止。”^⑨

但這些成功的情況却只是僅有的一些例外。各工會報紙雖一再提醒工人們說，“工會發達的地方的工資比沒有工會的地方要高得多”^⑩，也仍屬徒勞。雇主拒絕“雇用不肯脫離工會的工人”，強迫工人們走出了勞工組織^⑪。

在不景气时期的那些年里，也有人几度企圖組織全國勞工的聯合機構，但結果均告失敗。一八七二年七月十五日，由各工會代表們* 的共同會議所建立的工業大會兩年後便全部瓦解了。該會的創始人曾保證不使這一新的聯合機構參與獨立的政治活動，或“墮落成為一個政治黨派……或變成為一種失意政客們的避風港”^⑫。工業大會曾盡力幫助進行罷工的工會，甚至还派人四出進行組織工作。被派的人中間有一個即是不久後便成為勞工協會的領袖的泰倫斯·泡德利。一八七四年，一個秘密勞工組織工業兄弟會與工業大會合併，并使工業大會採用了它的各種儀節以及它的會章和名稱。這個名為工業兄弟會的新組織的會章強調政治行動的重要性，并強調要進行爭取在全國建立綠背票幣制的鬥爭，這種綠背票必須直接在人民中發行，并可用以兌換政府公債，而公債利息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六五。其他要求則有：實現同工同酬，建立八小時工作日，廢除公共事業上的合同訂貨制度，實施增進工人安全和健康的法令，保證按月付發工資的法令及規定工資有財產留置權的法令等項^⑬。工業大會的最后一次會議，是在一八七五年舉行的，全國性工會僅只有印刷業工會有代表出席。這次會議所採取的最重要的一個行動，就是規定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為通過“美國勞工群眾的聯合行動”^⑭ 全面實現八小時工作制的一天。

在工業兄弟會解体後，還曾有人再三再四地努力於建立一全國勞工聯合機構的活動，但結果仍均歸無效。是以自一八七三年起，直至一八七八年當勞工協會在美國勞工運動中變成為一種全

* 有七十個代表出席這次會議。其中四十四人來自五個全國工會（制桶工人、機械工人、鑄鐵工人、沃堪之子和制鞋工人工會），其餘的人則為礦工、雪茄製造工人、印刷業及烟草業工人等所派代表。

國性的力量時為止，竟沒有任何全國性的勞工機構來領導各個工會以對付僱主們的進攻。

不景氣時期的生活情況

紐約一工會運動者曾于一八七四年七月號的“勞動人”上寫道：“一個人只須在上午七點至八點及下午五點至六點的時候，在市區各處走一走，他就可以看到各種正在進行中的工作和許多違犯八小時工作規定而進行工作的工人……。這些人因為實際情況不容許他們長期的閑呆着，只得被迫接受了僱主們所提出的任何條件。”不景氣時期來臨以前，在建築業中，八小時工作日和每日工資二元五角至三元，已成為極普遍的情況，但到一八七五年十月，則每日工作十小時，每日工資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卻變成為最流行的標準了。而到這時，那些曾經一度頗稱強大的紐約磚瓦工人、石工、木工、刷牆工及印刷工人等的工會組織都已幾乎完全不復存在了^⑤。

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紡織工業中的工資數目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五。在一八七一年時，賓夕法尼亞一男織布工人的工資為每一個十小時工作日二元，女工一元一角六分。到一八七八年則分別減為一元二角三分及九角九分。鐵路工人的工資，在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間，被減去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家具工人的收入，在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間，更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到六十^⑥。早在一八七四年的夏天，紐約制桶工人工會即報告說：“目前情況已到了不堪的境地。在今天已無所謂工資標準可言，每一個人盡他自己所能爭取到的待遇在工作着，而是一律都拿着極低的工資。”

一八七四年夏，費列得爾菲亞熟練工人工会的中央委員會在其致“工人同胞”的一封信中說道：

“工人階級的苦難正在與日俱增中。他們很快便將陷于極度慘痛和悲傷的境地……。很快全部工人的實際數目中將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找到工作，而其餘的三分之二，流離、飢餓，將只能空等着騙人的報紙所預言的那個美好的年月……。到本年仲夏的時候，我們就將會整批地走向失業。而那些尚能找到一個僱主的人，則必須接受一再減低的工資，直到他們的勞動力已變成一文不值時為止。”^⑰

誠然，消費品的價格也在跌落中，因此，實際工資的減少並不像貨幣工資所表示的那樣多。可是，在普遍失業的情況下，這種話實際是不再有什麼意義的。在一八七四年的頭三個月中，約有九萬名無家的工人，其中有五分之二為婦女，都變成了紐約市各警察站中的住戶。他們被稱為“轉盤客”，因為他們在任何一个站上居住的時間被限制在一個月中不得超過一天或兩天。夜晚，他們穿着潮濕的衣服，擁擠在一條一條的硬板凳上睡覺，天剛一亮則一個個餓着肚子被趕出來。這種把工人們攆出屋外的辦法，正如一位曾參觀過這類警察站的記者所說，實在是“極端野蠻和無人性的”^⑱。但那些住着華廈的生活充裕的人們却指責“市當局的救濟過分慷慨”，因為，哪怕只是給他們幾條硬板凳，這也“會破壞那種獨立人格的基礎，破壞那種一個人應完全以自己的才能為依靠的原則的基礎”。“民族”雜誌則更說，這一切，實是“不折不扣地共產主義化了”^⑲。

當危機日益嚴重，千千萬萬無家的工人——七十年代的流民們——的情況更是日益惡化。他們居住在草棚中，在垃圾堆里尋

找充飢的食物。“舊金山郵報”一記者曾拜訪過太平洋岸的一個無家可歸的工人們的區域。他看到一個年老的工人正從一堆垃圾中挑尋“一個稍有人心的人所不忍以之餵狗”的食物，因問道：“你不能找一點工作做嗎？”那個人卻抬起頭望着他回答說：

“‘工作，先生？你難道以為要是我們能找到工作，我們會願意住在這裡，一天跟本市的野狗打架來爭奪我們一天的糧食嗎？這裡的每一個人哪一天不從一個碼頭走到另一個碼頭，走遍整個的城市，只要找到一個不論工價的工作。兩個子兒一天我們都會極高興地接受的，可是我們什麼也找不到’。

“這時，另有幾個身材矮小的人走過來，一個高個兒的、長得很漂亮的小伙子，一邊用一個罐頭盒子盛水洗着臉一邊說：‘我在這裡住了三個月了，吃睡都在這裡，但我沒有一天不跑出去好遠尋找職業。有些禮拜我賺到塊把錢，有些禮拜我一個子兒也弄不到。我曾提出願意只拿一個支那人（原文如此）所拿的一半的工價，擔任任何勞苦的工作。沒有用，誰也不要我。我不喝酒。我從不偷竊，可是我現在卻只能或者餓死，或者就靠這一類的食物來維持自己的生命。’”^{②0}

到西部去呢？“工人擁護者”曾解釋為什麼工人們不能到西部去。“第一，他們很多人都沒有錢作路費。第二，他們到了那裡也沒有耕種土地所需的工具……。如果他們可以不用牛或馬，也不要農具就可以種地，如果在他們第一年種下的庄稼成熟以前，他們可以吃草、吃樹葉、吃野果生活，那向西部遷徙倒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②1}。一個工人到哪裡去找十四元到十六元的手續費和登記費呢，哪裡去找旅程五百哩或一千哩所需的運輸費用呢？哪裡去找牲畜農具的購置費，以及在地裡能生長足夠的糧食以維持家人

生活及償付各種開支以前的那最初幾年的生活費用呢？據弗來德·沙農估計，“對於一個五口之家來說，僅是運輸費一項，就可以等於一個工人半年所得的工資”^②。

在不景气時期中，也確有一些工人遷到西部去；費列得爾菲亞制毯工人的地方工會，因聽說在堪薩斯的勒芬衛斯可以找到工作，乃全體遷移到那里去了。另有一些計劃西遷的工人却為芝加哥、底特律及聖路易等地的工會領袖們向勞工報紙所發出的呼吁所劝阻。他們勸告說，千萬別到西部去。西部各城市已經“擠滿了找不到職業的技工和其他的工人”^③。一個曾去西部尋找職業回來的工人，在一八七五年九月七日的“全國勞工論壇報”上寫道：

“十二個月以前，因不幸已窮得一文莫名，我乃從紐約出發四出尋找職業。我是一個技術工人，在我的本行中，一般也都認為我能力強的。在這一年中我走過了十七個州，而我一共只找到了六個星期的工作。我曾經受盡飢餓；當氣溫在零下三十度的時候，我却一連幾個月找不到一張可以睡覺的床鋪。去年冬天，我是一直在樹林子里睡覺，在我老老實實地到處尋找工作的时候，我常是兩三天沒有吃到任何東西。現在，奉上帝之名，我要求給我一點什麼以使我能將我的靈魂和肉體連綴在一起，我已經被人看成是‘游民和浪人’而被拋棄了。”

不但很少人到西部去，不少的工人却跑到東部來了，更有很多工人則向歐洲和向南美遷移。一八七六年八月，“紐約太陽報”登了一則廣告，招請一百名願意自付旅費前往蘇格蘭工作兩年的石工和泥瓦工。申請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必須請警察來維持秩序。一年半以後，一八七八年二月，報紙上有一條消息說，從美國滿載勞工開往南美的首都號汽船在中途失事沉沒。“紐約論壇報”報道

說：“在該船沉沒的消息到達費列得爾菲亞一小時後，柯林斯先生的辦公室便被數百個餓着肚子但行為規矩的工人所包圍，要求替代那些被淹死的工人的位置。”^{②4}

但我們不能因此作出結論說，工人們完全沒有興趣到西部去作農民。工人們向一八七八年委派的專門調查“勞工和商業的不景氣情況”的國會委員會所提出的各種建議中，最常被提出的一項就是要求國會貸款或津貼失業工人，使他們能夠按照農地私有條例的規定得到一片土地，開始農人生活^{②5}。沒有任何建議比班哲明·伯特勒于一八七八年在眾院所提出的一項議案更受到勞工方面的擁護的，這一議案提出，對於任何一個表示願意到西部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除開前往公共土地所需運輸費用外，“在定居下來的第一年中，應由政府為他們開支為數不超過一，二五〇元的一筆款項”^{②6}。這一議案被斥為共產主義的提案，很快也就被人遺忘了。那時，甚至“紐約論壇報”也被迫承認必須由國會來設法救濟那些無家可歸的飢民。該報于一八七八年二月七日說道：“對於這個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向我們露出猙獰的面孔的悲慘事實，要想完全採取不理的態度是不行的。”“這也再不是一方面修蓋幾間茅草棚，一方面組織大家極力防制流民所能解決的問題了……。失業的技工和其他工人們是怎麼度過這個冬天的，那只有天知道……。難道要讓他們就永遠這樣去做流民和乞丐嗎？”

“紐約世界”卻為失業工人提出了它的綱領：“美國勞工從今以後必須下定決心不要再希望過着比歐洲勞工更好的生活。少拿一點工資，一個人也應該感到滿足……。也只有這樣，工人才能更接近於上帝為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所安排下的地位。”^{②7}

但美國勞工並不相信上帝已規定下凡是工作的人都必須挨

餓，他們的偉大的失業示威運動更証明了這一點。

失業示威運動

國際工人協會的各美國小組，乃是各次失業工人運動中的組織中心*。一八七三年十月末梢，代表着第一國際各個美國小組的北美國際工人協會聯合會的聯合執委會，印發了一個宣言。在概述了失業情況和工人階級所身受的苦難程度後，該宣言提出了下面的計劃：

“我們向你們提出，并建議你們採用下列的組織計劃，這一計劃是在我們的德國工人弟兄中已經很成功地實行着的：

“住在同一個、兩個或更多的街段上的工人們在一起組織一個俱樂部，一個區域中的俱樂部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區域委員會，每一區域委員會更派出三個代表組成一個中心機構。

“在這種方式下組織起來的工人則將向各地的政府當局提出下列的要求：（一）在一般的工資標準和八小時工作日的原則下，給一切願意而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以工作；（二）對於實

-
- 甚至在一八七三年九月大恐慌來臨以前，國際便已在極力組織失業工人要求救濟。一八七二年三月，在湯普金斯廣場舉行的一次失業工人群眾大會，便是由紐約各國際小組召集的。示威遊行的人們手中所打的旗幟上的標語是：“失業工人向政府要求工作”，“八小時工作日是我們的首要權利”以及“八小時工作日必須實現，用和平的方法，如果可能；用強制的手段，如果必須”。這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之一更聲稱：“我們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全國勞工局以創辦各種有實用的工業，借以在維護合理的工時（每日不超過八小時）和報酬的原則下，保證使每一個不能在別的地方找到職業的人均有工可做，并將所有的生產成品按成本賣給人民。”（見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伍德哈爾與克萊福林周刊”。）這一決議正包含了擁護全面就業法案的人們所提出的基本原則。

际在困苦中的劳动者及其家人，貸給他們足夠維持一星期生活的現金或实物；（三）在自十二月一号至一八七四年五月一号期間，不容許房主因得不到房租驅逐房客。”²⁸

在紐約市的第十區，德籍工人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初便已成立了一個失業工人會，並開始收集關於失業情況和陷於苦難中的家庭的貧困情況的材料。不久以後，一次德籍工人群眾大會召開了，會上選出一個中央委員會以便使本市一切失業工人的活動能夠互相配合。在這同一時期中，紐約市的各工會也正開始行動起來。一次由各工會代表出席的會議，于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要求雇用技工及一般勞動者從事公共事業方面的工作，並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紐約市當局請求“全國政府救濟勞工”，撥發貸款一千萬元。該會更向國會呈遞請願書，鄭重說明，“一切貧苦的、無家可歸的、被迫閑呆着的人民均為國家的守護者，決不應被完全忽視、不予任何照顧而一任其在街頭流浪”。該請願書更建議政府“經營一切它有權經營的工業，……雇用工人階級中的全體成員”。這些生產事業所得的全部利潤可以用來減低國家的稅率²⁹。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由紐約各工會及國際的各小組召集，在苦泊爾學院舉行的一次會議，到會的人數之多連會場的門都給堵塞住了，很多進不去的聽眾只好在會場外面等着聽大會的決議。大廳里，大幅的旗幟上寫着：“失業工人所要求的是工作，不是救濟。”“當工人開始思想的時候，壟斷商人將開始戰慄。”“一切勤勞的人應享受法律上和住宅上的平等。”“紐約時報”則斥責這些口號是“無可懷疑地共產主義的”口號³⁰。

該會同意了組織委員會所提出的下列建議：（一）一切議案在變成法律以前應先得到公共輿論的贊同；（二）任何私人不得占有

三萬元以上的財產；(三)規定八小時為一個工作日。此外，大會更全體一致通過了下面的一條決議：

“既然我們是勤勞的、奉公守法的公民，我們已繳納了一切應繳納的稅款，我們擁護並忠心於政府，因此

“決議，在這困苦時期，我們必須供給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家人以適當的食物和住所，同時必須將我們的賬單送到市金庫去清償，直到我們能夠找到工作和得到工作的報酬時為止。”

休會前，大會更選出了一個安全委員會，其中包括有國際和工會主義者的代表。德籍工人群眾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和這一安全委員會同意彼此合作⁽³⁾。

在其他城市中，失業工人群眾大會也同樣在舉行着，其中大多數均有美國的各國際小組在裡面起着領導作用。在芝加哥，有五千名工人在國際及工會的主持下，於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了一次會議，會上擬定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在每日工作八小時和給以足夠維持生活的工資的條件下，給一切願意而且有能力工作的人以職業。該請願書並要求通過由工人們所選定的一委員會撥款或糧食救濟失業工人。

第二天，兩萬名失業工人排成隊伍走過芝加哥的街頭開往市政廳。他們的代表們要求市政府當局“給沒飯吃的人以糧食，給沒衣穿的人以衣服，給無家可歸的人以房屋”。幾年以前，為救濟芝加哥大火後的災民，救濟會曾收到一百多萬元捐款。這筆錢還剩下約有七十餘萬，代表們乃要求拿這筆錢來補助貧困的家庭；並由他們派代表參加決定哪些家庭應得到補助的委員會，因為他們知道誰是在飢餓中。

由芝加哥市長、市議會的一個委員會、工人代表們及救濟會方面的人共同參加的一次會議，于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但結果救濟會拒絕將那筆款子交給市金庫。因此代表工人的委員會又號召一次群眾示威運動，並派出一個群眾委員會前往救濟會請求救濟。最初該會拒絕接見這個委員會，但在看到成千的工人都要想進到屋子裏去的時候，他們乃改變了主意。相信工人們都是無知的、迷信的，該會乃宣布說，只有願意打注射針的人才可以得到救濟。立刻，該會的醫生被無數的工人所包圍，弄得只好去把警察叫來。最後，該會也只得放棄了鬥爭，宣布將于一八七四年的第一個星期發款救濟失業工人的家庭。約有九，七一九個家庭得到了一些補助。但市議會却始終也沒有實踐它的救助失業工人的諾言^②。

同時，在紐約城中，由中央委員會與代表工會及國際小組的安全委員會所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亦正組織失業工人舉行群眾大會和示威運動。這方面的活動以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所舉行的一次示威運動為其最高潮。這次示威，原計劃以市政廳為中心，但因受到禁止乃改定在湯普金斯廣場。當第一批參加示威游行的隊伍進入廣場時，紐約人即看到了一次在本市從來未有過的巨大的示威運動。市長，原答應來這裡向示威群眾講話的，却忽然改變了主張，而到最後一分鐘時，竟有警察來對這個集會進行干涉了。工人們事先並未得到任何警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跑到湯普金斯廣場上來準備要聽海福梅爾市長提出一個救濟失業工人的計劃。而當示威的群眾擠滿了廣場的時候，他們却受到了警察的攻擊。有一個敘述當時情況的報告說，“警察的木棍，直上直下地飛舞着。婦女和孩子們哭叫着四處奔逃。他們中有很多被涌向出口的人流沖

翻了，踩在脚下。在街头閑着的旁观者也都被冲倒在地，并被騎着馬的警官們用木棍毒打。”以百計的工人受了重伤，并有好些工人因攻打了警察被逮捕判刑^③。

安全委员会又号召群众游行示威以抗議警察的暴行，并要求釋放以在湯普金斯廣場攻打警察的罪名被監禁的克利斯琴·莫叶尔。

但失業工人的运动不能忍受如此慘痛的考驗，它开始逐渐失去力量了。在某些区域，塔馬尼大廳的代表們抓到了运动的領導权，他們的目的是要制止任何要想發動群众的企圖，而且塔馬尼大廳的影响很快就在安全委员会中也發生了作用。到一八七四年秋天，安全委员会内部不断發生紛爭，結果是失業工人对它完全失掉了兴趣^④。

拉薩尔主义者与馬克思主义者

如果美國各國際小組能够團結一致，它們很可能会阻止住失業工人运动内部的分化，然而，美國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最为欠缺的却正是團結。在不景气时期中，美國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者之間又一次發生了冲突。同时，由于数千名德國工人为逃避普法战争后在德國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迫而來到美國，因使这一冲突更为强烈化了。他們一到达美國，便把那种在德國工人階級中造成分裂的思想上的冲突也移植到美國來了。

这种冲突具体地表現在应采取何种策略以組織工人階級謀取自己解放的問題上。在拉薩尔派看來，工会的解体已証明在不景气时期中只有政治行动能够有助于工人階級的事業。失業示威运动，他們也認為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种运动能帮助組成一个劳工

政党，而且在这种政党一旦形成之后，便再沒有必要去集中力量搞群众大会和失業示威运动了³⁵。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政治行动；他們相信所有的階級斗争都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他們認為，組織一个强大的、可以影响选举的劳工政党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們爭辯說，工会組織乃是劳工运动的搖籃，因此复兴現有的工会并帮助組織新的工会乃是美國各國際小組的職責。失業工人示威运动，不管它会不会產生形成劳工政党的結果，也应当繼續下去，因为这种示威运动可以使飢寒困苦中的家庭得到一些救济，可以刺激工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可以多一些机会讓工人們深深地了解到建立工会的重要性³⁶。

一八七三年以后，西部的伊利諾劳工党和东部的北美社会民主党的組成乃是拉薩尔派影响的具体表現。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在芝加哥几次勝利的失業群众示威运动之后建立起來的劳工党，只爭取到一些空头的諾言。到一八七四年二月时，它已开始發行自己的机关报“前驅”周刊，由拉薩尔派分子卡尔·克林格担任編輯。“前驅”極力強調拉薩尔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由國家輔助合作社事業。堅持着拉薩尔派的原則，該报宣称，劳工党將不与工会运动發生任何关系，因为“它从來也沒有为任何行業的工人爭取到有永恒意义的生活上的改善”³⁷。

由拉薩尔派于一八七四年建立起來的北美社会民主党，則仍強調該派旧有的一套計劃：工人必須集中力量進行政治活动。但就在这一运动的內部却亦有不少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們不断指出政治活动必須与工会相結合的重要性。由于他們的影響，該党在思想上才慢慢和第一國際較為接近了³⁸。

当在西部以及在东部的拉薩尔派分子正集中力量組織劳工政

党的时候，一貫坚持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各國際小組，則正力圖使自己变成为美國勞工运动的一部分。一八七五年，它們便在这方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勝利。那时，由麥克唐奈尔領導的一个爱尔兰工人組織，美洲工人会加入了國際的組織。至于这一爱尔兰工人加入國際的行动为什么竟沒有能够在勞工运动中發展成为一种主要趋向，美國馬克思主义者本身存在着的某些缺点是应負相当責任的。正如左尔格曾常常提到的，他們差不多經常是把他們从德國学到的东西硬搬到美國來，而完全不去分析这两个勞工运动之間的差异。他們中有很多人就根本不肯学英文，而把自己的活动完全限制在講德語的工人圈子中。更有一些則甚至鄙視土生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思想落后^③。

十年后，恩格斯曾寫道：

“德國人不了解应如何拿他們的理論作为一只槓杆去發动美國的群众；他們自己对于那些理論也大部分不了解，因而便以武断的、教条主义的方式來对待它們，把它們看成是一种只要背熟了便可以毫不費力地用來解决一切問題的东西。对于他們，理論乃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們原則上都不學習英文。因此美國的群众便只好去另尋自己的出路了……。”^④

有一个时期，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者之間的分裂似乎有了和好的可能。伊利諾勞工党和北美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都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因此它們承認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理論是正确的，就是說，在工人被組織到工会里去以前过早進行政治活动是沒有用的。利用这一次的經驗教訓，社会民主党內部主張進行工会运动的人們乃逐漸擴大了他們的影響。一八七五年的一次党代表大

会更通过一項決議，明确提出“在目前情況下，將工人組織進工會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成為他那一行業的工會會員，或協助在沒有工會的行業中成立工會”。社會民主黨的英語機關報“社會主義者”曾對這一決議的通過表示慶賀，並號召大家“在任何情況下都極力維護工會組織及它的各種原則，以使重新改組社會的工作能夠迅速完成”^④。

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團結

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六年間，各勞工報紙都擠滿了要求加強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團結的號召。下面所引的曾在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國勞工論壇報”上登載過的一篇文告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美國各地現已存在着無數的工人組織，他們一致宣稱，目前的這種政治和社會制度是罪惡的，因而必須要從根本上予以改變；目前這種可恥的依靠資本家來維持生活的情況，是造成危害社會的智力和道德上的墮落以及經濟上的衰頹的最大根源；而每一政治運動必須服從於一個首要的社會目的，那就是，求得工人階級經濟上的解放。概括地說，這是極大一部分工人所共有的信念，同時也是上面所提到的各種勞工組織所共同主張的原則；但此外也還有一些較細微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不一致的。清除這些意見上的分歧，將所有的勞工團體團結成為一個巨大的、不為任何力量所屈的組織，在過去曾經有一個時期成為我們全體的热烈願望，而現在這種願望是即將變成為事實了。從各个方面都不斷傳來團結的呼聲。已有人提議找一個較便利的地區舉行一次代表大會以便決定

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計劃，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現在还没有决定下来。許多敌視劳工事業的人們——特别是那些做股票生意的报社里的編輯們——正極力毀謗这一剧烈的劳工运动，再三再四地說它是法國人的、德國人的或者俄國人的运动，真是没有什么話能比这更荒唐的了。这些有錢則灵的撰稿人，同样也可以說‘万有引力定律’，因为是牛頓發明的，所以只是一种英國人的运动。任何一个略具社会科学知識的人都知道，劳工的解放既不是某一个地方，也不是某一个國家的問題，而是一个牽涉到一切有現代社会存在着的各个國家的社会問題。我們是生于美國或已入美國國籍的工人，因此，这种要把我們当外國人看待的企圖，只不过說明我們的敌人的罪惡意圖是沒有止境的。‘分而治之！’是压迫者一直喊叫着的一个口号，而且多少世紀以來都已实行得很成功；但是現在，工人階級在一种共同的感觉的召喚下團結起來了……。”

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團結在一八七六年七月正式建立起來，那时美國十九个國際小組的代表們在費列得尔菲亞举行了一次會議，解散了國際工人协会*。数日后，各社会主义团体又在費列得

-
- * 在解散該会前，代表們通过了下面的一个宣言：

“工人同胞們：

“在費列得尔菲亞举行的國際代表会已决定取消了國際工人协会常务委員會，該組織同外部的連系从此不复存在了。

“‘國際已經滅亡了！’各國的資產階級一定会这样喊叫聲，并且还会以嘲笑和欢欣的态度指着这次會議的議事錄，認為它是世界劳工运动失敗的明証。讓我們不要為我們的敌人的喊叫声迷惑住了！我們放棄國際的組織形式实是目前歐洲的政治情勢所使然的，而在我們看到該組織的各种原則已為整个文明世界中進步的工人們所承認所維護的時候，我們覺得已得到了一种補償。只要給我們歐洲的工人弟兄們一点時間去注意理清他們國內的問題，

尔菲亞开会，成立了一个統一的政党。这一名为美國工人党的新政党的政綱采用了國際的工会政策，但同时又同意了拉薩尔派的要求，只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建立國際性的組織。該政綱声称：“我們將在全國和國際的基礎上，進行組織工会的工作以改善劳动人民的境遇。”因为沒有經濟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將只是一句空話，該党乃尽自己的力量首先解决經濟方面的問題。参加政治活动的事將延至党“已强大到能够發揮明确的影响时”再說，即到那时，也仍只限于在提出与党的政綱和总原則不相違背的純地方性要求的城鎮中進行^④。

統一代表会的政綱的提出，实是左尔格所領導的國際會員們的一次勝利，但此外也实有某些缺点存在因而削弱了党的力量。設立在芝加哥的全國执行委員會实完全为拉薩尔派所控制。同时，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的領袖彼得·麥克基尔終於使代表会接受了他的建議，授权执行委員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准許進行地方性的选举运动。該委員會竟因此經常拒絕遵从党綱中关于組織工人成立工会的規定，而完全徒劳地把工人們領向各地的投票箱。

在工人党几乎还沒有开始自己的活动以前，拉薩尔派和馬克

他們就一定会有力量清除存在于他們自己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工人之間的障礙的。

“同志們，你們已經以忠誠热爱的心情接受了國際的原則；你們一定有办法，在这一組織已不存在的情况下，繼續擴大热爱該原則的人的圈子。你們將會找到一些新的战士，他們將出來为实现我們协会的目标而進行战斗。你們在美國的同志們向你們保證，他們將忠心地保衛和重視國際在本國中所已作出的成就，一直到更有利的条件將再一次把世界各國的工人在一个共同的斗争中團結在一起，那时我們將以更大的声音喊叫着：

“‘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見國際工人协会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費列得尔菲亞代表會議記錄”，單行本，一八七六年紐約版，第八頁起。）

思主义者之間久已存在着的冲突現在是又一次爆發了*。代表拉薩尔派講話的麥克基尔認為，政治行动是組織美國工人求得自己解放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他爭辯說，“在这个困苦时期，我們就不可能有效地宣傳工会主义。”“工人們——我党的會員們——甚至每月拿出一角錢來維持党的經費都感到很困难，他們更哪里能够拿出比我党党費高出三倍的錢去維持工会呢？在这种困苦时期，我們必須牺牲一种形式的劳工組織以維持另一种劳工組織的存在。”而且，他結論說，如果工会真能够帮助工人解决他們的問題，那还成立一个工人党幹什么呢④？

馬克思主义者和麥克基尔开始了論辯。他們承認現在的工会組織还不够普遍，还不能包容所有的工人，但他們坚决認為使这种組織更为擴大乃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責任。对于如果工会已很成功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工人党的問題，他們回答說：

“我們的党有無限的作用。它可以担任工会在目前还不能完成的工作。它可以啓發并發展对各种經濟問題的了解。它可以向过去的一切錯誤作斗争。它可以幫助各个工会向前發展，力求并鼓动大家共同求得劳工地位的全面提高——这种提高是只有参加在劳工組織中才有可能的——以表明自己是一个代表才能和智慧对党。它可以推动群众進入他們的工会組織，最后它还可以加速实现統一的行动。如果我們要使

* 馬克思主义者确曾端尽一切努力以求維持美國工人党內部的團結，他們告訴拉薩尔派的人們說，宗派斗争是只会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阿道夫·杜埃更呼吁說，“讓我們的共同的死敌看到两个社会主义的工人集团不去攻打它們共同的敌人而竟自相斗争，那真是多么可笑的一个場面啊！”（見一八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劳动旗帜”。）

一个美好的將來迅速誕生，我們就必須先求得一个健康的現在。讓我們不要因為我們的黨并不是整個的勞工運動，于是產生一種愚蠢的自私的感情。黨只是一支先鋒隊。”^④

美國工人黨的英語報紙“勞動旗幟”，是完全了解自己在美國生活中所應起的作用的，一期接着一期它號召工會主義者不要脫離自己的工會，非工會主義者趕快加入勞工組織，並呼喚工人黨的黨員們組織自己的工人弟兄。甚至在該報編輯麥克唐奈爾曾受到為拉薩爾派所控制的全國執行委員會的譴責，說他過分著重了工會運動並讓工會活動佔據了太多的篇幅後，他仍還是繼續號召復興工會的運動。恩格斯和英國一國際會員喬治·依卡利阿斯所寫的文章，則使“勞動旗幟”的讀者們清楚地了解到歐洲工會活動和勞工鬥爭的情況。而且，從沒有任何報紙會像美國工人黨的這一刊物那樣生動的反映了在美國發生的各次偉大的罷工鬥爭^⑤。

第二十三章

对抗严重的不景气现象

美國的工人們並沒有以消極的態度去对待失業和減低工資的問題，而是組織英勇的斗争以保障自己的利益。紡織業、煤礦業和運輸業中的工人們都進行了偉大的罢工运动，以反击厂主們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對他們所發動的進攻。

紡織業的罢工运动

在一八七四年時已成為新英格蘭紡織工業中心的福尔河，是紡織業中的罢工运动進行得最激烈的地方。一八七四年秋，工人們的工資被減少了百分之十，跟着在几个月后又減了一次。在第一次減工資之后，紡織工人便恢復了他們的工会組織，聘用了一位秘書，并且召集了几次包括一切紡紗工人、織布工人和梳棉工人的群众大会。梳棉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她們另組織了自己的工会，同时織布工人們也組織了一个織工自衛会。

在麻薩諸塞州新斐德福和罗凌士的紡紗工人地方工会应允給予援助的鼓舞下，福尔河的工人們決定，如厂方不撤回減低工資的命令即將举行罢工。紡紗工人、織布工人和梳棉工人的工会共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去拜訪各制造业老板，要求撤消減低工資的決定。厂主們拒絕了这个要求，并以調解協議乃是非美國主义的为理由，拒絕討論調解的問題^①。

梳棉間的女工們聽到这个消息后，單獨舉行了一次會議，并決定不管男工罷工与否，她們却一定要進行罷工了。不久，男工也參加了罷工，因此，到一八七五年二月時，便已有三千多工人停止了工作。其他一切沒有受到罷工影響的工人們，則全體捐款支援罷工工人。經過一個月的鬥爭之后，廠主們終於四月一日同意取消減低工資的決定，罷工乃告結束^②。

然而到了夏季的時候，製造業老板們却又一次企圖實現他們的減低工資百分之十的計劃。工人又再度罷工；及至八月時，幾乎該城所有的紡織廠都關閉了，這一運動差不多已變成了該工業中的一次全面總罷工。這一被稱為“大休假”的罷工，繼續了共八個星期，而結果是工人們失敗了。當罷工進行到第三個星期的時候，感到絕望的工人們便已準備復工了。但那時他們却發現老板們竟要將工資減去不止百分之十的數目，於是他們只得再繼續堅持下去。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罷工工人集中到市政廳，要求發麵包救濟他們處於飢餓中的孩子們。但他們却被三連民兵和一隊警察所阻，不容他們提出他們的要求。此后很多年，福爾河的工人們還每于九月二十七日舉行群眾大會以紀念這次紡織工人的罷工運動。

遲至十月，工人們終於回到工廠去，接受了減低工資的條件，并且簽訂了當時一般所謂的“黃狗合同”，或“勒索誓約”。所有在工人大會上作過講演，或在其他方面協助推動了罷工運動的工人，均被列入黑名單。

這一失敗帶來了織布工人和梳棉工人工会的徹底消滅*。但

* 織布工人在解散他們的組織之前，把他們所剩為數不多的一點經費完全贈給了他們的領導人，使他們可以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紡紗工人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組織。他們虽然簽訂了“黃狗合同”，但他們却私自彼此表示，他們决不承認这种由于他們孩子們的飢餓強使他們同意的協定^③。

一八七五年的長期罷工

紡織工人失敗之前不久，礦工們在他們的“一八七五年的長期罷工”中，也曾遇到一次同樣嚴重的失敗。一八六八年，由約翰·西尼担任主席的工人福利協會宣告成立。而到一八六九年的時候，該會就已有了三萬會員，占無烟煤礦工人總數百分之八十五。就在那年，在工人們中進行了一次反對減低工資的大罷工之後，無烟煤礦區的礦主們已在一項協議上簽字，承認該工會為代表礦工和資方進行交涉的機構，並規定了一種以各時期不同的煤價為基礎的工資調整表*。同時還協議出了一種不管煤價如何跌落亦必須保持的最低工資數。從那時起一直到一八七五年，礦主們每年都在設法要強迫降低工資。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由無烟煤礦業公會和工會福利協會雙方簽訂了一個協議，但這在美國第一次出現的礦工和礦主之間的書面協定，却產生了極端不利于礦

-
- 利亥區的礦工們的工資是按照新澤西州依利薩伯的煤價和紐約市場上的煤價計算的。這一市場上的煤價如果是每噸五元，他們就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而煤價每超出此數一元，則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在斯庫基爾區，因為那裡的煤一般只運到費列得爾菲亞而不運到紐約去，工資則按照波特卡邦的煤價計算。波特卡邦的煤價為三元一噸時，斯庫基爾的礦工們則拿最低的工資，煤價每超出二角五分，則工資增加百分之五。（見安得魯·勞埃：“美國煤礦工人史”，一九〇七年俄亥俄州哥倫布斯版，第七六一—七八頁，及馬文·史列格爾：“工人福利會：無烟煤礦工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一九四三年十月“賓州歷史”第十卷，第二四六—二四七頁。）

工的結果。工會接受了廠主的提議，以二元一噸的煤價為最低工資標準，此外煤價每漲落二角五分，工資隨之增減百分之八點二五。該合同更規定對於參加簽訂合同的高工資的礦工的工資，另有一種折扣，其辦法是每月淨得工資一百元者，減去百分之十，二百元以上者減去百分之四十。但工會方面在這一協議中也得到一種勝利，那就是廠主們已同意決不“開除任何執行工人福利協會所交給他的任務或工作的工人和工會職員”④。

毫無疑問，在新協定成立之後，工會方面是急切地在盼望工資將因煤價的上漲而大為增加。但是非常不幸，煤價却是在迅速地下落着，在這一新合同簽訂后的第一個月里，礦工就已看到自己的工資減去了百分之八點二五。到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他們的工資更已減去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五。以後在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二年和一八七三年相繼成立的協定中，工資隨煤價的漲落而增減的原則依然保持着，但是工會方面終於爭取到提高了最低工資的數目。因此，儘管在這幾年中，煤價一再下落，礦工們至少還能夠保持住一定數目的最低工資。所以廠主們乃決定要破壞工會和這一條最低工資的原則了。

著名的反勞工分子富蘭克林·葛文，是礦主們的領袖。他是費(列得爾菲亞)勒(定)鐵路公司的總經理。該公司通過它的附屬機構——費勒煤鐵公司——已取得了對於無煙煤礦區中最大的一些煤窯的控制權。因為斯庫基爾和馬洪寧煤田的產品，都需依賴費勒鐵路公司運往市場，葛文更可以命令其他的煤礦老板完全接受他的對待勞工的政策⑤。這一煤閥不惜採取任何罪惡手段以消滅英勇的工人福利協會，或者照它現已改定的名稱，礦工及其他勞工福利會。他從外地運來合同勞工并雇用了一批公司私有的警察

和劳工奸細。而同时,他却又裝出劳工的朋友的面貌,責罵工会是一种專橫的組織,“在这个組織的前面,可憐的劳工們簡直像一只受着鞭打的小狗,不敢承認自己也还有一个灵魂”。他說,工会的領袖們是外國來的煽動分子,是“公社主义的拥护者和國際派來的間諜”⑥。

葛文花費了三年的時間准备一次大進攻。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煤礦老板都参加了他的这个反工会的大运动,因为他們了解工会的政策对于工業頗有穩定的作用。但不久葛文便將这一小部分人从該工業中清洗出去了,于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礦主們就开始發动進攻了。他們宣布一切簽訂过合同的礦工的工資必須減去百分之二十,其他劳工減去百分之十,同时取消最低工資的規定,并坚持,如果煤价跌落至二元五角以下时,每跌落二角五分錢,則須將工資再減低百分之八。很明顯,这一通告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激起工会的罢工,而礦主們乃希望在罢工期間來消滅礦工們的組織。一位礦工及其他劳工福利会的領導人曾对“費城时报”的一記者說,这一斗争的主要目的倒不在于压低工資,而更是“直接对着我們的組織來的”。馬洪尼城的一位通訊記者向“礦工雜誌”寫信說:“誰都明白,目前煤的市价是絕對可以維持去年的工資标准的,但現在問題似乎并不是在工資的多少上,而是要根本解散礦劳福利会的問題。”⑦

隨即开始的一次罢工是由曾經在联軍中作战三年的一个英籍礦工約翰·華尔許領導的。那个殘毒的葛文,他是同时还兼任着强有力的無烟煤礦業公会的会長的,后來在他向股東們所作的报告中承認为了破坏这次罢工他一共花費了四百萬元,而他为他的这种行为辯护說,这笔錢实在花得很值得,因为他把他們的公司

“从一个不負責任的工会組織的無理控制中拯救出來了”^②。葛文還曾得到賓州州長的幫助，他曾經迅速地派出軍隊來協助進行破壞罷工的活動。

礦工們沒有錢，但他們却有全國各地工人們的同情。工業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對於目前在罷工中的礦工們寄與真切的同情，並懇求全國各工人團體，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慷慨捐款給他們，予以財政上的援助”。不久，工業大會的主席更向美國的工人們發出呼喚說，礦工們目前“所進行的戰鬥是與在我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一个反工会的聯合力量的鬥爭”，並且說，“這些礦工們是正在為着我國的全体勞工進行戰鬥”。國際工人協會的各小組也發出了類似的宣言^{③*}。

捐募到的錢為數極少，因此礦工們只能完全依靠他們自己的微薄的資金和雄偉的精神了。下面的一支在戰鬥期中寫作出來的歌正是這種精神的反映：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我們的老板們共同商定一毒計：
叫一切男人、女人和兒童，不吃飯也不穿衣。
他們想用飢餓寒冷作武器來迫使我们屈服，

-
- * 馬克思主義者熱烈地支援了礦工們的罷工運動，但他們同時提醒罷工工人們說，如果他們僅止於“為了工資，和限制工時”而進行鬥爭，他們是不可能獲得生活條件的基本改善的。他們呼喚說：“讓全國的土地屬於我們所有！讓工廠和它的全部機器都屬於我們所有！而當我們得到了這些東西的時候，讓它們所產生出來的一切也都屬於我們所有！那時就無需為了要增加我們的勞動收入——這種收入在目前是要靠我們的勞工主子一百個不願意地償給我們的一一而舉行罷工了，那時誰都可以得到他或她的勞動所應得的全部收入，都可以得到他在自然產物中應得的一份。因此，我們在我們的旗幟上寫道：‘打倒為工資而工作的制度！起來，為占有這一切物質而戰！’”（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但礦工們是不怕这一切的：他們勇往直前地反抗下去！

兩個月的時間已經快过去了——这是誰都看見的事實。

如必須再來一個月，我們也願意不妨試一試。

不管窮魔如何猖狂，我們也決不承認將工資減少；

兄弟們，复工前我們必須爭取到七十五元的最低工資。”^⑩

罢工進行还不到几个星期，無烟煤礦区北边的一部分礦工們就接受了减低工資的条件，开始复工了*，但南区和中区的礦工們却仍然坚持着。有一个礦工在罢工期間所寫的一封信中說道：“自前次分手后，我已把我們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埋葬了，在他死去的前一天，在这住着六个孩子的家里，已經找不到半点粮食了。”^⑪

后来曾任俄亥俄州礦区檢察官的安得魯·劳埃曾寫道：“为了取得罢工的勝利，礦工們曾作了前所未有的英勇的牺牲。在这一斗争行將結束的几个星期中，到处可以看到惨痛、貧苦的景象，以及無比的隱忍一切痛苦的精神。無数的家庭清早一起来所吃的早飯是一点面包皮和一杯白水，更不知下一餐向那里去找。每天都有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們到附近的樹林子里去挖草根，挑野菜，借以苟延殘喘……。”^⑫

既有一部分礦工供应煤的生產，礦主們自然更可以繼續坚持，直到飢餓迫使其他的礦工們屈服。工会曾一度同意接受减低工資

* 两个礦工工会同时存在实是这次罢工失敗的一种因素。礦工福利协会和該工業的全國組織是維持着很友善的关系的，它同全國礦工协会甚至还交換过會員証。但福利会的會員們，特别是那些屬於斯庫基尔和利亥礦区的，却拒絕放弃旧有的工会去加入一个新的全國性組織。这种情况的結果使得分屬两个不同組織的地方工会在同一区域中并立着，虽然它們在一起進行活动，而無烟煤礦工人間的團結实受到了相当的損害。

的決定，但要求老板們承認工會有參加決定工資率的權力。礦主們拒絕了這一要求，罷工乃更繼續下去，直到六月飢餓征服了一切的時候。約翰·華爾許說：“我們是被擊敗了，我們所曾向煤業貿易所和各界人士宣告過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也都絕不能接受的條件，現在，在我們的妻子和兒女的無情的需要下却已被迫接受了。”^⑬結果，工資減去了百分之二十；重新簽訂的協議取消了按煤價計工資的決定；工會被解散了；華爾許和其他的一些工會領導人則被迫離開了礦區。在“長期罷工”已結束了七個月之後，礦工及其他勞工福利會的主席慘痛地說：“我們的組織從來也沒有受到過像現在這樣的摧殘；在大部分的地區，它已是微弱不堪，支離破碎，而在其他的某些地方更是根本不存在了。”礦工們悲慘地唱着：

“從前我們只知道不停地在挨着沉重的鞭打，
今天，先生，我們才開始知道這鞭子來自何處；
執鞭的是一個龐大的公司，它的職務是：
統治着這個國家，摧毀着這個民族。”^⑭

這一“長期罷工”也結束了全國礦工協會的一度大有希望的前途。約翰·西尼和該協會其他的領袖們曾經反對過這次罷工運動，當罷工已開始進行後，西尼還曾向協會的執行委員會說，罷工將變成“我們的各種苦難的根源”，以及“使我們的階級地位降低的主要原因”。調解和協商才是解決勞資糾紛的最好的辦法^⑮。西尼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現在要對付的是一群要誓死反對工會的老板們，不管工會如何願意委曲妥協，工人們仍會要面臨到為政府所支持的工業界的聯合力量的進攻的^⑯。

西尼自己在罷工運動中的親身經歷，也應該使他認識到這個基本的錯誤的。賓夕法尼亞州克利爾費爾德郡的罷工進行了三個

星期之后，礦主們就从外地运來了破坏罢工的工人。那时还曾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以抗議这种行为，而西尼也出席了这次會議的，虽然他并没有参加討論。一八七五年五月十二日，他以圖謀不軌罪名被逮捕。其他二十六个工会領袖，包括全國礦工协会的巡迴組織者芝諾·派克斯在內，也均于次日被捕。

对于他們的審判又一次証明，不成文法仍然被美國法庭用來对付人民群眾。審判官約翰·霍尔登·欧茲在他向陪審团所提出的控訴中說：“任何意在提高或压低可售品——不管是劳动力、商品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价格的协商、联合或同盟，按照宾夕法尼亞州的法律均可以圖謀不軌論罪。”宾州的法律是“我們的祖先从母國帶來的不成文法的一部分，本州人民，从威廉·烹*的那個時候起，就是一一直在這種法律下生活着的。”

当佐埃斯—馬罗尼案件中的被告被判以暴动和圖謀不軌罪行时，審判官欧茲在他的判決書中說：“我已証明佐埃斯，你是工会的主席，馬罗尼，你是工会的秘書，因此我判处你們一年的刑。”**⑭

在一种不顧一切以維持全國礦工协会的努力中，西尼乃轉而求助于生產合作社这个万应灵丹。但是會員們沒有資本，同时他們也不同意他們的領導方面所持的这种合作社將能調和劳資关系的論点。全國礦工协会終于一八七六年解体，始終也沒有开出一个屬于自己的礦坑來，該組織的會員們也就开始向劳工协会方面尋找領導力量去了⑮。

葛文和他的帮凶們覺得僅是消滅工人福利协会是还不能使他

* 最初开发宾夕法尼亞州的一个英國人。——譯者

** 由于劳工的憤怒和政治上的压力，在此后的一屆宾州立法會議上，便通过了一条法令，規定不得再以圖謀不軌罪名控告劳工的联合行为。

們滿足的。他們決心要粉碎礦工們的一切有組織的活動，因為這些工人們不是還在唱着這樣的歌嗎？

每一個回廠工作的工人必須下定決心，
為了未來的某一天的更大的鬥爭。

莫利馬乖雅

當工資一次接着一次地被減低的時候，礦工們在愛爾蘭籍工人的一个兄弟会一类的愛國組織——愛爾蘭古風社的領導下又開始反擊了。過去當礦工們自己的工會組織正強大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參加了這一團體，而現在它是更變成為他們的一个秘密的組織中心了。在大部分有關美國勞工歷史的材料中，礦工們在一八七五年的罷工後所進行的秘密活動，差不多总是被看成和賓夕法尼亞州東部所發生的各種暴行有關的，這種暴行，自一八六二年開始，共延續了二十年之久。據說，這些罪惡的行為全出自一个名為“莫利馬乖雅”的秘密組織。

最近的研究却得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現在已確切地證明，美國就從來沒有過一个自己稱為“莫利馬乖雅”的會社，這個名字乃是由各商業報紙，為了幫助煤礦老板們摧毀煤礦工業中的一切工人組織，妄加在愛爾蘭古風社頭上的一個稱號；證明費（列得爾菲亞）勒（定）鐵路公司所以雇用平克爾頓偵探，並不是為了清除社會中的恐怖分子，而是要製造恐怖；更證明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煤礦老板們曾津貼賓夕法尼亞州某些武裝的秘密會社，以暗殺和威嚇礦工。這些暴徒們所殺害的礦工，和礦工們所殺害的礦場監工和煤礦老板的數目是差不多的。

為了全面了解在長期不景氣時期中勞工所受到的攻擊，我們

还必須談一談关于那些被控告以曾在煤礦区進行暗殺和制造恐怖的罪名的所謂“莫利”分子被審判的情形，否則我們的叙述是还不能算完全的。在很多次这类案件中，都是葛文在担任州檢察官。他曾說：如果我們將莫利馬乖雅分子全部消滅了，“我們就可以站在全國人民的面前說，‘現在全國各地都非常安全了；來吧，帶着你的錢和你的家屬到这里來吧，拿这里作为你安樂的家園；帮助繁荣这个民族，你是决不会受到任何危害的’”⁽¹⁹⁾。

証明被告的罪行的証据則全由平克尔頓偵探，詹姆斯·麥克巴尔蘭提出，他作証說他已偵察出來了莫利馬乖雅分子的暗殺陰謀。同时更有一批無耻之徒出來支持麥克巴尔蘭所提供的証据，以求掩盖他們自己的犯罪行为。某些出面为被告作証的人都会被控以偽証罪，立刻被判以在郡監獄中服役兩年半的处分。因此甚至被告的最親近的朋友們，也都不敢出來為他們辯護。

各報紙一般都承認，支持麥克巴尔蘭的一些証人常常是如此地自相矛盾，滿口胡言，那是任何一次正直的審判都不可能依靠他們所提出的証明來判定一个人的罪名的。有一个約翰·克里根曾出庭作証說，受審者中的某几个人，在謀殺一个名叫約斯特的人时，他也是親身參加过的，而他自己的妻子却出來控訴說，殺那个人的就是他自己，而他現在却要控告“無辜的人來替他担当犯罪的处罰”。另有一个原告方面的証人說，他曾看到一眼殺害礦場監工湯姆斯·桑格的那些人的面孔，而他可以肯定湯姆斯·曼萊就是正凶，因为曼萊坐在法庭上的那种“奇特的、不安的神情”，正和謀殺案發生的那天早晨，他在五百呎外所看到的坐在圍牆上的那五个人是一个样子。葛文在最后作結論时也承認，他並沒有問过証明人是否認得清曼萊的面孔⁽²⁰⁾。

当另一个証人作証說，她曾經看到过凶手的側面，而“那个側面的确像”被審判的那个人的时候，葛文就向陪審官說，“有很多机械設計可以在一剎那間把一件东西的形象保存下來。照像技術也就是从这里找到的一种方法，你可以在一剎那間或更短的時間內，在脉搏一次跳动或一眨眼的時間內，把一个用最大速度从你面前走过的人的像照下來。这个女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能同样办到呢？”^{②①}

还有一个証人，只記得凶手有一小鬍子，但是記不清他的頭髮和眼睛的顏色。他所作証明自然是和他的同伴們所提的証明一样可靠的：

“問：你从前見過那个人嗎？”

答：在那天早晨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問：你过去究竟認識他嗎？”

答：不，我根本不認識他。

問：在那天早晨以后你又見到过他嗎？”

答：見過，先生。

問：曼萊，站起來。就是这个人嗎？”

答：这个人我却認不清楚。”^{②②}

但是曼萊却被判为有罪。

实际上一切証据都是以麥克巴尔蘭的报告为根据的，正如被告方面所指出的，各种罪惡，实是“自死神的使者詹姆斯·麥克巴尔蘭來到我國后”才开始的。麥克巴尔蘭后來的情況并不是那么十分如意。一九〇六年，当他担任丹佛区平克尔頓偵探組織的首領的时候，他被伊达荷州雇去偵查刺殺前州長法朗克·史道倫堡的案件。根据他所提出的証明，西部礦工联合会的領導人，威廉·海

渥、查理·莫叶尔、乔治·派梯波恩等人乃在柯罗拉多州的丹佛城被捕，被拐騙或被押送到伊达荷州的波伊斯城來了，在这里他們已被控以謀殺罪。在審判大皮尔·海渥*的时候，哈利·奥卡德出來作証說是他自己在工会領導者的指使下暗害前任州長的，而現在由于麥克巴尔蘭的影响，他願意自動來为本州作証。但是在克拉倫斯·达罗的巧妙的盤詰下，奥卡德終于吐露出來，他的話完全是由麥克巴尔蘭細心地教給他的。达罗証明，麥克巴尔蘭对于奥卡德的使用是正如在莫利馬乖雅案件中，使用克里根，以便將鐵路劳工領導人置于死地的情形完全一样的^②。

声援莫叶尔、海渥和派梯波恩的群众运动，在使他們獲得自由方面是有大作用的，也正是因为因为在莫利馬乖雅案件的審判中，沒有这样的群众运动，才使得非法審判成为可能了。虽然“劳动旗帜”和“爱尔兰世界”曾揭穿煤礦老板們的陰謀，但是这些報紙的影响有限，並沒有能够組織成一个巨大的运动以挽救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們**。

“全國礦工記錄报”拒絕援助被審判的人們，而“全國劳工論壇报”則辯論說，劳工运动方面的力量也出來反对被控告的人，就可

* “皮尔”是“威廉”的暱称。——譯者

** 那时許多工業中心城市也都举行过抗議大会。在費城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曾公开表示“反对那种將所謂的‘莫利馬乖雅分子’判处死刑的草率的殘暴的方式”。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由工人党召集的一次紐約工人群众大会，也通过了一連串的決議，說明对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們所加的罪名，“主要根据的只是由那个一貫積極为礦主服务的，名叫麥克巴尔蘭的無耻之徒所提出的証明”，同时并痛斥各煤礦公司“为了使人忽視他們自己殘忍地、強暴地搶劫工人的罪行，因而力圖給宾夕法尼亞的工人加上一个丑惡的外貌”。（見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日及二月二十四日“劳动旗帜”。）

以使各商業報紙肯定地相信，有組織的勞工是決不贊成暴行的^{②4}。

一八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一批被判決的人一對一對地被拉出監牢來行刑了。羅里第、卡羅爾、達菲和曼萊均先後被處死。在卡羅爾死前，曾有人請他講幾句話，但他說：“諸位，我沒有什麼話可說，我要說的只是，加在我頭上的罪名是和我完全無關的。”一年之內，其他的人也相繼全被處決，一八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夏卜和麥克唐奈爾兩人被送上絞台之後，這一合法的謀殺案才算完全結束。在他們兩人被處決的時候，一個信差帶着哈特蘭夫特州長的電報赦免令趕到。但是信差被阻止在刑場外面不能進去，等赦免令交到執刑官的手中時，他們是早已死去了。有一些新聞記者報告說，這一赦免令似乎是仔細地安排好讓它略遲一點到達的，這樣州長就可以使他自己執行各煤礦公司指派給他的任務時得到勞工們的擁護^{②5}。

一八七七年六月，“愛爾蘭世界”說：那些為勞工中的奸細和一些偽証者“一起誓而送掉”性命的人，“主要是一些明智的領導着礦工們使其有力量反抗殘忍的減低工資的活動的領導人物”^{②6}。一星期後，礦工的機關報“礦工雜誌”也支持這個說法，否認所謂圖謀不軌問題。對於前一兩天被處死刑的人，該報說：“他們究竟幹了什麼事呢？只不過是每當勞動力的價格不合於他們的要求時，他們組織起來，宣告罷工就是了。”*^{②7}

-
- 關於莫利馬乖雅問題的最近的研究，是華特·考利曼所著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賓州煤礦區工業糾紛莫利馬乖雅之叛亂”。這本書從某些方面來看，可以說是很奇怪的一部作品。作者聲稱他曾仔細地研究過有關此類案件的各种記錄和當地報紙中的材料，但他却不能根據他所得到的證據提出肯定的結論。一方面他承認研究該問題的人始終不可能看到“平克爾頓檔案”這一事實，就使人很難不懷疑賓州鐵路公司和平克爾頓分子曾互相勾結，偽造證據，以便

一八七七年的大罢工

全國的厂主們都附和着宾州的煤礦和鐵路公司的老板們的同声欢笑。在紡織工人和礦工們正遭受到嚴重的挫折的那几年中，南部各地的進步政府也逐步被推翻而为農場主和工業家所控制的政府所代替了。因此“商業与金融日报”实頗有理由向急于要在南部投資的北部資本家們报告說，目前的条件是最为理想的，因为“今年(一八七七年)更是战后第一次劳工已完全屈服的一年”^②。

各方面所作关于工業和商業問題的報告都一致重复着“劳工已完全屈服了”的这种論調，厂主們則更抱着無窮的希望，認為工人从此將再也不敢抵抗減低工資的決定，或提出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了。但是到了一八七七年夏天，在宾夕法尼亞州第一批被判死刑的人处決了不过一个月的時間以后，在我國却發生了一連串空前廣泛和激烈的罢工运动。

对那些英勇的工会領袖加以罪名，他也同意，麥克巴尔在此后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在有关海涅、莫叶尔及派梯波恩的那一套騙局中的行为，已足說明平克尔頓偵探們是極願参加这一种陰謀活动的。他也承認，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是与無烟煤礦区的劳工运动有密切联系的，而且作为劳工运动的領導者，他們極端仇視雇用劳工的老板們的利益”，而“为了这个原因”，宾夕法尼亞州东部的各重要礦業和鐵路公司才拿出錢來置他們于死地”。(第一七一——一七二頁)同时他更同意對他們進行審判的那种方式也完全是在拿法律开玩笑。尽管这样，他却終於作出結論說，“被視作劳工叛亂的一个方面的許多暴行，究竟应由何人負責是决非人世的評論家所能判定的”。(第一七五頁)

而在本書作者看來，非常明顯，安东尼·宾伯所著，于一九三二年出版的“莫利馬乖雅”一書——這本書考利曼也承認“是根据可靠材料寫成的”——所作結論实是更为接近事实的，那就是說，根据已有証据，已可以使一个“人世的評論家”清楚地看出，整个那一套把戲只不过是反动的資本家們用以反对英勇的劳工运动的一个陰謀。

鐵路工人也和全國其他的工人一樣，對於不景氣現象所產生的壓力感到無法忍受。他們的工資被逐次減少，直到每周平均工資已降至五元至十元左右。臨時工人的工資則減得更多。許多有家室之累的人每星期只有三天或四天的工好做，是以一星期中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必須自己化錢開銷。在付給公司寄宿舍每天一元的費用之後，他們時常只能剩下三角五分或四角錢帶回家去。而更為可怕的是，工人們往往需要等待兩個月、三個月甚至四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原規定按月付發的工資*⁽²⁾。

甚至如鐵路列車管理員兄弟會和火車司爐司機兄弟會一類極為溫和的共濟性的鐵路工人組織，也不能為公司所容。參加工會的人被列入了黑名單，訴苦委員會不允許有提出意見的機會，而平克爾頓的偵探則是到處活動，以致工人們竟不敢彼此交談一語。

最後運動爆發的導火綫，是決定於六月一日起在賓州鐵路公司實行并于一個月後在其他各綫實行再減工資百分之十的一個通知。鐵路官員們所以敢於大膽地宣布這個決定，是因為他們知道工人們已沒有一個英勇的組織來領導他們，而且更有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都正在尋找工作。但是這些鐵路官員們卻忽略了美國工人的戰鬥傳統和他們憤怒時的威力。

“巴爾的摩太陽報”的一位記者在他所作關於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罷工事件的報告中，描寫罷工工人及其家屬們的英勇

-
- 甚至保守的火車機工兄弟會的機關報也都承認，鐵路工人實在有理由對自己所處的境地表示不滿。在危機發生的前幾個月，該報即曾提出疑問道：“在一八七三年那個美好的年頭中，鐵路員工所受到的一種暴政的壓迫，不是使得殖民時期英國的稅政都會感到相形失色，使得打在奴隸背上的皮鞭都變成了一種仁政嗎？”（見一八七三年四月號“火車機工兄弟會會刊”，第一六二頁。）

精神說：

“在这次动乱中表現最为突出的一部分，是司爐工人們的妻子和母親，那些婦女們積極活動的情況。她們一个个面帶飢色但态度極為凶狠，她們宣布說，寧願餓死，也不願讓她們的家人在減低工資的條件下作工。她們說，立刻餓死掉，是比慢慢地餓死更容易忍受的。”^⑩

鐵路公司的老板們還忽略了另一個事實，那就是，大多數的美國人民是都痛恨鐵路公司的。區分不同的個人、公司或甚至某一整個行業，而規定不同的運費標準的辦法；在股票上的投機活動，行賄，貪污，以及大批強占公共土地等行為，已經使人民感到異常憤恨，因而極歡迎能有一個機會來幫助罷工的工人們。甚至那些以無可比擬的憤怒攻擊罷工工人的各商業報紙也被迫承認，那一罷工運動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和鐵路工人一樣痛恨鐵路公司的農民、礦工和小商人們也都參加了他們的戰鬥。

“紐約論壇報”曾宣稱說：“對於全國各地的輿論幾乎都完全同情這次暴動的這一事實要想強作不見，實在只是一種愚蠢的表示。”^⑪ 這次“暴動”是七月十六日清早在巴俄鐵路綫上開始的，四十個貨車上的司爐和殺車工人停止了工作。有一輛貨車就在巴爾的摩城外加木登岔道上停下來了。警察開來驅散了罷工工人。

罷工立刻在全綫展開。在西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堡地方，一千二百個殺車工人和司爐占領了該處車站，將所有的貨車都阻留下來，只允許客車和郵車通過。當馬丁斯堡的市長逮捕了罷工運動的一些領導者的時候，無數的群眾即刻活動起來，他們也就立刻被釋放了。附近各城鎮中礦工們的代表，也如潮水一般湧入該城

以制止再有任何逮捕工人的事件發生。

罷工逐漸發展到西弗吉尼亞州的其他各地區。在凱色鎮，白種和黑種鐵路工人在一起舉行會議，也決定參加罷工。他們曾經“清醒地考慮了這個問題”，但最後決定認為：“以目前公司所給我們的工資，我們不能維持生活和供給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們生活上的必需。”^⑳

巴俄鐵路局副局長金恩要求西弗吉尼亞州的州長馬太鎮壓罷工，該州長乃派出了一隊國民軍。這一支由勞工和農民組成的民兵隊，不但不肯向正使貨車脫開路軌的工人們射擊，卻把鐵路工人看成自己的弟兄，把武器也送給他們了^㉑。民兵隊既不可靠，馬太州長乃致電海依斯總統，請求他派遣聯邦軍。七月十九日，在接到電報後的第二天，海依斯便派出了一支軍隊，在弗蘭齊將軍的率領下開往西弗吉尼亞^㉒。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時期使用聯邦軍來鎮壓罷工運動的。

“紐約世界”的一記者自馬丁斯堡向本報報道說：“此間輿論正確指出，如在此次事件中權利被侵犯或損害者，非鐵路公司而為罷工工人，則馬太州長恐須經過極長時間之考慮始能決定自己是否有責任請求總統予以援助。”^㉓

弗蘭齊將軍立刻逮捕了罷工的領導人，并向華盛頓方面報告說，事件已完全平息了。但要說消滅這一罷工運動，那實在還差得很遠。它向西弗吉尼亞州的其他各地展開並逐漸發展到俄亥俄和肯塔基州。運河上的船工、礦工、以及其他的工人們也都出來，一方面要援助鐵路工人，一方面要減除自己所受的痛苦。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一群做下水道的黑色工人也停止了工作，他們扛着鐵鍬、鐵鏟和鋤頭，在街上游行，呼喊其他的工人們來參加他們的隊

伍。有一位通訊記者自路易斯維寫道：“在黑夜來臨以前，就有几百工人参加了，其中还有一些白人。”^{③⑥}

而正在这时，巴尔的摩却正在集合軍隊，以便开赴馬里蘭州的康伯蘭去对付那些阻止自馬丁斯堡开出的火車的鐵路工人和礦工。当軍隊向車站進發的时候，却有数千名巴尔的摩的工人也跟随着抗議这种派遣民兵到康伯蘭去的行动。后来，这些工人竟想阻止这支軍隊开出去，于是民兵乃向群众开枪，当即击斃十二人，伤十八人。“紐約时报”的一記者寫道：“士兵們当时坚定的决心，从死者的伤口均在头部或胸部这一事实上已完全表露出來。”^{③⑦}

馬里蘭州州長要海依斯总统派遣联邦軍的請求也立即得到了允諾，因此，在軍隊的帮助下，公司使火車开始行駛了。任何向破坏罢工的工人進行說服的工人，会立即被逮捕；任何一群想阻止火車开行的罢工工人，会立刻遭到射击。这一策略，“紐約时报”报道說，“已使暴民丧胆，因而也終于只得屈服了”^{③⑧}。大規模的屠殺和逮捕，正規軍、民兵和警察的出动，以及由各商業報紙所造出的恐怖空气，終于在七月二十二日破坏了巴俄鐵路綫上的罢工运动。

在馬里蘭州和西弗吉尼亞州兩地开始的巴俄鐵路罢工运动，曾擴張到宾夕法尼亞、紐約、新澤西、俄亥俄、伊利諾、密苏里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各鐵路綫去。这次罢工以匹茲堡最为激烈，因为在这里它受到了該城各个階級的支持。匹茲堡和紐約間僅有的这一条鐵路，其所定運費是如此高昂，以致小商人們以及該城中其他的居民都对鐵路公司异常痛恨。

减低工資还只是宾州鐵路工人感到不能容忍的一个方面；鐵路公司在宣布了新的工資标准几天后，更命令將每組車务員一次应拉車廂数，由十八个增至三十六个。因此，这一举兩得的命令不

僅是要將工作加倍而將工資降低，同時還要使半數的工人被解雇。

在工人們看到這個新的減低工資的通知後，由火車司機組成的一個委員會，立即往見賓州鐵路局局長湯姆·司哥德，表示同意接受減低工資的決定，但在生意情況好轉時必須仍恢復原工資標準。可是工人們卻不肯同意這種協議，於是他們在一個青年殺車工人亞芒的領導下，開始秘密地組織起來。他們組織了一個一般被稱為鐵路職工會的秘密的產業工會，其中包括有火車司機、列車管理員、殺車工人及司爐等。該會決定於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罷工，而當這一天即將來臨的時候，火車司機卻突然退出，整個運動因亦似將無法展開了。但這時，巴俄鐵路罷工的消息傳來了，同時賓州局也宣布了那個一舉兩得的命令，因此鐵路職工會乃終於開始實行了它的罷工計劃³⁹。

匹茲堡的罷工工人也採用了與巴俄綫罷工工人相同的策略。大隊的工人，其中包括一些魏爾京斯堡的罷工礦工和匹茲堡的失業工人，聚集在鐵路邊，阻止貨車行駛，而只容許客車和郵車通過。七月二十一日警察官費弗，在匹茲堡民兵的保護下，向集合在賓州鐵路邊的罷工工人宣讀暴動懲治條例。但當工人們拒絕散去，而民兵們又不肯驅散他們的時候，警察官也弄得無可如何⁴⁰。

鐵路職工會召集了一次群眾大會，決議如不撤消減低工資的決定，收回那一舉兩得的命令，並重新雇用所有的罷工工人，他們就不复工。匹茲堡的商人和附近礦區的工人們都派來代表，向罷工工人們保證給他們以支持。匹茲堡的情勢實在頗為緊張，但是甚至“紐約時報”的記者也承認罷工工人“甚為守禮”，他們僅阻止火車行駛而已。而鐵路公司方面不但不肯和鐵路職工會進行協商，却一味要求派更多的軍隊。於是州長就命令將費城的民兵隊也調

到匹茲堡來。湯姆·司哥德上校盛讚州長的美德，并公开誇耀說，他可以“用費城的軍隊來解決這一問題”^①。

司哥德滿心相信，他的這些剛從銀行中心和商業勢力的影响下調來的民兵，是絕不會和“暴民”講交情的。而這些民兵們在開赴匹茲堡的途中，也矜誇地說他們是前往清刷那個城市的。“陸軍報”甚至也認為所有費列得爾菲亞人是“正瘋狂地盼望着一次大戰”^②。他們的机会很快就來到了。當他們開始要逮捕罷工領導人的時候，人民却起來反抗了。他們以嘻笑怒罵的詞句和叱咤聲迎接來自敵城的士兵們。更有幾個青年孩子向民兵們投擲了兩三塊石頭。於是軍隊立即向群眾開槍還擊，當即槍殺男、女及幼童共二十人。受傷者二十九人。一個龐大的陪審官調查團，稱這種舉動是“無法紀的肆意亂殺行為……除稱之為謀殺案外，本團更無法擬以其他名稱”^③。

於是全城為之震怒。軋鐵廠、礦坑及其他工廠中的無數的工人立刻蜂擁到屠殺案發生的現場。巨大的人群包圍了那里的軍隊，逼着他們退入到車房里去。一整夜間那些士兵一直處於無數憤怒的、決心要為被屠殺的工人復仇的市民的包圍中。車房忽然着火燃燒起來，軍隊乃更被迫撤退。馬上，匹茲堡的“聯邦停車場”和賓州鐵路車站也都着火了！^④火究竟為何人所放，至今尚是一個疑問，但“全國勞工論壇報”于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五日發表言論說，罷工工人和軍隊都完全墮入了陰謀家們的詭計中，他們正“企圖并似乎恰如其願地達到了用政府的錢替他們把破舊的車輛換成新車，而使這一大公司終能免于破產的目的”。

各商業報紙上的驚人的大標題更增加了全國的恐怖氣氛。七月二十二日“紐約世界”報告匹茲堡的情況說：“匹茲堡已被洗劫

了。該城已全部為一群嗥叫着的暴民所統制了！”該報的新聞欄更告訴讀者說，匹茲堡是“已落入一群中了共產主義之魔的人們的手中了”。海依斯總統下令派兵守衛華盛頓。在參議院的一次會議上更有人提出建議，宣布賓夕法尼亞州已背叛政府，並立即動員七萬五千名志願軍。

各報紙，以及一些教會人士和政府官員們都一致大聲地呼喊著這次罷工乃是又一個“巴黎公社”運動，是“一次叛亂，一次革命，一種共產主義分子和流氓們企圖控制社會的努力，一種意在破壞美國制度的活動”^{④5}。各報紙，為它們自己的大標題所激動，乃竟呼喚更大規模的血腥的屠殺。“紐約論壇報”說，罷工工人是只認識槍炮的力量的；對這種“餓着肚子的愚蠢的暴徒”講仁義是沒有意義的。“紐約先驅報”則認為“暴民”就是“野獸，必須用槍將它打翻”。“紐約太陽報”建議請飢餓的罷工工人吃衛生丸子，而“民族雜誌”則要求將聯邦軍中的第一流射手派去。

紐約州伊利鐵路綫上的罷工是七月二十日開始的，該綫的司爐和殺車手停工抗議某些工人因曾與公司方面商討取消減低工資的命令的問題而竟被解雇的事件。伊利鐵路綫上工人的工資，在減削以前，為每月二十三元。當罷工發動以後，公司方面乃指罷工的領導人登納休為“相信并同时散布共產主義思想的危險分子”^{④6}。這一罷工運動漸擴張到霍尼爾斯維、吉爾維斯、克爾寧、特洛依、布法羅以及賓夕法尼亞州的伊利等地，而最後則更使紐約中部和壽爾湖等鐵路綫也卷入運動中了。

無論何時，只要把民兵派出來，他們總是與罷工工人表示友善的。在布法羅州曾經有一連民兵整個參加了罷工工人的隊伍，而據報告，厄爾邁刺的地方軍隊也曾“公開表示同情罷工工人”^{④7}。紐

約第六十九團的一位軍官曾告“劳动旗帜”說，該團中很多“愛爾蘭籍工人都極端同情他們的被壓迫的工人弟兄”。這位軍官又說：“我們中大多數的人都有理由說他是完全了解過長的工時和過低的工資是如何可怕的，因此，任何一個目的在反對其中任何一方面的運動，都將獲得我們的同情和支持。我們是民兵，但我們却更是工人。”^{④⑧}

紐約中部鐵路局局長威廉·溫德畢爾特，命令取消了在該局各綫上減低工人工資的決定，並允許將布法羅罷工工人的工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只要他們肯即時復工。同時他更撥款十萬元分配給紐約中部鐵路局的罷工工人和失業工人。但所許增加的工資，工人却始終並沒有得到^{④⑨}。

罷工運動像水池中環形的浪花，永遠不停地向西部展開去，一直達到太平洋沿岸。為了防止這個罷工的巨浪，舊金山的中太平洋鐵路公司取消了已於六月一日開始實行的減低工資百分之十的決定。另有幾個航運公司也為了同樣的理由，向工人們作了一些讓步。但不幸的是，某些專事蠱惑群眾的政客們，卻竟把這一罷工運動轉變成了一種反對中國人的暴動活動^{⑤①}。

當罷工運動的浪潮從大西洋發展到太平洋，從加拿大的邊境發展到梅遜—狄克遜綫的時候，斥之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呼聲則愈叫愈響亮起來。鐵路工人的罷工，據說是接受“舊大陸社會主義領袖們”的指示為工人黨進行活動的一些人發動起來的。他們要利用罷工作為一次巨大的革命暴動的信號，以便推翻政府，建立一種美國公社^{⑤②}。而事實上，由於拉薩爾派的分化活動阻止該黨在工會方面進行有效的工作，這個新成立不久的工人黨，在罷工以前，是和鐵路工人簡直沒有什麼接觸的^{⑤③}。黨的領袖以及一些社會主

义的領袖們，如那些和“劳动旗帜”有联系的人們，已預料到在各鐵路綫上將有一次大动乱發生，因此当一八七七年夏的大罢工运动开始时，他們并不是处于毫無准备的状态中。罢工运动一發動起來，工人党的全國执行委員會就命令各地党組織召开群众大会，提出“要求在全联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取消圖謀不軌法令，以及要求联邦政府收買鐵路綫和电报綫的議案”。在費列得尔菲亞、紐亞克、帕特遜、布魯林克、紐約以及其他一些东部城市中，工人党曾主持了多次的群众大会，而这些會議都一致表示支持罢工工人，并斥責政府帮助鐵路公司的老板們破坏罢工运动的行为。工人党在旧金山所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有一万余人参加，这些人也都“对那些为被压迫的劳工進行战斗而結果被槍殺的人們的家屬和朋友們”表示同情^⑨。但在該会閉幕以前，却有一群無賴之徒跑來打断了會議的進行，而竟將它轉变成了一个反对中國人的示威游行运动。

在辛辛那提，工人党曾派出一个委員會，去和鐵路工人保持接触并和罢工工人密切合作，而在芝加哥和聖路易，該党則更参加了領導罢工的工作。在芝加哥也和在其他西部城市中一样，一个全面罢工已开始形成。七月二十四日，密西根中部鐵路公司貨运站的工人們放下了工具。很快，其他各站的工人們也都停止了工作，而在那一天，全城大部分的工厂和制造厂，也都关了門。第二天，警察持着槍和警棒向密西根貨运站的罢工工人進攻，逮捕了罢工运动的領導人。但恐怖政策并不能阻止向各方面展开的罢工巨浪。聖克萊尔和麥迪生兩郡有八百名煤礦工人停工要求增加工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半月發工資一次。他們表示同情芝加哥罢工中的鐵路工人，并保證給与他們任何他們所需要的援助。

在伊利諾州的开罗城，一部分黑人清道夫也举行罢工，要求將每时工資从兩角增至三角。他們的要求終於得到了滿足，但在他們复工以前，他們保證仍將与本州其他各地的罢工工人充分合作^④。

七月二十五日，“紐約时报”宣称：“該城現已为共產党人所有了。”

工人党曾經帮助發动芝加哥的工人群众。当罢工运动在密西根中部鐵路公司开始發动的前兩天，工人党曾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会后并發出号召，定于次日召开大会。約有兩万工人响应了这个号召，他們有很多人都高举着旗帜参加了示威游行，旗上的口号是：“我們要工作，不要救济。”“为什么生產过剩給我們帶來的是飢餓？”“讓我們安于工作，或死于战斗！”^⑤

乔治·施依灵和阿伯特·派生斯，都是曾在大会上講話的工人党領袖。派生斯号召大家支援东部各州罢工中的鐵路工人，但是对于芝加哥的罢工却一字未提，同时也沒有表示工人党和密西根中部鐵路公司所發生的轉轍工人的罢工有任何关系。但在罢工一旦开始的时候，該党乃派定一个执行委员会，以發动一次全面总罢工。該委员会更立即發出通知，号召一切工人尽力使全城的一切制造厂、工厂、紡織厂和木材公司即时停閉，以便和鐵路工人联合行动。雪茄制造工人和家具工人中的工人党党员，在推廣这次罢工运动中起着領導作用。在所有这些秩序紊乱的日子里，社会主义的領導者們，特别是阿伯特·派生斯，是一直在罢工工人中間活动着，告訴他們必須沉着而堅強，同时吸收了几百个願意参加工人党的工人作党员^⑥。

芝加哥的市長和警察当局已不願再給工人任何警告，七月二十六日，警察和罢工工人在維亞达克特的哈尔塞街進行了一次部

署周密的戰鬥，結果一支騎兵隊持刀向群眾沖來殺死十二人，并殺傷數十人。芝加哥于是變成了第二個匹茲堡。貿易局組織了一個“公民巡邏隊”，以連發步槍武裝着的聯邦軍也从夕約克斯地方開來了。罷工工人的遊行隊伍被沖散，工人黨的領袖被逮捕，工人們的總部也被拆毀了。在街頭遊行的那一戰鬥中，大約有三十至五十人被殺害，有將近一百人受傷。芝加哥的罷工運動已被漸次消滅了；七月二十八日那天，貨車在軍隊保衛下開始行駛⁶⁷。

而在这时，在聖路易城中的運動却正急劇發展着，其速度之快使得該城最大的報紙“共和黨人”竟呼喊著說：“這決不是什麼罷工運動；這乃是一次勞工革命！”⁶⁸ 在这里，工人黨也曾發出一通告，号召于七月二十二日召開群眾大會。“我們呼吁各界人民起來抗議政府的這種派兵保護資本家和他們的財產，而壓制鐵路工人的正當要求的行為”。有幾個工人參加了這次群眾大會，他們一致責罵政府不應與資本家聯合以反對“僅只是要使自己的勞動力能夠得到正當的合理的報酬”的工人。大會一致同意“不管別人如何評論，我們將在这一正義的反掠奪和反壓迫的勞工鬥爭中，永遠和他們站在一起，直到鬥爭結束時為止”⁶⁹。

工人黨組織了一個群眾代表團，前去訪問鐵路工人在東聖路易城舉行的一次會議。當代表團到達橫斷該城的一條河邊時，代表們決定乘渡船過河，因為該處過河的橋是由一家專利公司經營的。鐵路工人因受到工人黨派來代表團的鼓舞，乃決定于第二天開始罷工。由每綫各派一代表組成的一個執行委員會成立了，該會并被授權在鐵道事業中的各個部門，如殺車工人、司爐、轉轍工人、路軌工人、段工、擦車工人及鐵工等中設立執行委員會分會。閉幕之前，大會更通過了一項決議，号召工人在罷工期間不要飲

酒，并建议，如有任何人醉酒，他的朋友应即送他回家^⑩。

公司方面提出愿恢复五月十五日时所行的工资标准，但工人却要求恢复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以前的工资数。七月二十三日一切货车被命令停驶。只有客车准许开行，同时更特别注意让所有的邮车都能顺利行进。当执行委员会得到消息，知道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要求决定回站复工的时候，它乃立即前去拜访那里的工人，要他们暂时不要复工以等待问题的全面解决。但他们却拒绝了。于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只得离去，但在第二天他们却同着一部机车和两挂满载数百罢工工人的敞车又回来了。这些工人排成队伍，锣鼓喧天地开到了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厂。这个办法是极有效的；那里的工人立即停止工作，参加了罢工者的队伍。一个以全城为基础的示威运动已组织起来，铁路罢工工人从一个工厂走到另一个工厂，去鼓动工人们参加罢工。在这些游行示威的运动中，黑色码头工人曾起着重要的作用。七月二十六日，有一记者自圣路易城发出报告说：

“本日下午，大批罢工群众及在码头边工作之黑人三百余名曾结队前往本市区极大一部分工厂，强迫各厂工人停止工作，并熄灭了各机器间炉火，关闭了各处厂房……。该群众中之黑人部分则更开至河边码头，迫使各汽船公司和独立经营之汽船管理人具书面保证，将汽船中各级雇用人员及码头工人之工资增加百分之六十至一百。”^⑪

当罢工运动在全城展开的时候，它乃是完全由工人党领导了，该党先发动了一次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接着便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仍表示赞成继续罢工，同时号召一切罢工工人极力防止扰乱社会秩序事件及暴行发生，

并坚持罢工直到聖路易城的全体劳工均獲得八小时工作日和可以过活的工資时为止。不久，更有一个委员会成立起來以便組織一次全面总罢工。这个委员会，其正式名称为聖路易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乃是由工人党的一部分党员領導的^②。

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所作的的第一件工作是，号召一次为要求增加工資，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及通过法令禁止使用十四歲以下童工的罢工。許多公司立即同意了各該厂工人所提增加工資的要求。但这是不够的；罢工运动依然在不断高漲中。到七月二十九日，該城一切商業地区都已停市。最初，該城的行政当局几乎是实际上已將該城全部留与执行委员会去代为管理了。当聖路易东南鐵路局的財務管理人要求欧弗斯托茲市長逮捕罢工工人的时候，他竟拒絕說，他“沒有能力办这件事”^③。但不久市政当局却与由該城各巨商所組織的一委员会联合起來，合力镇压罢工。聖路易槍械社供給他們一部分短槍，此外更从其他方面弄到五千支步槍。另一由商人們組成的委员会，更筹募了約兩万元的款子以武裝一支約一千人的兵力。

在州長菲尔浦斯威脅着要下戒嚴令的时候，执行委员会則要求他召集州議員進行會議，并要他在会上表示贊同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法令，及采取办法禁止使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該委员会說：“除对上述正义要求予以接受外，將無任何其他办法可以阻止住革命的巨浪。”^④民兵隊、騎警隊、武裝的警衛隊和联邦軍乃一齐出动來控制該城。罢工工人的总部遭到襲击，共有七十三人被捕，其中有四十九人未定任何罪名便予監禁。执行委员会中的委員則被以圖謀不軌罪名逮捕，而每人三千元的高額保釋金，更迫使他們只得留在獄中。群众运动已被打破，罢工也就很快被完全镇压下去。

执行委員中有四人被判五年徒刑，并每人罰款兩千元^⑤。到八月二日，罢工运动便已完全結束。也有極少的一些公司，对于工人們不滿的情况略有一些改善，但回去复工的工人們却看到减低工資的决定仍已实行。許多回到工作中去的工人都感到，他們經過了兩個星期的斗争而实际是一無所得，但另有一部分工人却始終不能忘記那“白人和有色人种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各种不同國籍的人共同参加一次为爭取工人权利的巨大斗争时的那种景象”^⑥。

从这一次全國罢工运动中，美國的資本家們却得到了一个教訓。他們認識到了由富人掌握的民兵隊的重要性，以及一支更大的常备軍和更多更好的軍火的重要性。在此后的数年中，有好几个州的民兵，都被集中管理，更多的軍火庫也在各战略地点建立起來，反工会的圖謀不軌法令則更被全力施行着。

劳工从这次大罢工运动所得到的教訓有兩個是最主要的：第一，將來的勝利必須依靠以工会和政治行动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全國性組織。地方政府、州政府以及全國政府在鎮压罢工中所担任的任务，使工人清楚地看到，現存的兩大政党都是决不能作为依靠的。第二，劳工已認識到，僅只有在斗争中才成立起來的执行委員會和分散的群众大会是不够的。有飢餓的家人急待供养的罢工工人必需能得到及时的救济金。倉卒成立的委員會是不可能滿足他們的这种需要的。鐵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已証明了工人必須有一种强大的并有適當的会費制度可解决罢工經費問題的工会組織。

第二十四章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八年的独立政治行动

在全國勞工會領導下成立起來的各政治党派迅速瓦解的情況，使得許多工人對獨立政治行動失去了興趣，但另一方面，在一八七三年經濟大恐慌後的那些艱苦的歲月里，一種認為工會實無力解除工人苦難而只有獨立政治行動才能對工資收入者有所幫助的感覺，也在勞工運動中日益發展着。一八七五年六月，“鑄工報”已承認勞工“運動中數以百計的最有才能的人都認為要讓工人通過一般稱為工會的那種組織去與資本家決勝負，那無論在力量方面或在意志方面說，都是沒有希望的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現在已不再努力將工人組織到工會或勞工協會中去，而是極力推動以政治行動為目的的組織工作……。”^①

綠背紙幣運動的興起

在不景氣時期中，領導獨立政治行動的，實是農民而並不是工資收入者。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間，有好幾個獨立的党派在西部諸州出現了。它們要求工人和它們一致行動的呼聲頗受到工人的歡迎，這一點是可以從“全國勞工論壇報”中的一篇文章中看出來的；該報在匹茲堡出版，由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勞動者協會中的一位領導人約翰·台維斯擔任編輯。台維斯于一八七五年寫道：“西部的農民們，我們極歡迎有一天我們能和你們攜起手來。東部

的技工——这一支劳动者的大军——随时都等待着在一陣警鐘声下，他們將能够和你們一道站起來占有这片土地和这个政府。”*②

由于商業不景气現象越來越嚴重而工会亦日漸瓦解，于是工会的領袖們及各劳工报刊則号召工人与農民联合起來進行独立的政治运动，以粉碎金融集团的力量。只要能够迫使政府發行綠背紙幣，并以百分之三的利息代替銀行家們所勒索的百分之十二的利息，貸款扶助工人的合作社，則一切都沒有問題了！綠背紙幣的

-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期間，農民与工人之間的团結由于工業自主会的活动更为加强了；这个会是从一个以教育和社交为目的的農民互助团体農民互济会中發展出來的。工業自主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消費合作社，以供給工資收入者生活必需品，并且是“專为一切劳动階級，特別是男工与女工服务的”。（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所藏“湯姆斯·菲利浦文稿”中的一篇題为“对各代表及藝師們的建議”的通告）。工業自主会曾常与農民互济会合作，甚至曾同互济会的會員們联合起來一同办理合作社。工業自主会所發的一通告曾說：“互济会會員們与自主会的會員們在消費問題上已在尽可能的範圍內变成了一個單位。一句話，他們已彼此携手并把兩個組織的力量集中在一起了。这个簡單的事实使自主会會員在与外界接觸的問題上比一切其他团体都有更大的便利。这更使工人直接得到一些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得到的費用上的節省。”（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所藏“湯姆斯·菲利浦文稿”中名为“互济会會員与自主会會員的团結”的通告）。另一通告宣称：“它（工業自主会）現在已經是，將來也仍要与農民互助会一心一德衷心合作，兩者实都是一个大整体的一部分，其目的为要給本國的各劳动階級創造一个美好的將來。”（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所存“工業自主会文稿”中一八七四年一月所發的通告。）

工業自主会的會員总数据說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六年时为四万人，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此处原文如此，疑系百分之五十七之誤。——譯者）在新英格蘭，百分之四十三是在麻薩諾塞州。一八七五年該会开始衰落，到一八七八年时則已不复存在。（見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一七一——一七五頁；又張柏齡：“工業自主会”，第一五〇——一五四頁；及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所藏“約翰·塞米尔文稿”中，一八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勃特費尔德于麻州烏司特致約翰·塞米尔一信之原稿。）

發行將立刻結束不景气現象。“全國勞工論壇報”說：“讓政府印行自己的鈔票，并……把它支付給飢餓中的人民——那些真正工作的工人，以使他們將他們的勞動力使用于屬於全体人民并由全体人民通过其所雇用之代理人經營的企業中。”“鐵路決不需要由私營公司修建、占有和管理。讓政府來修鐵路……。讓我們為修建鐵路發行綠背紙幣并雇用一切無工可作的勞動力。”^③

工人階級中的某些部分，并不是把綠背紙幣運動看成為一種單純要求多發通貨的運動的。而基本上是把這看成為一種楔形的矛頭，要借它引向更廣泛的工業上的民主和一種更良好的社會秩序。但這些原則在綠背黨中却并未被重視，因為工人在這個運動中很少有什麼影響。該黨的主要興趣是希望有更多的貨幣以維持較高的物價，至于改變社會秩序的問題它是并不關心的。

綠背黨是由一八七五年中所舉行的一系列的代表會中產生出來的。在這些大會中，大多數的代表都是農民和律師，但少數在不景气時期中已經瓦解了的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也常常出席。一八七五年三月在克里夫蘭舉行的一次大會上，約翰·西尼、里查·特萊夫立克、全國制桶工人工會的羅伯特·施依靈、凱默昂以及從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烟草工人工會來的黑人工會領袖湯普遜等人都出席了。

這次大會通過了一個以金融改革為基礎的政綱，并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該政綱宣稱，金融問題“是比任何其他問題更深切地影響到人民的實際利益的”。它所提的要求是以綠背紙幣償付國家的公債，并發行年利不超過百分之三點六五的、可以法幣兌換的公債券。這個新的獨立政黨立即就被人稱為綠背黨。

一八七五年九月，另有一個會議在辛辛那提舉行，它代表着一

个由霍瑞斯·戴义所领导的运动；戴义是一个很有钱的慈善家，过去曾在全国总工会中很积极活动过。戴义曾拒绝出席克里夫兰的代表会，他认为它不是代表工人的。但不顾戴义的反，辛辛那提的会议却决议要和那一独立政党合并。辛辛那提会议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一个直到一八七九年为止还始终保存在绿背党的政纲上的要求——废除一八七五年六月通过的以硬幣收兑公債的法令。

一八七六年五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绿背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特莱夫立克、亞歷山大·褚浦和約翰·兴亦克利夫代表劳工出席，但这次大会却是完全为农民、律师、商人与政客們所控制的。不論在委员会的代表名額上或是在有关政綱的問題上，劳工均未被重视；因为，硬幣收兑法令的废除和绿背紙幣的發行不是就会自然地消滅失業現象嗎？④

綠背党將其对于选举运动的主要努力用于争取農業地区的支持。少数几种劳工报纸，如“全國劳工論壇报”和“工人拥护者”为该党的全国与全州的候选人名單進行宣傳。在宾夕法尼亞州的煤礦区，特莱夫立克、台維斯、澤瑞以及其他一些劳动者协会中的領袖們，曾組織了一些綠背党俱乐部，并主持了很多次为该党候选人競选的會議⑤。而組織工人階級以支持該党的工作更以全國礦工协会的秘書約翰·詹姆斯做得最多。詹姆斯曾竭尽全力争取社会主义分子，并且和工人党中的党员热烈辯論綠背紙幣运动对于劳动人民如何重要的問題。一八七六年七月，工人党通过了一項決議，号召其所屬各單位在即將來到的一次选举运动中停止政治活动，并且不要支持任何現已参加競选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不是为資本家所控制，便是为政治騙子們所控制着的*。詹姆斯却要求那

些社会主义者改变他們的这种立場，并且爭辯說，把綠背党和其他政党混为一談是沒有道理的。他在“劳动旗帜”上說道：“这純粹是一个公理反抗强权，劳工反抗資本的斗争，我國每一个劳动者只要有选举权，就应该在独立党的选民名單中占一定的地位。”^⑥

有少数的社会主义者曾支持詹姆士的建議，他們并且說，綠背党不論有多少缺点，它却仍是“在尽力宣傳对壟断資本与金融專制主义的仇恨，揭發他們行騙与搶夺的行为，剔除旧政党中的政客，培养新的人才，發揚新的思想并为劳工的最后勝利准备道路”。但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却不贊同这种看法，他們爭辯說，綠背党的政綱对于工人階級是不及它对于那些在不动產上做投机買賣的商人和政客們更为有利的。該党所提出的关于金融問題的各种要求即使已通过國家法令予以实施，也并不能解决劳工的問題，因为綠背党人所关心的，只是要利用綠背紙幣的發行以償清國家的公債。它的总統候选人彼得·苦泊尔誠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但他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这些社会主义者更說，綠背党是在想完全忽視南部的恐怖統治，在那里三K党正以武力剝夺黑人的选举权并迫使他們降于半奴隸的地位。“劳动旗帜”亦說，任何一个政党，如果它忽視工人階級中某一部分人的問題，就不应得到任何一个工人的支持^⑦。

社会主义者在一八七六年时拒絕支持綠背党的运动是完全正

-
- 工人党这里所采行的政策实是一八七四年四月國際工人协会各美國小組的費列得尔非亞會議所通过的一項政策。該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各项決議，反对“与一切有產階級所組織的政党進行任何合作和發生任何关系，不論他們自称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或独立党人、或自由党人、或農民互济會員、或改良主义者、或任何別的名目”。（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所藏國際工人协会通告。）

确的。那时那个新的政党并没有要为劳工尽多少力量，在它的队伍中也只有极少的工人。一八七六年选举运动的投票结果证明劳工是完全站在绿背党的政治运动之外的。芝加哥的六二,二五八以上的选票，苦泊尔所得仅二五一票；辛辛那提的四七,〇〇〇票，苦泊尔所得则仅为二一票。费列得尔菲亚只有一〇票投苦泊尔；匹兹堡九三票；纽约市二八九票；布鲁克林五〇票。苦泊尔得票最多的地方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各郡，亦即一八七五年的“长期罢工”发生的地方。在斯库基尔郡苦泊尔所得票为一,二三八票；卢瑟恩郡六〇〇票；多芬郡三九七票；默瑟郡四〇〇票^⑧。因此，也无怪乎曾预言“劳工选票将表现为一个政治大革命”的“全国劳工论坛报”，会感到伤痛地失望的。它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令人无法忍耐的。”^⑨

劳工政党与绿背纸币运动

破坏一八七七年大罢工的恐怖政策已使工人们明白，如果政府的武装力量始终被用来粉碎工人的活动，他们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决心要提出并选举出一些真正支持工人阶级的人，工资收入者乃又转而致力于独立的政治行动了。在全国各地，在从纽约到旧金山之间的几乎每一个工业中心，纷纷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最初是和绿背纸币运动并无关系的。但不久，由于在罢工期间，工人、农民和小商人之间已经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很多工人政党都和绿背党结合起来。农民在罢工工人进行着为反对那些可痛恨的铁路公司的斗争中，曾表现出对于工人的极大的关怀。当罢工工人在斯克兰吞开办一个救济站的时候，农民们就曾供给他们一些粮食。“斯克兰吞共和党人”曾报道说：“四乡的农

民已証明他們自己真是非常慷慨，他們曾很多次把大袋的馬鈴薯捐贈給勞工的事業。這些馬鈴薯都是由一專門指定的委員會前往農民家中去挖掘并運到救濟站來，然后再分配給所有需要的人的。”^⑩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養家人協會號召工會運動者、勞工改革者、農民以及綠背黨人聯合起來組織一個獨立的政黨。該協會并提出四項要求以作為這個新黨的政綱：一、政府應當“立即掌握、占有并經營鐵路；二、制訂勞工法以保護工人；三、立即以“政府資金”重辦公營工廠以使失業工人均能夠得到工作；四、廢除一切全國銀行的特權，而由政府自行發行綠背紙幣。該號召最后結論說：

“公民們，組織起來！和我們聯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巨大、富庶而懶散的國家中的每一城市變成一個真正的工作間，把它的廣闊的土地中的每一畝都變成一片農場，把它的每一礦坑都變成為生活的資源而不再是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們的葬身地，而把我們的國家從公債、銀行和鐵道壟斷公司的魔掌中拯救出來。”^⑪

這個通告并列舉了此后兩年中在美國許多城市中所進行的政治活動都要遵循的原則。這種行動代表着兩個綱領的混合：要求實現金融改革和要求制定勞工法。

綠背黨與勞工第一次聯合行動的事是在賓夕法尼亞，在鐵路工人罷工運動最廣泛最激烈的心臟地區發生的。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三日，由工會主持的在匹茲堡舉行的一次大會產生了聯合勞工黨。它的政綱包括了典型的綠背黨人的要求，此外則更要求制訂保護關稅法，在州政府與全國政府中成立勞工部，廢止合同囚犯勞

工，制訂劳工报酬法及童工法，廢止使用于劳工組織的圖謀不軌法令，公共土地只分配給垦植者，以及成立解决劳資糾紛的仲裁法庭等^⑫。

八月末梢，宾夕法尼亞州的綠背党及联合劳工党共同派定了一个委员会以便組織一个兩党联合的运动，并草拟一种共同的綱領。从这个委员会中所產生的新政綱，仍然保存着綠背党本來对金融問題方面的一些要求，此外更加上了一些由联合劳工党提出的劳工要求。現在这两个政党是合并在一起了。大多数被提出担任政府职务的候选人都是由綠背党在几个星期以前提出的，但若干劳工方面的人也被加在候选人名單中了。所有在綠背党的旗帜下参加競选的劳工方面的人，都是劳动者协会中有声望的領袖們^⑬。

一八七七年秋季的选举时，便已可以看到一个在爭取一般人民支持劳工候选人和拉选票方面都頗为有力的組織了，这些工作是由那些在鐵路罢工工人進行斗争的地区和劳动者协会势力所在的中心地带迅速成立起來的綠背党俱乐部所領導的。“紐約論壇报”在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三日曾报道說：“在剛剛过去的几天中，便已有二十个新的綠背党俱乐部在匹茲堡和波茨維的郊区成立起來。”

一个同样的合并运动也在俄亥俄州進行着。九月十三日，由俄亥俄州哥倫布斯工人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一次代表会在該城举行了。这次大会通过決議說，只要綠背党人同意某些条件，工人党便願与綠背党合并，以成立一个全國性的政党。綠背党在六月时便已提出的那些候选人必須撤銷，而由一个联合会議來選擇新的候选人，同时，綠背党的政綱中必須要加進劳工的要求。綠背党

接受了這些條件，於是新的代表會召開了。綠背黨原提名的州長候選人斯蒂芬·約翰遜，在這次會上仍被提名，但其他的候選人則全是由工人的隊伍中選出來的。新的政綱也擬訂出來，要求廢止硬幣收兌法案和國家銀行法案，限使貨幣發行權為政府所專有，實行累進所得稅制，由政府全面控制一切公司組織，以及廢止用公司購物証抵付工資的制度^⑭。

辛辛那提的工人黨却仍然使自己遠離於綠背紙幣運動之外。在其八月十二日舉行的代表會上，該黨拒絕與綠背黨合併，並自己提出了競選州政府職位的全部候選人名單。對於教育局長候選人，該黨提出了一位現任黑人區學校總監的黑人。在鐵路工人罷工時期中，克拉克總監曾支持過罷工工人，並曾數次在鐵路工人所組織的群眾會上講過話^⑮。

在紐約，緊跟着養家人協會於鐵路工人罷工期間發出一號召之後，勞工改革的代表會於十月九日在特洛依舉行。該會提出了一份獨立的州政府官員候選人名單，並擬訂了一個有關勞工改革問題的政綱。叙拉古斯的約翰·朱理峨，他是一個雪茄製造工人，又是工會領袖，被提名為州政府秘書的候選人；紐約市的喬治·勃萊爾，勞動者協會中的一個領導人，為州檢察長候選人；制鞋工人拉爾夫·波芒則為州參議員候選人。該政綱所提勞工要求為減少工作時數；廢除囚犯勞工的合同制；禁止利用大公寓的房舍經營工業生產；設立勞工統計局以及由國家占有和經營鐵道事業。在金融問題方面，則贊成採用“一種金幣、銀幣和美國財政部所發行的紙幣同時並用的貨幣制度，這種紙幣，不論用以償付公私債務均應為有十足票面價值的法幣，而將國家銀行的鈔票收回”^⑯。

這樣一個和緩的關於貨幣改革問題的建議，使得綠背黨人實

無法提出与之合併的建議，雖然該黨在它的州代表會上曾將某些勞工改革黨的候選人列入該黨的候選人名單中。選舉開始前的幾個星期，勞工改革黨在該州的北部諸郡中建立了一個極為完整的選舉組織，那里是有大批的工人被僱用在工廠和鐵路上的制造廠中工作的。“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曾寫道：

“在厄爾邁刺，每一區都有一個‘勞工改革黨總部’，里面每晚都有由很多人參加的會議在進行着。用这里的一位極著名的共和黨人的話來說，自一無所知黨時期以後，從來還不曾有過這樣一個完整與嚴密的政治組織。每一郡分成若干區，每一區又分成許多支區和分區，而在每一個這樣划分出來的單位中都有正式委派和被大家承認的領導人，他們的責任便是在他們所轄的地區內尽可能地接近群眾以活動選舉……。差不多所有與這個運動有關的人都是作坊或工廠里的工人。”^①

該黨自己的報紙“厄爾邁刺每日呼聲”，每天都附印有一份誓約，希望該地區的每一個工人都簽字保證投票選舉勞工候選人。該黨對所有的候選人所提出的問題之一，是他在鐵路工人罷工期間會採取何種態度。

分析一下一八七七年選舉結果的報告，就可以看出鐵路工人的罷工會對獨立政治行動的運動起了何種推動的作用。斯蒂芬·約翰遜，綠背黨與勞工黨聯合提出的俄亥俄州州長候選人，所獲選票幾達一七，〇〇〇，比上一年綠背黨所得選票超過五倍以上。這些選票一大半是得自托利多、克里夫蘭、楊氏敦、坎吞和哥倫布斯等工業城市所在的各郡；另有四分之一的選票則來自自有鐵路經過的各城鎮及該州東北部的各工業郡。在托利多，參加市選舉的候

選人全部及郡選舉候選人一部都獲得了職位。托利多還使兩名綠背一勞工聯合候選人當選了州議會的眾議員。

在賓夕法尼亞州，綠背一勞工黨獲得了五二，八五四票，為綠背黨在前一年所得票數的七倍，並幾等於全部票數的百分之十。這些選票則主要來自賓夕法尼亞鐵路所經過的、出產無煙煤和有煙煤的各郡，以及鄰近紐約州的、屬於伊利鐵路綫範圍中的各郡。這些郡所投票數約占全部選票的百分之二十五。“紐約論壇報”曾對此次選舉評論說：“煤礦工人及其他粗暴之徒與共產主義分子，均在他們的秘密社會的負責人率領之下前往投票站，並以三千票的多數使得他們的候選人全部當選。”^⑱

紐約的勞工改革黨獲票二〇，〇〇〇以上，為一八七六年綠背黨所獲票數之十倍。伊利罷工的中心荷恩斯維鎮所在地的司徒本郡與厄爾邁刺所在的杰夢郡所投該黨票即為四，六六六票，或幾等於全部選票的四分之一。另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地區羅徹斯特，則貢獻了全部選票的百分之二十三^⑲。

全國綠背一勞工黨

一八七七年的選舉結果加速了一個全國性的獨立政治運動的組織工作。在這次選舉運動中，特別是在那些重工業極為發展的各州，綠背黨與勞工黨之間的團結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俄亥俄州，這兩個團體也已經聯合起來，並且已成立了地方性的綠背一勞工黨的組織。在巴爾的摩與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工人黨也頗願與綠背黨人聯合。在新澤西州與麻薩諸塞州，這兩個政治組織已經共同支持過同樣的候選人，而在紐約州，在這次選舉中勞工改革黨已經是和綠背黨人在一起工作了。

在这些选举后不久，决定于一八七八年二月在托利多召开一次劳工与金融改革者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已经发出来了。这一号召是由俄亥俄州托利多的司徒琴发布的，他是全国政党俄亥俄州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号召上更有某些重要的绿背党人的签字。农民、小商人和工人们都谈论着这个即将到来的代表大会，并急切地盼望着将有一个专为一般人民说话和做事的新政党出现。

一百五十名代表，其中大多数来自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及伊利诺各州，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虽然劳工运动中的领导人如罗伯特·施依灵、尤利亚·斯蒂芬斯、里查·特莱夫立克及拉尔夫·波芒等也均为会中代表，但主持这次大会的却是如艾礼斯与波恩顿等富有的制造商及纽约贸易局秘书兼“商务日报”编辑华尔脱尔·格鲁姆等人。特莱夫立克虽被给予临时主席的荣誉，但常任主席却是宾夕法尼亚州绿背党领袖弗兰西斯·休士。

这一新的全国政党的政纲在一开头便对国内的现状作了一番生动的描写：“商业收入与工资收入均大为降低，一种无可比拟的苦难已侵袭着我们人民中贫苦的阶层和中产阶级；欺骗、盗窃、破产、犯罪、苦难、贫穷与饥饿已充满了国土中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些情况的造成，该政纲说，乃是由于“一切法令均以高利贷者、银行家及公债持有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并为他们所决定”。对于那些勒减工人工资、强迫工人签订“黄狗合同”的工业资本家们则一字未提。绿背党人的一般要求是都有的，只除了年息百分之三点六五的公债票一事，政纲中并未提到。关于劳工的要求，则有制定减少工作时数的法令，成立全国的与各州的劳工与工业统计局；废止合同囚犯劳工以及禁止外国劳工入口等项^②。而对于这样一种温和的纲领，“纽约论坛报”仍攻击说：“当然，一切有理性的人都能看出托

利多決議案乃是以共產主義為目的的。這個即將出現的政黨正決心要實現一次徹底的社会与金融革命。”^{②1}

一八七八年春季前後，該黨內各派之間的團結已更為加強。綠背黨俱樂部已在工人階級中及農業地區組織起來；綠背黨的報紙已有了極廣大的銷路，綠背黨所發行的各種小冊子，更有全國各地的工人細加閱讀并加以討論。

一八七八年春，“紐約論壇報”的一位住賓夕法尼亞的記者曾寫道：

“在波茲維或塔馬瓜的街頭看到一群失業的礦工聚在一起談論着貨幣問題与一般政治問題，已成為平常的事。他們中間識字的人則手拿着一張報紙或一本關於貨幣問題的小冊子，向他的那一群為數不多的聽眾講解里面的內容，而在他講完後所有的人便都會自由地在這個露天討論會中發表意見。”^{②2}

在某些州中，工人協會也都變成了綠背黨俱樂部，工會也參加進來為這個新的運動吸收人員。凡有勞動者協會地方協會存在的地方，那里就一定也會有若干數目的綠背黨俱樂部。在紐約市，工人聯合會的領袖們也積極地宣傳新黨的各种理論。

在許多自願為之效力的人的幫助下，該黨的組織工作進行得頗有成效，這一點，從一八七八年的春季的選舉運動中很可以看出來。那年二月，不久後便變成勞工協會的工會總會長的泰倫斯·泡德利當選了斯克蘭吞的市長。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曾組織了一個共同的公民候選人名單，以求擊敗泡德利的“勞工改革黨或莫利馬乖雅候選人名單”。“斯克蘭吞共和黨人”大叫着說：“打倒這種共產主義的寡頭政治。”該報對於斯克蘭吞的將來感到惶懼，“市長取

务将会由一群泡德利分子來相繼担任，全城将会由一群不納稅的不負責的暴民來掌握統治权。泡德利的失敗是“和我們等待日落一样的可以肯定的”。当泡德利一当选之后，“斯克蘭吞共和党人”則解釋說，“成百成千的工人已被誘入共產主义的罗網中去了”^②。

在春季选举中，紐約州的一个名为工人与綠背联合党的新政党选出了厄尔迈刺、奧本、犹提喀及鄂斯威哥等地的市長，在罗徹斯特与叙拉古斯獲得比民主党更多的选票，并在十七个郡中都选出了某些鎮的鎮長。这些勝利乃是工人們在該州北部諸城中所進行的細致的組織工作的結果。从厄尔迈刺、奧本、罗徹斯特、犹提喀及鄂斯威哥等地來的“綠背工人党使者，均在附近各郡”向農民們宣称支持独立政党候选人的必要。

“紐約論壇报”的一記者自厄尔迈刺报道說：

“作演講的人几乎完全是在本城的鞋厂或机器厂工作的技工。他們每天在工作間中工作了八小时或十小时之后，还要坐車跑到十几哩以外的鄉下去，在某些学校的校舍中或在野地上作演說，到午夜或甚至更迟方能回來，而第二天早晨仍得按照一定的時間上工。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本郡的每一个学校区都举行着會議，而綠背党俱乐部也在很多鄉鎮里成立起來。”^③

但尽管正这样向前發展着，綠背一劳工党的运动仍然开始分裂了。早在一八七八年五月，該党内部的基本矛盾便已逐漸發展成了一个重大的危机。在該月举行的宾夕法尼亞州代表大会上，分裂便已無法避免，在选举大会主席时，泡德利失敗，而大維·克尔柯当选，这对劳工方面的代表便已是一个挫折，而他們所遇到的最主要的一个失敗是大会否決了“全國劳工論壇报”的發行人湯

姆斯·阿姆司特朗为州長候選人，却提出了一个与劳工运动毫無关系的律師塞米尔·梅遜。后来大家更知道他乃是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所雇用的一个律師。

另有一个使情况更为惡化的原因，是这次政綱中所提出的劳工方面的要求比上一年所提出的更要少些。它只要求减少劳动时数与廢止囚犯劳工的合同制。但約翰·西尼却把这个局势挽救过来了。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次大会就一定会分裂了。西尼悬切地說：“現有的政党只有兩種：一种是剝人皮的，一种是被剝皮的；一种是搶劫人的，一种是被搶劫的。那么來吧！讓我們劳工們，綠背党人們，以及一切反对不論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政客們的統治的人，在一起合作吧。”^⑤

和紐約的情况比較起來，在賓夕法尼亞發生的这种冲突还要算是極溫和的了。一八七八年七月底，一次代表會議在叙拉古斯举行，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全州綠背一劳工党的團結和提出一份州选举中的候選人名單。但从紐約市一地來的共有四个不同的代表团，各自声称为这一运动的合法代表。三个代表团來自布魯克林，三个來自特洛依，三个來自阿尔巴尼，來自布法罗的亦有兩個。关于紐約市四个代表团的取舍問題引起了一次异常激烈的爭辯，而結果却是將該市所有代表团全部拒絕了事。“民族雜誌”曾報告說，这一冲突实即“城鄉之間的冲突，城市主要是代表新党內的劳工改革派，而鄉村則主要代表新党內的綠背紙幣派”。大会所設立的全州执行委員會的組成成分說明該党实是在綠背党人的控制下的，因为委員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屬於金融改革派，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劳工代表。劳工本身也不是團結一致的；劳工領袖如厄尔迈刺的約翰·朱理峨竟公开宣称，他認為“綠背党人問題的解决也

就同時解決了勞工問題”。大會所提出的候選人則大多數是在勞工運動中沒有什麼影響的綠背黨政客，同時，在這裡也和賓夕法尼亞州一樣，大會的政綱所提出的勞工要求也比前一年的少²⁶。

各州綠背—勞工黨的政綱一般都反映了工人階級在該運動中的力量。在緬因州，那裡只有很少或幾乎沒有勞工支持這個運動，因此它的政綱是完全關於金融問題、土地問題的，同時，在印第安納州，唯一有關勞工問題的議案，只是要求在礦坑中裝置通風設備以及制定工資對於公司財產有優先留置權的法令。但在參加該運動的工人較多的俄亥俄、密蘇里、伊利諾及麻薩諸塞各州，則雖然金融改革問題仍在政綱中占主要地位，勞工問題亦得到相當的重視。在俄亥俄州，一礦工組織中的領導人安得魯·勞埃被提名為州政府秘書這個最重要的職務的候選人。在麻薩諸塞州頗受勞工擁護的班哲民·伯特勒則被提名為該黨的州長候選人。後來民主黨也同樣提出了他²⁷。

許多包含有勞工要求的政綱也同時表示排斥“從歐洲輸入的要求均分財產的共產主義的紅旗”²⁸。但工人們對於這種“紅色恐怖”並不覺得可以從工人階級的綠背黨俱樂部所散發的一種傳單中看出什麼道理來。這一以“智人拿但行傳”為題的對話式的傳單中有一段為：

“接着人民便問智人說，什麼是共產主義？”

“智人一個字也沒有回答，只是低下頭在一張紙上寫着。

“群眾更逼進一步問他說，那個被叫做共產主義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我們懇求你告訴我們。

“智人回答他們了，他說：當我的弟兄因找不到一片面包皮而暈倒的時候，不要把我所不需要的上等面包、好酒、好肉、

水果、金子、銀子、寶石，以及精工制作的花巧的衣服等……收集着保存在我的儲藏室里。這就是共產主義。

“于是一個婦人自言自語地說：這不就是基督教嗎？”

“于是一個年老的拉比*說，摩西和先知們的教義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

“于是一個從天朝來的人啞啞地說，孔夫子在六千年以前便這樣講的。

“那時，智人說，安靜！不用為一個字眼弄得心神不寧。這就是為人之道。”²⁹

一八七八年秋季的選舉結果代表了該運動的高潮；綠背一勞工黨國會議員候選人所得選票共約一,〇六〇,〇〇〇票，十五名代表被選進了國會，其中東部代表六名，西部中區六名，南部三名。國會議員選票來自賓夕法尼亞州一地的兒達一〇〇,〇〇〇，約占全部選票百分之十四。無煙煤區的選票又一次為數最多，雖然這次比一八七七年已減少了三,〇〇〇票，此外，盧瑟恩郡對全國政黨所投票數亦自一四,五三八降至九,六七四，多芬郡則自三,九二三降至一,四六八。對於所挑選的候選人不滿意乃是票數低落的原因³⁰。

基本上，勞工與綠背黨的聯盟是很不穩固的。在擁護綠背黨的人們看來，勞工的要求是毫無重要性的，因為綠背黨的理論已說明金融改革將解決一切問題。許多綠背黨人常常發表一些極無意義的談話，諸如：他們決不要和“共產主義或工會那種的勞工團體”發生任何關係等，則更削弱了兩派的團結。綠背黨人的最高要求，

* Rabbi, 是猶太人對於法學家或教師的尊稱。——譯者

有一位出席綠背一劳工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講得很明白：“我們的全部需要只是一种在全國通用的綠背票和一个誠实的政府。”^{③①}

但是工人們的需要却比这要多得多。为“大西洋月刊”寫稿的一位作者曾在一八七八年秋季作了一次調查，以求了解工人們究竟希望通过綠背一劳工党运动得到些什么。在他和宾夕法尼亞州、紐約州及新澤西州的工人們的談話中，他發現所有那些工人，“都一致相信需要有一种‘絕對貨幣’……一致希望政府大量創建公营工厂，以便由它來作为人民的雇主，并認為政府應該为了人民的利益，占有及經營鐵路、运河及电报事業；贊成土地为政府所有，并以法令禁止任何个人大量積累財富，同时希望尽可能以人民每年（或每天）所明白表現出來的意思來代替那些死板的憲法上的条文与各种限制”。其他一些共同的要求則是：較短的工作日，一切政府官員均由人民直接选举，一种累進的所得稅制，發展公营工厂以及按比例选举政府代表^{③②}。

到了一八七九年的时候，在那个曾一度强大的工人与中產階級分子之間的联盟中，現在僅剩下一群農民了。一八八〇年，綠背党的領袖們召集了一个會議，出席該会的有劳工协会、綠背一劳工党、加利福尼亞州工人党、堪薩斯州工人党、芝加哥八小时工作同盟及工人联合会等單位的代表。社会主义分子則是經過由阿道夫·杜埃所領導的一次長期斗争后才終于得以参加的；杜埃認為，尽管有那些关于“通貨問題的一派胡言”，綠背党与劳工的联合，对于劳工要求仍是很重要的。既然有美國的工人群众在这个运动中，社会主义分子便有必要参加到这个运动里去以保存它的优点并和它的缺点作斗争。杜埃問道：“如果我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他們怎么能听到我們的聲音？如果他們沒有机会得到我們的各种宣言，

他們又怎么能讀到它們？而且，在他們閱讀的時候，他們不是更需要我們給他們解釋才能使他們充分地了解那些東西的內容嗎？”³³但說來真够滑稽，當社會主義分子已決定要參加綠背黨與勞工的聯合運動時，工人們却已經脫離了那個運動。

在大会上社會主義分子是完全孤立的，他們所提出的一種很溫和的反壟斷資本的綱領，也被以一種議會中常用的花招給打消了。政綱中的勞工問題部分則只是要求實施全國八小時工作制法令，限制囚犯勞工，禁止雇用年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以及以現款支付工資³⁴。

在綠背黨與勞工聯盟所進行的美國總統競選運動中，它的候選人詹姆斯·威佛爾曾極力主張限制鐵路公司，並將公共土地完全保留給真正的墾植者，以求能特別得到農民的擁護。但結果雖在農村中已得到廣泛的有組織的支持，威佛爾仍僅只獲得三〇〇,〇〇〇票。在工人中間沒有為了選舉進行任何組織工作，威佛爾的競選活動主要是在南部各州進行的。到一八八二年，這一聯盟已完全瓦解，威佛爾更建議該黨的領袖們把他的競選演說計劃完全限制在農業區域中進行，因為在城市方面他們是絕無希望了³⁵。

對中國勞工的排斥

當紐約、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及其他東部與中西部諸州的工人們正把自己的精力完全用於綠背一勞工黨運動的時候，加利福尼亞州的工人却正在和一個目的要從美國生活中完全將中國人清除掉的獨立政黨進行聯合。在一八四九年金礦狂潮時期，中國人第一次大量來到美國的時候，大多數的美國人是對他們頗為歡迎的。

一八五二年時，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曾稱中國人為“我們最理想的入籍公民”，并建議給他們土地“以招致更多的移民”。無論如何，發現輸入中國工人可以謀取厚利的輪船公司以及借此使美國的雇主們可以得到一些廉價勞動力以破壞罷工的承包公司，都曾盡力鼓動中國人移民入境。

一八七〇年，曾有七十五名中國工人被雇來破壞麻薩諸塞州北亞當斯制鞋工人協會的一次罷工。老板更威嚇着說他要繼續使用“苦力”勞工以“使自己能從美國的一個最壞的工會組織——制鞋工人協會的凶殘的暴政下解脫出來”。“費城北美人報”也奉勸該地的老板們學習他們的北亞當斯的同行的榜樣，雇用這種每月所費不到六元的廉價勞工。“波士頓共和報”也表示贊同說：“這些‘天朝人’不參加任何一個罷工組織——不願深夜在外活動——不計較工資多少——不僭妄地要對他們的雇主發號司令。”^②

在勞工運動中對待中國人的態度有兩種。一種看法是，既然“一個國家財富的多少主要決定于它的勞動力——勞動力便是它的資本”，那麼美國工人就應該歡迎一切的人，“中國人、非洲人或任何國籍的人自願到這塊國土上來”。對中國人的反對，即是分裂工人階級，那將只會對雇主們有利。美國工人不但不應該跟着喊叫什麼“黃色威脅”，而必須組織中國工人以防止老板們利用他們來減低工資標準。他們一點也不應該把反對不合理地運入勞工來與他們競爭的鬥爭去和各種排外思想的偏見混淆起來^③。

對於這個問題提出這種正確看法的人是很少的。甚至凱默昂，他在堅信黑色工人應該團結起來這一點上是遠比其他的勞工領袖們更為進步的，而在關於東方移民問題上却也採取了錯誤的立場。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他在“工人擁護者”上寫道：“不錯，把他們

都弄來，中國人、日本人、馬來亞人和大馬猴，讓他們都成為選民；承認他們也是人和工人；把他們全弄在一起混合起來，以便逐漸消滅那古老的高加索人種。”由很有才能的阿道夫·杜埃編輯的“工人聯盟”，曾批評這種充分表露種族仇恨的意見，但他仍同意應該制止中國人移民入境，因為他們的生活水平是那樣低下，還需要一百年的時間他們才能吸收西方文明^⑳。

勞工運動中先進的領袖們都採取這樣一種態度，自然無怪有那麼多工人要反對一八六八年簽訂的中美兩國互相承認對方的公民有權向本國移民的“蒲安臣條約”^{*}了。那個條約剛一批准，美國的勞工運動便立刻發動了一個要求廢除該約的鬥爭。這一要求在全國勞工會一八六八年以後的各次代表會上都會被提出，並變成了全國勞工改革黨的綱領之一。勞工黨說，中國勞工在美國的存在“是一個大災害，它將產生貧困及隨之而來的苦難與罪惡，因之必須予以禁止……。”^㉑

政治騙子在加利福尼亞一時的氣焰

來到美國的中國勞工大多數是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在這裡，當幾條大的鐵路完成後，他們便開始進入到各個行業中去，並逐漸從非技術性的工作向需用技術的職業轉移。鐵路的完成使得成千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因而在國內任何其他地方失業還沒有變成一個嚴重問題的數年前，這裡便已發生了失業問題。政治煽動家們卻能使加利福尼亞州的許多工人相信這種失業現象完全是由於“苦力的競爭”造成的，而中國工人所拿的低得使人不能相信的工

*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一八二〇——一八七〇)，美國律師及政治家，曾任駐中國公使。該條約于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訂于紐約。——譯者

資，也使得这种論点似頗有理。許多开始感到在美國的中國商人的競爭影响的制造業者和商人們，也参加來合力制造关于“黃色威脅”的恐怖心理^④。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旧金山的工人們在美國工人党的主持下举行會議，表示对于鐵路罢工工人的同情。会上的發言和大会所通过的決議都决無一字提到关于中國勞工的問題。但在大会行將閉会之前，一群惡徒却來擾乱会场，要求發言人关于“中國人的威脅”問題講几句话。当大会不为这种威嚇所动时，惡徒們便离开了会场，向唐人街進發。好几天，他們便一直在那里游蕩，攻打中國工人并搗毀中國人开的洗衣房。这种騷擾直到最后安全委員會組織了一个“鋤柄隊”才被压服下去。

“鋤柄隊”中有一个隊員是愛爾蘭籍排子車工人丹尼斯·几尔尼，他是一向以同情老板、攻击工人階級、并常自吹曾从商業冒險事業中發了一大筆財聞名的。几尔尼很早就想到，他如果加入了勞工运动，那他的政治前途定可以得到最好的發展。他曾經想要加入美國工人党，但該党認為他是工人階級的敌人而予以拒絕了。于是他乃决定成立一个他自己的組織，因而在—八七七年八月，他和他的一小群追随者組織了旧金山各行業工人勞工协会。三个月之后，即是年十月，他更建立了加利福尼亞工人党，自任主席。

他的党提議“把应当由人民掌握的政权从有錢人手中夺过來交还给人民”，該党的目标是要消滅本州的土地壟断制度，并使“窮人和不幸的人們能有相当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他更宣告決定“要以一种使此后再不可能出現巨大財富的捐稅制度，來消除富人們的巨大的金錢勢力”。这些綱領实只是一个假面具，暫以用來掩飾

該黨的破壞目的的：“我們提議以最大的速度并盡我們的一切力量全部清除國內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因為它較其他的一切更為嚴重地危害着勞工地位并增強了資方的力量。”^{④①}

几尔尼的黨迅速地發展着；他在舊金山各地都建立了區分部；每一個星期日晚上都在沙灘地區舉行集會，成千的未組織起來的工人都參加了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當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的某些領袖也和几尔尼黨進行聯合時，它在工人中間的威信是更加增高了。不久，舊金山大多數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成員都加入了几尔尼黨，使它更增加了相當大的力量。

“勞工旗幟”則號召所有的社會主義運動者起來和“驅除一切中國人”的口號作鬥爭，并盡量揭露几尔尼實是一個力圖阻止適當地解決中國勞工問題的政治騙子。“勞工旗幟”更接着說，為了反勞工活動而運入中國工人的事件是必須反對的，但已在美國的中國工人，應該和其他工人聯合起來，以通過工會的活動提高他們的工資。東部的一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卡列勃·狄雷曾寫信給加利福尼亞的該黨說：“到你們的鞋店里去看一看，你們就能夠看到很多人之所以變成為無業流民，并不是由於有中國人的緣故，而是由於有一個更有力的敵人存在，那就是那個沒有心肝沒有靈魂永遠也不會聽見你們死前的呻吟的敵人——資本。”^{④②}

一八七八年一月初，几尔尼與他的一些伙伴以曾使用“有破壞和平趨向的”言辭的罪名被捕入獄^{④③}。既因為短期的監禁已使自己成為一個“正義的犧牲者”，几尔尼現在更相信沒有人再敢來反抗他的領導權了。但是他的高壓的獨裁的政策甚至在他自己的黨羽中也激起了憤恨的情緒。他常帶着一群身體強壯無時不吵吵嚷嚷的幫閑去巡視各區分部的會議，他一不高興，他的那些幫閑們便會

馬上把會議攪散，这种行为使得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的党员們对他憤恨达于極点。依靠着他的那一帮受过訓練的惡徒們的帮助，几尔尼任意免除敢于批評他的政策的区分部負責人的职务而另派一些对他俯首听命的人做領導。据聞他曾說：“我就是人民的声音，在人民拿另一个人來替代我的位置以前，就應該由我來決定一切。我对人民没有什么应感恩的地方，但人民却应对我感恩無窮。”^④

这个“人民的声音”实是由反劳工的势力所“豢养和指揮”的傳聞，以及他曾經答应过只要旧金山的商人們願給他五千塊錢他就可以停止他的那个运动的种种傳說，也造成了一般人对于几尔尼及其最親近的党羽們的反对。此外，由于几尔尼反对有組織的劳工，不容許工会在他的党内占据代表地位，因使得許多地方工会也逐漸和他敌对起來。

在一定的時間內，几尔尼还能够开除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党员，其中包括若干社会主义分子，以保持他对党的控制权。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还是被他所控制的，但他却并没有能够阻止該會議通过一个完全和几尔尼的分裂政策不相合的政綱。該政綱說，由于美國政府为資本家所控制，人民的权利已被完全忽視。“苦力”劳工則被斥为國家的灾害，并提出了对它加以限制和消滅的要求。其他一些要求則为：土地所有权应僅屬於真正的垦植者；金融制度必須配合農業、制造業和商品工業的需要而不是配合銀行家、商人及經紀人的需要；八小时工作应为法定的工作日；停止出租囚犯劳工，以及按一般工資标准付給公共事業所雇用的工人的工資。它同时主張通过賦稅制度以停止百万富翁与壟断資本家的發展，以及总统、副总统和美國的參議員均应由人民直接选举。最后，該政

綱更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非宗教性的強迫教育制度。“在一切公立學校中必須規定定期的講演，而其主要目的則應是維護勞工與機工職業的尊嚴，把他們看成為各行業中最高貴的職業。”^{④⑤}

在一八七八年的前幾個月中，該黨迅速發展到全州各地，變成地方選舉中一個強大的力量。在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九日聖大克拉刺郡的一次特別選舉中，工人黨所提的州眾院候選人當選，擊敗了民主黨與共和黨所支持的候選人。一個月以後，工人黨更選出了薩克刺門托的市長和市檢察官。

和綠背一勞工黨運動一樣，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的開始衰落也正是在它獲得最大的勝利之後。一八七八年三月後，該黨分裂成為凡爾尼派與反凡爾尼派兩個集團，在市選舉中凡是兩派各自提出不同候選人的時候，結果一定遭到失敗。另有一些別的因素也加速了它的瓦解，若干由該黨提出的候選人都是些老練的政客或製造商，他們一旦獲選之後，便根本不再顧及該組織的任何原則而投票贊成那些為工人所攻擊的法案。

到一八七八年五月，兩個執行委員會成立起來了。有很多工會運動者在內的反凡爾尼集團向加利福尼亞州的人民發出通告，指出凡爾尼是一個獨裁者，指責他“把自己出賣給敵人”的行為，並指出他“這個喪心病狂的破壞分子和黨的敵人，曾如何勸誘人們進行放蕩、騷亂和破壞治安的活動，如何解散區分部，並用其他方式來損害和沾污工人黨”^{④⑥}。

從這一事件以後，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的歷史大部分便只是一段無盡的內部糾紛與無聊的爭吵的歷史了。在這一段內部紛爭期間，該黨也還獲得了幾次勝利——一個新的州憲法的通過主要是依靠了工人黨與農民互濟會的聯盟，而在一八七九年該黨還選出

了依薩克·凱洛克为旧金山市長。但在一八八〇年，工人党便沒有能够使自己的候选人獲选，而不久以后，它便与那正在衰落中的綠背一劳工党合并了。

加利福尼亚工人党虽然最后已墮落成为一个一团糟的組織，綠背一劳工党运动虽然會常常为制造商和政客們所操縱，不过兩者都还是有其長远的影响的。兩者都把壟断資本的問題提到了顯著的地位，而在喚起一般人民支持某些重要的劳工要求方面也都頗有一些影响。兩個运动，在迫使已建立起來的旧政党更注意地傾听普通人民的要求方面，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东西的結果，某些州才通过了一些法律，設立劳工統計局，終止出租囚犯劳工，建立强迫教育制度，以及取締除法定貨幣外以任何其他东西支付工資的办法。

社会主义运动

一八七六年举行的社会主义各派联合代表会並沒有能够結束拉薩尔派和馬克思主义者之間的冲突。拉薩尔派已决心不考虑大会所作的必須在該党“已强大到能够發揮明确的影响时”才可以組織政治运动的規定。一八七七年大罢工的失敗，更被拉薩尔派拿來作为只有选票箱才是和資產階級進行斗争时唯一有效武器的証明。他們辯論說，罢工与失業的示威运动是决不能得到勝利的，因为每当它們正要接近勝利的时候，政府便会派遣警察、國民兵和軍隊來鎮压那些运动。既然工会的行动不能撤換政府的官員，那就只有依靠一个代表被剝削階級的独立政党來改变这种局面。一旦通过选票獲得了國家政权，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会近在眼前了①。

借助于跟隨在鐵路工人罷工后工人傾向政治行動的一般趨勢，拉薩爾派或者說“政治行動”派的社会主義者，竟能使很多人忽視聯合代表會的決議迅速鑽入了政治活動圈子。最初一切都很順利的。在一八七七年秋季的市選舉與州選舉中，社会主義者所獲票數頗有增加；在芝加哥所獲選票數為七，〇〇〇；辛辛那提九，〇〇〇；布法羅六，〇〇〇；密爾窩基一，五〇〇；紐約一，八〇〇；布魯克林一，二〇〇；新港一，六〇〇。

對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紐亞克舉行的工人黨代表大會，“政治行動”派的社会主義者獲得了完全的控制*。該黨的名稱被改定為社会主义勞工黨，它的黨章及原則宣言也已完全改頭換面。一切有礙於立即進行政治運動的東西被全部刪除，該黨的主要目的，它現在宣稱說，乃是動員工人階級參加政治行動。有一個補充聲明則聲稱，該黨“將與各工會維持友善關係，並將以社会主义的原則提高它們的組織”。社会主义勞工黨的首要任務是組織政治運動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它的指導原則現在已變成：“科學是兵工廠，理性是武器，選票則是彈藥。”

在一八七八年春季和秋季的選舉中，這一新政黨在投票箱邊獲得了相當大的勝利。在芝加哥的春季選舉中，該黨所獲選票數約近八，〇〇〇，並有兩名社会黨人當選為市參議員。是年，芝加哥的社会黨人選舉出四個黨員進入州議會，一個參議員和三個眾議員。在聖路易，也有三名社会黨人被選進州議會，而在紐約，社会黨所獲選票為四，〇〇〇，兩倍於上一次選舉中所得的票數⁴⁸。

很自然，“政治行動”派的社会黨人乃把這些選舉中的成就拿

* “勞工旗幟”的麥克唐奈爾和他的一些追隨者都沒有出席這次大會。

來證明他們的觀點的正確。但實際上，取得這些勝利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倒不是拉薩爾派，而是那些反對拉薩爾派集中精力於政治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或“工會”派的社会主義者。默忍着自己和拉薩爾派之間意見不一致的情況，芝加哥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聖路易、紐約等地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曾極力動員他們的工會來支援社会黨的候選人，在選舉那天散發傳單，並採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工會派與政治行動派彼此團結。但在辛辛那提，因為拉薩爾派在那裡已有控制一切的力量就沒有建立與工會之間的聯繫。因此，在一八七七年秋季之後，社会黨所得選票數便大大降低了^④。

此後的選舉運動則證明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確的，就是說，如果事先沒有很好的準備，又不能得到工會支持便冒失地向選票箱邊跑，那是永不能得到維持長久的效果的。一八七九年秋季選舉中社会黨人所得的票數便是很可悲的，芝加哥的票數從一二，〇〇〇降到了四，八〇〇。而“政治行動”派的社会黨人對這種情況則只是聳一聳肩頭說，“好年頭”的重新來到使得社会主义的勝利不可避免地要告一結束了，以及，“工人仍然是盲目而無頭腦的”。“好年頭”的重返把“被剝奪的勞動者迅速地送回到他

-
- * 在芝加哥使工會与社会黨能夠聯合起來的最主要的一個人是阿伯特·派生斯。他是一個積極的社会黨人同時也是一個英勇的工會運動者，他曾任芝加哥及其近郊行業工會聯合會的主席。決不能說已徹底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派生斯，那時的主張是經濟與政治行動同時並進。他曾明白宣稱說，組織工會並同時獨立地進行選舉運動，工人們“不要很久就一定能遏止住——那決定要把我們可愛的美國變成一個貧民、流浪漢和依人為生的奴僕的國土的——財富集團的日益增長着的力量”。（見阿蘭·卡爾默：“勞工鼓動者阿伯特·派生斯傳”，一九三七年紐約版，第三八頁；又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所藏阿伯特·派生斯的“雜記手稿”。）

們的老道兒上去”，因此使得社會黨人所得的選票數大為減少了。但是，甚至社會主義勞工黨中的拉薩爾派的領袖菲利浦·凡·派登在那時也不得不被迫承認馬克思主義者的見解是正確的，他說：

“在今天唯一可靠的基礎是工會組織，偶發性的政治方面的努力常常也能獲得暫時的勝利，但唯一衡量我們的政治力量的東西，是要看工會組織對於這種政治運動給與何種程度的支持。”^⑤

到一八八〇年，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已分裂成為一些彼此絕對不可調和的集團了。這個趨勢由“政治行動”派社會黨人開始，更為一八八〇年發生的兩大事件所促進。在是年春芝加哥的選舉運動中，第十四選區社會黨的市參議員候選人弗蘭克·史滔勃在勝利地獲選後却被選舉法官剝奪了他的占據議會席次的權利。雖然最後史滔勃仍得到了議會中的一席，但這件事卻使很多社會黨人深感到依靠選票作為一種方法以求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是靠不住的，因為已當選的社會黨的候選人仍可以被簡單地阻止不容去擔任職務。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社會主義勞工黨在應以何種方式參加一八八〇年總統選舉運動的問題上又發生了分裂。大多數人是贊成和綠背黨聯合的，而該黨，大家當能記得，已曾正式地參加過提名詹姆斯·威佛爾為候選人的那一次綠背黨代表大會。但該黨中的一翼卻堅持要單獨提出社會黨候選人，而在芝加哥的這一派，在阿伯特·派生斯的領導下，也就提出了它自己本地區的候選人名單^⑥。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某些領袖，由於對政治行動已感到失望並對於以選票作為一種武器以達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件事已失去了信

心，乃完全脫離了社會主義勞工黨。其中一派急劇右轉，開始主張一種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工會主義。另一派則主張放棄選舉，放棄教育性的“文字上的宣傳”，以及通過工會以求實現當前要求的鬥爭，而代之以物質的力量，武裝工人，並“以行動來作宣傳”*。

這一正在發展中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隊伍，由於一群德國社會主義者的來臨更為壯大起來，這些德國人是在一八七八年十月後因本國通過了反社會主義的非常法令而被迫從德國逃亡出來的。

不久，社會主義革命黨俱樂部便在紐約、波士頓、費列得爾菲亞、密爾窩基和芝加哥等地出現了，組成這些俱樂部的乃是那些已加入社會主義勞工黨的或新近從德國來的外籍工人。這些新的組織最後則聯合起來共同組成了革命社會主義黨。該黨在其一八八一年的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政綱中主張依據“共產主義的”原則組織工會，並聲稱，只有那些“進步”性的工會才能得到該黨的幫助。該政綱同時攻擊選舉制度為“資產階級用來愚弄工人的一種詭計”，並建議只有為了一種目的時，可以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那便

* 早在一八七五年，芝加哥的一些德籍社會主義者即曾組織了一個後來被稱為“智勇社”的武裝組織。一八七七年的大罷工中，警察、國民兵和美國陸軍部隊對工人進行攻擊的結果，乃使該社所發起的這一運動更為發展起來了。雖然這種武裝組織中大部分的成員是社會主義勞工黨的黨員，但該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却否認這種組織，認為它們將使人錯誤地了解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與政策。一八七八年，該黨命令所有社會主義勞工黨的黨員脫離這種組織，但這個命令卻引起了芝加哥社會黨人的憤恨，因而更加深了黨內的分裂。（見摩里斯·希耳奎特：“美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一九一二年紐約版，第二一三頁；又沙托瑞阿斯·瓦爾特蕭遜：“美國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一八九〇年柏林版，第一五八——一六〇頁；又見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八〇——二八一頁。）

是向工人證明“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以及要想通過選舉來改造社會是完全徒勞的”，和資本主義制度作戰所應採取的主要武器，乃是“工人的武裝組織，這些工人將隨時拿着槍準備抵抗任何侵犯他們權利的行為……”^④。

美國工人中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是極少的。那些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人主要是一些有階級覺悟的英勇的工會運動者，這些人因為看到使用政府軍隊和地方警察以鎮壓罷工的情況日益加劇，看到政治界普遍的貪污腐化現象，以及勞工候選人即使當選後也不能得到職位等等情況，對於選票的效用便完全失去了信心。

一八八〇年的選舉後，社會主義運動已分裂成好幾派。其中一派力圖重建那已殘破不堪的社會主義勞工黨。又一派則在一八八二年從英格蘭到美國來的尤杭·莫斯特的領導下在紐約及其他東部城市中發展一種純無政府主義的運動。在芝加哥那邊及其他中西部的各城市中，由阿伯特·派生斯和奧格斯特·司派士領導着一個溶和工會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一派；而在落磯山脈與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勞工運動中，一個憎恨自己的職業的律師伯恩勒特·海斯克爾和一位勞動者協會的領導人約瑟夫·布加南則在那里建議以行動來作宣傳，並強調以教育和工會運動作為手段，來實現“一個新世界將從而誕生的全面革命運動”。而另有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的一派却正在開始發展對於美國工人階級的前途將有極大影響的一些純而又純的工會主義——美國勞工聯盟的“新工會主義”。

第二十五章

近代劳工运动的开端 (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年)

在七十年代長期不景气时期中，許多工業部門中的工会都失去了一大部分會員，但是工会运动却始終沒有一个时期被完全消滅过。“鑄工日报”曾提醒雇主們說，尽管劳工运动已經衰頹下去，但那“反抗欺凌的精神，也就是工会主义的精神，在劳工还可能受到个人或法律的欺凌的时候是永远也不会消滅的”^①。

工会运动的复兴

一八七八年年中，商業已開始逐漸复兴，一年之后，工業上的恢复在全國極大部分的地区中也正在積極進行着。在此后數年間，由于托辣斯机构和壟断企業將整个國家的經濟生活愈來愈集中地掌握到它們手中，卡勒基、洛克斐勒、高尔德和摩根等豪門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但工業复兴並沒有自动地給工人帶來較高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和較好的工作条件。由于有組織的工人斗争的結果，本世紀初期普遍实行的每日十四小时和十五小时的工作時間已有所縮短。在極少的例子中，也有一些工人在八十年代的初期竟曾獲得八小时工作日的实现，但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和在六十年代期間一样，离开八小时工作制还远得很。大多数新英格蘭的紡織工人，在一八八三年时一般的工作日仍略多于十小时。

同年，面包工人每周工作時間为八十到一百二十小时；有組織的雪茄工人每周工作時間为五十五到六十小时；無組織的雪茄工人每周工作時間为六十六到九十小时，而大部分在各城市中心工作的運輸工人之每周工作時間則为九十到一百小时^②。

美國与加拿大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塞米尔·岡伯斯估計一八八三年的工資較一八七〇年为低。以紐約、麻薩諸塞、俄亥俄、宾夕法尼亞及伊利諾这五个最重要的工業州論，岡伯斯肯定說，每一个產業工人的每年平均工資尚不及四百元^③。这一时期所搜集的关于工資數目的統計材料并不与岡伯斯的估計完全符合，但这些材料仍可以补充他所作的結論，就是說有相当大一个數目的美國工人是生活在貧困中的。一八八三年时，一个工人階級的家庭每年平均生活費用据估計为七五四·四二元，而一个工人的平均收入却只有五五八·六八元^④。

度过了七十年代不景气时期的那些工会組織，形成了近代劳工运动的基礎。一八八〇年时，共有十八个全國性的工会存在着，其中有一半是在危机前成立的。从一八七九年开始，砌磚工人等四个工会會員增加的情况如下^⑤：

	1880年	1881年	1882年	1883年
砌磚工人	303	1,558	6,848	9,193
印刷工人	6,520	7,931	10,439	12,273
雪茄工人	4,409	12,000	11,430	13,214
木工及裝配工		2,042	3,780	3,293

和全國性工会會員人數的增加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是一八七九年以后市中心組織在每一个重要工業中心地区的建立。一八八〇年九月所寫的一篇報告說，“在一切重要城市中，各个工

会組織都以中心联合会或工会协会的形式联合起来以便彼此互助。”^⑥少数的一些工会协会已使自己的組織遍及一个郡的全部地区，如新澤西州的厄塞克司、帕舍易克郡及宾夕法尼亞州的阿利根尼郡等的工会协会即是如此。建筑業的地方中心联合会也在少数的几个城市中組織起来，紐約的联合会共包括有二十五个工会組織。另外还有一种城市联合会的組織便是在紐約、芝加哥、密尔窩基、聖路易和其他德籍工人階級人数众多的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德籍工会联合会^⑦。

德籍工会联合会是和社会主义劳工党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它一贯支持該党的竞选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并协助推銷社会主义的报纸。但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会联合会的影响却并不僅限于德籍工人的中心組織。許多工会协会都是由社会主义的工会运动者組織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劳工党公报”在一八八〇年九月时说，全国各地市中心劳工組織的建立，“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完成的，他們影响着，甚至在某些地区更控制着这些联合組織，而他們在所有这些組織中都相当受到尊敬”云云，实在并非誇張其詞。魯新·塞尼尔是社会主义劳工党在紐約的領導人，他在一八七九年九月所寫的一段話也更無半点虛構之处：

“我們敢于說，如果我們的人，那些社会主义者，作为他們各自所屬的工会中的積極的會員，沒有灌輸給这些組織以那种它們有时会强烈地表現出來的生命和精神，那美國許多最大的城市中的工会运动……真可能会还微弱得很。”^⑧

-
- 下面这封由过去是拉薩尔派的社会主义者而現在已是一个坚决的工会派的社会主义者的麥克基尔寫給社会主义劳工党領袖 菲利浦·凡·派登的信，生动地說明了塞尼耳的觀點并且讓我們看到了全國木工工会的根源。这一封信

新奧爾良、加爾維斯敦、胡斯吞和塞凡那等城市的工會協會，也完全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影響才開始允許黑色工人的工會在其與其他工會不等的基礎上參加到協會中來。在以上這些城市中，碼頭工人工會、馬車工人工會、鐵路調車工人工會、棉花分級工人和標號工人工會、過磅工人工會、過磅員與復核員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和機場工人工會，都組織了全市性的黑色工人和白色工人均可參加的聯合機構。這種在南部的各工會協會和水濱的各聯合組織中所採行的民主政策，對於打破白色工人和黑色工人之間的敵視心理是有相當大的作用的。一八八三年十一月，新奧爾良各業勞工協會所屬各工會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運動。參加遊行的工人在一萬人左右，代表着各種國籍、各種膚色和各種行業的工人。這個示威遊行是如此成功，因而在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五年更兩度重複舉行^⑨。

各工會聯合會在完成僱主與罷工工會之間的協商和實行商品

是在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五日由聖路易發出的：“我們木工們的這次罷工得到了光榮的勝利。這次罷工是由李布凱特和我兩人布置的。我終能使得李布凱特在這次運動中工作得很積極。我們已使我們的每日工資提高到了三元，經過兩個星期的罷工後，我們現在只有八十二個人還在罷工狀態中，而在一個星期前的今天，罷工的人數是在八百名以上的。下個星期一我們也要復工了。我們給了他們兩個星期的津貼讓他們支持下去，那些木工們為我們什麼都肯干。上個星期天我們開了一個有一千以上的木工參加的群眾大會。在聖路易從來沒有開過比這個會議更大的工會大會……我們為我們的工會得到了許多新會員。昨天晚上在東聖路易組織了一個有七十個會員的木工工會。我接到從各個城市寄來的信，要我告訴他們一些情況，並且要我組織一個全國木工工會。我一定要這樣做。”（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社會主義勞工黨通訊集手稿”，同時參看“社會主義勞工黨通訊集”中基哈德·塞格爾、費茲派特立克及羅伯特·威爾遜等人於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一日、一八八〇年六月二日、十二月四日致菲利浦·凡·派登的信。）

抵制运动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它们全部在政治战线上非常活跃，有些是采取独立的政治活动，另一些则是争取通过劳工法令。这里我们且引一个例子：一八八二年旧金山工会协会曾设立一立法委员会以便提出劳工法案，征询竞选政府职位的候选人们的意见，以及到本州都城去在议员中为劳工法案进行活动。委员会把要向各候选人提出的问题制成一张表，其中包括了有关雇主对工人安全的责任、工厂检查制度、邮政储蓄银行、铁路国有制、自由选定教科书、每周发薪制以及废除童工等等的問題。它号召工会会员只支持那些对这一问题表示给以满意答复的候选人^⑩。

工会协会经常可以通过它们的政治活动阻止州议会通过反劳工的法案，而强制它们通过有组织的工人所提出的法案。这样，有好几个工会协会成功地阻止了反劳工的图谋不轨法案的通过，而另有很多在争取成立劳工统计局和争取实施某些劳工法案的运动中也都得到了成功。

也许各工会协会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活动要算它们在各所属范围内的工人群众中所进行的组织运动。通过旧金山工会协会的努力，下述这些行业的工人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便都已组织起来了：小工、制模工人、制锅爐工人、翻砂厂中的普通劳工、机工、啤酒瓶洗刷工人、裁衣工人、金属屋顶装建工人和檐板制造工人、马车工人和拉煤工人、铁工、背包和书包制造工人、搬家工人、箍桶工人、铸铜工人和铜器精制工人、船板油漆工人、铅管和煤气管装配工人、大理石切割工人、精漆工人、大理石磨琢工人、制梯工人、码头建筑工人、钟表制造工人、油漆工人和行李搬运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会协会也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成就^⑪。

在许多地方性工会还没有和它们的全国性组织取得联系而又

还没有一个有力的全國勞工聯合機構出現的時候，各工會協會乃以聯合各地方工會的活動建立了勞工間的團結，並保證了許多為了組織工人階級，為了爭取較好的生活水平和為了實現某些勞工法案而進行的運動的勝利。

國際勞工會

各工會協會的活動儘管很重要，而它們絕大部分的工作都限制在技術工人的圈子中。同時組織非技術工人以及技術工人的工作，在這一時期中是由另外的兩個組織擔任着的，那就是國際勞工會與勞工協會。國際勞工會存在的期間雖然僅只有五年，到一八八二年間便已消滅，但從它所代表的方面，它所打算完成的工作來看，這一組織是仍有其極大的重要性的。它代表着第一個要將所有的非技術工人組織在一個工會中的巨大的努力，它並且還要和技術工人的工會聯合起來以實現一個不分國籍、性別、種族、信仰、膚色和宗教的全國勞工大團結。

國際勞工會是在一八七八年年初組織起來的。它是從過去的一些國際工會和八小時工作運動的領袖們在那時建立起來的一個聯合陣綫中發展出來的。由於深惡拉薩爾“政治派”的美國工人黨的專橫，左爾格、麥克唐奈爾、杜埃及約瑟夫·衛登麥爾的兒子奧托·衛登麥爾乃和伊拉·史都華、喬治·麥克尼爾以及喬治·幹頓聯合起來，環繞着“縮短工時和提高工資”這一口號，進行了為實現當前要求的運動。他們的策略是建立一個以消滅工資制度為目的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組織。

在一八七八年年初舉行的一次大會上，麥克唐奈爾和喬治·麥克尼爾組織了一個國際勞工會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共包括了十八個

州的代表。委員中有：芝加哥的阿伯特·派生斯和乔治·施依灵、匹兹堡的奥托·衛登麥尔、新澤西州荷波肯的左尔格和麻薩諸塞州的乔治·幹頓和伊拉·史都華。臨時中央委員會休會期間由十七人執行委員會代行職權；執委會的主席則為乔治·麥克尼爾。中央委員會起草了一個“原則宣言”，而這個政綱表現了聯合起來組成這一機構的兩個集團的彼此讓步^⑫。其中有關原則和最後目標的一部分是這個聯合組織中史都華一派的主張。它宣稱：

“工資制度是一種專制暴政，在這個制度之下，拿工資的工人被迫按照僱主所定的價格和條件出售他們的勞動力……。既然世界上的財富是通過工資制度來分配的，那末要實現更合理的分配，就必須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多的工作機會，直到工資所代表的是勞工所應得的報酬而不僅是他們的生活必需時為止；這樣去消滅利潤，拿合作社或勞工自我僱用的辦法作為由工資奴隸制到達自由勞工制的自然的和必然的步驟……。走向勞工解放的第一步是縮短工作時間，而縮短勞工工作時間所產生出來的更多的閑暇就將對於影響人民生活的自然根源發生作用，擴大慾望，刺激野心，提倡勤勞和增加工資……。”

政綱中關於要求的一部分則是臨時委員會中兩個派別共同的主張：

“因此我們彼此同意共同組織一個稱為國際勞工會臨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會，它的目的則是要爭取實現以下各項要求：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建立對工廠、礦區和工作間的檢查制度；廢除合同囚犯勞動和實物工資制；僱主應對因對機器失於檢查而發生的事故負責；禁止僱用童工；建立勞工局；勞

工得利用勞工報紙、勞工講習會及雇用一般組織工作人員的辦法進行有關勞工問題的宣傳，以及最後消滅工資制度……。”

策略方面則顯然是受着左爾格、麥克唐奈爾以及臨時委員會中其他一些從前的國際工人協會會員們的影響的：

“我們所建議的用以達到上述目的的方法是：

“第一，組織一個各業勞工聯合會，以使屬於任何行業的工人都可以在一個中心的領導下團結起來，而成為工會聯合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籌集一筆用於救濟和自衛活動的總基金。

“第三，將所有的工人都組織到他們各自的工會中去，並在沒有工會的地方，創立這種工會。

“第四，成立全國和國際的工會聯合組織。”^⑬

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會接受政綱中有關原則和最後目標的那一部分。決無問題，左爾格和他的同志們決沒有幻想通過八小時工作日就可以自然地消滅工資制度。他們決不像史都華一樣相信資本家會在他們的利潤由於八小時工作日的實行而被吸收到工人的工資中去之後，就立即自願放棄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而把他們的工廠移交給工人。但馬克思主義者和那些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的領袖們，對於這個政綱中的兩個主要的觀點是同意的：工資制度是一種專制暴政，而“走向勞工解放的第一步是縮短工作時間”。

左爾格和他的同志們所以願意讓步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史都華所領導的八小時工作制運動是“幣制改革的烏煙瘴氣的沙漠中的一個綠洲”。此外，馬克思主義者更相信國際勞工會的建立是可以

使大部分美國工人，包括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全部組織到工会中去，并使他們能通过工会的各种斗争更清楚地看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⑭。

國際劳工会的目的是組織一个群众性的劳工組織。該会主席麥克尼尔曾說，“國際劳工会提出了一个使無組織的群众和地方工会彼此联合起來的計劃。”它的目的，麥克尼尔說，是要“在犹太人、希臘人、爱尔兰人、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和其他各种國籍的人中間建立一种偉大的弟兄般的劳工团结”。通过这种組織，工会將“被鼓舞起新的和更坚强的生命力”，而在該組織中各种不同國籍、信仰和膚色的工人都將联合在一起，“直到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时为止”^⑮。阿道夫·杜埃对麥克尼尔的这些談話深表嘉許，他并且強調國際劳工会的这些原則在南部的黑色工人中尤为需要：

“南部的黑色人口实应得到我們最友善、最周到的关怀。他們几乎是那里所唯一有的劳动人民。而他們除極少的例外全都不过是工資奴隸而已。如不將他們組織到我們的隊伍中來，則这个國家中將有一半人口始終会对我們的运动抱着敌視或不关心的态度。只要讓他們开始了解我們——在巴尔的摩、華盛頓、路易斯維、聖路易以及任何其他我們的工会組織正發展着的地方——所進行的活动的目的，我們就可以完成一种用其他任何方法所不能完成的工作。我們就可能为他們解开他們的白色雇主所加在他們身上的束縛。”^⑯

虽然这个运动的發起人原意是要使它成为一个將美國所有非技術工人都团结起來的組織*，但在國際劳工会中占絕對优势的

• 國際劳工会总書記卡尔·斯塔叶在該会已成立的兩年后寫道：“國際劳工会的目的，主要是組織非技術工人，即那些常常变成技工的危險的競爭者的工人。

却是女工占多数的紡織工人。不景气时期紡織工業中工人工資的一再降低以及工作日的過長，使得這些工人早已有組織起來的要求。因此，當麥克尼爾、麥克唐奈爾、幹頓和國際勞工會中其他的領導人們將這一進行組織的消息帶到紡織工人中來之後，自維爾蒙州直至新澤西州間的每一個紡織業中心立即有無數工會組織涌現出來，罷工運動也隨即跟着開始了。這些罷工，有許多是自發性的，更有一些是由其他的組織領導進行的，但它們却都曾受到國際勞工會的影響。

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紡織工人在新澤西州的帕特遜和帕舍易克，在紐約州的克林頓和柯荷茲，在福爾河以及在其他的城市中所舉行的各次大罷工已表明了國際勞工會在它的短暫而光輝的一段存在時期中所建立起來的勞工大團結。一八八〇年紐約州柯荷茲城的罷工獲得完全的勝利，罷工工人使自己的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並獲得了五十分鐘的吃飯時間。參加罷工的工人在五千名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是國際勞工會的會員^①。

一八七八年與一八七九年間，國際勞工會領導在福爾河舉行的一次罷工，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罷工運動之一。該地的分會在罷工前的幾個月中即進行着細密的準備工作，當這一要求增加工資和實行九小時工作日的罷工運動開始時，已有五千多工人參加了這個組織。一八七八年五月八日，在罷工正進行時期中，有二萬五千個工人參加了由國際勞工會主持的一次示威運動，他們作為

因此，國際勞工會的存在是有利於各工會組織的，而各工會組織也因此完全同情我們，並盡它們的力量給我們一些幫助。如果在各工會把國際勞工會看成為它們的伙伴時，吸收技工來加入我們的組織，那將會是我們干犯它們的活動了。（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國際勞工會文件手稿”。）

他們的口号提出：

“我們要求較少的工作和較多的工資。我們要求一天工作九小時。我們要求中午有一小時的休息。我們要求這一切并要求立即實現這一切。和平！這裡沒有和平！在我們被扣除的百分之十五的工資恢復以前永不可能有和平！團結就是力量！趕快參加國際勞工會。”^⑮

可是多次罷工失敗的結果使得國際勞工會的會員人數迅速下降。到一八八〇年二月，該組織全部會員人數已不滿一千五百人，一年後則全部瓦解。一八八一年時，該會僅在左爾格所居住的新澤西州的荷波肯還剩有一個分會*。一八八三年，左爾格乃將該分會改組為荷波肯國際勞工會以“團結國際勞工會會員共同協助新澤西州的工會組織實現有利于勞工的各種法令”^⑯。四年後，左爾格離開荷波肯到紐約州的羅徹斯特去，該分會乃亦隨即解体。

國際勞工會的會員人數從來沒有一個時期超出過八千人，但很多時候都有約近此數的工人在短期內屬於這一組織并為它的各種原則所影響。這些工人則要把他們的勞工團結和階級覺悟的觀念帶到勞工協會的組織中去。

勞工協會

在內戰剛結束以後，勞工協會並不算是勞工運動中的一個重

-
- 一八八〇年二月，卡爾·斯培叶曾列舉該組織的分會如下：內布拉斯加州的俄麻哈(英語工人分會)；賓夕法尼亞州的康索布拉夫(英語工人分會)；密蘇里州的聖路易(英語工人分會)；伊利諾州的卡特維爾(英語工人分會)；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德語工人分會)；新澤西州的荷波肯(德語工人分會)；新澤西州的伯特遜(英語工人分會)；新澤西州的伯特遜(絲織工人第十四號分會)。(見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國際勞工會文件手稿”。)

要力量。直到不景气現象出現的那几年，它才开始在各方面發揮它的影响。一八七三年末，該會曾努力要使現存的各地方協會彼此联接起來。于是第一号地方協會乃向其他各協會發出通知，要它們选派代表出席一个筹备成立一个区協會的代表會。这次大會的結果，第一号区協會終於在費列得尔菲亞成立起來，該区協會共包括三十一个地方協會，該會原有的各种儀節也正式寫成了明文。在建立了这样一个永久性的中心組織之后，一直來僅限于費列得尔菲亞一地的勞工協會乃开始向新澤西州及宾夕法尼亞州的西部發展。一八七五年初，“全國勞工論壇報”告訴它的讀者說，“協會現正向西部前進中。”不久后，該報更宣稱：“这一秘密的勞工會已在我國工人羣眾中有了深厚的基礎……。像高漲中的潮水一樣，它寧靜地向四面延展着……。它是即將到來的勞工救星……。这里，門是向每一个善良的人打开着的，他們在这里將受到勞動弟兄們的兄弟般的歡迎，而這些弟兄們是以勞工的得救當成為自己的宗教信仰的。”^{②①}

一八七四年第二号区協會在新澤西州的加木登建立起來，一八七五年八月，在匹茲堡更組織了第三号区協會。从这个中心出發，組織工作者漸深入到四周的区域中去，西弗吉尼亞也被包括在他們的活動範圍中。

該會在這几年中的發展情況是很不平衡的。一群一群的工人很快加入進來，但在看到這一組織很少作要求增加工資的努力時又很快地退出去了。新會員大部分來自從未加入過全國性工會的一些獨立的地方工會或那些在不景气時期已經瓦解了的全國工會的地方組織。如全國礦工協會、機械工與鐵工全國工會以及制鞋工人協會等所屬的一些巨大的地方工會都曾時而加入該會時而又

退出去。該会兼收各种会员的精神对于一向总是以各不同工业部门为组织基础的采矿业来说实是正合其需要的，而該会早期的那种秘密性则使得矿工们在一八七五年的“长期罢工”失败后仍能继续进行劳工运动^①。

因为劳工协会并没有一定的纲领(一八七八年以前如此)、会章、或“原则宣言”，該会的组织工作者——会中称之为教习——乃可以向工人们保证说，加入该组织后，他们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自然，当这些保证结果落空时，工人们便会失望地离去。而因此，也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一种要求，即建立一个能够“结束目前的混乱状态，联结該会散在各处的各个单位并沿着明确的、协调的路线领导这一运动”的全國組織^②。

秘密问题是使該会内部的领导逐渐走向集中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各商业报纸急切地要把一切秘密的劳工组织都说成和莫利马乖雅分子有关，它们并已在喊叫着说，劳工协会，“莫利会”组织的一部分，现已正在阴谋推翻美国政府。此外，天主教教堂也明白表示仇视一切秘密会社，而特别是那些规定有一套一定的仪节和誓辞的会社，因为这些东西是可能和自白悔罪的原则相违背的。劳工协会最初是由新教徒们创建起来的，但当它发展到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区以后，它已经吸收了很多天主教会员。该区各郡的教士们对于劳工协会所抱的仇视态度颇有影响于該会的发展，同时也很快就使秘密问题成了一个必需重新加以考虑的问题了^③。

当上述的一八七六年的匹兹堡大会结果并没有能够团结现存的各劳工组织并创建一个巩固的全國性组织的时候，协会会员们乃决定要建立一个专属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全國机构。由第一号区协会为此目的而召集的一次代表会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在费列得尔

菲亞舉行。出席該會的代表共三十五人，其中二十二來自費列得爾菲亞和勒定。匹茲堡方面，則因認為協會的真正中心應是匹茲堡而不是費列得爾菲亞，竟沒有派代表出席。這次會議根本沒有提到改變協會政策——包括秘密問題在內——的問題，而只通過了一個全國性組織的會章，並定這一全國組織的對外名稱為美國勞工同盟會。這一全國組織有權掌握該會的秘密儀節，並可以在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後對它加以修改。其他的一切權利則仍屬各區協會。

另一由第三號區協會召集而僅只有該區協會所屬單位參加的代表會，於一八七七年五月在匹茲堡舉行。這一會議所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動是它發表通告說，協會的名稱和目標必須完全公開，並規定新的天主教會員，“如果他自己認為必要”，亦可以在他的神父面前自白悔罪^②。

一八七七年的大罷工證明勞工協會實有實行集中領導的必要。協會會員都是以個人身分參加這次罷工的，而泰倫斯·泡德利却堅持說協會這一組織所唯一發生的影響是建議力求穩健，建議採取和平手段並避免與急進分子發生聯繫。當罷工開始後參加勞工協會的工人愈來愈多時，對於集中領導的需要也就更為增強了。到一八七七年年底以前，更有十個新的區協會成立起來，那就是說總共已達到十四個。同時，協會現在已擴展到了紐約、麻薩諸塞、西弗吉尼亞、俄亥俄、伊利諾、印第安納以至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各州。

第一號區協會在第三號區協會的同意下，發出了一個號召，決定於一八七八年一月一日在賓夕法尼亞的勒定舉行一次代表會“以便建立一中央協會……也同時為了創建中央鬥爭基金委員會、統計局以及專為組織工作用的籌款機構，並成立一會務登記科以

便登記每一协会會議的次數及地點等等。同時也為了向外宣布本會名稱……”^⑤。

勒定會議給劳工协会建立了一個具有全國形式的中央組織，通過了若干原則；這些原則，在略加改變後，也同時便是該會在其整個存在時期中所一直採用的會章。它喚醒大家注意“大資本家和各大公司的驚人的發展和進攻，(這種情況)如不加以制止，必將會造成勞苦大眾的極端貧困和絕望的屈辱”。如果工人們要想“享受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們就必須要“制止……那不合理的財富積累和那已聯合起來的資本勢力的罪惡權力”。而這件是只有在工人們組織起來後才能做到的。劳工协会的目標是要“把生產性的工業中的每一部門都包容到組織中來”，並“求得使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從他所創造的財富中得到適當的一份”。

該會政綱主張：建立劳工統計局，建立生產與分配合作社，公共土地只分配給真正的墾植者，按周付給工人工資，規定技工的財產留置權，廢除公共事業的包工制度，調解劳工糾紛，通過法令保障采礦業、製造業與建築工業中工人的健康與安全，公司正式承認工會組織，禁止雇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禁止運入外國合同勞工，由政府建立“直接向人民發行，不容任何銀行公司居間，且在償付一切公私債務時均為法定貨幣的”全國統一幣制，由政府組織郵政儲蓄銀行，由政府占有“一切電報、電話及鐵路事業”，最後，“將工作時數減至每日八小時，以使一切勞動者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享受社交方面的幸福及增進自己的知識，並使他們能享受到由他們的智力所創造出來的節省勞力的機器所給人類帶來的福利”。

劳工协会的總綱和不景氣時期組織起來的工業兄弟會的總綱

和綱領是極其近似的。罷工行為被認為是極不幸的事，該總綱更聲稱，綱領中所列目標的絕大部分“只有通過立法制度始能實現”。協會分子認為壟斷資本是一種罪惡並要將它消滅。而消滅的辦法，他們則認為是要通過政府對於鐵道、電報、電訊事業的占有以及廢除私有銀行制度而代之以郵政儲蓄銀行²⁶。在以合作社制度全部代替工資制度以前，向壟斷資本發展的必然趨向是無法遏止的。因此協會就必須是一種“依靠它以求在一定的時間內使世界工人從公司暴虐統治及工資制度下獲得經濟及工業解放”的工具²⁶。

協會的綱領，儘管頗表現出一些思想上的混亂，它終於提出了一個要將全部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並消滅“工資奴隸制”的計劃。然而，該會的組織形式和它所採用的方法却都不適合於用來實現這些目標，而常常更會是有害於其他某些特殊要求的實現的。

勒定會議所通過的會章使一個稱為“北美勞工協會總會”的全國機構正式成立起來，在總會的年會上，由各區協會及獨立的地方協會派來的代表們共同選舉總會職員及決定一切有關總政策的問題。總會對於整個組織有“充分的及最高的控制權”。只有總會有權制訂、修改及廢除本會的規定和章則，解決內部發生的一切爭端及頒發一切執照、旅行證、轉移證及會員證等。它同時有權向會員徵費以維持本會經費²⁷。

從會章來看，勞工協會似乎有一個高度集中的組織形式，但實際上各地方協會及區協會實在都是一些獨立自主的機構，各按自己的意思進行活動。通常，總會負責人員僅在為各全國工會、地方協會及區協會所迫時才開始一些活動。集中領導實是有名無實的²⁸。

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不统一，基本上是从领导与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产生出来的。当会员群众已看到通过罢工和商品抵制，他们可以实现某些重要的劳工利益的时候，领导方面却极力强调罢工是徒劳的事并争辩说，只有通过自我雇用的办法，才能获得永久的胜利。罢工是不能解决劳工问题的，泰伦斯·泡德利曾于一八八二年时说道，因为“罢工不能改变雇用制度，罢工不能消除司法机构的不公正的特性，同时罢工也不能调节供求法则，因为在它减少供给量的时候，它同时也由于使得很多消费者失业，压低了他们的购买力而减少了需要量”^{②9}。同年，总会秘书罗伯特·雷顿更欣然写道：“对于罢工这个问题，我已经尽了我的一份责任。不久前，我曾向我自己和总会中的职员们作下一个诺言，那就是，要在罢工的肚子附近甚么地方沉重地给它一拳。我想如果强有力的（虽然粗些）言辞能够根除，或帮助推翻它在我们的协会中的魔鬼般的统治，那我个人在这方面已经略有一点贡献了。”^{③0} 从一八七九年开始继斯蒂芬斯任协会工会总会长职务的泡德利和雷顿两人都经常号召协会会员安于工作，并将应用于罢工运动的基金拿去创办合作社。七十年代各次罢工运动的失败乃更使劳工协会的领导人决定，除作为最后的武器外，一律反对罢工。

在一八七八年协会总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曾有一笔款子被划出来专作为罢工时期“斗争基金”之用。两年后，总会却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以该基金的百分之十用作教育费，百分之六十用于创办合作事业，而仅以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作为罢工之用。这次会议也拟出了一个罢工计划大纲。第一步是由发生罢工问题的地方协会选出一个调解委员会。如果这一委员会不能解决问题，则由该地方协会所属的区协会委派出一个区调解委员会。如果争端仍不能

解決，則由最鄰近的兩個區協會各派一人，本區協會亦派一人組織另一個委員會。但如果這一委員會仍不能收調解之功，則可以將全部糾紛始末報告執行委員會，工會總會長及總會秘書，由他們作最後決定。總會規定：“任何罷工，如未經這一總會諸負責人之聯合機構批准并與以正式命令而擅自進行者，均不得由本會之罷工基金中獲得任何支持。”^① 勞工協會的領導方面希望利用這種使一切罷工幾乎全都不能得到經濟上的援助的規定，將會員群眾的思想轉向合作社計劃與調解政策。但會員們却懂得如果不利用罷工行動，他們的一切爭取改善生活條件的努力是都不會有結果的。

在主張維持組織的秘密性最力的尤利亞·斯蒂芬斯于一八七九年九月*辭去工會總會長職務後不久，協會便變成為一個公開的組織了。工會總會長和總會秘書曾由一八八一年的大會授權，使于一八八二年一月一日向美國工人發一通告，宣布協會的存在以及該會的宗旨。這一次大會更取消了入會宣誓時的誓辭而代之以一種極簡單的諾言，并議決刪除了關於儀節規定中的一些唯心的辭句和字眼^②。

泡德利却並沒有發布這一通告，因為他說，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該會的存在，明白該會的宗旨。協會的真正發展是從一八八一年的底特律會議開始的，那時這一組織的秘密性雖已決定取消，但

* 一八七八年，斯蒂芬斯曾由綠背一勞工黨提名為賓夕法尼亞第五區國會議員候選人。他乃辭去勞工協會的工會總會長職務，以便以全部時間進行選舉活動。選舉失敗後他曾再度當選為工會總會長，但于一八七九年又行辭職，他解釋說，“私人的事和經濟問題都不容許我再留在芝加哥了。同時我覺得我已經不能再承當這一重擔。現在是必須把它放在別人的肩頭上去了”。（見“一八七九年勞工協會總會議事錄”；又泡德利：“勞工三十年”，第六二九頁。）

其各种秘密仪節却仍被繼續采用。一八七八年，該会共有會員九，二八七人；一八七九年，二〇，一五一人；一八八〇年，二八，一三六八人；至一八八三年时則已有五一，九一四人。但該会發展最快的一个时期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在这一时期中，新入会會員达六〇〇，〇〇〇人以上*。

一八八三年二月，罗伯特·雷頓在調查劳資关系的一國會委員會中作証时曾說，协会會員已遍及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俄亥俄、宾夕法尼亞、紐約、加利福利亞及加拿大等地。他說，任何年在十八歲以上的人，只要他是“为了工資在進行工作，或曾一度为工資而工作过”，均可成为协会会员。但“任何出賣酒类或依靠出賣酒类为生的人均不能入会，律师、医生、銀行家亦均不得入会”。有人問他，那是不是說制造商人却可以参加作會員呢？他回答說，“是的，制造商也可以加入”，但每一地方协会的“組成人数絕不能少于十人，而其中四分之三必須为工資工人”⁽³³⁾。劳工协会的領導人們既然公开宣称劳資利益一致，雇主可以作會員这件事当然也沒有

- 一八八〇年五月时，劳工协会共有区协会三十八个（其中有七个無实际活动）和地方协会八百六十八个。区协会分布于下列各地：在宾夕法尼亞州者八，新澤西州一，西弗吉尼亞州四，俄亥俄州三，伊利諾州四，印第安納州一，紐約州一，密苏里州一，肯塔基州二，馬里蘭州一，爱俄華州一，阿拉巴馬州二，麻薩諸塞州一及科罗拉多州一。

地方协会則为：在阿拉巴馬州者十九，加利福尼亞州二，康涅狄克州二，科罗拉多州十七，德拉瓦尔州五，乔治亞州一，伊利諾州五十八，印第安区一，印第安納州二十三，爱俄華州十三，堪薩斯州十五，肯塔基州三十六，明尼苏达州二，麻薩諸塞州十一，馬里蘭州十八，密苏里州三十五，密西根州二，紐約州二十三，新澤西州五十六，俄亥俄州五十一，昂特瑞俄州一，奧勒岡州十二，宾夕法尼亞州三百九十六，怀俄明区一，西弗吉尼亞州六十七；及威士康辛州一。（見一八八〇年五月十五日“联合劳工报”。）

什么奇怪了。

劳工协会在工会失败的地方組織分会的工作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有些行業工人人数过少，不能单独維持一个工会的存在，而劳工协会这种混合性的組織却可以代表任何行業。在許多地方，特别是在農村中，一个地方协会成立起來时，它所代表的職業种类的数目几乎和它的會員人数一样多。这种混合性的機構更極適合于組織半技術工人、無技術工人和零工*。在八十年代期間，劳工协会开始号召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一类的工人，因为工会是不組織他們的。协会的偉大口号：“一人受苦全体分憂”，更打动了全國無數工人的心^④。

一八八〇年八月十五日，“联合劳工报”驕傲地指出一个事实說，許多协会組織中現已均有黑人會員，而他們“在忠于自己的職責、嚴守會議制度、迅速交付會費、行为正当以及在其他一切作为一个好會員和好公民所必須具備的条件方面……均为本会任何其他种人所不及”**。該报宣称，該会在这方面的發展，和工会总会長一八七九年九月的總結報告中所提出的劳工协会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符的，这一報告曾說：“一个願入会的人的（外表的）顏色决不能妨碍他的入会；而他的頭腦和心地的顏色倒是需得考察的。”

• “單一行業的工会組織所曾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便是在一行業所雇用的工人人数不足成立自己的地方工会的地区去組織分散的工人。但在“劳工协会的系統下就决沒有这种困难，因為他們可以参加混合性的地方协会，而仍可以使任何行業在一个負責人的領導下全面地組織起來。”（見一八八三年七月“联合劳工报”，第五二〇頁。）

•• 协会的总秘書約翰·海依斯估計，在一八八六年时，劳工协会共有黑人會員不下六万人。（見斯諦尔林·斯佩若与阿伯仁·哈立斯：“黑色工人：黑人与劳工运动”，一九三一年紐約版，第四二頁。）

該報結論說，“如果我們僅以膚色或信仰為理由，排斥任何一個依靠正當勞動為生的人，那我們就違反了我們協會的一切原則。我們的綱領是廣泛得可以包容所有的人的。”

雖然協會會員們認為“工業的發展已超出了工會組織賴以為基礎的技術工人時期的階段”^⑤，但協會仍承認熟練工人有其特殊問題，並曾有一時期力圖要解決那些問題。協會分子對於工會問題所發表的第一個正式的意見是，由工會總會長斯蒂芬斯在一八七九年一月協會總會第二屆代表會上提出的。他號召向美國大陸上的一切行業工會發出通告，指出“孤立無援的努力或會社組織的缺點及惡果，以及那種由此而產生的無意義的、毀滅性的競爭現象，這種現象對於它們自己以及對於其他的一切人都是毫無好處的”。他建議提醒各工會組織，讓它們明了“與我們的這一偉大的兄弟般的同盟相結合、相聯系的利益”，並建議“為使一切勞工組織團結成為一個偉大的堅強的團體”作一番特別努力^⑥。

大會於是通過一項決議，規定“全國各地任何已以行業為單位組織起來的行業均可自行選出一行政幹事，他可以同時是他們自己的組織中的負責人，以在各該行業中組織地方協會，並使之從屬於統轄該行業的區協會”^⑦。這類區協會實際就是全國性的行業工會，它們可以有自己的負責人並可以自己單獨召開代表會。但到了一八七九年九月，下一屆的代表大會上，一個與此完全相反的對待工會問題的政策卻被提出來了。在這次總會的代表大會上，人們卻聽到協會的領導人說，“我們決不應把我們的時間或金錢浪費於罷工運動或單獨組織某一行業或職業的活動。在這些方面我們所能獲得的利益只能是局部的和暫時的……。我們的第一職責是使從事生產活動的一切勞工團結成為一個堅固的整體。”* 關於勞

工問題做出了兩種不同的決議案。一種決議說，“建立以一種行業為基礎並專為該行業的利益進行活動的地方會，實與本協會最初成立時的基本精神與原則相違背；因此我們建議各地方會必須容納各行業工人……同時宣布一切容許此種專業組織存在的規章一律作廢”。另一決議案則宣稱，地方會，“凡專為某一特殊行業的利益進行活動者，必須無例外地從屬於其所在地的區協會，一切容許行業性的區協會干涉其他區協會對於本區內任何地方協會的控制權的規章一律作廢”^⑳。

一八八二年，協會總會在如何對待工會的問題上又回到它原來的政策上去了。現在是又要鼓勵建立行業性的地方會。“聯合勞工報”竟反常地極力證明，組織“行業性的地方會和區協會現在是，過去也從來一直是勞工協會的綱領的一部分”^㉑。門窗玻璃製造工人，在協會的規章還正禁止行業性的地方會時，便已成立了一個強大的包括全國同業工人的協會組織，并被允許有權在第三百號地方協會的名稱下進行一全國工會的組織工作。而現在協會方面乃極力推進這種趨向，它向各工會保證說，“它們照樣可以保衛自己行業的利益……而同時又可以得到和其他一切工業部門組織在一起和彼此聯合的利益”^㉒。

毫無疑問，一般對於現存混合性區協會的不滿情緒，是推動勞

-
- 泡德利曾引用不景氣時期的經驗作為反對行業工會的理由。他認為，經濟大恐慌已證明熟練與不熟練工人的區分完全是虛構的，因為熟練技工已經看到，在求得合理待遇的職業方面說，“他是並不比拿鐵鎚和煤鏟的人占便宜的”。因此，他結論說，“一切從事勞動的人已經被艱苦的歲月一律安放在同一個水平綫上了，而他們也應該明白他們必須都站在同一水平上。大部分的工會都已弄得走頭無路。從這裡我們所得到的教訓是什麼？我們不需要行業工會。”（見一八八〇年六月十五日“聯合勞工報”。）

工协会对于工会組織采取更友善态度的一种力量。但促成这种改变的一个極重要的因素却是因为有一个要和它競爭的組織在一八八一年出現了，这个組織便是美國劳工联盟的基石——美國与加拿大有組織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新工会主义”

要了解創造上述这一联合会的是一种什么力量，我們必須再回到一八七三年大恐慌后的那些可怕的年头，并研究一下那正为各行業建立一种“新工会主义”的榜样的一群雪茄制造工人的活动。这些人就是阿道夫·斯湍斯尔、塞米尔·岡伯斯、斐迪南·劳雷尔、孔瑞德·卡尔及其他一些人。岡伯斯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从这一小群人中，產生了最后形成目前的劳工运动的宗旨和原动力。我們並沒有創造美國的工会，那乃是力量和具体条件的產物。但我們确曾創造和确定了領導工会运动走向建設性的策略并使之达到勝利的技巧和基本的原則。”^①

塞米尔·岡伯斯于一八五〇年生于倫敦的东端区，父母为荷蘭犹太人。父親是一个雪茄制造工人，他的家也同时就是他的烟厂。一八六三年夏，全家由倫敦的东端区移民到紐約的东城区。在这里岡伯斯一面帮助父親在他們自己的家里做雪茄烟，一面常去参加苦泊尔学社的講演会和文化班及共济会的辯論会，并加入了本行業的工会。

在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八年間，和岡伯斯交往最密的都是一些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紐約雪茄制造工人工会中，有很多人过去都曾積極参加过欧洲的革命运动，并曾为美國國際工人协会的會員。岡伯斯在他的自傳中說，他确感到國際的各种原則是

“完善而合乎實用”的，他同時承認，實是由于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一般人才更能更明確地了解到“工會乃是能給工資收入者帶來較好生活的一種直接的和實際的動力”的原則^④。

但岡伯斯所接受的一切社會主義思想却都是從對社會主義運動已感失望的那些社會主義分子那里得來的。岡伯斯所以能發展成爲一個工會領袖，實頗有賴于曾任北歐各國國際的秘書的瑞典人斐迪南·勞雷爾的幫助。勞雷爾曾在一雪茄煙廠中領導工人們的學習討論會，而岡伯斯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八年間便一直是在那里工作；這個廠屬于一逃亡的德國人大衛·黑爾希所有，乃是那時紐約唯一有工會組織的一個雪茄煙廠。勞雷爾勸導岡伯斯去參加社會主義者的會議，“傾聽他們講些什麼，了解他們，但不要去參加他們的黨”^⑤。他警告他要當心各種的“狂熱分子和夢想家”，并再三地提醒他說，工會乃是勞工運動的柱石。據說勞雷爾曾向岡伯斯說，“仔細研究你的工會的綱領，塞姆，如果它所包括的思想和那個原則相違背，那它就是完全不可信的。”^⑥

岡伯斯應當感恩的另一個失望的社會主義分子是曾于一八七七年任國際雪茄工人工會主席的阿道夫·斯滯斯爾。有一個時期，斯滯斯爾頗受拉薩爾派的影响并曾在北美社會民主黨中積極參加活動。他是建立美國工人黨時期的那種團結局面的創建人之一。後來，他却脫離了社會主義運動而把自己的工作完全只限于推動各種工會的要求^⑦。

美國資產階級的殘暴，對于那些不久後在美國勞工聯盟中居于顯著地位的，七十年代的急進分子們的向右轉變，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例如岡伯斯，他自己曾目擊一八七四年湯普金斯廣場的慘劇，并且自己曾藏身在一個地窖中才逃脫了警察的凶殘。但這一

事件却并没有唤起他的仇恨心理，而只是使他想到参加革命运动实在是太危险了^④。因一八七七年巨大的罢工浪潮而引起的反动叫嚣实吓倒了不少的“社会主义分子”。在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开始后的那几个月里，各报纸几乎没有一天不谈到“各工会组织的革命要求”，谈到“工会中的疯狂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的工会运动正如何要想毁灭美国社会”的企图^⑤。在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一日的“纽约先驱报”上，更有这样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关于或多或少具有劳工联盟或共产主义会社组织形式的工人們的，以推翻现存一切为目的的运动、计划和纲领的詳細报道請閱本日本报各欄。”

而“纽约论坛报”在这方面的努力则更是無出其右者，它发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專門論述“我國日益高漲的共产主义势力”这一主题。在一篇重要的論文中，作者說，共产党人已抓住了全國强大的工会組織，現在更是正利用这些組織准备一次全面总罢工以便夺取对于全國的控制权。該作者更在結論中說，在目前既然工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經成为一而二，二而一了，那我們就必須鎮压一切工会組織。“论坛报”更表示希望这篇論文能得到全國人的注意并希望其他各报予以轉載。該报更說：“一切爱好秩序或有財產需要保护的人，决不可对于这在我國正穩步發展着的共产主义势力視若不見漠不关心。”^⑥

前社会主义分子，如斯湍斯尔及麥克基尔等人，則出來力求使爱好秩序的人們相信，对于“新工会主义”他們是完全可以無所恐懼的。斯湍斯尔于一八八三年在國會的教育与劳工問題委員會上作証时所說的后來并常被引用的一段話，已表明在十年的時間中，他在政治上已走过了如何漫長的一段旅程了：

問：“那末你是首先要求要改善內部的情况？”

答：“是的，先生，我首先注意的是我所代表的那一行業，首先注意雪茄業及那些請我來代表他們的利益的人們的利益。”

主席：“我只是問你关于你們的最后目標的問題。”

証人：“我們沒有什麼最后目標。我們只有一天一天的活動。我們只是为了當前的目標——那些在幾年的時間內便能實現的目標進行鬥爭。”^④

雪茄製造工人

在一八七七年雪茄工人的大罷工中，斯湍斯爾是和岡伯斯在一起進行工作的。在不景氣時期中，紐約雪茄製造工業的老板們開始把他們的工作從大的工廠中向大公寓中轉移，在那里，工資要較之在工廠中低一半；而一天工作十六小時則是很平常的事。一八七五年年中，在紐約製造的雪茄煙多半是在那些大公寓的房舍中生產的。這種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幾乎完全消滅了該行業中的工會組織。在一八七三年冬季時，該業工會共有近一，七〇〇會員；兩年後，竟減少到為數極有限的幾個會員了。一八七五年夏天，斯湍斯爾、勞雷爾、岡伯斯及另外一些和他們合作的人才又將這一工會重新改組，岡伯斯并當選為改組後的一四四號地方工會的第一任主席^⑤。

甚至在不景氣現象發生以前，紐約的雪茄製造工人工會，也不像該行業的國際工會那樣排除不熟練工人，而是以整個工業為基礎進行組織，它同時容納卷煙工人、包裝工人以及更有技術的工人們。該工會改組以後，這種以全工業為基礎的形式仍然保存着。

一八七六年时，該会僅有會員五百人，但是其中有不少工人党中的优秀党员。一八七七年秋，雪茄工人發動了一次总罢工，要求取消大公寓生產制度。約七千至一万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大公寓中的工人，都起來反抗飢餓綫上的工資标准和大公寓血汗工作間里的不可容忍的工作条件。

全國各地都紛紛匯款來支援罢工工人。旧金山工人們的來電說：“不要憂慮。堅持下去。后当按周匯款。”雪茄制造工人的机关报感謝其他工人們所給与的帮助并且說：“如果貧困和飢餓竟迫使我們屈服了，那將不僅是我們自己，而是整个的工人階級遭受到了一次失敗。”在經過一百另七天的堅苦斗争后，罢工結束了。工作仍是在旧的工作条件下繼續進行，大雜院中的那种榨取血汗的工作間則依然存在。“雪茄工人报”說道，“多少年來便已存在着的罪惡現象，是不可能在一天的時間內改变过來的。”^①

这一次罢工的失敗加强了岡伯斯、劳雷尔和斯湍斯尔的改建國際雪茄工人工会的決心。他們相信美國工会所以不能經受不景气現象的襲击或罢工失敗的打击的原因，是由于它們沒有依据商業原則進行它們的活動^②。因此他們決定，要以英國的工会为藍本，將國際雪茄工人工会改建成为一个緊密的并有穩定的財政基礎的組織。他們建議使國際工会中的負責人对于各地方工会有絕對的統轄权；規定高額會費以儲備基金，建立疾病及死亡補助金制度以及建立对技工貸款的制度，以便其四出尋找職業。

这些变革主張在一八七九年八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被提出來，最后并被編入了該会的會章。这次會議同时通过了英國工会所采用的平均調剂基金的原則，在这种原則下，國際工会的負責人可以命令存款較多的地方工会將自己的基金轉移一部給其他財政

困難的地方會^⑤。于是一個新的、可以作為許多美國工會的榜樣的國際雪茄工人工會出現了；同時美國勞工聯盟本身所依據的各種原則也已在這裡確定下來。

從很多方面看，這個“新工會主義”是無所謂新的。六十年代期間，威廉·夕威斯就已經在國際鑄工工會中建立了這種集中控制的制度，許多其他全國性工會的領導人們那時也都極力要在各自的組織中實現這一特點。夕威斯曾一直強調行政效率，強調罷工基金和經濟上的保障，雖然他從沒有像斯湍斯爾和岡伯斯，要犧牲勞工的團結以實現這些目標。但自然，大多數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間的工會組織仍缺乏集中領導，特別在罷工問題上是如此，同時也並沒有穩固的財政基礎，那也是實在的情形。

雪茄工人的“新工會主義”真正稱得上新的地方，是它的興起正好在不景氣時期已使許多工會主義者認識到集中領導、財政上的穩定和效率問題對於勞工運動實有重大意義的這個時候。在整個七十年代的那一段艱苦的歲月中，各勞工報紙曾不斷討論應如何研究英國的工會組織以便從中吸取教訓*。不景氣時期震動全國的各次巨大鬥爭的失敗則更使人感到，在這艱苦的日子結束後新出現的工會組織實必須要採取英國工會的形式^⑥。而雪茄工人却首先將這一信念付諸實行了。

這一新的國際雪茄工人工會，並非如岡伯斯所說，是“第一個建設性的有效的美國工會組織”^⑦；這一榮譽必須歸之于夕威斯領導下的國際鑄工工會。但雪茄工人所不同於鑄工的是他們決不談

* 在一八七七年及一八七八年間，杰克遜·羅斯吞曾旅行美國各城市，向各工會講演關於“英國工會”的問題。（關於他的講演內容請參看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日的“勞動旗幟”。）

什么通过合作社以实现自我雇用等那一类的最后目标。他們所強調的只是“最实际的方法”和“最迫切的要求”。更没有什么秘密仪節、口令及神秘的入会仪式等那些毫無意义的东西。更重要的，他們也沒有那种烏托邦的金融改革計劃，要在一夜之間結束工人階級的一切苦难。雪茄工人認為，“实际需要已迫使劳工运动必須采取最实际的方法。他們只是为了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时進行斗争，而这些自將实现較高階段的人类文明。任何金融計劃或关于稅制的方案也不能縮短劳工的工作時間。”⁶⁶

岡伯斯、斯湍斯尔及劳雷尔曾自称他們的“新工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以馬克思主义的工会原則为基础的*。誠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工会組織極端重視，并認為它是劳工运动的基石。但他們認為工会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廣大的工人群众的組織核心”，因而他們号召“吸收一切工人進入他們的組織中去”。他們同时認為有組織的工人的使命是領導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⁶⁷。但对那些“新工会主义”的創建人來說，工会乃是有技術的劳工貴族們的“組織核心”，其目的則是为了牺牲不熟練或半熟練工人以保障技術工人对于職業的壟斷。而对岡伯斯來說，高額會費、巨額的工会基金、“訴苦委員會”、“商業代理人”以及关于雇用問題的規章等，乃变成了工会运动的最本質的东西。这种不久即將搬到美國劳工联盟中去实行的工会主义真是实际而又有效力的。毫無疑問，效力是美國工会所迫切需要的东西。但岡伯斯等

* 例如約翰·坎門司即曾說，雪茄制造工人工会的各种政策是以“一种重加修訂以適合美國國情的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并且說“岡伯斯甚至比馬克思本人的階級覺悟还要高”。（見“政治科学季刊”坎門司所作“卡尔·馬克思和塞米尔·岡伯斯”一文，一九二四年版，第四十一卷，第二八三——二八五頁。）

人在將效力介紹到他們的工會中去的時候，却奪去了它的有關勞工團結的各種原則以及對方向的辨別力。

到了一八八一年，岡伯斯和斯湍斯爾等人便已開始對工會內的民主制度表示厭棄。國際雪茄工人工會一四四號地方工會中的一群被稱為進步派的人們開始發動一個運動，要將那些被稱為國際派的岡伯斯及其同伙們驅出工會的領導部門。這些進步分子——也是社會主義分子——希望借此制止斯湍斯爾和岡伯斯企圖用高壓手段變雪茄製造工人工會為單純的技術工人工會的活動。但那時最迫切的問題是要進行一個政治鬥爭以反對大公寓制度。他們乃提議進行群眾鬥爭，發動示威和宣傳運動，並在必要時，提出獨立的勞工候選人名單。他們更說國際派是想要支持一個“曾經參加過各種各色黨派的”“流氓”律師。

一八八一年四月，進步派終於使該派的候選人在一四四號地方工會內部的選舉中獲得勝利。但是岡伯斯以及同他在一起擔任職務的那些人却拒絕承認自己的失敗，根本不接受任何要他們交卸職務和移交該會基金的要求。國際工會主席，即後來更將進步派描寫為“無政府主義者”和“大公寓中的浮渣”的斯湍斯爾亦極力支持岡伯斯集團^⑧。岡伯斯在這時為他自己的這種不民主的行為所作的辯護是和後來當他做美國勞工聯盟主席時，為同一行為所作的解釋相同的。他說，反對派既然是社會主義分子，就根本不適合於管理工會里的事務。他在他的自傳中寫道，“吾輩工會主義者，目睹暴亂的社會主義分子在數量上日益增加時，深感前途之可怖。”^⑨

進步派於是乃脫離了國際派，並在勞工協會第四九號區協會的幫助下，在紐約成立了一個雙重的工會組織，開創了後來勞工運

动中的社会主义分子所不幸地过多予以模倣的例子。他們很快便在数量上超过了紐約的國際派，組織了卷烟工人、包紮工人、裝箱工人以及斯湍斯尔称之为“大公寓中的浮渣”的那些工人們。

由此而發生的紐約雪茄工業中進步派与國際派之間的殘酷斗争——進步派充当工賊以破坏國際派的罢工，國際派充当工賊以破坏進步派的罢工——真是美國劳工运动史中深堪悲嘆的一頁，而且对于此后工会組織与劳工协会之間的关系也發生了長远的影响。但这是屬於下一时期的問題。現在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他們和第四九号区协会之間的爭端对于岡伯斯和斯湍斯尔始終拒絕跟隨其他的工会領袖們一同進入劳工协会的事应負相当的責任*。同样，雪茄工人內部的斗争对于美國劳工联盟的形成是也要負一部分責任的。

有組織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一八八一年四月，帕特遜一社会主义報紙“本地新聞”，号召已組織起來的各工会“于本年夏召开一次全國劳工代表大会，以便采取積極步驟組織無組織的工人”。該报說，这个新的联合組織的主要重点，应当在于使一切無組織的工人在工会中組織起來，以便共同進行有效的斗争，求得整个工人階級生活条件的改善。該报結論說，“过去各劳工代表会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它們把它們的时间

-
- * 岡伯斯曾在一個很短的时期中加入过劳工协会。他在一八九一年时寫道，“同着別的工会主义者一起，我也加入了劳工协会，目的是要使該組織完全限制于進行理論教育工作，并欲保护各工会使其不致受到破坏或分化。但那是早在一八七五年时的事。”（見哥倫比亞区華盛頓，美國劳工联盟大樓中塞米尔·岡伯斯紀念室所存“岡伯斯書信集手稿”，第五卷，第一五八頁，塞米尔·岡伯斯于一八九一年十月十日致馬休遜函。）

和金錢大部分用之于進行對金融問題的宣傳工作，而忽視了工業問題。在六年前最後的一次代表會上，我們曾經針對着這種危險情況提出過抗議，但結果無效。金融問題是應有它的地位，甚至是相當重要的地位的，然而，最重要的却是勞工的經濟組織的問題。”^⑩

但正式發動組織一個工會聯合會的工作的，既非岡伯斯，也不是雪茄工人工會，而是印第安納名為“工業協會”的一個秘密組織。它同另一秘密團體——混一勞工會聯合，號召于一八八一年八月二日在印第安納的德黑俄特舉行一次會議，“以便完成一個國際聯合工會的初步組織工作”。隨時都企望能有機會成立一個全國勞工聯合組織的印刷工人工會立即對這個建議中的聯合會表示歡迎，並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雪茄工人工會也曾決議要支持這一會議的，但它卻把派代表的事給忘了。結果，在這次會議上，工會總會多於全國性工會，綠背黨人則多於工會運動者。大會收到一項關於組織問題的建議案竟要求大會發出反對工會組織的宣言。工會運動者終能使這一會議及早休會以便他們到東部去召開另一會議，那里將有更多的全國性工會可以派代表出席。這一代表會最後決定于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匹茲堡舉行。為召開這次會議所發號召的開頭一段即申論工人階級實有更廣泛地團結起來的必要：

“工人同胞們：組織一個更完善的勞工聯合機構——一個將集中我們的力量以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对付已集中起來的資方的機構——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我們有無數的工會，行業工會或聯合會，勞工協會以及各式各樣其他的地方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的工會組織。但儘管這些機構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如果這些組織能够在一個工

会联合会中团结起来，那它们所能做的工作一定就会更要大为增多。”

该号召接着说，在英国和爱尔兰，每年都有各种工会代表会在举行会议，这些工会联合组织所已完成的工作说明，“只有在这样一种机构中，才有可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增进劳动阶级的一般福利”。一个美国全国劳工代表会将会提出各种劳工方案，以使美国国会在国家法令中付诸实行，可以“组织一个国会劳工委员会，以便一方面在华盛顿推动及促进有关劳工问题的法令的通过，一方面向各工会报告情况”，更可以组织“一种有系统的宣传工作以传播各种工会原则，使大家深明自衛性工会及劳工组织的必要，并鼓励这种组织的建立，以便进而联合成行业工会”。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就可以提高工会运动的地位而使工人阶级的各种正当的份内的权利能得到一般人的重视与尊敬”^①。

一百零七位代表出席了匹兹堡的会议，据当时的报纸估计，这一会议所代表的工人将近五十万^②。印刷工人的代表十四人，在全国性工会中代表数为最多；钢铁业工人联合会则有代表十人；铸工八人；玻璃工六人；雪茄工五人；木工五人。其余代表则来自劳工协会的四十六个地方协会。

钢铁业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翰·杰瑞特当选了大会主席，塞米尔·岡伯斯则当选了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提出，主张成立一个完全由工会组成的名为“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的纯工会联合机构，因而在大会上引起了极为激烈的争论。大家反对岡伯斯的提案是因为它所建议的这一劳工联合会将只组织熟练技工，而不是去组织整个的工人阶级——包括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黑人与白人、外籍人与土生的美国

人。这里且举出討論中的一節为例：

“韋伯尔先生希望改定該联合会的名称以使包括全体劳动人民。”

“金尼尔先生：我要求使这个組織包括一切从事劳动的人民，如我們海边市鎮中的碼頭工人也都应包括在內。因此我希望改定后的名称为‘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匹茲堡的格蘭德遜(有色人种代表)：我們在我們匹茲堡的組織中，有很多人并不屬於某一特定的行業，但我們不应把他們从联合会中排斥出去。据我了解，我們的目标是要联合全美國的劳动人口。我是更站在我自己的同胞的立場說話的，我現向你們宣告，如果將一般劳动者从这个組織中排斥出去，那对于熟練技工实是很危險的，因为那些人在危急的时候可能被雇用去担任他們所能够勝任的工作。”

“波林格先生：我們不知道什么叫信仰、膚色或國籍上的区别，而只是要將本國所有的劳动人口都包容到这一組織中來，不管他从事何种職業；因此該会的名称應該是‘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杜威先生：我同意这样修改。”

“布蘭特先生：那完全与我的意見相合。我希望这一联合会將廣泛到可以把全体劳动人民都包容進來。”⁶⁹

表決結果一致贊成修改，于是这一名称乃被改訂为美國与加拿大有組織行業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从此后，直到一八八六年該会改称美國劳工联盟时止都一直保持着这一名称。

在联合会的名称既决定后，代表們开始討論綱領委員會的報告。報告的第一部分是一个总綱，列举了劳工联盟所以必需的理

由。这个总綱和劳工协会中大多数領導人所持的劳資利益一致的理論却是一个很顯明的对比。

“当此文明世界中各國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正在各國內進行斗争的时候,劳資斗争必將一年比一年激烈化,必將对各民族中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如果他們不为了互衛和互利的目的及时联合起來的話,產生極为惨痛的結果。这一各國工資工人的歷史只是一个不断斗争和由于無知与不团结而產生無窮苦难的歷史;而那各个世紀的非生產者的歷史,却証明有了完善的組織即使是少数人也能創造善良的或罪惡的奇蹟……。正如俗語所說‘团结就是力量’,建立一个包含北美各行業和各种劳工組織的联合会,以形成一种以我們所居住的廣大的土地为基礎的团结,乃是我們的唯一的希望。”^④

总綱中所表現的这种階級意識是不能逃脫当时的报界的批評的。“匹茲堡電訊”說,总綱所表現的“是一种挑撥冲突而并非尋求和平的精神”,并表示希望該会能用一种新的精神,“和資方力求融洽的精神”來代替它^⑤。

政綱委員會所提出的各項議案則是要求:各工会联合起來;对兒童施行强迫教育;禁止使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統一的雇用法;实施全國八小时工作制法令;禁止合同囚犯劳工;廢除以公司購物証代替工資的制度;实施技工財產留置权法令;取消圖謀不軌法;成立全國劳工統計局;監督全國的鐵路及電訊公司,“以使它們的一切活动能够完全和邮政一样服从于授它們以特权的人民的利益”;由政府收回划归鐵路公司的公地作为不能完成政府訂貨合同的懲罰,而今后一切公共土地应完全保留給真正的垦植者;保护美國工業;制止外國合同劳工入口;最后則是号召各行業工会及劳工

組織一致行動，“以求通過選票，在一切立法機構中占得適當數目的席次”⁶⁶。

有些人曾反對廢除童工的提案，認為如實行這樣的法令實際是干涉個人的權利。但立刻就有一個代表接着一個代表站起來為這一提案辯護，關於童工對於社會所產生的可怕的惡果作了極生動的敘述。有一個代表說，“你們如果看到了我所看到的那些可怕的罪惡現象，你手中就有一百張票，你也會全部投出來贊成這一議案的。”塞米爾·岡伯斯概述了大公寓雪茄制作間中的兒童們所處的難堪的境地，并于最後結束他的談話說：“這是可恥的犯罪行為；如果我們不起來大聲疾呼地反對它，那我們實是不知恥了。”這一議案終于一致通過⁶⁷。

對於主張保護關稅的議案，也頗有一些人反對。“我贊成自由貿易”，有一個代表說。“保護關稅是屬於某些政黨的問题；它對於全國一般人民并無任何重要性。保護關稅只是保護美國的製造商人，替他們制止外國的廉價貨物入口，但它并不會保護美國勞工，制止外國的廉價勞動力入口。”鋼鐵工人的代表們是贊成保護關稅的，在他們的堅持下這一議案最後仍通過了⁶⁸。

政綱委員會所提議案中，有兩條被主席杰瑞特別出，他認為它們是與本代表會的目的無關的*。那即是要求監督鐵路及電訊公司

-
- 杰瑞特作主席的方式使岡伯斯學到了一個榜樣，他乃在此後數年中極有效地運用它，以擊敗美國勞聯中的官僚集團的對派。匹茲堡“商務公報”曾以“使用禁聲法”為標題對這一問題評論說：“在問題一提出來後，他就馬上問，‘對於這個問題大家有意見嗎？’立刻就會有好些代表提出問題來，他們以為他們這樣做就可以將這一提案明確下來以便進行辯論。但杰瑞特却另有他的主意，‘計劃’的最後三部分通過時的速度之快，使人不能不深深佩服杰瑞特先生對於會議規則（事先經大會通過之規則，規定在任何時候，如有七個代表對某

和公共土地应完全保留給真正垦植者兩項。若干数目的臨時提議也都通过了。那些提案則是要求通过法律規定对于礦坑、工厂及各工作間中通風設備的檢查制度，以及对于飲食和住所的衛生進行檢查，制定由雇主对一切由于他們的疏忽或無能而產生的意外事件負責的法律，以及要求國會采取行动“完全禁止中國人向美國移民”。代表中只有一个人曾發言反对这一关于中國移民問題的議案，即波士頓的克明先生，但他所講的話也并不是完全沒有狹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他在肯定地指出这个國家已經是而且應該永远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避难港”后接着說，“站在我所代表的國家的立場，我决不能投票贊成任何違反美國憲法的議案。这个國家是一个自由的國家，因此我們應該容許中國人到这里來。我不相信他們会把我們吞下去的。”^⑧

会上的臨時提案中有一条提案是表示同情愛爾蘭人民進行反对英國压迫以求得自己解放的斗争，这一提案也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討論。該提案說，愛爾蘭的土地應該屬於土地耕种者所有，任何人都不应允許占有超过他所能耕种的数量土地。岡伯斯却帶头反对这一提案，他說这种对于土地問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并且告誡大会不要惑于这一原則。有些代表断定，岡伯斯实因为報紙上的报告說他在代表会中代表着社会主义成分而極感不安，因此他要反对“社会主义的”土地方案，以明确表示他自己的立場^⑨。

这一議案最后被提交一个特別委員會处理，該委員會乃在它

‘問題’有意見則必須進行表決)的熟悉，虽然代表們都不十分滿意，代表們認為他們應該容許对任何一个提到會議上來的問題盡量說出他們的意見。”(轉引自阿弗來德·詹姆斯：“美國劳工联盟第一屆代表大会：对当时当地報紙材料之研究”一文，一九二四年二月号“西賓夕法尼亞歷史傳記雜誌”，第七卷，第一四頁注。)

的報告中提出了另一個議案來代替它，這一新議案表示痛心于“過去所實施的反对愛爾蘭人民的不公正的土地法”以及無數愛爾蘭人民“由于英勇地進行斗爭以求得本國被壓迫人民的生活改善”而遭受到的“無理監禁”。報告最后却以下面的一段表示出國際主義精神的話作結束：

“我們對於這些勇士們、這些為了人類的自由進行戰鬥的勇士們，敬致我們的衷心的同情，我們也同時對於世界各國為自由權利而鬥爭的被壓迫的人們，寄與同樣的表示同情的勉勵的言辭。”^①

這一議案結果通過了。

大會更通過了另一議案，這一議案亦有其重要意義，因為它表現了代表們對於農民所遭到的問題的關心。那即是對於一八八〇年二月提交國會的一個關於公共土地問題的法案表示反对，這一公共土地法案如一旦通過法律付諸實施，即將使一切公共土地全為“西部的牧場大王和其他的資本家”所有，而要迫使農民們“向這些大地主”去租種土地。該議案宣稱，“任何國會議員如對該法案投票贊同乃是甘願採取一種叛賣勞工利益的行為”，因此，凡一切投票贊成該法案的議員，都“將受到他們的選民中工人階級部分的政治上的反对以作為對他們的懲罰”^②。

該會的綱領使我們不禁想到勞工協會的綱領。兩者都同意，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如果不組織起來，他們的遭遇將只會每況愈下。兩者都強調組織整個工人階級的必要和利用選舉制度的必要。總之，這兩個組織的綱領有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兩個組織都主張要成立勞工統計局；實行保障工人衛生、安全及由僱主負責的法律；實施有關技工財產留置權的法令；禁止童工；取締合同

囚犯劳工；以及限制移民入境等。

但同时两者也有其极重要的差别。劳工协会要求由政府占有
一切交通运输事业，但这一个新的联合会却并无此种要求。联合
会也并没有采纳劳工协会的金融纲领，这说明该会肯定地认为工
资收入者的主要敌人是工业资本家而不是银行家，同时它——和
协会会员不同——几乎是完全抛除了那种金融万灵论的信念。而
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联合会决没有提到生产或消费合作社问题，
也没有提出劳工协会所主张的强迫调解制度。联合会所关心的雇
用法问题以及“公司购物证”问题，则均为协会的纲领所无。

虽然这两个组织所提出的很多要求是完全相同的，很明显，联
合会所更关心的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求得某些当前需要的满
足，而不是要通过自我雇用的办法去解决一切劳工问题。德黑俄
特会议常务委员会秘书马克·穆尔在他对匹兹堡代表会所作的报
告中说，紧紧地抓着更少的工时和更多的工资这一个观念，并把它
作为你们进行一切工作的首要原则。”^⑳ 接受这一原则的结果就必
然是和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期间中产阶级改良派的各种观念断绝
关系，并和各种关于金融问题的谬论告别，而使劳工运动走上为争
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实际斗争的道路。

在纲领委员会的报告完了后，代表会接着需要处理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决定此后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问题。在经过
相当时间的讨论之后，乃通过了一个全国性工会的代表占最大比
例的计划。地方性的行业工会及联合会每一单位只能派代表一人，而
全国性或国际性工会则满一千或少于一千会员者可派代表一人，
满四千会员者派代表两人，满八千会员者派代表三人^㉑。

匹兹堡会议选出了一个立法问题五人委员会，其中包括塞米

尔·岡伯斯、里查·泡尔斯、伯格曼、阮金和福斯特，大会指示該委員會着手組織一个运动以爭取通过保障劳工或其他有利于劳工的法令。大会对于这新成立的联合会的目标列举如下：

“一、推动建立工会及劳工会的工作。

“二、推动建立工会及劳工总会或联会的工作。

“三、推动建立全國性或國際性工会的工作。

“四、爭取通过適合各工業階級利益的法律。”^⑤

联合会第一任秘書弗蘭克·福斯特在其致全國砌磚工人工会的柯尔的信中概括地說明了这些目标的意义。他寫道，“联合着的資本的势力日益增强，就必須要有联合起來的劳工去和它对抗。联合就是我們未來的座右銘。”^⑥

引 文 注

第 一 章

- ① 愛德華·阿伯尔 (Edward Arber) 編：“約翰·史密斯上尉游記及作品” (Travels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一九一〇年愛丁堡版, 第一卷, 第三六〇頁及第二卷, 第四四四頁。
- ② 亞歷山大·伯朗 (Alexander Brown): “美國起源”(Gen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九一年波士頓版, 第二卷, 第七九七頁。
- ③ 亨利·道森 (Henry B. Dawson) 編：“新阿姆斯特丹大事記” (Records of New Amsterdam), 一八六七年摩雷杉尼亞版, 第二卷, 第二七八頁; 又阿爾門·勞伯尔 (Almon W. Lauber): “美國境內殖民時期的印第安奴隸問題”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within the present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 ④ 前引伯朗書第一卷, 第三五三頁; 又納桑尼耳·沙特列夫 (Nathaniel B. Shurtleff) 編：“新英格蘭麻薩諸塞州加芬納爾公司記錄” (Records of 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in New England), 一八五三年波士頓版, 第一卷, 第四〇五頁。
- ⑤ “威廉瑪利季刊”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第十四卷, 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 ⑥ C·A·海立克 (C.A. Herrick): “賓夕法尼亞的白色奴隸” (White Servitude in Pennsylvania), 一九二六年費列得爾菲亞版, 第四三、四七頁; 又湯姆斯·魏登巴克 (Thomas J. Wertenbaker): “美國文化的興起: 中部殖民地” (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The Middle Colonies), 一九三八年紐約版, 第一九八頁。
- ⑦ 詹姆斯·羅杰士 (James E. T. Rogers) 編：“英國農業及物價史(一二五九—一七九三年)”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1259—1793), 一八六六—一九〇二年牛津版, 第五卷, 第八二六頁。
- ⑧ 尼可斯爵士 (Sir G. Nicholls): “英國貧民救濟法令史編”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Law), 一九一〇年倫敦版, 第六卷, 第二四五頁。關於這一時期英國勞工法令的一般情況請參看里查·摩里斯 (Richard B. Morris): “早期美國的政府與勞工問題”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一九四

- 六年紐約版,第三一一九頁。
- ⑧ 菲利浦·伯魯斯(Philip A. Bruce): “弗吉尼亞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Virginia), 一九〇七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五七九頁。又 A·E·布蘭德(A. E. Bland)、P·A·伯朗(P. A. Brown)和 R·H·湯尼(R. H. Tawney)合編: “英國經濟史彙編”(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一九一四年倫敦版,第三五七——三五八頁。
- ⑨ 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和比姬推司·韋伯(Beatrice Webb): “工會運動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一九三〇年倫敦版,第二四九——二五〇頁。又弗萊得立克·毛頓·艾登爵士(Sir Frederic Morton Eden)著、A·G·L·羅杰士(A. G. L. Rogers)編: “貧民國家”(The State of the Poor), 一九二八年倫敦版,第二四——二八頁。
- ⑩ “蘇格蘭國会的法律及法令”(The Laws and Acts of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 一六八二年愛丁堡版,第一卷,第八一〇頁。
- ⑪ 阿瑟·湯姆斯(Arthur H. Thomas)編: “抗辯書與各案錄年編(公元一三二三——一三六四年)”(Calendar of Plea and Memoranda Rolls, A.D., 1323—1364), 一九二六年劍橋版,第二二五頁。又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 九——十一, “本國法令種種”(Statutes of the Realm), 第一卷,第三六七頁及第四卷,第一編,第五九頁。
- ⑫ 安諾德·羅杰士(Arnold T. Rogers): “六世紀來的工作和工資”(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一八八四年倫敦版,第三九八頁。
- ⑬ 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 “英國在北美殖民概述”(Summary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North America), 一七七五年倫敦版,第二〇六頁; 又馬爾卡斯·嘉利根(Marcus W. Jernegan): “殖民地時期美國勞動與寄生階級(一六〇七——一七八三年)”(Laboring and Dependent Classes in Colonial America, 1607—1783), 一九三一年芝加哥版,第四七頁。
- ⑭ 一九三四年四月“北卡羅來納州歷史評論”(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第十一卷,第一三二頁; A·R·紐薩姆(A. R. Newsome)編: “從英格蘭和蘇格蘭到北卡羅來納的移民記錄(一七七四——一七七五年)”(Records of Emigrants from England and Scotland to North Carolina, 1774—1775)。
- ⑮ 菲利浦·方納(Philip S. Foner)編: “湯姆斯·杰斐遜的重要著作”(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四頁及第一七頁。又一九四二年五月“經濟史報”(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二卷,第四〇——五三頁; A·E·史密斯(A. E. Smith);

“合同雇工：美國‘最初家庭’新釋” (Indentured Servants: New Light on Some of America's "First Families")。

- ⑰ 一九三一年三月“費城美國天主教歷史學會記錄”(Record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ical Society of Philadelphia), 第四十二卷, 第三四頁; 修女馬格利特·派特麗夏(Sister Margaret Patricia): “美洲殖民地的白色奴隸”(White Servitude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又威廉·埃第斯(William Eddis): “美洲來信”(Letters from America), 一七九二年倫敦版, 第七二——七三頁。
- ⑱ 佛蘭克·狄芬德弗(Frank R. Diefenderffer): “德國移民到賓夕法尼亞”(The German Immigration into Pennsylvania), 一九〇〇年賓州蘭卡斯特版, 第二〇六頁、第二一一——二一二頁及第二六二頁。
- ⑲ 轉引自賴拉·塞勒斯(Leila Sellers): “革命前夕查里士頓的商業”(Charleston Busines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一九三四年卡波山城版, 第一一八頁。
- ⑳ 轉引自一九四〇年“美洲”(Americana)第二十四卷, 第三七四頁, 查理·哈尔(Charles M. Haar): “殖民地時期紐約的白色合同雇工”(White Indentured Servants in Colonial New York); 又一七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國水星周報”(American Weekly Mercury);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六日“紐約郵童報”(New York Post Boy)。

(American Weekly Mercury); 一七五二年十一月六日“紐約郵童報”(New York Post Boy)。

- ㉑ 斯迭拉·蘇澤爾(Stella H. Sutherland): “殖民時期美洲人口分配情況”(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olonial America), 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第一一九頁及第一六八——一七五頁。又前引摩里斯(Morris)書, 第三一五——三一六頁; 又S·C·約翰遜(S. C. Johnson): “聯合王國向北美移民史(一七六三——一九一二年)”(A History of 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North America, 1763—1912), 一九一三年倫敦版, 第一——一〇頁。

第 二 章

- ① 一九一七年四月“黑人歷史”(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第二卷, 第一〇六——一〇七頁; 約翰·麥克林(John A. Mecklin): “美國民主政治中奴隸地位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Slave Status in American Democracy); 又一九三五年一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四十卷, 第二二七——二二八頁; 威廉·多德(William E. Dodd): “我國社會秩序的第一次建立”(Emergence of our First Social Order); 又W·W·海寧(W. W. Hening)編: “法令一般”(The Statutes at Lar-

- ge), 一八一〇——一八二三年里士滿版, 第二卷, 第四八一頁。
- ② 赫伯特·耶浦斯克尔(Herbert Aptheker): “美國黑奴起義史(一五二六——一八六〇年)”(Negro Slave Revo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526—1860), 一九三九年紐約版, 第九頁; 又一七三五年一月五日“紐約周報”(New York Weekly Journal)。
- ③ 威廉·埃第斯(William Eddis): “美洲來信”(Letters From America), 一七九二年倫敦版, 第七〇頁。又依賓澤·庫克(Ebenezer Cook): “烟草商業”(The Sot-Weed Factor), 一七〇八年倫敦版, 第六——七頁。
- ④ 檔案管理委員威廉·惠特曼(William H. Whitman): “麻州殖民法”(The Coloni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一八九〇年波士頓版, “自由篇”第八七節; 又“紐約殖民法”(The Colonial Laws of New York), 一八九四年阿爾巴尼版, 第一卷, 第一五七——一五八頁。又摩利斯書, 第八八——八九頁及第九章, “奴役制度的法定地位”(The Legal Status of Servitude), 第三九〇——五一二頁。
- ⑤ “新英格蘭歷史及家系記載”(New England Historical and Geneological Register), 一八五一年版, 第五卷, 第一六一頁。又喬治·道(George Francis Dow)編: “厄塞克司郡季節法庭的記錄與卷宗”(Records and Files of the Essex County Quarterly Courts), 一九一一年薩勒姆版, 第一卷, 第二七頁、五一頁、五七頁及第五九頁。
- ⑥ 埃第斯(Eddis)書, 第七〇頁; 又一七四〇年四月十七日“賓州日報”(Pennsylvania Gazetteer), 喬治·懷特費爾得(George Whitefield)文; 又I. N. P. 斯托克斯(I. N. P. Stokes): “曼哈坦島圖錄”(Iconography of Manhattan Island), 一九一五——一九二八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八六五頁。
- ⑦ 納桑尼耳·沙特列夫(Nathaniel B. Shurtleff)編: “新英格蘭的新普立茅斯殖民地記錄”(Records of the Colony of New Plymouth in New England), 一八五五年波士頓版, 第一卷, 第一二九頁。又尤金·麥克科爾梅克(Eugene I. McCormac): “馬里蘭的白人奴隸”(White Servitude in Maryland), 一九〇四年巴爾的摩版, 第五二頁。
- ⑧ “厄塞克司郡季節法庭的記錄與卷宗”(Records and Files of the Essex County Quarterly Courts), 第一卷, 第六頁及第一四七頁。
- ⑨ 前引耶浦斯克尔書第一七——一八頁; 又“科學和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 第一卷, 一九三七年夏季號, 第五一七頁。耶浦斯克尔: “美國黑奴的反抗”(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 ⑩ 小塞米尔·麥克基(Samuel J. McKee, Jr.):“殖民地时期紐約勞工(一六六四——一七七六年)”(Labor in Colonial New York, 1664—1776), 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第一六一——一六三頁。又 E·B·奧卡拉干(E. B. O'Callaghan)編“紐約州殖民地史料”(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一八五五年阿尔巴尼版, 第五卷, 第三九頁及第三四一頁。
- ⑪ 卡尔·布瑞頓波(Carl Bridenbaugh):“荒野中的城市”(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一九三八年紐約版, 第三七——三八頁。
- ⑫ 班哲民·熱許(Benjamin Rush):“宾州德國居民習俗”(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of the German Inhabitants of Pennsylvania), 一八七五年費列得尔菲亞版, 第一〇頁。同时參看一七一六年六月十八日——二十五日、一七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波士頓訊息”(Boston News-Letter)。
- ⑬ 亞丹·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八四五年倫敦版, 第一卷, 第三四頁。
- ⑭ 一七七一年二月十一日“紐約水星報”(New York Mercury)。
- ⑮ 前引麥克基書, 第二九頁; 又布瑞頓波書, 第三三七頁; 又哈洛德·威廉遜(Harold F. Williamson):“美國經濟的成長”(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一九四四年紐約版, 第六〇——六二頁; 又里查·摩利斯(Richard B. Morris):“殖民时期中的生產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又前引摩利斯書第三八——四一頁。
- ⑯ 里查·摩利斯:“早期美國政府与勞工問題”(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第四四——四五頁。
- ⑰ 美國勞工統計局(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第四九九号公报, 第五〇——五一頁(一九二九年發行); 又泰尔考特·威廉斯(Talcott Williams):“一百年前的勞工”(Labor a Hundred Years Ago), 一八八七年紐約版, 第九頁; 又奧卡拉干(O'Callaghan)編“紐約殖民地史料”(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New York), 第四卷, 第七〇七頁及第五卷, 第一九六頁及第三四三頁; 又摩利斯:“早期美國政府与勞工問題”, 第四七——四八頁。
- ⑱ 前引麥克基書, 第一一——一二頁; 又蘭納德·倫德林(Leonard Lundlin):“革命戰場”(Cockpit of the Revolution), 一九四〇年新澤西州普麟斯吞版, 第二七頁。
- ⑲ “麻州最高殖民法庭的記錄”(Records of the Courts of Assistants,

-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一九〇四年波士頓版; 第二卷, 第三頁。又“厄塞克司郡季節法庭的記錄與卷宗”(Records and Files of the Essex County Quarterly Courts), 第一卷, 第三頁; 又美國勞工統計局第四九九號公報, 第一〇頁。
- ⑳ 一七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賓州時事廣告報”(Pennsylvania Chronicle and Universal Advertiser); 又約翰·密勒(John C. Miller): “美國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九四三年波士頓版, 第二七五頁。
- ㉑ 前引布瑞頓波書第二〇一頁。關於南部工人抗議使用黑奴事例, 可參看耶茨·斯諾頓(Yates Snowden): “南卡羅來納州勞工組織筆記(一七四二——一八六一)”(Notes on Labor Organization in South Carolina, 1742—1861), 一九一四年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版, 第七頁。又艾倫·強得勒(Allen D. Chandler)編: “喬治亞州殖民大事記”(The Colonial Records of Georgia), 一九〇八年阿特蘭泰版, 第五卷, 第三七八——三七九頁。
- ㉒ 查理·林肯(Charles Z. Lincoln)編: “紐約州長言論集”(Messages from the Governors of New York), 一九〇九年阿爾巴尼版, 第一卷, 第二六〇頁。又一七六八年二月四日“紐約新聞”(New York Journal)。又參看“賓州檔案”(Pennsylvania Archives), 第八集, 第二卷, 第一四七七頁; 又摩里斯(Morris): “早期美國政府與勞工問題”(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第一八二——一八六頁。
- ㉓ 一七五三年三月十九日“紐約郵童報”(New York Post Boy)。
- ㉔ 一九二九年四月“新英格蘭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 第二卷, 第三〇九頁。羅伯特·西伯爾特(Robert F. Seyboldt): “殖民地時代波士頓的雇用合同”(Trade Agreements in Colonial Boston); 又一七四一年二月二日“波士頓每周訊息”(Boston Weekly News-Letter)。
- ㉕ “技工與木工友誼會之文件與條例(一七六七年三月十日)”(Artic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Friendly Society of Tradesmen and House Carpenters, March 10, 1767), 存紐約公共圖書館善本室; 又“紐約市市議會議事錄”(Minutes of the Common Council of New York), 一九〇五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一七七頁。又喬治·愛德華(George W. Edwards): “作為十八世紀中自治市的紐約(一七三一——一七七六年)”(New York as an Eighteenth Century Municipality, 1731—1776), 一九一七年紐約版, 第九〇——九一頁。

- ②⑥ “紐約市市參議會議事錄”第五卷，第一五頁；又奧卡拉干(O'Callaghan)編：“紐約殖民地史料”(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New York)，第三卷，第一六頁、三〇九頁、三二六頁、及第三二八頁；又馬利安娜·凡·阮斯萊爾(Marianna G. Van Rensselaer)：“十七世紀紐約史”(History of New York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九〇九年紐約版，第一卷，第六八頁及第二卷，第二一九頁。
- ②⑦ 一七五八年八月七日“紐約水尾報”。
- ②⑧ “喬治亞殖民史錄”(Georgia Colonial Records)，第一卷，第四九五頁。
- ②⑨ “新澤西歷史學會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New Jersey Historical Society)，一九三四年版，第五十二卷，第一六七頁。唐納德·凱麥爾(Donald L. Kemmerer)：“殖民地新澤西的選舉權”(The Suffrage Franchise in Colonial New Jersey)；又卡尔·培克(Carl Becker)：“紐約省政黨史(一七六〇—一七七六年)”(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1760—1776)，一九〇九年威士康辛州麥迪生版，第一——一七頁。又卡尔·布瑞頓波(Carl Bridenbaugh)和杰西卡·布瑞頓波(Jessica Bridenbaugh)：“暴動者与上流人”(Rebels and Gentlemen)，一九四二年紐約版，第一四頁。又一九一六年六月“麻州歷史學會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第四十九卷，第四五四頁。
- ③⑩ 前引斯托克斯(Stokes)書第四卷，第五三六頁；又默耳·寇蒂(Merle Curti)：“美國思想的發展”(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一九四三年紐約版，第四五頁。
- ③⑪ 亨利·培爾耐浦(Henry W. Belknap)：“麻州厄塞克司縣的商業与商人”(Trades and Tradesmen of Essex County, Massachusetts)，一九二九年薩勒姆版，第九頁。
- ③⑫ 布瑞頓波(Bridenbaugh)：“荒野中的城市”(Cities in the Wilderness)，第二五六頁。
- ③⑬ 菲利浦·伯魯斯(Philip A. Bruce)：“十六世紀弗吉尼亞制度史”(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Virgin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一九一〇年紐約版，第一卷，第六四四—六七五頁。又湯姆斯·魏登巴克(Thomas J. Wertenbaker)：“革命的火炬手”(Torchbearer of the Revolution)，一九四〇年新澤西州普蘭斯吞版，第八——一四頁。
- ③⑭ 奧卡拉干(O'Callaghan)編：“紐約州殖民地史料”(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第五卷，第三二二頁；又凡尔米勒牧师(Rev.

A. G. Vermilye): “一六八九年的賴斯勒糾紛”(The Leisler Troubles of 1689), 一八九一年紐約版, 第二五頁。

- ③⑤ 一九二一年九月“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三十六卷, 第五八六——六〇二頁。喬治·愛德華(George W. Edwards): “美國革命前的紐約政治”(New York Politics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又一七三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及十月十四日“紐約公報”(New York Gazette); 又一七三四年十月十四日“紐約周報”(New York Weekly Journal); 又一七三四年九月八日由提摩西·惠爾賴特(Timothy Wheelwright)和約翰·齊索(John Chissel)簽字的傳單, 及“一支歌——一七三四年”(A Song—1734), 均存紐約公共圖書館善本室。
- ③⑥ 前引愛德華書第五八七頁及第五九三頁; 又奧卡拉干編“紐約州殖民期史料”第六卷, 第七——八頁。
- ③⑦ 阿伯特·哈爾特(Albert B. Hart)編: “現代人談美國史”(American History Told by Contemporaries), 一八九八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一九八頁。
- ③⑧ 約翰·密勒(John C. Miller): “山姆·亞當斯傳”(Sam Adams), 一九三六年波士頓版, 第九——五頁。

第三章

- ① 一九三一年四月“新英格蘭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 第四卷, 第二四〇——二六六頁。寇蒂斯·奈脫爾司(Curtis P. Nettels): “一六九〇——一七二〇年殖民地製造業的威脅”(The Menace of Colonial Manufacturing 1690—1720); 又克萊倫斯·艾爾弗特(Clarence V. Alvord): “密士西比流域與英國政治”(The Mississippi Valley in British Politics), 一九一七年克里夫蘭版, 第一卷, 第八八——九九頁。
- ② 約翰·密勒(John C. Miller): “美國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第二三頁。
- ③ 寇蒂斯·奈脫爾司: “美國文明的根源”(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一九三八年紐約版, 第一七——二二頁。
- ④ 摩西·泰勒(Moses C. Tyler): “美國革命文學史(一七六三——一七八三年)”(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 一八九七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一〇〇——一〇一頁。
- ⑤ 麻州殖民會社“叢刊”(Publications), 第十九卷, 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 第二五九頁。查理·安德魯斯(Charles M. Andrews): “波士頓商人与不進口運動”(Boston Mer-

chants and the Non-Importation Movement)。

- ⑥ 杰尔德·斯巴克司(Jared Sparks): “摩利斯州長生平”(Life of Gouverneur Morris), 一八三二年波士頓版, 第一卷, 第二五頁。又 H·C·凡·沙克(H. C. Van Schaack): “彼得·凡·沙克的一生”(Life of Peter Van Schaack), 一八四二年紐約版, 第四七頁。
- ⑦ 一九三二年一月“北卡罗來納州歷史評論”(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第九卷, 第五〇——五四頁。又非利浦·戴維生(Philp Davidson): “自由之子和頑固人”(Sons of Liberty and Stamp Men)。
- ⑧ 一七六五年十一月七日“紐約公報”(New York Gazette); 又爱默遜·泰勒(Emerson Taylor): “保罗·瑞弗尔傳”(Paul Revere), 一九三〇年紐約版, 第七〇頁。又里查·摩利斯(Richard B. Morris) 編: “美國革命时代”(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九三九年紐約版, 第二七二——二七三頁。赫勃脫·毛萊士(Herbert M. Morais): “紐約自由之子”(The Sons of Liberty in New York); 又 C·C·瓊斯(C. C. Jones): “乔治亞州史”(History of Georgia), 一八八三年波士頓版, 第六——頁。又“康州歷史学会文集”(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

lections), 第十八卷(一九二〇年版)中“菲区文稿”(Fitch Papers), 第三八四——三八五頁。

- ⑨ 波士頓通訊委员会(Boston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手稿, 第六卷, 第四七二——四七三頁, 存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室; 又威廉·克特(William Cutter): “依士雷尔·潑特倫生平”(Life of Israel Putnam), 一八六一年紐約版, 第一三三頁。又一九三三年三月“新英格蘭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 第六卷, 第九八——一三〇頁。R·S·朗雷(R. S. Longley): “革命时期麻州的暴民活动”(Mob Activities in Revolutionary Massachusetts); 又伊利莎白·梅·勃萊克(Elizabeth May Blake): “紐約城对印花稅法案的反对”(Opposition to the Stamp Act in New York City), 第三八頁(一九三六年敘拉古斯大學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 ⑩ 詹姆斯·霍斯默(James K. Hosmer): “湯姆斯·赫特琴生的生平”(The Life of Thomas Hutchinson), 一八九六年波士頓版, 第二三八頁; 又一九四〇年十月“中美”(Mid-America), 第二十二卷, 第二五二頁; 查理·麥澤爾(Charles M. Metzger): “宣傳和美國革命”(Propagan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又約翰·密勒(John C. Miller): “山姆·亞當斯傳”(Sam Adams), 第三〇二頁; 又 R·弗

- 勞星漢 (R. Frothingham): “約瑟夫·華倫的一生及其時代” (Life and Times of Joseph Warren), 一八六五年波士頓版, 第一三七頁。
- ⑪ 一九四〇年一月“賓州歷史和傳記雜誌”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第六十四卷, 第三〇頁; 又 H·L·卡爾金 (H. L. Calkin): “美國革命時期的流行讀物和輿論” (Pamphlets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又一七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南卡羅來納公報” (South Carolina Gazette)。
- ⑫ “一支新歌——獻給美洲的‘自由之子’ (一七六八年)”, (A New Song—Address'd to the Sons of Liberty on the Continent of America, 1768), 存賓夕法尼亞的歷史學社圖書館; 又一七六六年一月六日“紐約公報” (New York Gazette)。
- ⑬ 本生·羅新 (Benson J. Lossing): “革命戰場圖片集” (Pictorial Field-Book of the Revolution) 一八六〇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四八二頁。又一八九四年“美國歷史實錄” (American Historical Register), 第一卷, 第二九——三六頁; R·J·柏爾克 (R. J. Burkner): “自由女兒” (The Daughters of Liberty); 又一七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波士頓新聞” (Boston Chronicle)。
- ⑭ 約翰·密勒: “美國革命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第三四四頁; 又一七六六年四月四日由波士頓發出的信的手稿, 存羅得島歷史協會。
- ⑮ W·W·維爾拉得 (W. W. Willard) 編: “論美國革命的書信集” (Letter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九二五年波士頓版, 第二五頁。
- ⑯ 阿瑟·施列興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殖民期商人和美國革命”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九一八年紐約版, 第三八二——三八七頁。又約翰·密勒: “山姆·亞當姆斯傳”, 第二九九頁。
- ⑰ 里查·摩里斯 (Richard B. Morris) 編: “美國革命時代”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第三三七——三三九頁所載邁克爾·克勞斯 (Michael Kraus): “十八世紀美國與愛爾蘭革命運動” (America and the Irish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一文; 又見維爾拉得書第一二一頁、二一六頁; 又一七七五年三月十二日“紐波得水星報” (Newport Mercury)。
- ⑱ “威廉瑪利季刊”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第二集, 第四十卷, 第九四頁; 格利恩·史密斯 (Glenn C. Smith): “不進口協會的時代” (An Era of Non-Importation Associations) 一文; 又“戒基遜訊集” (Gage Correspondence), 第一卷,

- 第一九七頁。
- ①⑨ 前引培克書,第二八頁。
- ②⑩ 前引塞勒斯書,第二〇五——二〇九頁。
- ③⑪ 伊瑟·福尔勃斯(Esther Forbes):“保罗·瑞弗尔和他的时代”(Paul Revere and the World He Lived In),一九四二年波士頓版,第一八七頁;又迈理尔·真森(Merrill Jensen):“联邦問題論文集”(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一九四〇年威士康辛州麥迪生版,第四五頁;又L·H·吉浦生(L.H. Gipson):“杰瑞·英節索尔傳”(Jared Ingersoll),一九二〇年紐約版,第二七〇頁。
- ④⑫ 菲利浦·戴維生(Philip Davidson):“宣傳和美國革命(一七六三——一七八三年)”(Propagan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一九四一年北卡罗來納州,卡波山城版,第七七頁。
- ⑤⑬ “宾州歷史和傳記雜誌”(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一八八五年版,第九卷,第一九六頁;一八九七年版,第二十一卷,第四七八頁;又一九三八年版,第六十二卷,第三〇六頁。
- ⑥⑭ 轉引自克勞德·凡·泰恩(Claude Van Tyne):“美國革命中的保皇黨”(Loyalist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九〇二年紐約版,第一四二頁。
- ⑦⑮ “乔治亞歷史學社文集”(Georgia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一八七三年塞凡那版,第三卷,第二二八頁。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詹姆斯·賴特州長(James Wright)致达特末斯勋爵(Lord Dartmouth)一信。
- ⑧⑯ 轉引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加拿大歷史評論”(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第十二卷,第二六七頁,查理·密列特(Charles F. Millett):“獨立宣言前夕的英王党帝國主義”(Tory Imperialism on the Ev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⑨⑰ 克勞德·凡·泰恩:“獨立戰爭的起源”(The Causes of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一九二二年紐約版,第三九四——三九五頁。
- ⑩⑱ “美國革命时期的紐約城……原始記錄”(New York City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Original Papers),第五四——五五頁(馬利納斯·維勒特上校[Colonel Marinus Willet's]的敘述);又約翰·亞当姆斯(John Adams):“寄妻信函”(Letters Addressed to His Wife),一八四一年波士頓版,第一卷,第四二頁。又唐納德·凱麥尔(Donald L. Kennerer):“到自由之路:新澤西殖民地爭取自治的斗争”(Pathway to Freedom: The Struggle for Self-Government in Colonial New Jersey),一九四〇年新澤西州普麟斯吞版,第三二七

- 頁。
- ②⑨ 華星吞·福特 (Worthington C. Ford) 編：“大陸會議報”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一九〇四——一九三七年華盛頓版，第一卷，第八六——八九頁。又愛德華·麥克可芮第 (Edward McCrady)：“革命時期南卡羅來納史 (一七七五——一七八〇年)”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in the Revolution, 1775—1780)，一九〇一年紐約版，第二七〇頁。
- ③⑩ 菲利浦·方納 (Philip S. Foner) 編：“湯姆斯·裴因全集”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三〇——三一頁。
- ③⑪ “新澤西州檔案” (New Jersey Archives)，第十卷，第一七九頁；又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國革命女兒們雜誌” (Magazine of 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五十五卷，第六一七頁；約翰·費茲派特立克 (John C. Fitzpatrick)：“革命戰爭通信及安全委員會” (The 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 and Safety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 ③⑫ 前引麥克可芮第書，第三九——四〇頁。
- ③⑬ 一九四二年“科學和社會” (Science and Society) 夏季號，第六卷，第二三六頁，赫勃脫·毛萊士 (Herbert M. Morais)：“工人民主與美國革命” (Artisan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③⑭ 卡尔·凡·道倫 (Carl Van Doren)：“一月兵變” (Mutiny in January) 一九四三年紐約版，第四三頁。又斯梯爾林 (Sterling) 手稿，第四册，第六二頁，一七七六年三月四日存紐約歷史學會。
- ③⑮ “賓州檔案” (Pennsylvania Archives)，一八五三年費列得爾非亞版，第一集，第八卷，第七三〇頁。
- ③⑯ 一九一六年四月“黑人歷史”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一卷，第一一九——一二八頁；W·B·哈特格勒夫 (W. B. Hartgrove)：“美國革命中的黑人士兵” (The Negro Soldier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③⑰ 赫伯特·耶浦斯克尔 (Herbert Aptheker)：“美國革命中的黑人”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九四〇年紐約版，第三四——四一頁。
- ③⑱ 菲利浦·方納 (Philip S. Foner) 編：“喬治·華盛頓選集” (George Washingto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一六——一七頁。
- ③⑲ 同上書，第五九——六〇頁。
- ④⑰ 查理·佛朗西斯·亞當姆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 編：“美國革命時期約翰·亞當姆斯夫婦通信集” (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

-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八七六年紐約版, 第三六五頁。
- ④ C·J·霍德雷(C. J. Hoadley)編: “康涅狄克公務記錄”(Public Records of Connecticut), 一八九四年康涅狄克州哈特福特版, 第一卷, 第六二頁。
- ⑤ 罗伯特·伯倫豪斯(Robert L. Brunhaus): “宾夕法尼亞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Pennsylvania), 一九四三年費列得尔菲亞版, 第七〇——七一頁。
- ⑥ G·H·伯萊登(G. H. Bryden)編: “凱撒·罗德尼來往信件集”(Letters to and from Caesar Rodney), 一九三三年費列得尔菲亞版, 第三〇三頁。又安利亞斯·欧伯霍茨尔(Elias P. Oberholtzer): “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 一九〇三年紐約版, 第五一——五六頁。又前引伯倫豪斯書, 第七一頁及以下數頁。
- ⑦ 前引伯倫豪斯書, 第五八頁; 又尤金·林克(Eugene P. Link): “民主共和黨會社(一七九〇——一八〇〇年)”(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第二六頁。
- ⑧ 前引卡尔·凡·道倫書, 第二一三——二一四頁。
- ⑨ E·R·透納(E. R. Turner): “宾州的黑人”(The Negro In Pennsylvania), 一九一一年華盛頓版, 第九二頁。
- ⑩ 一七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獨立日報”(Independent Journal); 又前引麥克科尔梅克書, 第七六頁; 又“宾州歷史”(Pennsylvania History), 一九四〇年版, 第七卷, 第一三六頁, 威廉·密勒(William Miller): “美國革命对合同勞役的影响”(The Effe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Indentured Servitude)。
- ⑪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一日“全國勞工”(National Laborer)。
- ⑫ 一八四四年七月六日“福尔河技工”(Fall River Mechanic)。

第 四 章

- ① 一七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七月十七日、九月八日及十月七日“紐約廣告人報”(New York Advertiser)。
- ② 一八二一年一月“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 第十二卷, 第八五——八六頁; 又約翰·勃瑞斯特得(John Bristed): “美國及其資源”(America and Her Resources) 一八一八年倫敦版, 第五四頁。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經濟商業史報”(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第四卷, 第七八四頁及以下數頁; 塞米爾·雷茲納克(Samuel Rezneck): “一七六〇——一八三〇年美國工業意識的蘇醒及其早期發展”(The Rise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60—1830)。

- ③ 菲利浦·方納 (Philip S. Foner) 編: “湯姆斯·杰斐遜作品選集” (Thomas Jefferso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一九四三年紐約版, 第三〇頁。
- ④ 前引雷茲納克書, 第八〇一頁。
- ⑤ 維克多·克拉克 (Victor S. Clark): “美國製造業歷史”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二九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三八〇頁。
- ⑥ 一八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尼羅斯實錄” (Niles' Register), 第十二卷, 第二八六——二八七頁。
- ⑦ 恩格斯 (Frederick Engels): “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一九三六年倫敦版, 第二九五頁。
- ⑧ 哈利·卡門 (Harry J. Carman): “美國社會經濟史”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三四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一八頁。
- ⑨ W·R·培格奈爾 (W.R. Bagnall): “塞米爾·斯萊特和美國棉織品業的早期發展” (Samuel Slater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九〇年康涅狄克州密德爾坦版, 第四四頁。
- ⑩ 考羅林·魏爾 (Caroline F. Ware);

“新英格蘭早期的棉織業” (The Early New England Cotton Manufacture), 波士頓一九三一年版, 第六四頁。又一九三三年六月 “商業史學會會刊” (Bulletin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第七卷, 第六——一三頁; 喬納森·泰勒·林肯 (Jonathan Taylor Lincoln): “新英格蘭機器時代的開始: 有關採用動力機梭文件集” (The Beginning of the Machine Age in New Engl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wer Loom)。

- ⑪ 查理·威爾遜 (Charles A. Wilson): “窩爾坦的過去和現在及其工業” (Waltham, Past and Present, and its Industries), 一八七九年麻州劍橋版, 第一二二——一三〇頁。又休爾文·考浦蘭 (Melvin T. Copeland): “美國棉織工業” (The Cott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八八年波士頓版, 第三八頁。
- ⑫ 維拉·錫拉克曼 (Vera Shlakman): “一座工廠城的經濟史”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一九三五年麻州諾坦普吞版, 第三一、三七、四八頁。
- ⑬ 布朗士·哈澤德 (Planche E. Hazard): “一八七五年以前麻州靴鞋工業的組織”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oot and Shoe Industry in Massachusetts before 1875), 一

- 九二一年麻州劍橋版，第九三——九六頁、第一一二、一二四頁及以下諸頁。
- ⑭ 一九二九年二月“經濟商業史報”(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第一卷，第二四——二八一頁；又L·C·亨特爾(L. C. Hunter)：“一八六〇年前市場對於西賓夕法尼亞鐵業技術的影響”(Influence of the Market upon Techniques in the Iron Industry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to 1860)。
- ⑮ 轉引自湯姆斯·考可蘭(Thomas C. Cochran)和威廉·密勒(William Miller)：“企業時代”(The Age of Enterprise)，一九四二年紐約版，第六頁。
- ⑯ 迈克尔·穆羅(Michael G. Mulhall)：“工業和國家財富”(Industries and Wealth of Nations)，一八九六年倫敦版，第三二、二九二——二九八頁及第三七七——三八〇頁。
- ⑰ 國會第三九屆大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行政文件集”(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第二號，第一〇頁；又“耶波頓年鑒”(Appleton's Annual Cyclopedic)，一八六二年版，第六九九頁。又一八六四年七月十日及二十七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 ⑱ 弗萊得立克·默克(Frederick Merk)：“內戰時期威士康辛的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in Wisconsin during the Civil War)，一九一五年威士康辛州麥迪生版，第一七〇——一七一頁；又一八七〇年的“聯邦調查”(Federal Census)，人口部分，第七九三頁；又海倫·堪浦別爾(Helen Campbell)：“職業婦女”(Women Wage Earners)，一八九三年波士頓版，第一〇一頁。
- ⑲ 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無煙煤工業”(The Anthracite Coal Industry)，一九〇一年紐約版，第一九頁。
- ⑳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三日“商業與金融日報”(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又亞馬孫·弗愛脫(Emerson D. Fite)：“內戰期北部社會經濟狀況”(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一九一〇年紐約版，第一六五頁。
- ㉑ 司杜爾特·戴吉特(Stuart Daggett)：“南太平洋歷史片斷”(Chapt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Pacific)，一九二二年紐約版，第一九九——二二一頁。
- ㉒ “特別委員會關於所謂抵押投資所受賄事件調查報告(一八七三年二月十八日)”(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lleged Credit Mobilier Bribery, February 18, 1873)，一八七三年華盛頓版，第X頁。
- ㉓ 一八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全國勞

工論噴報”(National Labor Tribune)。

- ⑳ 轉載于愛德華·魏克(Edward A. Wieck):“美國礦工協會”(The American Miners' Association),一九四〇年紐約版,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 ㉑ 菲利浦·方納(Philip S. Foner)編:“林肯選集”(Abraham Lincol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八四——八五頁。
- ㉒ 詹姆斯·夕威斯(James C. Sylvis):“威廉·夕威斯的生平、演說及論文”(The Life, Speeches, Labors and Essays of William H. Sylvis),一八七二年費列得爾菲亞版,第九八、一一〇、一一二——一三、一五五——一五六頁及四四八——四五〇頁。

第五章

- ① “美國國家公報”(American State Papers),財政部分,一八五八年華盛頓版,第四卷,第六六二號。
- ② 一八八八年“麻州歷史學會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第二集,第四卷,第一二四頁,“昆西一八〇一年旅行報告”(Account of a Journey of Josiah Quincy in 1801)。
- ③ 前引克拉克書,第五七頁;又前引史都華書,第二〇——二三頁;又哈利特·羅賓遜(Harriet H. Robinson):“紡織機和紡錠”(Loom and Spindle),一八九八年紐約、波士頓版,第六頁。
- ④ 西德尼·波默蘭茨(Sidney I. Pomerantz):“一七八三——一八〇三年的一个美國城市——紐約”(New York, An American City, 1783—1803),一九三八年紐約版,第二一六——二一七頁。
- ⑤ 約翰·坎門司(John R. Commons)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克里夫蘭版,第三卷,第一一八頁。
- ⑥ 亨利·菲隆(Henry B. Fearon):“美國概述”(Sketches of America),一八一九年倫敦版,第四〇四頁。
- ⑦ 佛蘭克·莫納汗(Frank Monaghan)和馬文·羅文瑟爾(Marvin Lowenthal):“這就是紐約:一七八九年的首都”(This Was New York: The Nation's Capital in 1789),一九四三年紐約花園城版,第八〇——八一頁。
- ⑧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二十四卷,第五〇頁及以下數頁;又約翰·坎門司(John R. Commons):“一六四八——一八九五年的美國制鞋工業”(American Shoemakers, 1648--1895);又坎門司:“美國勞工史”(History of

-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一卷, 第一〇四頁。
- ⑨ T. 耳厄 (T. Earle) 和 C. T. 康登 (C. T. Congdon) 合編: “紐約工商業總會年鑑 (一七八五——一八〇〇年)” (Annals of the General Society of Mechanics and Tradesme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785—1800), 一八八二年紐約版, 第一〇——二二頁。又詹姆斯·威爾遜 (James G. Wilson) “紐約城年記” (Memorial 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紐約版, 第三卷, 第一六頁, 又前引波默蘭茨書, 第二一五頁。
- ⑩ 喬納桑·布却爾 (Jonathan Boucher): “略論美國革命形成的原因及其後果”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一七九七年倫敦版, 第三〇九頁。
- ⑪ 前引莫納汗、羅文瑟爾書, 第七七頁; 又前引里查·摩里斯書, 七七、八一頁。
- ⑫ 前引里查·摩里斯書, 第七七頁、第八一——八四頁。
- ⑬ 艾西耳伯特·史都華 (Ethelbert Stewart): “印刷工人早期組織史料”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rly Organization of Printers), 一九〇七年印第安納波利斯版, 第六頁; 又前引耳厄和康登書, 第三八一頁。
- ⑭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第三卷, 第三六四頁。
- ⑮ 一八一七年七月四日“民族擁護者” (National Advocate); 又一八四五年十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Working Man's Advocate)。
- ⑯ 喬治·屈萊賽 (George A. Tracy): “印刷工會史” (History of the Typographical Union), 一九一三年印第安納波利斯版, 第一九頁及以下諸頁。
- ⑰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三卷, 第三六五頁; 又前引史都華書, 第四七頁及第一〇一頁。
- ⑱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三卷, 第三七〇頁。
- ⑲ 同上書, 第三六頁; 又 G. A. 史蒂文斯 (G. A. Stevens): “紐約印刷業工會史”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Typographical Union), 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第六號, 第七〇頁。
- ⑳ 前引史都華書, 第一〇一頁。
- ㉑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六卷, 第三九二頁; 又詹姆斯·杜魯斯洛·亞當斯 (James Truslow Adams): “一七七六——一八五〇年合眾國中的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in the Republic, 1776—1850), 一九二六年波士頓版, 三四六頁。
- ㉒ 前引史都華書, 第二四——二五頁, 三九、五二頁。
- ㉓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

三卷，第七四——七六頁及第三六九頁；又前引史都華書，第一九——二〇頁；又前引斯蒂文斯書，第四五頁及第六〇頁。

②④ 前引斯蒂文斯書，第七二——七三頁。

②⑤ 同上書，第一六頁。

②⑥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三卷，第三六四——三六六頁。

②⑦ 同上書，第二九四頁。

②⑧ 前引斯蒂文斯書，第七二——七三頁。

②⑨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三卷，第八三、九三頁及第九七——九八頁；又坎門司：“美國勞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第一卷，第一一〇——一一一頁。

③⑩ 前引斯蒂文斯書，第四七頁。

③⑪ 同上書，第六四頁；又前引史都華書，第三五頁。

③⑫ “勞工統計局第十六次年報”(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一八八五年譯薩諸塞州版；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三卷，第一三六頁。

③⑬ 斯蒂芬·辛柏遜(Stephen Simpson)：“工人手冊”(The Working Man's Manual)，一八三一年費列得爾菲亞版，第八六頁。

③⑭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哥倫比亞法律評論”(Columbia Law Review)，第三十二卷，第一一二九頁，華特·奈

耳斯(Walter Nelles)：“聯邦政府對亨特訴訟案”(Commonwealth V. Hunt)。

③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耶魯法律學報”(Yale Law Journal)，第四十一卷，第一七七頁；華特·奈耳斯：“第一個美國勞工案件”(The First American Labor Case)。

③⑯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三卷，第一六七、一七二頁及第一七七頁；又“耶魯法律學報”，第四十一卷，第一七七頁，奈耳斯(Nelles)文。

③⑰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四卷，第一六頁。

③⑱ 前引史都華書，第一八頁。

第六章

① 一七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賓州郵訊”(Pennsylvania Packet)。

② “美國文件”(United States Documents)，第四十一卷，第一部分，第二六三〇——二六三一頁，“一七七七年憲法，第七條”(Constitution of 1777, Article VII)。

③ 一七八四年十月九日“獨立新聞報”(Independent Gazetteer)“阿米納斯”(Arminius)一文。又參看同上報“老機工”(An Old Mechanic)一文。

④ C·W·斯泡丁(C.W. Spaulding)：“一七八三——一七八九年危機中的紐約”(New York in the Critical Period, 1783—1789)，一九三九年

- 紐約版,第一〇七——一〇八頁;又前引波默蘭茨書第九五——九六頁;一七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及二十五日“紐約日報”(New York Gazetteer);又一七八五年四月七日、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紐約郵訊”(New York Packet)。
- ⑤ 前引斯泡丁書,第一七七頁;又約翰·密勒(John C. Miller):“山姆·亞當斯傳”(Sam Adams),第三七八——三七九頁;又查理·皮爾特(Charles A. Beard):“從經濟看美國憲法”(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一三年紐約版,第二四一、二四四頁及第二四七頁;又一七八八年七月九日“賓州公報”(Pennsylvania Gazette)。
- ⑥ 一七八七年十月三日及十二月十九日“賓州公報”。
- ⑦ 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公報”(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第九二——九三頁;小杰卡利阿·柴菲(Zachariah Chaffee, Jr.):“一切權力屬人民”(The Bill of Rights Belongs to the People)。
- ⑧ 威廉·羅賓遜(William A. Robinson):“新英格蘭杰斐遜時代的民主政治”(Jeffersonian Democracy in New England),一九一六年新港版,第一——四頁。
- ⑨ 一七九四年三月五日“紐約新聞”(New York Journal);又一七九三年一月三日“鄧萊普美國每日廣告報”(Dunlap's 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又W·R·費義(W. R. Fee):“新澤西州從貴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轉變(一七九九——一八二九年)”(Transition from Aristocracy to Democracy in New Jersey, 1799—1829),一九三三年新澤西州散麥維爾城版,第四四頁。
- ⑩ 一七九四年三月五日及一七九六年十月十一日“紐約新聞”。
- ⑪ 前引林克書,第九一——九二頁及第一一五頁。
- ⑫ 一七九四年八月二日“美國廣告人日報”(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
- ⑬ 前引林克書,第一六六——一七一頁。
- ⑭ 同上書,第一五八頁。
- ⑮ 威廉·曼寧(William Manning):“自由的鎖鑰”(The Key of Liberty),一九二二年麻州貝勒維亞版,第六六——七一頁。
- ⑯ 前引林克書,第一五一頁;又菲利浦·方納編:“湯姆斯·裴因全集”(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一八三頁。
- ⑰ 前引林克書,第一五一頁。
- ⑱ 魏爾農·斯陶佛爾(Vernon Stauffer):“新英格蘭的教士和巴伐利亞的知識階層”(New England Cler-

- gy and the Bavarian Illuminati), 一九一八年紐約版, 第一三——二二頁; 又提摩賽·德怀特(Timothy Dwight): “目前危机中美國人的責任”(The Duty of Americans at the Present Crisis), 一七九八年新港版, 第二〇——二一頁。
- ⑱ 轉引自約翰·華尔夫(John H. Wolfe): “南卡罗來納杰斐遜時代的民主政治”(Jeffersonian Democracy in South Carolina), 一九四〇年卡波山城版, 第一四四頁。
- ⑳ 轉引自前引林克書, 第九六頁。
- ㉑ “漢密爾頓對製造業問題在國會的報告(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日)”(Alexander Hamilton's Report on Manufactures Made to Congress, December 5, 1791), 一八九二年波士頓版, 第二九頁。
- ㉒ 薩莫·艾呂特·摩利生(Samuel Eliot Morison): “哈利遜·格雷·奧提斯的生平及其書信集”(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arrison Grey Otis), 一九一三年波士頓版, 第一卷, 第二一八頁。
- ㉓ “一九一二年美國歷史學會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1912), 第一二三——一二四頁; 又佛蘭克·安德孫(Frank M. Anderson): “外僑法與暴動法的實施”(The Enforcement of the Alien and Sedition Laws)。
- ㉔ 前引波默爾茨書, 第一二九頁。
- ㉕ 一九三八年七月“賓州歷史”(Pennsylvania History), 第五卷, 第一四五頁; 格林·布雪(Glenn L. Bushey): “威廉·杜安: 司法改革運動者”(William Duane: Crusader for Judicial Reform)。
- ㉖ “哥倫比亞法律評論”(Columbia Law Review), 第三十二卷, 第一一六三——一一六四頁。
- ㉗ 狄克生·雷安·福克斯(Dixon Ryan Fox): “貴族在紐約政治上的衰微”(The Decline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Politics of New York), 一九一八年紐約版, 第八八頁。
- ㉘ 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 “新英格蘭聯邦主義文件集”(Documents Relating to New England Federalism), 一八七八年紐約版, 第三九二頁。
- ㉙ 同上。
- ㉚ 轉引自前引華尔夫書, 第二三二頁。
- ㉛ 一八〇八年一月四日“獨立時事日報(波士頓)”(Independent Chronicle [Boston])。又參看一八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二月三日、五日、七日、三月二十七日及一八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費列得爾非亞的“曙光”(Aurora)。
- ㉜ “紐約市市議會議事錄”(Minutes of the Common Council of New York City), 第四卷, 第六九九——七〇一頁。
- ㉝ 克勞德·包爾斯(Claude G. Bow-

- ers): “杰斐遜執政時期”(Jefferson in Power), 一九三六年波士頓版, 第四三三頁。
- ②④ 一八〇八年四月三十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又一九二七年“紐約州歷史協會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New York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第二十五卷, 第一四四——一四五頁, 維基尼亞·哈靈頓(Virginia D. Harrington): “紐約和一八〇七年的封鎖”(New York and the Embargo of 1807)。
- ②⑤ 前引包爾斯書第二三九頁; 又見前引亨利·亞當姆斯書, 第一七二頁。
- ②⑥ 一九三八年四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四十三卷, 第五五九——五六〇頁, T·S·馬退爾(T. S. Martell): “北部同盟盟員策略側面觀”(A Sidelight on Federalist Strategy)。
- ②⑦ 一八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里士滿訊問報”(Richmond Enquirer); 又一八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尼羅斯實錄”(Niles' Register), 第三卷, 第二四六——二四八頁; 又一八一二年二月二十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又一八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紐亞克前哨報”(Newark Sentinel); 又前引華爾夫書第二五七頁注; 又前引史都華書第五四頁。
- ②⑧ 一八一四年八月十二日及二十八日“紐約晚郵報”; 又一八一四年八月十一日“紐約旁觀者報”; 又一八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尼羅斯實錄”, 第六卷, 第四四一頁; 又一八一四年八月十五日“紐約市市議會議事錄”(Minutes of the Common Council of New York City); 又一九四五年十月“紐約歷史學會季刊”(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Bulletin), 第二十九卷, 第二〇三——二一二頁; W·E·耶浦加(W. E. Apgar): “紐約在一八一二年戰爭中的貢獻”(New York's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 of 1812)。
- ②⑩ 本生·羅新(Benson J. Lossing): “一八一二年戰爭戰地圖片集”(Pictorial Field Book of the War of 1812), 一八六八年紐約版, 第九七〇——九七一頁。
- ②⑪ 威廉·奈耳(William C. Nell): “一七七六年及一八一二年戰爭中的有色美國人”(Colored Americans in the Wars of 1776 and 1812), 一九〇二年費列得爾菲亞版, 第三〇——三一頁。
- ②⑫ 約翰·斯賓塞·巴色特(John Spencer Bassett)編: “安德魯·杰克遜書信集”(Correspondence of Andrew Jackson), 一九二七年華盛頓版, 第二卷, 第一一八——一一九

頁。

- ④ 一八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康涅狄克州潮流報”(Connecticut Courant)。
- ⑤ 見前引福克斯書第二六七頁注。關於爭取取消選舉中財產限制的鬥爭的詳細敘述可參看克爾克·波特(Kirk H. Porter):“美國選舉史”(A History of Suff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九一八年芝加哥版,第四七頁及以下數頁。
- ⑥ 菲利浦·方納編:“湯姆·杰斐遜作品選集”(Thomas Jefferso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一九四三年紐約版,第二〇頁。

第七章

- ① 一八一九年八月七日、九月四日、十月二十三日“尼羅斯實錄”(Niles' Register);又一九三三年十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三十九卷,第三〇—三二頁;塞米爾·雷茲納克(Samuel Rezneck):“一八一九—一八二二年的不景氣現象”(The Depression of 1819—1822, A Social History)。
- ② 哈利特·韋特(H. A. Weed)編:“澤洛韋特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Thurlow Weed),一八八四年紐約版,第二卷,第一九頁。
- ③ 一九三七年“杜蘭法律評論”(Tulane Law Review),第十一卷,第二〇六—二〇九頁;密契·富蘭克林(Mitchell Franklin):“愛德華·李文斯敦的歷史意義”(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Edward Livingstone)。
- ④ 前引雷茲納克書,第三九—四二頁。
- ⑤ 威廉·丟多爾(William Tudor):“論東部各州問題書信集”(Letters on the Eastern States),一八二一年波士頓版,第二六三頁;又前引坎門司書,第一卷,第一七一頁。
- ⑥ 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賓夕法尼亞人”(Pennsylvanian);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第五卷,第三三〇—三三一頁。
- ⑦ 一八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又馬太·卡瑞(Matthew Carey):“向富人的呼喚”(Appeal to the Wealthy of the Land),第三版,第三—五頁。
- ⑧ 一九一〇年“美國勞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第九卷,第一二五頁,“關於美國女工和童工情況的報告”(Report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 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海倫·薩姆納(Helen L. Sumner):“美國工業中的婦女”(History of Women i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部分。
- ⑨ 馬太·卡瑞:“精選錄”(Selected Ex-

- cerpts), 第四卷, 第四三五頁 (寄存費城區書館公司); 又一八三五年八月十一日“帕特遜快報”(Paterson Courier); 又“政府文件”(State Papers), 財政部分, 第五卷, 第八一七頁; 又馬太·卡瑞: “論窮人生活的書信集”(Letters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Poor), 第二版, 第一六一——一七頁; 又一八三〇年六月十九日及七月三十一日“技工自由報”(Mechanics' Free Press); 又一八三五年十月十五日“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
- ⑩ 卡罗尔·賴特(Carrol D. Wright): “麻州工資和物價史(一七五二——一八八三)”(History of Wages and Prices in Massachusetts, 1752—1883), 一八八五年波士頓版, 第一七一頁。
- ⑪ 一八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製造工業者和農民雜誌”(Manufacturers' and Farmers' Journal)。
- ⑫ 一八三四年三月十一日“人報”(The Man); 又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七日“技工自由報”; 又一八三五年八月五日及十二日“帕特遜快報”; 又“一個美國公民向美國工人的呼吁”(An Appeal to the Working M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ir own Condition and Amelioration, By an American Citizen), 一八三三年挪利支版(存“美國哲學學會”手冊收藏部分), 第八頁。又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 又一八三五年八月十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Newark Daily Advertiser)。
- ⑬ 一八三五年八月十二日“帕特遜快報”。
- ⑭ 一八三四年三月十一日“人報”。
- ⑮ 一八二三年四月一日“路易斯安納人”(The Louisianan) [轉引自阿瑟·皮爾斯(Arthur Pearce)一九四〇年在杜蘭大學所作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新奧爾良勞工運動的盛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New Orleans), 第七——八頁。]
- ⑯ 一八二五年四月二十日“哥倫比亞前哨報”(Columbian Centinel); 又坎門司(Commons)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第六卷, 第七七——七九頁。
- ⑰ 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技工自由報”(Mechanics' Free Press)。該報登載有一本現已無存的小冊子的全文。這次重載只不過是在該小冊子出版后一年的時間內, 這可以證明那本小冊子在當時是極受歡迎的。
- ⑱ 一八二七年六月十四日“費列得爾菲亞民主報”(Philadelphia Democratic Press)。
- ⑲ 一八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技工自由報”; 又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五卷, 第八七頁。
- ⑳ 一八三二年四月三日“合作者”(The

- Co-operator); 又一八三二年九月六日及十日“波士頓郵報”(The Boston Post)。
- ⑳ 塞斯·路得 (Seth Luther): “对新英格蘭工人的致辭”(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Men of New England……), 一八三二年波士頓版, 第七—八頁; 又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六卷, 第八—八三頁; 又美國勞工局“第十六次年報”(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16th Annual Report), 第七二五頁。
- ㉑ 一八三四年十月四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又一八三三年八月五日“帕特遜快報”(Paterson Courier); 又一八二九年一月十七日“按工自由報”。
- ㉒ “新英格蘭農民工人及其他勞動者協會一八三三年全國會議記錄”(Proceedings 1833 Convention,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Farmers', Mechanics' and other Workingmen), 第七頁、二〇頁及第三二一頁; 又“美國參議院文件第六四五號”(United States Senate Document 645)(第六十一屆國會, 第二次會議), 第十卷, 第十二頁; 又約翰·安德魯(John B. Andrews)及海倫·勃利斯(Helen Bliss): “工會組織與婦女”(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 ㉓ 塞斯·路得: “对新英格蘭工人的致辭”(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Men of New England), 一八三六年費列得爾菲亞第三版。此書為对新英格蘭工人介紹國家教育狀況及歐美各生產階級情況, 并特別討論到目前進行的製造工業對於弱人的健康、幸福以及國家安全的影響。
- ㉔ 美國議會文件集第四二號, 第二部分(第四七屆國會, 第二次會議), 第四四頁, 卡羅爾·賴特 (Carroll D. Wright): “關於美國工廠制度的報告”(Report on the Factory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又一八三四年十月一日“工人擁護者”。
- ㉕ 一八三〇年十月一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八三三年一月九日“工人擁護者”。
- ㉖ 一八三〇年十月一日同上報。
- ㉗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三四八—三五二頁、三九六頁、四二四頁及第四七八—四八四頁; 又見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商業公報與密蘇里記錄”(Commercial Bulletin and Missouri Register)。
- ㉘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四七二—四八四頁; 愛德華·米脫門 (Edward B. Mittleman) 所擬一表。
- ㉙ 一八三六年六月四日“全國勞工”(National Laborer); 又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 第三八、四二頁。
- ㉚ 前引錫拉克曼書, 第六二—六三頁。
- ㉛ 一八三四年三月八日及十一日“人報”(The Man)。
- ㉜ 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人報”轉載

- “波士頓實錄”(Boston Transcript); 又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人報”。
- ③① 威廉·斯科斯比牧師(Rev. Wm. Scoresby): “美國工廠與女工”(American Factories and Their Female Operatives), 一八四五年波士頓版, 第六一頁。
- ③② 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全國勞工”; 又一八三六年十月七日“波士頓郵報”。
- ③③ 塞斯·路得: “關於貪婪的起源和發展及其對人類幸福的影響”(An Address on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Avarice, and its Deleterious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 一八三四年波士頓版, 第三頁。
- ③④ 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 第四三頁; 又一八三四年一月一日及六月十八日“林城記錄報”(Lynn Record)。
- ③⑤ “費城政府與公民關於減時加薪問題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of Philadelphia on the Reduction of the Hours of Labor, and Increase of Wages.), 一八三五年波士頓版, 第九頁。
- ③⑥ 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三十日及五月七日“全國勞工”。
- ③⑦ 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帕特遜通訊”(Paterson Intelligencer); 又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三十日及八月十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Newark Daily Advertiser); 又前引塞斯·路得書, 第四二—四六頁。
- ④① 一八三三年六月三日“紐約每晨快訊”(New York Morning Courier and Enquirer)。
- ④② 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二十日及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一日及十一月五日“全國勞工”。
- ④③ 一八三六年四月九日、五月十四日及六月二十五日同上报。
- ④④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三六〇頁、三六四頁。
- ④⑤ 一八三六年四月九日、三十日“全國勞工”重載該文。
- ④⑥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三六九頁。
- ④⑦ 一八三五年四月三日“商務報”(Journal of Commerce); 又一八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⑧ 一八三六年二月十三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 ④⑨ 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及十二月二十四日“全國勞工”。
- ④⑩ 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⑪ 一八三四年十二月六日同上报。
- ④⑫ 一八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全國各業工會會刊”(National Trades' Union)(紐約); 又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全國勞工”。
- ④⑬ 坎門司書: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第六卷, 第

- 二三二——二三三頁；又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全國勞工”。
- ⑤④ 一八三五年四月十七日、五月六日及七日“波士頓郵報”；又一八三五年八月八日“賓夕法尼亞人”(Pennsylvanian)；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六卷，第九四頁，第二七九頁及第二八〇頁；又前引哈茨書，第四〇五頁。
- ⑤⑤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六卷，第九四頁。
- ⑤⑥ 前引坎門司書，第一卷，第四一七頁；又見一八三五年八月八日“賓夕法尼亞人”。
- ⑤⑦ 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工人擁護者”。
- ⑤⑧ “費城政府與公民關於減時加薪問題議事錄”，一八三五年波士頓版，第九頁。
- ⑤⑨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六卷，第三九頁。
- ⑥① “費城政府與公民關於減時加薪問題議事錄”，第四——五頁。
- ⑥②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六卷，第三九頁。
- ⑥③ “費城政府與公民關於減時加薪問題議事錄”，第四、第八、第九——十頁。
- ⑥④ “麻州勞工統計局第十六次年報”(16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 Massachusetts)，一八八五年八月。
- ⑥⑤ 一八三五年八月十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Newark Daily Advertiser)；又一八三六年四月九日、五月二十六日“全國勞工”；又一八三六年三月十六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 ⑥⑥ 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及四月二十六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又一八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帕特遜快報”(Paterson Courier)；又一八三四年一月八日“林城記錄報”(Lynn Record)。
- ⑥⑦ 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六月一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又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及五月七日“全國勞工”。

第 八 章

- ① 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自由詢問報”(Free Enquirer)。
- ② 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技工自由報”(Mechanics' Free Press)。
- ③ 斯蒂芬·辛柏遜(Stephen Simpson)：“工人手冊”(The Working Man's Manual)，第二〇二——二〇三頁；又一八三五年八月十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Newark Daily Advertiser)；又一八三〇年三月六日及十三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又一八三〇年五月一日及七月十日“技工自由報”所載“費城工人告同胞書”(Address of Workmen of Philadelphia)；又見前引坎門司書，第一卷，二二七頁。
- ④ 一八二九年十月三日及三十一日

- “工人拥护者”；又一八三〇年一月二日“技工自由报”。
- ⑤ 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一八三〇年一月六日、三十日、二月二十七日“工人拥护者”；又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全国劳工”(National Laborer)；又“商业史学会会刊”(Bulletin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二卷二号，第一一——一三頁；又一八二三年七月三日新泽西“自由前哨”(Sentinel of Freedom)；又一八三二年七月二十日“波士頓邮报”(Boston Post)。
- ⑥ 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三月六日和一八三一年二月五日“工人拥护者”。
- ⑦ 一八三〇年十月二日“技工自由报”。
- ⑧ 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工人拥护者”。
- ⑨ 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同上报；又“自由貿易拥护者与政治經濟报”(The Free Trade Advocate 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八二九年五月九日，第一卷，第二九七頁；又小河瑟·施列兴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杰克遜时代”(The Age of Jackson)，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一一九——一二一頁及五二六——五二七頁。
- ⑩ 一八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工人拥护者”。
- ⑪ 一八三〇年九月六日新泽西“自由前哨”。
- ⑫ 一八三〇年四月十七日“工人拥护者”轉載自“紐約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又一八三〇年九月六日新泽西“自由前哨”。
- ⑬ 馬太·卡瑞(Matthew Carey)“精選錄”(Selected Excerpts)，第三十一卷，第一五六——一六〇頁(書存費城圖書館公司)。
- ⑭ 見前引辛柏遜書，第八九頁。
- ⑮ 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技工自由报”；又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日“工人拥护者”。
- ⑯ 約翰·波拉德(John A. Pollard)：“惠梯尔論工会”(Whittier on Labor Unions)一文，載“新英格蘭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一九三九年三月号，第十二卷，第一〇〇頁。
- ⑰ 一八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技工自由报”；又阿登·惠特曼(Alden Whitman)：“劳工党(一八二七——一八三四)”(Labor Parties, 1827—1834)，一九四三年紐約版，第二二頁。
- ⑱ 一八二八年八月十六日“技工自由报”。
- ⑲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一日同上报。
- ⑳ 一八二八年十月十日同上报。
- ㉑ 一八二九年八月十七日、二十七日、三十一日“費列得尔非亞民主报”(Philadelphia Democratic Press)；又一八三〇年六月七日“工人拥护者”。
- ㉒ 前引惠特曼書，第二九頁。
- ㉓ 一八三〇年十月十六日“技工自由

- 報”(Mechanics' Free Press)。
- ②① 一八四二年“急進派”(The Radical), 第二卷, 第三頁, 乔治·亨利·伊文斯(George Henry Evans): “紐約工人黨的起源及其發展”(History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Working Men's Party in New York); 又一八二九年四月三十日“紐約每晨快訊”(New York Morning Courier and Enquirer); 又見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二三六頁。
- ②② 赫伯特·白瑞恩(Hobart Berrian): “紐約工人黨發展狀況簡錄”(A Brief Sketch of the Origin and Rise of the Workingmen's Par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華盛頓版(出版日期不明), 第四頁。又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及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自由訊問報”(Free Enquirer)。
- ②③ “通俗短論”(Popular Tracts), 第三號, 第四頁, 法朗士·賴特(Frances Wright): “致工業界書”(Address to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 ②④ 一八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工人擁護者”; 又見前引伊文斯書, 第五五頁。
- ②⑤ 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三日“紐約快訊”(New York Courier and Enquirer)。
- ②⑥ 一八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工人擁護者”。
- ②⑦ 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五日及九日“紐約晚郵報”; 又一八二九年十一月七日“紐約商務日報”(New York Journal of Commerce)。
- ②⑧ 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日、四月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 五月八日及十五日“工人擁護者”; 又轉引自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工人擁護者”轉引“哈里斯堡通訊者”[Harrisburg (Pa.) Intelligencer]; 又一八三〇年五月五日“農民、技工與工人擁護者”(Farmers' Mechanics' and Workingmen's Advocate); 又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技工報”(Mechanics' Press)。
- ②⑨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又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工人擁護者”。
- ③① 一八三四年三月三十日“自由訊問報”中阿莫斯·基伯特(Amos Gilbert): “湯姆斯·斯克德莫的一生”(The Life of Thomas Skidmore); 又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工人擁護者”。
- ③② 一八三〇年三月三十日“自由訊問報”轉載該文。
- ③③ 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三日及二十日“工人擁護者”。
- ③④ 一八三〇年四月三日同上報; 又一八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美國”(Young America)。
- ③⑤ W·R·羅凌士(W. R. Lawrence)編: “亞摩斯·羅凌士日記與通訊選錄”(Extracts from the Diary and

-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Amos Lawrence), 一八五五年波士頓版, 第二八頁; 又愛德華·耶非瑞特(Edward Everett): “論工人黨”(A Lecture on the Working Men's Party), 一八三〇年波士頓版, 書存國會圖書館善本室。
- ③ 一八三〇年三月三十日“自由訊聞報”轉載該文。
- ④ “通俗短論”(Popular Tracts), 第五號, 第四頁, 法朗士·賴特(Frances Wright): “致工業界書”(Address to the Industrious Classes)。
- ⑤ 一八三〇年四月十三日“紐約每日前哨報”(New York Daily Sentinel), 羅伯特·台爾·歐文(Robert Dale Owen): “論大眾教育散文集”(Essays on Public Education); 又一八三〇年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及五月二十九日“工人擁護者”; 又里查·雷波耳德(Richard W. Leopold): “羅伯特·台爾·歐文傳”(Robert Dale Owen), 一九四〇年劍橋版, 第九二——九四頁及第一〇〇——一〇二頁。
- ⑥ 西德尼·杰克遜(Sidney L. Jackson): “美國自由教育鬥爭史(一八二七——一八四二年)”(America's Struggle for Free Schools 1827—1842), 一九四一年華盛頓版, 第一六六——一六七頁。
- ⑦ 一八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七月十日及一八三〇年九月十一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关于油漆工人工會支持“國家監護”計劃事件, 請參看一八三〇年一月九日“自由訊聞報”。
- ⑧ 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三日、六月十六日及十九日同上報; 又一八三〇年三月十三日“每日前哨”(Daily Sentinel); 又見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二四六頁。
- ⑨ 一八三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十二日及九月十五日“工人擁護者”; 又一八三〇年六月十二日“技工自由報”。
- ⑩ 一八三〇年六月十日“工人擁護者”, “塞內克斯”(Senex)一文。
- ⑪ 一八三〇年七月十日“工人擁護者”。
- ⑫ 一八三〇年九月四日及十一日“工人擁護者”。另一版本見一八三〇年九月四日“技術工人”(The Craftsman)。
- ⑬ 一八三〇年九月十一日同上報; 又一八三〇年十月八日“紐約快訊”(New York Courier and Enquirer)。
- ⑭ 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一月十三日“工人擁護者”; 又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紐約快訊”。
- ⑮ 一九二三年十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二十九卷, 第八一——八六頁; 阿瑟·達靈(Arthur B. Darling): “麻城工人黨概況(一八三三——一八三四年)”(The Workingmen's Party in Massachusetts, 1833—

- 1834)。
- ④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又一八三〇年八月十一日“工人擁護者”。
- ⑤ 前引佛蘭克·卡爾登書, 第三三九—三四四頁; 又詹姆斯·杜魯斯洛·亞當姆斯 (James Truslow Adams): “一七七六至一八五〇年合眾國中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 in the Republic, 1776—1850), 第三六九頁; 又佛蘭克·卡爾登: “美國經濟對教育的影響(一八二〇—一八五〇年)”(Economic Influences on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50), 一九〇八年或上康辛州麥迪生版, 第一二二頁。
- ⑥ 原書缺此註。——譯者
- ### 第九章
- ① 一八三〇年四月十七日及十二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又一八三一年二月二日“農民、技工與工人擁護者(阿爾巴尼)”(Farmers' Mechanics' and Workingmen's Advocate (Albany))。
- ② 一八三〇年四月三日、七月九日、八月五日和十月三十日同上报。
- ③ 一八三〇年四月三日及十七日“工人擁護者”; 又一八三〇年八月四日“每日前哨”(Daily Sentinel)。
- ④ 詹姆斯·理查遜 (James F. Richardson): “美國總統言論彙編”(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一八九九年哥倫比亞區華盛頓版, 第二卷, 第五九〇—五九一頁。
- ⑤ 詹姆斯侯爵 (Marquis James): “安德魯·杰克遜: 一位總統的素描”(Andrew Jack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 一九三七年紐約版, 第三〇四頁。
- ⑥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工人擁護者”; 又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及十二月三十日“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又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實話實說”(Plaindealer)。關於萊杰特 (Leggett) 的生平及其政治理論的簡略介紹, 參看里查·郝弗斯塔德 (Richard Holstader): “威廉·萊杰特, 杰克遜時代的民主代言人”(William Leggett, Spokesman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刊于“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號, 第五十八卷, 第五八一—五九四頁]。并參看錫俄非勒斯·費斯克 (Theophilus Fisk): “勞動為財富的真正來源”(Labor the Only True Source of Wealth): 一八三七年南卡羅來納州查里士頓版, 第四頁。
- ⑦ 保羅·萊司特爾·福特 (Paul Leicester Ford) 編: “湯姆斯·杰斐遜的著作”(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一八九二—一八

- 九九年紐約版，第十卷，第四二七—四三九頁。
- ② 一八三四年四月九日“人報”(The Man)；又一八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 ③ 一八三二年九月至十月的“工人擁護者”；又小西奧多·塞德威克(Theodore Sedgwick, Jr.)編：“威廉·萊杰特政論集”(A Collection of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Leggett)，一八四〇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七〇頁；及一八三二年七月二日“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
- ④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及十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又“老居民歷史協會文獻”(Contributions of the Old Residents'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一八七九——一九〇四年羅州羅厄爾版，第一卷，第一二二頁。
- ⑤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工人擁護者”轉載該文。
- ⑥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二日及一八三四年二月十四日同上报。
- ⑦ 一八三三年大會“會議錄”(Proceedings)，國會圖書館小冊子。
- ⑧ 前引詹姆斯書，第三五四頁；又克勞德·包爾斯(Claude G. Bowers)：“杰克遜時代的政黨鬥爭”(Party Battles of the Jacksonian Era)，一九二二年紐約版，第三一四頁；又R·C·麥克格潤(R. C. McGrane)編：“尼古拉·畢特爾書信集”(Correspondence of Nicholas Biddle)，一九一九年波士頓版，第二一九及二二一頁。
- ⑨ 轉引自約翰·麥克科羅依(John McConaughy)：“誰統治着美國？”(Who Rules America?)，一九三四年紐約版，第一一八頁。
- ⑩ “商業史學會會刊”(Bulletin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第七卷第三期，第四頁，及第八卷第三期，第二頁。
- ⑪ 一八三四年二月十一日“紐約快訊”。又一八三四年一月及二月的“人報”上有很多由於擁護杰克遜而被解僱的工人的來信；同時參看一八三四年三月五日“人報”，“一個聯合主義者”(A Unionist)一文。
- ⑫ 一八三四年二月十一日“紐約快訊”。
- ⑬ 一八三四年四月三日及五月三十一日“人報”；又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 ⑭ 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二十四日、三月三日、三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及八月二日“人報”。
- ⑮ 一八三四年三月十九日同上报。
- ⑯ 一八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同上报。
- ⑰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六日同上报。
- ⑱ 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同上报；又一八三四年二月十日“紐約晚郵報”；又一八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及四月九日“工人擁護者”。
- ⑲ 一八三四年四月九日“工人擁護

- 者”；又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人報”。
- ②⑥ 約翰·斯賓塞·巴色特(John Spencer Bassett):“安德魯·杰克遜的一生”(The Life of Andrew Jackson),一九一一年紐約版,第七〇一頁。
- ②⑦ 一八三四年四月九日“工人擁護者”。
- ②⑧ 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二日、八月十六日及十月十日同上报。
- ②⑨ 第二十四屆國會第一次大會的“國會辯論錄”(Register of Debates in Congress),第二卷,第三四二九—三四三五頁;又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及七月九日“全國勞工”(National Laborer)。
- ③① 一八三五年五月十四日“民主人”(The Democrat);又一八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二月十二日及四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③② 一八三五年九月十九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又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實話實說”(Plaindealer);小西奧多·塞德威克(Theodore Sedgwick, Jr.)編:“威廉·萊杰特政論集”(Polit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Leggett),第二卷,第五六頁及以後諸頁。
- ③③ 一八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工人擁護者”;又F·貝爾德沙爾(F Byrdsall):“火柴民主黨的起源及其歷史”(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Loco-Foco Party),一八四二年紐約版,第二六頁。又一八三五年十月三十日“紐約快訊”(New York Courier and Enquirer)。
- ③④ 坎門司(Commons)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第四卷,第九九頁及以後諸頁;同時參看華特·奈耳斯(Walter Nelles):“聯邦政府對亨特訴訟案”(Commonwealth v. Hunt)的附錄,載“哥倫比亞法律評論”(Columbia Law Review),第三二卷,第一一六六—一一六九頁。
- ③⑤ 一八三五年紐約城“人民對費希爾的訴訟”(People v. Fisher),十四,汪戴爾(Wendell),二十;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四卷,第三三〇頁。
- ③⑥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四卷,第三一五、三二五、三三〇及三三二諸頁;又一八三六年六月一四日“團結”(The Union);又一八三六年八月六日“全國勞工”。
- ③⑦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三日“紐約晚郵報”。
- ③⑧ 一八三六年五月七日“全國勞工”。
- ③⑨ 一八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紐約晚郵報”。
- ④① “英格蘭季刊”第一二卷,第一〇一—一〇二頁;約翰·波拉德(John A. Pollard):“惠特爾論工會”(Whittier on Labor Unions)。
- ④② 一八三六年六月八日及七月二日“全國勞工”。

- ④① 一八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團結”。
- ④② 一八三六年六月八日“紐約快訊”。
- ④③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紐約晚郵報”；又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團結”。
- ④④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四至十六日“紐約晚郵報”。
- ④⑤ 一八三六年六月十五日“團結”；又卡尔·卡麥尔(Carl Carmer):“一百零五年以前八鞋匠的第一次勞工勝利”(How Eight Poor Shoemakers of Hudson, N. Y., Won Union Labor's First Victory 105 years ago),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版。
- ④⑥ 見前引貝爾德沙爾書, 第六八頁及其后諸頁。
- ④⑦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團結”。
- ④⑧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民主人”轉載自“阿爾巴尼顯微鏡”(Albany Microscope)。
- ④⑨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民主人”。
- ④⑩ 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全國勞工”(National Laborer)。
- ④⑪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民主人”。
- ④⑫ 一八三五年八月一日至五日“急進改革派和工人擁護者”(Radical Reformer and Working Man's Advocate); 又“民主評論”(Democratic Review), 一八四五年一月版, 第十六卷, 第七三——七五頁; 又見前引小阿瑟·施列興格書, 第二〇四——二〇五頁。
- ④⑬ 一八三五年三月至九月“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 又錫俄非勒斯·費斯克(Theophilus Fisk):“自由堡壘”(The Bulwark of Freedom), 一八三六年查里士頓版, 第四——八頁; 又小阿瑟·施列興格書, 第一六五——一七六頁; 又見一九二四年一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二十九卷, 第二七六頁及其后諸頁所載阿瑟·達靈(Arthur B. Darling):“一八二四——一八四八年蘇州的杰克遜時代民主政治”(Jacksonian Democracy in Massachusetts, 1824—1848)。
- ④⑭ 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全國勞工”。
- ④⑮ 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同上報; 关于海軍造船廠工作時間的情況, 參看一八四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根據海軍委員通訊對不同海軍造船廠不同工時的報告”(Statement of the working hours at the different Navy Yards, take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Navy Commissioners), 文存國會圖書館, “凡·布倫文稿集”(Van Buren Papers)中。
- ④⑯ 一八三六年十月一日“全國勞工”。
- ④⑰ 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一月十日同上報。
- ④⑱ 一九四〇年九月“新英格蘭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 第十三卷, 第四〇六——四〇九頁所載哈茨(Hartz):“塞斯·路得”(Seth

- Luther); 又一九四二年七月“罗德岛的歷史”(Rhode Island History), 第一卷, 第九〇—九四頁, 又約翰·雷伊(John B. Rae): “选举大游行”(The Great Suffrage Parade); 又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工人拥护者”。
- ⑤⑩ 阿瑟·摩雷(Arthur M. Mowry): “道尔的战争”(The Dorr's War), 一九〇一年普罗維頓斯版, 第二四一頁及第二九七—二九八頁。
- ⑤⑪ 一八三七年三月十日“全國勞工”; 又一八三七年二月十五日“紐約時報”。
- ⑤⑫ 國會圖書館所存“凡·布倫文稿集”(Van Buren Papers) 中一八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及二十二日亨利·吉尔平致馬丁·凡·布倫信(Henry D. Gilpin to Martin Van Buren)。关于在波士頓的同样一次集会, 参看一八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波士頓改革者周报”(Boston Weekly Reformer)。
- ⑤⑬ 一九三九年十月“密苏里史評”(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第三十四卷, 第二四—二五頁; 罗素·諾爾(Russell M. Nolen): “内战前聖路易的勞工运动”(The Labor Movement in St. Louis prior to the Civil War); 又一八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波士頓改革者周报”。
- ⑤⑭ 國會圖書館所存“凡·布倫文稿集”中一八三八年一月十日奧瑞斯特斯·伯朗遜致馬丁·凡·布倫信(Orestes Brownson to Martin Van Buren)。
- ⑤⑮ 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麻州民主人”(Bay State Democrat)。
- ⑤⑯ 國會圖書館所存迈克尔·兴納耳(Michael Shiner)的“日記手稿”(Manuscript Diary), 第七七頁。
- ⑤⑰ 桃乐賽·哥柏尔(Dorothy B. Goebel): “威廉·亨利·哈利遜傳”(William Henry Harrison), 一九二六年印第安納波利斯版, 第三五二頁; 又第二四六号“威斯康辛大学公告”(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第八一—八二頁; 乔治·曼哥德(George B. Mangold): “美國保护关税爭辯中的勞工主張”(The Labor Argument in the American Protective Tariff Discussion); 又一八四〇年費列得尔菲亞版小册子“請看, 農民与技工們!”(Farmers and Mechanics, Look at this); 又見“商業史学会会刊”(Bulletin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第八卷第一期, 第三一—三二頁。
- ⑤⑱ 荷拉西奧·伍德曼(Horatio Woodman): “波士頓市法庭刑事案件報告”(Reports of the Criminal Cases Tried in the Municipal Court of the City of Boston), 一八四五年波士頓版, 第六一〇—六一六頁; 又西昂·麥特卡夫(Theon Metcalf)編: “麻州最高法院辯

論和判決案件報告書”(Report of Cases Argued and Determined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Massachusetts), 一八四三年波士頓版, 第四卷, 第一二一——一三四頁; 又一九三二年四月“新英格蘭季刊”, 第五卷, 第二六八——二六九頁所載默耳·寇蒂(Merle E. Curti): “政治改革者, 小罗伯特·蘭特爾”(Robert Rantoul, Jr., The Reformer in Politics)。

- ⑥⑨ 菲特·奈耳斯(Walter R. Nelles): “联邦政府对亨特訴訟案”(Commonwealth v. Hunt), 載于“哥倫比亞法律評論”(Columbia Law Review), 第三十二卷, 第一一五九——一一六〇頁。
- ⑦⑩ 前引小施列興格書, 第二六六頁。
- ⑦⑪ 一八三〇年六月五日“技工自由報”(Mechanics' Free Press); 又一八三六年三月九日“紐約民主黨人”(New York Democrat)。
- ⑦⑫ 前引理查遜書, 第五卷, 第四九九頁。
- ⑦⑬ 一八四四年十月五日“羅徹斯特團結報”(Rochester Daily Union)。

第 十 章

- ① 一八三八年一月二十日“紐約客”(The New Yorker)。
- ② 一九三五年七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四十卷, 第六六三——六六七頁; 塞米爾·雷茲納克(Samuel Rez-

neck): “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三年美國不景氣時期社會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American Depression, 1837—1843); 又霍瑞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 “忙碌生活的回憶”(Recollections of a Busy Life), 一八六八年紐約版, 第一四五頁; 又F·馬利亞特(F. Marryat): “美國生活日記”(A Diary in America), 一八三九年巴黎版, 第一七頁。

- ③ 前引雷茲納克書, 第六六七頁。
- ④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四五六頁; 又前引艾西耳伯特·史都華書, 第四七——四八頁。
- ⑤ 見前引雷茲納克書, 第六七六頁。
- ⑥ 前引史都華書, 第七六頁; 又“商業史學會會刊”(Bulletin of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第十五卷, 第八頁。
- ⑦ 前引格利雷書, 第一四五頁。
- ⑧ 前引雷茲納克書, 第六七二頁。
- ⑨ 轉引自諾曼·魏爾(Norman Ware): “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工業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 1840—1860), 一九二四年波士頓及紐約版, 第一六頁。
- ⑩ 一八四四年七月六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 ⑪ 湯姆斯·斯基德默(Thomas Skidmore): “財產權”(The Right to Property), 第三八三頁。
- ⑫ 一八三六年九月十九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 該報所載之“機械裝置——勞動的等价交換”(Machinery——Equal Exchange of Labor)一文。
- ⑬ 一八四一年一月“波士頓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第四卷,第一一九及其后諸頁。
- ⑭ 喬治·柯爾(George D. H. Cole):“羅伯特·歐文傳”(Robert Owen),一九二五年倫敦版,第一七九——一八五頁;又湯姆斯·吉爾卡泊(Thomas Kirkup):“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Socialism),一九〇六年倫敦版,第六〇——六四頁。
- ⑮ 小阿瑟·佩斯特爾(Arthur E. Bestor, Jr.)一九三八年于耶魯大學所寫未發表之博士論文“美國法蘭克斯黨人”(American Phalanxes),第八——九頁。
- ⑯ 坎門司(Commons)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第七卷,第一六四——一六六頁。
- ⑰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一九三五年紐約版,第四〇——四四頁。
- ⑱ 轉引自前引佩斯特爾(Bestor)書,第九頁。
- ⑲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七卷,第一七六——一七八頁。
- ⑳ 一八四六年四月十日“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 ㉑ 一八四二年八月六日同上報。
- ㉒ 一八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七月十二日、二十一日同上報。
- ㉓ “勞工苦難及勞工解救”(Labor's Wrongs and Labor's Remedy),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書。
- ㉔ 轉引自前引佩斯特爾書,第二六四頁。
- ㉕ 轉引自同上書,第四五、五〇——五一、一七四——一七五頁。
- ㉖ 約翰·諾依斯(John Humphrey Noyes):“美國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一八七〇年費列得非亞版,第二三九——二四三頁。
- ㉗ 黑恩利赤·斯帖勒(Heinrich Stemler):“北美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史”(Geschichte des Socialismus-und Kommunismus in Nord Amerika)一八八〇年萊比錫版,第一五五——一五六頁;又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法蘭克斯”(The Phalanx)。
- ㉘ 前引佩斯特爾書,第七四——七五、一〇四、二二五——二二六頁及二三八頁;又前引諾依斯書,第二七九、二八二——二八三頁。
- ㉙ “新英格蘭季刊”(New England Quarterly),第十二卷(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出),第七二七——七二八頁;曼寧·霍桑(Manning Hawthorne):“霍桑和空想社會主義”(Hawthorne and Utopian Socialism)。
- ㉚ 奧克大維亞斯·弗勞星漢(Octavius Brooks Frothingham):“喬治·雷

- 伯萊傳”(George Ripley), 一八八二年波士頓版, 第一八三頁。
- ③① 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一日“工業之聲”(Voice of Industry)。
- ③② 愛德溫·羅茲溫克(Edwin C. Rozwenc): “美國合作社起源: 一八四五——一八六七年的保護商業運動史”(Cooperatives Come to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Protective Store Movement 1845—1867), 一九四一年愛俄華州蒙特凡爾農版, 第五八——五九頁及一一七頁。
- ③③ 佛蘭克·斯塔克頓(Frank T. Stockton): “造型工人與生產合作”(The Molders and Productive Cooperative), (載于一九一四年“國際造型工人報”(International Molders Journal), 第五十卷, 第三六八——三七〇頁); 又一八四九年九月十二日“紐約論壇報”。
- ③④ 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及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四日“紐約論壇報”。
- ③⑤ 一八五〇年八月十二日、十三日、十五日,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一八五二年一月九日同上报; 又前引羅茲溫克書, 第六四——六五頁。
- ③⑥ 前引羅茲溫克書, 第一三、二九——三三頁。
- ③⑦ 同上書, 第二三、四三、四六——四七、五四及六三頁。
- ③⑧ 同上書, 第六九頁。
- ③⑨ 同上書, 第四三——四六、九〇——九五頁。
- ④⑩ 轉引自海倫·薩勒(Helen Sara Zahler): “一八二九——一八六二年東部工人和全國土地政策”(Eastern Workingmen and National Land Policy, 1829—1862), 一九四一年紐約版, 第四五頁。
- ④⑪ 同上書, 第三五頁; 又“急進派”(Radical), 第一卷, 第六、三六、四一頁。
- ④⑫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 ④⑬ 一八五一年二月八日“青年美國”(Young America); 并參看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⑭ 一八四四年七月六日“工人擁護者”, 紐約市全國改革協會的報告。
- ④⑮ 一八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五日、九月二十七日及一八四六年一月十日“青年美國”; 又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九月二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又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先驅”(The Harbinger)。
- ④⑯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青年美國”。
- ④⑰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四七年三月六日同上报; 又一八四五年五月六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Newark Advertiser); 又一八四四年九月四日、十一月九日及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⑱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⑲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七卷, 第五四——五五頁。如欲知

对有关此問題有限証据的詳細分析,請參看“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一九三五年,第五十卷,第一六八——一八五頁,及一九三六年,第五十一卷,第六一頁及以下諸頁,卡特尔·古德雷其(Carter C. Goodrich)、索尔·戴維生(Sol Davidson):“西進运动中的工資收入者”(The Wage-Earner in the Westward Movement);又見一九四〇年十月“南方經濟雜誌”(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第一五八——一八六頁;塔克尔(R. S. Tucker):“作为剩余勞力出路的边陲”(The Frontier as an Outlet for Surplus Labor);又見一九三六年九月“密西西比流域史評”(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二十三卷,第一六九——一八八頁;默雷·凱恩(Murray Kane):“关于安全活門原則的商榷”(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Safety Valve Doctrine)。

- ⑤⑩ 一八五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及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紐約論壇報”;又艾德格·巴克雷·愷耳(Edgar Barclay Cole):“一八五〇——一八七〇年的費城勞工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in Philadelphia 1850—1870),一九四〇年費列得尔非亞版,第九頁。
- ⑤⑪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九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 ⑤⑫ 一八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工業之聲”(Voice of Industry);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会史料”,第七卷,第二三三頁;又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先驅”。
- ⑤⑬ “勞工实况:勞工改革同盟會一會員向其同志致詞”(The Condition of Labor: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Labor Reform League By one of the Members),一八四〇年波士頓版。
- ⑤⑭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五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四七年三月六日“青年美國”。
- ⑤⑮ 一八四四年四月六日及十一月二十三日“工人擁護者”。
- ⑤⑯ 罗伯特·台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勞工的歷史和前途”(Labor: Its History and its Prospects),一八四八年辛辛那提版。
- ⑤⑰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中“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运动’”一文,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二頁。

第十一章

- ① 一八四一年一月“波士頓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第四卷,第一二二頁及其后諸頁。
- ② 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五、七月二十日“福尔河技工”(Fall River Mechanic);又一八四四年八月三日同上雜誌中有关波士頓勞工的部分。
- ③ 諾曼·魏尔:“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

- 年的工業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 1840—1860), 第七四頁。
- ④ 一八四五年七月三日“工業之聲”。
- ⑤ 大衛·克羅凱特(David Crockett): “羅厄爾之遊”(A Visit to Lowell), 一八三七年費列得爾非亞版; 又前引斯科斯比書, 第二〇——二六頁。
- ⑥ 轉引自前引錫拉克曼書, 第一三五——一三六頁。
- ⑦ 查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美洲拾零”(American Notes), 一八四二年紐約版, 第七七頁; 又“古老南部零綑”(Old South Leaflets), 一八八五年波士頓版, 第三卷, 第一五一號。
- ⑧ 一八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 ⑨ 一八四三年九月“羅厄爾獻言”(Lowell Offering), 第三號, 第四三及二八四頁。
- ⑩ 同上書, 第一號, 第三四三頁; 又露茜·拉爾孔(Lucy Larcom): “一個新英格蘭的少女”(A New England Girlhood), 一八八九年波士頓版, 第二二二——二二三頁。
- ⑪ 畢格斐(J. Bigelow): “公司與職工: 工廠職工情況介紹”(Corporations and Operatives: Being an Exposi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Factory Operatives), 一八四一年羅厄爾版, 第二八頁; 又一八四六年二月六日“工業之聲”; 并參看一八四五年七月二六日“鞋襪報”(The Awl); 又一八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工業之聲”。
- ⑫ 一八三〇年八月“經濟商業史報”(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第二卷, 第九二——九八頁及七〇二頁, 又伯薩·斯梯恩斯(Bertha M. Stearns): “新英格蘭早期工廠雜誌”(Early Factory Magazines in New England)。
- ⑬ 同上書, 第六九六頁。
- ⑭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工業之聲”; 又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及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上報。
- ⑮ 一八四六年一月二日同上報。
- ⑯ 一八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六月五日、十日、十二日同上報; 又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 第七一——七二頁。
- ⑰ 一八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九月十八日、十一月七日、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及一八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二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十日、五月十五日“工業之聲”; 又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 第七四——七六頁; 又見密西根大學拉巴第藏書中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克里夫蘭公民”(Cleveland Citizen) 所載關於一次野餐的描寫。
- ⑱ 一八四六年一月九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工業之聲”; 又前引安德魯、勃利斯書, 第七四頁。
- ⑲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六日及一八四六年一月九日、五月五日、十一月十三日“工業之聲”; 又一

- 八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青年美國”(Young America)。
- ⑳ 密西根大學拉巴第藏書中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九日“勞工一頁(底特律、密西根州)”(The Labor Leaf (Detroit, Michigan)); 又一九三七年三月“新英格蘭季刊”,第一〇卷,第四四頁,艾倫·麥克唐納(Allan Mac Donald):“商業烏托邦的羅厄爾”(Lowell: A Commercial Utopia); 又一八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鞋維報”(The Awl)。
- ㉑ 一八四六年一月二日“工業之聲”。
- ㉒ 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同上報; 又見一八四六年一月九日同上報中培格利小姐(Miss Bagley)為“工業之聲”婦女欄所寫的發刊詞。
- ㉓ 一八四五年六月十四日“青年美國”轉載自“福爾河每周新聞”(Fall River Weekly News); 又一八四五年六月五日“工業之聲”。
- ㉔ 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一日、七月六日“福爾河技工”(Fall River Mechanic); 又一八四九年九月六日“特倫頓每日公報”(Trenton Daily State Gazette)。
- ㉕ 一八四七年四月五日“紐約晚郵報”。
- ㉖ 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福爾河技工”。
- ㉗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同上書。
- ㉘ 一八四四年五月十八日“福爾河技工”, 又阿蘭·格利生(Alan H. Gleason)于羅徹斯特大學一九四一年所作未發表的碩士論文,“一八二〇至一八八〇年羅徹斯特勞工史”(The History of Labor in Rochester, 1820—1880),第六三頁,所引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八日“羅徹斯特每日廣告人報”(Rochester Daily Advertiser)。
- ㉙ 一八七〇年麻州勞工統計局第一次年報(1st Annual Report,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第二二一、二二六頁; 又見前引錫拉克曼書,第一八五頁。
- ㉚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紐約技工之鏡”(New York Mechanics' Mirror)。
- ㉛ 查理·帕爾遜斯(Charles F. Persons):“勞動法及其實施”(Labor Laws and their Enforcement),一九一一年紐約版,第四〇—四一頁。
- ㉜ 同上書,第二二—二六頁。
- ㉝ 一八四四年五月四日、二十五日、七月六日、十三日、九月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福爾河技工”; 又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七日“鞋維報”。
- ㉞ 一八四四年八月三日同上報。
- ㉟ 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福爾河技工”。
- ㊱ 一八四四年八月三日—三十一日“福爾河技工”,希威特(Hewitt)的日記。
- ㊲ 一八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福爾河技工”; 又前引魏爾書,第二一〇頁。
- ㊳ 一八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工業之聲”。

- ③⑨ 一八四五年九月十八日同上報。
- ④⑩ 一八四六年四月三日同上報；又前引魏爾書，第二一九頁。
- ④⑪ 一八四五年十月十八日“青年美國”轉載自“匹茲堡日報”(Pittsburgh Journal)。
- ④⑫ 一八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青年美國”轉載自“匹茲堡自由精神”(Pittsburgh Spirit of Liberty)。
- ④⑬ 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第七〇頁；又前引帕爾遜斯書，第四一頁；又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青年美國”。
- ④⑭ 前引帕爾遜斯書，第四三頁。
- ④⑮ 同上書，第四七頁。
- ④⑯ 一八四五年“麻州議會文件集”(House Document)，第五十期，第八、一六頁。
- ④⑰ 詹姆斯·杜魯斯洛·亞當姆斯(James Truslow Adams)：“一七七六至一八五〇年合眾國中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 in the Republic, 1776—1850)，第三九一頁。
- ④⑱ 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工業之聲”。
- ④⑲ 前引魏爾書，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 ⑤⑩ 一八四七年一月八日“工業之聲”；又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第七七頁；又一八四五年六月七日、十四日“青年美國”。
- ⑤⑪ 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第六四頁；又一八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四八年七月六日、十二日、十七日“匹茲堡晚郵報”(Pittsburgh Evening Post)。
- ⑤⑫ 一九二二年四月“西賓夕法尼亞歷史傳記雜誌”(Western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五卷，第二〇三——二一一頁。
- ⑤⑬ 一八五三年十月“歡樂月刊”(Monthly Jubilee)，第三卷，第四〇一頁；又前引帕爾遜斯書，第六五頁。
- ⑤⑭ 亨利·法爾南(Henry W. Farnam)：“一八六八年前美國社會史片斷”(Chapter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1868)，一九三八年華盛頓版，第二六五頁。
- ⑤⑮ 前引帕爾遜斯書，第七七頁。
- ⑤⑯ 同上書，第六九頁；又前引魏爾書，第一五六——一五八頁。
- ⑤⑰ 前引魏爾書，第一五九及一六一頁。
- ⑤⑱ 查理·考萊(Charles Cowley)：“羅厄爾畫傳”(Illustrated History of Lowell)，一八六八年波士頓版，第一四九頁；又阿瑟·達靈(A. B. Darling)：“一八二四至一八四八年麻州的政體變化”(Political Changes in Massachusetts, 1824--1848)，一九二五年新港版，第一七一頁；關於當時公司控制選票箱的生動的描寫，參看阿馬沙·華克爾(Amasa Walker)：“經驗的考驗，或美國選舉投票實況”(The Test of Experience, or the Working of

- the Ballot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五五年倫敦懷特赫爾斯特版。
- ⑤①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特令敦每日公報”(Trenton Daily State Gazette)。
- ⑤②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四九年一月十八日、九月五日、六日、二十日、十月十二日同上報。
- ⑤③ 一八五〇年九月三日、十五至十七日同上報。
- ⑤④ 一八五〇年十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一日同上報。
- ⑤⑤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五日“特令敦真正美國人報”(Trenton True American); 又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四日“特令敦每日公報”。
- ⑤⑥ 一八六〇年“亨特商人雜誌”(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第四十一卷, 第七五〇頁; 又前引愛德加·馬爾丁書, 第三四四——三四五頁; 又“麻州勞工統計局第十一次年報”(11th Annual Report of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 一八八〇年版, 第九——一三頁。
- ## 第十二章
- ① 華倫、皮爾遜(C. F. Warren and F. H. Pearson); “一七二〇年——一九三二年二百一十三年來的批發價”(Wholesale Prices for Two Hundred and Thirteen Years, 1720 to 1932), 一九三二年紐約州依薩卡版, 第一六八頁、一九三頁; 又前引庫辛斯基書, 第四三頁。
- ② 前引庫辛斯基書, 第四四頁。
- ③ 轉引自海倫·薩姆納書, 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 ④ 轉引自前引馬爾丁書, 第一六二頁。
- ⑤ 一八五〇年六月八日、十一日、十五日、十七日、十八日、二十日“紐約論壇報”; 又伊拉·克羅斯(Ira B. Cross): “加利福尼亞勞工運動史”(A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California), 一九三五年加州巴克萊版, 第二二——二三頁。
- ⑥ 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二日“波士頓每日實錄”(Boston Daily Transcript)。
- ⑦ 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
- ⑧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五八七頁。
- ⑨ 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三十一日“紐約論壇報”。
- ⑩ 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三日同上報。
- ⑪ 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同上報。
- ⑫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四日同上報。
- ⑬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紐約論壇報”。
- ⑭ 一八四六年四月“祖國之鷹”(Native Eagle); 又喬治·尼古拉·克蘭姆爾(George Nicholas Kramer)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一九三六年所寫未發表之哲學博士論文, “一無所知黨運動史”(A History of the

- Know-Nothing Movement), 第一六九頁。
- ⑮ 雷·畢灵頓(Ray A. Billington): “新教十字軍运动”(The Protestant Crusade), 一九三九年紐約版, 第三三六——三三七頁。
- ⑯ 一八五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八月三日“紐約論壇報”; 又一八四七年四月三日“紐約晚郵報”。
- ⑰ 一八五〇年四月二七日、六月十二日及十七日“紐約論壇報”。
- ⑱ 一八五〇年四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六日同上報。
- ⑲ 杰斯·齊克灵(Jesse Chickering): “迁入美國的移民”(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四八年波士頓版, 第六四頁。
- ⑳ 一八八〇年“麻州勞工統計局第十一次年報”, 第六——九頁。
- ㉑ 安得魯·勞埃(Andrew Roy): “美國煤礦工人史”(A History of the Coal Mi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〇三年哥倫布斯版, 第七二——七五頁; 又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七日“礦工雜誌”(The Miner's Journal)。
- ㉒ 愛德華·魏克(Edward A. Wieck): “美國礦工協會”(The American Miners' Association), 一九四〇年紐約版, 第八五、二一七——二一九頁。
- ㉓ 赫爾曼·施留特爾(Hermann Schlueter): “德國工人运动在美國的兴起”(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Amerika), 一九〇七年斯圖加特版, 第一三——二八頁、八三——九六頁、一二六——一三三頁。
- ㉔ 同上書。
- ㉕ 一八五三年五月“改良報”(Die Reform)。
- ㉖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八日“紐約州時報”(New York Staats-Zeitung)。
- ㉗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同上報。
- ㉘ 一八五三年五月九日同上報; 又卡爾·歐伯爾曼(Karl Obermann)未發表的手稿“約瑟夫·衛登麥爾”(Joseph Wedemeyer), 第五章。
- ㉙ 一八五三年四月十六日“全國工人擁護者”(Workingmen's National Advocate)。
- ㉚ 前引歐伯爾曼書, 第五章。
- ㉛ 前引坎門司書, 第一卷, 第五五〇——五六二頁; 又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八卷, 第二三——二五頁。
- ㉜ 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 ㉝ “美國印刷工人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二日全國會議議事錄及一篇一八五一年的通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Journey-men Prin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 1850, together with An Address, 1851); 又喬治·屈萊賽(George A. Tracy): “印刷業工會史”(History of the Typographical Union), 一九一三年印

- 第安納波利斯版，第一一七——一二六頁。
- ③④ 前引屈萊賽書，第一三〇——一三五頁。
- ③⑤ 同上書，第一二五頁。
- ③⑥ 轉引自夏洛特·托德士 (Charlotte Todes): “威廉·夕威斯和全國勞工會”(William H. Sylvis 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on), 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第二〇頁。
- ③⑦ 一九一三年六月“鑄工報”(Iron Molder Journal), 第四十九卷, 第三〇五頁, 亨利·霍格蘭(Henry E. Hoagland): “鑄鐵工人國際工會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Iron Molders' International Union)。
- ③⑧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三日“費城北美人報”(Philadelphia North American)。
- ③⑨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九日、十三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又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費城公共記錄報”(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 ④⑩ 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又前引愷耳書, 第三七——三九頁。
- ④⑪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日“費城公共紀錄報”。
- ④⑫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 ④⑬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同上報; 又前引愷耳書, 第三九——四一頁。
- ④⑭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共登錄報”(Public Ledger)。
- ④⑮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九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 ④⑯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同上報。
- ④⑰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日“紐約先驅報”。
- ④⑱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三日及十二日“紐約時報”、“紐約晚郵報”、“紐約先驅報”。
- ④⑲ 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六日“紐約論壇報”、“紐約先驅報”。
- ⑤⑩ “貧民福利促進會第十五次年報”(Fif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第二二頁。
- ⑤⑪ 一九三六年七月“賓州歷史”(Pennsylvania History), 第三卷, 第一九三頁, A·E·赫卿森(A. E. Hutchinson): “費列得爾菲亞和一八五七年的大恐慌”(Philadelphia and the Panic of 1857); 又見一九四二年五月“經濟史報”(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二卷, 第一八頁, 塞米爾·雷茲納克(Samuel Rezneck): “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商業不景氣對美國輿論之影響”(The Influences of Depression upon American Opinion, 1857—1859); 又李·費德爾(Leah H. Feder): “蕭條時期的失業救濟”(Unemployment Relief in Periods of Depression), 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第二一及三四頁。
- ⑤⑫ 前引愷耳書, 第二一——二二頁, 第

- 三三——三六頁；又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公共登錄報”。
- ⑤③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及五月四日“公共登錄報”。
- ⑤④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Newburyport Daily Herald)；又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波士頓廣告人報”(Boston Advertiser)；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斯柏令費爾德共和黨人日報”(Springfield Daily Republican)；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嘿味立爾報”(Haverhill Gazette)；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紐約先驅報”；又見一八八〇年“麻州勞工統計局第十一次年報”(Eleventh Annual Report,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 1880), 第一七——一九頁。
- ⑤⑤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波士頓旅行者”(Boston Traveller)。
- ⑤⑥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同上報；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紐約先驅報”。
- ⑤⑦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波士頓蜂報”(Boston Bee)；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先驅報”。
- ⑤⑧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五日“波士頓旅行者”；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紐約先驅報”。
- ⑤⑨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
- ⑥⑩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紐約先驅報”中“制鞋工人之歌”(The Shoemaker's Song)。
- ⑥⑪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波士頓蜂報”；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三月二日、五日、六日及十七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又一八六〇年三月二日“嘿味立爾報”；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波士頓旅行者”；又一八六〇年三月一日“斯柏令費爾德共和黨人”(Springfield Republican)。
- ⑥⑫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七日“紐約先驅報”；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一日“波士頓旅行者”。
- ⑥⑬ 一八六〇年三月七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
- ⑥⑭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波士頓旅行者”；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
- ⑥⑮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三月一日“紐約先驅報”。
- ⑥⑯ 一八六〇年三月八日“波士頓快報”(Boston Courier)及“波士頓廣告人報”(Boston Advertiser)。
- ⑥⑰ 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七日“波士頓快報”及“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
- ⑥⑱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波士頓蜂報”；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
- ⑥⑲ 一八六〇年三月二日“斯柏令費爾德共和黨人”；又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紐伯利坡特每日先驅報”。

報”。

- ⑦⑥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波士頓快報”。
- ⑦⑦ 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一日“波士頓先驅報”；又一八六〇年三月七日“紐伯利波特每日先驅報”；又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黑味立爾報”。
- ⑦⑧ 特別參看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九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 ⑦⑨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波士頓快報”。
- ⑧① 前引克羅斯書，第一五頁。
- ⑧②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紐約論壇報”。
- ⑧③ 一八五八年十月四日“特令敦真正美國人報”(Trenton True American)。
- ⑧④ “新澤西特令敦城工會一八五八年十月十二日通過的政綱和章程”(Platform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Workingmen's Union of the City of Trenton, New Jersey, adopted October 12, 1858)，一八五八年特令敦版。
- ⑧⑤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特令敦真正美國人報”。
- ⑧⑥ 一八五八年十月一日及二十八日同上报。
- ⑧⑦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三日同上报。
- ⑧⑧ 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手稿本，愛德華·羅傑士(Edward H. Rogers)：“自傳”(Autobiography)。

第十三章

- ① 轉引自阿瑟·皮爾斯(Arthur R. Pearce)于杜蘭大學一九三八年所寫未發表之碩士論文，“新奧爾良勞工的盛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abor in New Orleans)，第四頁及第一一——一三頁。
- ② 同上書，第一〇——一頁。
- ③ 湯姆斯·安伯雷(Thomas Anbury)：“美國內地旅行記”(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America)，一七八九年倫敦版，第三三——三三二頁。
- ④ 約瑟夫·英格蘭姆(Joseph H. Ingraham)：“一個美國人眼里的美國西南部”(The Southwest by a Yankee)，一九三五年紐約版，第二卷，第二八四——二九六頁。
- ⑤ 約翰·斯賓塞·巴色特(John S. Bassett)：“南部種植園的監工”(The Southern Plantation Overseer)，一九二五年麻州諾坦普吞版，第四——七頁；又弗萊得立克·歐姆斯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邊區旅行記”(A Journey in the Back Country)，一九〇七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五八、八四——八五頁；又一九三七年一月“北卡羅來納州歷史評論”(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第十四卷，第三一——三八頁；查理·夕德諾(Charles S. Sydnor)：“奴隸主及其監工”(A Slave Owner and his Overseers)。

- ③ 赫伯特·耶浦斯克尔 (Herbert Aptheker): “美國黑奴的反抗”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第一二八——一三〇頁; 又美國農業部第九号公报 (雜編), 第四一——四二頁, 詹姆斯·華特金斯 (James L. Watkins): “百年來棉花生產及其價格” (Production and Price of cotton for one hundred years), 一八九五年華盛頓版。
- ⑦ 欧姆斯台德 (F. L. Olmsted): “南部沿海各奴隸州旅行記” (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 一九〇四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三五二頁。关于奴隸供应問題的不同意見, 參看查理·夕德諾: “密士西比奴隸制度” (Slavery in Mississippi), 一九三三年紐約版, 第三〇——三九頁; 及拉尔夫·弗蘭德尔斯 (Ralph B. Flanders): “乔治亞州种植園奴隸制” (Plantation Slavery in Georgia), 一九三三年卡波山城版, 第五六——五九頁。
- ⑧ 阿伏利·克雷文 (Avery Craven): “內战的到來”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第七八——七九頁。
- ⑨ “美國工業社会史料”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第二卷, 第三一頁; 欧利赤·菲利浦斯 (Ulrich B. Phillips) 編: “有关种植園及邊疆文件” (Plantation and Frontier Documents)。
- ⑩ 考尔曼 (J. W. Coleman): “肯塔基奴隸制时代” (Slavery Times in Kentucky), 一九四〇年卡波山城版, 第一三〇頁; 又派生斯 (C. G. Parsons): “奴隸制的内幕” (Inside View of Slavery), 一八五三年波士頓版, 第九四頁。
- ⑪ 欧利赤·菲利浦斯: “美國黑奴制度” (American Negro Slavery), 一九一八年紐約版, 第三〇三——三〇四頁。
- ⑫ 湯姆斯·德魯 (Thomas Drew): “难民” (The Refugee), 一八五六年波士頓版, 第一六四頁。
- ⑬ 吉恩·約翰遜 (Guion G. Johnson): “南北战争前的北卡罗來納” (Ante-Bellum North Carolina), 一九三七年卡波山城版, 第四九三頁。
- ⑭ 基尔伯特·巴恩斯 (Gilbert H. Barnes)、德怀特·杜蒙 (Dwight L. Dumond): “一八二二至一八四四年西阿多·德怀特·威尔德、安琪林娜·格林克·威尔德和莎拉·格林克書信集” (Letters of Theodore Dwight Weld, Angelina Grimke Weld and Sarah Grimke, 1822—1844), 一九三四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五一二頁。
- ⑮ 一八一八年二月二十日 (北卡罗來納州版) “拉里記事報” (Raleigh Register)。
- ⑯ 西伯特 (W. W. Siebert): “从奴隸制到自由的地下铁道”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一八九九年紐約版,

- 第二八及一五二頁；又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解放者”(The Liberator)。
- ⑰ 沙拉·勃萊得福特(Sarah F. Bradford): “哈利特·塔布曼時代史實”(Scenes in the Life of Harriet Tubman), 一八六九年奧勃恩版, 第三二—三三頁。
- ⑱ 瑪麗·希金生(Mary T. Higginson): “一八四六年至一九〇六年湯姆斯·溫特華司·希金生日記和書信集”(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1846—1906), 第五二—五三頁；又康拉德侯爵(Earl Conrad): “哈利特·塔布曼傳”(Harriet Tubman), 一九四三年華盛頓版。
- ⑲ 轉引自赫伯特·耶浦斯克尔: “目前情況下美國黑奴逃亡情況”(Maroons within the Present Lim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載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黑人歷史”(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第二十四卷, 第一七六頁。
- ⑳ 轉引自一九三七年七月“黑人歷史”, 第二十二卷, 第三〇六頁；哈維·維許(Harvey Wish): “一八六〇年前的美國奴隸暴動”(American Slave Insurrections before 1860)。
- ㉑ 馬利維爾“通訊者”(Intelligencer), 轉引自汪戴爾·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 “擁護奴隸制的憲法”(The Constitution, A Pro-Slavery Compact), 一八五六年紐約第三版, 第二〇八頁。
- ㉒ 赫伯特·耶浦斯克尔: “美國黑奴起義史”(Negro Slave Revo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三七頁。
- ㉓ 查理·韋士雷(Charles H. Wesley): “美國黑人勞工”(Negro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二七年紐約版, 第二二頁；又耶浦斯克尔: “美國黑奴的反抗”, 第一一五頁。
- ㉔ 一八六一年六月“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 第九十三卷, 第七三〇—七四四頁, “丹麥·維西”(Denmark Vesey)。
- ㉕ 喬治·威廉斯(George W. Williams): “美國黑人種族史”(History of the Negro Race in America), 一八八三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八五—九一頁；又赫伯特·耶浦斯克尔: “美國黑奴的反抗”, 第二九三—三〇四頁；又愛思特貝(J. H. Easterby): “根據阿爾斯教材料論南卡羅來納的稻米種植情況”(The South Carolina Rice Plantation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Robert F. W. Allston), 一九四五年芝加哥版, 第三二、一〇一及一三六頁。
- ㉖ “從德葆氏第七次調查的統計數字看美國”(Statis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a Compendium of the Seventh Census, by J. D. De Bow, Superintendent of the U. S. Census), 一八

- 五四年華盛頓版，第九四頁，表格第九〇。
- ②⑦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九頁；又一九三六年一月“黑人歷史”，第二十一卷，第一——一四頁，希塞丁(W. B. Hesseltine)：“拥护奴隸制論点的几个新方面”(Some New Aspects of the Pro-Slavery Argument)；又一九四一年四月“農業史”(Agricultural History)，第十五卷，第一二二頁；罗伯特·罗素(Robert R. Russell)：“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奴隸制对非奴隸主的影响”(The Effects of Slavery upon Non-Slaveholders in the Antebellum South)；又“德葆氏評論報”(De Bow's Review)，第二十九卷，第二二七頁；又阿尔巴尼城第一期的“評論晚报”(Evening Journal Tracts)，威廉·西渥德(William H. Seward)：“关于不可調和的冲突的講話”(Irrepressible Conflict Speech)。
- ②⑧ 查理·諾德霍夫(Charles Nordhoff)：“自由工人的美國”(America for Free Workingmen)，一八六五年紐約版，第八頁。
- ②⑨ “德葆氏評論報”，一八四七年二月版，第三卷，第九六頁；又同報第八卷，第一三九頁；又查理·夕德諾(Charles S. Sydnor)：“密士西比奴隸制度”(Slavery in Mississippi)，一九三三年紐約版，第三六頁；又罗歇尔·夏格(Roger W. Shugg)：“路易斯安納階級斗争的起源”(Origin of Class Conflict in Louisiana)，路易斯安納大学一九三九年版，第八九頁；又一九四二年六月“密士西比流域史評”(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二十九卷，第五七頁；安德利斯·道派侖(Andreas Dorpalen)：“德國因素和內战問題”(The German Element and the Issues of the Civil War)。
- ③⑩ 凱斯林·伯魯士(Kathleen Bruce)：“奴隸时期弗吉尼亚的鉄工業”(Virginia Iron Manufacture in the Slave Era)，一九三一年紐約版，第二七五——二七六頁；又一九二六年“威廉与瑪利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六卷，第二集，第二九八頁，凱斯林·伯魯士文。
- ③⑪ 前引約翰遜書，第四八九頁；又前引罗伯特·罗素書，第一二四——一二五頁。
- ③⑫ 前引約翰遜書，第六九頁；又一八五一年八月“德葆氏評論報”，第十一卷，第一三三頁；又一八六〇年八月同報，第二十九卷，第二二七頁。
- ③⑬ 美國人口調查局一八六〇年“美國統計”(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五一二頁；又歐姆斯台德：“海濱各奴隸州”(Seaboard Slave States)，第五四二頁；又爱德加·馬尔丁(Edgar W. Martin)：“一八六〇年的生活水平”(The Stan-

- dard of Living in 1860), 一九四二年芝加哥版, 第五五——六〇頁。
- ③④ 罗瑟·泰勒 (Rosser H. Taylor): “南北战争前的南卡罗来纳”(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一九四二年卡波山城版, 第八一頁; 又加尔文·戴文波 (Carvin Davenport): “南北战争前的肯塔基(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六〇年)” (Ante-Bellum Kentucky, A Social History, 1800—1860), 一九四三年俄亥俄州鄂斯福版, 第二三——二四頁。
- ③⑤ 大衛·萊司 (David Rice): “奴隸制与公理及善政的矛盾” (Slavery Inconsistent with Justice and Good Policy), 一七九二年費城版, 第一一頁; 又“但尼尔·韋布斯特 (Daniel Webster) 选集”, 一八五三年波士頓版, 第五卷, 第三一〇頁。
- ③⑥ 欧姆斯台德: “海濱各奴隸州”, 第五四二——五四四頁。
- ③⑦ 查理·來伊尔 (Charles Lyell): “再訪美國” (Second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一八四九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二三六——二三七頁; 又路得·杰克遜 (Luther J. Jackson):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弗吉尼亞自由黑人勞工及財產之占有” (Free Negro Labor and Property Holding in Virginia, 1830—1860), 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第五九——六〇頁。
- ③⑧ 一九二六年“威廉与瑪利季刊”, 第七卷, 第二期, 第二九九頁, 凱斯林·伯魯士 (Kathleen Bruce) 文; 又前引夏格書, 第一五五頁。
- ③⑨ 前引夏格書, 第一二六及一五五頁。
- ④⑩ 白金漢 (J. S. Buckingham): “美國奴隸州” (Slave States of America), 一八四二年倫敦版, 第二卷, 第一二頁。
- ④⑪ 一九三九年十月“密蘇里史評”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第三十四卷, 第三四——三五頁, 罗素·諾蘭 (Russell M. Nolen): “內战前聖路易的勞工運動” (The Labor Movement in St. Louis Prior to the Civil War)。
- ④⑫ 一九三四年一月“商業史学会公報” (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 第八卷, 第一期, 第三二——三三頁, “聯邦計劃中的奴隸” (Slaves on a Federal Project)。
- ④⑬ “威廉与瑪利季刊”, 第六卷, 第二期, 第二七九——二九九頁, 凱斯林·伯魯士文。
- ④⑭ “美國工業社会史料” 第二卷, 第三六四——三六五頁, 欧利赤·菲利浦斯 (Ulrich B. Phillips) 編: “有关种植園及邊疆文件” (Plantation and Frontier Documents); 又一九四〇年十月“北卡罗来纳州歷史評論”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第十六卷, 第三二二——三二三頁, 費皮恩·林登 (Fabien Linden): “南北战争前南部製造業对美國的影响” (Repercussions of

- Manufacturing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 ④⑤ 前引林登書，第三二二——三二四頁。
- ④⑥ 法來丘尔·格林 (Fletcher M. Green): “一七七六至一八六〇年間大西洋南部各州立憲史”(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Atlantic States, 1776—1860), 一九三〇年卡波山城版，第一六〇——一六一頁。
- ④⑦ 魏格斯塔夫 (H. M. Wagstaff): “一七七六至一八六一年北卡罗來納政府权力及政党”(State Righ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North Carolina, 1776—1861), 一九〇六年巴尔的摩版，第一——頁；又諾頓 (C. C. Norton): “南北美战争前北卡罗來納州的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in Ante-Bellum North Carolina), 一九三〇年卡波山城版，第一七三頁。
- ④⑧ 前引諾頓書，第一九九——二〇〇頁；又波义得 (W. K. Boyd): “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从价奴隶税”(Ad Valorem Slave Taxation, 1858—1860), 載于“三一学院历史学会叢刊”(Trinity College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一九〇五年版，第五卷，第三一——三八頁。
- ④⑨ 前引波义得書，第一三一頁。
- ④⑩ 前引諾德霍夫書，第八頁。
- ④⑪ 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三日“斯柏令費尔德共和党人”(Springfield Republican); 又前引格林書，第一六一頁。
- ④⑫ 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方之星”(The North Star)。
- ④⑬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解放者”轉載。
- ④⑭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蒙特哥馬利廣告人報”(Montgomery Advertiser); 又一八六一年一月八日“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轉載自“流动水星報”(Mobile Mercury)。
- ④⑮ 一八五六年二月十六日“聖安多尼時報”(San Antonio Zeitung)。
- ④⑯ “关于叛乱战争的官方記錄”(Official Records of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第一集，第九卷，第一七〇六頁；又見同書，第十五卷，第九二五——九二六頁。
- ④⑰ 一八五六年罗撒斯特版陶尔 (P. Tower): “奴隶制的真实面目”(Slavery Unmasked) 第三四八頁所引一八五〇年一月“德葆氏評論報”; 又一八六一年一月三日及五月二十九日“紐約論壇報”。
- ④⑱ 前引費皮恩·林登書，第三二〇頁。
- ④⑲ 欧姆斯台德: “南部沿海各奴隶州旅行記”，第五九〇頁。
- ④⑳ 轉引自“南部美國在建國工作中的作用”(The South in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 一九〇九年里士滿版，第五卷，第二一三——二一四頁，及欧姆斯台德: “海濱各奴隶州”

(Seaboard Slave States), 第二卷, 第一四九——一五〇頁。

- ⑫ 一八五三年六月四日“紐約論壇報”。

第十四章

- ①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合作者”(The Co-Operator); 又赫爾曼·施留特爾(Hermann Schlueter): “林肯, 勞工和奴隸制”(Lincoln, Labor and Slavery), 一九一三年紐約版, 第三八——三九頁。

- ② “一八三〇年麻州工人請願書”(Workingmen's Prayer, Massachusetts, 1830), 藏于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坎門司所收藏的勞工文件中。

- ③ 塞米爾·摩利生(Samuel E. Morison): “麻州海運史”(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一九三〇年波士頓及紐約版, 第二九九頁; 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新英格蘭季刊”, 第十四卷, 第六二一——六二三頁; 又路辛(R. H. Luthin): “一八四八年在麻州的林肯”(Lincoln in Massachusetts in 1848)。

- ④ 轉引自菲利浦·方納: “商業和奴隸制度”(Business and Slavery), 一九四一年卡波山城版, 第一四頁。

- ⑤ 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全國勞工”。

- ⑥ 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四十八卷, 第二七四頁, 克利門特·依登(Clement Eaton); “南部

郵件檢查種種”(Censorship of the Southern Mails)。

- ⑦ 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全國勞工”。

- ⑧ 一八三五年八月十日“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 又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福爾河技工”(Fall River Mechanic)。

- ⑨ 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同上書; 又一八六〇年二月三日“嘿味立爾報”(Haverhill Gazette)轉載“弗吉尼亞先驅報”(Virginia Herald); 又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全國勞工”及“箴言”(Monitor)。

- ⑩ 一八三六年九月十三日“全國勞工”。

- ⑪ 第二十五屆國會第三次會議發行之“國會世界”(Congressional Globe)附錄, 第二三七——二四一頁; 又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波士頓郵報”。

- ⑫ 威廉·德瑞頓(William Drayton): “得到昭雪的南部美國”(The South Vindicated), 一八三六年費城版, 第二四一頁; 又一八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解放者”轉載“紐約商務日報”(New York Journal of Commerce)及“紐約先驅報”。

- ⑬ 一八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紐亞克廣告人日報”; 又一八三六年三月三十日“團結”(The Union)。

- ⑭ 一九三六年“美國天主教歷史學會的歷史文件與研究”(United States Catholic Historical Society His-

- torical Records and Studies), 第二十六卷, 第一二〇、一四九——一五六、一六七頁; 克斯伯特·艾倫 (Cuthbert E. Allen): “一八五〇——一八五六年天主教報紙對奴隸制的看法”(The Slavery Question in Catholic Newspapers, 1850—1856); 又麥代爾林·荷克·萊司 (Madeleine Hooke Rice): “美國天主教對奴隸問題之主張”(American Catholic Opinion in the Slavery Controversy), 一九四四年紐約版第八六——一三一頁。
- ⑮ 一八五〇年于波士頓發行之“麻州反奴隸制協會第十八次年報”(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 第一〇七——一〇八頁。
- ⑯ 文德爾·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 “演說、講義和書信”, 第二集, 一八九二年波士頓版, 第二二——二三頁。
- ⑰ 前引艾倫書, 第一四九——一五六頁。
- ⑱ 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解放者”。
- ⑲ 一八四七年八月五日及十月十四日“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幟”(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又一八四七年七月九日“解放者”。
- ⑳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所藏菲利浦斯手稿中一八四八年文德爾·菲利浦斯致韋伯的信(Wendell Phillips to R. D. Webb)。
- ㉑ 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一日“解放者”; 又霍瑞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 “講義、演說及其他論文集”(Lectures, Addresses and other Writings), 一八五〇年紐約版, 第三五二頁。
- ㉒ 一八四六年一月二日“工業之聲”(Voice of Industry)所引“卡伯威耳時事報”(Cabotville Chronicle); 又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福爾河技工”(Fall River Mechanic); 又一八四四年十月五日同上刊中“一個每日工作十小時的女子”(A Ten-Hour Woman)一文。
- ㉓ 一八三四年五月十七日“人報”; 又一八三六年七月二日“全國勞工”; 又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福爾河技工”。
- ㉔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日“福爾河技工”轉載。并參看一八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鞋維報”(The Awl)。
- ㉕ 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 ㉖ 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四日、六日、八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及一八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同上報。
- ㉗ “擁護奴隸制的論點”(The Pro-Slavery Argument), 一八五二年查里士頓版第三一頁; 又羅伯特·吐姆斯(Robert Toombs): “講演集”, 一八五六年華盛頓版, 第一一頁; 又喬治·費茲哈(George Fitzhugh): “沒有主人的奴隸或吃人獸”(Can-

- nibals All: or Slaves Without Masters), 一八五七年里士滿版, 第二九——三一頁; 又威廉·格雷遜 (William J. Grayson): “雇工和奴隸” (The Hireling and the Slave), 一八五四年查里士頓版, 第五〇頁; 又哈維·維許 (Harvey Wish): “喬治·費茲哈” (George Fitzhugh), 一九四三年巴清魯吉版, 第一七四——一九三頁。
- ②⑧ 一八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工人擁護者”; 又一八四六年一月三日“青年美國”(Young America) 轉載“真正太陽報”(True Sun)。
- ②⑨ 一八五〇年二月十六日“紐約論壇報”。
- ③⑩ 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同上報。
- ③⑪ 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一〇七頁。
- ③⑫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先驅”(The Harbinger)。
- ③⑬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日“解放者”。
- ③⑭ “勞工實況: 對勞工改革同盟會會員致辭”(The Condition of Labor: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Labor Reform League), 第一六頁。
- ③⑮ 馬克思: “資本論”, 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一卷, 第三五三頁。
- ③⑯ 前引寇蒂書, 第一一九頁。
- ③⑰ 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一二二頁。
- ③⑱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工業之聲”; 又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新時期”(The New Era); 又諾曼·魏爾(Norman Ware): “工業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 第二二六頁。
- ④⑲ 轉引自阿伏利·克雷文(Avery Craven): “內戰的到來”(The Coming of Civil War), 第一九二頁。
- ④⑳ 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日“工人擁護者”。
- ④㉑ 前引魏爾書, 第二二六頁。
- ④㉒ 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一日及一八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④㉓ 一八四四年八月十日同上報轉載。
- ④㉔ 一八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幟”(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 ④㉕ 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一〇七頁; 又“勞工實況”(Condition of Labor), 第一三及一六頁。
- ④㉖ 前引施留特爾書, 第七三——七四頁。
- ④㉗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十五日紐約“美國人自己園地及消防隊日報”(America's Own and Fireman's Journal)。
- ④㉘ 一八五〇年八月十五日“紐約論壇報”。
- ④㉙ 一八五〇年六月十三日同上報。
- ④㉚ 一八五三年十月“歡樂月刊”(Monthly Jubilee)。
- ④㉛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六日“特令敦每日公報”(Trenton Daily State Gazette)。
- ④㉜ 前引施留特爾書, 第七五——七六頁。
- ④㉝ 比塞·路易斯·皮爾斯(Bessie Louise B. Pierce): “芝加哥歷史”

- (A History of Chicago), 一九四〇年紐約版, 第一六七頁。
- ⑤ 一九三五年四月“北卡罗來納州歷史評論”(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第十二卷, 第一一二頁及以后各頁, 皮恩(W.G. Bean): “南北戰爭前南部的反杰斐遜運動”(Anti-Jeffersonianism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又一八五八年七月五日“查里士頓水星報”(Charleston Mercury); 又一八六〇年八月“德傑氏評論報”, 第一〇九頁; 又第三十六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國會世界”附錄, 第九七頁; 又查理·諾德霍夫(Charles Nordhoff): “自由工人的美國”(America for Free Workingmen), 一八六五年紐約版, 第一八頁。
- ⑥ 欧姆斯台德(F.L. Olmsted): “南部沿海各奴隸州旅行記”(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 第一卷, 第二〇四頁; 又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紐約每周論壇報”(New York Weekly Tribune); 又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南方歷史報”(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第六卷, 第五一四—五二〇頁; 威福利德·卡尔索(Wilfred Carsel): “奴隸主对北部工資奴隸制的訴訟案”(The Slaveholders' Indictment of Northern Wage Slavery); 又罗凌士·施麥西比耳(Laurence F. Schmecehier): “馬里蘭州一無所知黨史”(History of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ryland), 一八九七年巴尔的摩版, 第四八頁。
- ⑦ 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一日“福尔河技工”。
- ⑧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北方之星”(The North Star)轉載。
- ⑨ 一八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密尔窩基自由民主党人”(Milwaukee Free Democrat)。
- ⑩ 一八五六年七月三日“紐約論壇報”。
- ⑪ 一八五四年二月二日、四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三月十五日、二十三日同上报。
- ⑫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日、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六日、三十一日同上报。
- ⑬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二日同上报。
- ⑭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会史料”, 第七卷, 第三七頁; 又一九〇九年九月“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二十四卷, 第四八八頁; 又約翰·坎門司(John R. Commons): “霍瑞斯·格利雷与共和党中工人成分”(Horace Greeley and the Working Class Origins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 ⑮ 轉引自約瑟夫·卡萊尔·夕特尔生(Joseph Carlyle Sitterson)于北卡罗來納大学一九三七年所寫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北卡罗來納脫离联邦运动”(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North Carolina), 第一〇

- 九頁；又第三十四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國會世界”附錄，第一一五五——一五六頁。
- 65 前引克雷文書，第二一八頁所引“芝加哥日報”(Chicago Daily Journal)，并參看方納：“商業和奴隸制度”(Business and Slavery)，第二一八頁。
- 66 一八五七年九月九日“紐約晚郵報”；又哈雷·威廉斯(T. Harry Williams)：“林肯和激進派”(Lincoln and the Radicals)，一九四一年麥迪生版，第八——九頁。
- 67 一八六〇年三月十日、十九日“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又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三日“費城公共記錄報”(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喬治·馬爾丁(George H. Martin)文。
- 68 一八五六年九月十二日、十五日、二十六日、十月二十日“紐約論壇報”。
- 69 “共和黨雜編”(Republican Scrap Book)，一八五六年波士頓版，第三四頁。
- 70 一八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紐約論壇報”及“匹茲堡公報”(Pittsburgh Gazette)。
- 71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一日、十九日、二十七日、四月一日“紐約論壇報”。
- 72 湯姆斯·畢特金(Thomas Monroe Pitkin)于西瑞澤符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一九三五年所寫未發表的博士論文，“關稅與早期共和黨”(The Tariff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Party)，第二六二——二六四頁；又藏于國會圖書館的“徹斯文稿集”(Chase Papers)中，一八五九年十月三日及一八六〇年二月六日“詹姆斯·華脫與霍德雷致索門·徹斯書”(James Walter, George Hoadley to Salmon P. Chase)。
- 73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五日“辛辛那提商務報”(Cincinnati Commercial)。
- 74 弗蘭克·海利奧特(Frank I. Herriot)：“德國僑聯中德黨共和黨員會議(一八六〇年五月十四至十五日于芝加哥)”(The Conference of German-Republicans in the Deutsches Haus, Chicago, May 14—15, 1860)，轉載自“伊利諾州歷史學會一九二八年年會報”(Transactions of the Illinois Historical Society for 1928)，第四八——四九、六三——六四、八五——八六及九三頁。
- 75 貝靈格爾(W. L. Baringer)：“林肯的執政”(Lincoln's Rise to Power)，一九三七年波士頓版，第二七四頁；并參看蘭多爾(J. G. Randall)：“林肯總統”(Lincoln the President)，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一卷，第一六一——一六三頁。
- 76 上引貝靈格爾書，第一九〇頁；又納爾斯·霍堪遜(Nels Hokanson)：“林肯時代的瑞典移民”(Swedish Immigrants in Lincoln's Time)，一九四二年紐約版，第五四頁。

- ①⑦ 菲利浦·方納編“林肯選集”(Abraham Lincol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一九四四年紐約版, 第一五——一六頁, 八七——八八頁; 又約翰·尼可萊和約翰·海依(John G. Nicolay and John Hay)編: “亞伯拉罕·林肯全集”(Complete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一九〇五年紐約版, 第五卷, 第二四七——二五〇頁; 又前引貝靈格爾書, 第三四——三五頁; 又一九一五年“伊利諾州德美歷史學年鑒”(Yearbook German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of Illinois), 第十五卷, 第一八一頁及以下諸頁, 海利奧特(F. L. Herriot): “林肯致堪尼薩斯信之論據及意義”(The Premises and Significance of Abraham Lincoln's Letter to Theodor Canisus)。
- ①⑧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紐約論壇報”; 又第三十六屆國會, 第一次會議“國會世界”, 第一八七二——一八七三頁。
- ①⑨ 前引畢特金書, 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又一八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三十日“紐約論壇報”。
- ①⑩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匹茲堡公報”; 又前引畢特金書第二五八頁。
- ①⑪ 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先驅報”。
- ①⑫ 方納: “商業和奴隸制度”, 第二〇六頁。
- ①⑬ 一八六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二日“紐約民主黨人”(New York Demokrat); 又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日“紐約先驅報”。
- ①⑭ 一八六〇年四月九日及十月十二日“費城訊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
- ①⑮ “密蘇里史評”(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第三十四卷, 第三七頁; 又前引霍堪遜書, 第五十八頁; 又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塔格里西伊利諾州時報”(Tägliche Illinois staatszeitung)。
- ①⑯ 麥克斯·皮爾波姆(Max Birnbaum)一九三八年六月于威士康辛大學所寫未發表之學士論文, “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全國危機中的北部勞工”(Northern Labor in the National Crisis, 1860—1861), 第四五——五七頁; 又一九四二年六月“伊利諾州歷史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 Illinois Historical Society), 第三十五卷, 第一三三——一三九頁, 杰·莫納汗(Jay Monaghan): “林肯是否獲得伊利諾州德國人的選票?”(Did Abraham Lincoln Receive the Illinois German Vote?)。
- ①⑰ 方納: “商業和奴隸制度”, 第二〇六頁; 又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九日“紐約論壇報”。

第十五章

- ①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五日“紐約論壇報”

- 報”轉載。
- ②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辛辛那提商務報”。
- ③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伊利諾州報”(Illinois State Journal)。
- ④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又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五日——十七日“國家通訊者”(National Intelligencer); 又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八日“辛辛那提商務報”。
- ⑤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芝加哥論壇報”; 又一九二九年“馬里蘭歷史雜誌”(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第二十四卷; 卡尔·弗拉削(Carl M. Frasure): “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一年馬里蘭州的團結心”(Union Sentiment in Maryland, 1859—1861), 第二一四——二一五頁。
- ⑥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四日“紐約先驅報”; 又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費城訊聞報”。
- ⑦ 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辛辛那提商務報”。
- ⑧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七日“國家通訊者”。
- ⑨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八日“費城訊聞報”。
- ⑩ 一八六一年一月八日——十日“紐亞克自由前哨報”(Newark Sentinel of Freedom); 又一八六一年一月十日“紐約論壇報”。
- ⑪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 ⑫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費城訊聞報”。
- ⑬ 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又前引體耳書, 第四四——四五頁。
- ⑭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二日“紐約論壇報”。
- ⑮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同上報; 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西賓夕法尼亞歷史傳記雜誌”(Western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第二十四卷, 第二五四——二五五頁, 平漢姆·鄧肯(Bingham Duncan): “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的新卡瑟城: 一種對戰爭危機的共同反應”(New Castle in 1860—1861: A Community Response to a War Crisis)。
- ⑯ 一八六一年一月七日“紐約論壇報”。
- ⑰ 轉引自卡尔·散德伯格(Carl Sandburg): “戰爭年代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四二八頁。
- ⑱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四日、十八日“辛辛那提商務報”。
- ⑲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費城新聞”(Philadelphia Press); 又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費城訊聞報”; 又前引體耳書, 第四五——四七頁。

- ⑳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費城訊問報”。
- ㉑ 同上報。
- ㉒ 方納：“商業和奴隸制度”，第二七三頁；又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費城新聞”(Philadelphia Press)；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六日“紐約先驅報”；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匹茲堡公報”；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及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波士頓快報”。
- ㉓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費城公共記錄報”；又前引櫻耳書，第四四——四五頁。
- ㉔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紐約先驅報”。
- ㉕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波士頓快報”。
- ㉖ 一八五七年五月“和平先驅”(Herald of Peace)，第三三期，第二〇二——二〇三頁；又前引寇蒂書，第三二——三八及一二二頁。
- ㉗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八日“費城訊問報”；又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四及十八日“辛辛那提商務報”；又“關於叛亂戰爭的聯邦軍官方文件彙編”(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A Compila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一八九九年華盛頓版，第三集，第一卷，第一二二期，第五六——五八頁；又一八六一年一月十日、十五日、十六日“紐約論壇報”。
- ㉘ 班哲明·伯特勒 (Benjamin F. Butler)：“伯特勒書”(Butler's Book)，一八九二年波士頓版，第一六五頁。
- ㉙ 一八六一年八月“鐵鐵論壇”(The Iron Platform)。
- ㉚ 一八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五日“羅厄爾人民之聲”(Lowell Vox Populi)。
- ㉛ 弗萊得立克·默克 (Frederick Merk)：“十年內戰中威士康辛的經濟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isconsin during the Civil War Decade)，一九一六年麥迪生版，第二六頁。
- ㉜ 一八六一年七月四日“紐約論壇報”。
- ㉝ 一八六一年七月九日、十日同上報；又一九四三年一月“紐約歷史”(New York History)，第二十四卷，第五六一——五七頁，霍華德·馬拉羅 (Howard R. Marraro)：“林肯的來自紐約的意大利志願軍”(Lincoln's Italian Volunteers from New York)。
- ㉞ 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紐約論壇報”。
- ㉟ 一八六二年八月七日同上報。
- ㊱ 第三九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行政文件集”(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s)第二號，第二一頁。
- ㊲ 高爾德(B. A. Gould)：“美國軍人兵種及人種統計研究”(Investigations in the Military and Anthropological Statistics of American

- Soldiers), 第二一二及二一六頁, 特別是表格第二号及第八号, 以及第二〇九頁及以後諸頁。
- ③⑧ 索耳·施因德勒(Saul Schindler)于布魯克林學院一九四〇年所寫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北部勞工和美國內戰”(Northern Labor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第四八及五九頁。
- ③⑨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七日“波士頓夜聲報”(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
- ④⑩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九日“紐約先驅報”。
- ④⑪ 泰倫斯·泡德利(Terence V. Powderly): “勞工三十年”(Thirty Years of Labor), 一八八九年哥倫布斯版, 第五七頁; 又見藏于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一八六一年五月二日北美國際鑄工協會特洛依支會(International Molders' Union of North America, Troy local)的記錄手稿。
- ④⑫ 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羅厄爾公民新聞日報”(Lowell Daily Citizen and News); 又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④⑬ 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二一六頁; 又前引夕威斯書, 第五四頁; 又前引默克書, 第一七六頁。
- ④⑭ “一八六一年北美機械工與鐵工國際工會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Mechanists and Blacksmiths of North America for 1861), 一八六二年費城版, 第二八頁。
- ④⑮ 前引魏克書, 第一一二——一四頁。
- ④⑯ 菲利浦·方納: “美軍紀律教育”(Morale Education in the American Army), 一九四四年紐約版, 第三三——三六頁; 又前引希耳奎特雷, 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又前引施留特爾書, 第八三——八四頁; 又佛蘭克·穆爾(Frank Moore): “暴動事件史實”(Rebellion Record), 一八六二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一〇七、一〇九、二三五頁; 又一九二九年七月“密蘇里史評”(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第二十三卷, 第六〇三——六〇五頁; 錫法·布來特·拉夫靈(Sceva Bright Laughlin): “內戰時期的密蘇里政治”(Missouri Politics During the Civil War)。
- ④⑰ 一八六四年一月二日“芬區爾工會評論”(Fincher's Trades' Review)。
- ④⑱ 前引夕威斯書, 第四九頁; 又前引托德士書, 第二七——二八頁。又喬納桑·格羅斯曼(Jonathan Grossman): “威廉·夕威斯, 美國勞工先驅”(William Sylvis, Pioneer of American Labor), 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第四八——四九頁。
- ④⑲ 前引魏克書, 第一一三頁。
- ④⑳ 見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六一七——六二七頁; 又一八六四年“鑄工報”

- (Iron Molders Journal), 第二五、三八、五四頁。
- ⑤ 哥倫比亞大學所藏縮小攝影本之一八六一年五月二日“特洛依鑄鐵工業工會議事錄”(Minutes of the Troy Iron Molders' Union)。
- ⑥ 前引馬太和韋克脫書, 第一四六頁; 又前引夕威斯書, 第二三二——二三三頁; 又藏于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之手稿本羅杰士(F. H. Rogers)“自傳”(Autobiography), 第十二章。
- ⑦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波士頓快報”(Boston Daily Courier)轉載。
- ⑧ 一八六一年九月三日“西茲堡公報”; 又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十月九日至十五日“紐約論壇報”; 又前引哈雷·威廉斯書, 第四〇頁。
- ⑨ 散德伯格(Sandburg): “戰爭年代”(The War Years), 第二卷, 第一二七——一二八頁; 又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一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 ⑩ 伍德·格雷(Wood Gray): “潛伏着的內戰: 銅頭蛇的故事”(The Hidden Civil War: The story of the Copperheads), 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第八六頁。
- ⑪ 一八六二年十一月“鋼鐵論壇”(The Iron Platform)。
- ⑫ 吉爾摩耳(J. G. Gilmore): “對林肯及內戰的個人回憶”(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Civil War), 一八九八年波士頓版, 第七五頁; 又“解放者”(The Liberator), 第三十一卷, 第一五、一二二、一三〇、一八五頁; 又同書第三十二卷, 第二一、二六、六〇頁; 又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費城新聞”(Philadelphia Press)。
- ⑬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 一九五四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 第一卷, 第三六一頁。
- ⑭ 弗萊得立克·本克勞夫特(Frederick Bancroft): “威廉·西渥德傳”(William H. Seward), 一九〇〇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一六八頁。
- ⑮ 一九一八年四月“愛俄華歷史政治報”(Iow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第十六卷, 第四〇〇——四三九頁; 伯納·施米特(Bernard Schmidt): “內戰時期小麥和棉花對英美關係之影響”(The Influence of Wheat and Cotton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ivil War); 又一九三九年十月“美洲”(Americana)第三十三卷, 第四六二頁; 又查理·格利克斯堡(Charles I. Glicksburg): “亨利·亞當姆斯和內戰”(Henry Adams and the Civil War)。
- ⑯ 哈利特·韋特(Harriet A. Weed)編: “瑟羅·韋特自傳”(Autobiography of Thurlow Weed), 一八八三年紐約版, 第一卷, 第六四二頁。
- ⑰ 前引馬克思恩格斯: “論美國內戰”, 第五〇頁。
- ⑱ 亨利達·伯克馬斯特(Henrietta

- Buckmaster): “讓人民選擇自己的道路”(Let My People Go), 一九四一年紐約版, 第六四二頁; 又一九二四年九月“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三十九卷, 約瑟夫·派克(Joseph H. Park): “英國工人和美國內戰”(The English Workingme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第四三九頁。
- ⑤ 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六日“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
- ⑥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同上報。
- ⑦ 前引馬克思恩格斯: “論美國內戰”, 第一二五頁。
- ⑧ 前引馬克思恩格斯: “論美國內戰”, 第一三四頁。
- ⑨ 同上書, 一九三七年紐約英文版, 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 ⑩ 前引派克書, 第四四三頁。
- ⑪ 同上書, 第四三九頁。
- ⑫ 約翰·德萊泊(John W. Draper): “美國內戰史”(History of American Civil War), 一八六七——一八七〇年紐約版, 第二卷, 第五九一頁; 又愛德華·麥克菲爾生(Edward Mepherston):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至一八六四年七月四日大叛亂期之美國政治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Great Rebellion from Nov. 6, 1860 to July 4, 1864), 一八六四年華盛頓版, 第二三四頁。
- ⑬ 華星吞·福特(Worthington C. Ford)編: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亞當姆斯書信集”(A Cycle of Adams Letters, 1861—1865), 一九二〇年波士頓版, 第一卷, 第二四三頁。
- ⑭ 同上書, 第二四六頁。
- ⑮ 見馬克思恩格斯: “論美國內戰”, 一九三七年紐約英文版, 第三——四頁。
- ⑯ “國會世界”(Congressional Globe), 第六十四卷, 第一〇二頁。
- ⑰ 約翰·克倫威爾(John W. Cromwell): “美國歷史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History), 一九一四年紐約版, 第二四二頁。
- ⑱ “關於叛亂戰爭的官方記錄”(Official Records of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第一集, 第十卷, 第一六二頁; 又霍瑞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 “美國矛盾”(The American Conflict), 一八七三年哈特福特版, 第二卷, 第二五八頁; 又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紐約論壇報”。
- ⑲ “關於叛亂戰爭的官方記錄”, 第一集, 第十三卷, 第六八四頁及第九卷第四〇二頁。
- ⑳ 同上書, 第一集, 第九卷, 第三五三頁。
- ㉑ 菲利浦·方納編: “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選集”(Frederick Douglass: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第三五——三六, 第六五——七四頁; 又拜爾·維利

- (Bell I. Wiley):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之南部黑人”(Southern Negroes 1861—1865), 一九三八年新港版, 第二七四——二七五頁; 又彼得·克拉克(Peter H. Clark): “辛辛那提的黑人旅”(The Black Brigade of Cincinnati), 一八六四年辛辛那提版, 第一三頁。
- ②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新群众”(New Masses), 第一八頁。
- ③ “关于叛乱战争的官方记录”, 第一集, 第二十六卷, 第六八八——六八九頁。
- ④ 一九三九年四月“黑人历史报”(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第二十四卷, 第一八三頁, 赫伯特·耶浦斯克尔: “目前情况下美国黑奴逃亡情况”。
- ⑤ 非利浦·方纳: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第七一——七二頁。
- ### 第十六章
- ① 見路易斯·海克尔(Louis Hacker): “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一九四〇年纽约版, 第三七三頁。
- ②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芬区尔工会评论”。
- ③ 詹姆斯·夕威斯(J. C. Sylvis): “威廉·夕威斯的生平、演说及论文”(The Life, Speeches, Labors and Essays of William H. Sylvis), 一八七二年费列得尔非亚版, 第二二九頁。
- ④ “全国反奴隶制旗帜”(The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一八六三年八月号。同时参看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一日“纽约时报”。
- ⑤ 哈维·奥康诺(Harvey O'Connor): “梅隆的财富”(Mellon's Million's), 一九三三年纽约版, 第二四頁。
- ⑥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六日“纽约铜头蛇”(New York Copperhead)。
- ⑦ 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同上报。
- ⑧ 一八六三年五月三十日同上报。
- ⑨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八日同上报; 卡尔·散德伯格(Carl Sandburg): “战争年代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The War Years), 第二卷, 第三六一頁及以后数頁。
- ⑩ 海得雷(J. T. Headley): “纽约大暴动”(The Great Riots in New York), 一八七三年纽约版, 第二六一——二六八頁; 又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至十九日“纽约时报”。
- ⑪ 威廉·伊特尔(William A. Itter)于一九四一年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所写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宾州在内战时期的征兵制”(Conscription in Pennsylvania During the Civil War), 第一四四頁及以后数頁。
- ⑫ 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纽约铜头蛇”。
- ⑬ 一八六四年九月“钢铁论坛”(The Iron Platform)。
- ⑭ 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及三十日“纽约论坛报”。同时参看阿瑟·施

- 列兴格(Arthur M. Schlesinger): “美國历史新观点”(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一九二二年紐約版, 第一三頁; 華特·考列曼(J. Walter Coleman): “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宾夕法尼亞的勞工糾紛”(Labor Disturbances in Pennsylvania, 1850—1860), 一九三六年華盛頓版, 第四二頁及以后數頁。
- ⑮ 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⑯ 全文載于一八六四年六月份“鋼鐵論壇”。
- ⑰ 一八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⑱ 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同上報。
- ⑲ 轉引自乔治·密尔顿(George F. Milton): “林肯和第五縱隊”(Lincoln and the Fifth Column), 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第二三七頁。
- ⑳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六、三十日及六月六、二十日“紐約銅頭蛇”。
- ㉑ 前引伍德·格雷書, 第一五九頁; 又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紐約世界”(New York World); 又約翰·羅根(John A. Logan): “大陰謀”(The Great Conspiracy), 一八八六年紐約版; 又一八六三年七月十八日“紐約銅頭蛇”; 又一九三五年四月“黑人歷史”(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第二十卷, 第一三一——一五二頁, 瑞·阿伯仁斯(Ray H. Abrams): “銅頭蛇報及黑人”(Copperhead Newspapers and the Negro)。
- ㉒ 第三十七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第二號“眾院報告”(House Report) 第三五頁; 又一八六四年“哈普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 第二十九卷, 第二二八頁, 罗伯特·托姆斯(Robert Tomes): “戰爭帶來的好運”(The Fortunes of War); 又一九一八年一月“愛俄華歷史政治報”(Iow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第十六卷, 第三六頁; 阿浦漢(Upham): “內戰時期愛俄華軍隊的武器與裝備”(Arms and Equipment for Iowa Troops During the Civil War)。
- ㉓ 一九一三年第一一四號“美國勞工統計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附錄: “批發價格”(Wholesale Prices)。
- ㉔ “一八六八年商人和銀行家年鑒”(Merchants' and Bankers' Almanac, 1868), 第一三八、一四九頁; 又“紐約州商會報告(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Report of Chamber of Commerce of New York State, 1868—1869); 又一八六三年三月五日及一八六四年一月六日“紐約晚郵報”; 又修士巴塞爾·列奧·李(Brother Basil Leo Lee): “紐約城內的民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Discontent in New York City, 1861—1865), 一九四三年哥倫比亞區華盛頓版, 第一八一頁。

- ②5 轉引自詹姆斯·艾倫 (James S. Allen): “重建时期: 争取民主的斗争” (Reconstruction: The Battle for Democracy), 一九三七年紐約版, 第一一六頁。同时参看一八六四年八月份“印刷工人”(The Printer), 第一一六頁。
- ②6 韋士雷·米琪尔 (Wesley C. Mitchell): “綠背党人史” (A History of the Greenbacks), 一九〇三年芝加哥版, 第一八——三〇頁。
- ②7 一九四一年五月份“經濟史报”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一卷, 第四四頁及以后数頁, 但尼尔·克利默 (Daniel Creamer): “为阿莫斯凱格制造厂招收合同劳工” (Recruiting Contract Laborers for Amoskeag Mills)。
- ②8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②9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日同上报。
- ③0 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七日及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三日同上报。
- ③1 前引魏克書, 第一二二頁。
- ③2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五月十四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③3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同上报。
- ③4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日同上报。
- ③5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同上报。
- ③6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同上报。
- ③7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第九九号“西瑞澤符歷史学会会刊” (Western Reserve Historical Society), 第一四——二一頁; E·J·邦頓 (E. J. Benton): “内战期末獲勝利的和平运动” (Movement for Peace without a Victory During the Civil War)。
- ③8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③9 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同上报。
- ④0 参看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紐約每日新聞” (New York Daily News) (布魯克林木匠業工会通过之決議) 及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四日“波士頓夜声报” (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 (新英格蘭工会群众集会通过之決議)。
- ④1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日、十月二十九日及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四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④2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上报。
- ④3 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波士頓夜声报”。
- ④4 前引散德伯格書, 第二卷, 第六二一頁及第三卷, 第三九八頁及以后数頁; 又一八六四年一月九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④5 同上。
- ④6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④7 一八六四年二月十六日同上报。
- ④8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三日、十八日及七月四日、九日。
- ④9 一八六三年十月份及一八六四年二月、三月、九月份“鋼鐵論壇”; 又一八

六四年七月十九日“紐約論壇報”。

- ⑤① 一八六一年十月份“鋼鐵論壇”。
- ⑤② 一八六二年九月份同上報。
- ⑤③ 一八六三年五月份同上報。
- ⑤④ 一八六四年三月份同上報。
- ⑤⑤ 一八六四年三——四月份同上報。
- ⑤⑥ 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紐約論壇報”。
- ⑤⑦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同上報。
- ⑤⑧ 紐約公立圖書館所存“格利雷文稿集”(Greeley Papers)中一八六四年八月二日阿伯特·勃瑞斯培恩(Albert Brisbane)致霍瑞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信。
- ⑤⑨ H·施留特爾(H. Schlueter):“第一國際”(The First International), 一九一八年芝加哥版, 第一八八——一九一頁。
- ⑤⑩ 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四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⑤⑪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三日“波士頓夜聲報”。

第十七章

- ① 前引斯塔克頓書, 第二三頁; 又“機械工和鐵工匹茲堡大會會議錄(一八六一年十一月)”(Proceedings of the Machinists and Blacksmiths Convention at Pittsburgh, November, 1861), 第二一頁。
- ②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芬区尔工会評論”(Fincher's Trades' Review)。
- ③ 一八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同上報中

詹姆斯·安德魯(James Andrews)文。

- ④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上報。
- ⑤ 前引克羅斯書, 第三四——三五頁所引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六日“舊金山晚報”(San Francisco Evening Bulletin)。
- ⑥ 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
- ⑦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⑧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同上報。
- ⑨ 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同上報。
- ⑩ 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同上報; 又參看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及一八六四年一月二日、四月三十日同報。
- ⑪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上報; 又“女工自衛聯合會第三十一次報告(一八九四年)”(31st Report of the Working Women's Protective Union, 1894), 第八頁。
- ⑫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紐約晚郵報”; 又“女工自衛聯合會第三十一次報告(一八九四年)”, 第八——九頁。
- ⑬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紐約論壇報”; 又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三日“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 又“女工自衛聯合會第七次報告(一八七〇年)”(7th Report of the Working Women's Protective Union, 1870), 第一一頁。

- ⑭ 美國勞工委員會 (U. S. Commission of Labor) “第四次年報 (一八八八年)”, 第五一頁; 又“女工自衛聯合會第五次報告 (一八六八年)”, 第一四頁。
- ⑮ 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九日“紐約論壇報”; 又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七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 (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 ⑯ 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及九月十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又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 第九五頁。
- ⑰ 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⑱ 一八六五年二月四日同上報。
- ⑲ 英格瑞·彼得遜 (Ingree Peterson) 于一九三七年在杜爾大學所寫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得克薩斯州休斯頓城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史” (History of Organized Labor in Huston, Texas); 又查理·菲利浦·安遜 (Charles Philips Anson) 一九四〇年在北加利福尼亞大學所寫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弗吉尼亞西部勞工運動史” (A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West Virginia), 第七四頁。
- ⑳ “國際鑄鐵工會會議錄 (一八六四年布法羅會議)” (Proceedings of the Iron Molders International Union Convention, Buffalo, 1864), 第七——一三頁, 存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 ㉑ 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又前引托德士書, 第三七頁; 又前引格羅斯曼書, 第八八——一一九頁。
- ㉒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 第一五頁。
- ㉓ 一八六四年一月九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㉔ 威廉·夕威斯 (William H. Sylvis): “雜記” (Scrapbooks), 存芝加哥約翰·克利拉圖書館。
- ㉕ 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㉖ 前引托德士書, 第三八頁; 又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 第一六六頁。
- ㉗ 前引坎門司書, 第二卷, 第一五——一七頁; 又一八六四年四月十六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又前引魏克書, 第二六一頁。
- ㉘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二十六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㉙ 一八六三年六月六日同上報。
- ㉚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同上報。
- ㉛ 一八六三年十月十日同上報。
- ㉜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及四月九日“工人擁護者” (Workingman's Advocate)。
- ㉝ 一八六四年七月二日及十月二十九日“芬區爾工會評論”轉載。
- ㉞ 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同上報。
- ㉟ 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上報。
- ㊱ 前引托德士書, 第五一頁。
- ㊲ 前引弗愛脫書, 第二〇二頁; 又一八六三年十月五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又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一日“波

- 士頓夜聲報”。
- ③⑧ 前引斯塔克頓書,第一七頁;又一八六三年十月五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③⑨ 一八六三年十月三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④⑩ 一九四二年十月份“紐約歷史”(New York History),第二十三卷,第四四九——四五七頁,乔納桑·格羅斯曼(Jonathan grosman):“鑄工反对合同罪犯勞工的斗争”(The Molders' Struggle Against Contract Prison Labor);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三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④⑪ 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七日“波士頓夜聲報”;又一八六四年十月八日及一八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日“芬区尔工会評論”;又前引魏克書,第一二八——一三〇頁。
- ④⑫ 前引魏克書,第二五八頁。
- ④⑬ 前引克羅斯書,第三二——三四頁;又散德伯格:“战争年代”(The War Years),第二卷,第六二〇——六二一頁。
- ④⑭ 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又一八六四年八月五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④⑮ 一八六四年一月二日“芬区尔工会評論”;又前引懷耳書,第七九頁。
- ④⑯ 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④⑰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芬区尔工会評論”;又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三——二四頁。
- ④⑱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九日、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芬区尔工会評論”;又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一三九頁。
- ④⑲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一三九頁。
- ⑤① 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芬区尔工会評論”轉載。
- ⑤② 一八六四年四月八日“紐約先驅報”。
- ⑤③ 同上報;又一八六四年四月八日“紐約論壇報”。
- ⑤④ 一八六四年四月二日“芬区尔工会評論”;又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三日“紐約論壇報”。
- ⑤⑤ 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人拥护者”。
- ⑤⑥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一三一——一三二頁。同时參看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及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⑤⑦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五日“芬区尔工会評論”中C·M·塔尔馬其(C. M. Talmadge)文。同时參看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同上報及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波士頓夜聲報”中“一技工”(A Mechanic)一文。
- ⑤⑧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会史料”,第九卷,第一一七頁;又一八六四年一月二日“芬区尔工会評論”。
- ⑤⑨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同上報中塔尔馬其(Talmadge)文。

- ⑤⑩ 一八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同上报；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一八頁。
- ⑥⑩ 一八六四年十月一日“芬區爾工會評論”；又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波士頓夜聲報”；又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三五頁。
- ⑥⑪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二〇——一二五頁；又美國勞工部（U. S. Department of Labor）“一九二〇年年報”（Annual Report for 1920），一九二一年華盛頓版，第一三頁。
- ⑥⑫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⑥⑬ 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同上报轉載。
- ⑥⑭ 麥里翁·卡希耳（Marion C. Cahill）：“縮短工時”（Shorter Hours），一九三二年紐約版，第一三七頁。
- ⑥⑮ 前引愷耳書，第三七——三八頁。又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Wisconsi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印發的文件，“有步驟的勞動改革運動”（Systematic Labor-Reform Movement）。
- ⑥⑯ 參看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紐約先驅報”。
- ⑥⑰ 一八七八年六月九日“勞動旗幟”（Labor Standard）。
- ⑥⑱ 一八七八年一月六日同上报；又一八七四年四月“公正報”（Equity）。
- ⑥⑲ 見伊拉·史都華（Ira Steward）：“貧窮”（Poverty）的前言，該書為波士頓八小時工作協會（Boston Eight Hour League）印行的小冊子。
- ⑦⑩ 一八七七年三月三日“勞動旗幟”。
- ⑦⑪ 一九三二年八月份“政治經濟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四〇卷，第五三二以下諸頁，又桃樂賽·道格拉斯（Dorothy W. Douglas）：“伊拉·史都華論消費與失業”（Ira Steward on Consumption and Unemployment）；又前引麥爾斯書，第八五——八八頁；又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工人擁護者”中伊拉·史都華文；又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勞動旗幟”；又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份“同志”（The Comrade），第一卷，第六六以下諸頁中威廉·埃德寧（William Edlin）文。
- ⑦⑫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美國工人（波士頓）”（American Workingman（Boston））。
- ⑦⑬ 前引道格拉斯書，第五三二頁；又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全國工人”（National Workman）。
- ⑦⑭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十卷，第二六頁。
- ⑦⑮ 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及一八七〇年一月十四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及二十四日“全國工人”。
- ⑦⑯ 一八六三年十月三日、三十一日及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四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⑦⑰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报。
- ⑦⑱ 奧古斯大·郭斯通（Augusta E.

Galston): “制鞋工業的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Shoe Industry), 第一三八頁。

- ② 一八六五年九月九日“芬區爾工會評論”中伊利通訊。
- ③ 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同上報；又一八六六年五月八日、十二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④ 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五三頁。
- ⑤ “木工和裝配工人一八六七年全國工會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Carpenters' and Joiners' National Convention, 1867), 第二五頁。

第十八章

- ① 一八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工人擁護者”(Workingman's Advocate)。
- ②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二六——一二九頁；又一八六六年八月十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工人擁護者”。
- ③ 同上坎門司書，第九卷，第一二七——一二八頁。
- ④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六七頁；又前引希耳奎特書，第一八五頁。
- ⑤ 同上。
- ⑥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三九——一四一頁。
- ⑦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一八四六——一八九五)”(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第二一四——二一五頁。(譯文參閱“馬恩通訊選集”，一九四九年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第二〇——二一頁——譯者。)
- ⑧ 馬克思：“資本論”，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五三頁。
- ⑨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三四——一三六頁。
- ⑩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七頁。
- ⑪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六九——一七一頁。
- ⑫ 同上。
- ⑬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⑭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同上報。
- ⑮ 一八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同上報。
- ⑯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及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日、四月二十四日、九月四日同上報。
- ⑰ 一八六九年二月十六日“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 ⑱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紐約先驅報”；又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工人擁護者”。
- ⑲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⑳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二日“工人擁護者”；又愛德華·麥克菲爾生(Edward McPherson): “一八七二年政治手冊”(A Handbook of Politics for 1872), 一八七二年華盛頓版，第六九——七〇頁。
- ㉑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三二四頁。

- ② 一八六九年五月一日及十二月二日“工人拥护者”。
- ③ 前引麥克菲爾生書,第七〇頁;又前引馬利·卡希耳書,第六九——七〇頁;又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工人拥护者”。
- ④ 一八七〇年八月六日“阿拉巴馬的灯塔”(Alabama Beacon)轉載。
- ⑤ 前引卡希耳書,第六九——七〇頁。
- ⑥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工人聯盟”(Arbeiter Union)。
- ⑦ 前引克羅斯書,第五〇——五一頁;又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日“工人拥护者”。
- ⑧ 一八六八年費列得爾非亞“全國勞工會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Labor Union),第一四頁;又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日“工人拥护者”。
- ⑨ 前引依夫斯書,第二〇——二〇六頁。
- ⑩ 前引波爾曼書,第五〇頁。
- ⑪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日“全國工人”;又“賓夕法尼亞州法律(一八六七——一八六八)”(Laws of Pennsylvania),第九九頁;又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工人拥护者”。
- ⑫ 前引卡希耳書,第一四八頁;又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一四七頁。
- ⑬ 賓州勞工與農業統計局“第一次年報”(Pennsylvania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 and Agriculture),第二部分,第二三二——二七五頁。
- ⑭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五日“紐約時報”。
- ⑮ 一八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同上報。
- ⑯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一日“工人拥护者”。
- ⑰ 一八七一年五月六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
- ⑱ 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工人拥护者”。
- ⑲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⑳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及一八七〇年二月五日、三月十九日“工人拥护者”;又前引安德魯和勃利斯書,第九八——九九頁。
- ㉑ “全國印刷工會會議錄(一八六九年)”(Proceedings of the 1869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第二九頁;又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工人拥护者”。
- ㉒ 一八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八月十八日“工人拥护者”。
- ㉓ “全國印刷工會會議錄(一八七二年)”,第五〇——五一頁;又前引屈萊賽書,第二六三——二六四頁。
- ㉔ “全國勞工會第二次年會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nnual Congress of the National Labor Union)。
- ㉕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選集(一八四六——一八九五年)”(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一九四二年紐約版,第二五五頁。
- ㉖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

九卷,第一九八頁;又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革命報”(The Revolution)。

- ④⑦ 同上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九八頁。
- ④⑧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日及九月二十一日“革命報”;又前引托德上書,第八三——八四頁。
- ④⑨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九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六九年九月九日“革命報”;又一八七〇年三月五日“工人擁護者”。
- ⑤⑩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二二二頁。
- ⑤⑪ 一八六九年四月二日“工人擁護者”。
- ⑤⑫ 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同上報。
- ⑤⑬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九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及六月二十五日“工人擁護者”。
- ⑤⑭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工人擁護者”。

第十九章

- ①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五九——一六〇頁。
- ② A·D·麥克科依(A. D. McCoy):“南部勞工理論的過去、現在與將來”(Thoughts on Labor in the Sout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八六五年新奧爾良版,第二二頁。又第三十九屆國會第一次會議“議

院行政文件集”(Senate Executive Doc.),第一三、二一、三二、三五、四三、四四頁。

- ③ 一八六六年“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第六〇六頁。
- ④ 轉引自前引詹姆斯·艾倫書,第三九〇——三九一頁。
- ⑤ 轉引自一九三九年夏季號“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第三卷,第三六四頁;曼紐爾·哥特李勃(Manuel Gottlieb):“建設時期喬治亞的土地問題”(The Land question in Georgia during Reconstruction)。同時參看弗萊德·沙農(Fred A. Shannon):“農民的最后領域(一八六〇——一八九七)”(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1860—1897),一九四五年紐約版,第八三——八六頁;又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二日“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又一九三九年“農業史”(Agricultural History),第十三卷,第二三——二七頁,奧斯伽·蔡克納(Oscar Zcichner):“南部諸州奴隸到自由農人的轉變”(The Transition from Slave to Free Agricultural Labor in the Southern States)。
- ⑥ 一八六五年八月十日“紐約先驅報”。
- ⑦ 杜·布阿(W. E. B. Du Bois):“美國黑人建設”(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一九三五年紐約版,第二三〇——二三三頁;又前引

- 詹姆斯·艾倫書，第七三——七八頁。
- ⑧ 一九三〇年一月份“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三十五卷，第二七六——二九四頁，霍華德·皮爾(Howard K. Beale)：“關稅與建設”(The Tariff and Reconstruction)；又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一日“民族”雜誌(The Nation)；又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反奴隸制度旗幟”(Anti-Slavery Standard)；又第三十九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國會世界”(Congressional globe)附錄，第二八四頁。
- ⑨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全國工人”；又一八六六年十月四日“波士頓夜聲報”；又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五日“聯合勞工日報”(Journal of United Labor)；又塞米爾·岡伯斯(Samuel Gompers)：“雜記”(Scrapbooks)，第一集，第三頁，存紐約公共圖書館。
- ⑩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⑪ 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同上報。
- ⑫ 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同上報。
- ⑬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三日同上報。
- ⑭ 一八六六年二月二日同上報。有關建設和黑色及白色工人團結的其他材料參看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及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三月七日、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五月十一日、十四日、六月二十九日、八月十六日、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二日“波士頓夜聲報”。
- ⑮ 一八六五年五月六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⑯ 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及一八六七年一月五日“全國工人”；又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紐約論壇報”。
- ⑰ 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一日、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及一八七〇年七月二日、九日“工人擁護者”。
- ⑱ 一八六九年三——四月，特別是三月二十七日的“工人擁護者”；又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二三三——二三五、三三三——三三四、三三九、三四二——三四三頁。
- ⑲ 同上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八二頁。
- ⑳ 查理·韋士雷(Charles Wesley)：“美國黑人勞工”(Negro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九二七年紐約版，第一三五——一四〇頁；又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阿特蘭泰大學叢刊(Atlant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第三六頁，杜·布阿(W. E. B. Du Bois)和A·G·狄爾(A. G. Dill)編：“美國黑人技工”(The Negro American Artisan)。
- ㉑ “哈普斯月報”(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五——四〇三頁；瑪利·道奇(Mary M. Dodge)：“我們的走私活動”(Our Contraband)；又一八六九年

- 八月七日“工人擁護者”。
- ②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及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③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五九——一六〇頁。
- ④ 同上書，第一八五——一八八頁。
- ⑤ 一八六七年四月二日“流動每日廣告登錄報”(Mobile Daily Advertiser and Register)；又一八六七年一月五——九日“查里士頓每日新聞”(Charleston Daily News)；又洛安達·考克斯(Lawanda F. Cox)一九四一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所寫未發表的博士論文，“一八六五至一九〇〇年的美國農業勞動(特別關於南部的)”(Agricultural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5—190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outh), 第一一二頁。
- ⑥ 一八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幟”(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又前引杜·布阿書，第三六一頁。
- ⑦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三三一——三四八頁。
- ⑧ 一八六九年九月四日、十一日“工人擁護者”。
- ⑨ 同上。
- ⑩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工人擁護者”轉載自“紐約時報”。
- ⑪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二十一日及一八七〇年二月五日、五月七日、十月八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七日“紐約論壇報”。
- ⑫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六九年國際印刷工會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 for 1869)，一八六九年辛辛那提版，第一六——一七頁。
- ⑬ “一八七〇年國際印刷工會會議錄”，一八七〇年費列得爾菲亞版，第三一頁。
- ⑭ 同上書，第一四〇頁轉載。
- ⑮ 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七日“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幟”。
- ⑯ 前引查里·韋士雷書，第一七三——一七四頁。
- ⑰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查里士頓共和黨日報”(Charleston Daily Republican)。
- ⑱ 前引查里·韋士雷書，第一七五——一七六頁；又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十日“紐約論壇報”。
- ⑲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二四三——二五三頁。
- ⑳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十日“紐約論壇報”。同時參看一八七〇年華盛頓“全國有色人種工會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Colored National Labor Convention)。
- ㉑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工人擁護者”。
- ㉒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幟”；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二四三——二五三頁；又前引韋士雷書，第一七八——一七九頁。

- ④③ 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國家新時代”(New National Era)。
- ④④ 前引杜·布阿書,第三六六頁;又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國家新時代”;又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查里士頓共和黨日報”。
- ④⑤ 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八月二十七日“工人擁護者”;又前引韋士雷書,第一六四——一六六頁。
- ④⑥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二五四頁。
- ④⑦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國家新時代”。
- ④⑧ 前引查里·韋士雷書,第一八二頁。
- ④⑨ 同上書,第一八五頁及以下諸頁。
- ④⑩ 前引杜·布阿書,第三六七頁;又前引韋士雷書第一八八頁。

第二十章

- ① 一八六五年三月十八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② 一八七〇年五月七日及十月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③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全國工人”。
- ④ 一八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工人聯盟”(Arbeiter-Union)。
- ⑤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一八六——一八七頁;又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擁護者”。
- ⑥ 前引托德士書,第八六——八七頁。
- ⑦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全國工人”。
- ⑧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工人擁

護者”;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三三八——三三九頁。

- ⑨ 施留特爾(Schlueter):“林肯,勞工和奴隸制”(Lincoln, Labor and Slavery),第二三一——二三四頁;又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三三八——三三九頁。
- ⑩ 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及十一月二十三日“工人擁護者”。
- ⑪ 同上報。同時參看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該報。
- ⑫ 前引托德士書,第六四頁。
- ⑬ 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新時代”(Neue Zeit)合訂本斯圖加特版,第一卷,第三九一——三九二頁,弗萊得立克·左爾格(F. A. Sorge):“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六年的美國工人運動”(Die Arbeiterbewegun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1866 bis 1876);又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十一月十一日及一八七二年二月十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 ⑭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〇八——二〇九頁;又赫爾曼·施留特爾(Hermann Schlueter):“國際在美國”(Die Internationale in Amerika),一九一八年芝加哥版,第一五——三〇頁;又前引希耳奎特書,第一九四頁。
- ⑮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三五六——三五八頁。

- ⑩ 同上書,第三六八——三七〇頁;又前引希耳奎特書,第一九六——一九七頁;又斯帖克洛夫(F. M. Stekloff);“第一國際的歷史”(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一九二六年紐約版,第二六八——二七二頁。
- ⑪ “國際工協大會會議雜記”(Copy Book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手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
- ⑫ 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工人擁護者”;又前引艾倫書,第一七七——一八〇頁。
- ⑬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三六七——三七八頁;又一八七〇年七月三十日、八月六日、十月八日、二十二日、十二月三日、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二日及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七〇年六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轉載“工人聯盟”(Arbeiter-Union)。
- ⑭ 一九四三年四月“紐約歷史”(New York History),第二十四卷,第一九六——一九七頁,喬納桑·格羅斯曼(Jonathan Grossman):“合作翻砂廠”(Cooperative Foundries);又喬納桑·格羅斯曼:“威廉·夕威斯傳”(William Sylvis),第十章;又一八六四年九月三日“芬區爾工會評論”。
- ⑮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份“印刷工人報”(Printer's Circular)。
- ⑯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芬區爾工會評論”中夕威斯文;又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湯姆斯·菲列浦文稿集”(Thomas Phillips Papers)中一八六九年四月五日自費列得爾菲亞寄來之未署名的信。
- ⑰ 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芬區爾工會評論”;又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九日“工人擁護者”;又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湯姆斯·菲列浦文稿集”中同上信。
- ⑱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查里士頓共和黨日報”(Charleston Daily Republican);又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全國反奴隸制度旗幟”(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又“菲列浦文稿集”(Phillips Papers)中J·D·魏爾(J. D. Ware)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湯姆斯·菲列浦信”,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
- ⑲ “紐約歷史”,第二十四卷,第一九六——二〇一頁,格羅斯曼文;又一九一四年七月“國際鑄工報”(International Molders' Journal),第五三三頁,佛蘭克·斯塔克頓(Frank T. Stockton):“鑄工與生產合作”(The Molders and Productive Cooperation)。
- ⑳ 前引格羅斯曼書(恐系指“合作翻砂廠”。——譯者),第二〇七——二〇九頁;又同上引斯塔克頓書,第五三四——五三五頁;又一八七六年五

- 月六日“社会主义者”(The Socialist);又前引格利生書,第一一六頁、一五九頁;又“威上康辛歷史学会”存“湯姆斯·菲利浦文稿集”中关于文德爾·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的合作社問題的一封未署日期的信。
- ②7 爱德華·开洛格(Edward Kellogg):“劳动及其他資本”(Labor and Other Capital),一八四九年紐約版,第一九、三六—三七、三二〇頁。
- ②8 一八六八年五月九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 ②9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標題頁。
- ③0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劳动旗帜”。
- ③1 前引詹姆斯·夕威斯書,第七二、八二頁;又一八六九年五月十五日“工人拥护者”。
- ③2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工人联盟”。
- ③3 “紐約工会組織章則种种”(Laws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Workingmen's Union of New York City and Vicinity),一八六七年紐約版,第十条,第一節。
- ③4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二十日、二十六日“工人拥护者”。
- ③5 一八六六年一月四日“波士頓夜声報”。同时参看“木工和裝配工一八六七年全國工会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1867 Convention of the Carpenters and Joiners National Union)。
- ③6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工人拥护者”。
- ③7 “宾夕法尼亚法律(一八七二年)”(Laws of Pennsylvania, 1872),第一一七六頁;又亞瑟山大·特萊区頓褒(Alexander Trachtenberg):“宾州維護礦工利益法令史編”(History of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al Miners in Pennsylvania),一九四二年紐約版,第三二—四九頁。
- ③8 前引依夫斯書,第二三頁。
- ③9 “美國百科年表(一八七〇年)”(American Annual Cyclopaedia, 1870),一八七一年紐約版,第十卷,第四七四頁。
- ④0 文德爾·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演說、講義和書信(第二集)”(Speeches, Lectures and Letters, Second Series),第一三九頁。
- ④1 “美國百科年表(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二年紐約版,第十一卷,第四九四頁。
- ④2 文德爾·菲利浦斯:“演說、講義和書信(第二集)”第二卷,第一六七頁“劳工运动基礎”(The Foundation of Labor Movement)一文。
- ④3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七日“紐約論壇報”。
- ④4 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联邦政治”(Commonwealth);又一八七四年六月“公正報”(Equity)。
- ④5 参看A·M·韋恩(A. M. Winn):

- “加州全州技師學會主席韋恩的告別演說”(Valedictory Address of General A. M. Winn, President of Mechanics' State Council of California), 一八七一年舊金山版, 第五五頁。
- ④⑥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九卷, 第一七五頁。
- ④⑦ 一八六八年九月二日及十月十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⑧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二十五日“監護人”(The Guardian); 又一八七二年三月九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 ④⑨ 湯姆斯·麥德基(Thomas A. McKee): “各政黨全國大會及其政綱(一七八九——一九〇一年)”(The 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Platforms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1789 to 1901), 一九〇一年巴爾的摩版, 第一五四——一五五頁。
- ④⑩ 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紐約論壇報”; 又一八七二年四月六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
- ④⑪ 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 又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九日“民族雜誌”(The Nation)。
- ④⑫ 一八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辛辛那提日報”(Cincinnati Daily Gazette); 又一八七二年九月十四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⑬ “馬克思等致左爾格等書信選錄”(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on Karl Marx, et al., an F. Sorge und Anders), 第一八頁。又“國際工協美洲大會會議雜記(一八七一年八月)”(Copy Book of the American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August 1871), 手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
- ④⑭ 坎門司編: “美國工業社會史料”, 第九卷, 第二二八——二三一頁。
- ④⑮ 一八六九年九月十八日“紐約論壇報”。
- ④⑯ “全國印刷工會會議錄(一八七一年)”(Proceedings of the 1871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 第一二九頁。
- ④⑰ “一八七一年紐約工人大會議事錄”(Proceedings of the Workingmen's Assembly of New York for 1871), 第六四頁。
- ④⑱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工人擁護者”。
- ④⑲ 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及一八七三年五月三日同上報。

第二十一章

- ① 一八六三年五月九日“費城公共記錄報”。
- ② 一八六九年二月四日同上報; 又泰倫斯·泡德利(Terence V. Powderly): “勞工三十年(一八五九——一八八九)”(Thirty Years of Labor, 1859—1889), 第一三四頁。

- ③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費城公共記錄報”；又同上引泡德利書，第一四〇——一四四頁。
- ④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一九——二四頁；又泰倫斯·泡德利：“我走過的道路”(The Path I Trod)，一九四〇年紐約版，第四九——五三頁。
- ⑤ 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全國勞工論壇報”(National Labor Tribune)。
- ⑥ 一八八七年一月份“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一卷，第一四〇頁。
- ⑦ 前引希耳奎特書，第二九一——二九二頁。
- ⑧ 前引魏爾書，第二十七頁；又泡特利：“我走過的道路”，第三三六頁。
- ⑨ 泡特利：“勞工三十年”，第一六七頁、五三四——五三五頁。
- ⑩ 前引魏爾書，第七四頁。
- ⑪ 同上書。
- ⑫ “勞動者協會一八七九年大會會議錄”(Proceedings of the 1879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Knights of Labor)，第五六頁。
- ⑬ “總工會會長決議”(Decisions of the General Master Workman)，一八八七年版，第二三頁。
- ⑭ 前引魏爾書，第一五六頁。
- ⑮ 同上書，第一五五——一五六頁。
- ⑯ 泡德利：“勞工三十年”，第一四四頁。

第二十二章

- ①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全國勞工論壇報”(National Labor Tribune)。
- ② 前引費德爾書，第三八——四〇頁；又阿蘭·奈文斯(Allan Nevins)：“近代美國的形成(一八六五——一八七八)”(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 1865—1878)，一九三五年紐約版，第二九九——三〇一頁。
- ③ 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及一八七七年二月十日“勞動旗幟”(Labor Standard)。
- ④ 一八七七年九月十八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七六年二月十九日“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
- ⑤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一七五——一七七頁；又“一九〇一年美國工業委員會報告”(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 Report for 1901)，第七卷，第六一五頁；又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紐約時報”；又一八七六年五月十三日“社會主義者”；又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勞動旗幟”。
- ⑥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四六——四八頁；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全國勞工論壇報”；又一八七四年八月八日“勞動人”(The Toiler)；又一八七七年二月十日、二十四日“勞動旗幟”。
- ⑦ 一八七六年五月六日、七月二十九

- 日“社会主义者”；又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劳动旗帜”。
- ⑧ 关于講述联合运动的更完全的文件参看一八七五年八——十二月及一八七六年一——五月“全國勞工論壇报”。
- ⑨ 克雷斯·伊文斯 (Chris Evans): “美國礦工联合会史” (History of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 一九一八年印第安納波利斯版, 第一卷, 第三七——七二頁。
- ⑩ 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及十月二十八日“劳动旗帜”轉載“鑄工日报” (Iron Molders' Journal) 文。
- ⑪ 一八七四年八月八日“劳动人”。
- ⑫ 一八七三年七月五日“工人拥护者”。
- ⑬ 官方报“人道”(Humanity) 所出小册子“工業兄弟会的組織” (Constitution of the Industrial Brotherhood); 又前引坎門司書, 第二卷, 第一六四頁。
- ⑭ 前引坎門司書, 第二卷, 第一六七頁。
- ⑮ 一八七四年七月(沒有日期)“劳动人”; 又一八七五年十月二日“全國勞工論壇报”。
- ⑯ “俄亥俄劳动統計局”(Ohio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第二次年报(一八七八年)”, (2nd Annual Report, 1878) 第一九九——二〇一頁; 又“美國勞工統計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第六〇四号公报” (Bulletin No. 604), 一九三四年華盛頓版, 第三九一頁; 又一八七六年五月六日、六月十日“社会主义者”; 又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二日、九月九日及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三日“劳动旗帜”。
- ⑰ 一八七四年八月一日、八日“劳动人”。
- ⑱ 前引費德爾書, 第四二、六五——六六頁。
- ⑲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及一八七四年三月十四日“民族雜誌”。
- ⑳ 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二日“愛爾蘭世界和工業解放者” (Irish World and Industrial Liberator) 轉載。
- ㉑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日“工人拥护者”。
- ㉒ 弗萊德·沙農 (Fred A. Shannon): “農民的最后領域”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第五四頁。
- ㉓ 泰倫斯·泡德利 (Terence V. Powderly): “勞工三十年”, 第一八三——一八四頁; 又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劳动旗帜”。
- ㉔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六日“全國勞工論壇报”; 又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劳动旗帜”; 又一八七八年二月七日“紐約論壇报”。
- ㉕ 第四五屆國會第三次會議“众院報告第二十九号文件” (H. R. Misc. Doc. No. 29), 第四五、一一四七、二〇二、二六七、三八八、四〇七、四七〇、五八〇、六五六——六六四頁。
- ㉖ 法案全文見一八七八年八月十日

- “爱尔兰世界”(Irish World)。
- ②7 一八七七年九月二日“劳动旗帜”轉載。同时参看一八七七年八月一日“斯克爾吞共和党人”(Scranton Republican)。
- ②8 威士康辛历史学会存“国际劳工协会文件”(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Papers)中的“宣言”。同时参看一九三一年六月“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第十卷,第五六六—五七二頁“一八七三年危机中的一篇失業宣言”(An Unemployment Manifesto During the Crisis of 1873)(附亞歷山大·特萊区頓褻[Alexander Trachtenberg]之編者注)。
- ②9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紐約时报”。
- ③0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同上报。
- ③1 同上报。
- ③2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四日“芝加哥論壇报”(Chicago Tribune); 又前引費德爾書,第五一—五三頁。
- ③3 一八七四年一—四月份及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劳动人”; 又一八七四年一月十四—十五日“紐約論壇报”和“紐約时报”。
- ③4 一八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及九月五日“劳动人”; 又“新时代”(Neue Zeit),第九卷,第三九七—三九八頁,左尔格(Sorge)文; 又一八七六年五月十三日“社会主义者”; 又一八七四年五月十九日“紐約工人时报”(New York Arbeiter-Zeitung); 又“国际工协北美联合会議雜記(一八七四年四月)”(Copy Book of the North American Fed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April 1874),手稿存威士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③5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二六—二二九頁; 又一八七四年六月五日、二十日“芝加哥先鋒报”(Chicago Vorbote)。
- ③6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一七—二一九頁; 又“新时代”第九卷,第三九七—三九八頁左尔格文; 又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紐約工人时报”; 又“国际工协費列得尔菲亞第二十六小組記錄(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Records of the Philadelphia Section no. 26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June 24, 1872),手稿存威士康辛州历史学会。
- ③7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六—二九頁; 又一八七四年六月五日、二十日“芝加哥先鋒报”。
- ③8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会史料”,第九卷,第三七六—三七八頁; 又“北美社会民主党的政綱及党綱”(Platform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Workingmen's Party of North America),一八七六年紐約版。
- ③9 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二日“全國劳工論壇报”。

- ④⑩ 馬克思恩格斯“通訊選集(一八四六——一八九五)”(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第四四九——四五〇頁。
- ④⑪ 前引坎門司書, 第二卷, 第二三三頁; 又一八七六年五月十三日“社會主義者”。
- ④⑫ 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二日“勞動旗幟”。
- ④⑬ 一八七七年一月六日及十三日同上報。
- ④⑭ 同上報; 又“J·P·麥克唐奈爾文稿集”(J. P. McDonnell Papers)中“J·P·麥克唐奈爾自傳”, 手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
- ④⑮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及一八七七年一月六日、二十日、四月十四日“勞動旗幟”。

第二十三章

- ① “麻州勞工統計局第十一次年報(一八八〇年)”(11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880), 第六三頁。
- ② 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二二三——二二八頁。
- ③ 同上書; 又“麻州勞工統計局年報(一八八〇年)”, 第三五——四四頁。
- ④ 一九四三年十月份“賓州歷史”(Pennsylvania History), 第十卷, 第二四九——二五五頁; 馬文·施列格爾(Marvin W. Schlegel); “工人福利協會: 無煙煤礦工的第一
- 個工會組織”(The Working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 First Union of Anthracite Miners)。
- ⑤ 前引羅伯特書, 第六六——六八頁; 又前引施列格爾書, 第二五八頁。
- ⑥ “賓州州議院聯合委員會上的葛文論點”(Argument of Franklin B. Gowen before a Joint Committee o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Legislature), 一八七五年費列得爾菲亞版, 第七四——七九頁。
- ⑦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二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又前引施列格爾書, 第二五九——二六一頁。
- ⑧ “費(列得爾菲亞)勒(定)鐵路公司董事長和經理們給股東的報告(一八七五年)”(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Managers of the 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 Company to the Stockholders, 1875), 一八七五年費列得爾菲亞版, 第一六——一八頁; 又一八七七年同上報告, 一八七七年費列得爾菲亞版, 第二五頁。
- ⑨ 安東尼·賓伯(Anthony Bimba); “莫利馬乖雅分子”(The Molly Maguires), 一九三二年紐約版, 第六——六一頁; 又一八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⑩ 喬治·考爾遜(George G. Korson); “無煙煤礦工的民謠歌曲”(Songs and Ballads of the Anthracite Miner), 一九二六年費列得爾菲亞

- 版,第一六一——一六二頁。
- ⑪ 一八七五年九月四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⑫ 安德魯·勞埃(Andrew Roy):“美國煤礦工人史”(A History of the Coal Mi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〇七年 俄亥俄州哥倫布斯版,第九九頁。
- ⑬ 一八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⑭ “賓州斯庫基爾郡歷史學會叢刊”(Public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chuylkill County, Pennsylvania),一九一〇年版,第二卷,第三六六頁,約瑟夫·派特生(Joseph F. Patterson):“早年勞工福利會時代”(Old W. B. A. Days),一八七五年九月四日、十月九日“全國勞工論壇報”;又前引施列格爾書,第二六六頁;又喬治·考爾遜(George G. Korson):“礦坑中的歌手”(Mistrels of the Mine Patch),一九三八年費列得爾菲亞版,第二二六頁。
- ⑮ 一八七五年四——五月“全國礦工史編”(Miners' National Record),又一八七五年十月九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⑯ 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⑰ 一八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同上報;又一八七五年六月十六日“紐約時報”;又一八七五年十月份“全國礦工史編”。
- ⑱ 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十月三十日及一八七六年五月十五日“全國勞工論壇報”;又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月“全國礦工史編”;又前引勞埃書,第一七五——一七八頁。
- ⑲ “在州政府與湯姆斯·孟萊案件中葛文之論點”(Arguments of Franklin B. Gowen, Esq., of Counsel for the Commonwealth in the case of the Commonwealth vs. Thomas Munley),第二四、三三——三六頁;又華特·考列曼(Walter Coleman):“賓夕法尼亞的勞工糾紛(一八五〇——一八八〇)”(Labor Disturbances in Pennsylvania, 1850—1880),第一四一頁。
- ⑳ 前引考列曼書,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 ㉑ 前引賓伯雷,第九五——九六頁;又“在州政府與湯姆斯·孟萊案件中葛文之論點”,第七——八頁。
- ㉒ 前引考列曼書,第一四一頁。
- ㉓ 同上書,第一五一——一五二頁;又“皮爾·海伍德書”(Bill Haywood's Book),第十一——十二章,一九二九年紐約版。
- ㉔ 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勞動旗幟”;又一八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愛爾蘭世界”(Irish World);又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二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㉕ 一八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紐約論壇報”;又前引考列曼書,第一六六頁。

- ②6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愛爾蘭世界”。
- ②7 轉引自前引賓伯書，第一二一頁。
- ②8 轉引自一八七七年“耶波頓年鑒”(Appleton's Annual Cyclopaedia)，第二卷，第二三一頁。
- ②9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Scranton Republican)；又“第三次勞工委員會年報”(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Labor)，一八八八年華盛頓版，第一〇七一頁；又“俄亥俄勞工統計局年報”(Annual Report,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hio)，一八八三年哥倫布斯版，第八五頁。
- ③0 轉引自塞米爾·耶冷(Samuel Yellen)：“美國勞工鬥爭”(American Labor Struggles)，一九三六年紐約版，第一二頁。
- ③1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又一九三七年四——六月“馬克思主義季刊”(Marxist Quarterly)，第一卷，第二一七頁，又菲利浦·斯蘭納(Philip A. Slaner)：“一八七七年的鐵路罷工”(The Railroad Strikes of 1877)。
- ③2 查理·菲利浦·安遜(Charles Phillips Anson)，一九四〇年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所寫未發表的博士論文，“弗吉尼亞西部勞工運動史”(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West Virginia)，第一九〇——一九三頁；又前引耶冷書，第一〇頁；又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九日“紐約時報”；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斯克蘭敦共和黨人”轉載自“巴爾的摩報”(Baltimore Gazette)；又一八七七年八月十四日“勞動旗幟”。
- ③3 詹姆斯·麥克凱布(James McCabe)：“大叛亂”(The Great Riots)，一八七七年費列得爾菲亞版，第二〇頁；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陸軍報”(Army Journal)。
- ③4 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九日“紐約時報”。
- ③5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世界”(New York World)。
- ③6 第五七屆國會第二次會議“議院文件第二〇九號”(Senate Document No. 209)，第一九一頁；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Scranton Republican)；又前引斯蘭納書，第二二一頁。
- ③7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又O·D·波義耳(O.D. Boyle)：“鐵路工人罷工史”(History of the Railroad Strikes)，一九三五年哥倫比亞區華盛頓版，第一六頁。
- ③8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
- ③9 前引斯蘭納書，第二二三——二二五頁；又一八七七年七月十四日“勞動旗幟”。
- ④0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勞動旗幟”。
- ④1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紐約時

- 报”。
- ④② 一八七七年八月四日“陸軍報”(Army Journal);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
- ④③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一日“愛爾蘭世界”。
- ④④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
- ④⑤ 前引斯克蘭納書, 第二二八頁。
- ④⑥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紐約世界”; 又前引斯克蘭納書, 第二八—二九頁。
- ④⑦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紐約論壇報”;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愛爾蘭世界”。
- ④⑧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一日“勞動旗幟”。
- ④⑨ 前引斯克蘭納書, 第二二九—二三〇頁;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勞動旗幟”。
- ⑤① 前引克羅斯書, 第八九—九〇頁; 又一八七七年九月二日“勞動旗幟”;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
- ⑤② 前引奈耳斯書, 第五一七頁注解; 又一八七七年八月六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
- ⑤③ 赫爾曼·施留特爾 (Hermann Schlueter): “國際在美國”(Die Internationale in Amerika), 第六編, 第三八三頁。
- ⑤④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一日“勞動旗幟”;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 及“紐約論壇報”。
- ⑤⑤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芝加哥時報”(Chicago Times);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及八月一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
- ⑤⑥ 阿蘭·卡爾默(Alan Calmer): “勞工鼓動者阿伯特·派生斯傳”(Labor Agitator: The Story of Albert R. Parsons), 一九三七年紐約版, 第二八頁。
- ⑤⑦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一日“勞動旗幟”;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三十日“芝加哥時報”;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
- ⑤⑧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一日“芝加哥時報”。
- ⑤⑨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紐約太陽報”轉載。
- ⑥① 一八七七年八月九日“勞動旗幟”; 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密蘇里共和黨人”(Missouri Republican)。
- ⑥② 一九四〇年一月“密蘇里史評”(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第二十四卷, 第一五七頁以下數頁, 羅素·諾蘭(Russel M. Nolen): “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〇年聖路易的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in St. Louis from 1860—1890)。
- ⑥③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斯克蘭吞共和黨人”。

- ⑫ 前引諾爾書，第一七〇——一七二頁；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紐約世界”。
- ⑬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斯克爾吞共和黨人”。
- ⑭ 前引諾爾書，第一七一——一七二頁；又前引施留特爾書，第三八八頁；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
- ⑮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三日“密蘇里共和黨人”。
- ⑯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四日“勞動旗幟”；又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紐約太陽報”。

第二十四章

- ① 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九日“全國勞工論壇報”轉載。同時參看“國際工人協會北美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Report of the North American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1872—1873)，手稿存威上康辛歷史學會。
- ② 一八七五年九月四日同上報。同時參看一八七四年八月一日“勞動人”。
- ③ 一八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④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一六七——一七〇頁。
- ⑤ 一八七六年九月三十日“全國勞工論壇報”；又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工人擁護者”。
- ⑥ 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勞動旗幟”。
- ⑦ 一八七六年九月二日、三十日、十月七日、二十八日及十一月四日同上報。同時參看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全國勞工論壇報”及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一日、二月三日“紐約論壇報”。
- ⑧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紐約論壇報”；又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⑨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⑩ 一八七七年七月三十日、八月八日“斯克爾吞共和黨人”。同時參看“勞工黨伊利諾州柯克郡的記錄簿”(Record Book of the Cook County, Illinois, Labor Party, 1876—1877)，原稿存威上康辛歷史學會。
- ⑪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紐約論壇報”；又國會圖書館善本室存“一八七七年八月一日告美國勞工界”(To the Laboring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gust 1, 1877)。
- ⑫ 一八七七年九月十六日“紐約論壇報”。
- ⑬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五、二十八日同上報。
- ⑭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三——十五日同上報。
- ⑮ 一八七七年八月十三日同上報。

- ⑩ 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
- ⑪ 同上報。
- ⑫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八日“紐約論壇報”。
- ⑬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八日——十五日“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又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七日“羅徹斯特團結和廣告報”(Rochester Union and Advertiser)。
- ⑭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四四頁；又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論壇報”。
- ⑮ 一八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論壇報”。
- ⑯ 一八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同上報。
- ⑰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一——二十日“斯克龍吞共和黨人”。
- ⑱ 一八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論壇報”。
- ⑲ 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九日同上報。
- ⑳ 一八七八年七月十八日、二十五日同上報。
- ㉑ 弗萊德·海因斯(Fred E. Haynes)：“內战后的第三黨運動”(Third Party Movement Since the Civil War)，一九一六年愛俄華城版，第一二五——一二九頁。
- ㉒ 同上書，第一二七頁。
- ㉓ “啓示錄：智人拿但行傳”(Revelations: The Epistle of Nathan the Wise)，一八七八年出的小冊子。
- ㉔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七——十日“紐約論壇報”。
- ㉕ 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報。
- ㉖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大西洋月刊”，第四十一卷，第五二——五三〇頁。
- ㉗ 一八七八年五月五日“勞動旗幟”。
- ㉘ 前引海因斯書，第一三五——一四〇頁；又“威士康辛科學、藝術、文學院報告”(Wisconsin Academy of Science, Arts and Letters, Transactions)，第十二卷，第五三五頁；又O·G·立彼(O. G. Libby)：“一八七八至一八八四年綠背黨運動研究”(A Study of the Greenback Movement, 1876—1884)，一八九九年版。
- ㉙ H. C. 尼克松(H. C. Nixon)：“愛俄華州人民黨運動”(The Populist Movement in Iowa)，一九二六年愛俄華城版，第二三頁。
- ㉚ 坎門司編：“美國工業社會史料”，第九卷，第八四——八五頁；又一八七〇年六月一日“費城北美人報”(Philadelphia North American)；又前引懷耳書，第十章。
- ㉛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工人擁護者”；又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底特律每日聯合報”(Detroit Daily Union)；又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塞米爾文稿集”(Samuel Papers)中一八八〇年七月四日W·C·特拉法格(W. C. Traphage)致約翰·塞米爾(John Samuels)信。
- ㉜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人聯盟”(Arbeiter-Union)。

- ③⑨ 前引麥克基書,第一三五頁。
- ④⑩ 前引克羅斯書,第八八——九七頁。
- ④⑪ 同上書;又一九四四年九月“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十三卷,第二八〇——二八一頁,拉爾夫·柯爾(Ralph Kauer):“美國工人黨”(The Workingmen'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 ④⑫ 一八七八年六月二日、十六日、三十日“勞動旗幟”;“新澤西區紐亞克社會主義勞工黨記錄”,一八七八年五月三日一節(Records of the Socialist Labor Party, Newark, New Jersey Section, May 3, 1878),手稿存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
- ④⑬ 前引克羅斯書,第九八——一〇三頁。
- ④⑭ 同上書,第一〇五——一〇六頁。
- ④⑮ J·C·斯帖德曼(J. C. Stedman)、R·A·蘭納德(R. A. Leonard):“加利福尼亞工人黨”(The 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一八七八年舊金山版,第六三——六四頁。
- ④⑯ 前引克羅斯書,第一一二——一四頁。
- ④⑰ 一八七七年七月十四日“勞動旗幟”;又一八七七年九月二日“紐約工人之聲”(New York Arbeitersstimme)。
- ④⑱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七七頁。
- ④⑲ 又一九二〇年五月份“政治經濟報”,第二十九卷,第四一二——四一五頁,愛德華·米脫門(Edward B. Mittleman):“芝加哥勞工與政治(一八七七——一八九六年)”(Chicago Labor in Politics, 1877—1896);又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社會主義勞工黨通訊集”(Socialist Labor Party Correspondence)中一八八〇年四月八日J·愛曼(J. Ehmann)自辛辛那提致菲利浦·凡·派登Phillip Van Patten)信。
- ⑤⑩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公報”(Bulletin of the Social Labor Movement),第一卷,第二號,第一二頁。
- ⑤⑪ 前引米脫門書,第四一五——四一七頁;又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二八五——二九〇頁;又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社會主義勞工黨通訊集”中一八八〇年八月三日約翰·興南(John Shinnan)自辛辛那提致菲利浦·凡·派登信。
- ⑤⑫ 亨利·大衛(Henry David):“干草街事件史”(History of the Haymarket Affair),一九三六年紐約版,第五章;又沙托瑞阿斯·瓦爾特蕭遜(A. Sartorius Freehern Von Waltershausen):“美國近代社會主義運動”(Der Moderne Socialismu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一八九〇年柏林版,第一二〇——一四三頁。

第二十五章

- ① “劳动人”(The Toiler) (日期無) 轉載。
- ② “參議院委員會关于勞資关系和实际情况調查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第三卷, 第六、二八、七五頁, 第一卷, 第四五〇頁, 一八八五年華盛頓版四卷本; 又前引庫辛斯基(Kucszynski)書, 第八——八八頁。
- ③ “參議院委員會关于勞資关系和实际情况調查報告”, 第三卷, 第四五二頁。
- ④ 亨利·大衛: “干草街事件史”, 第一八頁。
- ⑤ 前引坎門司書, 第二卷, 第三一三——三一四頁。
- ⑥ 一八八〇年九月份“社会劳工党公报”(Bulletin of the Social Labor Party)第一頁。
- ⑦ 沙托瑞阿斯·瓦尔特蕭遜(A. Sartorius Frecheru von Waltershausen): “生產技術改良对于北美商業的影响”(Die Nordamerikanischen Gewerkschaften unter dem Einfluss der fortschreitenden Productionstechnik), 一八八六年柏林版, 第一三四——一四八頁; 又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新时代”(Neue Zeit), 第二卷, 第二四二頁及以下數頁, F·A·左尔格(F. A. Sorge): “一八七七——一八八五年
的美國工人运动”(Die Arbeiterbewegun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877—1885)。
- ⑧ 一八八〇年九月份“社会主义劳工党公报”第一頁; 又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存“社会主义劳工党文稿集”(Socialist Labor Party Papers)中“紐約城和郡執委会一八七九年記事錄”(New York City and County Executive Committee, Minute Book, 1879), 魯新·塞尼耳(Lucien Sanial) 一八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致罗伯特·霍華德(Robert Howard)信。
- ⑨ 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新时代”, 第二卷, 第二四四——二四五頁左尔格文; 又前引皮尔斯書, 第一八——一九頁, 二三——二六頁; 又前引彼得遜書, 第二二頁; 又前引韋士雷書, 第二五五頁。又露斯·艾倫(Ruth A. Allen): “西南部大罢工”(The Great Southwest Strike), 一九四二年得克薩斯州奧斯丁版, 第二四——二五頁; 又前引麥克尼爾書, 第一六八頁。
- ⑩ 前引克羅斯書, 第一四二頁。
- ⑪ 同上書, 第三二五——三二六頁; 又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份“社会主义劳工党公报”, 第十頁; 又前引瓦尔特蕭遜書, 第一三九——一四一頁。
- ⑫ 威士康辛州歷史学会存“伊拉·史都華文稿集”(Ira Steward Papers)中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年代無)伊拉·史都華致左尔格信。

- ⑬ 一八七八年九月七日、十月十二日“劳动旗帜”。
- ⑭ 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新时代”，第二卷，第一七九頁，第二四六——二四八頁，F·A·左尔格文。
- ⑮ 一八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一日及一八七九年一月四日“劳动旗帜”。
- ⑯ 一八七八年五月五日同上报。
- ⑰ 一八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十日同上报。
- ⑱ 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二日同上报。
- ⑲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三〇六頁。
- ⑳ 一八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六月十九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㉑ 前引坎門司書，第二卷，第一九九——二〇〇頁；又前引賴特書，第一四六——一四七頁。
- ㉒ 泡德利：“我走过的道路”，第四八頁。
- ㉓ 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七日“紐約論壇報”；又一九三三年五月“現代月刊”(Modern Monthly)中大衛·塞波斯(David J. Saposs)：“天主教和劳工运动”(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Labor Movement)。
- ㉔ 泡德利：“劳工三十年”，第二二五——二三二頁，二三八——二三九頁。
- ㉕ 同上書，第二一八——二三八頁。
- ㉖ 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三日“联合劳工日报”(Journal of United Labor)，第二四七〇頁；又泡德利：“劳工三十年”，第三四頁；又“州議會會議錄(一八七九)”(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879)，第五五頁，“工会总会長報告”(Report of the Grand Master Workman)。
- ㉗ 一八七八年“州議會會議錄”，第一條，第二節，第二九頁，“大会組織條例”(Constitut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 ㉘ 前引魏尔(Ware)書，第六三頁。
- ㉙ 一八八二年“州議會會議錄”，第二七八頁。
- ㉚ 威士康辛州歷史學會存“約翰·塞米尔文稿集”(John Samuel Papers)中一八八二年七月七日里查·雷頓(Richard D. Layton)致約翰·塞米尔信。
- ㉛ 一八八〇年“州議會會議錄”，第二四七——二四八頁。
- ㉜ 泡德利：“劳工三十年”，第二五五——二五六頁。
- ㉝ “參議院委員會关于教育与劳工問題報告”(Report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第一卷，第七——九頁。
- ㉞ 泡德利：“劳工三十年”，第一四三——一四四頁；又一八八六年“立賓考特的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六一七——六一八頁；馬丁·愛恩斯(Martin Irons)：“我的劳工运动經驗”(My Experience in the Labor Movement)。
- ㉟ 泡德利：“劳工三十年”，第四八頁。
- ㊱ 一八七九年一月份“州議會會議

- 錄”，第五五頁。
- ⑳ 一八七九年在聖路易召开同上會會議錄，第六九頁。
- ㉑ 一八七九年在芝加哥召开同上會會議錄，第一二九頁。
- ㉒ 一八八三年七月份“聯合勞工報”(Journal of United Labor)；又前引麥克尼爾書，第四一八頁所引“匹茲堡時報”(Pittsburgh Times)中泡德利文。
- ㉓ 一八八二年“州議會會議錄”，第二九七——二九八頁；又一八八三年七月份“聯合勞工報”，第五二〇頁；又一八八二年“州議會會議錄”，第三一二、三三四、三四七、三五二、三六八頁。
- ㉔ 塞米爾·岡伯斯(Samuel Gompers)：“七十年生活勞動史”(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一九二五年紐約版，第一卷，第八七頁。
- ㉕ 同上書，第三八、八五頁。
- ㉖ 一九二五年二月份“現代歷史”(Current History)，第二十一卷，第六七一頁；又一九二五年“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第一三五卷，第四〇八頁。
- ㉗ 岡伯斯：“生活”(Life)，第一卷，第七四——七五頁；又一九二六年六月份“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四十一卷，第二八一——二八六頁，約翰·坎門司(John R. Commons)：“卡爾·馬克思和塞米爾·岡伯斯”(Karl Marx and Samuel Gompers)。
- ㉘ 一八七七年四月七日“勞動旗幟”。
- ㉙ 岡伯斯：“生活”，第一卷，第九六頁；又羅蘭·希耳·哈威(Rowland Hill Harvey)：“塞米爾·岡伯斯”，一九三五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版，第一七頁。
- ㉚ 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三日“紐約論壇報”。
- ㉛ 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同上報。
- ㉜ “參議院委員會關於教育與勞工問題報告”，第一卷，第四六〇頁。
- ㉝ 前引哈威書，第一九頁。
- ㉞ 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十一月四日、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十二月二日、九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及一八七八年一月六日、十三日“勞動旗幟”。
- ㉟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全國勞工論壇報”。
- ㊱ 岡伯斯：“生活”，第一卷，第一六五——一七一頁。
- ㊲ 一八七七年五月十二日“勞動旗幟”。
- ㊳ 岡伯斯：“生活”，第一卷，第六二頁。
- ㊴ 一八八七年四月份“雪茄工人公報”(Cigar Makers Official Journal)，第八頁。
- ㊵ A·羅梭夫斯基(A. Losovsky)：“馬克思和工會”(Marx and the Trade Unions)，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 ㊶ 前引魏爾書，第二六三——二六四頁。
- ㊷ 岡伯斯：“生活”，第一卷，第二〇〇頁。

- ④ 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五日“聯合勞工報”轉載。
- ⑤ 前引魏爾書，第四一頁；又前引哈威書，第四一頁；又“美國勞工聯盟會議錄（一八八一——一八八八年）”（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881—1888），第六頁。
- ⑥ 一九二四年一月份“西賓夕法尼亞歷史傳記雜誌”（Western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七卷，第四一頁，阿弗萊德·詹姆斯（Alfred P. James）：“美國勞工聯盟第一次會議：當代當地報紙材料研究”（The First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Local Newspapers as a Source）之注解。
- ⑦ “會議錄”，第一五——一六頁。
- ⑧ 同上，第三頁。
- ⑨ 前引詹姆斯書，第四四——四五頁。
- ⑩ “會議錄”，第三——四頁。
- ⑪ 同上，第一八頁。
- ⑫ 同上，第一九——二〇頁。
- ⑬ 同上，第二〇頁；又前引詹姆斯書，第一〇七頁注解。
- ⑭ “會議錄”，第一二頁；又前引詹姆斯書，第二一六——二一七頁，二二五——二二六頁。
- ⑮ “會議錄”，第一八頁。
- ⑯ 同上，第二三頁。
- ⑰ “會議錄”，第一四頁。
- ⑱ 同上，第一七頁。
- ⑲ 一八八一年十一——十二月份“聯合勞工報”，第一六六頁。
- ⑳ “塞米爾·岡伯斯書信集”（Samuel Gompers Letter Books）中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弗蘭克·福斯特（Frank K. Foster）致 H·A·柯爾（H. A. Cole）信，手稿存哥倫比亞區華盛頓城美國勞聯紀念館中。

本書人物介紹

四 圖

孔瑞德·卡尔(Conrad Carl),“紐約工人時報”(Arbeiter-Zeitung)編輯,該報為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德國小組(German Sections)于一八七三年二月在美國創辦。

尤杭·莫斯特(Johann Most)(一八四六——一九〇六),在德國時為社會主義者,後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移民到美國;來美後曾主編“自由刊”(Die Freiheit),並積極推進無政府主義運動。

尤利亞·斯蒂芬斯(Uriah Smith Stephens)(一八二一——一八八二),成衣工,一八六二年組織費城裁衣工人協會(Garment Cutlers' Association of Philadelphia);一八六九年組織勞工協會;一八七九年前為該會工會總會長。

丹尼斯·凡爾尼(Denis Kearney)(一八四七——一九〇七),一八七七年建立了舊金山各行業工人協會(Workingmen's Trade and Labor Union of San Francisco);加利福尼亞州工人黨主席。

文德爾·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一八一——一八八四),卓越的奴隸取消主義者,演說家,及勞工改革的擁護者;隨著黑奴的解放,轉而致力於勞資關係問題;主張勞工運動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曾積極從事於八小時工作日運動。

五 圖

卡尔·克林格(Karl Klinge),拉薩爾派的社会主義者(Lassalleian Socialist),一八七四年任芝加哥“先鋒報”(Vorbote)編輯;一八七七年積極參加芝加哥勞工運動的政治鬥爭。

卡羅爾·賴特(Carroll Davidson Wright)(一八四〇——一九〇九),社會經濟學權威;麻州勞工統計局(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局長;自一八八五年美國勞工局(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成立之日起,任該局檢查官計二十年。

六 圖

伊比尼塞·福特(Ebenezer Ford),木工;紐約工人黨中積極分子;一八二

九年由該黨提名選入紐約州眾議院。

伊薩克·尼耳(Isaac J. Neall), 全國鑄工工會第一任主席; 內戰一開始便參加了聯軍; 受傷退伍; 傷愈重又參軍任上尉職; 內戰後積極從事鑄工工會活動。

伊拉·史都華 (Ira Steward) (一八三一——一八八三), 機工, 一八六三年任代表出席國際機械工與鐵工協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Machinists and Black Smiths) 的年會, 該會曾通過了要求以八小時為合法工作時間的決議; 此後一直繼續為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積極努力, 曾任波士頓八小時工作同盟(Boston Eight Hour League) 及全國十小時工作同盟(National Ten Hour League) 主席。

伊薩克·麥爾斯(Isaac Myers), 巴爾的摩油灰工人, 內戰後期成為卓越的黑人勞工領袖; 曾任巴爾的摩有色油灰工人工會(Colored Caulkers' Union of Baltimore) 及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National Colored Labor Union) 主席。

伊利莎白·凱第·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 (一八一五——一九〇二), 曾積極從事於取消奴隸制運動及禁酒運動; 女權運動中的領導人, 並為一八四八年在辛尼加福爾斯舉行的美國第一次婦女權利大會(Woman's Rights Convention) 的召集人之一; 全國勞工會一八六

八年代表會上的代表之一。

伊力·穆爾(Ely Moore)(一七九八——一八六〇), 印刷工人; 紐約各業工會(New York Trades' Union) 第一任主席; 自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六年為紐約“全國各業工會會刊”(National Trades' Union) 編輯; 全國各業工會主席; 一八三四年由紐約選出為勞工議員; 在國會中工作至一八三九年。

喬治·亨利·伊文斯 (George Henry Evans) (一八〇五——一八五六), 生於英格蘭; 一八二九年任紐約“工人擁護者”(Working Man's Advocate) 編輯; 並任紐約出版的“人報”(The Man) 編輯; 一八四一年開始在“急進與年青的美國”(The Radical and Young America) 上提出自己對於土地改革的主張; 組織了全國改革協會(N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 並領導了爭取通過農地私有法案(Homestead Act) 的運動。

喬納桑·芬區爾(Jonathan C. Fincher), 機械工人;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當選為全國機械工與鐵工聯合會的書記; 工會報紙編輯; 一八六三年自辦了“芬區爾工會評論”(Fincher's Trades' Review), 該報可稱為美國最好的勞工報紙之一; 在自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一年間共創辦獨立的勞工報紙四種; 曾反對分散的政治行動; 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退出勞工運動。

乔治·施依灵(George A. Schilling), 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中的活动分子。

乔治·爱德文·麦克尼尔(George Edwin McNeill)(一八三七——一九〇六), 与伊拉·史都华合作进行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并任波士顿八小时工作同盟(Boston Eight-Hour League)主席共八年; 一八六九年协助建立了麻州劳工统计局(Massachusett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并担任该局副局长职位直至一八七四年; 任国际劳工会(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主席; 曾积极从事劳工协会及美国劳工联盟活动; 一八八七年出版了他的“今日之主要问题——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 The Problem of Today)这部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

乔治·幹頓(George Gunton)(一八四五——一九一九), 纺织工人及编辑; 曾在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中与伊拉·史都华合作; 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〇年为福尔河区国际劳工会的组织者。

乔治·本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一八〇〇——一八九一), 美国历史学家; 一八三〇年由工人党提名当选麻萨诸塞州州议员, 辞未就职; 一八三二年选举运动后便全力献身于工人运动, 领导了对第二合众国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攻击; 极力反对奴隶制

度; 曾在波克(Polk)总统任内担任海军部部长, 一八四八年任美国驻英大使。

乔治·雷泊莱(George Ripley)(一八〇二——一八八〇), 波士顿超越主义运动中的积极活动分子; “溪流农场”(Brook Farm)主席; 在三十一年的长时期中为“纽约论坛报”的文艺批评家。

乔治·魏克斯(George Wilkes)(一八一七——一八八五), 曾在纽约“地下报”(Subterranean)工作; 自创办“警察报”(Police Gazette)及“魏克斯时代精神”(Wilkes Spirit of the Times); 曾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巴黎公社及第一国际的拥护者。

弗莱德立克·左尔格(Frederick Adolph Sorge)(一八二八——一九〇六), 生于德国的萨克森(Saxony); 曾参加过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一八五二年来到美国; 一八五八年参加纽约共产党人俱乐部(New York Communist Club); 曾长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 自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六年为第一国际美国的领导人; 曾积极从事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创建工作; 曾帮助组织国际劳工会(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 自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间曾给德国的“新时代”(Neue Zeit)撰写过很多有系统的介绍美国劳工运动的文章。

弗莱德·欧伯克萊因(Fred Oberkline),

辛辛那提德籍美國工人的領導人；一八六〇年前往謁見林肯的代表團的主席。

弗萊得立克·羅賓遜(Frederick Robinson)，杰克孙时代麻薩諸塞州急進民主運動的領袖；麻州州議院議員；因奴隸制問題脫離了民主黨轉而擁護共和黨。

弗蘭克·福斯特(Frank K. Foster)(一八五四——一九〇九)，國際印刷工人工會(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中、勞工協會(Knights of Labor)中及美國勞聯組織期間的活動分子；在麻薩諸塞州嘿味立爾曾自辦“勞動者日報”(Daily Laborer)及“勞動者周刊”(Weekly Laborer)。

弗蘭克·朗尼(Frank Roney)，生于一八四一年；全國勞工改革黨(National Labor Reform Party)中活動人物；太平洋沿岸的一社會主義者及活躍的工會運動者；一八八〇年建立了海員工會(Seamen's Union)；舊金山行業工會與勞工總會(San Francisco Assembly of Trades and Labor Unions)的領導人；曾在美國勞工聯盟中擔任重要職位。

弗萊得立克·陶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一八一七——一八九五)，一八三七年逃脫奴隸制的鎖鏈，成為反奴隸制運動中一位積極的演說家和作家；曾任“北方之星”(The North Star)、“弗萊得立克·

陶格拉斯報”(Frederick Douglass' Paper)、“陶格拉斯月刊”(Douglass' Monthly)及“國家新時代”(New National Era)等報刊編輯；曾為“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實現及爭取容許黑人參加聯軍而鬥爭；有色人種全國勞工會(National Colored Labor Union)主席；華盛頓契約法官；駐海地公使；并曾積極從事于提高女權運動。

吉伯生(C. W. Gibson)，八小時工作制的積極擁護者；全國勞工會的秘書。

艾弗萊特·菲爾浦斯(Alfred W. Phelps)，康涅狄克州勞工領袖，曾積極從事全國勞工會的組織工作。

安得魯·卡爾·凱默昂(Andrew Carr Cameron)(一八三四——一八九〇)，印刷工人，印刷工人工會中活動分子；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八〇年任芝加哥“工人擁護者”(Workingman's Advocate)編輯，且以當代偉大勞工編輯著稱；任全國勞工會(National Labor Union)中綱領委員會主席六年，曾代表全國勞工會出席一八六九年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在巴塞爾舉行的年會。

安得魯·勞埃(Andrew Roy)，俄亥俄州煤礦工人工會中重要人物；俄亥俄州礦廠檢查官。

悉生·布朗內爾·安桑尼 (Susan Brownell Anthony) (一八二〇——一九〇六)，一生為取消奴隸制，爭取黑人選舉權及婦女權利而鬥爭；婦女參政運動的領袖；一八六九年為出席全國勞工會代表之一。

克雷斯·伊文斯 (Chris Evans)，礦工工會秘書；曾任一八九四年由資方和礦工工會共同建立的仲裁調解委員會 (Board of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的秘書。

里查·特萊夫立克 (Richard F. Trevellick) (一八三〇——一八九五)，一八六五年任造船木工與油灰工國際工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hip Carpenters and Caulkers) 主席；底特律行業工會 (Detroit Trades' Assembly) 主席；一八六九年，一八七一年及一八七二年任全國勞工會主席；建立過約五十個工會組織；曾協助完成綠背黨的建立工作並積極參加過幣制改革運動。

沙拉·培格利 (Sarah G. Bagley)，羅厄爾工廠工人；學校教師；一八四五年建立之羅厄爾女工勞動改革協會 (Lowell Female Labor Reform Association) 主席；曾任代表出席過新英格蘭工人協會 (New England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一八四五年的代表會。

李維·史萊姆 (Levi D. Slamm)，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為紐約制鎖工人雇員工會 (Journeymen Locksmiths'

Union of New York) 領導人；四十年代期間任紐約“平民” (Plebian) 編輯。

八 圖

亞歷山大·褚浦 (Alexander H. Troup)，全國印刷工人工會會計；曾代表波士頓工人總會 (Boston Workingmen's Assembly) 參加全國勞工會的建立工作。

(大) 亞歷山大·明 (Alexander Ming, Sr.)，印刷工人；一八二九年由紐約工人黨提名為州議會眾議員候選人；曾長期與湯姆斯·斯基德默 (Thomas Skidmore) 一起工作，並曾與之合編“權利平等之友” (Friends of Equal Rights)。

(小) 亞歷山大·明 (Alexander Ming, Jr.)，印刷工人；火柴民主黨運動 (Loco Foco Movement) 的領導人；一八三六年由火柴民主黨提名為紐約市市長候選人；一八三七年大恐慌時期曾積極從事於失業工人示威運動的活動。

亞歷山大·肯納第 (Alexander M. Kennady) (一八二九——一八九七)，印刷工人；舊金山行業工會 (San Francisco Trades' Assembly) 主席；八小時工作日運動及全國勞工會 (National Labor Union) 中的積極活動者。

阿道夫·斯瑞斯爾 (Adolph Strasser)，一八四七年任拉薩爾派組織北美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North America)的全國書記；一八七七年任國際雪茄工人工會(Cigar Makers' International Union)主席；曾積極從事于美國勞工聯盟的組織工作。

阿道夫·杜埃(Adolph Douai)，一八一九年生于德國；參加過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一八五二年移居到得克薩斯州并創辦了“聖安多尼時報”(San Antonio Zeitung)以反對奴隸制度；在波士頓舉辦了一個三級制的學校，并附設有幼稚園，是為在美洲成立的第一个幼稚園；任“工人聯盟”(Die Arbeiter Union)編輯直至一八七〇年；一八七八年轉任社會主義的“紐約人民時報”(New Yorker Volkszeitung)副編輯，直至一八八八年為止；同左爾格(Sorge)一起合作，對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組織起了很大的作用。

阿伯特·派生斯(Albert Richard Parsons)(一八四八——一八八七)，印刷工人；一八七四年起參加勞工運動，一八七六年後積極參加了美國工人黨的活動；一八七六年參加勞工協會；自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九年間為芝加哥社會黨提名之候選人；在一八八六年五月四日芝加哥秣市事件後的一次反勞工進攻中，他是犧牲者之一；一八八七年被非法判處死刑。

阿伯特·勃瑞斯培恩(Albert Brisbane)(一八〇九——一八九〇)，紐約著名大地主之子；十九世紀二十

年代後期去到歐洲，因而頗受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查理·傅利叶(Charles Fourier)影響；一八四〇年出版了他的“人的社會命運”(The Social Destiny of Man)一書，以闡揚傅利叶的理想和綱領，在此後，他開創了美國的合作會社運動。

羅伯特·施依靈(Robert Schilling)，全國制桶工人工會(Coopers' National Union)的第二任主席；一八七三年任工業大會(Industrial Congress)主席；一八七八年為國際勞工會(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創建人之一；勞工協會中的活動分子。

羅伯特·雷頓(Robert D. Layton)，一八八二年當選勞工協會書記。

(小)羅伯特·湯生德(Robert Townsend, Jr.)，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為紐約房屋建築木工工會(New York House Carpenters' Union)領導人。

羅伯特·霍華德(Robert Howard)，生于一八四四年；一八七八年任福爾河區紡織工人協會(Fall Rivers' Spinners' Association)主席；一八八〇年當選入州眾院，一八八五年當選入州參院；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為美國與加拿大有組織行業工會與勞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會計。

羅伯特·台爾·歐文(Robert Dale

Owen) (一八〇一——一八七七)，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之長子；一八二五年十一月與其父同至美國的新哈姆尼創辦合作殖民社，同法朗士·賴特合作出版“自由訊問報”(Free Enquirer)；曾積極從事于紐約工人黨的活動；曾三任印第安納州州議院議員(一八三六——一八三八年)，自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為國會議員；奴隸制的堅強反對者；曾協助解決美國與英國的奧勒岡糾紛；並曾協助建立史密遜學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彼得·阿瑟(Peter M. Arthur)(一八三一——一九〇三)，自一八六三年火車機工兄弟會(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一成立便與之有密切聯繫；一八七四年當選為該會總會長，逝世前一直擔任該職。

彼得·麥克基爾(Peter J. McGuire)，生于一八五二年；受德籍美國人社會主義者影響參加過拉薩爾運動；後來曾主張單純工會主義；一八七六年組織了社會勞工黨的英語區支部；一八八一年組織了木工和裝配工兄弟會(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起草為成立美國與加拿大有組織行業工會與勞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而召開的大會的宣言，此後并積

極從事于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活動；被稱為勞動日之父。

彼得·苦泊爾(Peter Cooper)(一七九一——一八八三)，製造工業家和發明家；一八五七年于紐約建立了“以推進科學和藝術為目的”的苦泊爾學社(Cooper Union)；曾支持綠背黨(Greenback Party)，並曾為該黨一八七六年的總統候選人。

依拉塔斯·羅特 (General Erastus Root) (一七七三——一八四六)，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紐約選舉法改革運動的領導人；紐約州副州長；國會議員及紐約州議院議員。

法朗士·賴特(Frances Wright)(一七九五——一八五二)，生于蘇格蘭；曾發表“美國社會及習俗研究”(Views of Society and Manners in America)一書；曾于田納西州積極從事農業殖民及黑人教育工作；“新哈姆尼報”(New Harmony Gazette)編輯；曾與羅伯特·台爾·歐文在紐約同編“自由訊問報”(Free Enquirer)；曾擁護提高女權，反對奴隸制，實行土地改革，推行大眾教育等運動。

九 團

威廉·夕威斯(William Sylvis)(一八二八——一八六九)，一八五五年為鑄工工會會員；一八五九年任全國鑄工工會(National Molders' Union)會計；內戰期在聯軍中服兵役；

曾任全國鑄工工會主席；作為一個卓越的勞工組織者對於內戰期及內戰後期的全國勞工運動曾有極大的影響；積極從事於建立全國勞工會(National Labor Union)的工作，並于一八六八年任該會主席；對於勞工的獨立的政治行動，對於合作社制度，國際勞工的團結以及婦女權利等，他是一位堅強的擁護者。

威廉·耳厄(William H. Earle)，工業自主會(Sovereigns of Industry)的組織人和主席，該會于一八七四年成立於麻薩諸塞州的斯柏令費爾德。

威廉·杰索浦(William J. Jessup)，紐約州工人協會(New York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主席；全國勞工會中活動人物。

威爾漢·威特靈(Wilhelm Weitling)，生於德國，一八四七年移民到美國；一八五〇年開始在紐約發行“工人共和國”(Republik der Arbeiter)雜誌，一八五五年雜誌停刊；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一年間為德籍美國人勞工運動中領導人物。

威廉·加里生(William Lloyd Garrison)(一八〇五——一八七九)，印刷業罷工及著名的奴隸取消主義者；一八三一至一八六五年間任“解放者”(The Liberator)編輯。

威廉·查寧(William H. Channing)(一七八〇——一八四二)，唯一神教派著名傳教士及和平主義者；曾宣講提高工人階級的理論；痛恨奴

隸制度，但對於內戰却表示反對。

威廉·哈爾丁(William Harding)，國際馬車制作工人工會(Coachmakers' International Union)主席；紐約行業工會(New York Trades' Assembly)領導人；全國勞工會(National Labor Union)創辦人之一。

威廉·卡倫·伯利揚特(William Callen Bryant)(一七九四——一八七八)，詩人和民主派的出版家；任“紐約晚郵報”(New York Evening Post)編輯達四十年；銀行鬥爭(Bank War)時期為杰克孫的堅強擁護者；曾極力為反奴隸制而鬥爭。

威廉·英格利士(William English)，制鞋工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費列得爾菲亞的勞工領袖；一八三五年及一八三六年時任費城各業工會主席，自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一年間為費城工人黨領導人，一八三五年由民主黨提名當選賓夕法尼亞參議員。

威廉·韋斯特(William West)，一八六九年建立的新民主會社或稱政治公社(New Democracy or Political Commonwealth)的通訊秘書並為該社駐全國勞工會的代表；曾主張人民復決權及自願結合的社會主義為社會改革的真實道路。

約翰·杰瑞特(John Jarrett)，一八四三年生於英格蘭；一八七三年任沃堪之子(Sons of Vulcan)煉鐵工人工會副主席；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任鋼鐵工人聯合會(Amal-

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主席。

約翰·塞米爾(John Samuel)(一八一七——一九〇九),曾參加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費列得爾菲亞的勞工運動;一八五七年進行玻璃工人組織工作;六十年代時期,主要致力於合作社運動。

約翰·芬區(John Finch),印刷工人;一八三三年八月積極從事于紐約各業工會(New York Trades' Union)的組織工作;兩篇討論紐約勞工運動的小冊子的作者。

約翰·麥克布萊德(John McBride),生于一八五四年;俄亥俄州礦工工會(Ohio State Miners' Union)主席;一八八三年及一八八五年當選俄亥俄州州議員;曾積極從事美國勞聯的活動并于一八九四年任該會會長一任。

約翰·康默福特(John Commerford),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工會運動中出色人物;全國各業工會(National Trades' Union)秘書;一八三五年任紐約各業總工會(General Trades' Union of New York)主席并編輯該會機關報“團結”(The Union);曾積極參加火柴民主黨運動。

約翰·費倫巴區(John Fehrenbach),機械工與鐵工工會(Machinists' and Blacksmiths' Union)主席;曾主張建立全國性的工會聯合會;一八七六年當選入俄亥俄州州議會,兩年後在聯邦政府中担任职務。

約翰·斯文登(John Swinton), (一八二九——一九〇一),內戰時期為“紐約時報”總編輯,後對勞工運動頗有興趣,一八七四年由工業政治黨(Industrial Political Party)提名為紐約市市長候選人;一八八〇年與馬克思相晤於歐洲;在自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間曾發行一種勞工周刊,稱之為“約翰·斯文登報”(John Swinton's Paper);此後畢生為勞工利益而鬥爭。

約瑟夫·衛登麥爾(Joseph Weydemeyer)(一八一八——一八六六),普魯士軍團中的炮兵軍官;一八四六年晤馬克思及恩格斯;一八五一年至美國;一八五二年開始發行“大革命”(Die Revolution),不久并發行“改革”(Die Reform);後漸成為德籍美國工人勞工運動中卓越的領袖人物;內戰爆發時,以上尉軍官資格參加聯軍,退休時已升至准將級軍官;戰後在聖路易編輯“新時代”(Die Neue Zeit);一般目之為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

約翰·柯林斯(John A. Collins)(一八一〇——一八七九),羅伯特·歐文信徒;反奴隸運動組織者;根據歐文主義原則作為反奴隸制度實驗,曾于紐約州建立“斯克尼亞脫斯(紐約一湖名。——譯者)公社”(Skaneateles Community);“共產黨人”(The Communist)乃該社機關報。

約翰·費拉(John Ferral),手織布工,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費列得爾菲

亞的卓越勞工運動領導人物；領導了該城一八三五年為爭取十小時工作日的全面罷工；後來乃積極從事于土地改革運動。

約翰·溫特(John Windt)，印刷工人雇工，紐約印刷工人工會領導人；曾積極從事火柴民主黨及土地改革運動；一八三七年經濟大恐慌時期失業工人游行示威中的重要人物；全國改革協會(N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的秘書，工業大會(Industrial Congresses)代表。

約翰·西尼(John Siney)，煤礦工人工會早期歷史中的卓越人物；斯庫基爾郡工人福利協會(Working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 of Schuylkill County) (礦工組織)的創辦人；一八七三年組織并領導了全國礦工協會(Miners' National Association)；死于一八八〇年。

約翰·興赤克利夫(John Hinchcliffe)，在伊利諾州柏利維勒創刊的“礦工周刊”(Weekly Miner)的出版者；曾積極從事全國勞工會的活動及綠背黨運動。

約瑟夫·雷·布加南(Joseph Ray Buchanan)(一八五一——一九二四)，西部勞工運動領袖及編輯；曾積極努力建立勞工協會(Knights of Labor)與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之間的團結。

約翰·台維斯(John M. Davis)，曾任匹茲堡“全國勞工論壇報”(National Labor Tribune)編輯及勞工

協會第三號區協會主席。

約翰·法卡爾(John M. Farquahr)，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七日生于蘇格蘭；曾作印刷工人、編輯及出版家；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二年任全國印刷業工會(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主席兩任；參加聯軍作上等兵，后升至少校職；以共和黨員身份被選入第四十九屆國會。

約翰·謝頓(John Shedden)，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間為費列得爾菲亞勞工界活動分子；第一國際費列得爾菲亞小組會員。

查里·道格拉斯(Dr. Charles Douglas)，新英格蘭農民、技工及其他工人聯合會(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Farmers, Mechanics and other Workingmen)第一屆大會主席；一八三一年曾協助創辦一種名為“新英格蘭技工”(New England Artisan)的勞工周刊；一八三四年一月協助建立波士頓總工會(General Trades' Union in Boston)；大眾教育的熱烈擁護者，并曾極力表示對新英格蘭各工廠情況的抗議。

查里·戴拿(Charles Anderson Dana)(一八一九——一八九七)，*“紐約論壇報”*總編輯；一八四九年晤馬克思于歐洲，乃請他為該報歐洲通訊員；后任*“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總編輯。

查里·李其曼(Charles H. Litchman)(一八四九——一九〇二)，製鞋工

人协会 (Knights of St. Crispin) 的全國總書記，并任劳工协会 (Knights of Labor) 總書記十四年。

十 画

馬丁·佛蘭 (Martin A. Foran)，一八八四年生于賓夕法尼亞州的羅斯刻罕那郡；業制桶木工，后組織國際制桶工人协会 (Coopers' International Union) 并任該会主席；曾極力主張成立全國各業工会的聯合組織；从事政治活动后成为律师；一八七四年被选为克里夫蘭的檢察官，一八八四年当选为國會議員；并連选連任教次。

馬太·卡瑞 (Matthew Cary) (一七六〇——一八三九)，費列得尔菲亞商人；曾撰寫多种小册子以揭示工人階級所处的慘痛情况并呼吁改革；極力主張普及教育和內政改革。

馬麗·華尔斯頓克萊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一七五九——一七九七)，英國作家及男女平权主义者；在文字方面为爭取妇女解放的先驅；所著“拥护女权”(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一書于一七九二年出版，該書曾在美國各地翻印。

紐威尔·但尼尔斯 (Newell Daniels)，制鞋工人协会創始人之一。

班哲民·伯特勒 (Benjamin F. Butler) (一八一八——一八九三)，劳工权利的積極維護者，領導过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內战期任聯軍中

將官；一八七八年以独立綠背党人資格被选入國會；一八八二年当选麻薩諸塞州州長；一八八四年由反壟断主义党 (Anti-Monopoly Party) 提名为美國總統候選人。

泰倫斯·泡德利 (Terence V. Powderly) (一八四九——一九二四)，一八七〇年参加机械工与鉄工工会 (Machinists' and Blacksmiths' Union)；劳工协会 (Knights of Labor) 区协会秘書，并于一八七九年当选为工会总会長；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二年任斯克蘭吞市長；曾拥护共和党并于一八九七年被委任为美國移民首席檢查官。

愛德華·施列格尔 (Edward Schlegel)，拉薩尔派社会主义者；曾任代表出席全國劳工会 (National Labor Union) 一八六六年年会；曾積極主張建立独立的劳工政党。

愛利休·伯利特 (Elihu Burritt) (一八一〇——一八七九)，鉄工，奴隸取消主义者及世界和平組織的堅強拥护者；一八四八年在布魯塞爾組織了第一个國際和平大会 (International Peace Congress)。

十一 画

麥克唐奈尔 (J. P. McDonnell)，一八六九年后即与馬克思及第一國際發生联系；到美國后参加了美國工人党 (Workingmen's Party)；任該党英語机关报紐約“劳动旗帜”(Labor Standard) 編輯；一八八三年組

織了新澤西州各業勞工工會聯合會 (New Jersey State Federation of Trades and Labor Unions), 并任該會主席共十五年; 一九〇六年逝世。

十二 圖

湯姆斯·道爾 (Thomas W. Dorr), 羅得島選舉制改革運動的領袖; 一八四二年當選羅得島州長; 一八四四年從事憲法的民主改革運動失敗後被判处無期徒刑; 一八四五年六月被釋放; 一八五四年法院對他的裁判始失效; 死于一八五五年。

湯姆斯·菲列浦 (Thomas Phillips) (一八三三——一九一六), 生于英格蘭; 一八五二年來到美國; 曾積極從事于制鞋工人工會的組織工作; 按照羅其代爾計劃在美國費列得爾非亞創立第一個合作組織; 積極從事制鞋工人協會 (Knights of St. Crispin) 及勞工協會 (Knights of Labor) 的活動; 一八八九年當選鞋靴製造工人國際工會 (Boot and Sho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主席。

湯姆斯·戴佛爾 (Thomas A. Devyr), 愛爾蘭土地改革主義者; 在美國參加了喬治·亨利·伊文斯的土改運動; 曾在紐約編輯“全國改革人” (National Reformer) 及“租稅反對者” (Anti-Renter) 兩種期刊。

湯姆斯·斯基德默 (Thomas Skidmore), 機械工人, 是一八二九年出版的

“人的財產權”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一書的作者; 曾主張土地改革; 一八二九年曾積極為紐約工人黨的組織工作進行活動; 一八二九年為工人黨提名的眾議院議員候選人。

湯姆斯·阿姆司特朗 (Thomas J. Armstrong), 一八七〇年間在匹茲堡發行的“全國勞工論壇報” (National Labor Tribune) 編輯; 一八八二年曾由綠背一勞工黨提名為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候選人。

斯蒂芬·辛柏遜 (Stephen Simpson) (一七八九——一八五四), 第二合眾國銀行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票務科職員, 又曾列得爾非亞基納德銀行 (Girard's Bank) 出納; 在傑克孫的領導下參加了新奧爾良之戰 (Battle of New Orleans); 一八三〇年由費列得爾非亞工人黨 (Workingmen's Party) 及聯邦黨 (Federal Party) 提名為國會議員候選人; “工人手冊: 根據生產是財富的源泉這一原理的政治經濟學的新理論” (The Working Men's Manual: A New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Principle of Production the Source of Wealth) 的作者, 該書于一八三一年于費列得爾非亞出版; 最初曾反對合眾國銀行, 但後來在其所著“工人手冊”附錄中竟為該銀行辯護因而失去原來在他領導下的工人群眾的擁護; 一八三一年他擔任

了保守派報紙“賓州獨立黨人”(Pennsylvania Whig)的編輯職務。

斯培叶(J. G. Speyer), 第一國際美國小組會員; 一八七六年曾積極從事于紐約各業勞工聯合會的改組工作。

凱特·穆朗尼(Kate Mullaney), 特洛伊硬領製造工人協會(Troy Collar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主席; 被委派為全國勞工會職員及組織者。

惠雷(J. C. C. Whaley), 華盛頓行業工會(Washington Trades' Assembly)主席; 曾積極從事于全國勞工會的組織工作并任該會第一任主席職務。

菲利浦·凡派登(Philip Van Patten), 一八七六年成立的美國工人黨(Workingmen'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全國總書記; 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的熱烈同情者; 一八七九年當選為社會主義勞工黨(The 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全國總書記。

十 三 畫

塞米爾·岡伯斯(Samuel Compers) (一八五〇——一九二四), 生于英格蘭, 曾作雪茄烟廠學徒; 一八六三年偕其家人來到美洲; 參加了雪茄製造工人工會; 和阿道夫·斯澤斯爾(Adolph Strasser)一起重新改組了國際雪茄工人工會(Cigar

Makers' International Union)并担任該會第一四四號分會主席職務; 積極參加了美國與加拿大有組織行業工會與勞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及美國勞工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組織工作; 除一八九四年一年外, 自一八八六年美國勞聯成立起至一九二四年他本人逝世時為止一直担任美國勞聯主席職務。

塞斯·路得(Seth Luther) (一八一七——一八四六), 木工; 早期勞工運動組織者; 波士頓總工會(Boston General Trades' Union)秘書; 發表了數種對於三十年代勞工運動有重大意義的小冊子。

塞米爾·艾倫(Samuel Classon Allen), 公理會牧師; 國會議員; 一八三三年由工人黨提名為麻薩諸塞州州長候選人; 曾團結麻州工人黨以支持杰克孫的硬幣政策。

塞米爾·克明斯(Samuel P. Cummins), 積極參加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麻薩諸塞州的勞工運動; 制鞋工人協會(Knights of St. Crispin)的領導人, 在全國勞工會(National Labor Union)中担任極重要的角色。

詹姆斯·賴特(James L. Wright) (一八一六——一八九三), 一八三七年為費城成衣工人福利會(Tailors' Benevolent Society of Philadel-

phia)會員；勞工協會最初組織人之一；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一直為勞工協會中居于領導地位的會員。

詹姆斯·威佛爾(James Baird Weaver)(一八三三——一九一三)，*“愛俄華論壇報”(Iowa Tribune)*編輯；第四十六屆國會中議員；一八八〇年由全國綠背一勞工黨(National Greenback-Labor Party)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并曾獲選票三十五萬余；后當選入國會，積極從事于人民黨運動。

詹姆斯·索弗林(James R. Sovereign)，*愛俄華州一*編輯；一八九四年排擠掉泡德利自己占據了勞工協會的工會總會長職位。

奧托·衛登麥爾(Otto Weydemeyer)，約瑟夫·衛登麥爾之子；繼父志進行工作；一八七六年后在社會主義勞工黨及國際勞工會(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中央委員會中居領導地位；一八七七年完成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第一部英譯普及本的翻譯工作。

奧瑞斯第斯·伯朗遜(Orestes Augustus Brownson)(一八〇三——一八七一)，生于維爾蒙州；自一八二九年至一八四〇年一直同工人運動有着極密切的聯系；后因一八四〇年凡·布倫(Van Buren)的失敗感到絕望乃加入了保守陣營。

費茲派特立克(P. F. Fitzpatrick)，曾任鑛工工會主席及美國勞工聯盟第一任副主席。

十四 圖

維多利亞·伍德哈爾(Victoria Claplin Woodhull)(一八三八——一九二七)，婦女參政及“社會自由”的積極擁護者；國際工人協會美國組第十二組的領導人；一八七〇年與其妹田納西·克萊福林(Tennessee Claflin)創辦了“伍德哈爾及克萊福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一八七二年曾由權利平等黨(Equal Rights Party)提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赫爾曼·克利格(Herman Kriege)，自一八四五年起即積極從事德籍美國人的勞工運動；土地改革的熱烈擁護者。

十五 圖

魯新·塞尼爾(Lucien Samial)，巴黎公社參加者之一；積極從事于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的活動，該黨分裂后則從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的活動。

十六 圖

霍瑞斯·戴義(Horace H. Day)，布魯克林的一位熱心于全國勞工會工作的富有的慈善家；對於幣制改革運動及生產合作社運動主張甚力。

霍瑞斯·格利雷(Horace Greeley)(一八一——一八七二)，編輯和政治領導人物；一八四一年四月十日開始發行“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 傅利叶主义拥护者并曾与阿伯特·勃瑞斯培恩合作; 曾竭力攻击黑奴制度; 共和党中活动人物; 紐約印刷工人工会 (New York Printers' Union) 主席; 一八七二年曾作为自由共和党 (Liberal Republican Party) 候选人参加过美國总统竞选活动。

錫俄非勒斯·费斯克 (Theophilus Fisk), 生于一八〇一年; 急進派的杰克逊运动的領袖; 原名“新英格蘭技工” (New England Artisan) 后

更名“波士頓改革者” (Boston Reformer) 一報的副編輯; 一八三五年曾为代表出席全國各業工会 (National Trades' Union) 的代表会。

十七 圖

戴义 (J. G. Day), 木工, 生于加拿大; 旧金山各行業工人工会 (Workingmen's Trade and Labor Union of San Francisco) 主席, 該会乃一八七八年丹尼斯·几尔尼所建立。

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7

美國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从殖民地时期到劳联的成立

〔美〕方 纳著
黄雨石、王仲英、黄寧而合译
沈國芬、陈大春、黄巨兴

*

生活·讀者·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8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350×1163公厘 $\frac{1}{32}$ · 印張27 $\frac{3}{8}$ · 插頁5 · 字數661,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6,500 定价(7)3.20元

統一書号11002·50



